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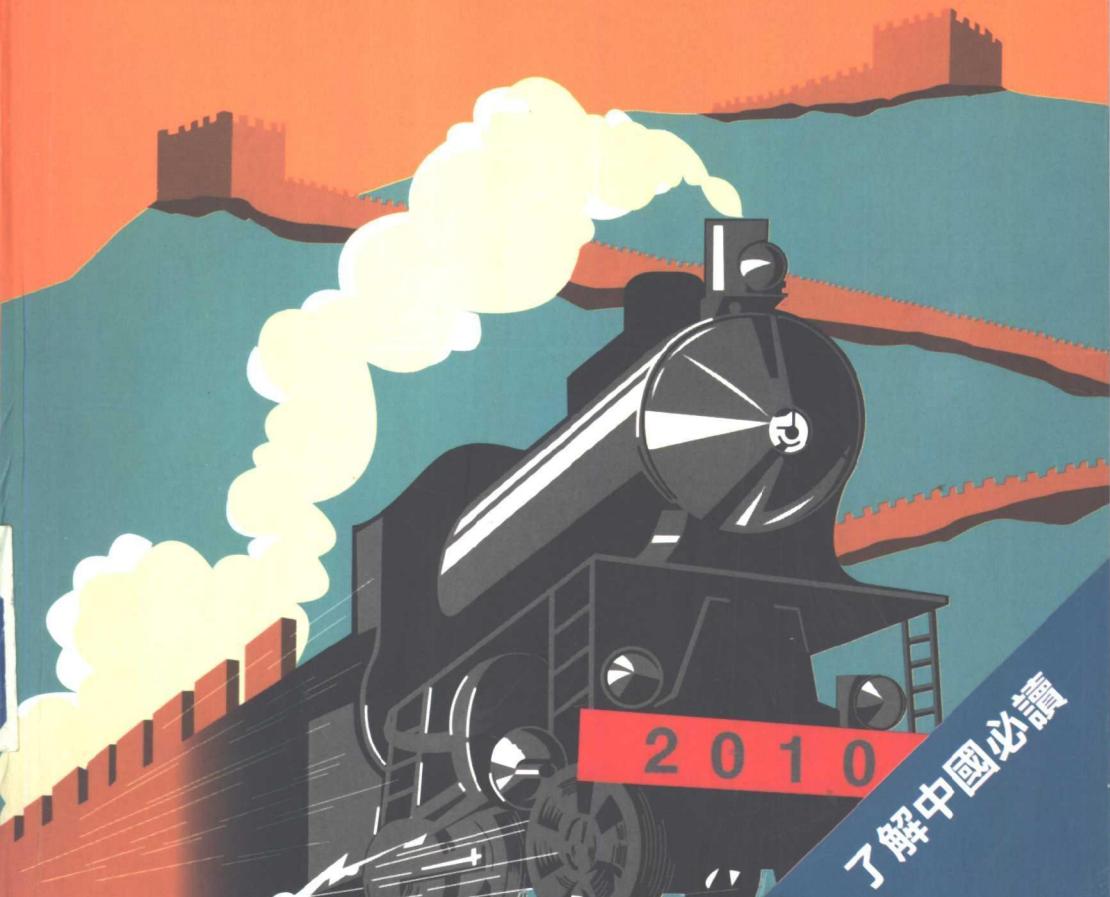
建國以來

1949
1997

客觀、深入淺出的經濟政治述評
張家敏 著

[下]

香港政策研究所出版



2010

了解中國必讀

此書對中國的發展提供了相對客觀的深入分析，作者利用近年來中國內部陸續公開的許多珍貴資料，重新描繪出四九年以來整個發展過程，使讀者可以擺脫舊有的意識形態迷執，清楚地認識其中的脈絡因由，有助於理解今後中國的發展，即使對從事中國貿易和投資的人，亦大有裨益。

陳文鴻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總幹事兼商學系教授

張家敏在香港大學讀書時，即積極推動對中國國情的瞭解和研究。他博聞強記，實事求是，態度誠懇而客觀，不囿於任何黨派的立場，也不會走進意識形態的迷宮。十多年來，他仍能孜孜不倦，對中國的現代史繼續探索，並將心得編寫成書出版，在香港回歸中國的重要時刻，實在饒有意義，本書也當成為一般市民和年輕人的有用參考書。

陸人龍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助理校長 原香港大學歷史系高級講師

在這本書中，家敏全面地及客觀地介紹了中共建國以來所走過的迂迴曲折的道路。書中且包括了作者個人的體會。對於希望認識當代中國的讀者來說，此書是一本值得推薦的入門讀物。

劉兆佳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講座教授

作者自求學時期已積極研習國是，對國情有透澈、獨到的觀察，本書讓我們能溫故之順逆而儆惕未來，亦為大眾研究分析中國經濟政治問題的必備參考。

何綽越先生 瑞士聯合證券 香港及大中華市場主管
獲亞洲貨幣雜誌選為 94、95、96 三年度之「最佳中國分析師」

此書史料詳實豐富，分析全面冷靜，甚有助把握中國四十八年波瀾壯闊的經濟演變歷程、政府在各時期經濟政策形成的背景、和中國今後經濟發展和改革的趨勢。

馬國南博士 美國經濟學博士 美國信孚銀行亞洲經濟學家

張家敏長期有系統地探研中國問題，並經常提出有創見的觀點。此書資料詳盡，並著重分析「文革」及改革開放後的發展，是一本難能可貴的紮實作品。

ISBN 962-8240-02-1

魯凡之先生 香港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及政論家



9 789628 240029

定價(上下冊)：港幣二百八十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建國以來

1949-1997

客觀、深入淺出的經濟政治述評

張家敏 著

香港政策研究所出版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建國以來 (1949-1997)

著 者：張家敏

出 版：香港政策研究所

香港沙田小瀝源源順圍 10 號 6 樓

電話：2686 1973 傳真：2648 4303

製作承印：傳真廣告印刷公司

香港灣仔譚臣道 114 十樓 A 座

電話：2838 1699 傳真：2838 1786

封面設計：吳玉盈

定 價：港幣 280 元（上下冊）

國際統一書號 (ISBN)：962-8240-02-1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獻辭

獻給自一八四零年以來為
爭取中國主權獨立及富強
民主而奮鬥的人們

獻給建設美好香港，譜寫
一國兩制新樂章的人們

獻給我的妻子李婉如

2024/02

鳴 謝

我首先要感謝葉國華先生支持本書的出版，葉先生是一位家中坐擁書城、書不離手的知識分子型企業家，我很高興有不少機會與葉先生接觸，他很多精闢的觀點對我有一定的啟發。

在出版本書的過程中，我得到李嘉詠小姐、鄺心美小姐、區萬德先生，劉白露小姐和很多的朋友的協助，陳少彬先生及羅慧瑩小姐更為本書的出版付出很大的努力。

我亦要感謝傳真廣告印刷公司的謝國治先生及他的同事為本書的出版作出的協助。

此外，我希望在本書出版的時刻，感謝百富勤証券有限公司的上司及同事對我的支持和關心，百富勤是一家十分重視專業知識及研究的投資銀行，公司的工作環境及各同事的專業知識加深了我對經濟運作的理解。我特別要感謝我的老同學、好朋友及同事鄧克騰先生及黃灌球先生對我在很多方面的協助，他們對金融財經運作有透澈的認識，並給予我很多寶貴的意見。

我亦要感謝思想家及評論家魯凡之先生長期對我的指導，魯凡之先生曾出版有關文化、歷史、哲學、社會學、中國當代經濟及政治等學術著作二十本，他理論根基深厚，知識博大，對我理解各種不同理論有很大的裨益。

我特別要感謝敬愛的父母對我的教導、關懷與培養，使我在一個快樂的家庭成長。

最後，我衷心感謝我摯愛的妻子李婉如，她在我寫作的過程中給予我很大的關懷、支持和忍耐。她從事中國投資的諮詢工作，對大陸經貿問題有深入的認識，她經常和我討論問題，並給予很多很好的意見。

葉國華序

我很高興為張家敏先生這本百萬字的著作《建國以來》(1949-1997)作序。

我修讀中國歷史、哲學出身，對中國大陸、台灣、香港的發展十分關心。我的興趣比較狹窄，喜歡看政治、歷史、經濟、社會科學各類書藉，以及邀請朋友來我家談天說地。早在五十年代，我還是年青小伙子的時刻，便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後來我從商，較早返大陸投資，故亦認識不少政府及商界的朋友。我想我跟所有的香港人一樣，受到三個很大的時代衝擊；一是一九七六年毛澤東的逝世及四人幫下台，二是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中國宣佈收回香港，三是一九八九年北京學運事件，每次歷史事件都對我帶來很大的思想衝擊。在這裡，我希望將多年來思索的四點經驗與大家分享。

第一是要堅持自己的信念與理想，懷著對社會、對國家，甚至對世界的熱誠，以「一以貫之」的態度，盡自己的本份及貢獻。只有真正緊守立場，方能做到問心無愧，理直氣壯的面對時代的挑戰。

第二是獨立思考及包容性強。我們是獨立的個體，一定要有獨立思考及批判的能力，不人云亦云，不盲從附和，面對複雜的形勢，一定要以理性、冷靜的態度、對事物作全面的分析來作出合理的判斷。此外，在研究問題的過程中，在投入之餘，一定要有點「抽離」的態度，這樣才能避免各走極端，無法回頭，甚至作出無謂的犧牲。

我在強調堅持原則及獨立思考的同時，亦十分著重包容性。要實踐民主，一個大前題就是衷心考慮各方面不同的意見。社會是多元化的，存在著各種意識形態和力量，不同「力」的衝擊構成了整個社會，我們要有兼容的量度，不應片面的排斥「異己」，就如香港社會，她的成功實際上由於其兼容性，我喜歡稱之為「五元文化組合」，這個組合包括儒、釋、道等中國傳統文化；英國在港實行的文官法治精神及基督文化；美國戰後發展之系統理論如邏輯化、計量化及系統化等；傳統之日本文化

與西方文化交流激盪而成之企業及刻苦工作要求；以及中國在近數十年流至香港的中國文化意識等。

第三是要堅持一種「不斷實踐」的人生態度。在哲學上我受拜恩斯坦的影響，他說：「終極的目的是沒有的，運動便是一切」，我認為等待一個完美終極的社會出現是不實際的，最重要的是今日的所有行動、工作及生活，才是最有意義的。年青時我崇尚一個最後目標，所以無論生活多困苦，我也可忍受，因為我追求一個人間天堂，但經過多年的實踐，我發覺應把握每一日去創造、去實踐，這樣才能產生積極意義，至於五十年一百年後的事情，未經實踐，無人確知，故只能做好今日。

第四是物質與精神，或經濟與政治的關係。我希望用「奶粉與傳道」來說明此道理。小時候，正值二次大戰後不久，物質很貧乏，那時有些傳道人來講道理，我們一群小孩子圍著聽，但眼睛只看著那些一罐罐的奶粉，目標只在聽完道理後拿奶粉，但是聽得多了，又慢慢覺得傳道人有點道理，這是說明一種意識形態，若加上即時的經濟基礎或物質報酬就更能突顯其說服力。好像中國在改革開放前的一套理念很完美，但其物質基礎很令人失望，故此，中國領導層在七八年改革開放政策確立後，便正視此問題，既重視精神文明，亦強調經濟發展，並在精神及物質文明兩個方面的建設中，既重視中國實際情況，亦關注與世界的接軌，這樣，中國政策的理念就更有基礎，更使人信服。

十數年的改革開放為中國帶來舉世矚目的成就，而在經濟體制轉軌及進一步發展的進程中，中國亦面對不能迴避的挑戰，我相信要了解中國的現狀與未來，一定要對她走過的步伐有所理解，我認為張家敏先生這本《建國以來》有下列幾個特點：第一，這是一個在香港土生土長的青年知識分子以獨立思考及新觀點評述中國自四九年以來發展的著作。作者在寫作過程中從多個不同角度，翻閱海內外，不同觀點的資料來論證他的觀點，是一本開放、客觀及具新觀點的著作；第二，此書著重資料性及分析性，全書百多萬字，重視資料出處及註釋，並從經濟、社會及政治層面綜合分析問題，既具學術嚴肅性，又深入淺出和易讀；第三，現實性較強及有一定的前瞻性。此書除從多角度評述中國四十八年的發

展之餘，尤著重經濟方面的分析，基於經濟建設已成為中國發展的最重要議題，故此方面的論述實有助讀者理解中國發展的重點。此書的最後一篇「改革十九年宏觀政策」中，作者以較大篇幅從社會、經濟及政府與民間政策三個方面分析十九年改革與發展的情況，頗具前瞻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十八年發展史是一個十分大的題目，此書是現時唯一的論述這方面的著作，我期望社會上有更多這方面的著作，並希望此書的出版能引發社會對中國發展有更多理性、深入及高水準的討論。

雖然讀者對中國這四八年的歷史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和觀點，但我希望指出，這書畢竟是一本了解中國四八年以來發展及前瞻不可多得的著作，我誠意的向各位推薦。

一九九七年五月

葉國華先生是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特別顧問、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及運科集團主席

自序

醞釀出這本書是一九八零年的事，到現在已有十八年的光景了。

我在一九七九年進入香港大學，當時的學運正陷入低潮。七六年四人幫倒台，香港學界的理想隨即破滅，很多以前被認為是正義的、是社會主義的東西被否定。不少在七六年以前追求社會主義理想的學生無法接受這個衝擊，霎時間，學運迷失了方向，陷入一片沉寂的死靜。經過數年的沉思，香港年青知識分子總結出新的經驗，他們了解到再不能像過往那樣只倚仗豐富的感情及情緒，片面地了解國家和社會的情況。在學界處於較理性和開放的時刻，我在一九七九年底當上港大學生會國事學會主席。

十分幸運，幼年時的經驗使我沒有像其他學運前輩們面臨理想幻滅的衝擊，在剛進大學參與社會事務時，能夠以較理性的觀點看問題。我從小就十分喜愛看有關歷史人物的連環圖，影響我最深的是中國宋朝的民族英雄岳飛，岳飛是一個逢戰必勝，保家衛國，抵抗外敵的長勝將軍，但後來卻給苟且偷安的人害死了，他的悲壯收場對當時就讀小學二年級的我衝擊很大，我的民族感情被岳飛的事跡引發出來。雖然我是一個富民族主義的人，喜愛看中國大陸的「創業」、「紅雨」等宣揚艱苦建國的電影，喜歡聽「我的祖國」、「歌唱祖國」及「我愛祖國的藍天」等歌曲，在八二年中英就香港前途談判前已明確公開支持中國收回香港主權。但由於我小時候親眼見到一九六七、六八年文革期間香港的情況，因此，使我對大陸的觀感也帶上一點理性及疑問的色彩。文革期間香港十分混亂，經常有示威及放置炸彈事件，政府亦常宣佈戒嚴。當時，我家住在灣仔，在位於港島西區般咸道的聖保羅書院上小學，由於褓姆車載我們上學時要經過港督府，經常碰到示威，故為安全計，司機經常放棄只需十五分鐘的路程而繞道深水灣及南區，每次花上一小時接送我往返學校，當時我們根本不知危險，還對可以「遊車河」看風景感到十分愜意。當時真正令我感到害怕的是由於文革期間中國大陸出現武鬥，很多被縛

著手腳的浮屍漂流到香港。此外，有一次我的學校出現了一條大橫額，內容應是寫一些文革的口號，當時學校十分緊張，所有學生被指示站在操場，我們更見到有警察來到學校，後來更聽說有些高年班的同學被逮捕了。最令我親身感到恐懼的是有一次媽媽拖著我回家，有一個中年男子用水潑我媽媽，由於當時社會上有淋濺水的情況，我們十分害怕，飛跑回家。後來我從研究得知，香港文革期間出現的示威基本上是殖民地統治下長期經濟和社會矛盾的結果，所以才能捲入那麼多人。

此外，由於改革開放前大陸經濟較差，與很多香港人一樣，我爸爸常長途跋涉走過羅湖橋，攜帶很多物資乘火車帶給在大陸的親人。一九七五年，我開始陪家人返大陸，在大陸期間，我一有機會便會以好奇但關心的心態詢問親戚及碰到的人的生活。七七年夏天，在到北京及上海的旅行中，儘管當時鄧小平仍未第三次復出，我已感到氣氛較以前開放。在七九年進入大學前，我再到北京及上海等地旅遊，更感到改革開放的威力，大陸市民不單生活有所改善，心情也較舒暢，並敢於向我這個小伙子喋喋不休提出他們面對的種種問題，如物價、住屋、就業及婚姻等。

「找方向，探前途，為中國尋出路」是我們一九八零年國事學會的政綱，我們認為國事學會除了向校內同學迅速報導及分析國內事情外，還有責任為中國的前途路向提出批評及建議。除爭鳴國事，共謀獻策外，我們也認為有責任為中國輸入新的管理知識，以協助日益重要的經濟建設。在研究中國及給予建設性意見的過程中，我與一些有心的朋友總結出兩點經驗：第一是假若要為中國出謀獻策，則一定要以理性的態度，從經濟、社會、政治、甚至人民心理的層次理解過去及現在的中國，分析她所面臨的各種國內外環境，切不可重蹈過往部分人士只著重激情、缺乏客觀分析的覆轍；第二，由於經濟建設是中國四人幫下台後最主要的任務，故要理解中國，則不得不對經濟，尤其是中國大陸的經濟有一定的認識。在此認識下，我決定主修經濟，希望這樣對我參與建設中國有一定的幫助。

從參與國事學會、學生會中央工作開始，直至大學畢業後的多年

裡，我經常接受多個不同機構及團體的邀請，就當代中國問題作出超過三百次的演講。早在八零年代，已有很多朋友建議我應將演講及一些發表過的文章紀錄下來，出版一本有關當代中國的書。從那時開始，我便開始有出版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書的念頭。經過數年的準備，我於八六年乘在修讀碩士課程前的空檔時間，開始動筆。不知不覺，直至現在，已寫了十年多。寫作此書最大的困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是一個十分大的題目，為尋求事情的真相並作出持平的評論，我不單需要參考大陸、台灣、香港及海外的書本雜誌，更要閱讀和接觸第一手資料，包括各種原始文件如中共官方政策文件、各類大陸舊報紙、紅衛兵和民間刊物。我個人尤其重視回憶錄，也喜愛聽一些從大陸到香港定居的朋友講述他們在大陸時的親身經驗。通過對各方面資料不同角度的相互對比，盡量保證寫出來的東西能較客觀及持平地評述中國自四九年以來的歷史。

由於我正常的工作佔用大部分的時間，而我自八五年開始亦參與不少社會事務，故只能在下班、假期或利用轉職時的空檔時間寫作，過程十分艱苦，經常徹夜不眠，常常為尋找一個資料而多次跑書店及圖書館，而家中差不多所有的地方都擺滿了書籍，更霸佔了整個飯廳，我已多年不能在飯廳吃飯了。而更要命的，其實也是一個可喜現象，是隨著中國經濟及社會進一步開放，出版學術界呈現一片活潑氣氛，很多過往未公開的材料及評論不斷展示於世，從而使更多歷史真相曝光，但這樣就迫使我不得不修改已寫過的內容。與此相關的，就是中國自七八年底改革開放，尤其是鄧小平九二年南巡以來，改革及發展的步伐實在太多采多姿，真可謂翻天覆地，令人驚訝讚嘆之餘又眼花瞭亂，中國不斷變化的形勢著實使我著迷，要將這些重要的變革冷靜地消化及分析使我的寫作好像永遠完不了，不少知道我正在寫此書的朋友經常催促我盡快出版，我的太太李婉如也不斷勸告我要下決心收筆。在十年間不知不覺間本書已三易其稿，參考了約三千份材料，寫到九七年五月，完成了約一百萬字。

由於工作及參與社會事務的關係，我經常有機會往返大陸並接觸不同階層及各方面的人士，這些經歷給予我很多感性認識，並影響我對現

階段中國大陸發展的看法。雖然中國在經濟體制轉軌及經濟發展過程中面對著眾多不能迴避的困難，如通脹、失業、貪污、治安、娼妓、執法力度不夠，以及政制改革有待進一步深化等，但經過長期對大陸的理解及接觸，我感到隨著社會及經濟進一步發展，以及政府與各方面人士的推動及努力，情況將會進一步改善。記得我曾向一位很有才華，站在中國政府改革前線的年青官員請教中國經濟發展事宜時，他的話深深的打動了我。他說：「我們這代在四九年及五十年代初期出生，在發育時期，碰上了大躍進，糧食供應不足。年青求學時期，碰到文化大革命，社會一片混亂無法上學。等到七九年改革開放，希望大展拳腳為國家建設時候，政府開展了經濟體制改革，為提高效率及盈利，不少企業裁減冗員，很多與我同年代的人因而面臨失業，無法實踐理想。我現在有幸在政府工作，正遇上中國理性發展的黃金時刻，我必須珍惜這個機會，盡力把工作做好。」此外，在我參與香港回歸的工作中，我接觸到很多大陸官員，他們日以繼夜、默默地為香港實踐一國兩制做了大量工作。與這些站在中國改革各個崗位的官員接觸，使我感到縱使前路險阻，但中國仍充滿希望。

事實上，觀乎一八四零年鴉片戰爭以來，現時中國的局面著實得來不易，人民生活大幅改善、社會思想日趨開放，出版異常蓬勃，書籍刊物種類繁多，人民在討論時往往觀點尖銳，比過往進步不少。本書希望以一種開放、客觀、持平的態度，通過對社會、經濟及政治等各方面的分析，為讀者提供中華人民共和國自一九四九年建國以來的歷史發展情況。

這書的內容基本是依據歷史時期，突出每個階段的重點，而形成十二篇，共六十八章。在這裡我希望提出如下四點：第一，雖然此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四九年以來歷史的述評，但由於我個人喜愛研究文化大革命及七八年底開展的改革開放，故這兩部分著墨較多，我很希望此書能對讀者理解以上兩個題目有所幫助。此外，由於歷史原因，台灣的發展與大陸的經歷基本屬於不同範疇，故本書只在兩岸統一部分中才涉及台灣的情況。第二，基於經濟建設，可以說是四九年建國以來的重要國

策，故此書很著重討論與經濟有關的重要事件。然而，我希望強調此書並無艱深的經濟術語，在寫作過程中亦對不同概念深入淺出地闡析，務使一般讀者能容易理解；第三，此書雖著重過去，但亦強調現在與將來，希望從眾歷史教訓中總結出一些對將來有幫助的經驗。例如此書對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後中國的發展作出較詳細的論述，希望使讀者能更易掌握中國將來的走向。此外，本書最後一篇「改革十九年的宏觀政策」亦用了較多篇幅，從社會、經濟及政策（官方與民間）的角度總結七八年底以來十九年改革開放的發展，目的也是為讀者提供一些前瞻性的意見。第四、本書是本人獨立思考的結果，內容自然與中國官方的不少意見及其對某些歷史的解釋有所不同。雖然我本人擔任中國政府任命的某些公職，但我的意見絕不代表任何政府或團體的意見，我亦沒有和大陸的官員或朋友提及過寫作本書的事。

參閱過多方面的資料後，我認識為最有資格寫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還是大陸的專家，現時他們面對的問題主要是政府要小心處理社會輿論，以保持穩定局面，故有一些較敏感的材料及觀點仍不得隨意發表。我相信中國在不久將來再進一步發展和開放後，大陸將會有更多水平甚高的著作面世。

我希望強調本書之內容及意見，概由作者本人負責。此外，由於建國以來的題目十分大，再加上我的水平和見識有限，書中自有不少疏漏不妥之處，敬請各位專家和廣大讀者予以賜教及批評指正。我並懇切期望此書能起到拋磚引玉的效果，引發更多更高水平著作的出現，及帶來對中國問題更深入的討論。

一九九七年五月

目 錄 [下]

第七篇 撥亂反正 改革啟航(1976-1985)

| | | |
|-------|-------------------------------------|-----|
| 第三十九章 | 走向大治的過渡期 | |
| | ——華國鋒時代的建立與終結 | 644 |
| 第四十章 | 鄧小平掌權與中央改革開放及堅持黨權的政策 | 660 |
| 第四十一章 | 新時期的經濟路線(一九七九—一九八四) | |
| | ——調整與局部改革 | 675 |
| 第四十二章 | 中國民主運動的發展(一九七九—一九八一) | 692 |
| 第四十三章 | 中國外交政策的演變 | |
| | ——從中越戰爭到八十年代的和平外交 | 707 |
| 第四十四章 | 全面改革之預備與推行(一九八二—一九八四) | |
| | ——十二大及三大運動(整黨、減罪、清除精神污染) | 719 |
| 第四十五章 | 十二屆三中全會——全面經濟體制改革之推行 (一九八四—一九八五) | 737 |
| 第四十六章 | 配合全面改革之組織安排 | |
| | ——百萬大裁軍與幹部年輕化 | 752 |

第八篇 改革攻關 深層困擾(1985-1991)

| | | |
|-------|-------------------------------------|-----|
| 第四十七章 | 全面改革面臨之經濟困境以及八五學運 | 762 |
| 第四十八章 | 政治改革與波折 | |
| | ——言論假期、八六學運與胡耀邦下台 | 782 |
| 第四十九章 | 改革的十三大——中央改革措施與開放的人大、政協會議(八七至八八年) | 803 |
| 第五十章 | 勇闖物價關與治理整頓 | 817 |
| 第五十一章 | 八九民運與六四事件 | 837 |
| 第五十二章 | 六四後之危機與回應，以及深化治理整頓政策 (一九八九—一九九一) | 880 |

第九篇 經濟騰飛 宏觀調控(1992-1995)

| | | |
|-------|--|------|
| 第五十三章 | 鄧南巡旋風與中共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鞏固江澤民的核心地位 | 918 |
| 第五十四章 | 鄧小平南巡後的中國——經濟騰飛、改革深化 | 946 |
| 第五十五章 | 宏觀調控(九三—九五)(上)兩大經濟困擾 ——局部過熱與混亂及其深層原因 | 962 |
| 第五十六章 | 宏觀調控(九三—九五)(中)——十六條、 改革五十條 反腐敗與強調中央權威 | 981 |
| 第五十七章 | 宏觀調控(九三—九五)(下)——成就及深化 經濟體制改革 | 1007 |

第十篇 江澤民——挑戰與回應(1995-1997)

| | | |
|-------|-------------------------------|------|
| 第五十八章 | 江澤民面對的挑戰(一)——十大內政問題 | 1018 |
| 第五十九章 | 江澤民面對的挑戰(二)——外交形勢與 「中國威脅論」 | 1052 |
| 第六十章 | 鄧小平的交班計劃與江澤民的治國總方針 | 1060 |
| 第六十一章 | 新領導層的組織策略——軍權、建黨、民主 制衡 | 1069 |
| 第六十二章 | 反腐敗、反罪惡，與思想道德建設 | 1086 |
| 第六十三章 | 台海危機、釣魚台糾紛及新時期中國外交 政策 | 1107 |
| 第六十四章 | 經濟建設——跨越九七年的經濟持續發展 | 1138 |

第十一篇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 | | |
|-------|-------------|------|
| 第六十五章 | 香港前途問題與一國兩制 | 1164 |
|-------|-------------|------|

第十二篇 總結與前瞻：改革十九年的宏觀政策 (1978-1997)

| | | |
|-------|---------------------|------|
| 第六十六章 | 基本國情——發展之制約因素 | 1196 |
| 第六十七章 | 開放十九年的經濟體制改革與經濟發展述評 | 1219 |
| 第六十八章 | 建國方略——官方與民間 | 1277 |

第七篇

撥亂反正 改革啟航

(1976-1985)

- 第三十九章 走向大治的過渡期——華國鋒時代的建立與終結
- 第四十章 鄧小平掌權與中央改革開放及堅持黨權的政策
- 第四十一章 新時期的經濟路線（一九七九至一九八四）——調整與局部改革
- 第四十二章 中國民主運動的發展（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一）
- 第四十三章 中國外交政策的演變——從中越戰爭到八十年代的和平外交
- 第四十四章 全面改革之預備與推行（一九八二至一九八四）
——十二大及三大運動（整黨、減罪、清除精神污染）
- 第四十五章 十二屆三中全會——全面經濟體制改革之推行
（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五）
- 第四十六章 配合全面改革之組織安排——百萬大裁軍與幹部年輕化

第三十九章 走向大治的過渡期——華國 鋒時代的建立與終結

導 言

從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幫被捕到七八年十二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一段期間，可視為中國走向開放改革大治時代的過渡期，這個時期的特徵，是以華國鋒為首的新領導層開始糾正文革的極左路線，將注意力集中於經濟建設，為中國的發展邁出正確的一步。然而，以華國鋒為首的部分中央領導人，乃是在文革期間眾多老幹部被打倒的機遇下冒升的一群，他們的利益、思想及工作方法使他們無法突破許多在文革時期定下來的框框，令他們與一般群眾和以鄧小平為代表的在文革期間被打倒的高級幹部之要求，如徹底否定文革及毛澤東晚年施政方針等發生衝突，而爆發出新一輪的政治鬥爭。

除上述政治路線衝突外，在這兩年裡，為了盡快改變中國自文革以來經濟閉關自守及落後的狀況，當時主管經濟的領導人，推行了一連串超乎國力所能承擔的過急經濟發展計劃，導致中國不平衡的經濟結構進一步惡化，是次被稱為洋躍進的後果是使中國進入一個長達五年的經濟調整期。

第一節 糾正文革，發展經濟的一系列工作

在粉碎四人幫後，中共中央做了很多工作，以糾正文革期間的錯誤。

一 徹底消除文革極左派影響力

從七六年十月開始，中央分別與各地區政府及軍事負責人聯繫，通報四人幫被捕消息，對四人幫勢力較有基礎的上海和遼寧等地區派出幹部，與當地的駐軍合作逮捕四人幫的支持者，以穩定國內形勢。(註一)

七六年十二月後，中央在十個月內分三批發出批判四人幫的文件及罪證材料（註二），並發動群眾遊行以及清除四人幫在各地區及部門的骨幹，部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幹部重新走上各級領導崗位。

二 強化經濟領域上的計劃與領導，集中力量發展經濟

文革期間中國的經濟發展甚為緩慢，而最為嚴重的問題乃是生產管理異常亂，很多工廠仍然停產，正常的生產秩序還沒有恢復，鄭州、太原、蘭州等多處樞紐地區鐵路堵塞。此外，農業、輕工業及戰略性行業如燃料動力等工業長期落後，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多年來的高積累、低消費政策造成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十分緩慢（註三），在這情況下，經濟建設已成為刻不容緩的任務。

（1）確定經濟發展思想

七六年下旬中央重新發表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意味著中央從理論層次了解應更重視農業、輕工業之發展，並改變過往高積累、低消費的政策，以改善人民生活。（註四）七七年三月，國家計委召開會議，中央提出十個「要不要」的問題，以統一領導層對經濟發展的思想，重點包括：1.強調黨的集中領導，加強國民經濟計劃；2.生產的重要性，強調企業要以生產為主，一切為生產服務；3.要執行嚴格的規章制度，抓管理；4.實行按勞分配，反對平均主義；5.重視引進新技術，並強調造就一支龐大的技術幹部隊伍。（註五）

（2）經濟計劃重點

七六年十一月，國務院批准計委對七七年第一季度的經濟計劃安排，這計劃包括：1.重點發展農業與輕工業；2.在重工業中，要重點發展原材料、燃料和電力的生產；3.解決鐵路堵塞問題；4.安排災區的建設和改善災區的人民生活；5.將七七年全年基建限制在二百五十億元以內，並推行增產節約計劃，以增財政收入。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合乎當時國家狀況的安排。（註六）

(3) 各個經濟會議的召開

七六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七七年四、五月間，中央先後在大慶和北京召開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在這些會議前後，國務院相繼召開鐵路、煤炭、計劃、農田基建、交通、冶金及水產等多方面的全國會議(註七)，以落實中央加快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

三 教育科技文化工作走上軌道

七七年十月教育部召開全國高等學校招生會議，決定改變文革以來推薦工農兵學員上大學的招生方法，大學招生改為自願報名，統一考試，按優取錄的原則，這個改變極為關鍵，使年青人可憑個人努力考進大學，故大大推動了年青一代學習的積極性，為培養文革後的知識分子邁出關鍵的一步。(註八)

第二節 兩個凡是——阻撓鄧小平復出之策略

一 阻撓平反天安門事件及鄧小平復出的「兩個凡是」

在中央糾正文革錯誤時，人民極希望中央能對群眾自發的反四人幫的天安門事件平反，並恢復因天安門事件而導致下台的鄧小平的職務，然而，這種徹底糾正文革極左路線的行動卻受到當時任黨、政、軍最高職務的華國鋒及其他在文革期間地位迅速冒升的領導人如吳德及汪東興等反對，從而爆發了領導層新一輪的權力鬥爭。

七六年十月，針對幹部及群眾要求恢復鄧小平職務及為天安門平反的情況，華國鋒提出：「1.要集中批四人幫，連帶批鄧。2.四人幫路線是極右路線。3.凡是毛主席講過的，點過頭的，都不要批評。4.天安門事件要避開不說。」(註九)七六年十一月，吳德亦指出：「凡是毛主席肯定的，我們要努力去做……天安門事件中反四人幫是錯的，那時他們還是中央領導，那是分裂中央……要把批四人幫和批鄧結合起來。」(註十)十二月五日，中共中央更發出通知，指出：「凡純屬反對四人幫的人和案件應給

予徹底平反。凡不是純屬反對四人幫而有反對毛澤東主席、反對黨中央、反對文化大革命……的人，絕不允許翻案。」七七年二月七日，經華國鋒及汪東興支持的《人民日報》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中正式提出「兩個凡是」的觀點，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註十一)

七七年一月八日，支持鄧小平的群眾藉周恩來逝世一週年紀念，再次湧向天安門，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及准許鄧小平出來工作。二月八日，中央根據兩個凡是的方針，發出了〈關於堅決打擊政治謠言的通知〉，指出要針對攻擊華國鋒的大字報，要予以覆蓋，對這類大字報和政治謠言要由公安部進行追查。(註十二)

二 兩個凡是鬥爭之背後——評價文革與現實政治的權力鬥爭

華國鋒等提出「兩個凡是」及種種框框，其用意是藉毛澤東來穩定自己的地位、阻撓平反天安門事件及恢復鄧小平的名譽，而阻止鄧小平復出乃最終之目的。華國鋒等之做法，實有其背後的原因：

(1) 華國鋒較傾向平均主義等意識形態

在文革後期林彪事件爆發直至四人幫下台期間，中央大致上出現三個派系，其一是以周恩來、鄧小平為首之穩重軍幹集團，與之對立的為四人幫極左集團，而介乎這兩對立集團中間的，乃是一批在文革期間冒起而又不屬於四人幫集團的中間偏左力量(註十三)，這些人包括華國鋒、汪東興、紀登奎、陳錫聯、李德生、陳永貴及吳桂賢等。這些中間偏左力量幹部的其中一個特點，是認同文革期間許多強調精神刺激、忘我工作等平均主義理想的新生事物，而對經濟領域的利潤掛帥、物質刺激等在感情上有一定之抗拒。

在七六年毛澤東病重時，毛清楚了解江青等極左力量無法得到軍幹集團及群眾的接受，但是他又對鄧小平等要糾正文革過左政策之幹部極

不放心，基於政治考慮，毛選擇了在思想上較為靠近自己，而又較被多方面力量接受的華國鋒為接班人。由於這個中間偏左力量並無強大的組織及群眾基礎，他們的冒升在很大程度上乃基於毛澤東的政治平衡考慮及毛對他們的支持，再加上他們的思維模式及意識形態傾向文革的平均主義，故此，無論從思想傾向及現實政治權力考慮，憑毛澤東「你辦事、我放心」手諭而上台的華國鋒是不會全面否定文革及毛澤東晚期極左路線的。

(2) 鞏固華國鋒的領袖地位

推行兩個凡是的其中一個客觀功能，是借助毛澤東的權威以提高自己的聲譽，鞏固接班人之地位。

中國在七六年百廢待興情況下，人民仍對毛澤東崇拜，故此，堅持兩個凡是，對倚靠毛最高指示上台的華國鋒實有相輔相承之作用。

此外，堅持兩個凡是，也可收實用主義(即對自己有利的指示才用)之功效。當時社會上有個順溜口說：「有個凡是派，不是都凡是，有的要凡是，有的不凡是」。兩個凡是之推行，客觀上使華國鋒及汪東興等壟斷了對毛澤東思想的解釋權，使他們可以隨時引用毛的指示保障自己，打擊別人。(註十四)

(3) 阻撓鄧小平復出

維護毛的威信，堅持兩個凡是，就是不准為天安門事件翻案，這不單因為毛判定天安門事件屬反革命性質，而更重要的，是天安門事件乃導致鄧小平下台，以及毛澤東決心指令華國鋒為接班人的轉捩點。否定兩個凡是，為天安門平反，無疑是為鄧小平全面復出作準備，而對華國鋒及吳德等直接參與鎮壓天安門群眾運動的領導人來說，無疑就是要他們承認錯誤，並動搖他們的領導地位，這客觀上亦是廣大群眾在七七年一月悼念周恩來所期望出現的。

此外，華國鋒等亦明白，讓鄧小平這位有偉大氣魄的所謂「中國第二個最大走資派」復出，會嚴重動搖他們在中央的統治地位，並有

可能導致他們下台，因為無論從個人在黨及政府內的資歷威望、個人魅力才幹及歷史背景，華國鋒是無法與鄧小平相比的。故此，以華國鋒為首的集團乃藉兩個凡是及盡量提倡對華的個人崇拜以維護他們的地位。

第三節 凡是派的失勢與鄧小平時代之確立

七七年三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討論鄧小平復出問題，雖然華國鋒等極力阻止，但在以陳雲、王震為首的高幹堅持下，華被迫要考慮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的問題，華要求鄧小平承認天安門事件並非革命行動，但這個要求遭鄧拒絕。^(註十五)此後，雙方進行了妥協，鄧小平在七七年四月十日致中央的信件中，表明了他支持華國鋒擔任黨中央主席，而華亦表示會支持鄧小平出來工作。值得注意的，是鄧在信中，已明白表示「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此話極具針對性，明顯提出與「兩個凡是」相對立的方針。^(註十六)

七七年七月，中共召開十屆三中全會，正式確立華國鋒的領導地位，並恢復了鄧小平的工作。同年八月，中共十一大召開，正式宣告文革結束，並強調建設現代化強國的目標。由於時代的局限及凡是派的影響，這些會議仍重申「階級鬥爭為綱」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基於此，要全面否定文革路線的鄧小平進行了大量工作，在群眾的支持下，逐步削弱了凡是派的力量，為全面改革奠定根基。

基於鄧小平在黨內的實力與威望(筆者按：鄧小平實為周鄧路線的推行者)，他在復出後自然成為要徹底否定文革的軍政幹部的凝聚點。扼要而言，當時中國領導層大致可就未來政策的路向分為四個派別：一、藉文革上台的「凡是派」；二、否定文革，但基本肯定文革前中央制度及政策的「還原派」；三、否定文革，並希望改變文革前中央不合理的制度及政策，以防止文革重新出現的「改革派」；四、以民間力量為基礎，較主張由下而上改革中國不合理制度的「民間改革派」。^(註十七)在與凡是派的鬥爭中，由於涉及全面否定文革的觀點，還原派、改革派及民間改革派

便有默契地聯合起來，成為這個時期的「實踐派」，並通過下列四類事件，削弱著凡是派的力量：

一 鄧小平爭取軍政高幹及知識分子支持的工作

(1) 解放在文革期間被打倒之幹部

七七年十月開始，在鄧小平支持下，《人民日報》相繼發出要為在文革期間被打倒的幹部平反及重新工作的社論。十二月，在鄧的爭取下，胡耀邦出任中央組織部長，他上任時，就明確指出：

「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甚麼人定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註十八)

胡並擺脫了汪東興的障礙，於一年內分別召集十幾次省、市會議，大規模平反在文革期間發生的冤案。鄧小平這一戰略性的行動得到在文革時被打倒的實力幹部所支持。

(2) 恢復科技文教事業，強調知識分子的重要功能

搞好經濟的重要關鍵是發展科技教育事業，鄧小平復出後就表示要「自告奮勇」領導這方面的工作。(註十九)在當時中國仍嚴重受文革思想影響的情況下，鄧小平勇敢地公開否定毛澤東對四九年後十七年文教科研工作的論斷，即否定毛澤東對十七年工作的「兩個估計」——教育領域是黑線專政，而知識分子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現時看來，鄧小平的講話並無特別，但假若考慮到七七年時的環境，凡是毛批示過的都不能否定，鄧小平的公開評論就需要很大的勇氣，所以當時主管教育的劉堯對鄧小平之講話感到「震動很大，趕超有望」，但是「心有餘悸」。(註二十)

在七八年四月，在鄧小平的支持下，中央決定摘掉全國右派分子的帽子，為他們平反，這行動使數十萬受不平等待遇的知識分子得到解放。

除上述兩項重點工作外，鄧小平還召開各個領域如經濟，軍事及外

交等會議，解決發展上遇到的各項實際問題並端正思想。由此可見，是鄧小平具有時代改革者的胸襟與膽色，勇敢地突破毛澤東的思想框框，得到廣大群眾的衷心敬佩。

二 由下而上的群眾鬥爭

七七年一月六日開始，人民藉悼念周恩來的機會，湧向天安門廣場，強烈要求為鄧小平及天安門事件平反，而遭華國鋒及吳德等人鎮壓，一部分示威人士被捕。在七七年二月華提出兩個凡是，對群眾的要求採取進一步打擊時，人民又醞釀於四五運動一週年再舉行大規模的行動，以表達對凡是派的不滿。

當七八年鄧小平開展「檢驗真理」的辯論，並在十一月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為天安門事件平反時，群眾又再次呼應中央改革派的政策，使北京出現北京之春民主運動，人民通過大字報及油印刊物，表達了他們對凡是派的不滿及支持中國走向改革的思想。可以說，在對凡是派的鬥爭中，中央改革派靈活地掌握市民的情緒，通過「上下結合」的形式迫使凡是派交出權力。

三 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

針對凡是派的「兩個凡是」理論，鄧小平一開始就與之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鄧堅持要突破毛澤東的框框去看問題。在七七年二月鄧小平尚未復出時，他已明確表示反對兩個凡是思想，堅持要全面地、整體地分析毛澤東思想體系，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除鄧小平以外，多位黨軍高幹如陳雲、徐向前等也於七七年相繼發表談話，支持鄧小平的觀點。

實踐派與凡是派的爭論，隨著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而推向高潮。翌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同時轉載這篇文章，全國各地的報章也陸續轉載，造成很大的衝擊。這篇文章是經胡耀邦精心策劃而推出的，實踐派的觀點十分簡單明確，就是不能以教條衡量社會問題，而應以實事求是、實踐第一的態度，來衡量一種思想是不是真理。

這個理論問題之所以如此重要，並非因為它是一個純學術論爭，而是當時政治鬥爭的一個焦點。在中共建國後的多次政治鬥爭如文革、反右傾翻案風等，都是在輿論領域首先發動的。這次檢驗真理的論爭，直接將矛頭指向凡是派，尖銳地評批他們藉毛澤東的片言隻語為教條，阻礙徹底否定文革的工作。通過是次輿論攻勢，更可統一全國思想，進一步鞏固鄧小平領導權威，從而迫使凡是派下台。

基於這個辯論的政治目標非常明顯，當時凡是派的大將，主管宣傳工作的汪東興大為震怒，批評五月十一日的文章是「指向毛主席思想」，並批評刊登這篇文章的人「沒有黨性」，甚至質疑這篇文章是那一個中央的意見（註二十一）。汪並未回應群眾要求否定文革的呼聲，更提出「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丟刀子，三不要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由於汪東興的表態及他不斷地向報章施加壓力，實踐派多位領導人如鄧小平、中央軍委秘書長羅瑞興、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等相繼發表與汪針鋒相對的談話，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觀點。在中央軍政實力派的表態下，七八年六月到十一月，全國絕大多數的地方和大軍區負責人都發表文章或講話，支持鄧小平一方。此時，凡是派的下台已成定局。

四 各個中央會議的召開與華國鋒正式下台

（1）七八年十一月 中央工作會議

這次會議討論天安門事件及文革期間很多冤案的平反問題，而華國鋒亦就他支持的兩個凡是的觀點作出檢討。會議並針對華國鋒推行的個人崇拜、作出少宣傳個人的決議。受天安門事件平反的鼓舞，北京群眾更牽起了北京之春民主運動。

（2）七八年十二月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是次會議被中共視為改革的里程碑，（筆者按：是次會議將會在下章更詳盡的討論）會議正式為文革期間各起錯案平反，強調發展經濟為中國最重要的戰略，並增選了一批老幹部加入中央最高領導層，凡是派實際

上已一敗塗地。

(3) 七九年九月 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

再補選大批老幹部進入中央委員會，進一步鞏固實踐派之實力

(4) 八零年二月 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

這次會議正式宣佈凡是派下台，會議批准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等的辭職要求，並免除他們之職務。

(5) 八零年八月 五屆人大三次會議

是次會議同意華國鋒辭去國務院總理，解除陳永貴職務，並任命趙紫陽為新總理。

(6) 八零年十一、十二月 政治局連續九次召開會議

會議重點討論華國鋒於四人幫下台後之錯誤，主要包括兩個凡是觀點的提出、仍堅持文革之口號、反對解放幹部、突出個人迷信及要對七七、七八年間經濟過熱負責等。

(7) 八一年六月 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

是次會議同意華國鋒辭去中共中央主席及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之職位，並選胡耀邦為中共中央主席，鄧小平為中央軍委主席。至此，凡是派可說正式在中共政壇上全面崩潰了。

第四節 凡是派下台的啟示

- 凡是派的下台，標誌著文革（包括其極左思潮）全面結束，國家亦開始走上改革的大治道路。

從鄧小平全面重新當權的過程分析，他取代華國鋒的位置是整個時

代發展的必然趨勢，當時不單在文革期間被鬥倒的軍政高幹（改革派、還原派）希望徹底否定文革，以恢復他們的權位，民間改革派及廣大群眾亦希望跳出文革期間動輒以言入罪的恐怖社會狀態，盡快發展經濟，改變社會上強調空頭政治，無法無天的情況，所以差不多整個中共領導層及廣大群眾皆聚集在鄧小平身邊，為打倒凡是派——即徹底否定文革而努力。從現實政治角度分析，華國鋒的實力絕不及鄧小平，他的上台只是毛澤東用以平衡黨內對立鬥爭的中間人物，華本身並無一個強大的集團支持，他所倚重的主要是毛的手諭及七六年下旬開展的個人崇拜。缺乏實力基礎使他無可避免地成為過渡性人物。

二 經濟發展是建國的核心策略

從凡是派下台的經驗中可看到，依靠意識形態控制人民的政治思想並不是保持政權的最有效保證。人民期望一個安全的生活環境，安心工作以發展經濟，改善生活。鄧小平十分明白這點，所以經濟建設就成為新時期各項工作的核心，成為日後中共治國的最重要工作。

三 中央的鬥爭方式

在這場權力路線鬥爭中，可以見到一貫中共上層權力鬥爭的規律，雖然每次鬥爭都會運用不同策略，但一般來說，要打倒對方，首先要得到中央及各級地方軍政實力幹部的支持，這是最重要的關鍵。其次，發動輿論、建立起統一全國的思想，以鞏固自己集團之權威。最後，爭取群眾的支持，強化自己一方的合法性。

從鄧小平打倒凡是派的過程中，可以看到上述規律的運用：鄧小平首先聯合具有實力的軍政首腦抗爭，爭取各級幹部及知識分子支持，與民間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保持默契，推行「上下結合」的鬥爭策略，繼而發動輿論、統一思想，然後是各地方表態，最後是中央開會，總結政治對手的錯誤並作出新的人事安排。

節五節 洋躍進——經濟決策的失誤

在粉碎四人幫後的兩年(七七、七八)，中國經濟由於多方面的整頓及七八年農業豐收，得到較快的恢復和發展。為盡快改變文革以來經濟停滯的狀況，以及對經濟預期過份樂觀，對各項困難估計不足，經濟決策層作出新的躍進，即強調高速增長的發展方針。由於經濟建設規模嚴重超過國家的負荷能力以及缺乏各方面的設備配合，再加上文革長期以來的經濟結構失調等因素，中國的經濟更惡化，直接造成長達五年的調整期。

一 洋躍進——急於求成的發展計劃

七七、七八年期間，中國領導人在多方面提出超乎國家負擔能力的經濟目標及計劃，使已經嚴重失衡的中國經濟更失調：

(1) 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七六年十二月)

是次會議要求全國在一九八零年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結果造成不少地區不講實效，盲目大搞農田基本建設，製造大批低效能的農業機器，造成龐大的人力物力損失。

(2) 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

會議鼓吹在短時期內建造十個大慶油田，在這指導思想下，影響了國家計劃的建設規模，大大超乎中國的實際情況。

(3) 全國計劃會議(七七年十一月)

是次會議及之前的預備，用了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國家計委並向中央政治局作了報告。七八年二月，政治局將計委的計劃建議，批交各地區及部門執行。

計委建議在七年至二零零零年的廿三年，經濟發展應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由七年至八七年，重點發展農業、燃料、動力、原材料

等工業，為八一年開展的第六個五年計劃作準備。第二階段是六五計劃期間，各生產建設事業都要有較大的進展，並提出鋼及原油的大指標，為達到此指標，連帶要擴大基建計劃，並提出要完成一百二十個大項目，包括十個大油氣田、三十個大電站等。第三階段的目標是在二零零零年完成四個現代化，使中國經濟走向世界前列，在農業方面成為世界上第一高產國家。(註二十二)

(4) 五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七八年二月)

人大會議主要根據上述計委的計劃，通過了重新修訂的〈一九七六—一九八五年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草案)〉。此草案雖沒有正式公佈及下達，然而實際的作用十分大，宣傳上大大提高了大幹快上的思想，導致一九七八年的經濟工作重覆了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急躁冒進錯誤。七八年的基本建設投資其實已十分龐大，但在加速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下，中央又不顧國家經濟實力追加投資八十億，國家預算內投資由七七年的三百一十二億猛增至四百一十七億元，新開了過百個項目。由於建設規模超過了財力物力的負擔，導致鋼材、水泥和木材等原材料供應十分緊張，而財政支過大亦直接導致七九年出現一百七十億赤字。

(5) 整套設備項目引進過急(七七、七八年)

為了適應新的躍進目標，中央強調要放手利用外國資金，並大量引入外國先進技術，以打破閉關自守的思想。然而，在這兩年中，進口成套設備的規模過大，超過了財政及配套能力的可能，引進之項目全是重工業項目，引進時並沒全面考慮到建成後將會消耗大量原材料，且會加劇交通緊張，更沒有考慮到某些設備的消化與吸收問題，此外，有些國內也可製造的設備，也在引進外國技術的大風氣下，盲目引進，造成國家外匯不足，及被迫向外以高息借貸。

此外，由於不熟悉國際行情，在與外商的談判中不斷吃虧，引進了不少陳舊、過時的設備。

二 洋躍進所造成的影響

洋躍進造成中國的經濟結構繼文革後進一步失調，從而使經濟調整成為無可避免的任務。

(1) 累積與消費比例更失調。

過大的基建投資，導致過高的累積，使國家無能力發放更多工資予工農群眾改善生活。此外，基建項目主要是鋼鐵、化工等項目，於是影響了應撥予建設與人民生活有直接關係的住宅、文教衛生、城市公共事業等項目的資源。

(2) 農業、輕工業、重工業及工業內部的比例進一步失衡，直接導致經濟效益降低。

由於強調大型項目之興建，導致重工業畸形發展，使農業生產遠遠落後於重工業。在工業結構來說，燃料動力工業落後於經濟的需要，由於電力不足，全國約百分之二十的工業生產力不能發揮。此外，鋼材等原材料的提供又不足夠，牽制著機械工業的發展，再加上交通運輸緊張的情況沒有緩和，鐵路及港口等運輸能力嚴重不足，導致貨品積壓，不能及時供應，使國家損失八千七百多萬美元。由於各方面發展的不配套，使經濟發展出現嚴重虧損及浪費，經濟效益大大降低。

(3) 勞動就業問題十分嚴重

據當時主管經濟的領導人李先念指出，全國約有兩千萬人需要安排就業，在這客觀因素制約下，政府還過份發展需要大量機器的基本建設，無疑會令就業不足情況惡化，這不單會影響社會之安定，更會使經濟建設不能走上符合中國國情(人口資源豐富，而資金缺少)的發展道路。(註二十三)

三 洋躍進的幾點分析及經驗總結

- (1) 洋躍進是一五計劃初期及五七年大躍進的錯誤重演。中國各級的決策者通常會在經濟形勢較為樂觀的情況下，作出超乎國家實力的經濟計劃，這當然可歸咎於決策者為儘快擺脫中國落後的好大喜功思想，但更深層的原因，實為不須負經濟責任的指令式計劃經濟體制。當某項決策失敗後，各級決策領導者無須負上如資本主義國家企業的破產責任，他們不愁會被辭退，這就間接鼓勵更多風險過高及不符合經濟利益的決策。
- (2) 洋躍進的主要錯誤在於基建及引進項目過速，超過國家負擔能力。然而它的發展指導思想，如計委於七七年十一月的計劃可說是正確回應中國的困難，如農業、燃料、動力、原材料及交通行業嚴重滯後等。中央強調油田、電站、農業的建設及引進技術的提法在方向上並無不妥，值得檢討的，是在制訂符合經濟發展需要的宏觀方針後，一定要循步漸進，量力而為，制訂合符國情如就業人口及資金需要等具體政策，並與各方面配套進行。
- (3) 當時中央的最高名義領導華國鋒對洋躍進固須負上重要的責任，然而，將一切錯誤歸咎於他並不公平，亦無助於總結經驗，避免類似錯誤的重覆。從七十年代開始，負責制訂經濟計劃的部門，藉著中央強調需多進行像大慶油田等建設項目而強化其權力基礎，在這背景下及上述提出的對經濟形勢判斷過份樂觀，以及計劃體制等因素下，才會出現以化工、鋼鐵、冶金為重點的基礎及引進計劃。

註 釋

- 註 一 黃見秋等《新時期專題紀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一頁。李盛平等編《一九七六至一九八六十年政治大事記》，光明日報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2頁
- 註 二 同註一，第3頁
- 註 三 柳隨年等《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簡明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283-286頁

- 註 四 有關此方面的更全面分析，請參閱 Stuart R. Schram：華國鋒主持編輯的《論十大關係》，載王建論《華國鋒與鄧小平》，明報有限公司出版部，一九七七年，第99頁
- 註 五 房維中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大事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576頁
- 註 六 同註五，第572頁
- 註 七 同註五，第578-590頁
- 註 八 鄭德榮等《新中國紀事》，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615頁
- 註 九 同註二，第6頁
- 註 十 戴晴等《走出現代迷信》，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一九八九年，第4頁
- 註十一 《人民日報》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
- 註十二 同註二，第8頁
- 註十三 有關這方面的詳細論述，請參考丁望《華國鋒紀登奎和新起一代》《明報月刊》叢書一九七七年
- 註十四 王洪模等《改革開放的歷程》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49-50頁
- 註十五 同註二，第10頁
- 註十六 同註八，第605頁
- 註十七 陳子明〈十年改革反思〉載《當代月刊》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五日，第71頁。陳一諭《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九〇年，第5頁
- 註十八 同註八，第619頁
- 註十九 同註八，第609頁
- 註二十 同註十，第13頁
- 註二十一 同註二，第35頁
- 註二十二 同註五，第590頁
- 註二十三 有關洋躍進所造成的經濟結構惡化情況，請參閱李先念〈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載《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104頁

第四十章 鄧小平掌權與中央改革開放及堅持黨權的政策

導 言

一九七八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改革開放時代開端的里程碑，在明確訂定新時代發展的總方針後，中央政府在多方面作出重大的改革，以彌補文革時代國家的創傷，並將中國帶往健康發展的道路。這章將討論三中全會的內容及歷史意義，進而從中央「反右」、「反左」的方針看鄧小平的治國思想，並會分析一九八一年中共全面取締民間民運的原因，以及討論中共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最後將簡單介紹中央在新時期的一些政治、法制及社會改革。

第一節 歷史轉捩點——中央工作會議與十一屆三中全會

一 平反冤案及中央確立現代化的方針

在與凡是派鬥爭的過程中，以鄧小平、胡耀邦為首的實踐派開展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基於鄧小平的聲望及他在黨政軍中的實力，七八年六月開始，各地方領袖及軍區負責人皆表態擁護鄧小平一方。鄧在壓倒性勝利的形勢下，於七八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十五日，召開了由中央和地方黨政軍實力派共二百一十三人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按照中共的慣例，這種性質的會議是用以統一黨內各實力人物的共識，以為即將召開的中央正式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鋪路。

雖然中央工作會議原先的議程主要是討論一些較為具體的經濟政策，但由於黨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開會前已認同全黨的工作重點應從階級鬥爭轉到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故政治局提出在討論經濟的具體政策前，應先討論工作轉移問題，從而引起了活躍的討論氣氛。不少與會者

認為安定團結是保證中央工作順利轉移的關鍵，故必須解決文革以來一些大事大非問題。十一月十二日，中共元老陳雲在東北組發言(註一)，提出為天安門群眾運動、彭德懷、陶鑄、薄一波等六十人（所謂六十人叛徒集團）平反，並批判康生及謝富治等六個重大問題，由於陳雲的發言涉及糾正文革的左傾路線及老幹部的各起冤案，得到與會者熱烈支持，會議更對很多文革前後的歷史事件如三家村、二月逆流、七二零武漢兵變、反右傾翻案風及批鄧等事件重新評價。與會者並針對七六至七八年華國鋒、汪東興、吳德、紀登奎等人工作繼續犯左傾錯誤而提出批評。

經過政治局常委的研究，十一月廿五日，政治局對很多重大事件作出結論，分別是：

- (1) 將黨的工作重點轉到現代化建設來；
- (2) 重新起草〈關於加快農業發展速度的決議〉；
- (3) 對文革以來的重大冤案如天安門事件、批鄧等平反，並揭發康生和謝富治的問題。

二 經濟建設與解放思想的號召

(1) 解決中國當前經濟困境的對策

在政治是非問題達至共識後，陳雲再發表有關經濟問題的講話，強調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解決中國當前面對的經濟問題：

1. 進口糧食，解決農民困難，以穩定全國。陳雲坦率地指出：「建國快三十年了，現在還有討飯的……如果老是不解決這個問題，恐怕農民就會造反，支部書記會帶隊進城要飯。」(註二)
2. 針對急躁過急引進外國項目的情況，陳雲強調要循序漸進的引進工業項目。
3. 生產和基本建設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一定要重視配套，否則將引起經濟環境的緊張，並對發展農業、輕工業和城市建設有不良影響。

4. 要給各省市一定數量的真正的機動財力，以發揮其積極性。
5. 重視旅遊業的發展。

（2）鄧小平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定調

十二月十三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作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註三），為即將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定調。鄧小平強調：

1. 針對凡是派的僵化思想，鄧提出解放思想是當前一個重大政治問題，他強調應鼓勵幹部和人民多用腦筋，勇於探索創新的搞建設；
2. 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故務須加強法制，健全國家制度，並擴大地方和企業自主權；
3. 處理歷史遺留的問題之目的是向前看，選幹部要更嚴格，對於一些幫派思想強、只關心私利及不講原則的人，不能輕信及重用。為了中國的穩定並避免造成過大的思想衝擊，鄧更針對很多高幹否定毛澤東的態度，重新肯定毛澤東建設新中國的功績；
4. 研究新時期的情況，解決新問題，主要有下列三點：
 - i. 要解決官僚主義，要用經濟方法管理經濟；
 - ii. 在管理制度上，要加強責任制，包括擴大管理人員的權限，善於選用人才，授予職責並要嚴格考核、賞罰分明等；
 - iii. 推行新經濟政策，容許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並對貧困地區加以幫助。

由於中央會議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人民受到極大鼓舞，在七八年十一月下旬開始，北京西單出現很多討論國事的大字報及民間自發演講會，成為北京之春民主運動的序幕。

三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意義

十二月十八日，離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僅三天，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

全會，會議準備充足，雖然時間只有五天，但卻影響深遠，其影響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1) 建國總方針的轉變

三中全會衝破中共長期以來推行的以政治掛帥的極左路線，摒棄兩個凡是的思想方針，高度評價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討論，決定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並作出從七九年起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決定，從此，中央徹底與文革路線決裂。

(2) 是次會議回顧了建國以來經濟建設的教訓，制定改革和開放的政策，並集中精力搞好農業

全會認為發展國民經濟的前提，是保持社會政治安定和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辦事。在經濟建設方面，要注意解決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嚴重失調的問題，並要切實做到綜合平衡，基本建設要量力而行。

全會更深入討論了農業問題，強調要集中精力把農業盡快搞上去，會議重新起草了〈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同意將這文件與〈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下發討論和試行。這兩份農業政策文件的主要具體措施包括提高農村社隊的自主性；允許農村實行不同形式的聯產計酬責任制，把農民收入與其生產積極性掛鉤，打破平均主義；恢復農民的自留地；農民可經營家庭副業；開放集市貿易；並對個體經濟予以扶助。此外，全會還決定提高糧食、棉花及油料等農副產品的國家收購價格，使農民能多得，從而調動農民生產的積極性。

(3) 平反冤案

三中全會更審查了中共歷史上一批重大冤案，如右傾翻案風和天安門事件等，並強調要實行社會主義民主及加強法制。此外，會議對中央領導機構和人事作出調整，以保證經濟建設的路線得以落實，這包括增選陳雲為黨中央副主席，鄧穎超、胡耀邦及王震為政治局委員。全會更決定成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選舉陳雲為第一書記。值得注意的是三

中全會後，華國鋒及汪東興等人的主要職務雖尚未變動，但他們實際上已失去在中央決策機關的主導作用，而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領導層及改革開放路線已正式形成。

第二節 中共中央「反右」、「反左」政策的確立

一 中央的「反右」、反脫離黨領導的方針

（1）中共從默許到反對民間的民主運動的原因

七八年九月，基於中共黨內在開展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中出現的分歧，葉劍英建議中央召開一次理論工作討論會（在中共政治術語上叫務虛會——相對於處理具體工作的務實會議），以統一全黨思想。葉的提議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得到廣泛的響應，於是，中共中央於七九年一月十八日至四月三日，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

是次會議繼續批評兩個凡是的觀點，並就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和特徵、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鬥爭、文革的成因與教訓、民主法制及個人崇拜之根源及禍害等，開展討論。在開放寬鬆的環境下，各報章及雜誌發表大量批判時弊、檢討文革錯誤及揭露社會不平等問題的文章，文藝界出現了大批描寫中國人民在文革期間受官僚迫害的傷痕文學，社會上亦出現了以大字報及油印刊物為工具的反官僚、要求民主法制的民間民主運動。

中共領導人起初對民主運動表示支持，因為人民普遍支持鄧小平的開放改革路線，而中央的實踐派亦希望能藉民眾的支持而加強其與凡是派鬥爭的實力。然而，隨著三中全會後凡是派的失勢，中共在七九年初期開展對越南戰爭，國內外形勢漸趨緊張。而在另一方面，民主運動人士亦開始觸一些對中共領導層來說十分敏感的問題，如黨的領導及無產階級專政而帶來的弊端、中共對越戰爭得失及鄧小平會否成為新獨裁者等，再加上民運亦有擴大的趨勢，在這情況下，中共黨內一些強調黨權不容侵犯及恐怕社會會重新出現動亂的領導人開始策劃針對這股動搖黨

的領導的「反右」鬥爭。

(2) 鄧小平強調黨的領導等四項堅持

據當時與胡耀邦有密切工作關係的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阮銘指出，作為中央副秘書長的胡喬木曾作出下列行動：

1. 在七九年一月三日的講話中針對西單民主牆的民運及黨內改革力量，指出當前存在否定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及馬列毛觀點的三股風，更指出七九年形勢比一九五七年右派進攻的形勢更嚴重；(註四)
2. 打電話予黨內改革人士胡績偉，批評《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人民萬歲(論天安門廣場革命群眾運動)》是企圖以民主黨改造共產黨，人民日報的文章指出「天安門事件告訴我們，關鍵的問題就是人民群眾要真正地當家作主……如果人民能夠真正行使憲法規定的各種民主權利，四人幫又怎能對天安門廣場採取反革命暴力手段……我們國家還存在反人民、反民主的勢力，人民的民主權利經常受到這樣或那樣的侵犯。因此，進行爭取和保衛人民民主鬥爭，就成為一項長期的、極為重要的任務。」(註五)
3. 在「組織上聯合主張兩個凡是的力量，準備向民主力量發動進攻。」(註六)

此外，作為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亦注意到社會思想的動向，三月三十一日，鄧在理論務虛會上發表講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指出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堅持四個原則，這分別是：

- i. 社會主義道路
- ii. 無產階級專政
- iii. 共產黨的領導
- iv.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在討論黨的領導一條中，鄧小平指出：「決不能把天安門廣場那個群眾運動看成為與黨的領導無關的像五四運動那樣純粹自發的運動」，他進

而指出「離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誰來組織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誰來組織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在今天的中國，決不應該離開黨的領導而歌頌群眾的自發性。」鄧認為黨雖然不是沒錯，但黨「每一次都依靠黨而不是離開黨糾正了自己的錯誤」，故此黨的錯誤「決不能成為要求削弱和取消黨的領導的理由。」^(註七)

此外，鄧小平更在這講話中對七八年底開展的民主運動大肆抨擊，指出搞民運的人「力圖利用我們某些同志的這樣或那樣的不慎重的言論，作為他們的借口或護身符。」^(註八)據阮銘的分析「其中就包括胡耀邦的不慎重言論。」^(註九)

二 從中央的「反左」方針看鄧小平以黨領導改革的思想

雖然鄧小平的講話針對社會上要求削弱黨權的思潮，但相對於一些頑固領導而言，鄧是一個開明的領導者，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中，他也同時批評一些抗拒三中全會路線的左的傾向，指出「黨內有一部分同志還深受林彪、四人幫極左思潮的毒害，有極少數人甚至散佈流言蜚語，攻擊中央在粉碎四人幫以來特別是三中全會以來所實行一系列方針違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基於以上原因，鄧小平認為一定要繼續肅清四人幫左的流毒，「幫助一部分還在中毒的同志覺悟過來，並且對極少數人所散佈的誹謗黨中央的反動言論給予痛擊。」^(註十)

從上述鄧小平反左、反右的言論中，可以清楚看到鄧小平的思想本質。鄧是一個思想較為靈活的實用主義者，他希望排斥文革以來僵化的極左教條，針對兩個凡是而鼓勵人民開動腦筋，以實踐為準則為四化出謀獻策。而在另一方面，鄧小平絕不容許社會上出現否定黨領導的言論及行動，對鄧來說，這些言論或行動不符中國國情，並將導致社會混亂，更有可能使中國重現文革期間的對立鬥爭，使國家缺乏中心力量帶領中國邁向現代化。

理論務虛會後，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矛盾現象，就是一方面隨著四項堅持的提出，魏京生被審判及封閉西單民主牆，中國局勢又出現緊張。

名家劉賓雁回憶道：「七九年三月最初提出『四項基本原則』的時候，國內知識分子認為是刮起一陣冷風，有人要否定三中全會。一九八零年初，對於四項基本原則全國掀起了一場大宣傳。各省的四人幫幫派分子和『左派』都欣喜若狂，以為三中全會不算數了。」(註十一)

然而，在另一方面，中共又針對幹部思想僵化及對改革開放抵觸的情緒，繼續開展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在七九年六、七月間，各省、市、自治區相繼召開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之會議，以統一全黨的思想，從而貫徹改革開放的路線。例如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在安徽工作會議上指出：

「我們看形勢要分清主流和支流，前一時期，有人從右的方面，利用我們發揚民主、解放思想之機，散佈懷疑和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社會上也出現了極少數鬧無政府主義和極端民主化的現象，這是支流。……情況已很快轉變。我們決不要被這些支流所迷惑。當前又有一股否定三中全會的錯誤思潮，有些人抓住一些支流現象，加以誇大，進而攻擊黨的路線右了……對這種以左的面貌出現的思潮也必須引起充份注意。這說明不少人的思想仍然處於僵化狀態，因此，我們要……繼續解放思想，把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引向深入。」(註十二) 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在省地、市、縣三級幹部會議上也指出：「要注意反對來自左的和右的兩個方面錯誤思潮的干擾。而右的思潮和左的思潮相比，左的思潮更容易迷惑人，因而對我們的危害更大。」(註十三)

三 人事變動與新時期領導層的確立

對左傾思潮的批判，促成中央人事重大變動與華國鋒辭職。在八零年二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中，選舉胡耀邦為總書記，並批評汪東興、紀登奎、吳德等人的錯誤，免除了他們的領導職務。在同年八月的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中，決定由趙紫陽接替華國鋒擔任國務院總理，在十一至十二月，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九次會議，批評華之錯誤，免去其中共中央主席的職務，正式提交八一年六月的六中全會通過。

第三節 政治的開放與轉折——八一年初對民主運動的全面取締

一 鄧小平的政治改革綱領

隨著實踐檢驗真理討論的深入與及十一屆五中全會的召開，八零年中國再呈現一片活躍氣氛，在七九年中段被取締的民間刊物和小型組織又再重新活動起來。而由於八零年開始實行選舉法，不少學生及無黨派人士參與競選。八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討論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與進一步發展民主問題，鄧小平在會上作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註十四)，鄧指出：

- (1) 黨和國家制度中存在不少弊端，包括官僚主義、權力過份集中、家長制、幹部領導終身制和種種特權現象，而核心的問題在於權力過份集中；
- (2) 過去黨的錯誤雖然與某些領導人的錯誤有關，但鄧更清晰地指出組織制度及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為重要，如不堅決改革，一些舊錯誤將有可能重新出現；
- (3) 上述各種弊端都帶有封建主義色彩，故此他提出要肅清封建主義的問題；
- (4) 為了從制度解決種種制度上的弊端，他提出很多的重大改革措施，包括：
 1. 修改憲法以保障人民權利，並將不允許權力過份集中的原則，在憲法上表達出來；
 2. 為改革幹部終身制，設立黨中央顧問委員會，以安排工作給從第一線退下的幹部，以安撫他們；
 3. 介定黨政職權，解決以黨代政問題；
 4. 企業事業單位成立職工代表大會，逐步推行選舉領導人；
 5. 實行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制度，重大問題一定要集體討

論和決定，不能由第一書記說了算。

鄧的講話，在八月底的政治局會議通過，成為政制改革的總綱領。

八零年八月三十日，全國人大五屆三次會議召開，這次會議可說是中共自四九年建國以來最開放的會議。在政治寬鬆的氣氛下，代表對七七、七八年經濟建設的高指標所造成的財政赤字進行質詢，有些代表更要求石油和冶金部長當場接受質詢渤海二號沉船事件和寶山鋼鐵廠的興建事宜，代表更對文革期間的樣版大寨大隊作出批評，並對昔陽縣西水東調工程作出嚴厲質詢，而以建設大寨名噪全國的陳永貴更被解除副總理職務。在大會會場外，《人民日報》每天以數版篇幅來發表代表的評論，會議氣氛可謂十分活躍。

二 中央正式取消大字報並全面取締民間的民主運動

然而，是次人大正式接受中共的建議取消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及大辯論）。在中國官方壟斷所有傳媒以及出版法根本不合時宜的情況下，大字報實際上起著讓市民自由發表意見的功能，雖然大字報是一種落後的發表意見方式，在文革期間它亦被利用作為打擊異己的手段，然而，大字報本身與電台、電視、《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等一樣都是中性的，它是否起積極或消極作用，完全視乎運用這種途徑的人而定，例如《人民日報》及《紅旗》亦在文革中被利用作宣傳極左觀點。此外，雖然是次人大對一些錯誤的政府政策作出批評，然而可以察覺到這些批評主要落在黨內個別官員身上，而非對整個經濟決策過程作出檢討。例如，七七、七八年的財政赤字、渤海二號事故及寶鋼事件直接與華國鋒及主持石油部（洋躍進的主要倡議者）的官員有關，而大寨發展模式受質疑，則與陳永貴遭批判有直接聯繫。況且，是次會議亦決定趙紫陽接替華國鋒擔任總理，在此情況下，中共領導人較嚴厲批評由華國鋒領導下的國務院工作錯誤，客觀上也為趙紫陽上台造成更大的合理基礎。

雖然中國政局在八零年初呈現更開放的形勢，然而自八零年底，由於國內外局勢的變化，使中共最高領導收緊了寬鬆的政策，並於八一年

初發表九號文件，逮捕出版民刊的人士如王希哲、徐文立、何求等，並全面取締民間所有自發組織。這些事態變化包括：

- (1) 民主意識開始在工人階級中興起，而民刊在八零年復刊後亦加強了對工人爭取權益問題的報道，再加上八零年底規模龐大的東歐波蘭團結工運的影響，使中共高層深感事態嚴重，不能讓民運人士的行動與工人爭取權益的呼聲掛鉤，恐怕會引起重大震盪，衝擊經濟建設的部署，遂斷然採取全面取締的決定。
- (2) 由於七九年中國頒佈了人大選舉法，更規定縣級和縣級以下的人民代表由直選產生，故在八零年開始，不少大學生及無黨派獨立候選人參與競逐，他們不單提出很多對時局尖銳的批評，更使部分官方事先內定的候選人不能順利當選，引起中共高層的注意。
- (3) 在八零年三月開始，中共高層開始醞釀討論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討論過程中，不少高層幹部發出了批毛呼聲，由於這些對毛澤東全面否定的言論會動搖整個中共統治的合法性，故促使鄧小平等領導加強警惕，對開放速度作出控制。
- (4) 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央領導如陳雲、李先念等已提出經濟結構嚴重不平衡而極需調整，然而由於全黨對這問題認識不一，以及權力已大量下放地方，以致中央的調整政策甚難推行，七九至八零年中國更繼續出現龐大赤字，導致貨幣發行增加，物價上漲。在此背景下，財政部及計委的官員有系統地提出以調整經濟為主的主張，在八零年十月召開的第四次全國財政理論會裡，部分主管經濟的官員更猛烈抨擊企業本位論等經濟改革主張，並引發一系列的重要會議，這些會議更使中央確定在八一年開始以五年的時間進一步調整對經濟之。由於調整經濟需要中央運用較集中的權力，故亦拖慢了政治開放的步伐。

在上述形勢下，中共確定首要的任務是政治安定，故暫緩推行一些八零年下旬提出的政改嘗試，加強控制宣傳領域，不再支持及報導大專院校學生參與選舉活動，更全面逮捕民運人士。在經濟領域方面，則強

調集中權力，對經濟進行更深入之調整，但對農村改革及城市經濟改革試點則予以積極支持。

第四節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討論與建國經驗的總結

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經濟建設為工作的中心後，中央領導人認為應認真總結建國經驗教訓，以統一全國全黨的認識，故著手籌備起草〈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文件，此決議草稿先後經過黨內四千名負責幹部及理論工作者討論，其間八易其稿，歷時一年零八個月。

〈歷史決議〉對建國卅二年重大歷史事件和領導人的是非功過進行評價及對歷史作全面總結，目的是引導全國團結一致向前看。如前所述，討論過程最具爭議的地方乃在於對毛澤東的評價，不少黨高幹在文革及以前的政治運動中飽受打擊，導致妻離子散，對發動這次運動的毛澤東很自然充滿憤恨，有些人主張關於毛澤東思想的部分乾脆不寫；有些認為文革的錯誤最終乃是由於毛澤東的品質不好；有些則認為毛澤東在後期根本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文革及其以前的錯誤統統都應該由毛澤東一個人負責。

針對黨內這些看法，鄧小平在八零年十月下旬的談話指出（註十五），若不提毛澤東思想，或對毛澤東持全面否定的態度，不單老工人、土改時翻身的貧下中農通不過，而一些幹部也通不過，鄧認為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不能丟掉，若否定毛澤東思想，實際上就否定了自從一九二七年建黨以來中共的歷史，是一個影響國內外十分重大的政治問題，如果寫不好這部分，整個決議不如不做。最後全黨高幹在接受鄧小平的基調下，於八一年六月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中通過這份歷史決議文件。

這份文件充份肯定四九年的革命與中共建設中國所達致的成就，但亦承認在文革前出現了階級鬥爭擴大化及經濟建設上急躁冒進的錯誤，並認為文革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決議更對文革產生的社會歷史原因，

進行分析。針對毛澤東在發動文革及以前的錯誤，決議認為毛始終功大於過，並指出應把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排除出毛澤東思想的真理科學範疇之外，而毛澤東科學思想的三個基本方面，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及獨立自主，一定要貫徹下去。

〈決議〉更總結建國卅二年以來的發展，並得到下列十點教訓（註十六）：

- 一 黨和國家工作重點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 二 經建必須根據國情，量力而行，有步驟、分階段地進行；
- 三 社會主義經濟關係要適應經濟狀況，重新肯定集體經濟、個體經濟及市場調節的作用；
- 四 階級鬥爭已不再為主要矛盾；
- 五 建立政治及經濟上的民主制度，並加強法制保障人民；
- 六 強調精神文明，發揮科技及知識分子的作用；
- 七 尊重少數民族自治權利，以加強民族團結；
- 八 在戰爭危機仍存在的國際條件下，加強國防現代化的建設；
- 九 對外關係上，堅持反對帝國主義及霸權主義等，維護世界和平；
- 十 根據文革的教訓，須把中共建成具有健全民主集中制的黨。

第五節 新時期政治社會的各種撥亂反正政策與改革（七九——八一）

一 加強民主、健全法制

在這階段，政治、法制改革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是黨和政治體制的改革，以強化政府效率，使其更適合經濟建設的需要；第二是下放權力，強調法制，落實保障人民的權利，並敦促市民對政治有更投入的參與。

為改變個人專權的權力過份集中情況，中共決定成立書記處，以落

實權力分散及黨內制衡。此外，為解決幹部結構普遍老化及現代專業知識較低的問題，中央實行幹部退休和顧問制，以利老一輩幹部的順利交班，而中央更提出幹部年輕化、知識化及專業化的方針。再者，中央成立紀律檢查委員會，發表多份文件和中央首長講話，以針對黨風敗壞及幹部生活特殊化的情況。

七九年七月的五屆人大二次會議更通過刑法、刑事訴訟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全國人大及地方人大選舉法、地方和地方政府組織法等七條法規，標誌著中國開始改變文革以來無法無天的狀況。

人大組織法及選舉法不單加強人大的權力，使縣以上人大可設常委員，以更有效的監督政府工作，並容許人大推行差額選舉，及將直選人大代表的範圍推廣到縣一級。而中央亦強調會更重視政協的作用，鼓勵各民主黨派及各行業的專業人士對國家政策發表更多意見。

二 平反冤案及對社會階級關係重新釐定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央大規模展開平反文革及之前冤案的工作，其中振奮人心的是為五七年反右運動時的錯劃右派分子平反，改正錯劃右派多達五十四萬人，佔原被劃為右派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七九年人大會議更對中國社會的階級狀況和矛盾進行分析，提出作為階級的地主、富農及資本家已經消滅。同年十一月，中央更決定把小商販及小手工業者從原工商業者區別出來，恢復其勞動者的身份。此外，中共中央又明確指出原工商業者已成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勞動者，其成份改為幹部或工人，所有待遇與幹部及工人一視同仁，改變過往對他們歧視的情況。

再者，中共還逐步落實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宗教政策、僑務政策、民族政策以及制定寬大處理原國民黨投誠官員的政策等等。以上種種撥亂反正工作解除了人民的精神及物質枷鎖，緩和了自文革以來緊張的社會關係，凝造安定團結的社會局面。

註 釋

- 註一 陳雲〈堅持有錯必糾的方針〉載《陳雲文選》（一九五六至一九八五），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208頁
- 註二 陳雲〈關於當前經濟問題的五點意見〉載同註一
- 註三 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載《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至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130頁
- 註四、五、六 阮銘《歷史轉捩點上的胡耀邦》，八方文化企業公司，一九九一年，第34-35頁
- 註七 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載同註三，第156頁
- 註八 同註七，第161頁
- 註九 同註四，第37頁
- 註十 同註三，第152頁
- 註十一 李怡〈再訪劉賓雁〉《九十年代》220期 一九八八年五月
- 註十二、十三 王洪模等《改革開放的歷程》，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141-142頁
- 註十四 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載同註三，第280-302頁
- 註十五 鄧小平〈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載同註三，第262-263頁
- 註十六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第四十一章 新時期的經濟路線（七九—八四）——調整與局部改革

導 言

中共在五三年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便推行高累積及偏重發展重工業的政策，經濟結構已極不平衡。七六年後洋躍進後，國民經濟結構更嚴重失調，故在七八年底後，中國提出長達五年的經濟調整政策，直至八四年才正式結束，故經濟調整是這段時期最重要的經濟方針。另一方面，為挽回頻臨崩潰的經濟，中央也支持在農村實施以承包制為主線的農村改革，而在城市，則以試驗的形式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改革。對外經濟開放方面，這段期間亦有很大的突破。經過了幾年的實踐，中央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提出增強經濟效益的十點建議，標誌著中央經濟政策的初步全面建立。

第一節 國民經濟的二次大調整

一 中國經濟嚴重失衡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央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國民經濟進行深入調查研究，發覺存在嚴重失衡的局面。

(1) 改革開放之前發展戰略的偏差

中國長期推行高發展指標、高積累及低消費的發展策略，造成經濟重大比例失調，包括：

1. 農業和工業的比例失調

中國由於長期實行側重工業發展的政策，對農業投資不單不夠，更通過低價收購農產品的剪刀差政策(筆者按：即國家人為地壓低收購農產

品的價格)從農村拿走資金以發展城市經濟，使農民生活長期不能提高。

2. 工業內部發展的比例失調

由於過份強調重工業，相信通過大量製造機器等資本產品，能帶動整個經濟的全速發展，結果忽略了輕工業，造成市場供應緊張，缺乏出口能力。

除輕工業發展落後外，中國的燃料及原材料工業亦追不上經濟發展的需要。

3. 積累與消費的比例失調

國家把資金過多地投資於基本建設，而忽略提高職工及農民的收入，打擊市民生產的情緒，牽制著經濟發展的動力。(註一)

(2) 洋躍進使經濟結構進一步惡化

七七、七八年經濟上的洋躍進，引進過多項目，對外匯支付和國內配套造成困難。此外，由於作出投資缺乏充份的全面考慮，基建投資一再增加，部分資金沒有集中投到急需之處，造成燃料、鋼材、木材及水泥等全面短缺。再者，工業普遍出現盲目追求產值而忽視質量的傾向，導致產需脫節，積壓與短缺同時出現，經濟結構進一步失衡。

(3) 財政支出過多，造成赤字出現

在三中全會期間，政府決定改善農民生活，將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大幅增加，並減免多項農業稅收。在城市經濟方面，則針對文革及以前上山下鄉青年回流城市工作的要求，安排接近三千萬的就業人口在國營和集體企業工作，國家的「還賬」(筆者按：即國家推行補償在文革期間受苦的群眾的措施)政策導致政府的勞動工資開支增加，更加重了企業冗員的情況。再者，中國在七九年的中越戰爭中軍費支出龐大，加上洋躍進時過量投資，使中央財政面臨極大之困難。

二 中央的經濟調整政策

面對經濟的失衡局面，中央採取一系列改善措施：

- (1) 七九年三月，陳雲、李先念聯名給中共中央寫信，指出國民經濟嚴重失調，為將來穩定的發展，應注重綜合平衡，按比例發展，避免再出現反覆局面，並提出要進行兩三年的調整工作。註二
- (2) 同年四月，中共中央召開各地方第一書記和主管經濟負責人出席的中央工作會議，李先念作了關於國民經濟調整問題的報告，會議正式確定「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八字方針。六月，在提交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中央把此八字方針作為當前經濟政策的重點。註三此外，四月的中央工作會議更提出了十二條調整原則和措施註四，重點是：
 1. 加快農業、輕工業的發展；
 2. 在重工業中突出煤、電、油、運輸和建築材料工業的生產建設；
 3. 縮短基建並減輕引進外國項目之步伐；
 4. 增加中國商品對外競爭能力，增加出口；
 5. 對不合理價格作必要性的調整；
 6. 廣開就業門路，並控制人口增長，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改善人民的生活。
- (3) 在中央工作會議的指導思想下，中央調整了七九年的國民經濟計劃，把基建減少百分之二十六，並將工業生產速度放緩，取消洋躍進時提出的八零年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的任務，將全國正在建設的大型項目由一千一百八十七個減少到九百一十二個。

三 國民經濟的進一步調整

(1) 經濟結構仍嚴重失衡

雖然七九、八零年的經濟調整取得一定的成就，如壓低積累、增加

城鄉人民收入、調整了農、輕、重工業比重及加強了能源生產等，但由於八字方針還包括將經濟權力下放的「經濟體制改革」，加強了地方及企業的投資決策能力，而這兩年的經濟工作重點亦在於改革，而會觸動地方及企羣利益的「調整」根本未被地方和企業單位貫徹推行。更重要的，是趙紫陽以四川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改革名震全國，加上其改善農業的政績，使他成為取代華國鋒出任總理的人選，以下放權力為特徵的改革更成為時代的趨勢。七九年底至八零年初，國務院更通過一系列有關企業擴權的文件，使企業改革成為一時之趨勢。

由於當時中央經濟政策偏重改革，經濟調整工作不被重視，故出現了兩個嚴重情況：

1. 基本建設項目已過多，但八零年的投資規模卻不減反增，造成經濟進一步嚴重失調。國家計劃的大中型項目雖然有一批被停建緩建，但地方施工項目反而增加，導致鋼材、水泥、木材大量短缺，建設規模再一次超出國力。
2. 七九至八一年，由於基建失控，中央財政連續出現三年赤字，國家不得不增發鈔票，引致通脹，嚴重影響市民生活。

（2）「放權」的改革導致投資失控

造成七九年後經濟失控，再不能從文革以來及洋躍進經濟失調等方面尋找原因。而主要是由於在經濟體制下放權力時，沒有及時建立有效的中央調控能力，再加上地方政府及企業的投資饑渴心態，利用各種得到資金的渠道不顧國力地擴大投資與生產。造成是次經濟失調，可歸結於下列幾個原因：

1. 建設權力分散

無論是中央、省市、地區、縣市、甚至公社五級都有批准建設的權力，由於基建管理權高度分散，彼此還互相競爭，爭相興建項目，中央根本無法控制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之規模。

2. 建設的資金渠道過多

雖然國內資金受控制，但各級單位卻可利用外資項目；財政資金減少，但銀行貸款卻增加；中央政府預算減少，但地區及各部門自行安排的資金增加；新的基本建設減，但各種名目如更新設備，挖潛等資金增加，實際資金仍用於基建投資。(註五)

3. 重複、盲目建設及進口的情況嚴重

在中央實行經濟改革、財政「分灶吃飯」和擴大企業自主權政策下，由於強調獨立自主、企業本位論，而適應新環境的宏觀經濟管理體制改革沒有跟上，再加上企業本身缺乏自我控制發展機制，負盈不負虧，投資饑渴情況嚴重，造成各方面盲目重複建設，加劇了國民經濟的不平衡局面。

(3) 中央進一步調整——確立「兩平一穩」的方針

八零年下旬開始，由於調整工作遇到阻力及國民經濟出現危機，各理論機構、國務院及黨中央相繼召開會議，分析形勢，統一指導思想。在八零十月的第四次全國財政理論討論會裡，支持「調整」的財政部經濟學者如許毅等猛烈抨擊赤字財政及企業本位論之政策，認為企業的獨立運作會使企業脫離國家計劃，他並強調「調整」是八字方針的中心和關鍵。(註六) 由於財政部官員的爭取，引致中央召開一系列重要會議。八零年十一月十五日至三十日，國務院召開全國省長及地方首腦會議，並同時舉行全國計劃會議，討論經濟形勢及調整八一年的國民經濟計劃。

會議期間，各中央最高領導人對調整八一年的指標作出指示，主要內容是：「明年基本建設要退夠，壓縮基建投資是鐵公雞，一毛不拔，為克服困難，權是要集中的，不是分散的，最後的落腳點是中央集中統一。」(註七)

八零年十二月，黨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各領導相繼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貫徹調整之重要性。陳雲按中央常委的決定作了〈經濟形勢與經濟教

訓》的講話，提出十四點意見，認為建國以來經建的主要錯誤是「左」的錯誤，並提出引進新技術及外資時要十分謹慎。今後若干年，中央和地方財政在開支方面要大大緊縮，調整意味著某些方面的後退，而且要退夠，不要害怕這個清醒健康的調整。^(註八)趙紫陽也提出中國過去走的是重視基建、高積累及低效率的道路，雖然生產增長速度快，但創造的財富少，今後不應靠多建新的基建項目，而應發揮現有企業作用，提高經濟效益。^(註九)

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時，鄧小平更作了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的講話，除了強調「調整」經濟結構的重要外，更針對在七九年底及八零年初死灰復燃的民間自辦刊物行動大加抨擊，指出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黨的領導。對於黨內外任何企圖削弱和反對黨領導的傾向，必須進行鬥爭。^(註十)

中央工作會議對調整提出「兩平一穩」的要求，即財政收支平衡；信貸收支平衡；以及穩定物價，並確定在整個六五計劃期間（一九八一至八五），要繼續進行調整。這次會議更集中界定調整與改革的關係，提出調整乃改革的前提，實行以調整為中心，改革須服從調整，加強集中統一和宏觀控制，在繼續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前提下，要放慢改革的步伐，為調整創造條件。在這次「調整」與「改革」關係中，可以看到調整與改革出現的矛盾，正如中國經濟學家周叔蓮指出：「調整一般要求加強集中統一」，這樣才可確保縮短基本建設等決策得到迅速的貫徹，而改革往往要求適當分散權力，以調動地方、企業和勞動者個人的積極性、主動性。^(註十一)

調整的具體措施主要是消減財政赤字，八一年減少財政支出一百四十億元，包括大幅削減基建總規模，減少國家預算內基建投資及減少行政、國防費等支出，以爭取儘快達至收支平衡。八一年開始，中央相繼採取一系列政策如凍結市場物價、制止濫發獎金、加強信貸管理，嚴格控制貨幣發行等。值得注意的，是次調整並不排斥經濟改革，例如工業改組、企業聯合，基建投資由國家撥款改為銀行借貸及工資改革等，總而言之，經濟改革仍是局部地、試點地進行。

由於加緊調整工作，從七九至八二年，整個國民經濟結構如積累與消費、社會總需求與總供給及農輕重等關係，已比較協調地發展。在這基礎上，中央減少了建設規模、以減低財政赤字，加上推行的農村改革、城市企業試點改革、對外開放及強調以發揮經濟效益為中心的經濟政策，人民生活質素得以提高，整個經濟呈現活躍局面。

是次以調整為主的方針主宰了七九至八四年的中國經濟發展總政策，直至八四年才有所改變。由於經濟穩定，改革開放的呼聲及要求日增，鄧小平在八四年第一次南下特區鼓吹改革。一九八四年，中國經濟的總方針轉向城市經濟改革。

第二節 農村以「包」為基礎的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改革

農村改革以及其帶來之農村生活大幅改善，乃七九至八四年鄧小平新政的最大成就，值得注意的是以「包產到戶」為基礎的家庭承包責任制的發明權是農民的(鄧小平語)(註十二)，雖然中央在七八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中提出不少發展農業的措施，然而這些政策仍未能滿足農民的實際需要，而農民亦須衝破共黨內保守勢力的種種阻力才能爭取包產到戶的合法性。

一 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農村改革發展的第一步（七九—八四）

制定發展農村政策是七八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重要議程，全會同意將〈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發到各省、市、自治區討論試行。在三中全會後，中央更制定一系列政策，針對文革以來農民耕種缺乏自主性及無刺激機制等嚴重問題，從「放權」及「讓利」等六個方面促進農業的發展(註十三)。

(1) 「放權」方面的措施包括：

1. 尊重生產單位的自主權實行因地種植。這主要改變了一向以來農村幹部盲目指揮之情況，農民有權因地制宜地進行種植，決定增產措施及經營管理方法等。
2. 推行不同形式的責任制。這項方針打破了以往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舊模式，而按生產者的貢獻來分配農作物，以加強其工作積極性。
3. 容許農民發展家庭副業，開放集市貿易，肯定人民公社的社員自留地、家庭副業及集市貿易乃社會主義經濟的一部分，容許農民在公社工作後還可利用自留地及家庭副業進行生產，並可到自由市場出售產品以增加收入。

(2) 讓利的政策包括

1. 大幅度提高農副產品的國家收購價格，直接使農民增加收益，以物質刺激政策鼓勵他們更努力地生產。
2. 減輕農民稅收，減低國家以平價收購的公價糧的數量，並降低農業機械、化肥及農用工業品的價格，使農民能以更便宜的價錢購買所需的農業生產資料，以減輕農民的生活負擔。
3. 國家大量進口糧食，以減輕農民種植糧食以供應城市人口的負擔，從而為農民耕種其他農作物製造條件，調整過往「以糧為鋼」的單一農業結構，使農業能因地制宜地發展生產，讓農民休養生息。

雖然十一屆三中全會改變了以往「一大二公」的極左政策，但其政策仍是漸進的，會議更明確指出「不許包產到戶」。但實際上，政府根本無法控制農民，在三中全會以前，農民已局部突破政府反對「包產到戶」的限制，並取得良好的成績。

二 包產到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自發創造的政策

包產到戶是指國家將土地劃分予農民經營耕種，雙方協定一個生產指標，若農民經營此塊土地的產量超過此指標時，剩下的農作物交農民自行處置，從而達至「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之結果。

以家庭經營、包產分配為主要特徵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並不是由中共策劃推行，而是農民在建國後過左政策下為求生存的創舉。

承包制起源於宿縣褚蘭公社的老農劉慶蘭，在六零年人民公社化及隨之而來的大饑荒時，他已經七十三歲，兒子患有肺病並喪失工作能力，但這老人卻不願留在公社吃大鍋飯，而向公社要求准許他帶兒子到山裡開荒種地，結果一年後他收了三千三百斤糧食，上繳公社一千八百斤和六十元錢。這個事例傳到安徽省黨委第一書記曾希聖那裡，促使他推行「按勞動力分包耕地，按實產糧食記工分」的責任田政策，使安徽農村在一九六零年出現生機，減輕大饑荒的災難，群眾當時更稱責任田為「救命田」。然而，責任田政策在推行僅一年並使農村出現生機時，即被毛澤東及一些頑固的黨政幹部扼殺，被當作復辟資本主義的「單幹風」而被猛烈批判^(註十四)。

七八年夏，安徽出現百年不遇的大旱。為解民困，當時省委第一書記萬里決定鼓勵農民多種「保命麥」以渡過荒年，他批准將集體無法耕種的土地借予農民種麥種菜，所產糧食不徵購，不計口糧。肥西縣山南公社率先行動，借地予農民耕種，並取得顯著效果。同年秋冬，安徽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一個被稱為討飯村的地方，為解決生活厄困，也私下秘密的推行包產到戶。那時要實行此政策是要冒很大風險的，據當時一份為解民困的共產黨基層幹部與社員簽訂的合約，可以看到這場農村革命之悲壯局面：

「我們分田到戶，每戶主簽字蓋章，如以後能幹，每戶保證完成每戶

的全年上交和公糧，不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坐牢殺頭也甘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到十八歲。」（註十五）

在此情況下，包產到戶迅速普及，又一次成為生產的主要形式。

雖然包產到戶使農村恢復生機，但中國於七八年期間由於「左毒」仍廣泛存在，很多地方幹部對包產到戶仍不願表態支持，不少黨支部書記指出「如果你們搞包產到戶我就退黨，你們在破壞社會主義。」不少幹部並認為包產到戶實是倒退，「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有些幹部更說：「毛主席……辦起人民公社，他老人家逝世才三年，我們就把人民公社搞垮了，怎樣對得起他老人家……老牛要是會講話也要告到中央。（註十六）除了部分較基層的幹部對包產到戶持懷疑及批評態度外，高幹間也出現了一定的爭論，據當時曾參與農村改革的陳一諦回憶道：

「當時農委主任給……萬里打去了電話，說：『你知道不知道，你們那兒有的人分田到組了，可能有的還要分田到戶。這樣，人民公社三級所有制不就變成三級半了嗎？』萬里說：『我管他甚麼三級半四級，只要農民吃飽了肚子就行。你再好的辦法農民吃不飽飯也不是好辦法。』……兩人發生激烈的爭論。」（大略）（註十七）

無可否認的是當時中共中央仍不贊成把土地分給農民一家一戶自由經營，七八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雖然對農村政策進行很大程度之改革，但仍指出「不許包產到戶，不許包幹到戶。」此外，隨著包產到戶大量湧現，在八零年間中國也進行了一場「產量與方向」的論爭，在不少權威性的報章刊物上，包產到戶被視為分田單幹而被要求停止，攻擊者認為堅持集體生產和統一分配才是社會主義，包產、包幹到戶由於不具備這兩個重要條件，故不能被視為社會主義。

雖然包產到戶面臨再被扼殺的危險，但由於部分接近基層而思想開放的領導人如萬里等堅持，更重要的是農民實踐而帶來的輝煌成果，中央很快就改變了政策。七九年九月，中共中央十一屆四中全會提出，「除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地區、交通不便的單家獨戶外，不要包

產到戶。」雖然此文件對包產到戶作出限制，但仍肯定了包產到戶的政策適應某些地區。八零年鄧小平的講話也談到，「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大……有些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個擔心是不必要的。」(註十八) 在鄧小平的支持下，八零年九月中共中央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制定〈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的通知，指出在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後地區，群眾要求包產到戶的，應當支持群眾的要求，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幹到戶，並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保持穩定。(註十九)

當包產到戶使一些農村得益後，鄰近地區的農民亦競相向當地政府施加壓力，要求也推行包產到戶，故雙包的發展出現燎原之勢。八一年中央批准的〈關於積極發展多種經營的報告〉中指出應「……積極鼓勵和支持社員個人或合伙經營服務業、手工業……等。凡是適宜社員個人經營的項目，盡量由農戶自己去搞。」(註二十) 八二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亦肯定包幹到戶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八三年的一號文件更肯定分戶承包的家庭經營只不過是合作經濟中一個經營層次，是新型的家庭經濟。

由於承包制的廣泛推行，中國農村發生極大變化，農民收入增加，生產改善，普遍家庭都有了積蓄，糧食生產在八四年創下歷史高峰，而其它經濟作物在八五年亦大幅增產，使中國的經濟實力大大增強。

三 對承包制的分析——成功原因與局限

(1) 承包制的成就

聯產承包責任制之所以成功，主要是解決了中國自五零年代初期農業合作化以來農業發展面對的三個嚴重問題：

1. 解決了農民經營自主權的問題。承包制使土地公有和家庭分散經營相結合，土地種植甚麼，怎樣種植及分配，皆由農民因地制宜地決定，解決了以往在公社下土地耕種的決策要交由公社幹部負

責而產生瞎指揮的情況。

2. 在分配政策上，包產到戶取代了大鍋飯等平均主義，使權、責、利緊密結合，改變以往幹多幹少都一樣的情況，促使農民從物質上更關心自己的勞動成果，激勵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
3. 使農民在集體經濟中的地位有所改變，從以往的單純勞動者改變為經營者，並掌握了生產經營自主權。更重要的，是承包制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幹部特殊化的問題，過去有些幹部在集體經濟的保護下，為一己私利而抽調生產隊甚至農民的生產成果。承包制推行後，由於經營制度之轉變使農村幹部大大減少，他們更失去調配集體經濟的權力，從而減少剝奪農民生產成果及營私舞弊的機會。

（2）放權讓利的承包制改革之局限性

雖然承包制對激勵農村生產產生很大的作用，但這方面的改革仍有一定的局限，主要是承包制使國家領導人及農民誤以為簡單的「放權讓利」政策便能使農村經濟快速發展，從而忽視了政府對農業發展的承擔與功能。其實，中國農業經濟在實行承包制後能獲得重大發展，除了激勵機制外，過去二十年間的農田建設投資也發揮很大作用。承包制形成的家庭經營方式，由於對土地最終產權問題未能觸及，再加上農民害怕政策多變的影響，使其缺乏對農地作長期投資的打算，甚至在耕種時對土地往往實施掠奪性的經營與砍伐。以上的情況反映中國農村缺乏積極的投資主體來擴充水利等基礎建設，以促進農業的長期發展，從而造成八五年以後農業生產後繼能力不足，及糧食生產停滯不前的局面。

此外，農村的改變也與農村外部的計劃經濟發生矛盾，主要表現為收購農產品及供應農用生產資料的商業體制及運銷體制未能配合，使農民在豐收時未必能賣去農作物，而在生產減少時國家商業機構又會堅持收購，使農民承受很大的壓力。此外，國營商業機構又未必能及時供給農民所需的生產資料，而運銷結構不合理，往往使很多農產品在農村腐

爛而不能及時運出市場。故此，隨著農村的發展，也迫使城市經濟體制進行更全面的改革，以配合農村的需要。

第三節 財政及城市經濟的試點改革

相對於全國經濟調整的總方向，以及承包制以燎原姿態在農村推行，中國城市的改革雖然沒有停止，但只能說是以小規模的試點形式進行。

一 中央與地方關係

為擴大地方的財力，以加強地方政府理財及發展經濟的責任心，中央決定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幹」的「分灶吃飯」財政體制，將責任制引用到中央與地方關係之上。其基本內容有如下兩個方面：

- (1) 中央與地方按經濟管理中的隸屬關係劃分各自的財政收支範圍。舉例來說，屬於中央的企業、公債及關稅收入，都劃歸中央，而屬於地方政府的企業，不同稅收項目則劃入為地方政府的收入。在支出上亦引用同一原則，中央與地方劃分不同類別的支出，交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負責。
- (2) 在收支範圍劃定後，以七九年地方財政收支預算為基礎數，並據此確定每個地區的上繳中央政府的比例，或受補助地區的固定補助數額，幾年不變。地方的各項支出，則主要根據國民經濟計劃及自身財力，自求平衡，多收多支，少收少支。

二 國家與企業關係——擴大企業自主權

為改變企業全面依附於國家的狀況，並提高企業的經營效益，中國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開展了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改革，主要循「放權讓利」、搞活企業及引進市場機制的思路進行的。

七八年十月，四川省在重慶六個企業實行擴權試點，七九年九月，國務院更發佈以實行「利潤留成」為主的擴大企業自主權的五個文件。全

國擴權試點的企業，八零年六月達至六千六百家，佔全國國營企業總數的百分之十六，但產值和利潤卻分別佔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左右。

在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中，企業在生產計劃、產品銷售、利潤留存、資金運用、對外貿易以及職工獎罰等多方面都有了部分權力(請參閱附錄有關十九年經濟體制改革及發展的述評)，初步改善了企業被國家完全控制而缺乏活力的狀況。然而，由於企業改革仍是局部的、試點探索性的進行，企業自主權仍有很大之限制，這包括：

- (1) 企業留利可供自行運用的比例，並無劃一的規則，基本上是企業與政權機關討價還價的結果，這就造成企業間由於留利的不同而出現苦樂不均的情況，影響企業的積極性。在另一方面，國家如下放過多財力，會使政府收入減少，企業更會著眼於與政府之談判，而忽視改進內部的經營效率；假若企業得利太少時，則會使職工的物質刺激不足，造成企業不能活躍發展之局面。在這情況下，國家遂進行「利改稅」之改革，把討價還價的「利潤分成」制度改為各企業皆要依照「劃一稅率」上交稅項，然而由於各企業本身的先天條件不同，依照劃一稅率交稅將造成更為不均的狀況，致使「利改稅」無法成功推行。
- (2) 除利潤留成的局限外，國家對企業的管理依然採用行政辦法，使企業仍舊依賴國家的照顧。另一方面，企業為其自身的利益，希望能加快投資建設步伐，造成投資過熱現象，而中央在新出現的企業擴權環境下亦未能建立有效的宏觀調控措施，造成經濟失控，導致國民經濟在八零年代初需要實行進一步的調整。

三 發展多種經濟成份

七九年後，國家在公有制為主體的情況下鼓勵和發展多種經濟形式，如集體和個體經濟，這項重大改革的目的是緩和七八年前後社會就業的壓力。八一年下旬，國務院發佈了〈關於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若干政策性規定〉及〈關於廣開門路、搞活經濟、解決城鎮就業問題的若干規

定》，強調個體經濟在發展生產、搞活經濟、滿足市民需要及擴大就業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七九年後集體和個體工業發展迅速，遍及零售商業、飲食業、修理業、建築業及服務業等行業，至八四年底，個體工業從業人員已達三十八萬人，產值達十四點八億元，佔工業總產值的百分之零點二^(註二十一)。

四 對外經濟關係。

對外開放是中國經濟發展一大轉變。粉碎四人幫後，中國決定實行對外開放，借助外國的技術資金，加快經濟發展。七九年七月，人大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鼓勵外國企業或外國商人到國內投資設廠，辦合資企業。

同時，中國亦改革以往的外貿制度，下放部分出口商品予地方經營，以增加地方進行外貿的份額。中央更決定對廣東、福建兩省的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與靈活措施，給予更多自主權，在財政上實行特別優惠兩省的財政包幹，外貿上給予更大比例的外匯留成，以及在對外活動方面給予更大的自主權。

此外，中央亦決定在廣東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頭市以及福建省的廈門市，各劃出一定範圍的區域，試辦經濟特區，在特區內實行特殊經濟政策，吸引僑商及外商設廠，或與他們合辦企業，以引進先進技術，並發展對外貿易。

總括而言，通過城市及農村方面的改革，高度集中的僵化體制開始變得靈活，經濟形勢呈現活潑的局面。

第四節 以效益為中心的經濟建設十條方針—— 對新時期經濟政策的初步總結

經過對經濟進一步調整，以及城市、農村、中央地方和對外經濟開放等改革的初步經驗，在八一年五屆人大四次會議上，剛上任的趙紫陽

總理提出了中國今後經濟建設的十條方針。趙紫陽認為考慮一切經濟問題時，必須把根本出發點放在提高經濟效益上，走出一條較實在、效益好及人民可得更多實惠的新路子，這十條方針包括是：

- 一 依靠政策和科學，加快農業的發展。
- 二 把消費品工業的發展放到重要地位，進一步調整工業的服務方向。
- 三 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加強能源工業和交通運輸業的建設。
- 四 有重點有步驟地進行技術改造，充分發揮現有企業的作用。
- 五 分批進行企業的全面整頓和必要改組。
- 六 講究生財、聚財、用財之道，增加和節省建設資金。
- 七 堅持對外開放，增強中國自力更生的能力。
- 八 積極穩妥地改革經濟體制，充份有效地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
- 九 提高全體勞動者的科學文化水平，大力組織科研機關。
- 十 從一切為人民的思想出發，統籌安排生產建設和人民生活。

這十條經建方針，是「調整、改革、整頓、提高」八字方針的具體表現，它們有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的，其中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及第九條是從國民經濟各部門以及在生產過程中人和物的因素，在教育、科研的基礎上闡述如何有效地安排積累和消費，以及各個部門如農業、消費品工業和重工業的協調發展，解決交通、能源和技術改造等問題。第五及第八條則從微觀的企業整頓與宏觀的經濟體制改革方面來調動企業的積極性，以增加其活動。第七條則強調對外經濟技術交流，提高我國的技術水平，以促進經濟發展。第十條是前九條的總結，要求把提高全社會的經濟效益看為一切經濟活動的中心和前提，作為衡量經濟工作成敗之主要標準，在提高效益的基礎上促進經濟發展，改善人民的生活。

註 釋

- 註 一 李先念〈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載《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經濟政策文獻選論》，經濟科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37-39頁
- 註 二 陳雲〈關於財經工作給中央的信〉載《陳雲文選》，人民出版社，一九

八六年，第224頁

註三、四 同註一、第62-79頁

註五 許毅〈當前財政經濟中存在的問題和我們的對策〉載《當前財政問題》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第16-17頁

註六 同註五、第十八頁、第20-30頁

註七 有關是次會議情況，請參考黃見秋等著《新時期專題紀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103頁。王洪模等《改革開放的歷程》，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186頁

註八 同註二、第248頁

註九 同註七，《新時期專題紀事》，第103頁

註十 鄧小平〈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載《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313-333頁

註十一 周叔蓮《經濟結構與經濟效果》，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48頁

註十二 朱濤〈鄧小平珠海紀行〉《文匯報》，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七日

註十三 翁永曦等〈對我國農業發展戰略問題的若干看法〉載《經濟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十一期，第19頁

註十四 有關責任田的論述，請參考楊勛、劉家瑞《中國農村改革的道路》，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第90頁

註十五 《北京日報》一九八四年十月五日

註十六 同註十四，第105頁

註十七 陳一諳《中國二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聯經出版社，一九九零年，第33-34頁

註十八 鄧小平〈關於農村政策問題〉同註十，第275-277頁

註十九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大事輯要》一九四九—一九八五，紅旗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第430頁

註二十 中共中央、國務院轉發國家農委〈關於積極發展多種經營〉的報告載《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經濟政策文獻選編》，第269-287頁

註二十一 《中國統計年鑑》(一九八五)，中國統計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235、306、308頁

第四十二章 中國民主運動的發展（一九七九——一九八一）

導 言

中共自建國以來，社會上就積累著很多矛盾，年青一代經過文革的洗禮，對社會不平現象有深刻的體會，對社會政治及經濟的不滿長期積壓於心中，一有機會便要爆發出來。七八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受到政治寬鬆氣氛的影響，中國出現了以「北京之春」為序幕的民主運動。雖然是次民運在八一年受到官方的取締，但畢竟表現了經歷過文革的年青一代的成熟，為新時期的民間運動編上重要的一章。

第一節 北京之春初期——論政文章、傷痕文學、遊行示威

七八年底到七九年初，北京及上海等地掀起了一股群眾自發性的民主運動，外國評論者稱之為「北京之春」。是次民運的出現，主要是受到七六年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影響，人民受到寬鬆氣氛之鼓舞，長期以來積壓的不滿亦迸發而出。在這段期間，人民的呼聲從幾方面反映出來，包括大字報、民刊及群眾討論、示威請願的群眾抗爭行為；以及在文學作品裡以宣洩的方式表達出來。

一 大字報及民刊的湧現

受天安門事件平反影響，七八年十一月左右，北京西單發生了兩次上萬人遊行至天安門廣場和幾次多達幾千人參與的民主研討會。群眾由於沒有其他宣洩不滿的工具，只好運用大字報將自己的不滿或對社會種種不平的批判貼到牆上。當時的大字報的內容雖然包括多方面，但在最初出現時皆是要求個別性冤案平反和揭發地方的官僚罪行為主，並要求

重新評價文革及毛澤東，提出要設立專門機關，追究鎮壓天安門事件的政府首腦，並配合以鄧小平為首的實踐派批判華國鋒及汪東興等人。

在活躍的民主氣氛鼓勵下，一些經歷過文革而具有民主思想、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青年，紛紛創辦油印刊物及組織政治團體，發表自己的主張。當時的民刊相信超過數十份，而比較有名的包括《北京之春》、《探索》、《四五論壇》及《中國人權報》、《人民之聲》及《解凍》等。這些青年人在出版民刊的前夕，便在西單的民主牆上貼出預售告示及部分精彩文章，以吸引讀者購買，由於文章內容切中時弊，得到廣大讀者共鳴，故民刊通常都會在短時間內被搶購一空。

雖然民刊及民間團體皆有不同的觀點，如以魏京生為首的《探索》就反對馬克思主義，而《人民之聲》則基本上是擁護社會主義，但是歸納起來，大字報及民刊的內容可劃分為下列幾大類：

(1) 政治評論文章

這分別是針對當前尖銳的政治問題，如重新評價文革、毛澤東、天安門事件後導致鄧小平下台的決議，以及華國鋒、汪東興、吳德及陳錫聯等人的功過等。此外，這類文章亦分析官僚及民主等政治問題，例如《渤海之濱》第一期的文章〈癥結在那裡〉指出縱使四人幫下台，社會仍然特權泛濫，官僚作風嚴重，其根源不能再歸咎四人幫，而應以封建意識殘餘、人民缺乏民主意識、司法不能獨立及共產黨一元化領導等方面尋根究源，解決辦法是打擊凡是派，確立民主及獨立的法制等。自發組織「中國人權同盟」亦通過〈中國人權宣言〉十九條，要求實行全面普選、健全法制以保障自由與人權、取消秘密警察及進行社會改革，如保護農民基本口糧、消滅乞丐、實施邊界開放、對外交流及落實創作、新聞自由等。（註一）

綜觀這些政治評論的觀點，可以總結為下列幾項：

1. 一致強調民主的重要，倡言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
2. 要求維護人權，反對專制，並強調言論自由及民主的基礎，一致抨擊以思想入罪、以言治罪的不合理情況；

3. 主張政治體制改革，反對一黨專政，加強人大權力及增加政府的透明度，並要求地方自治；
4. 反對共產黨內定候選人的選舉，要求落實真正的民主選舉；
5. 要求司法獨立，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對法庭判案受到黨政官員的干預；
6. 取消官僚控制生產資料，落實基層參與管理的經濟民主，容許公民擇業、遷徙自由，以及改變夫婦分居兩地的制度；
7. 認真平反冤案及錯案，改變申訴的上訴制度，給予上層機構直接處理冤案之權力，使基層市民的冤情得以上達；
8. 反對個人崇拜及神化領袖的愚民政策。

民運人士實際上已擺脫了馬列教條的束縛，而以獨立的思想及實際生活體驗來引證自己的觀點。另外有些人如王希哲及徐文立等，雖然仍喜愛引用一些馬列經典著作，但他們實際上已跳出共黨教條，以開放的態度從這些思想大師的著作中抽出支持其改革的警句。

(2) 理論性文章

在是次民主運動中湧現了很多理論性的、探討社會主義下官僚出現及民主法制的文章，其中分析較深入及影響面較廣的包括魏京生的〈第五個現代化——民主與其他〉、王希哲的〈為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而努力〉、〈無產階級專政是人道的專政〉、傅申奇的〈民主與社會主義〉及陳爾晉的〈論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等。

原載於《人民之聲》第八期的〈為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而努力〉(註二)一文中，王希哲分析了社會主義國家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過程中形成官僚主義的危機性，他並引述南斯拉夫的理論和實踐總結，提出共產黨應放棄行政領導，建立「工人直接的民主管理」，而黨只擔當思想指導功能。刊於四五論壇第十期的〈論無產階級民主革命〉(註三)(這篇文章長達十三萬字，於七六年定稿，直至七九年才通過《四五論壇》得以發表)中，陳爾晉指出不少由共產黨統治的國家已滑入「修正主義」(文革時批判蘇聯制度的慣用語)的道路，陳指出這是一種新型的吃人不吐骨的剝削制度，其特

徵包括：

1. 官僚壟斷特權階級所有制。社會財富變為特權階級的私有物，而在「公有制」的掩蔽下，以官僚壟斷特權階級集團壟斷共同佔有的方式反映出來。
2. 特權資本化。官僚藉著政治與經濟權力，將整個社會的人力物力高度組織起來，變為「具有巨大競爭能力的資本積累制度，是典型化了、特權化了的私有制。」
3. 糖衣砒霜和帶血屠刀相結合的統治方法，形成「勞動和特權的尖銳對立」，更造成「週期性政治危機」。陳爾晉進而指出像中國這樣一個完成生產資料公有制改造後的社會主義國家，具有走向「修正主義」或「完全社會主義」的兩重性，他稱之為「叉路口社會主義」，要避免由「叉路口社會主義」滑向「修正主義」，進而向「完全社會主義」發展，就必須完成無產階級民主的任務，確立共產黨兩黨制，實行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及落實對人權的保障等。

(3) 社會改革文章。

這類文章對社會上的問題作出建設性的評論和提供解決方法，在青島《海浪花》七九年十一月號的文章〈為社會秩序而大聲疾呼〉中，作者認為應用科學的態度去探討各項社會問題如貪污、強姦、殺人及欺騙等，並研究這些問題出現的社會基礎，而不應用封建社會思想，只歸咎於個人的罪惡本質。

二 傷痕文學的興起

在七七至八零年中國政治氣氛較開放的三年裡，反映現實，暴露社會陰暗面的傷痕文學大量湧現。狹義而言，「傷痕」一詞出自七八年八月上海復旦大學生盧新華一篇題為〈傷痕〉的小說，內容描寫一個十六歲的學生在文革時與母親劃清界線，後來母親病重，其女返回上海，但其母親已經去世，這作品反映中國在文革冷酷的階級鬥爭理論統治下，造成母女間陰陽永隔的人倫慘劇；廣義而言，傷痕文學涵蓋了從反右及文革

以來所有流行的暴露黑暗的文藝作品，這些作品均以血和淚控訴反右及文革以來大陸人民精神及肉體上所受的殘酷迫害和打擊。

傷痕文學中較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劉心武的〈班主任〉、李家華的〈新詩學〉、舒展的〈復婚〉、陳國凱的〈我應該怎麼辦〉、沙葉新的〈假如我是真的〉及白樺的〈苦戀〉等，這裡會簡介後來被中共大力批判的作品〈假如我是真的〉及〈苦戀〉。

〈假如我是真的〉描寫下放青年李小璋，冒充中共高幹的兒子張小理，他欺騙和利用一群幹部而獲准調離農場，但騙局終被揭穿，李後來在法庭上說：「我錯就錯在我是個假的。假如我是真的，真是老張或其他首長的兒子，那我做的一切，就將會是完全合法的。」這作品大力批評部分中共高幹享特權、拉關係、官官相畏的貪婪作風，引起很大的共鳴。

至於在八一年被鄧小平及中共猛烈批判的〈苦戀〉，原先以文學劇本形式在《十月》雜誌七九年第三期上發表，八一年根據劇本拍攝了電影〈太陽和人〉。故事描寫知識分子在中共過往極左政權下生活的悲劇，劇中主人翁是一個名畫家，五十年代從美國回歸大陸，卻無法在社會立足，於文革時因逃避禍亂，在途中遭遇家破人亡的慘劇。電影以意識交錯描述法，通過主角女兒的口說：「爸爸，您愛我們這個國家，苦苦地留戀這個國家……可是這個國家愛您嗎？」

三 農民上訪請願、下放青年示威的群眾行動

除了思想及文藝的反思外，社會上群眾不斷要求改善生活及平反冤案，也刺激民主思潮轉化為社會行動。

由於農村多年來實行的極左農業政策，導致民不聊生。受到北京之春的民主氣氛鼓舞，各省農民陸續向北京聚集，舉行反饑餓及反壓迫的遊行示威。農民除了受不合理的一大二公農業政策影響外，還要忍受部分人民公社幹部的壓迫及奴役，例如陝西省某縣的公社幹部整治農民的名目繁多，農民如沒法完成生產或生豬交售的任務，都要扣糧罰款；有病不能工作，開會不到都要罰款（註四）。又如湖北省大悟縣某公社幹部任意處罰農民，強迫農民服役，並私設刑堂，審訊農民，使農民的人身自

由及安全缺乏法律的保障（註五）。

與農民到京請願行動相呼應的，是下放倒流回城市的青年的示威行動。在七八年前的二十年中，不少下放農村的知識青年過著悲慘生活，不單物質貧缺、勞動條件落後、更受農民歧視，他們感到前途茫茫，升學就業毫無保障，結婚困難，再加上部分青年在農村長期遭受公社幹部欺凌虐待，使他們充滿著怨憤。

七八年十二月，下放雲南的五萬多名青年舉行罷工，並集會遊行，反對下放，會後並選出二十八位代表赴京請願，他們打著「我們要抗議，我們要告狀」的標語（註六），後來更得到中共元老王震的接見，引起市民圍觀及外國記者的報導，帶來極大迴響，刺激著全國各地區下放青年的抗爭。

七八年十一月開始，上海市不斷有下放青年集會遊行，他們要求停止下放，將已下放的調回上海工作。早在七八年十二月，一千多家庭主婦到上海市政府門前示威，要求市委會出錢買車票，讓他們在新疆及黑龍江的子女，得以返回上海探望一別十年的母親。據法新社引述目擊者的資料指出，上海青年的示威也刺激青年工人的仿效，十二月底上海一家絲織廠工人發動示威，抗議工資過低和工作時間過長，當這數十名示威工人上街遊行時竟遭槍擊（註七）。七九年二月五日，下放知識青年為爭取市委領導的接見，乃聚集在上海火車站臥軌攔車，使鐵路交通大受影響。此外，杭州、南昌、山西、湖南、貴州、四川等地的知識分子，亦展開示威遊行，爭取回城工作的權益。

第二節 中共「收」風起——民運陷於低潮

一 民刊開始時得官方的默許

民刊和大字報在七八年下旬開始興起時，由於配合著中共上層實踐派對抗凡是派的鬥爭，據當時較接近胡耀邦的阮銘回憶道：「胡耀邦注意了社會民主運動的這一重要發展，並且設法使民主牆上討論的重大問題反映到中央工作會議上來……這樣就在事實上形成社會民主運動與黨內

改革……的聯盟。」^(註八)此外，當時實踐派由於推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思想解放運動，故比較能接受民間的不同意見，再加上中央希望擴大外交合作局面，七八年十二月中美正式宣佈建交，而鄧小平在七八年下旬及七九年一月曾造訪亞洲多國及美國，對民間不同聲音的容忍，實有助提高中央領導人的國際聲望。

鄧小平在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與日本民社黨領袖談話時，表示：「我們無權否定或批評群眾，貼大字報是正常要求，正常現象，群眾有氣要讓他們出氣。群眾要求並非完全正確，有些要求對安定團結、實現四個現代化不利，要向群眾講清楚，要善於領導。」^(註九)而在同一時期，中央報刊又發表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文章，強調天安門事件是「偉大的運動」，並宣稱「只有人民才能決定中國的命運，只有人民才能推動歷史前進……人民革命運動的歷史潮流，是誰也阻擋不了的。」^(註十)

二 民眾激烈言論與示威使政府改變了對民運的態度

民主運動的觀點及行動，很快就超出了中共領導人的容忍範圍，而導致「收」風出現。不少大字報不單批評凡是派的領導人，更全面否定毛澤東，甚至整個共產黨領導國家的制度。在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原本要求取消導致鄧小平下台的決議的萬人集會裡，逐漸演變為要求自由及民主的群眾集會，在會場上群眾頻呼「打倒封建法西斯獨裁」、「為所有中國人帶來民主」等口號，可見人民不滿足於否定極左路線，而要求改變中國的政治制度。此外，一些民運團體如人權同盟也在鄧小平出訪美國及中國與越南戰爭期間，要求美國總統支援中國的人權問題，引起高層的憤怒。

更令中國領導人感到震驚的，是民運及其氣氛引發下鄉青年爭取回城示威及農民抗議行動，中國領導人擔心這樣下去，必然引起全國效發，造成更大的混亂。因此，鄧小平在七八年十一月下旬已指出：「群眾的議論，並非一切都是深思熟慮的，有些對安定團結、實現四個現代化不利，要向群眾說清楚。」^(註十一)中共對民運的壓制，實際發生在七九年初鄧小平訪問美、日歸來並與越南作戰之後，在七九年三月

十六日中國政府宣佈完成自越南撤軍的同一天，鄧小平便作出了一個譴責民運的講話：「民主應為完成四個現代化服務，但有些人搞得太過份了。」(註十二)三月三十日，鄧小平更強調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並指責民主運動帶來的混亂情況：

「最近一段時間內，在一些地方出現了少數人鬧事現象……提出種種在目前不可能實現或者根本不合理的要求，煽動、誘騙一部分群眾衝擊黨政機關，佔領辦公室，實行靜坐絕食，阻斷交通，嚴重破壞工作秩序、生產秩序和社會秩序。」(註十三)

「有個所謂解凍社，發表了一個宣言，公開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說這是分裂人類的。我們能夠允許這種公開反對憲法原則的言論自由嗎？」(註十四)

在中央領導人強硬的態度下，中共及各地方政府均頒佈壓止民運的通告，雖然各地的通告內容不盡相同，但歸納起來有如下六項：

- (1) 集會、遊行，須聽從民警指揮，不得阻攔車輛，妨礙交通(北京)。
- (2) 不准衝擊黨政機關和企業單位(北京)
- (3) 不准造謠惑眾，結夥打架(山東)。不准無理取鬧，誹謗誣陷(北京)。
- (4) 除指定地點外，不准在街道、公眾場所張貼大字報(北京)。
- (5) 凡反對社會主義、洩露國家機密的大字報，一律禁止。(大略)
- (6) 不准擅自離開生產、工作或學習單位(廣東)。

除下達禁令外，北京及上海等大城市亦開始逮捕民運人士，北京首先逮捕帶領農民上訪的女知識青年傅月華，以及在三月廿五日以〈要民主還是要新獨裁〉一文批評鄧小平三月十六日講話的《探索》主編魏京生，魏後來被判刑十五年。

魏京生案後，群眾運動寂靜下來，七九年底全國民刊被指令停刊，民刊人士開始對更多理論問題進行沉思。各地民刊為保持聯絡及思想交流，轉而搞內部討論，並出版以內部通信形式出現的《學友通訊》。有些

民刊仍堅持出版，並以贈閱形式發行，以逃避官方的責難。當時民刊人士的普遍心情，可從七九年底《四五論壇》出版的〈審視自己與周圍環境〉一文中表現出來，文章反省過去一年的民主運動，認為太注重文字宣傳而忽視「現實社會特別是工農生活狀況。」民運人士又要「對付時刻準備毀掉它的官僚勢力，而且要努力克服自身的弱點，更多地接觸勞動群眾，使自己為他們所接受。」(註十五)這階段的民運可以概括為《四五論壇》徐文立的多讀書及廣交朋友的口號。

第三節 中央政治開放與轉折——民刊從復興到被全面取締

一 庚申變法

雖然中國對民間運動的收風在七九年三月刮起，但由於那時中國正值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不久，政治氣氛總的來說仍算開放，故民刊勢力未被全面整肅，而只是轉為較低調的存在。

七九年五月，首都各界舉行紀念五四運動六十週年活動，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行大型學術討論會，與會者討論了民主和科學之口號，並肯定民主乃促進科學繁榮的前提，沒有民主就沒有科學。此外，實踐檢驗真理標準之討論進一步深入，八零年開始實施選舉法，鄧小平在八零年下半年作出要實行政制改革的重要講話，以及黨內改革派知識分子廖蓋隆制定政制改革方案和八零年人大呈現開放的討論氣氛等，皆對民運人士產生很大的鼓舞。王希哲曾指出「這是一個以改革為旗幟的時代，歷史學家們已經把它稱之為庚申改革時代了。」徐文立也認為「中國社會已經發展到一個非變法不得進步的歷史關頭。」因此，人們稱中國歷史上這次中共改革派勢力佔主導地位的變法為庚申變法。

二 民運的復興期與學運、工運的發展

八零年期間民刊如雨後春筍般重新湧現，不單停刊的復刊，新的民刊也不斷出現。此外，全國各地民刊也聯合出版一份全國性的刊物《責

任》，並以各城市的民刊負責人士擔任編務工作，《責任》在復興期的民主運動、學運及工運中最為突出。

(1) 學生運動

學運最初是以人民大學為主的北京地區多所大專院校所爆發的，從抗議校舍被佔的學生騷動開始。七七年下旬，全國高等院校陸續恢復考試及招生制度，而這年大專院校的招生總人數已達二十七點三萬人，破了文革以來的招生紀錄，但當學生歡天喜地進入院校時，卻發現校舍已在不同程度上被軍隊、工廠或其他單位占用，由於各方面皆有自己的困難，以致這些單位對校方要求交還房舍一事遲遲未能答覆或執行，造成七九年十月的人民大學學生示威遊行。

七九年人大通過「地方人大選舉法」，規定縣級的人大代表由普選產生，由此引發八零年上海、湖南、北京等地部分高等院校學生的競選行動。與過往所有的自發民主運動一樣，學生的言論漸趨激烈，使共黨幹部大為緊張。例如復旦大學化學系學生王大琦說「我不是共產黨員，我只承認我唯一的領導，是全體選民」(註十六)。此言一出，即博得無數掌聲。另外有些學生更大講「祖宗三代沒有一個黨員」，亦得到支持。有人則提「不要黨代表，選舉工作要獨立於黨的領導之外」，並鼓吹「多黨制」(註十七)。學生這些言論，引起黨政幹部的警惕。七九年十月，湖南師範學院因官方臨時修改選舉法規，導致師生罷課、絕食靜坐及上訪等。這些事件得到全國各地民刊發報消息，表態支持，使官方同意檢討及重新進行選舉。由於是次勝利之刺激，以武漢大學為中心，有二十二間大專院校參加的《大學生通訊》出版，承擔起各學生團體聯絡的任務。

更進一步引起中共高層關注的，是中國政府認為少數參加競選的學生之活動是北京西單民主牆的發展和延續，而事實亦是如此，例如北京大學表現出色的候選人胡平與王軍濤分別是民間刊物《四五論壇》及《沃土》的活躍分子。八一年一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提議中共北京市委召集北京大學等十所院校的黨委書記會議，強調要對學生進行教育宣傳工作，

並宣佈所有黨員、共青團員一概不得參加串聯集會、簽名和印刷等活動。（註十八）

（2）工人運動

更令中共領導感到震驚的，是受到波蘭工運的影響，工人爭取民主及改善生活的行動亦開始抬頭。在七九、八零年間，由於基建失控，財政赤字擴大，導致通貨膨脹惡化，而工人亦須面對工資低，生活條件如住房問題等困難。此外，工人亦受到開放下西方民主自由思潮、民刊以及農運等影響，再加上八零年波蘭工潮的衝擊啟示，使不少地方如上海、浙江、天津、武漢及山西等地的工人，紛紛要求組織真正代表工人而獨立於中共領導的獨立工會，工人並就個別的勞工問題如獎金發放、廠內法規過份嚴格及官僚主義等問題，進行罷工，並且貼出「打倒官僚作風」、「打倒特權」和「推翻獨裁專制」等標語。（註十九）

八一年一月二十二日的《長江日報》也指出「有少數的人想要使國家陷於混亂，他們正試圖脫離黨的領導，並組織所謂自由工會及獨立學生協會。」（註二十）美聯社亦指出：「最近陝西省的工人，試圖組織一種獨立波蘭式的工會，但為中共當局壓制。」（註二十一）

工人運動得到民刊人士的熱烈支持，北京的《四五論壇》復刊，首先就向波蘭工人的勝利祝賀。青島《理論期》一篇名為〈官僚特權階級統治的喪鐘〉的文章中指出，官僚特權的加速腐爛，是波蘭獨立工會取得勝利的真正原因，並認為中國也需要同樣地學習波蘭團結工會，對官僚作出鬥爭。

三 中共官方對民刊的全面鎮壓及對〈苦戀〉等文學作品的批判

基於工運的興起、學生參與選舉時的激烈言論、中共高層在討論〈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有關對毛澤東評價的分歧、以及調整經濟結構而客觀上需要權力更集中等因素（見前章——中央政策之確立），官方決定對民刊作出全面鎮壓。

鄧小平在八零年十二月明確指出：

「對於黨內外任何企圖削弱、擺脫、取消、反對黨的領導的傾向，必須進行批評、教育以至必要的鬥爭。」(註二十二)

「現在有些地方已經發現，一小撮唯恐天下不亂的人正在用『文化大革命』中的辦法進行煽動和鬧事……個別地方在壞人煽動下少數支邊青年的鬧事，極少數壞頭頭操縱的非法組織、非法刊物的積極串連，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的公開發表，反動傳單的散發，政治謠言的傳播。」(註二十三)八一年三月，鄧小平更點名批評〈苦戀〉：「對電影文學劇本〈苦戀〉要批判，這是有關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在八一年七月鄧進而指出：「無論作者的動機如何，看過以後，只能使人得出這樣的印象：共產黨不好，社會主義制度不好……這樣的作品和那些所謂民主派的言論，實際上起了近似的作用。」(註二十四)

根據中央領導的指示，黨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處理非法組織和有關問題的指示〉等七號、九號文件，聲言取締非法刊物，並指出不允許其以任何方式活動、印刷出版和發行。八一年四、五月更全面逮捕民運人士，著名的民運人士如王希哲、徐文立、傅申奇、陳爾晉等皆被判以重刑。至此，曾經影響國內外的民主運動終被全面取締，民間自發行動遭受徹底的打擊。

在差不多同一時間內，中共各主要報章如《解放軍報》、《人民日報》等亦相繼發表文章，對白樺的〈苦戀〉以及其他有「自由化傾向」的文章如葉文福的〈將軍，不能這樣做〉及沙葉新的〈假如我是真的〉等進行批判。

第四節 對民間的民主運動之總結與評論

一 文革一代知識分子的成熟

是次自發性民主運動是以經歷過文革，並曾深刻反省中國現況的青年工人及知識分子為主體，可說是文革期間楊曦光的〈中國往何處去〉及

七四年〈李一哲大字報〉的延續。他們雖然受時代的局限，無緣讀到一些較新的、介紹外國種種理論的文章，但仍能從馬克思的經典原著或個人體驗出發，細緻分析社會矛盾並尋根究源，高度理性地作出不少刻劃中國社會現象並要求具體改革的理論文章，表現了經歷過文革一代的世故及醒覺。

二 民運與社運的合流引起政府的警覺

這次民刊運動領導人清楚要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必定要與各項社會運動如農運、工運、各項社會抗爭以及基層直接選舉相結合，故此，在七九年初至八一年上旬期間，可以發覺民刊人士對各項社會運動作出廣泛的報導甚至參與。此外，民刊間亦希望組成跨地區的聯絡網，《責任》的出現可視為這股努力的結果。由於民刊人士的爭取策略正確，亦引起中共高層的醒覺，決定要把這股潛力甚大的民間力量取締。

三 官方與民間「上下結合」改革的微妙關係

通過短短兩年的爭取民主運動，可以更清楚在中共統治下，自發的民主運動與官方政策間的緊密及微妙關係。雖然民運的出現乃基於社會矛盾客觀存在及民運人士的醒覺與主動爭取，但假若沒有中央高層在七八年下旬連接著「實踐檢驗真理辯論」的開放政策，以及初期對大字報的容忍，北京之春相信沒有機會開展。後來鄧小平講話強調四項基本原則，以及隨之而來的收風，民刊便立即沉寂下來。直至七九年底、八零年受官方改革開放氣氛鼓舞，以及官方對民間活動的容忍，民刊及各種社運又再度活躍起來，而在八一年中共決定全面取締民間活動時，民運根本無法抵抗地被鎮壓下去。

從以上的發展經驗可知，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政權相對強大的社會裡，爭取民主須要等待歷史的契機，而這主要視乎黨內高層的路線分歧，從而導致某一派認為需要開放民主渠道，使支持自己的民間呼聲與自己作出「上下結合」而把對手打倒。另一種情況是黨內個別或部分較為開放的領導人，明白讓人民宣洩不滿的重要性，而下放民主，以上兩種

情況皆有助於民間自發民主運動的出現。

四 官方堅持循序漸進改革步伐

在改革期間，官方並非絕對政治保守，反而會主動作出部分民主改革，以改善行政效率或鼓勵市民參與監督政府，但官方卻絕對不能容忍一些完全獨立及無法掌握動向的行動，尤其是這些行動有機會與群眾運動如工運、農運等相配合時，官方便會毫不猶疑地進行鎮壓，官方認為這樣才可維持黨的領導，防止社會動亂，避免民革式的災難，以爭取有利的建設環境。

註 釋

- 註 一 〈中國人權宣言〉十九條載葉洪生編著《中國往何處去》，成文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第251頁
- 註 二 《王希哲論文集》，《七十年代》雜誌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第1-24頁
- 註 三 《四五論壇》第十期，一九七九年七月號
- 註 四 〈幹部作風要來一個大的轉變〉《人民日報》，一九七八年八月三日
- 註 五 〈關於大悟縣河口公社幹部作風問題的調查報告〉《紅旗》雜誌一九七九年一月
- 註 六 路透社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 註 七 法新社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註 八 阮路《歷史轉折點上的胡耀邦》，八方文化企業公司，一九九一年，第29頁
- 註 九 法新社，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廿八日
- 註 十 《解放日報》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人民日報》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廿一日
- 註十一 新華社電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廿七日
- 註十二 法新社電 一九七九年三月廿一日
- 註十三 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載《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159頁

- 註十四 同上註，第160頁
- 註十五 〈審視自己與周圍環境〉載《中國民主運動資料》，香港大學學生會國事學會編印，一九八一年，第136頁
- 註十六 石建承〈上海大學競選人民代表的前前後後〉《廣角鏡月刊》第九十三期，八零年六月十六日
- 註十七 船夫《十年學潮紀實》，北京出版社，一九九零年，第77頁
- 註十八 同上註，第73頁
- 註十九 中央社馬德里專電，一九八一年二月廿七日
- 註二十 法新社電 一九八一年一月廿八日
- 註二十一 美聯社電 一九八一年一月廿八日
- 註二十二 鄧小平〈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同註十三，第317頁
- 註二十三 同註二十二，第329頁
- 註二十四 鄧小平〈關於思想戰線上的問的談話〉同註十三，第346頁

第四十三章 中國外交政策的演變——從中越戰爭到八十年代的和平外交

導 言

七十年代末期，基於蘇聯的軍事威脅，以及蘇聯支持越南在亞洲的擴張，中國在越南入侵柬埔寨後，進一步聯絡美日及東南亞各國，並於七九年二月進軍越南。是次軍事行動只進行了二十多天，在成功打擊越南氣焰後，中國迅速退兵。踏入八十年代，隨著國內經濟建設的大規模開展、以及傾向「對話」及緩和的國際形勢，中國大幅調整其聯美反蘇的外交政策，並以獨立、爭取世界和平的姿態加強與世界各國的聯繫，成功為國內經濟建設締造長期安定的國際環境。

這章將從國際政治關係角度分析中國對越戰爭，並會討論中國在整個八十年代大規模開展和平外交的背景及國策，進而簡要地評述八十年代中國外交的兩大成就——收回港、澳主權與中蘇關係正常化。

第一節 聯美反蘇——從國際戰略看中越戰爭

一 中國對越戰爭（一九七九年二月）

中國與越南原為友好鄰邦，中國在四九年後遭西方各國圍堵的年代，曾站在保衛週邊領土安全及援助世界革命的立場，以大量物資、數十萬計的支援部隊及派遣軍事顧問支援越南的抗法抗美戰爭，當時，越南的領導人胡志明並與中國高層領導人如毛澤東及周恩來等建立了良好的私人關係。

然而，自七五年越南抗美戰爭成功，越南共產黨奪得政權後，中越關係不斷惡化，兩國就領土問題出現很多衝突，七七年初，越南國內更

在與中國毗鄰的省份推行「淨化」政策，推行大規模驅趕華僑的排華行動。七八年底，越南在蘇聯的支持下，入侵親中國的柬埔寨，希望成立其「大印支聯邦」的理想。中國為避免將來南北兩邊受越南及蘇聯的威脅，在爭取到美、日及一些飽受越南威脅的東南亞國家之實際「默許」下，於七九年二月開展對越戰爭，中國此舉一則為消除將來的挑戰，並希望能產生牽制越南的作用，迫使其在柬埔寨撤軍。

二 從國際戰略關係看中越戰爭

在抗法抗美戰爭時，越南曾稱中國是「同志加兄弟」關係，兩國在七十年代發生矛盾實有深刻的國際戰略轉變的背景，主要牽涉中越兩個國家對美、蘇這兩個超級大國的關係。

（1）越南一向希望同時與中蘇保持友好關係

中共自六十年代與蘇聯鬧翻以來，便推行著一條反兩霸（美國、蘇聯）的外交政策。此外基於反美、支援世界革命及與越南共產黨有良好關係的歷史，以及保衛南方邊境領土安全，不受美國支持的南越政府圍堵等戰略原因，中國一向支持越南共產黨（北越）的反法反美戰爭，這是中越共產黨的蜜月期。

在越共方面，其頭號敵人為美國及其支持的南越政府，基於此，越共積極拉攏中共，並同時利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對立，爭取蘇聯的支持，以加強其反美力量。中國站在反兩霸立場，中國一方面希望越南能打敗美國，但另一方面，中國基於蘇聯對其的軍事威脅，亦不希望越南與蘇聯過份緊密合作。面對著極其微妙的外交關係，為同時爭取中、蘇兩國的援助，越共經常在北京與莫斯科間擺動，保持與中、蘇兩國關係的平衡。在六十年代初期中蘇進行大論戰、中蘇兩國關係面臨決裂的時刻，越共對這兩個盟友的相互對立表示擔憂，但越共卻十分成功的對雙方論戰保持中立。在六十年代後期，由於蘇聯奉行與西方世界和平共處的政策，而北京卻推行文革期間極富理想主義色彩的、強硬的支援第三世界（指落後、被西方壓迫的國家）國家革命的外交路線，故越南較傾向中國。

(2) 中國聯美抗蘇政策促使中越關係緊張

促使中越兩個關係出現對立的，實際要追溯到六九年三月中蘇的珍寶島戰爭，以及隨後的蘇聯在中國邊境派駐重兵的政策。中蘇兩國直接的軍事衝突使中共徹底明白蘇聯才是威脅中國國家安全的頭號敵人。在此情況下，中共開始修正其反兩霸政策，並決定改善與美國及西方的關係，以建立一條國際反蘇戰線。而站在美國立場，她亦希望改善與中國這個亞洲第一大國的關係，以配合其推行遏制其頭號對手蘇聯擴張的政策。在中美兩國共同國際戰略利益的背景下，中美關係迅速解凍。並於一九七二年實現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

由於越南的頭號敵人為美國，故越南對中美關係改善，尤其是尼克遜訪華十分反感，認為中國背叛了越南。(筆者按：當然，中國也可以反駁，蘇聯為中國的頭號對手，故越南過往與聯蘇友好的政策，同樣也是背叛中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當時中國仍支持越共的對美戰爭，而越共方面亦為了對付美國，仍保持與北京的友好關係，以爭取更多的支持，一九七五年，越共成功推翻由美國扶持的南越政府，越共領導人黎筭在戰勝後同時訪問中、蘇兩國，基於蘇聯希望利用越南牽制中國，並促使越南作為其於亞洲的親密戰略伙伴，故其以經濟援助越南的態度比中國更積極，這便促使越南更親蘇，同一時期，越共黨內已開始清除與中國關係良好的黨員。

三 越南侵柬及排華直接導致中越雙方開戰

(1) 首先，越南在七五年抗美戰勝後，公開宣稱為世界第三大軍事強國，並在同年派兵侵佔鄰國柬埔寨的領土威島，更進駐鄰國老撾。越南之目的，在於吞併柬埔寨，實現其「印支聯邦」。

基於越南的擴張行動引起中國及東南亞各國的警惕及反對，故為加強自身的實力基礎，越南進一步投向蘇聯。一九七八年，越南參加東歐經濟集團「經互會」，跟著又與蘇聯簽訂有軍事性質的蘇越條約，此外，越南更頻繁出訪亞洲各國，展開目的在於孤立中國的

外交活動。在此背景下，越南大舉進攻親中國的柬埔寨，七九年一月，柬首都金邊失守，由越南支持的韓桑林政府成立。越南侵柬令中共大為震驚，並擔心從此蘇聯便有更多機會插手東南亞事務，從南北兩面抑制中國。實際上，越南的軍港金蘭灣一直以來都是蘇聯想利用的不凍港。在後來中越開戰後，蘇聯軍艦便進駐了峴港和金蘭灣，開進了南中國海。蘇聯的行動不單直接威脅中國，更加強了蘇聯對美國在亞太區域及印度洋地區的爭霸實力。

- (2) 其次，基於越南將中國看成為其推行「印支聯邦」的最大障礙，並將東南亞諸國對其侵柬的警惕看成是中國煽動的結果，故為打擊中國並挑撥其與東南亞諸國的關係，越南在七八年上旬便開展進一步的排華行動，通過驅逐大批華人出境，弄致東南亞各國內雞犬不寧。

面對龐大的華人難民潮，東南亞各國不收容又不符合人道原則，收容的話又將引來更多的人潮，使本國種種設施無法負荷，而更重要的，是難民潮將挑起其國內一直以來普遍存在的種族——敵視華人（因為華人一般較富有）情緒。正如越南所料，其排華行動使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緊張。

為回應越南及蘇聯的威脅，遏制蘇越在東南亞的擴張；牽制越南，營救柬埔寨；以及改善與東南亞及美日及歐洲各國關係，以建立對抗蘇聯統一戰線的戰略目標等原因，中共在七九年二月決定出兵越南。

四 中國在出兵越南前的外交活動——中美建交與對日談判

站在中共的立場，越南侵柬及排華背後實有更深刻的蘇聯全球戰略背景，為遏制蘇聯，中共必須開展全球外交，以建立反蘇戰線，代表中共喉舌的《紅旗雜誌》在七八年八月號曾指出：

「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在東南亞的活動，是它全球戰略部署的一個組

成部份……從越南當局侵略柬埔寨戰爭到它大肆反華，這些都是同一條鏈條上的環節……蘇聯在加緊謀求實現準備新的世界戰爭的全球戰略佈局，戰爭的危險在明顯增長。這是需要世界人們密切注視，高度警惕，認真對付的。」

(1) 鄧小平訪問東南亞

七八年十一月五日，鄧小平訪問東南亞的泰國、馬來西亞及新加坡。在此行程中，鄧小平警告越南不要在柬埔寨玩火，「世界戰爭的危險仍然存在……和平不是靠乞求所能夠得到的。想要維護世界和平，就必須反對和遏制霸權主義」。(註一)

(2) 中美建交(七八年十二月)與鄧小平訪美

中、美兩國自七二年簽署上海公佈後，兩國關係並未有重大進展。直至卡達就任美國總統，美國於七八年五月宣佈承認一個中國的概念，中美關係才得到發展。同月，美國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訪華，決定克服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剩餘阻力，以盡速建交，但美國當時提出三項中共不能接受的條件，分別是：中美建交後，美國仍將向台灣提供包括軍援的援助；美在關閉在台領事館後，將開設美國貿易機構；中國政府必須保証不以武力達至大陸與台灣的統一。

雖然中共拒絕了美國的條件，但為了建立反蘇戰線，完成其全球戰略目標，中共實際上默許了美國於七八年十二月中美建交後僅五個月而通過的美國〈與台灣關係法〉，此法案批准美國向台灣提供防衛性的武器，並給美台互設的工作機構的職員以外交特權及豁免。

中美在美國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及保持半官方關係的情況下建交，對中共外交史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極大的讓步，而另一方面，這亦反映了中共領導人在處理外交問題上的靈活性。實際上，中美建交的日子，正是越南與蘇聯簽訂軍事友好條約之後不久，亦是中越戰爭的前夕。

中美建交後不久，鄧小平於七九年一月底訪美，鄧小平在華盛頓期間，曾發表多次講話，闡明了中國對世界形勢、中美關係、對台立場，

並鮮明提出了聯合反蘇聯霸權主義的方針：「美國、中國、日本、西歐和世界其他國家聯合起來……對付蘇聯霸權主義。」「蘇聯在哪裡搞，我們就阻止它，破壞它」。（註一）

（3）對日談判並提出暫擱置對釣魚島主權的爭論

中國在七六年逮捕「四人幫」後，便開展對外開放的步伐，中日兩個經貿交往日益蓬勃。此外，由於美蘇矛盾加深，美國從其國際戰略出發，極希望中日能簽署有反霸權，實質為針對蘇聯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日在談判和約時，日本十分害怕會得罪蘇聯，故不願在條約中寫進反霸權的條款，後來，由於美國的介入，勸喻日本早日簽訂條約，日本才在七八年八月與北京簽訂「中日友好和平條約」。

七八年十月，鄧小平應邀訪日，並在東京舉行互換條約批准書儀式。鄧小平在日本時，曾就中日雙方長期爭議的釣魚台主權問題提出擱置主權爭議，共同開發的主張，鄧說：就釣魚台問題「雙方有著不同的看法，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時候，我們雙方約定不涉及這一問題……是比較明智的。這樣的問題放一下不要緊，等十年也沒有關係」。（註三）

上述鄧小平處理美國對台關係及釣魚台問題，皆表現出極大的包容性，這當然是中國當時的全球戰略目標，在於聯合美、日，以組成遏制蘇聯擴張的聯盟，從而保証國內和平建設的環境。

五 對越戰爭簡要評論

七九年二月十七日，即鄧小平訪美返京後不到兩星期，中共正式出兵越南，並在同時發表聲明，指出「我們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也絕不容許別人肆意侵犯我國領土。」「在給予越南侵略者以應有的還擊之後，中國邊防部隊將嚴守祖國的邊界。」（註四）

對越戰爭自二月十七日至三月十六日止，為時二十八天，中共軍隊攻克了涼山、高平、老街三個省會和十七個縣、市，摧毀了越南在北部針對中國而築建的軍事設施，從七九年三月五日起，中國部隊開始逐步撤回，直至十六日全部撤完，在這場戰爭中，中國堅守不要越南土地的

承諾，贏得了各國的讚賞。

在這場戰爭中，中共最警惕的是蘇聯會對中國進行軍事干涉，但戰爭的結果顯示蘇聯沒有直接出兵，只是虛聲驚嚇，這證明只要採取強硬態度，蘇聯霸權主義便會受抑制。此外，中共對越的牽制亦迫使越南從柬埔寨收回部分軍隊抵抗中共，從而給柬埔寨反越游擊隊一個喘息機會，並加緊在柬國境內打擊越軍。當然，這場戰爭另一個重要的意義在於通過打破越南「戰無不勝」的神話，抑制蘇聯的擴張，使中國贏得一個有利於經濟建設的良好國際環境。

第二節 八十年代中國的和平外交

從七九年中國對越戰爭，可以看到中國外交政策基本上仍是繼承改革開放前的在中、美、蘇三角關係中，靠攏美國，以美國抗衡蘇聯，聯合第三世界進行反霸陣線，並在國際交往中以親蘇或反蘇來介定自己的盟友。

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的展開，中國在一九八零年前後，開始調整其外交政策，並開創了中國外交的新局面。

一 中國調整外交政策的背景

(1) 國內經濟建設的需要

七八年十二月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將中國的工作重點從「階級鬥爭」轉移到現代化建設，八二年九月的中共十二大，更確定了中國二零零零年經濟建設的目標。鄧小平曾提出中國在整個八十年代的任務是：加緊現代化建設，爭取實現包括台灣在內的祖國統一，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鄧小平更強調：「這三大任務中，核心是經濟建設，它是解決國際國內問題的基礎」。(註五)

國內工作重點的轉移，相應地要求外交政策作出適應，爭取長期的安全的國際環境成為外交政策最優先的目標，這樣將更有利引進技術、資金，開拓國際市場，以及加入國際社會。

(2) 因台灣等問題與美發生衝突，促使中國對美、蘇關係進行調整

雖然中美於七九年建交，但中共始終對美國力圖使美台關係具備官方性質，以及繼續出售武器給台灣的做法表示不滿。此外，中國更對美國部分政界人士提出中國在抗蘇、尋求資金、技術和市場等問題上有求於美國，而美國無求於中國，故美國可迫使中國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向美讓步的判斷及言論表示不滿。

一九八一年，鄧小平曾針對美國指出：

「中國不會像美國有些人所說的，中國出於反對蘇聯的戰略會把台灣問題吞下去。」八二年九月，鄧再指出：「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註六)

與此同時，中蘇兩國之意識形態論戰已結束，蘇聯亦希望通過改善與中國的關係，以打破中美配合遏制蘇聯之局面。蘇共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利用中美出現矛盾的時機，於八二年先後發表三次講話，提出要恢復蘇中關係，他在講話中承認中國擁有對台灣的主權，並提出蘇聯對中國沒有領土要求，願意解決雙方爭議的邊境衝突，並願意就改善中蘇關係達成協議。(註七)

基於蘇聯的友好表示，中國亦順應調整其在美蘇兩極間之位置，對美、蘇採取獨立姿態，既不與某一方結盟，亦避免與美、蘇發生衝突，以爭取最有利的外交位置，為國內建設締造和平的國際環境。

二 八十年代中國外交政策的思想與方針

在新的國內外環境下，中國政府從維護和平局面，促進發展的需要出發，對國際形勢作出新的判斷，從而對外交政策作出重大調整：

(1) 從「世界大戰迫在眉睫」的判斷，轉為認同「和平與發展」是現今國際社會的兩大主題

中國在六、七十年代，認為世界大戰不可避免，故在國策上立足於

「早打」、「大打」，並認為戰爭將引起革命，所以對外大力支援世界革命，在內進行備戰的國防建設、並將重工業移往內陸。

然而，到了八十年代初期，中國基於美蘇核武力量已達飽和狀態，雙方根本不敢使用核武，否則必然兩敗俱傷，故此，核武本身也變為抑制戰爭的因素。其次，各個國家皆在追求經濟的發展，而國際間相互依存及相互滲透不斷加深，各國經濟上的共同利益亦成為推動和平的因素。在上述認識下，中國認為戰爭可以避免，故在一九八五年實行百萬大裁軍。

(2) 中國重新調整對外國的關係

1. 堅持獨立自立、不與大國結盟。
2. 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即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及和平共處)來處理與別國關係。改變過往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異同，以及對蘇聯的態度來決定國家關係，這政策使一些與蘇聯關係密切的國家改善了與中國的關係。
3. 以「和平友好，互相支持，平等互利，共同發展」四項原則來處理與發展中國家政府的關係，此政策取代了過往中國大規模的對外經濟援助，以及對某些國家共產黨以及激進力量的支持。
4. 弱化對大國角色的追求，一心一意的集中經濟建設。最明顯的例子為蘇聯解體後，有些國家希望中國能帶頭對抗西方，但中國的回應是「絕不當頭」。

(3) 推行經濟外交

大力發展與美國、歐洲及日本等的經濟合作，以引進資金、技術和管理方法。其次，中國並積極重返國際社會，廣泛地發展與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會等組織的關係。與此配合，中國並進一步實行對外開放經濟政策，引起外商來華投資的熱潮。

(4) 中國外交政策的十大方針

一九八六年，中國總理趙紫陽從十個方面概括中國的外交政策，其重點為^(註八)：

1. 中國將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及促進共同經濟繁榮，作為外交政策目標；
2. 反對以大欺小，各國的事由各國人民自己去管，世界上的事應由各國協商解決，不能由一兩個超級大國說了算；
3. 中國堅持獨立自主，對一些國際問題都是根據其是非曲直來決定自己的態度；
4. 中國不依附任何大國，不同任何一方締結聯盟；
5. 堅守五項原則，中國並反對任何國家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差異作為佔領別國領土、干涉別國內政的藉口；
6. 中國屬於第三世界，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維護民族獨立，反對外部勢力干涉；
7. 反對軍備競賽，並主張全面禁止化學武器，在進行核裁軍的同時大幅裁減常規軍備；
8. 中國推行對外開放政策，強與各國的經濟聯繫；
9. 支持聯合國，並廣泛參與各種國際組織；
10. 鼓勵各國人民在經濟、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上的交往與合作。

三 八十年代的外交成就——解決香港、澳門問題與中蘇關係正常化

八十年代，可說是中國外交成績美滿的十年，通過政府的努力，中國對外開放格局已經形成，成功地與世界上一百八十個國家和地區發展了經濟、貿易、科技以及各方面的合作，並使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處於建國以來最佳狀態。在八十年代眾多的外交事件中，最為突出的當數以外交談判收回香港與澳門，以及與蘇聯關係正常化。

(1) 港、澳問題

中國政府按照收回主權，「一個國家，兩個制度」的方針，於一九八

四及八七年，分別與英國和葡萄牙就香港和澳門問題簽署了聯合聲明，根據此份外交協議，中國將從九七年七月一日起對香港，以及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起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

就香港問題，英國起初極不願意交還香港予中國，中英兩國並就此進行艱辛的談判，並於會場外進行種種角力，中國最終能透過外交談判成功收回香港，製造了以對話解決國際爭端的典範，中國成功收回香港的最重要原因為中國有強大的國勢；其對港政策極為實務靈活，盡量照顧中、英、港三方面的利益；以及中國利用改革開放優勢，增強其在外交上的影響力；此外，由於反殖民地侵略已成為國際社會的主流，故英國極難在國際層面尋求支持。(有關香港前途問題，將在「香港前途與一國兩制」一章中詳細分析。)

(2) 中蘇關係正常化

一九八二年開始，中蘇關係已開始出現鬆動。一九八五年當戈爾巴喬夫就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後，為加速蘇聯國內改革及經濟發展，故以緩和為基調對外交政策進行大幅調整，並急於改善與中國的關係。

一九八六年，戈爾巴喬夫在蘇聯遠東城市海參威發表一些過往沒有提及過的關於改善中蘇關係的談話，他說將從蒙古撤出大部分蘇聯軍隊，對中國國內政策表示尊重和理解，並同意中蘇邊境河流以主航道為界的原則，以解決兩國邊界糾紛。

同年，鄧小平回應蘇聯領導人講話指出，如果戈爾巴喬夫在消除中蘇間三大障礙(即武裝入侵阿富汗、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及在中蘇邊境和蒙古派駐重兵，尤其是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的問題)，走出扎扎实實的一步，則鄧小平本人願意跟戈氏見面。

八七年初，中蘇恢復了部長級的中蘇邊界談判，一九八八年，蘇聯決定從阿富汗撤軍，同年十二月，中國外長錢其琛訪蘇，實現三十一年來中國外長第一次對蘇聯的正式訪問。訪問期間，錢其琛就以政治解決柬埔寨問題與蘇聯進行深入的討論，增加了共同點，為八九年上半年進行的中蘇最高層會晤奠定了基礎。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五至十八日，戈爾巴喬夫訪華，分別會見了鄧小平、國家主席楊尚昆、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及國務院總理李鵬。是次高層會晤，標誌著中蘇關係正常化。五月十八日，中蘇在北京發表〈中蘇聯合公報〉，強調兩國將在互相尊重主權及領土完整、互不干涉內政及和平共處等原則上建立關係。此公報的簽署，不單徹底的改善了中蘇關係，更為世界的和平，獲得更有力的保証。（註九）

註 釋

- 註 一 李健編《新中國六次反侵略戰爭實錄》，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298頁
- 註 二 何理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檔案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359頁
- 註 三 《中日友好關係的新階段》，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第46頁
- 註 四 翟作軍等主編《共和國四十年大事述評》，檔案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298頁
- 註 五 鄧小平〈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3頁
- 註 六 同上註
- 註 七 同註二，第443頁
- 註 八 趙紫陽〈一九八六年政府工作報告〉載《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41至43頁
- 註 九 請參閱同註二，第443至444頁；以及廖蓋隆等主編《當代中國政治大事典》，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990至991頁

第四十四章 全面改革之預備與推行（一九八二——一九八五）—— 十二大及三大運動（整黨、 減罪、清除精神污染）

第一節 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八二年 九月一日）

共產黨代表大會是十分值得注意的會議，黨大會由於事前準備得十分充份，故不必在開會時對實際問題進行詳細討論，但其政策的重點和人事變動是決定中共路向的重要指標。

是次會議由鄧小平致開幕詞，他形容十二大是中共自一九四五年召開第七次全國黨代表大會以來最重要的會議，並指出黨和國家在八零年代的三大任務，分別是加緊現代化建設，爭取實現包括台灣在內的祖國統一，以及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其核心是經濟建設，因為這是解決國內外問題的基礎^(註一)。此外，胡耀邦並代表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作了〈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的報告^(註二)，葉劍英及陳雲就老幹部交接班問題發表了講話。大會的議程主要是通過新黨章及胡耀邦的報告，並選舉新的中央領導機關，完全確立了實踐派領導地位，凡是派的力量基本全被排斥，而鄧小平、胡耀邦（總書記）及趙紫陽（國務院總理）的「三頭馬車」領導局面亦初步形成。

十二大的歷史意義有如下幾點：

- 一 確定中共直至二零零零年經濟建設的戰略目標、戰略步驟及戰略重點

胡耀邦的報告顯示中共經建的戰略目標是從八一年至本世紀末的二

十年，在經濟效益不斷提高下，力爭使全國工農業的年總產值增加四倍或翻兩翻，即由八零年的七千一百億元增加到二零零零年的二萬八千億元，人民的生活水平將達小康。

為實現戰略目標，在戰略步驟上分兩步走，前十年主要打好基礎，後十年則進入經濟起飛期。

至於實施戰略重點，黨中央十分清楚中國經濟當時的薄弱環節主要在農業、能源、交通、教育和科技，因此，胡耀邦強調要集中國家有限資金，於這些制約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部門作重點建設。此外，胡耀邦的報告亦提出在國營經濟主導下，鼓勵發展多種經濟形式，如合作經濟及個體經濟，繼續推行經濟體制改革與擴大對外經濟技術交流等。(註三)

當時黨中央對經濟形勢的掌握是準確的，雖然一方面十二大定出長遠的經建目標，但黨的領導幹部亦明白在八二年間經濟所面臨的難題，如「經濟效益還很差……浪費現象還十分驚人」，再加上人口增長及上述各薄弱環節的制約，故八十年代「國民經濟的發展不可能很快」(註四)，而經建任務主要是為後十年的經濟發展打好基礎。

其實在八二年的十二大前後，中國又出現了基本建設盲目擴大、資金投入過於分散、消費失控，以及能源、交通、教育、科技、農業等重要部門投資所需的資金得不到保證等問題。造成以上情況，主要是由於在經濟調整期間，中央仍進行局部的經濟改革，將權力下放予地方與企業，地方與企業投資過大、消費意慾大增，加上中央控制不嚴，故造成失控局面。基於上述原因，中央在八二年制定第六個五年計劃時，反覆強調提高經濟效益，反對片面追求發展速度，要求集中財力物力，以保證交通、能源等重點建設(註五)。

二 成立中央顧問委員會，大規模進行幹部隊伍交班

十二大為實踐幹部「年輕化、知識化及專業化」，並為老幹部尋求退路，成立了中央顧問委員會，讓一些年紀較大的幹部在中央委員會的第一線退到中央顧問委員會，好讓較年輕的一代能掌握中央的決策。十二大共選出中央顧問委員一七二人，他們平均皆具四十年以上黨齡。這項

改革其實並不簡單，因為在四人幫倒台後，一大批在文革期間被打倒的幹部復出，他們希望能利用有限的時間彌補失去的光陰，參與工作（當然，有些乃從自己的權位利益角度考慮），但無論如何，讓較年青一輩走上第一線工作崗位乃是改革時代的必要。為順利過渡，中央決定成立顧委會，讓有志工作的老幹部傳授經驗，而顧委會成員亦享有高幹的種種權益，這樣就使新老幹部交班所產生的衝突大大減少。

在新組成的中央委員會中，新選進的中央和候補中委共有二十一人，佔總人數的百分之六十五，在知識文化方面也比上屆為高，持大專學歷的有一二二人，佔總人數百分之三十以上。

然而，並不是所有年紀較大的幹部皆從中央委員會中退下來，如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陳雲、彭真、鄧穎超、王震等十六位握有實權及在黨內有重大影響力的幹部仍留在中央委員會，可見是次新老交替並不徹底。但從政治角度分析，這反映了現實的客觀需要，中國當時的實況，掌握黨中央實權的不是職位最高的幹部，反而是黨內有勢力基礎與威望之領導人，這是歷史形成的客觀情況，他們的思想傾向改革（尤其是鄧小平），極希望自己及老一輩的幹部能盡快退下以讓較年青一代接班，但基於現實政治的需要，他們仍須在中委會保留席位，利用其影響力協助胡耀邦及趙紫陽等推行改革開放的政策。

第二節 中共的整黨與減罪運動

一九八三年下旬，中共進行兩項規模較大的運動——整黨與減罪。此外，差不多在同一時間內，知識界進行反對精神污染（在第三節中將會討論），這幾個運動可視為中共在初步開放與準備全面開放時希望對執政黨及社會進行更有效之控制，從而避免開放帶來過大的社會治安混亂及對執政黨發生權力上的衝擊。

一 整黨功能與目的

八三年的整黨是針對執政黨在開放改革政策推行過程中出現的問

題，而進行黨內統一思想及清洗行動。中共的整黨運動在建國前後皆有進行，總括而言，歷次整黨具有如下效果：

1. 素正黨員的作風，克服官僚主義，防止脫離群眾，從而提高執政黨之治國地位；
2. 克服黨內對重要政策之分歧，統一思想，消除派別，防止組織分裂；
3. 消除異己分子，純潔組織。

二 八三年整黨的任務

中共在清除四人幫後，早在七八年底便號召整黨。在八二年的十二大上，胡耀邦更宣佈「中央決定從八三年下半年開始，用三年時間分期分批對黨的作風和黨的組織進行一次全面整頓。」八三年十月，中共召開十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整黨的決定〉，規定這次整黨的四項任務，分別是：

(1) 素一思想

指糾正所有違反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左傾（仍堅持文革時階級鬥爭）與右傾（隨改革開放而帶來的傾向西方）思想，以實現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

(2) 整頓作風

糾正所有利用職權謀取私利、貪贓枉法的行為，打擊對黨對人民不負責任的官僚主義，以改善人民與政府的關係。

(3) 加強紀律

通過整黨，做到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個人服從組織、全黨服從中央，以改變開放改革路線備受抗拒、黨員幹部與各級黨組織紀律鬆馳、不受中央節制的局面，以達至黨各級組織能推行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路線之目的。

(4) 純潔組織

把堅持反對黨、危害黨的分子開除(註六)。是次整黨中，決定有幾大類別的人必須開除出黨，他們分別是：

1. 在文革中入黨，並殘酷打擊老幹部的「追隨林彪、江青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及打砸搶分子」等三種人；
2. 頑固抗拒三中全會改革開放路線的人；
3. 在經濟和其他刑事問題上嚴重犯罪的人。

三 改革開放的重大隱憂——保守力量的實力基礎與幹部以權營私問題

從以上四項基本任務中，可以清楚看到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下面臨嚴重的黨內問題：

(1) 在思想上，黨存在與三中全會路線不協調的「左」「右」兩種思想

八二年三月，《紅旗》雜誌指出當前中共各級組織和黨員幹部中一個普遍現象，是「在政治上不能同黨中央保持一致。有的懷疑、抵制黨的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或者在口頭上擁護，行動上另搞一套」。(註七)

對三中全會開放政策產生抵觸情緒的，或被稱為「頑固抗拒三中全會路線」的人，可說是當時黨內最大的隱憂。因為要清除文革時入黨的極左派、犯嚴重刑事罪行的人、及支持政治改革的黨內開明民主派，在當時鄧小平擁有實權的歷史環境下，相信阻力並不大。中央面對的最大問題，是一批抗拒改革開放，在執行開放政策上製造阻力或陽奉陰違的人。這批人數量眾多，看不出犯有什麼明顯的錯誤，但由於改革開放政策根本違反他們的既得利益，因此他們成為牽制整個改革開放的保守力量之黨內基礎。概括而言，他們包括兩類人：

第一是在文革期間入黨的一千八百萬名黨員，這些人在文革期間未必直接衝擊鄧小平等領導干部，但他們始終是文革政策下受重用的既得利益者，他們雖與所謂的「三種人」有分別，但這類人的特徵是著重思想的純潔而對很多實際業務不大掌握，實質是凡是派的黨內群眾基礎。由於強調改革開放、尊重知識等政策客觀上對他們的地位產生極大衝擊，所以他們對鄧小平路線持觀望以至反對的態度。

第二是否定文革，但基本上肯定文革前中央制度或政策的「還原派」。這些人不少是黨政軍高級領導人，在文革期間受過一定的衝擊，他們在四人幫下台後復出，認為鄧小平很多開放政策進行得過急，甚至是背離了共產主義的思想。這類人的「黨領導一切」的觀點十分強，再加上既得利益的關係，他們對改革帶來的利益分配的改變產生很大的反感。

在八二年十二大後，發生了攻擊改革開放的「趙易亞事件」，導致軍隊出現人事大變動。趙於八二年八月廿八日在《解放軍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共產主義思想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核心〉的文章，內容批評資本主義高度自動化的生產，給全人類造成無可估計的災難，並強調縱然沒有足夠文化知識，也可能會有崇高的思想品德，從而間接批評鄧小平提出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倚靠知識分子的觀點。趙易亞的文章明顯地代表部分對改革開放持懷疑態度的軍人的思想，並得到他們的支持。趙文刊出後，牽連很大，導致鄧小平對軍方高層人事作出調動，當時的總政治部主任亦受此事影響而遭調職。雖然鄧小平能憑其在黨政軍內的威望把質疑改革的呼聲鎮壓下去，但這股力量實不容忽視，因為「還原派」代表了共產黨自建國至文革期間的正統派別，他們雖然不會公然反對鄧小平，但對改革開放並不以為然，他們是黨內保守力量的客觀基礎，也是一股影響中國七八年後改革開放的重要力量，大大牽制經濟及政治改革的進程。

（2）幹部作風上的嚴重官僚主義及特權

這些問題可說是政府機構脫離人民監督及輿論監察的必然現象，絕對權力做成絕對腐化是一個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真理。這些問題的具

體表現包括不受黨紀國法約束，利用特權為子女親友謀福利、破壞國家計劃，截留稅收利潤和侵吞國家財物等。此外，在經濟開放環境下，不少黨政領導還利用自己的特權地位貪污受賄，並協助一些外商或國內機構進行走私、瞞稅、投機倒把等犯罪活動。

雖然自從建國以來中共曾進行過多次的整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各高級領導人亦曾多次發表講話以及下達文件，並成立中央紀律檢察委員會以監察黨員的違法情況，但始終收效不大，這亦是導致群眾對執政黨不滿、社會運動持續出現的原因。

紀律上，當時有些領導幹部把自己凌駕於組織之上，個人決定一切，使黨內不能開展討論，缺乏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精神，很多人皆以不得罪別人為原則，有的人壓制批評，對舉報者打擊報復，造成黨內氣氛窒息的現象。此外，黨內派性情況嚴重，不少領導幹部任人唯親，排除異己，結幫營私，妨礙中央路線的落實。

(3) 派性嚴重的極左分子

中共黨內仍有個別效忠四人幫路線、派性嚴重及打砸搶分子。鄧小平曾指出這三種人甚為危險，因為他們有一套煽動性和顛覆性的政治主張，有狡猾的政治手腕，隱蔽在全國各地，秘密的派性聯繫還沒有完全被消滅，而他們亦較年青及有文化，故鄧小平認為他們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勢力，不可少看(註八)。

四 整黨的部署與進程

為順利進行整黨，中央組織了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以胡耀邦為主任，而整黨的工作從黨的中央機關到基層組織，自上而下、分期分批地執行。

整黨的主要方法是通過黨員會議，學習文件，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然後進行學員審查，到整黨後期進行組織處理及黨員重新登記，並開除不合規格的黨員出黨。

八三年十月的整黨其實只是大規模整黨行動的開始，整黨前後共分

三期：第一期由八三年十月至八四年冬；第二期由八四年冬至八五年冬；第三期則由八五年冬開始，在八七年春結束。

八七年五月，薄一波代表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總結三期整黨工作，指出在統一思想、整頓作風、加強紀律和純潔組織等各方面皆有一定之成績，但他亦提出一些缺點和不足，例如在整頓黨風方面，「有些敗壞黨的形象的以權謀私、違法亂紀的重大問題，還沒有揭露出來，有的雖已揭露但沒有嚴肅查處；至於組織、人事工作方面存在的一些不正之風問題，相當一些單位在整黨中沒有認真觸及。」（註九）

經過三年半的整黨，雖然在各方面皆有一定之成績，但由於中共權力仍過份集中、缺乏監察，而社會輿論的制衡力量亦不足，故很難改善特權等現象。此外，保守勢力仍客觀地存在，他們雖然不會高姿態地公開否定經濟改革及政治開放等總方針，但他們始終對一些認為是過激或損害其利益的措施採取抵制的態度，對改革開放，尤其是政治及文化方面的改革帶來一定之負面影響。

第三節 打擊犯罪運動——經濟與刑事

自從中共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社會犯罪活動日趨嚴重。在經濟領域方面，由於開放政策推行後很多配套的法律未及草擬或完善，以致給予一些掌握權力的官員或企業可乘之機，利用職權藉法律之漏洞貪污受賄、協助走私逃稅及倒賣貴重財物。在刑事犯罪方面，由於改革帶來人口流動和遷移，一些流入城市的人在政府推行調整政策（引致不少企業倒閉）及就業機會不足的情況下無法工作。另一方面，社會在開放期間更重視消費、物質及個人主義，再加上政府對刑事犯罪分子打擊不力等原因，使刑事犯罪大幅增加。（註十）

一 打擊經濟領域的犯罪活動

中共早在八二年開始，便多次針對經濟領域的犯罪狀況，發出多項文件，開展打擊經濟犯罪活動的鬥爭。

八三年開始，配合中共整黨的工作，打擊經濟領域犯罪的行動雷厲風行。八三年七月下旬，六屆人大常委舉行座談會，中共中央紀律檢察委員會書記韓光發表〈關於打擊經濟領域中嚴重犯罪活動工作的報告〉，他透露直至八三年四月底一年以來，全國揭露經濟犯罪案件共約十九萬二千多件，案中涉及黨員七萬一千多人，被開除黨籍者約八千五百人。韓光更指出，在清查經濟犯罪案中遇到重重阻力，包括負責審查的官員在處理涉及領導機關和中高層幹部案件時太多顧慮，而假若案件牽連到這些官員時，更會主動為疑犯開脫，並設置障礙，防止深入調查。

同年九月五日開始，全國打擊經濟領域嚴重犯罪活動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強調要加強這場鬥爭的領導，抓好中央及各部門打擊經濟犯罪的鬥爭，對犯罪分子必須從重從快加以打擊。

上述各個會議後，中共定出打擊犯罪的主要方法，分別是認真查處大案、要案；加強宣傳，對黨政官員進行反腐蝕教育；加強公、檢、法、海關、工商管理及稅務等部門的日常職能工作，把打擊經濟罪犯作為經營的重要責任；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建立各項健全的規章制度，以堵塞法規方面的漏洞。

打擊經濟犯罪之鬥爭，在八三年開始得到較大的進展，打擊了走私、受賄及貪污盜竊等犯罪。然而，中共始終由於缺乏人民及輿論有實效之監督，當黨政官員的權力與經濟活動連繫一起時，往往由於法令法規之不健全及監察不足，而給予一些掌權的貪婪分子可乘之機，對各項經濟犯罪包庇縱容，這亦是市民對執政黨之黨風存在不滿的主因。

二 打擊刑事犯罪運動

改革開放以來，中共針對社會治安敗壞問題，曾進行過一連串之打擊措施，然而情況未見好轉。八三年八月（即中共正式宣佈實行全面整黨之前夕），中央通過了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之決定，「中央決定以三年為期，組織一次、兩次、三次戰役，按照依法『從重從快，一網打盡』的精神，對刑事犯罪分子予以堅決打擊。」（註十一）

在中共中央決定下，六屆人大常委會舉行第二次會議，主要討論刑

事犯罪問題，公安部長劉復之匯報了社會治安情況，承認「兇殺、搶劫、強姦、盜竊等刑事犯罪問題還比較突出，特別是一些流氓歹徒，結成團伙，偷盜詐騙，攔路搶劫、殺人越貨、強姦婦女，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基於上述情況，劉強調「必須糾正打擊不力的偏向，強而有力地行使專政職能，該逮捕的逮捕，該判刑的判刑，……對於那些罪行特別嚴重、情節特別惡劣的，要堅決給予最嚴厲的制裁。」

是次會議結束前，人大常委會通過了兩項修正〈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決定，以貫徹從嚴從快判案的原則，分別是〈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份子的決定〉和〈關於迅速審判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份子的程序的決定〉。（註十二）

第一個決定的重點是將〈刑法〉中對危害社會治安的刑罰提高，若情節嚴重的，「可以在刑法規定的最高刑罰以上處刑，直至判處死刑。」而針對情節特別嚴重之教唆犯，「判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這項決定是配合從重的原則。

第二個決定的重點是改變判刑的程序，使判決能得以迅速的執行。決定指出：「對殺人、強姦、搶劫、爆炸和其他嚴重危害公共安全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主要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鑿，民憤極大的，應當迅速及時審判，可以不受刑事訴訟法第一零一條規定的關於起訴書副本送達被告人期限以及各項傳票、通知書送達期限的限制。」這個決定是貫徹從快判決的原則。

雖然人大常委會的修改於八三年九月二日才通過，但從當年八月開始，中共便開始在各城市以從重從快的原則大規模的懲治罪犯。行動首先從北京開始，北京中級人民法院於八月廿三日在工人體育館召集萬人宣判大會，將二十九名男性和一名女性押至會場，當眾宣判死刑，並立即執行。（註十三）此後，中國各省、市亦先後以同樣方式集體處決罪犯，以收威懾之效。據法新社電：「受刑的人都在頸上吊著一塊牌子，上面寫明罪狀，在押赴刑場執行死刑前，均遊街示眾，這種殺雞儆猴的做法，在大陸非常普遍。」（註十四）

中共自改革以來治安日壞，人民贊成對重犯施以極刑，但是打擊罪

犯以運動形式推行，並在全國大規模推行這種集體處決，很有可能將一些罪不致死的犯人也草草殺掉，形成社會上一種恐怖的氣氛。況且，未經人大正式通過，人大常委會就根據共產黨的決定修改在七九年由人大批准的刑法及刑事訴訟法，又再一次證明中國即使在強調法制的新時期，往往為了應付緊急需要或其他特殊情況，便以非常方式修改法律。

在另一方面，通過是次威懾力量甚大的快捕快殺行動，使社會治安情況有所扭轉。據統計，全國九月發生的刑事案件比八月份下降高達百分之四十七點四，十月又下降百分之十，社會治安開始好轉。

第四節 人道及異化論的討論與反精神污染運動

隨著八二年標緻著改革開放路線全面推行的中共十二大的召開，中國又再一次呈現開放的政治氣氛，不少黨政機關內的高級知識分子紛紛發表文章批評時政，他們引經據典，以馬克思著作〈經濟學——哲學手稿〉及〈法蘭西內戰〉等為基礎，強調社會主義社會應重視人道主義及異化問題，並提出要改革政治制度及重視並執行法制等以維護人民的權益。由於他們的言論大膽，並能引用社會主義始創者的經典論著以批評時弊，故對中共上層造成很大的震動。八三年下旬開始，為針對這群知識分子的言論，鄧小平提出反精神污染的言論，中共高層亦開展反精神污染運動，導致一些改革派知識分子被迫作檢討甚至要辭去職務。然而，由於此運動受到普遍人民以及黨內高層闡明官員之抵制，推行一段很短的時間便結束。

一 全面改革的呼聲——一九八三年上旬

繼八二年中共十二大後，中國的改革呼聲又一次響徹雲霄。胡耀邦在八三年一月二十日的「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中，就〈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發表講話，他首先指出「沒有改革就不可能實現四個現代化，這是鄧小平同志這幾年一直強調的。」胡耀邦進而指出「全面而系統地改，就是一切戰線，一切地區，一切部門，一切單位，都有改革的任

務，都要破除陳舊的、妨礙我們前進的老框框。」^(註十五)在差不多同一時期，鄧小平與趙紫陽亦發表支持進一步改革的指示，鄧與國家計委的負責人談話時指出，「現在放得還不夠，要以是否有助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否有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是否有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作為衡量我們各項工作做得對或不對的標準。」^(註十六)

在中國最高領導人的鼓舞下，《人民日報》頻頻發表鼓吹改革的社論，激勵各幹部及人民要「做改革的促進派」^(註十七)，並針對一些在戰爭時代有貢獻的幹部不滿意改革期間重用知識分子的言論作出批評，明確指出應該重視知識分子於建設時的作用，並批評「我們打天下，知識分子坐天下」^(註十八)的牢騷話。官方對全面改革的支持在八三年三月十三日中共召開的馬克思逝世一百週年紀念會中達至一個高潮，胡耀邦作出了〈馬克思主義偉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們前進〉^(註十九)的講話，強調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科學，必須衝破舊的觀念和模式，才能使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現代化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此外，胡的講話並著重談知識分子問題，指出馬克思「是一位代表人類智慧和良心的最完全的知識分子，」在以馬克思來肯定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後，他強調知識就是力量，並指出一定要反對把知識分子同工人階級割裂開來，看成是異己力量的錯誤傾向，確立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正確觀念。

二 人道主義與異化論的提出

在八三年三月胡耀邦發表要發展馬克思主義講話期間，曾在五十年代批判胡風文藝理論及在五七年推行文藝界反右的中共文藝主管周揚，發表了〈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註二十)的重頭文章，以極開放的觀點談論了要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並討論了社會主義下出現僵化的問題。周揚由於在文革期間受到衝擊而進行反省，七九年更承認自己以往由於思想「左」傾，曾傷害了一些同志，自此，他傾向開放及支持思想解放的行動。

由於周揚的重要地位，他的文章引起了中共高層的震動，而在學術理論界就人道主義與社會主義異化為題的文章，在八零年以來發表的就

有六百多篇，其中較為有代表性的人物還包括了《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若水，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汝信、阮銘及張奎良等人。此外，在文藝領域，亦出現了不少肯定人性及批判社會主義制度不足的作品，如張笑天的《離離原上草》、徐敬亞的《崛起的詩群》和戴厚英的《人啊，人》等。

理論界有關異化及人道主義的主要觀點如下：

（1）異化（Alienation）

一般理論來說，異化是指某一物體（包括人）在發展過程中分化出與自己相敵對的東西的現象。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的《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曾提出「勞動異化」的概念以批判資本主義下的非人化現象，馬克思指出工人通過勞動創造了財富，然而財富卻為資本家控制而增強了資本家剝削工人的能力，因此，由工人創造的勞動及財富都異化了成為統治工人的力量。

堅持社會主義下有異化現象的文章，認為異化現象在經濟、政治以及思想領域都存在。周揚指出在經濟建設中，「由於沒有經驗，過去就幹了不少蠢事。」王若水更引西水東調及片面追求高速度而造成財政浪費及犧牲人民生活等問題，論證經濟決策錯誤而造成的異化的現象。

在政治領域方面，由於民主法制的不健全，「人民公僕有時會濫用人民賦與的權力，轉過來做人民的主人」，「由人民的公僕變成人民的老爺，轉過來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變成了政治上的異化。」

周揚認為「思想領域的異化，最典型的就是個人崇拜」，這和德國哲學家費爾巴哈批判宗教異化有相似之處，「把領袖當成了異己的力量，異化了。」（註二十一）

（2）人道主義

這些文章主要提出馬克思是十分關心人道主義問題，故此，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一切問題都應以人為出發點，從而改變中國以往種種忽視民主與自由的不人道情況。社科院副院長汝信曾指出「共產主義者是最徹底的人道主義者，……要為人類創造一個更適宜於人生活的新世界，使

人能夠真正得到充份的自由的全面發展。」(註二十二)

王若水在〈為人道主義辯護〉一文中，指出中國如有人道主義，則會：

1. 使人在真理和法律面前真正平等；使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不受侵犯；
2. 意味著反對封建的等級和特權觀念，……真正把人當人看，並且從一個人本身而不是從他的出身、職位或財產去衡量他的價值；
3. 反對漠視人的官僚主義與損人利己的極端個人主義；
4. 重視社會主義建設中人的因素……重視教育，重視人才的培養和人的全面發展等。(註二十三)

異化論和人道主義的提出，是希望能針對中共政治上仍然保守及官僚主義嚴重的弊病，提出政治上的改革。如王若水在〈談談異化問題〉的文章中，就引用馬克思文章〈法蘭西內戰〉的政治改革觀點，提出要引用馬克思提出的普選制和低薪制精神，讓人民擁有言論自由、選舉權和罷免權，並反對幹部的特殊化。

三 中共高層開展清除精神污染運動

由於黨內高級知識分子的開放言論，又一次衝越中共的政治忍受限度，故在八三年十月中共決定整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中，亦提出了針對過份開放觀點的「反精神污染運動」，這可視為中共在改革過程中同時反「左」、反「右」的另一次表現，「整黨」目的主要在於統一思想，強化黨員對改革開放路線的擁護，從而克服「左」的傾向；而「清污」則針對從「右」方面的衝擊，再配合社會上針對經濟及刑事犯罪的運動，構成八三年中國政壇上的三件重要事件。

鄧小平在二中全會上以〈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為題發表講話，強調：

「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我現在主要說理論和文藝戰線」，鄧進而批評「有一些同志熱衷於談論人的價值，人道主義和所謂異化，他們的興趣不在批評資本主義而在批評社會主義……資產階級常常標榜他們如何講人道主義，攻擊社會主義是反人道主義。我沒想到，我們黨內有些同志也抽象地宣傳起人道主義，人的價值等等來了……現在有些同志……不只是針對資本主義勞動異化的殘餘及其後果，而是說社會主義存在異化，經濟領域、政治領域、思想領域都存在異化。……這實際上只會引導人們去批評、懷疑和否定社會主義。」鄧進而指出「對於造成思想混亂和精神污染的各種嚴重問題，也必須採取堅決嚴肅認真的態度，而且要一抓到底。」(註二十四)

得到鄧小平的首肯，一批思想警察，包括主管意識形態的重要官員如胡喬木、鄧力群，還有中央黨校校長王震等，皆發表了反精神污染的講話和文章，從理論層面對異化及人道主義問題作出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當時視為精神污染的事物，不單是指思想理論界的開放言論，還包括了下列五個方面：

- (1) 一切向錢看，精神產品完全商品化；
- (2) 一些庸俗的文章如偵探、俠義、奇案及秘聞等；
- (3) 封建迷信思想；
- (4) 傷風敗俗、輕浮邪靡的低級趣味和黃色書刊照相；
- (5) 哲學和社會科學上的西方資產階級思潮，如異化論等。(註二十五)

對中共政權來說，上述五類「精神污染」的東西，第五類具「理論形態出現的有害思潮，是一種影響更為深遠的污染源。」

十分明顯，將一些高級知識分子引用馬克思原著寫作的、甚有水平的政治改革文章，與一些低級趣味並夾雜著迷信與黃色的書籍並列，作為精神污染的對象來批評是十分牽強和不能接受的。

然而，在中央批判的壓力下，周揚被迫寫了檢討，以維護中央的面子，接著《人民日報》亦被改組，以開放改革馳名的胡績偉社長及副總編輯王若水被撤職，不少作家如張笑天及徐敬亞等亦寫了自我檢討文章。在八三年十月至八四年二月的短短四個月內，各級報刊共發出超過二百篇文章，大力批判人道主義與異化理論，全國上下，尤其是文藝及理論界皆人心惶惶，擔心一場反右鬥爭又重新出現。

四 清污運動的急剎車——只搞了八十三天的「小文革」

鄧小平在提出清污時，已重申「在強調開展積極的思想鬥爭的時候，仍要注意防止左的錯誤。過去那種簡單片面、粗暴過火的所謂批判，以及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處理方法，決不能重覆。無論是開會發言，……都要進行充份的說理……絕對不能以偏概全，草木皆兵，不能以勢壓人，強詞奪理。」(註二十六)

雖然有鄧小平的警告，但清污運動一開展，立刻擴展至文藝理論界以外的領域，如農村承包制、城市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對外開放、宗教信仰自由，甚至年青人的衣著、髮式等，皆被一些反改革的保守人士利用清污運動的機會大加批判，造成社會上緊張的局面。

在這情況下，中央很快就決定對清污運動剎車，中央大員亦紛紛表態，以平抑群眾擔憂的情緒。鄧穎超在八四年五月出席政協文藝界聯組的討論會指出：「前一段在反對和抵制精神污染時，有的地方出現了某些不恰當的做法，以致文藝界的一些同志感到不安和擔心。黨中央得知後，立即及時進行了糾正……你們不要怕，我們現在的中央下了決心，不能讓過去的、深刻的、帶血的教訓重犯。」鄧穎超的談話立即贏得了與會者熱烈的掌聲。(註二十七)

八四年六月的六屆人大二次會議中，趙紫陽亦指出「群眾要求美化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是完全正當的，是應該提倡的，決不允許把它同思想戰線的精神污染混淆起來。」(註二十八)胡耀邦在八五年時也指出：

「過去有一段時間，某些地方、某些同志把這個問題擴大化了，甚至

查到群眾的生活、衣著上去等，這是錯誤的。」（註二十九）

由於當時黨政領導人在清污運動進行不久就採取剎車的態度，以致清污運動很快停止，而這運動亦被譏諷為搞了八十三天的小文革。堅決推行這運動的掌握意識形態的幹部亦受到衝擊，他們被批判為向中央謊報軍情，應要受法律制裁等。另一方面，這運動也可反映群眾與黨的矛盾及黨內不同力量的角力。中央在八三年初提出全面改革，與北京之春出現時一樣，改革言論日趨大膽，超越了的中共接受程度，鄧小平因此發出除污指示，這是中央打擊從「右」方面進攻的措施。然而，以反右為目的之清污運動一開始，保守的「左」力量又乘時興風作浪，企圖超越鄧小平等為清污訂定的界限原則，希望進而否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總路線，這又立刻導致鄧小平對清污運動的剎車。

這運動反映了主管意識形態的幹部與思想開放的領導如胡耀邦及趙紫陽間的觀點分歧，亦可再次認清鄧小平強調經濟開放，但黨權要堅決掌握的態度。然而，鄧小平在批判不同的意識形態時，採取了甚為克制的態度，當他認為批「右」有礙於改革開放的總方針時，他便會加以制止，進一步顯示鄧小平偏於穩重的黨權路線，以及改革開放的經濟思想。

註 釋

- 註 一 鄧小平〈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載《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3頁
- 註 二 胡耀邦〈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載同註一，第6-63頁
- 註 三 同註二，第14-15頁
- 註 四 同註二，第16-17頁
- 註 五 有關是次要求集中財力的討論，請參閱桂世鏞等著《集中財力物力，保證重點建設》，經濟科學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12-17頁
- 註 六 〈中共中央關於整黨的決定〉載同註一，第390-410頁
- 註 七 《紅旗》八二年三月，第六期
- 註 八 鄧小平〈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同註一，第441頁

- 註 九 薄一波〈關於整黨的基本總結和進一步加強黨的建設〉載《整黨與黨的建設》，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332頁
- 註 十 有關經濟及犯罪問題之討論，請參閱谷書堂主編《我國當前社會問題透視及治理方略》，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246-283頁。陸學藝主編《中國社會發展報告》，遼寧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373-431頁
- 註十一 中共中央〈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之決定〉同註一，第385頁
- 註十二 張天榮等編《中國改革大辭典》，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442頁
- 註十三 合眾國際社北京電 一九八三年八月廿三日
- 註十四 法新社電 八三年九月九日
- 註十五 《人民日報》一九八三年一月廿一日
- 註十六 鄭德榮等主編《新中國紀事》(一九四九——一九八四)，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789頁
- 註十七 《人民日報》一九八三年二月二日
- 註十八 《人民日報》一九八三年二月六日及三月廿六日
- 註十九 載同註一，第291-316頁
- 註二十 周揚〈關於馬克思主義幾個理論的探討〉《人民日報》一九八三年三月八日
- 註二十一 上述引用的文章，請參閱周揚八三年三月八日的文章、註二十、以及王若水〈談談異化問題〉載《為人道主義辯護》，三聯書店出版，一九八六年，第191頁
- 註二十二 《人民日報》一九八零年八月十五日
- 註二十三 王若水〈為人道主義辯護〉，同註二十一，第233頁
- 註二十四 同註八，第413、415、416、421頁
- 註二十五 施友欣〈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紅旗》雜誌，一九八三年，第二十期
- 註二十六 同註八，第422頁
- 註二十七 《人民日報》一九八四年五月廿五日
- 註二十八 《人民日報》一九八四年六月二日
- 註二十九 《人民日報》一九八四年四月十四日

第四十五章 十二屆三中全會——全面經濟體制改革之推行（一九八四—一九八五）

導 言

在八三年底至八五年間，由於前幾年經濟調整有成效，加上農村發展及城市經濟之客觀需要，中國推行以城市為中心的進一步改革，高潮在八四年十月召開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以及隨後的一連串改革計劃。八五年九月，中共更通過「七五計劃」的建議，為中國深化改革奠定堅固的理論基礎。

第一節 全面經濟體制改革之背景

中國在八四年開始便推行全面之經濟體制改革，促成是次經改的原因包括農村改革的成效與需要、城市經濟之客觀需求、世界科技革命之影響、以及過往幾年經濟調整之成效。

一 農村改革之成效與需要

（1）農村各方面體制之改革

八三年中共中央發出一號文件〈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對農業承包責任制作出高度的評價，肯定承包制採取了統一經營和分散經營相結合之原則，「使集體優越性和個人積極性同時得到發揮」，文件並突破中央以往認為發達地區不實行包產到戶的限制，從而使包產到戶在全國更普遍的推行。八三年底，全國百分之九十七以上的生產隊實行了承包制。（註…）在推行承包制的同時，農村亦實行了一系列措施：

1. 鼓勵專業戶、重點戶和個體經濟的發展；把土地承包期延長到十五年以上；並鼓勵土地向種田能手集中，更肯定了由技術、資金、勞動力及其他生產要素聯合而產生的各項經濟聯合體及鄉鎮企業，從而發揮規模經濟效益。

專業戶和重點戶是一些在農村分工發展之基礎上，以一家一戶為單位而從事某項特定生產活動的經濟個體。專業戶由於只集中某項物品之生產，故他們是以商品生產者的身份出現，從而使農村的分工及專業化程度提高，這情況亦刺激了不同專業的家庭互相結合，就各方面的優勢組成經濟聯合體及企業。由於各個聯合體的農戶聚集了資金、技術及各項生產要素，使他們能集中力量購置農用機械、運輸汽車及各種機器，從事農業或其他加工經濟活動，促成鄉鎮企業的蓬勃發展。鄉鎮企業在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開創鄉鎮企業新局面的報告〉中被充分肯定，中央亦對農村、尤其是鄉鎮企業中的僱工現象，採取不提倡、不宣傳但亦不取締的政策。

2. 調整農業的產業結構，改變以往以糧為綱的單一種植局面，走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以及農工商聯合經營之道路，並鼓勵農民個人或聯戶進行跨地區、跨省的長途販運。
3. 實行城鄉流通體制改革，改變以往商業機構統得過死、獨家經營、渠道單一的舊模式。以往的流通方式做成農產品未能及時賣出，堆積倉庫而腐爛。為改變此情況，中央決定實行多種經濟形式、不同經營方法及多種流通渠道，以加快供銷合作社的改革速度。此外，更建立商業企業的承包制，務求令農作物流通速度加快。

除此以外，國家決定減少對農作物統購派購，改變農民過往必須把大部份農產品賣給國家的情況，並實行國家、集體、個人多渠道的經營，加快流通環節的運作與速度，以保障農業能進一步發展。

4. 改革人民公社體制，實行政社分離，建立鄉鎮政府。中國在五

八年大躍進時期開始，便實行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將經濟建設與農村政權結合，特點是政治全面統領經濟發展，這與七八年後的改革產生體制上之矛盾。為改變政經混淆的情況，並推行農村經濟改革，中央決定把政社分開。一九八三年，全國一萬四千六百三十四個人民公社實行了政社分離，根據八三年一號文件的決定，各地陸續開展政社分開後建立鄉村政權之工作。直至八五年六月，全國完成政社分設之改革，建立鄉政府前全國共有五萬六千個人民公社，在政社分離後，建立了九萬二千多個鄉、鎮人民政府，取代了原來的人民公社和下層的生產隊。

(2) 農村改革之成效

中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促成農業生產的增長，糧食及棉花大幅增產，八四年成為棉花淨出口國，八五年成為糧食淨出口國。此外，農村中的經濟作物生產亦迅速發展，林漁牧業得到加強。更為重要的，是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資金、勞動力及技術逐步流向鄉鎮企業，促使輕工業、交通運輸業及第三產業如娛樂服務業、商業及建築業等在農村迅速發展，這些進步大大加強了整體國力，為全國經改奠定基礎。

(3) 農村經濟的發展要求城市作出相應之改革

農村經改經驗亦加強了中央領導人對全面經濟改革(重點在城市)的信心，鄧小平曾提到「改革要從農村轉到城市。」^(註二)通過推行刺激農民積極性之承包制，不單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而農村發展本身也對整體經改產生促進作用，並要求城市經改能進一步配合農村之發展。

1. 農產品及農村工業品在城市的銷售

農產品及農村加工製成品在農村改革後大幅增產，農民極希望城市的流通渠道暢順，使農村產品能盡快出售，這樣就促使城市的運輸、收購和銷售行業需要加快改革，提高效率，以滿足農村發展之需要。

2. 價格改革

過往，中國政府實行計劃價格，進行物價管制，農作物在城市的銷售價由政府決定，政府向農民收購產品，再於城市低價廉售。由於七八年後政府大幅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但又不敢改革城市以往的低價體制，唯有被迫拿出巨額財政補貼，高價向農民收購，低價售予城裡人，結果使政府財政百上加斤，導致中央財政連年出現赤字。

為改變上述情況，政府只得限制農產品的收購價及收購數量，結果做成農村賣糧難，導致農民怨聲載道。在這情況下，政府被迫要進行全面的價格改革，將暗補(即政府維持城市職工的低工資，但實際上是巨額財政津貼，使食物及日常用品能維持低價狀況)轉為明補，即一方面提高城市工人的工資，另一方面推行與農產品收購價掛鉤的物價政策，將農產品銷售價提高，以改變財政赤字不平衡的局面。

3. 城市產品供應農村情況極須改善

農業發展所需的農用機器、化肥農藥，建屋用的水泥鋼筋，農民生活改善後所需的種種消費品，以及鄉鎮企業所需的資金及工業原料等都極須城市的有效供應。要滿足這些需求，城市企業必須增加效率及活力，城市產品供給予農村的渠道亦需改變。一向以來，農用化肥及農藥等供應皆由供銷合作社壟斷，由於流通渠道少及產品供應不足，導致舞弊叢生，貪污頻繁，農民亦得不到需要的產品，嚴重打擊農業的進一步發展，這亦是八零年初不少地方發生農民集體搶化肥的原因之一。

此外，新出現的鄉鎮企業與城市國營企業爭原材料、爭能源、爭人力及爭資。雖然鄉鎮企業造就農村工業化，促使農民「離土不離鄉」，並緩和城鄉間之貧富差距，得到中央之認可。然而，在實際運作方面，中央始終認為城市的國營企業由於擁有強大的基礎及技術，其享有的效益始終比鄉鎮企業為高。因此，中央往往將有限的能源、原材料及其他重要生產資料優先供應給國營企業。鄉鎮企業只好利用政策上的漏洞，甚至被迫利用不法手段與國營企業競爭，以求生存。政府過份維護國營企業，亦使其過份倚賴國家，不能發揮應有之活力。要改變此情況，非進

行經濟改革不可。可以說，鄉鎮企業的發展以及其靈活的經營機制產生了一種示範作用，亦迫使國營企業認識到如不進行企業改革便無法生存下去。

由於上述種種農村與城市新舊體制的衝突，若不改變城市的狀況，將會牽制農業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亦不利城市及其企業的發展。在此情況下，中國出現了農村包圍城市之局面，促成城市經濟改革的步伐加速進行。

二 城市經濟的客觀要求

城市的發展也對全面的經濟體制改革作出了內在需求。直至八四年，中國城市企業已有一百多萬個，職工約八千萬人，其稅收及上繳利潤高達中央財政收入之百分之八十。但七九年以來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措施基本上只是局部及試點探索性的，並無法根本克服僵化經濟體制模式產生的弊端。概括而言，問題包括：

- (1) 政企職責不分，容易造成經濟發展受錯誤國家經濟決策所影響；
- (2) 條塊分割——即經濟活動由不同地區及部門統籌、而它們往往不能相互協調融通、出現了各方面只顧自己發展而各自成立體系，由於缺乏分工，故出現企業自給自足、互相封鎖及分割現象，不利於跨行業、跨地區的發展與聯合；
- (3) 國家對企業管得過多過死，使企業不需負上經濟責任及缺乏活力；
- (4) 忽視商品生產、價值規律和市場作用，導致生產與需要脫節的嚴重浪費現象；
- (5) 分配中的平均主義，實際上就是打擊先進、鼓勵落後，造成不求進取及不負責任的風氣，這亦是計劃經濟下企業生產效率低落的主要原因。

三 世界新科技革命及經濟發展對中國產生衝擊

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開展了新的技術革命，對經濟及社會

生產各領域帶來很大的衝擊。此外，當時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一二八個國家中處於倒數第二十名(註三)，而中國亦面臨來自其他周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競爭與壓力。

由於中國與世界先進國家有巨大差距，故對中國領導人產生一種壓迫感。

八三年十月上旬，趙紫陽在一個討論新科技革命影響的研討會中指出：「這次新的工業革命或產業革命的結果，將使社會生產力突飛猛進地發展。」「對我們來說，對今後向四個現代進軍來說，這是一個機會，也是一個挑戰。」

在趙紫陽的鼓勵下，從八三年下半年到八四年，中國出現了一次討論新科技革命的熱潮，論證了開放改革政策繼續發展的迫切需要。是次熱潮除了回應世界發展的衝擊外，在國內也具有政治意義。由於八三年下旬中國推行反精神污染運動，特區政策亦受波及，被批評為造成資產階級文化泛濫。故此，支持對外開放，積極回應新科技革命，客觀上亦肯定了起著開放窗口作用的特區的必要性，間接否定了對特區政策的批評。

四 經濟調整與發展政策導致整體國力增強

自七九年以來，尤其是八三、八四年之經濟成就，乃中央實行正確的經濟調整政策以及各項改革措施如農村改革、城市簡政放權措施、個體經濟恢復及全面對外開放等結果。農村改革打破了過往農產品長期低徊的局面，農產品連年穩定增長，八三及八四年更是大豐收。農業及輕工業的發展導致在調整政策下發展速度一度下降的重工業迅速回升，反過來支援農業及輕工業的發展。國民經濟的良性循環大大加強了國家整體國力，為進一步的體制改革奠定有利之基礎。

第二節 全面經濟改革的前奏——鄧小平南巡特區與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開展

一 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鄧小平南巡特區（一九八四年）

中央於七九年制定特區政策，開放四個特區。在特區問題上，曾有不少幹部斥之為資本主義的典型。八四年初，為了表示對特區政策的肯定，鄧小平、王震及楊尚昆等連續視察了深圳、珠海和廈門特區，他們對特區幾年來取得的成就表示高興。一月二十六日，鄧小平特別為深圳特區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設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而他給珠海的題詞是：「把經濟特區辦得更快些更好些。」(註四)

鄧小平南巡回京後在二月下旬指出：

「我們建立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區是個窗口，是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政策的窗口。從特區可以引進技術，獲得知識，學到管理，……有些投資項目現在可能賺不到甚麼錢，但從長遠看有好處。」鄧小平除充份肯定特區政策外，還指出，「除現在的特區之外，可以考慮再開放幾個點，增加幾個港口城市，如大連、青島。這些地方不叫特區，但可以實行特區的某些政策。……我們還要開放海南島，如果能把海南島的經濟發展起來，那就是很大的勝利。」(註五)

在鄧小平的指示下，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於三月下旬到四月初舉行了沿海部份城市座談會，決定進一步開放大連、秦皇島、天津、煙台、青島、連雲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等十四個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島，加快對外開放的步伐。

二 城市體制改革的展開——十二屆三中全會前的各項改革

八三年開始，為進一步擴大企業的自主權，城市綜合性的改革逐步開展，內容主要有下列幾點：

（1）進一步擴大企業自主權

1. 推行兩個階段的「利改稅」改革，將企業上繳利潤改為固定百分比的稅率，改變過往政府和企業在釐定利潤上繳比例時的討價還價情況，這樣有助解決國家與企業的分配關係，減少行政部門對企業的干預，並可保證國家有穩定之收入。
2. 國務院於四月發出〈關於國營企業發放獎金有關問題之通知〉，規定發放的獎金可以沒上限，同時實行獎金納稅辦法，而對於獎金的使用，企業有自主權。此外，中央並實行勞動用工制度和企業內部工資制度改革試點，以加強工人的積極性。
3. 為解決政府過往對企業管得過多的弊病，八四年五月國務院發出〈關於進一步擴大國營工業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從生產經營計劃、產品銷售、產品價格、物資選購、資金運用、資產處理、機構設置、人事勞動管理、工資獎金、聯合經營等十個方面擴大企業的自主權。
4. 在國營企業中，逐步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改革企業內的管理制度，使企業的生產、經營及盈虧交廠長全盤負責。
5. 發展企業的多種經濟與經營形式，推行投資包幹制、招標承包制及租賃制等。

（2）國民經濟管理體制的總體改革

1. 計劃體制，將過往較單一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改為指令性計劃、指導性計劃及市場調節三種計劃管理方式並存，並加強指導性計劃與市場調節之比重。

2. 在流通體制上，擴大企業間的橫向交流與聯繫，逐步發展消費資料及生產資料市場。早於八二年下旬，國務院決定將一百六十種小商品價格放開，實行市場調節。
3. 在價格體制方面，配合流通體制及計劃體制的改革，政府採取了國家固定價格、浮動價格和自由價格相結合的價格體制。
4. 在基建體制上，簡化了基本建設的審批程序，推行各類工程之承包制度，並進行住宅商品化的試點。

（3）城市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推行

中央為改變不同地區、部門分裂管理經濟之局面，並發揮城市組織經濟的作用，實行以經濟較先進的城市為中心，帶動鄰近地域發展、生產和流通，形成了以大城市為基礎的多層次、網絡型之經濟區。八三年二月，國務院批准對重慶市給予國家計劃單列，並賦予省級經濟管理權限，以帶動周邊經濟發展，這是全國第一個進行試點的大城市。在五月，改革擴展到武漢、瀋陽、南京、廣州及西安等大城市。

八四年九月九日，趙紫陽在給中央常委的報告中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三個重要問題，包括計劃體制改革、價格改革與國家領導經濟的職能。報告強調計劃體制要重視指導性計劃，國家應簡政放權，減少對企業之干預，以經濟手段對經濟運作進行宏觀控制，又提出中國應進行價格改革。趙紫陽指出：

「理順經濟的主要標誌是建立合理的價格體系。價格改革難度最大，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近幾年來，國外許多不同學派的經濟專家，都建議我們在適當時機進行價格改革。他們認為，改革價格最好選在經濟發展較順利、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較快的時候。現在中國有此條件，正處在改革價格的黃金時代。」(註六)

第三節 十二屆三中全會與全面改革的推行（一九八四年—一九八五年）

一 十二屆三中全會的召開

在全國全面改革的呼聲中，中共召開十二屆三中全會，會中作出兩個重要之決策，一是通過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二是定於八五年九月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這兩個決定對中國的發展有重大的影響，這份經濟體制改革文件是七八年改革以來一份最完整、最全面及開放的整體經濟改革綱領，涉及的改革範圍從農村擴展至全國各領域，對整體經濟改革有深刻的分析。而八五年九月的黨代表大會除通過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外，更重要是進行人事交替，很多老幹部將退休及增選新的中央領導層以進一步落實幹部的專業化與年輕化，這對中國的長治久安有重要的作用。

〈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指出中國經濟改革之目的在於改革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並提出完整的改革原則和政策，（註七）重點包括如下幾點：

- (1) 強調企業自主權，把增強經濟的最重要細胞——企業的活力，作為整個經濟改革的中心環節，從各方面作出改革的以激勵企業加強效益，為社會創造更多財富；
- (2) 改革計劃體制。包括縮少指令性計劃及擴大指導性計劃，使國家的計劃能更符合社會之需要，做到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開放活，從而使企業有更大的活動空間，生產社會真正需要之商品；
- (3) 推行價格改革，加強浮動價格及自由價格的範圍，使價格能提供正確的市場訊號，通過供求關係帶動企業生產，促進經濟資源的合理分配，保證生產與需要相結合；
- (4) 實行政企職責分開，正確發揮政府機構管理經濟之職能，改革過往企業全部依賴政府，造成效率低下的狀況。在實施政企分開後，還要發揮城市的中心作用，帶動鄰邊經濟的發展；

- (5) 在企業內部，建立經濟責任制，使權利、責任及利益相結合。在分配上擴大工資差距，務求職工勞動與勞動成果相聯繫，並批評平均主義的思想；
- (6) 積極發展多種經濟形式，進一步擴大對外、對內的經濟技術交流，肯定城市和鄉鎮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作用。在開放政策方面，決定要辦好特區，進一步開放沿海港口城市。
- (7) 尊重知識人才，起用新人，建立一支經濟管理的專業隊伍，加強黨的領導，通過整黨統一對改革開放的認識，「在新的時期，黨的思想工作和組織工作必須堅定地貫徹執行，為實現黨的總任務、總目標服務，密切結合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的實際來進行的指導方針。」

這是次決定肯定了經濟體制改革方向乃是發展「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第一次確立了發展商品經濟的改革目標。

二 全面改革的展開（一九八五年）

在十二屆三中全會後，中國經濟改革從局部試點進入全面開展的新階段，並推行了幾項較大型的改革。

(1) 農村進行第二步農產品的統派購制度改革

八五年一月中央發出一號文件〈關於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文件以十二屆三中全會強調多運用市場機制的政策為基礎，改變以往中央指令式的統購政策，即國家機關不再下達指令性計劃予農戶，硬性規定生產指標，而是對糧棉等重要農作物，推行國家與農民簽定合同，進行採購的制度。至於其他農副產品，如生豬、水產品、蔬菜等則實行價格逐步開放，通過市場自由交易。此構想使農產品價格改革成為八五年價格改革之重點環節。

是次政策轉變將農民帶進市場，好處包括有利農民的自主經營，農民可以決定生產甚麼，生產多少，避免過往政府實行統派購時的命令主

義及購過多糧食之狀況。新政策更可使農民因應市場需要以及本身的特有條件，發揮優勢地進行生產，用市場去引導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這政策更可促使農商品流向多樣化，增加農作物的流通渠道，使農作物能盡快運往銷售點等。

能夠成功地在八五年推行新農村政策，主要是受十二屆三中全會強調引進市場機制的影響，而第一步的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亦為新措施的推行奠定經濟上的基礎，這是由於在承包制下，農業生產發展迅速，農副產品由少到多，賣方市場(供不應求)轉向了買方市場(供過於求)，客觀上消除了統購統銷的需要，而使開放市場有了物質上的可能。

然而，這次改革推行的時間十分短暫，由於農產品在八五年開始大幅減產，國家不得不在很短的時間內恢復統派購之政策，以保證城市之需要。(有關農業減產等問題將於下章詳細討論。)

(2) 推行價格改革

除了部分農副產品價格放開以外，根據十二屆三中全會規定，在工業生產資料及消費品方面，亦放開了對企業自銷產品比例之限制。對於企業自銷產品，企業有權根據市場自行定價，或由供需雙方在規定之幅度內協商定價，這點十分重要，因為中國的經濟從此走上計劃內價格與計劃外價格並存之雙軌制道路。

(3) 改革工資制度

國務院在八五年一月規定在國營大中型企業中，實行職工工資與企業經濟效益按比例浮動。而八五年之工資總額以八四年的工資總額為基數進行核定。八五年由於價格關係尚未理順，此項改革只在佔全國企業總數百分之十五的企業中進行試點式之推行。

(4) 進一步增加大中型國營企業之活力

八五年九月，國務院命令各地方應按政企職責分開、簡政放權之原則，為增強大中型國營企業的活力創造條件，並加強企業內部之改革，

以提高質量、降低消耗，明確樹立有效經營之觀念，如面向市場、重視利息、資金周轉、強調競爭及智力開發等。

(5) 擴大對外開放

八五年二月，中央決定將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及閩南三角洲劃分為沿海開放區，建立以外向型為主的經濟，按貿易、工業及農業的次序來安排生產，爭取多出口、多創匯，並將開放由沿海到內地、由東部地區到西部地區，由點到面逐步推進。

此外，中央在八五年並對計劃、財政、稅收、基建、教育及科技等體制作出改革，制定各有關的決定。

第四節 七五計劃建議的制定

一 經濟體制改革的三大環節

中國在各個領域改革聲音高漲的大環境中，中共於八五年九月十八日召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並於八六年三月召開的人大會議中正式通過。

七五計劃進一步落實十二屆三中全會精神，把經濟體制改革放於首位，決定力爭在五年或者更長的時期內，奠定有中國特色的新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基礎。在體制改革方面，七五計劃明確地提出三個十分重要之環節，清楚介定經濟體制改革需要兼顧的三個方面：

- (1) 增強企業之活力，使企業成為真正獨立的、自主經營及自負盈虧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
- (2) 發展市場，逐步完善市場體系，為企業制造合理之外局環境，使企業能於一個真正的市場上通過平等競爭而生存。至於形成和完善市場體系的關係，在於改革價格制度。

對於消費品，除極少數重要商品仍由國家定價外，一般商品要

根據市場供求狀況有計劃地開放。至於重要的生產資料如機器及原材料等，則要逐步減少國有統一定價部分的比重，擴大市場調節之部分，並同時調整計劃部分之價格，務求使計劃與市場之價格拉至平衡，以利進一步開放價格。

- (3) 逐步減少國家對企業的直接控制，建立健全間接控制體系，運用經濟和法律手段，來控制和調節經濟之運行。

二 「七五」期間經濟發展的兩個階段

除了經濟體制改革外，在經濟發展目標及重要建設方面，「七五」計劃確定了不太高的增長速度，在不斷提高經濟效益之前提下，五年內全國工農業總產值增長百分之三十八，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六點七。「七五」計劃並提出控制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合理調整投資結構，改變能源、交通、通訊和原材料等基礎工業一向投資偏低之問題，堅持把科學、教育事業放在重要的戰略地位，以及強調企業的發展應以技術改造為基礎。此外，計劃更堅持進一步對外開放，將國內建設和擴大對外開放與對外經濟技術交流結合起來。

在研究「七五」計劃時，值得留意的是計劃把「七五」時期的五年時間分兩個階段來安排，前兩年的重點在於控制社會總需求，解決八四年底到八五年間工業增長速度過快、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過大及消費基金增長過速之問題，而在「七五」計劃的後三年，再根據經濟情況，適度增加投資。

出現上述的原因，主要由於在十二屆三中全會後，即八四年的第四季開始，中國宏觀經濟領域出現了失控現象。原因在銀行信貸和企業工資制度的改革中，有關負責部門提出將來各專業銀行自主支配的信貸數額以及企業工資總額，均以八四年的實數定為基數而決定。在這規定下，從八四年第四季度開始，各銀行及企業爭相增加貸款額以及提高工資，期望爭取更大之基數，導致銀行信貸和消費基金急劇增長，以及貨幣發行過多等困境。

由於總需求過份膨脹造成市場供求失調，加上十二屆三中全會強調

價格改革及加強市場調節之原則而出現的雙軌制運行，出現了議價（即市場價格部分）大幅上漲等情況，反過來又進一步加劇經濟之失衡（有關八四年下旬改革後之種種經濟困境，將在四十七章「全面改革面臨之經濟困境以及八五學運」再詳加分析）。在上述環境下，從八五年二月起，國務院曾召開四次省長會議以解決困難，更迫使七五計劃在首兩年的重點放於控制社會需求，避免情況進一步惡化。

註 釋

- 註 一 《中國農村經濟》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 註 二 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514頁
- 註 三 世界銀行一九八二至八七年各年度《世界發展報》，中國財貿經濟出版社
- 註 四 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三聯書店香港分店，一九八五年，第22-23頁
- 註 五 同上註
- 註 六 趙紫陽〈關於經濟體制改革中三個問題的意見〉載同註二，第536頁
- 註 七 〈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載同註二，第558-587頁

第四十六章 配合全面改革之組織安排—— 一百萬大裁軍與幹部年輕化

導 言——鄧小平果敢負責的承擔

八四年末，當中國全面展開經濟、科技及教育改革的同時，人民解放軍亦於八五年中進行精簡整編，在當年五月廿三日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中，軍委主席鄧小平宣佈裁軍百萬，是次裁軍再一次顯示鄧小平清醒果斷的性格。早於八四年十月一日的中共建國三十五週年國慶典禮中，鄧小平以中央軍委主席身份進行大閱兵，向國內外宣示中國改革開放及軍事建設的成就。軍隊威武的儀容及群眾的歡呼，把作為三年統帥鄧小平的威望進一步抬高，但就在這人心振奮、為改革開放成就感到喜悅的時刻，鄧小平卻在沉思怎樣為解放軍「消腫」，保證軍隊能為國家建設出力。

大規模裁軍絕非易事，這需要極為果斷無畏的性格，因為裁軍牽涉一百萬軍人及其家屬的切身利益，被裁減的軍人不單會被調離工作多年的單位，令他們對前途感到不安，而自己作為冗員而被調職的殘酷現實，更會使他們對改革產生怨憤。自古已來的改革事業往往由於侵犯某部分人的既得利益，遭遇強烈反抗而失敗，鄧小平對此有深刻的理解，他說裁軍「是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現。」(註一)「消腫比較難的是安置退下來的幾十萬幹部」他更坦率及負責地說，裁軍「是個得罪人的事情哪！我來得罪吧，不把這個矛盾交給新的軍委主席。」(註二)

與裁軍政策推行的同時，中央高層亦出現了人事大變動，一大批元老宣佈退出政治舞台，讓較年輕的一輩接班。

裁軍與幹部年輕化顯示了中國在進行全面改革的時刻，人事及組織方面的配合，以使較年輕的一代能更放手的推行經濟及全面改革的措施。

第一節 裁軍的背景

一 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

中共自四九年建國後，由於與西方關係緊張，加上國內危機重重及意識形態上認為世界大戰不可避免等原因，以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人認為戰爭迫在眉睫，軍隊的建設方針乃立足於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觀點，並把有限的財力過多地用在準備戰爭上。

七十年代中期開始，國際關係發生變化，美蘇兩國之軍事對峙雖仍存在，但基於維持平衡狀態的構想及避免核戰的出現，兩國加強了對話。此外，日本、西歐等國的經濟實力膨脹，使國際格局進一步趨向和平及穩定。而中國在七八年底推行改革開放，亦把主要精力放於經濟建設，把軍事戰略重點從備戰轉移到和平時期國防現代化的建設軌道。

軍事戰略的調整，首先是將國防建設放在經濟建設的全局考慮之下，即先經濟後軍事，嚴格控制並減少軍事開支。八四年十一月，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中，鄧小平指出：

「現在需要的是全國黨政軍民一心一意地服從國家建設這個大局。」「大局好起來了，國力大大增強了，再搞一點原子弹、導彈，更新一些裝備，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陸上的也好，到那個時候，就容易了。」
(註三)

八五年五月的軍委擴大會議中，鄧小平在宣佈裁軍百萬後，與會眾分析國際局勢，鄧指出在粉碎四人幫及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及對外交政策有兩個轉變：

第一是戰爭與和平問題的認識，「改變了原來認為戰爭的危險很迫切的看法」，並得到新的結論，認為「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註四)

第二是奉行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提倡反霸權和維護和平的旗幟，

並同時與美國及蘇聯改善關係。

基於相對和平的國際形勢，鄧小平提出：「先把經濟搞上去，一切都好辦」，「軍隊裝備真正現代化，只有國民經濟建立了比較好的基礎才有可能」。^(註五)八五年六月十一日，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在會見羅馬尼亞軍事代表團時亦指出，裁軍決策是經過反覆思考，經過對國際形勢及中國自衛能力分析後作出的。^(註六)

二 精簡編制，消除臃腫

在過往建軍指導思想下，軍隊出現臃腫的情況。早於一九七三年鄧小平復出協助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時，已指出軍隊整頓要把消腫作為主要任務。七六年打倒四人幫後，中央再對軍隊多次進行精簡，在七七年十二月底的中央軍委會議上，鄧小平就尖銳地指出：「腫、散、驕、奢、惰，第一個字就是腫。這個腫，我們還沒有很好解決。」^(註七)在八零年，鄧小平再次指出「軍隊很臃腫。真正打起來，不要說指揮作戰，就是疏散也不容易。現在提出消腫，主要是解決軍隊機構重疊、臃腫，以及由此帶來的各級指揮不靈等問題。」^(註八)鄧又說：「不消腫不行。……我們國家現在支付的軍費相當大，這不利於國家建設，軍隊人員過多，也妨礙軍隊裝備現代化。」^(註九)

總的來說，當時軍隊面對的主要問題包括：

- (1) 軍隊人數太多。到八五年，仍有四百萬軍人，居世界首位。^(註十)
- (2) 結構不合理，在官與兵比例中，官員太多，領導部門重複，「領導太複雜」。^(註十一)
- (3) 合成性不高，雖然中國軍隊總體上是不同兵種合成的軍隊，但在戰爭編組上卻缺乏合成性，特種兵如通訊、防化學兵等不多，不適應現代戰爭要求。^(註十二)
- (4) 軍費不足。^(註十三)

第二節 裁軍的內容與難點

一 裁軍的主要內容

八五年五、六月間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中，鄧小平正式宣佈人民解放軍減少員額一百萬，即軍隊人數減至三百萬。

六月八日，中央發出〈關於支持軍隊體制改革，精簡整編的通知〉，要求各地方政府協助解決幹部和軍人的安置問題。

七月十日，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指出，八五年精簡整編的方針為實行精兵政策、提高質量，以及把重點放在改善武器裝備和提高士兵的質素上，並實行科學的組編，使武器和人能更好的結合。（註十四）

八五年的裁軍牽涉甚廣，包括下列各方面：

- (1) 裁併大軍區，將原來的十一個大軍區合併為七個，各省軍區、軍分區亦進行精簡，使人數比以前大為減少；
- (2) 精減機關。在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空軍、海軍、第二炮兵和國防科工委等機關，精簡重疊的組織，減少領導層次，精減人員達百份之四十（註十五）
- (3) 精簡及調整軍事院校。原軍事、政治、後勤三個部院於八五年十二月合併成國防大學。
- (4) 合併「軍分區」與同級的「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將縣（市）的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全歸為地方建制，由地方縣市政府管理。例如八五年中共將「嫩江軍分區」與齊齊哈爾市的人武部合併為「齊齊哈爾軍分區」，（註十六）合併後，超編的五十多人皆要面臨轉業或離退的問題。
- (5) 減少軍官數量，改變官兵比例不合理的情況。（註十七）
- (6) 實行陸軍部隊合成編組，提高部隊諸兵種協同的作戰能力。（註十八）

是次裁軍使軍隊規模大為縮減，八七年減少軍以上單位共三十一個，師團級單位四千餘個，全軍被編出來的幹部共六十多萬人。

二 裁軍的難點——幹部安置問題

精簡部隊最棘手的就是幹部安置問題，幾乎每個軍人都要面對「去、留」的選擇，其本身與家屬的即時利益都會受到影響。

解放軍的退伍安置，向來都分為士兵與幹部兩種，士兵安置由民政部按「從那裡來，回那裡去」的原則，農村徵集的回農村，城鎮徵集的回城鎮，城鎮入伍的由當地政府安排到企業、事業單位工作。因此，安置士兵並非是主要問題，困難是怎樣安排一般知識程度較低、又無一技之長、黨性很強但思想較難接受新事物的軍隊幹部。

軍隊精簡整編在八零年已開展，雖然軍方領導人經常宣傳各軍隊幹部皆願服從大局，裁軍進展順利。但實際上，由於裁員涉及切身利益，抗拒是在所難免的。《解放年報》於八五年三月廿日透露：「江蘇省軍區南京軍分區某副司令員一九八二年組織安排他離休，由此產生不滿，對軍區領導進行恐嚇、誣蔑、謾罵，並揚言要行兇殺人。」八五年一月廿九日，《解放年報》刊出〈當精簡到自己的時候〉一文，指出：「很多同志談到精簡機構時，常常對該『撤』該『減』的單位和個人，言詞激昂，然而當減到自己頭上，態度就大不相同了。『減到別人拍手笑，減到自己哇哇叫』」。一位副軍長說：「這次精簡整編，我是首當其衝，一想之下，心裡總有點不是滋味。」這些軍人深切理解到：「在工作崗位是受尊重的，一旦退下來，就被另眼看待。」（註十九）

八五年五月十一日，《解放軍報》發表瀋陽軍區六十四軍政委李碩的文章，提出軍隊在精簡整編的過程中，面臨著四種抵制思想，分別是：

- (1) 自己願走願留不是為大局；
- (2) 一個人的問題妨礙不了大局，在幹部的原則上表示要服從精簡的安排，然而一碰到影響自己個人的問題就想不通，提出「個人的問題影響不了大局，給個方便也沒甚麼大不了的」；
- (3) 多半服從大局，最後照顧一次應該；
- (4) 誰服從大局誰吃粥。（註二十）

從上述情況可以清楚看到，裁軍百萬、精簡整編的難點是安置被編整出來的軍官，為解決這個問題，中共作出了軍隊與地方相配合的安置辦法。

在軍隊方面，要求部隊加強紀律性，聽從組織安排，發揚犧牲精神，並從軍隊建設大局出發，當「開明人士」，正確對待去留問題。^(註二十一)此外，中共並協助幹部進行轉業培訓，幹部在轉業前，可先進電視大學、自修大學或各高等院校舉辦的各種專業班學習，或者參加部隊自己舉辦的各種培訓班，以保證轉業的軍人有一技傍身。

在地方政府安置轉業幹部的政策方面，盡量根據轉業幹部的專長，安排相應職務。然而由於轉業幹部人數激增，有一部分軍隊幹部被分配到地方政府部門以外的集體所有制單位，惟仍保留其幹部身份，待遇不變。^(註二十二)同時，一時間要地方安置大批轉業幹部，亦給地方帶來很大的壓力，如造成地方機構臃腫，轉業幹部由於不適應境，不能與一般幹部團結共處，形成派系的出現。

雖然軍隊及地方政府對轉業幹部做了很多工作，但由於轉業人數實在太多，難以負荷。八五年三月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在「全國軍隊離休退休幹部和退伍軍人安置工作會議」上，即對國務院民政部及勞動人事部等安置軍隊幹部不夠快提出批評，余指出：「從一九八一年以來，第一、第二批退休幹部移交安置工作的落實情況，同完成預訂的計劃距離過大……第三、第四批退休幹部的安置工作，現在還沒有開始……這樣多的退休幹部要安置，加上他們的家屬、子女的安排，工作量是很大的、安置時間拖長了，對軍隊、對地方、對幹部本人都是不利的。」^(註二十三)

雖然安置轉業軍官給地方造成很大的壓力，但由於裁軍是中央一個重大決策，全國上下都要動員執行，在各方面努力下，百萬大裁軍到八七年初基本完成。

總的來說，裁軍對節省軍費、支援國家建設、減輕人民負擔都有重大意義。此外，精兵制度亦有利於改善部隊的武器裝備，提高戰鬥力。百萬大裁軍是中國政府在充滿風險的改革中取得的一項重大成就。

第三節 中央人事大變動——幹部年輕化（八五年全國黨代表大會）

在八四年十二屆三中全會、八五年百萬大裁軍及中國在各個領域進行大幅度改革的時刻，中國共產黨在八五年九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舉行了三個重要會議，分別是十六日的中共中央十二屆四中全會、十八日的全國黨代表大會，以及二十四日的中共中央十二屆五中全會。

這連串會的焦點，在於全國黨代表大會的兩個議程，即通過七五計劃（第七個五年計劃），以及人事大調整，而在這兩個議程中，人事調整是比較突出的問題，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曾指出：

「九月中旬中共代表會議，在『七五』計劃和人事調整這兩個議題中，主要是人事安排問題。」鄧小平亦坦率地表示：「全國黨的代表會議的主要議題就是幹部年輕化，使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的成員也更年輕化一些，以保証我們政策的連續性。」（註二十四）

中共黨政制度實行終身制及「鐵飯碗」制，已導致幹部隊伍老化、保守及臃腫，此情況絕不利於中國推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在十二屆四中全會中，會議收到了葉劍英、鄧穎超、徐向前、聶榮臻、烏蘭夫及王震等六十四位高幹請求不再擔任中共中央委員及候補中央委員、李井泉等三十七位老幹部請求不再擔任中央顧問委員會、黃克誠等三十名高幹請求不再擔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信，會議並作出〈關於同意一部分老同志不再擔任中央三個委員會成員的請求提請全國代表會議審議的報告〉。

這些老幹部在致中央的請辭信中提出：

「用自己的實際行動……樹立幹部能上能下的新風氣，廢除實際上存在的領導職務終身制，形成領導機構成員更新的經常制度，這是我們對黨、對共產主義事業應盡的重要責任。」（註二十五）

可以說在中共的高層權力架構中，一百三十一位高級幹部集體請辭，而讓較年青一輩掌握權力，推行改革，實是一件影響深遠的大事。

緊接著四中全會而召開的全國黨代表大會中，正式批准了這批老幹部的辭職，並通過了制定「七五」計劃的建議。為填補老幹部辭職後的空缺，會議增選了新的中央委員五十六人，中央候補委員三十五人，中央顧問委員五十六人，以及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三十一人。是次會議由胡耀邦致開幕詞，趙紫陽就中央制定「七五計劃」的建議作了說明，鄧小平、陳雲作了重要講話，而李先念則致閉幕詞。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從八四年決定進一步大幅改革的過程中，遇到了很大的經濟困難，包括經濟過熱、農業減產、對外開放政策混亂及黨風不正等等。這些問題引起中央領導人的密切關注。故雖然八五年的全國黨大會是以「新老交替」、貫徹改革開放政策為前提，但中央領導人如鄧小平及陳雲等皆就一些消極現象發表甚具針對性的發言，例如鄧小平提出要重視精神文明，「著眼於黨風和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並強調要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以防止一些新上來的中青年幹部在「日益複雜的鬥爭中迷失方向。」(註：十六) (有關進一步改革面臨的困擾，將在下一章「全面改革面臨之經濟困難以及八五學運」討論。)

在全國黨代表大會後，中共中央隨即召開以改組政治局及中央書記處為目的之十二屆五中全會，會議決定增選田紀雲、喬石、李鵬、吳學謙、胡啟立及姚依林等為中央政治局委員，而中央書記處的成員亦作出了局部調整。

無疑，通過這幾次重要會議，中央領導層的年齡結構進一步年輕化。然而，由於黨內的最高權力始終掌握在一些擁有崇高政治權威及軍權的領導人，如鄧小平及陳雲等手中，故較年輕的領導人雖然能在很大的範疇內自主的進行決策，但若碰到一些重大的政治問題如黨權控制範圍、政治改革幅度及民間運動時，始終會受到最高權力擁有者的牽制。這亦是胡耀邦及趙紫陽相繼於八七年及八九年下台的原因。

註 釋

註一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126頁

- 註二 王炳林、徐付群《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闖關奮進》(1984-1990)，紅旗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37頁
- 註三 同註一，第99-100頁
- 註四 同上註，第127頁
- 註五 同上註，第128-129頁
- 註六 新華社北京電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一日
- 註七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75頁
- 註八 同上註，第285頁
- 註九 同上註，第287頁
- 註十 陳果吉、崔建生《輝煌與誤區——建國以來五十件大事紀實》，內蒙古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593頁
- 註十一 同註七，第410頁
- 註十二 同註十
- 註十三 同上註
- 註十四 同註二
- 註十五 同註十，第598頁
- 註十六 新華社哈爾濱電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 註十七 同註十第，597頁
- 註十八 同上註
- 註十九 《解放軍報》一九八五年三月十日〈服從大局，加快步伐，妥善安置〉
- 註二十 《解放軍報》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一日
- 註二十一 《解放軍報》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 註二十二 同註十九
- 註二十三 新華社石家莊電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九日
- 註二十四 江偉文〈中共九月大變革〉載《廣角鏡》一九八五年九月
- 註二十五 〈六十四位老同志請求不再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候補委員致黨的十二屆四中全會的信〉載《中國共產黨十二屆四中全會 全國代表會議十二屆五中全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6頁
- 註二十六 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同上註，第109頁

第八篇

改革攻關 深層困擾

(1985-1991)

第四十七章 全面改革面臨之經濟困境以及八五學運

第四十八章 政治改革與波折——言論假期、八六學運與胡耀邦下台

第四十九章 改革的十三大——中央改革措施與開放的人大、政協會議
(八七至八八年)

第五十章 勇闖物價關與治理整頓

第五十一章 八九民運與六四事件

第五十二章 六四後之危機與回應，以及深化治理整頓政策
(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一)

第四十七章 全面改革面臨之經濟困境以 及八五學運

導 言

中共在八四年十月召開十二屆三中全會，八五年於經濟、科技及教育等各個領域推行大刀闊斧之改革。然而，是次改革進行不到半年，即在八五年中期便面對種種經濟困擾，使改革步伐不得不放慢或只能以試點進行。經濟面對之困擾，主要為投資過度膨脹而導致通脹及生活各領域之緊張；農業出現生產大幅下降，嚴重影響經濟之穩定；黨風及經濟犯罪問題嚴重；特區政策由於偏差而被抨擊；以及很多改革先進分子「中箭落馬」(即被批判) 等。在上述背景下，八五年九月召開的黨代表大會，雖然在人事方面仍進行有利於改革之變動，並通過以改革為綱領的「七五」計劃建議，但中共高層已清晰明瞭經濟困境所在，而將「七五」計劃之首兩年用作壓縮投資，以穩健見稱的領導人陳雲並發表強烈針對改革造成之偏差的重要講話。由於改革觸礁以及政治經濟情況未如理想，中國於八五年底曾爆發了以反日為號召的一次學運。在八六年一月，中共更召開八千人機關幹部大會，提出經濟上的「鞏固、消化、補充、改善」的新八字方針，對經濟過熱情況進行調整。由於經濟關係的不協調，原先在八六年初通過的價格改革被押後，並以對整個經濟環境影響較少的企業改革方案取代之，而八六年實際上成為全面改革較為緩慢的「小調整年」。

第一節 八五、八六年中國經濟面對之困擾

一 經濟總需求膨脹導致經濟過熱，供需嚴重失衡

(1) 供需失衡及其惡果

中國在八五、八六年間面對的主要問題是工業生產發展速度過快、

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過大、消費基金增長過猛、貨幣發行過多以及外匯結存下降，經濟生活中產生了不穩定因素。

趙紫陽於八五年三月的人大會議中指出，經濟困擾表現在信貸增長過猛和工資增長過快，原因是八四年下半年醞釀金融體制改革以及企業工資改革時，有關負責部門曾提出各專業銀行自主支配的信貸數額和企業工資總額，均以八四年的實數為基數決定，基於此，各銀行及企業為爭取更大的基數，在八四年下旬開始便爭相擴大貸款額及提高工資，導致銀行信貸和消費基金急劇增長。^(註一)

在八六年一月召開的中央機關幹部八千人大會中，副總理田紀雲進一步指出中國經濟困擾的核心問題是基本投資規模過大，他指出：

「由於大家都爭著搞基本建設，需要大量的設備和建築材料，這樣就刺激工業特別是加工工業超高速發展，而且帶來了信貸資金膨脹和消費基金的大幅度增加，不得不大量進口原材料和組裝件；為了回籠貨幣，又多進口了一批高檔消費品，這樣就導致外貿逆差增大，結存外匯下降。這個問題的實質是國民收入出現超額分配，社會總需求超過社會總供給。」^(註二)

基本建設規模過大，造成下列惡果：

1. 建材供應不足，導致基建停工待料，拖長建設週期，增加造價，投入多，產出少，工期長，效益低；
2. 胡亂進行基建，使重點項目不能集中進行，影響重點工程建設和產業結構調整；
3. 擴大原材料及設備的進口，影響國際收支平衡；
4. 加重物資短缺的壓力，為得到極其有限之物資，導致不少走後門拉關係之歪風。

(2) 經濟過熱的深層原因——經濟體制改革滯後

值得分析及總結的是為甚麼中央一推行經濟改革，對企業進行放權，便會出現「一放就亂」的現象，這情況在一九七九年經濟初步改革的

情況曾出現過，經過長達五年的調整，在綜合國力鞏固而再度改革時，這情況又再於八五年出現，原因除上述趙紫陽指出的有關部門在改革金融體系及工資的問題上出錯外，更重要的應是雙軌制下的經濟體制問題：

1. 八四年時中央雖然對企業下放權力，但企業仍不是真正獨立的經濟實體，其產權仍歸國家，在國家的保護下，往往出現了負盈不負虧之狀況，由於利益約束軟化，使企業往往不計後果地盲目擴大投資，成為新的膨脹主體。
2. 由於經濟關係緊張，價格改革未能進行，從而使不合理的比價現象仍然普遍存在。中國當時的經濟環境是耐用消費品價格偏高，而能源、交通及農產品價格偏低，在此情況下，企業為了賺取更多利潤而湧往加工工業的生產，造成建設規模投資進一步加大。
3. 由於當時改革中國家強調要減少對企業的直接行政干預，希望盡量以間接經濟手段調控經濟，然而，中央當時未能有經驗地及時總結雙軌制下的經濟運作，去制定一套較完善的宏觀控制經濟措施，導致過熱的情況無法解決。

其實中央對於上述三大問題是甚為清晰的，所以在「七五」計劃的經濟體制改革一節中，也是以企業徹底改革、完善市場及價格改革、以及建立有效宏觀調節為改革之三個重心。雖然在理論層次上中央及眾多經濟學者對此問題有一定之共識，然而由於對具體改革方案出現分歧，再加上客觀經濟環境甚為不利(通脹持續)等原因，使企業改革及價格改革未能徹底地執行，使上述求過於供、通脹嚴重的狀況未能消除。在雙軌體制下，又引致以權謀私的官倒情況出現，這亦是導致八五、八六、八九學運和民運出現之主因。

二 農業生產下降

農村經濟面對的主要問題是繼八四年農產量創歷史高峰後，主要農產品產量在八五年開始連年出現滑坡下降局面。以糧食為例，八五至八

七年的糧產量連年下降，達不到八四年之水平。又如棉產量，八四年為六二五點八萬噸，八五年降至四一四點七萬噸，八六年為三五四萬噸，八七年為四一九萬噸。

農產品出現生產下降，除了天然災禍及調整產業結構引起播種棉糧面積下降等原因外，改革措施的不完善以及決策失誤是重要原因。

(1) 價格政策不合理

農用生產資料價格上漲及農業貸款利率增加幅度比國家收購農產品的增幅更大，使農民種植變為無利可圖，在「谷賤傷農」的情況下，大大打擊了農民投資種植業的積極性。

(2) 對農業的投入減少

國家對農業的投資在改革開放十四年來一直下降。此外，自改革以來，個體農戶成為投資於農田的主要承擔者，但個別農戶由於勢孤力薄，其對農田的投資主要限於日常性的投入如施放化肥等，而對於大規模改善農業生產條件的投資如水利設施等則無能為力。由於對農地只重產出而輕投入，農田水利很大程度上是倚靠改革前幾十年(尤其在大躍進期間)基建的老本，八零年中期農村生產條件由於投入不足而惡化，而在承包制解放農民積極性的作用完全發揮以後，農業根本不存在快速增長的因素，在此情況下農業產量下降可謂是必然的事。

(3) 鄉鎮企業之興起，第二(工業)、第三(服務)產業的挑戰及利益懸殊過大使農業降為副業。

為促使農村踏上富裕之路，中共提倡發展離土不離鄉的鄉鎮企業，使農村盡早實現工業化。直至八五年，鄉鎮企業從業員人數已達六千萬，總產值二千三百多億元，佔農村總產值一半左右。(註二)

鄉鎮企業的出現，無可否認可為農業現代化帶來很大動力，但亦帶來某些負面之影響，主要是由於農業勞動力所創造的價值，只相當於工業、商業及飲食業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引致農民種田的興趣大為降低。

由於農業收入與第二、第三產業收入差距過大，使不少農村勞動力轉向工副業的生產，這不單造就了一種輕農思想，更使到務農勞動力的質素降低，例如一些種田能手、乃至種糧的專家也改行經營工副業。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呂東曾指出「農民做工經商收入多，種糧收入少，就是養豬、種菜也看不上眼。」^{〔註四〕}在這情況下，導致農業生產後勁不足和發展減慢。

（4）耕地面積銳減及農民的嚴重短視行為

中國可耕土地相對人口來說本來就極為有限，然而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到處擴大基建，加上城鄉的各項建設皆佔用更大量耕地，造成糧棉生產下降。

此外，由於農民對共黨於改革開放前的政治運動心有餘悸，故對農村開放政策仍有一定之疑慮，他們擔心責任田有再被收回之可能，在土地產權不明確的情況下，作長期性投資須冒很大之風險，故他們普遍對農地作掠奪式之經營，例如用地過度，養地不足，為多建房屋而取土以燒為磚塊，毀壞可耕之土地，更有些農民砍林過甚，使不少地方林木狀況進一步惡化。

除了上述原因外，農民還要面對農村幹部的種種名目繁多的攤派和繳交各項費用，導致負擔過重，也增加了其經營之困難。此外，農村的農業技術仍十分落後，加上落後的生產條件如電力、柴油不足，農機具不耐用等原因，皆拖慢了農業的發展，直接引致八五年開始的大幅減產。

由於中國當時的農業人口佔百分之八十，十億人的吃飯穿衣，都倚靠農產品的供應，「無糧則亂」是一個十分現實的問題。此外，農業對財政與經濟建設有甚大的約束力，根據建國後的經驗，幾次農業歉收，都使第二年的工業生產、財政收入和基建投資下降，這主要是由於工業（重工業、輕工業）生產中很多原材料、燃料皆來自農村，而農村更供應了工廠勞動力所需之糧食。

再者，農業對市場價格之穩定有極其重要之影響，若農產品供應不足，不單農產品本身，連倚靠農產品為原材料的輕工業產品價格亦會上

升，從而導致各個經濟環節的連翻價格上漲，對市場的穩定有極為不利之影響。可以說，八四年後中國的過度膨脹以及社會產品的供應不足，也與農業生產下降有緊密之關係。

三 經濟特區及部分對外開放政策備受質疑

中國七九年開始批准成立經濟特區，當時希望特區的發展，以吸收外資為主，引入先進技術，並發展以出口為主的工業，使中國貨品能打進國際市場。為促進特區的發展，中央對特區實施較為寬鬆之經濟政策，容許特區自行審批引進的生產性項目、設備進口、組團出口訪問及享有較高的外匯留成而不需將賺取到的外匯上交。

八四年鄧小平南巡時，十分肯定特區的蓬勃發展，然而，經過一年多的時間，隨著高通脹而帶來的經濟緊縮，使深圳等特區的繁榮受到很大影響，例如很多在深圳的基本建設即時停頓，在商業貿易上則有大量入口貨品被積壓。在這情況下，國內外有不少分析認為深圳特區等的繁榮並不是由於其建設符合了原先決定開發特區的目標(如外向經濟等)，而是由於特區倚賴中央及各省市的輸血(即大量投入資金)，以及藉其特殊的優惠經濟政策，進口商品倒賣而賺國內的錢。而特區引進的外資企業，其技術設備很多是陳舊和過時，生產出來的商品根本無法與先進國家競爭。

當時不少外商來深圳等地投資，出口只是幌子，實際上是以內銷為主，因此，特區與外商合營的公司生產的產品非但未能創匯，反而賺了內地的金錢。

此外，由於深圳有進口商品的特權，大批內地企業皆湧進深圳設公司，目的是藉深圳的進口優惠政策，轉手進口貨品倒賣內地。內地企業亦通過深圳出口，由於深圳享有甚高的外匯留成優惠措施，使這些內地企業賺取的外匯不用上繳，可自行留用而購入更多洋貨。

隨著八四年下旬經濟緊縮，內地銀根抽緊，國內購買力下降，即時影響了深圳的基建工程，並導致大批進口商品積壓，這又反映了深圳的經濟活動在當時主要是針對國內市場的。

八四年十二月下旬，趙紫陽曾指出：

「廣州、深圳、珠海等地，由於設備原料大部分進口而產品則大部分內銷，使外匯短缺，黑市猖獗……進口設備、原料，生產『洋貨』內銷賺錢不是辦法，不顧一切拿外匯進口高檔消費品等牟取暴利也好景不常。」(註五)

八五年七月底，新華社報導廣東省海南島發生了一宗大量進口和倒賣汽車的案件，事緣中央為了加速海南島等經濟基礎較差地區的發展，但又無力作大量投資，故給予這些地方投資審批權、審訂產品內銷比例等政策優惠。而在外貿方面，海南島亦如特區一樣更可留成外匯，自主進口市場短缺的消費品。在這情況下，海南政府為了籌集資金加快發展，從八四年一月到八五年三月的一年時間內，先後批准進口八萬九千多輛汽車以及二百八十萬台彩色電視機，二十五萬台錄影機，還有摩托車、電子計算機等大量物資，然後倒賣到內地，而用於購買汽車等進口貨之貨款高達四十二億人民幣，是全島八三年總產值的一倍半。直到八六年，由於國內市場的停滯，海南島積壓了八萬八千台錄影機及五十二萬台彩色電視，價值十二多億元。

由於對外開放所造成的問題，鄧小平於八五年六月曾指出：

「深圳特區是一個試驗，路是否走對還要看一看。它是社會主義的新事物，搞成功是我們的願望，不成功是一個經驗嘛。」(註六)

經歷上述開放問題之困擾，中央及地方領導皆決定要重新檢討建設特區及一些開放區域之發展政策，務求改變過往靠倒賣貿易而賺內地錢等鑽政策空子的狀況，以使經濟能落實向工業方面發展。

四 黨風不正，經濟犯罪情況嚴重

中國自八四年底、八五年全面改革開放以來，由於法制不健全、黨員擁有權力過大而缺乏監察等原因，出現了嚴重的貪污謀私情況。

陳雲曾於八五年九月就開放政策影響到黨風敗壞之情況，作出明確

的描述：

「一說對外開放，對內搞活，有些黨政機關、黨政軍幹部及幹部子女，就蜂擁經商。根據十幾個省市的調查，從去年第四季度以來一下子就辦起了兩萬多個這樣那樣的公司。其中相當一部分，同一些違法分子，不法外商互相勾結，互相利用。鑽改革的空子、買空賣空、倒買倒賣、行賄受賄、走私販私、弄虛作假、敲詐勒索、逃避關稅、製造和銷售假藥、假酒，謀財害命，以致販賣、放映淫穢下流錄相，引誘婦女賣淫等，都出現了。『一切向錢看』的資本主義腐朽思想，正在嚴重地腐蝕我們的黨和社會風氣。」(註七)

自改革以來經濟領域出現的不正之風主要有如下各點：

- (1) 黨政幹部利用其掌握的物資、資金及人事等方面權力以經商，利用雙軌制下的空隙，大搞倒賣活動；
- (2) 亂集資及攤派，加重企業負擔；
- (3) 粗製濫造，以劣貨充優，禍害消費者；
- (4) 濫發獎金、補貼及各種實物，並利用職權，揮霍公款等。

據中國審計長呂儉指出，一九八五年一月至九月審計署審計了四萬三千個單位，查出違反財經紀律以及賬實不符等有關問題金額達五十三億，相當於一九八四年的一點六倍。(註八)

五 改革明星「中箭下馬」

八六年四至六月期間，《光明日報》、《經濟日報》、《人民日報》及《工人日報》和很多地方報紙，都廣泛報導了不少在企業改革有良好表現的先鋒人物被反改革的既得利益幹部打擊誣告。

舉例來說，《經濟日報》於四月廿四日發表一篇為太原溶劑廠廠長楊敏廉平反之報道(註九)。楊敏廉在七九年開始便任溶劑廠之廠長，由於銳意改革，推行各種責任制，使該廠很快就轉虧為盈。然而，在八四年太原市化學橡膠工業公司收到一封匿名信，便組織一個工作組，對楊進行

調查，並指他受賄六千元，以致楊於八五年一月被免去廠長職位。事件使太原不少企業的經理廠長感到不安，後來太原市人民檢察院據上級指示對案進行覆查，終於發覺楊之受賄純屬不實之詞，而給他平反。《經濟日報》亦為此事發表評論，指出：

「最近一個時期，在一些地方和部門，一部分改革者的命運不佳。有的遭到責難、非議，有的因流言蜚語而陷於困境，有的甚至被不明不白地撤職或調職。用群眾的話講，叫做『紛紛中箭落馬』。」

《人民日報》於五月三十日的評論員文章指出：

「這一個時期，一些在改革中有作為的企業領導幹部受到種種非議和責難。」他們「不是因為有甚麼大的過錯，而是因為改革觸及了某些人的權益。他們的頂頭上司仍習慣於按老辦法發施號令。誰要堅持改革，就利用職權對改革者進行錯誤的處理。」(註十)

六月十日的《光明日報》指出：

「據對上海、四川、北京、安徽四省市作的不完全統計，曾被評為全國百名優秀青年廠長（經理）的二十一個青年改革者，幾乎有一半受過各種調查。」(註十一)

改革者被誣告打擊，是因為他們的改革觸動了既存的經濟權力關係，一些企業為落實企業自主權，推行種種自負盈虧的承包責任制，客觀上使企業負責實務的廠長獲得比該廠黨委書記更大的權力，從而保證企業能在競爭的環境下生存。此外，一些庸碌無能的廠負責人，由於缺乏良好表現，亦會面臨被開除的威脅，在這情況下，一些在既存制度下得益的人為不想改革觸動其既得利益，往往對一些銳意改革而有表現的人放冷箭，作出種種誣告，使改革者不能安於位，從而保障自己的既得權力及利益。改革者紛紛中箭下馬的情況反映了中國改革與反改革的重要一面，就是反改革的保守派不單是一些思想較為僵化和崇尚文革前制度的高級官員，更包括一大群在既存指令或計劃經濟制度下不需競爭及

沒有出色工作表現的企業從業員，如部分廠領導及工人等。可以說，反改革的力量具有深厚的社會基礎。中國仍缺乏一套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企業承擔著種種社會服務功能如提供房屋、職工子女教育、退休保障等。不少在既存制度下受益的人對大刀闊斧的改革措施如企業需自負盈虧、廠長可開除表現不佳之工人及企業可以由於經營不善而破產等持保留態度。

正因為經濟體制改革涉及政治權力分配，故於八六年中開始，中共開始進行曾於一九八零年下旬提倡而一度中斷的政治體制改革，鄧小平於八六年六月明確指出：

「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註十二) (有關八六年的政治體制改革，將在下章詳細討論。)

第二節 中央之回應、困難及陳雲的重要談話

一 中央對經濟困擾的回應

可以說，八四年下半年開展的全面改革而面對的困擾，如上述指出的經濟過熱及失控、農業生產下降、特區及對外開放政策偏差、黨風不正之經濟犯罪以及改革者由於觸犯既存利益格局而中箭下馬等五個方面，可以看到中國在徹底進行改革的環境下碰到一些最深層及基本的阻力，而需要在經濟、政治及社會各個層次作出整體的改革以作回應。中國領導人對上述問題是十分清晰的，他們亦希望通過不同的措施保證整個改革能貫徹推行。八五年中旬，當上述困擾較清楚的出現後，中共推行了下列政策：

(一) 壓抑投資及消費，回復經濟平衡

從根本原因分析，凡一開展經濟改革，推行經濟權力下放，就會導致一放就亂、需求過大之混亂局面，中國的經濟專家及官員普遍接受由於企業欠約束預算而導致過量投資消費之情況，故在八五年九月的黨代

表大會就經濟體制改革問題中，明確介定企業、價格以及宏觀調控機制等三方面改革需配套緊密進行，並加以適度的緊縮政策，保證經濟體制改革成功。

(2) 調節經濟發展戰略

在經濟發展策略方面，重視農業之投資，從多方面加以配合，希望扭轉農業生產落後情況。中央為改變國民經濟的薄弱環節，在八六年後更強調加強能源、原材料及交通等基礎工業之發展，並抑制加工工業之發展速度，以保證國民經濟各個環節能協調運作。此外，中央亦檢討了特區及對外開放區域之政策，目標在改變這些地方以投機倒賣方式賺錢之情況。

(3) 政治局面的改革

在政治層面上，中央繼續推行清黨及反貪污政策，以抑制經濟犯罪，並在不同程度上推行政治改革，以改變黨政不分、權力過度集中及效率低落之困境，從而保障經濟改革得以貫徹推行。

二 制約中央貫徹危機對策的客觀因素

雖然上述三點乃是對症下藥的良方，然而一些中央領導及銳意改革者在執行時卻又困難重重，原因不能只歸咎於保守派或官僚之阻力，而應從舊有體制下既有利益基礎、中國的客觀制約因素、政策的正確性、以及在推行時會出現的種種負面影響去解釋。

舉例來說，壓抑需求就遇到地方政府及企業之反抗，由於緊縮政策無可避免地造成經濟滑坡、企業破產(由於社會缺乏足夠之購買力，從而導致企業生產中斷)，嚴重影響企業及地方政府之收入。由於中國資源不足，社會保障不健全，企業及地方政府遂向中央政府游說及施加壓力，希望中央網開一面，放鬆緊縮經濟政策，結果造成通脹始終無法壓抑，而引致八八年底須實行全面的治理整頓政策。

此外，進行價格改革、增加對基礎工業及教育科研的投資，及完善

社會保障制度的其中一個大前提，就是國家擁有較雄厚的經濟基礎及資源，否則在開放價格後就會由於缺乏充份的生產供應而導致通脹（原因是求過於需，而價格開放又因資源不足無法誘導更大的生產及供應）。而增加各重點領域之投資，又是無財不行，這些對於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真是百上加斤。

當然，除客觀環境制約外，還有中央決策錯誤（追求高速發展及在不適當時機推行部分改革、如在八八通脹劇烈下仍冒險闖物價關等）及黨權問題，以致政改及反貪污等由於損害黨政幹部的既得利益及脫離一黨專政之觀念而無法落實，這亦是改革出現阻礙之主因。

三 回應困擾——陳雲於八五年九月黨代表大會的談話

是次黨代表大會在一片改革聲中召開，會議通過新老交替的人事安排，並確認了七五計劃期間中共經濟體制改革中企業、市場及宏觀調控的三個配套環節。由於八五年中旬中國已經歷八四年第四季度的經濟過熱、農業出現滑坡、幹部藉改革開放以權營私及海南島汽車倒賣事件，故全會確定七五計劃前兩年（八六及八七年）的主要任務是控制需求、解決增長速度過快、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過大及消費基金增長過猛等問題。此外，以穩健廉潔見稱的陳雲並發表針對改革出現偏差的談話，其重點包括如下幾個方面：（註十三）

（1）強調農業之發展，重視種糧

「前一時期，報紙上宣傳萬元戶，說得太多，實際上沒有那麼多……現在有些農民對種糧食不感興趣，這個問題要注意……發展鄉鎮企業是必要的。問題是無工不富的聲音大大超過了無農不穩。」

「十億人口吃飯穿衣，是我國一大經濟問題，也是一大政治問題。無糧則亂，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

（2）強調中國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還是要有計劃按比例」

陳雲首先肯定了經濟改革：「城市的經濟體制改革，總方向是正確

的，具體的步驟措施，正在探索中。要走一步看一步，隨時總結經驗，堅持把改革搞好。」

跟著陳雲指出計劃的重要性，「從全國工作來看，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這話現在沒有過時。」

針對經濟過熱問題，陳雲指出「小平同志八月二日接見外賓，談到我國工業發展速度太快時說：『聽起來可喜，但有不健康因素』。我贊成他的意見。」

「……這樣高的速度，是不可能搞下去的。因為我們目前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都很難適應這樣速度的需要。」

(3) 「抓黨風的好轉，仍是全黨的一件大事。」

(4) 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維護黨的思想政治工作部門的權威

陳雲針對性的指出：

「有些人，包括一些共產黨員，忘記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他們為了私利，『一切向錢看』，不顧國家和群眾的利益，甚至違法亂紀。」

「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更加要有為共產主義事業獻身的精神。」

第三節 八五年大學生藉紀念九一八而爆發的學運

八五年九月十八至二十四日，中共全國黨代表大會召開，而在會議召開的同一天，即「九一八」紀念日，爆發了自八四年中國進一步改革以來的首次學運，這亦標誌著社會運動在全面開放期間，隨著經濟、政治及社會的不完善情況而持續出現。由於幾次運動(八五年九月、八六年十二月、八九年四月)皆希望達至削弱黨權、擴大群眾參與及組成民間壓力團體之目標，而與官方認為社會要穩定、共黨權威不容挑戰等原則相左，最終導致八九年六月鎮壓的悲劇。

一 學運的經過與官方的回應

中國自八五年四月開始，由於全面改革帶來寬鬆氣氛，及改革遭遇困境，有零星的社會群眾運動以不同形式相繼出現，例如四、五月間北京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自山西返北京示威抗議，要求返京定居及與家人團聚。同年五月十九日，北京工人體育館內因中國大陸足球隊敗給香港隊，又發生了上萬球迷暴動事件，顯示了社會不安之情緒。

八五年學潮的開始，是學生利用即將來臨的九一八紀念日，針對中日貿易及外交不公平，以及日本首相及內閣成員參拜供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十四名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等事件，學生貼出「反對日本經濟侵略」、「打倒中曾根」及「抵制日貨」的大字報。九月十二日，北京大學生更建議政府將九月十八日定為國恥日，並呼籲同學於九月十八日當天到天安門廣場遊行示威。而怎樣紀念九一八，則成了校方與學生、學生與學生間意見分歧之焦點。

中央北京市委由於考慮到九月十八日黨代表大會召開以及學生們高昂的情緒，故提出應將紀念活動局限於校內進行，並堅決制止繼續寫大字報和到天安門獻花圈。事件發展到此，聲討日本軍國主義形同點綴，運動實質上已演變為政府與學生之對抗。

十五日開始，北大的大字報已增至三十多張，部分內容已顯示明顯的現實政治傾向：

「不能半途而廢，要衝出去，在天安門自由演講。改革、現代化不僅在於科技，更主要的是精神的現代化和理性的光芒。有目共睹，整黨收效甚微，我們幹部官僚主義、求穩怕亂思想嚴重，對自己民族和人民缺乏真正的愛和同情心。利用這次黨代會召開的時機，到天安門去……去遊行。」^{註十四}

一些大字報更攻擊「北京的腐敗」，「橫掃一切漢奸，走狗賣國賊」，還有一張小字報影射黨代會是「短代會，斷代會」。^{註十五}

雖然九月十八日北大校園被關閉，但仍有數百名北大學生走出校

門，到天安門廣場進行小規模的示威活動。北大學生之行動迅速波及全國其他大專院校，他們更計劃在八五年結束前的日子裡，充分利用同學的高漲情緒，要「臥薪嘗膽九一八，東山再起一二·九」，部署紀念「一二·九」運動五十週年的行動(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京學生在中共領導鼓勵下，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日示威運動，史稱「一二九」運動)。

面對洶湧的群眾情緒以及八六年的敏感日子(天安門事件十週年)，中央做了大量的工作：

- (1) 派出高幹深入各大學進行游說；
- (2) 開動宣傳機器，加強對學生的思想教育，重點在於要學生維護安定團結局面，指出學生的主要任務是學習專業知識和文化，進而批評「踢開黨委鬧革命」，和藉民主法制而不要黨領導等「資產階級自由化」行動；
- (3) 加強黨團組織，透過各校的共青團員影響及改變學潮的方向；
- (4) 淡化一二·九的紀念活動，策略是由各院校校方出面，主動舉辦一些官式活動，吸納同學參加，以轉移學生的激昂情緒，將紀念活動納入中共可以容忍及控制的軌道上。

由於中央的嚴密部署，基本上穩定了局面，使十二月九日那天能風平浪靜的渡過。

二 八五年學運的反思

(1) 學運爆發之原因

是次學運藉反日而爆發，表面上是同學不滿日本軍國主義有跡象復辟及種種對華不平等貿易，然而，更深層的原因是同學不滿經濟改革過程失控而導致通脹，引致學生的生活條件惡劣。而更重要的，是學生對開放改革所帶來的幹部以權營私、貪污腐化、官僚主義和不正之風等異常不滿，認為改革造成更嚴重的貧富差距、社會不公，並助長犯罪活動。故此，學生希望以群眾運動的形式表達其不滿，向中央施加壓力，一則希望改革上述情況，二則希望藉示威之行動實踐公民的權利和自

由，並爭取更多民主權利。

由於學潮的主要目標是爭取民主權利及改革腐敗情況，所以雖然八五年十二月九日較為平靜的渡過，但只要上述問題未得到真正改善，學生仍會藉不同的事件發動群眾，而這亦是八六年底、八九年四月民運出現的主要原因。

(2) 對官方回應之分析

從官方處理八五年學運事件可知，中共對一些借任何理由而爆發的、脫離黨領導的群眾運動非常警惕，雖然官方或許完全認同學運提出之目標，如反日、反貪污及尊重知識分子，但對於脫離黨領導或默許之自發性群眾運動則認為是有礙安定團結，這些「資產階級自由化」行動足以破壞社會穩定之局面，而需要用種種方法加以引導、控制，甚至壓止。

當然，官方為維護其自身之權威認受性，處理這些自發性的群眾運動主要仍希望運用游說教育等手段，從而避免武力衝突而導致更為複雜之局面。更值得注意的是官方在處理完這些群眾運動後，往往以高度的、冷靜理智的態度反醒，在平抑運動餘震的同時，更進行各方面深入改革如擴大反貪污、繼續推行改革開放並進行政治改革等。例如八五年學運後中央舉行以反貪污為主題的八千人大會、繼續推行經濟開放及改革，並於八六年開展政改等。又如八七年學運及胡耀邦下台後，中央又即時推行反左、鼓勵經濟開放，在同年召開以改革總覽全局的十三大等。就算是引致舉世震動的八九年六四事件後，中央仍堅持一個中心(經濟)、兩個基本點(四項堅持與開放改革)而繼續推行經濟開放，並雷厲風行地推行反貪污及整頓不法公司，以杜絕官倒。

第四節 八千人大會及「新八字方針」的提出

一 八千人大會

八六年一月六日及九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了約八千人出席的大會，除由田紀雲發表〈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長篇談話外，整

個會議主旨旨在於反對不正之風，端正黨紀，對八五年學運提出的問題作出積極回應。

中共中央書記王兆國在大會中談黨內六種不正之風，包括官僚主義嚴重；不執行黨方針的政治自由主義；個人主義以權謀私思想膨脹；不顧大局的本位主義嚴重；用人辦事不講原則只重關係；以及組織涣散紀律鬆弛。王兆國進而指出糾正不正之風要抓好四方面工作：

- (1) 加強思想教育；
- (2) 整頓紀律及健全制度，並禁止黨政幹部經商；
- (3) 嚴肅查處大案要案；
- (4) 健全黨內生活，並加強黨組織對黨員的監督管理。

總書記胡耀邦更於一月九日發表〈中央機關要做全國的表率〉^(註十六)的談話，指出在整個中國建設事業中，「中央機關起著樞紐作用，對我們事業的興衰成敗，關係極大。因此，必須尖銳地向中央機關提出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這就是要以自己高崇的精神面貌和優良的工作作風，做全國的表率。」

在緊接著八千人大會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鄧小平發言大力支持打擊經濟犯罪活動，並強調處理應是堅決、明確及毫不含糊：

「我最近看了一些材料，屢教屢犯的多得很，勞改幾年放出來以後繼續犯罪，而且更熟練，更會對付公安司法機關了。對這樣的累犯為甚麼不依法殺一些？……現在總的表現是手軟。判死刑也是一種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要多殺幾個，這才能真正表現我們的決心。」^(註十七)

二 經濟上新八字方針的提出與經改重點由價格改革轉至企業機制改革

(1) 新八字方針——「鞏固、消化、補充、改善」

八四年第四季度開始的經濟失控，迫使國家在推行各項改革的同時，不得不緊縮需求，但國務院為防止過急的緊縮方案，決定採取「軟著

陸」的方針，即把控制總需求的任務放在兩年內解決，並爭取改善供應，使八七年能邁出以價格改革為重點的方案。

八五年二月至九月，國務院先後召開四次省長會議，解決消費基金增長過猛和信貸規模過大、外匯使用過多以及控制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問題，方法主要是緊縮銀根，控制貨幣發行。

八六年一月的八千人大會中，田紀雲就經濟問題發言，宣稱「國務院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經過認真研究，認為今年主要是對已經採取的改革措施進行鞏固、消化、補充、改善，解決突出問題，存利去弊。」

八六年二月《紅旗》雜誌就新八字方針作出闡釋。(註十八)

1. 「鞏固」，就是要鞏固改革的成果，堅持改革的方向，為深入改革奠定基礎。
2. 「消化」，是根據財政所能負擔之能力、企業自身消化能力和群眾對價格上漲的承受力，及時解決改革出現的問題。這點主要是針對上階段物價上漲過速，使企業在購買原料時負擔加重，嚴重影響盈利情況。此外，物價上漲更影響居民的實質收入，而上述情況又要求中央財政作更大的補貼，這幾方面的困境對各方面皆構成需要消化的壓力。
3. 「補充」，主要對改革中不健全的環節進行修補，解決協調配套，重點在針對搞活微觀企業活力的同時，未能從宏觀上調節出現失控的現象，解決方法為綜合運用稅收、信貸、利率及工資等經濟槓杆，對經濟加以調控。
4. 「改善」，就是改善宏觀控制方法並改善供給，把生產進一步搞活。

基於八字方針的指導，八六年是改革的調整年，國務院決定價格改革不採取大的調價措施，只是對突出不合理的價格，作少量的調整。(註十九)

(2) 經改重點的改變——從價格改革到企業改革

然而，八五、八六年的「軟著陸」緊縮政策並沒收到八一年時調整的效果，地方和企業的投資及消費基金壓不下來，實際壓縮的只是企業生產需要的流動資金(用以購買原材料進行生產的資金)，故引起工業生產速度大幅下降，許多地方驚呼生產滑坡影響了生產及供給，迫使政府在八六年三月放寬貨幣投放。這種經濟擴張政策，實際推行了以通脹來維持經濟增長的主張，一直延至八七年秋季，而物價在這期間出現了新一輪上漲。

雖然政府曾決定以兩年時間抑制需求，增加供給，為八七年的物價改革打好基礎。然而，由於八六年中旬經濟局面再度呈現緊張(通脹持續出現)、政府在前階段由於經濟滑坡收入減少，缺乏財力支持價格改革(補貼因開放物價而虧損的企業及增加工資)、以及一些部門及地方政府之反對、再加上經濟理論界有些學者強調應先進行企業所有制改革等種種原因，以價格改革為主導的方案在八六年九月左右被擱置，而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遂轉移往企業承包制方向發展。

註 釋

- 註 一 趙紫陽〈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體制改革〉載《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11頁
- 註 二 田紀雲〈關於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載《人民日報》，八六年一月十二日
- 註 三 萬里〈加強科技支援，發展鄉鎮企業〉《人民日報》八六年一月十九日
- 註 四 《人民日報》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 註 五 《文匯報》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五日
- 註 六 新華社電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 註 七 陳雲〈必須糾正忽視精神文明建設的現象〉載《十二大以來中》，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854頁
- 註 八 《中國新聞社》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註 九 《經濟日報》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 註 十 《人民日報》一九八六年五月三十日
- 註十一 《光明日報》一九八六年六月十日
- 註十二 鄧小平〈改革政治體制，增強法制觀念〉載《堅持改革、開放、搞活》，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第380頁
- 註十三 陳雲〈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同註七，第842-845頁
- 註十四 船夫《十年學潮紀實》，北京出版社，一九九零年，第105頁
- 註十五 同上註，第107頁
- 註十六 胡耀邦〈中央機關要做全國的表率〉載同註七，第885頁
- 註十七 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的講話〉載同註七，第891頁
- 註十八 《紅旗》雜誌半月刊，第三期，一九八六年二月十日
- 註十九 成致平《發展中的價格新體制》，中國物價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145頁

第四十八章 政治改革與波折——言論假期、八六學運與胡耀邦下台導言

經歷過八五、八六年間由於經濟改革失控而出現的困擾，以及八五年底學運衝擊之啟示，中央除召開八千人大會及決定對經濟進行緊縮外，鄧小平及眾多高層領導還積極鼓吹政治體制改革，並引起社會廣泛的共鳴。八六年中下旬的寬鬆環境引發中國出現建國以來少見的「言論假期」，不少黨內理論家及高級知識分子發表見解精深、分析透徹之大膽言論。八六年九月，中共召開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除肯定經濟開放要與精神文明建設互相配合外，中央高層內部更出現是否在決議上寫上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之論爭。由於鄧小平的堅持，這條一直被中央肯定之反自由化政策再一次被強調。八六年底，大規模學運從合肥的科技大學開展，蔓延全國，作為黨總書記的胡耀邦由於以溫和手法處理學運而被迫下台，中央並開展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由於強調意識形態的「思想警察」希望將運動推往社會各領域，這樣極有可能衝擊經濟改革開放，遂引起趙紫陽及鄧小平的警惕及阻撓，反自由化運動隨即收斂，中國局勢又再沿既定開放方針發展。

第一節 政治改革之重提與局限

針對經濟改革推行的權力下放措施遭遇阻撓，鄧小平於八六年六月十日在聽取有關領導匯報經濟情況時指出：「不搞政治體制改革不能適應形勢……我們要精兵簡政，真正把權力下放，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把人民群眾和基層組織的積極性調動起來。現在機構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加了。你這邊往下放權，他那邊往上收權」。鄧還說：「一九八零年就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但沒有具體化，現在應提到日程上來。不然機構龐大，人浮於事，官僚主義，拖拖拉拉，不守信用，你放權，他收權，必然會拖後腿，

阻礙經濟體制改革。^{註一}此後，鄧小平更就政改問題在五個月內發表五次講話，明確指出：「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註二}」在中共建黨六十六週年紀念日中，中央更決定重新發表鄧小平於八零年八月十八日曾發表的重要政改文章〈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為政治改革製造更大之輿論。

由於鄧小平表態支持政改，黨中央及國務院的決策層立即活躍起來，黨內高級知識分子及理論界皆就政改問題開展理論研究和調查的工作，使政改問題成為八六年下旬工作的中心點。

八六年九月十三日，趙紫陽總理給鄧小平寫了一個報告，指出「為了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必須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註三}報告中建議由趙紫陽、胡啟立、田紀雲、薄一波及彭沖五人組成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為八七年召開的全國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設計政改藍圖，得到鄧小平積極的回應，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遂成立了。^{註四}

當時政改目標有三點，分別是一、保持黨和國家的活力，促使幹部年輕化；二、克服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三、調動基層和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積極性。^{註五}

政治改革研討小組成立政治改革辦公室，由陳一諮主持日常工作。辦公室負責搜集各國政制之材料，並召開多次座談會，當時辦公室提出政改之內容應從七個方面入手，分別是黨政分開、重視黨的組織和黨內民主進一步下放權力、精簡政府工作機構、改革人事制度、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及健全法制。^{註六}雖然政改在八六年底的學運及胡耀邦下台事件中受到一定的衝擊，但很快又再次被高層強調，小組並將政改初步方案交八七年十月的中共十二屆七中全會討論及通過，寫入十三大的報告中。

雖然八六年中旬的政改討論為社會營造了寬鬆氣氛，然而改革的內容卻有著嚴格的限制，不能挑戰黨的領導。據八月八日《文匯報》報導北戴河會議討論政改問題時，中共明確規定「政制改革的目的是堅持黨的領導，不能違背四項原則、現行政制基本適應經濟發展需要，只是有些地方不完全適應而已。」^{註七}

此外，中共於八六年九月廿八日召開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此文件從醞釀到起草，徵求意見及反覆修改到最後通過，用上了一年多的時間。決議認為經濟建設及各項經濟體制與政治改革，應與精神文明建設互相配合，以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

在上述精神文明決議中，觸目之一點是保留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提法，這提法其實是經過長期反覆及激烈之爭論，最後由鄧小平拍板決定寫下來的。在六中全會前的五天預備會議期間，南方開放省市及沿海地區的負責人認為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八三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時提出來的，容易被某些人利用作打人的棍子，不利安定團結與改革局面。^(註八)至於不寫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觀點受到胡耀邦的支持，而這亦導致他後來下台的原因之一。

鄧小平在六中全會中明確表明其反自由化之立場：

「搞自由化，就會破壞我們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就是對我們現行政策、現行制度的對抗…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現實政治要求我們在決議中寫這個。我主張用。」^(註九)

這裡再一次表明鄧小平的政治立場，他主張推行增強政府效率以及有一定程度民主成份之政制改革，如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及完善人大監督政府之功能等。與此同時，他始終對一些脫離黨控制的行動表現極大的介心，認為這類行動會影響安定團結及阻礙建設，故一定要加以反對，這就無可避免形成鄧小平與一些更開明的黨內領導人如胡耀邦等衝突，而鄧的政治觀點亦是他在八七、八九年決定以強硬手段結束學運之原因。

第二節 寬鬆的環境——八六年的「言論假期」

在鄧小平肯定政改前後，中共開明領導人、各重要報刊及知識界學

者，相繼發表政改之言論，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再度被大力提倡。在寬鬆的政治環境下，中國遂進入歷時達半年的「言論假期」，直至八六年十二月底爆發大規模學運才稍作收斂。

一 中央領導群之言論以及開明處事例子

中共開明傾向的領導人如趙紫陽、胡耀邦、萬里、胡啟立、朱厚澤（中央宣傳部長）、王蒙（文化部長）皆發表支持言論開放及政治改革之談話。

趙紫陽多次講到，若不進行政改，經改很難深入地進行，^(註十)因為黨政不分、政企不分，企業就不可能做到自負盈虧。胡耀邦亦指出中國的「管理體制有一個嚴重的弊端，就是過於集中，統得太死。」^(註十一)而主管文化宣傳的王蒙與朱厚澤，亦強調要創造一種融洽和諧的氣氛，以利文學藝術的發展。^(註十二)

當時更為開放的是萬里的言論，他曾指出「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不是聖經，而是行動的指南……決不能在維護馬克思主義純潔性的藉口下，把當代人類的許多新理論、新成果當作糖衣炮彈、異端邪說而拒之門外」。^(註十三)在當時影響更重大而引起強烈共鳴的，是萬里於八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在全國軟科學研究工作座談會上就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的講話，萬里提出要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真正實行決策民主化、科學化的號召，並強調：

「領導人要尊重人們充份發表意見的權利，不要害怕別人講不同意見的話，甚至講反對自己的話……只有在高度學術自由的氣氛中，才能才思泉湧，觸類旁通，獨立思考，提出真知灼見。」^(註十四)

中央領導層除發表開放的言論外，還身體力行，與多個不同界別人士接觸，了解他們對政改之意見。十一月三十日，萬里與安徽省十一所學校負責人座談，圍繞民主辦學等問題進行深入討論。科技大學副校長、著名民運人士方勵之向萬里表示民主不是給予，而是公民權利，並談及知識分子的獨立地位以及要求教育委員會放權，使大學能較獨立地

運作等三個問題。方勵之強調：「他和萬里雖然曾就一些問題爭論，但萬里是同意他們大部分觀點的，他們是在友好融洽的氣氛下談話，並不是不歡而散。」(註十*ii*)

另一件當時引起人民鼓舞及議論的事，是蛇口工業區黨委書記袁庚在八六年二月主動鼓勵報紙刊登一些批評領導的文章。在二月廿八日《蛇口通訊報》刊登了一封題為〈該注重管理了——向袁庚同志進一言〉的來信。《人民日報》前社長胡績偉曾指出：「一個小青年敢於寫信批評黨委第一書記，而且黨報敢登批評第一書記的信，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註十六)這封批評信刊登以來，引起很大震動及鼓勵，一些幹部群眾反映「這樣登有什麼不好呢？我們以前的觀念不對，好像一公開批評誰，誰就得下台。依我看，在蛇口這類批評多了，大家就慢慢習慣了。」〈進一言〉為全國輿論界之首創，這表明在蛇口除了政府、企業之外，又形成了第三勢力——民意。報紙一旦為群眾提供發表意見的機會，打小報告和傳小道消息的將會大大減少。(註十七)中國當時的氣氛實很寬鬆，例如方勵之在十一月的一次演講指出，「今年八月份，我在記者招待會上點名批評了胡喬木，也沒把我怎麼樣嘛。」(註十八)

在中央各領導人發表政改言論的同時，中共也發動內外報刊響應，包括《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光明日報》、《工人日報》、《經濟日報》等等。這裡僅引中共最重要報章《人民日報》於八六年發表的部分評論員文章的標題(筆者按：評論員文章基本上表達了最高領導人的思想)，以反映當時輿論界之開明情況：

- (1) 〈沒有社會主義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五月八日
- (2) 〈支持探索，鼓勵創新〉五月十九日
- (3) 〈旗幟鮮明地支持改革〉五月三十日
- (4) 〈鼓勵大家講心裡話〉七月二十一日
- (5) 〈在波浪衝擊中前行〉八月二十五日
- (6) 〈政治問題可以討論〉八月三十日
- (7) 〈肅清政治生活中的封建遺毒〉十月二十日

(8) 〈多討論少批評〉十月二十八日

二 黨內外知識分子的意見

黨內外知識界的學者如嚴家其(政治學研究所所長)、蘇紹智(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研究所所長)、李洪林(福建省社會科學院院長)、方勵之(科技大學副校長)、溫元凱(科技大學教授)、于浩成(政治學會副會長、《法學》雜誌主編)及王滬寧(復旦大學副教授)等等，皆相繼發表很多分析深入、切中時弊的言論，從多方面分析並鼓勵推行更進一步的政制改革。此外，以中國社會科學院為主的各個學術團體，也先後在全國不同地方舉行環繞政改的大型研討會。

縱觀理論界的言論，不少觀點實已超越官方政改的範圍。一般來說，官方對政改所持的態度較為慎重，例如胡啟立曾提出，「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是領導體制改革，而不是政治制度的改革」^(註十九)官方的改革目標在於打擊官僚主義，強化效率，故重點放於黨政分工、幹部人事制度、健全法制及精簡機構等方面。至於擴大人大、政協監察功能等具有增強民主成份之改革，亦相當審慎地提出以保證不會動搖黨的領導，避免引起可能混亂的情況。然而，在知識界中，不少言論則相對大膽，部分(尤其是蘇紹智及方勵之)已觸及黨的領導這個最焦點的問題，其內容可以總結為三點：

(1) 政治多元化與思想多元化，從而引伸應承認獨立於黨的團體之存在與發展。

方勵之曾指出民主本身的含義就是首先承認每個人自身的權利，然後組成一個社會。方進而提出知識分子是一個獨立的、佔領導地位的階級，是社會的主導力量，而知識分子的知識價值是獨立和不受領導的，^(註二十)故他極支持民主辦學。

蘇紹智的觀點則更為明確，如「社會主義社會的階層、集團和團體是多種多樣的……各種人的眼前利益、具體利益是不一致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利益同樣是多種多樣的，各種經濟利益在政治上的表現——

通過人民代表會議……就導致政治利益多元化」。此外，蘇紹智更認為社會存在著的各個群眾組織如工會、農會等不應是黨的『傳送帶』，「群眾團體要代表各自群眾的利益，有獨立的權利。」(註二十一)

（2）中國共產黨於國家的權力與角色

蘇紹智提出黨大還是法大這個具爭議的焦點問題，他認為「憲法和法律是人民代表們制定……所以黨當然要在法律和憲法範圍內行動……從而，立法機構的獨立，司法機構的獨立，應當是不言而喻的。」

此外，蘇紹智亦強調黨的領導是路線等的領導，不應由黨包辦一切，他認為：「黨與政府不能合一，不能把政府的權力變成黨的權力。」(註二十二)方勵之亦指出「接受黨的領導是一個政治意識形態上的接受，而不是一個具體部門，教委可以少管些事情。」(註二十三)

（3）民主不是恩賜，而是要爭取的

方勵之是這方面的倡議和鼓吹者，他認為「要把人權、自由、平等、博愛等看作是歷史上值得肯定的遺產，先肯定這些東西，然後再爭取到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而不能靠上面恩賜。上面恩賜的不叫民主，而叫寬鬆……只有自己爭取，才能真正得到，爭取可以看各種方式，不一定用非常激烈的方式……當然比較激烈的方式包括在內。」

方勵之有膽量鼓吹民主是要靠爭取這個觀點，其實也與社會在七八年中國政府改革以來的開放環境有關。他曾指出：

「現在又的確有很多與從前不同了……儘管現在還沒有達到西方那種民主的程度，可是已經有了這種苗頭，用順口溜說就是『東風吹，戰鼓擂，現在誰也不怕誰』……有的東西是你不去做，你真去做了就會發現他也不敢怎麼樣。」(註二十四)

以上三點可說是知識界中最前衛（或激烈）的言論，明確針對共黨權力過大、要求成立獨立的群眾組織，並以行動爭取民主，以上的觀點實是導致八六年底至八九年爆發大規模學運的原因之一。以上言論

暫沒有提出要在中國成立反對黨，或提出通過選舉以取代共產黨的統治，部分知識分子在當時所要求的是通過爭取，使中國實行類似西方的利益集團（或壓力集團）政治，並限制黨的權力，以落實政改的各項具體措施。

第三節 八六學運與胡耀邦的下台

一 學運爆發之原因

(1) 對社會的政治、經濟現象不滿

首先，與八五年學潮出現的情況一樣，群眾及學生對社會現狀的不滿是構成整件事件的基礎。據八六年八月廿三日中國政府體改所發表的調查報告指出，雖然有百分之六十四點三被訪群眾認為前幾年改革成功，但自「一九八五年第四季度以來，群眾不滿心理也在增加；按不滿程度排列，前十位依次是(1)以權謀私，(2)物價上漲，(3)任人唯親，(4)法制不健全，(5)政策多變，(6)某些商品和服務質量低劣，(7)不能自由選擇職業，(8)收入不平等，(9)平均主義，(10)在改革上對群眾交底不夠。」(註二十五)

八七年一月，一個對北大、清華、人民大學、師大四所高校部分大學生思想狀況調查顯示，大學生有四個不滿意，一是對改革速度不滿，認為改革進展太慢，阻力大、收效少；二是對人民實際上能行使民主權利甚微表示不滿；三對黨風及以權謀私的現象忿忿不平，特別對重用高幹子女的問題意見很大；四是對知識分子政策落實狀況不滿，認為是雷聲大、雨點小。(註二十六)

部分大學生的四點不滿引伸出來的反思，與後來被批判為宣傳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之觀點甚為類似，這分別是：

第一認為中國所以受文革等摧殘，乃是由於封建主義在中國根深蒂固，又沒有受過資本主義充份發展和資產階級民主洗禮，故中國應補上資本主義這一點。

第二認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相比，資本主義是更為民主及經濟先進。

第三認為中華文化落後，是出現文革、不正之風及改革受阻之根源，故中國只有徹底否定自己文化，實行全盤西化，改革方能徹底。

第四認為馬克思主義在今天只起著禁錮人們思想的作用，故應該允許其他學派同馬克思主義平起平坐。（註二十七）

（2）學生亦對學校的生活環境表示不滿

據天津南開大學學生會會長白長虹指出，以南大為例，他進入大學時全校學生約五千人，四年後已增至八千人，但宿舍、食堂、後勤管理均未達到需要，造成同學對教學改革、生活管理方面的問題不滿，因而導致學潮產生。（註二十八）參與上海學潮的大學生也指出，大學裡大字報反映的包括有「食堂、浴室、醫務條件、獎學金、師範生地位待遇等經濟生活方面的要求，反映了同學要求以主人姿態參與學校管理的要求。」（註二十九）

（3）八六年政治寬鬆環境促使學生進一步爭取民主

除上述兩點社會經濟基礎等原因外，八六年開始的寬鬆氣氛而引發的開放大膽言論，如方勵之指出「民主是要靠爭取的」等，亦為學生帶來很大的鼓舞與刺激。此外，中共高層亦有一批對政治問題較為開放的開明派如胡耀邦及朱厚澤等，他們對一些後來被批評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言論持較開放態度，客觀上亦鼓勵了一些「出格」言論的發展。再者，世界民主性潮流亦有湧現的趨向，例如在菲律賓，代表人民力量的科拉桑在大選勝而迫使馬科斯出逃，海地獨裁政治被動搖等，皆對學生產生很大衝擊，使他們也有走出校園、以爭取進一步改革的傾向。

在分析學潮爆發時有一點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學生們在運動中主觀上表現出支持改革的願望，他們希望藉著自發的行動，以自下而上的方式配合官方的改革，達至徹底掃除種種經濟、政治及社會的困擾，並協助官方達至政制改革的目標。在一份題為《堅決支持鄧小平的改革》的文

章中，清楚地反映了同學的普遍心態：

「……我們從來也沒有打算與政府對立，因為我們與政府的根本目標是一致的，我們更深深感謝老一輩改革家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我們也知道，中國的改革還並沒有形成不可逆轉的機制，中國還有相當一批人特別是一批中下層的官僚在自覺地反對和阻礙改革，我們不願意我們的行動成為他們攻擊改革、抵制改革的藉口……我們不能讓矛盾再激化了，兩敗俱傷只能使漁翁得利。為了發洩心中的屈辱而對政府採取報復行動，則完全背離了我們的初衷而顯得有些可悲了。」(註三十一)

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亦指出：「……參加遊行的絕大多數學生是熱愛祖國，支持改革，願意為振興中華而努力。」(註三十一)

二 學潮經過及學生的要求

在中國官方推行政改及社會上言論開放的環境下，學生對社會的不滿遂在八六年十二月開始，通過上街示威的形式爆發出來。

十二月五日，合肥科技大學學生抗議省委操縱人民代表選舉，藉著紀念「一二九運動」五十一週年而走上街頭，參加是次游行的有科技大學、安徽大學及合肥工業大學等三千多名學生。

安徽的學生運動迅速蔓延至全國各地，武漢、廣州、昆明、深圳、上海及北京等地皆有學生走上街頭，其中以上海及北京的規模最大。上海的學運在十二月七日一篇提出〈科大在行動，我們怎麼辦〉的小字報開始，學生更希望在十二月十九日發動聯校大遊行。上海市長江澤民在十八日親臨交通大學與學生對話，但「會場十分混亂，只要講到馬列主義、社會主義、黨的領導，台下就是一片噓聲。」(註三十二)多達數萬的學生依照原定計劃上街遊行，造成交通擠塞，郵件運輸路線被打亂，甚至出現有人乘機搗毀汽車等事件。

十二月十日開始，北京各大專院校亦出現大字報介紹各地的學潮情

況。十二日，一份北大的小字報指出：「民主要靠自己爭取，北大在民主運動中不能走在前列，將愧於北大傳統和民主歷史。」(註三十三)雖然後來北京上街的學生數目沒有上海那麼多，然而相持的時間最久，後來更衝破了封鎖，衝進天安門廣場，引起輿論甚大的迴響。

八七年一月一日，警察對兩次衝破天安門廣場警戒線的學生採取行動，拘捕超過三十名示威者，後來由於副總理李鵬及北京大學校長丁石孫於一日晚致電公安局，要求釋放學生，警方的強硬行動才遭制止。(註三十四)

學生在八六、八七年的學潮中提出甚多的要求，歸納起來主要有如下幾點：

- (1) 學校的管理、教學、收費及膳宿問題之改革，主要是抑制物價、增加同學的福利、要求保障圈內外的治安秩序、保證學習用電、反對蠶食鯨吞學校土地、黨政分家、校黨委不再干預學生的活動以及學生會真正向同學負責等。
- (2) 針對基層人大代表選舉工作，要求採取直選方式，選舉真正順從民意的代表，。由於中國大專學生例行住校，故希望大專院校也劃為獨立選區，有權推薦人民代表等。
- (3) 要求政治改革，落實憲法中的公民權利。不少大字報提出應改革由國家以行政手段控制的新聞廣播制度，落實新聞自由，改革戶藉制度，取消侵犯個人私隱權的檔案制度，實現憲法規定的公民有言論、集會、結社、遊行、著作、出版等自由，改革選舉制度，以加速政制民主化等。

三 胡耀邦下台與官方對學運的控制

在全國學潮洶湧而來的背景下，鄧小平於十二月卅日召見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及李鵬等，批評他們未能平息學潮，並作出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指示。鄧的談話被整理為八七年中央第一號文件，其主要內容如下：

「學生鬧事，大事出不了，但看問題的性質是一件很重大的事……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那裡領導態度不堅決，旗幟不鮮明……是幾年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堅決的結果。」

「我看方勵之的講話，根本不像一個共產黨員的講話。這樣的人留在黨內幹甚麼，他不是勸退的問題，而是開除。」

「四項堅持必須講，人民民主專政也必須講，絕不能讓顛倒黑白、混淆是非、造謠惑眾的人暢通無阻，我們不是把魏京生抓起來了嗎？抓了就不放，並沒有影響中國的形象。」

「不能照搬資本主義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那一套……中國沒有共產黨領導，不搞社會主義是沒有前途的。」

「這次學生鬧事，民主黨派表現是好的……不好的倒是我們黨內，甚麼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

「波蘭領導人當時頭腦清醒，態度堅決，面對團結工會與教會勢力勾結，並得到西方世界支持的形勢，他們用軍事管制控制了局面，證明了沒專政手段不行。專政手段不僅要講，必要時還得要用，但要慎重。抓人要慎重，要少、避免流血，但如果他們製造流血，有甚麼辦法？我們的辦法是最好地揭露他們的陰謀。一個不死最好，寧可我們的人被打傷，也要把為首的人抓起來，要下決心，我們如後退，以後麻煩更多。」(註三十五)

八七年一月十日至十五日，黨中央召開了由政治局委員和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部分人員參加的「黨生活會議」，胡耀邦在會上檢討其領導工作的失誤，並提出辭去總書記的要求。在此次會議的醞釀下，政治局於一月十六日舉行擴大會議，胡耀邦首先作出檢討，然後與會者相繼發言批評他的錯誤，批評內容主要有「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態度不堅決，旗幟不鮮明，對自由化份子不僅不抵制，反而給予支持，更對反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消極抵制……胡耀邦的態度，使得有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的人更猖獗，到處演講、做報告，結果為學生鬧事提供了理論依據。」(大略)(註三十六)

通過對胡耀邦的批判，是次會議決定：一、接受胡辭去總書記的要求；二、推選趙紫陽代理中央總書記職務；三、以上兩項決定，提請下次中委會追認；四、保留胡耀邦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的委員職務。

在撤去胡耀邦的同時，中央亦推行多項措施，防止學運進一步擴大，這分別是：

(1) 由政權系統制定法規，防止延續的遊行示威行動

如人大常委會在八七年一月下旬通過〈關於加強法制教育維護安定團結的決定〉。而上海亦發佈〈關於集會、遊行管理暫行辦法〉，以較嚴格的申請程序制止學生的示威行動。

(2) 在中共黨內開展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並利用宣傳機器發出警告，以遏止黨員暗地裡支持脫離黨領導的社會運動。

在八六年十二月下旬開始，《人民日報》連續發表社論，如〈珍惜和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十二月廿三日)、〈政治體制改革只能在黨的領導下進行〉(十二月廿五日)、〈講民主不能離開四項基本原則〉(十二月廿九日)、〈大字報不受法律保護〉(十二月卅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搞好改革開放的根本保證〉(八七年一月一日)、及〈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八七年一月六日)等等。

另一方面，中共在黨內開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中央在一月廿八日發出〈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干問題的通知〉，明確指出：

「這場鬥爭，從總體上說，是對廣大黨員進行一次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全面、正確理解和貫徹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教育。……在學習中，要聯繫政治思想戰線的實際，正確分析和總結經驗教訓，切實改變軟弱混亂的狀況」，是次鬥爭「主要在政治思想領域內進行，著重解決根本政治原則和政治方向問題，即主要是反對企圖擺脫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道路的錯誤思潮。」(註三十七)

(3) 控制輿論，批評部分官員及開除部分黨內知識分子出黨

由於鄧小平曾大力批評黨內「領導上的軟弱」，而導致群眾認為「中央有個保護層，對是否堅持四項原則，是否要反對自由化，也有兩種意見。」^{註三十八}在鄧小平的批評下，除黨總書記胡耀邦下台，以及開除黨內知識分子方勵之、劉賓雁及王若望出黨外，在八七年一月下旬，中央宣佈成立直屬國務院的新聞出版局，對各種刊物加以控制。此外，主張製造寬鬆環境而導致八六年「言論假期」的中宣部長朱厚澤在二月下台，由被視為「思想警察」陣營的王忍之接任。八七年一、二月間，幾份曾刊登甚多開明言論的刊物如《深圳青年報》、《廣州現代日報》等被迫停辦，使社會形勢大為緊張。

八七年三月，中央紀律委員會列出十三名進行自由化活動的黨員名單，要求處理，但由於後來形勢的變化，在十三大前再呈現寬鬆的氣氛，故只處理了吳祖光、王若水、蘇紹智及張顯揚等四名黨內高級知識分子。

第四節 琢州會議與中央之反左

一 中央四號文件對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定出界限

八七年一月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開展，已引起海外華人、知識分子及投資者極大之震動及抗議，海外很多著名大學學者及中國海外留學生皆通過不同渠道聯署書信呈交中央領導人，對反資運動表示異議。此外，外國投資者亦對中國之穩定性產生疑問，不少投資項目被拖遲進行。

面對海外壓力，以及中央領導一向對反資運動持審慎態度，故中央在一月廿八日發出的中央四號文件——〈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干問題〉中，指出除要開展反資運動外，亦明確指出這場運動的界限，這分別包括如下幾點：

- (1) 「這場鬥爭嚴格限於黨內……不要聯繫經濟改革的政策、農村政策……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這場鬥爭不涉及民主黨派和黨外知識分子……」
- (2)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必須十分注意政策界限，這場鬥爭，要始終堅持以正面教育為主……需要在報刊上公開指名批評和作出組織處理的，只是極個別公開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屢教不改、影響很大的黨員……對這些人，仍要安排適當的工作，發揮他們的專長，尊重他們的公民權利。」
- (3)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必須採取正確的方法，不搞政治運動。要採取和風細雨、心平氣和、以理服人的方法，堅決避免過去那種以人劃線、上挂下連、層層檢查、人人過關以及號召揭發檢舉等『左』的錯誤做法。」(註三十九)

在中共中央通過四號文件後一天，代總書記趙紫陽發表春節團拜談話，表達四號文件的精神。他指出：

「有人擔心，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會不會又是一次政治運動，我代表中央負責地向大家說明，我們不搞政治運動……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要著重解決根本政治原則和政治方向問題。這項工作，嚴格限於中國共產黨內，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領域中進行，農村不搞，企業和機關進行正面教育……必須十分注意政策界限，不僅不傷害而且誠心誠意地團結大多數，包括在政治思想領域內從事工作的絕大多數同志在內。」(註四十)

二 強調意識形態幹部希望擴大反資運動與涿州會議之召開

雖然黨中央在一月下發了四號文件，但是一些強調意識形態純潔化的幹部，並不甘心讓這次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如八三年反精神污染般只經過廿八天便夭折，他們堅持用各種途徑突破四號文件及黨內開明

派的框框，希望在文化界打開缺口，從而擴展到經濟及其他領域，以圍剿大膽推行經濟改革的路線。他們認為：

「要反政治上的自由化就必須反對經濟上的自由化」，「現在反自由化，只反說自由化的，不反幹自由化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最深刻根源來自經濟領域」，(註四十一)「胡趙體制，批胡必批趙，不批趙就批不了胡。」(註四十二)

八七年二月，胡喬木授意策劃「批自由化」的一百篇文章題目，要在三年內陸續發表。四月上旬，鄧力群在天津發表講話，把一九七九年鄧小平掌權推行改革的歷史說成是「時好時壞，好壞參半。」在四、五月期間，中宣部某負責人更提出：「這一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三中全會以來的第二次撥亂反正。」把矛頭直指鄧小平的改革。(註四十三)

八七年四月六日到十二日，這些強調意識形態的幹部在河北涿州召開了兩報一刊座談會。《紅旗》雜誌總編輯熊復指出七九年以來的八年是「曲折的八年」、「資產階級自由化在各個領域向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衝擊」，「資產階級自由化最深刻的根源在經濟領域」(註四十四)。熊復更對當時正在形成的反對自由化的國內大氣氛感到鼓舞，並要求理論和文化界上的馬克思主義力量聯合起來，以推行自由化的鬥爭。他更把《人民日報》、《新華文摘》、《讀書》、《世界經濟導報》等多份刊物指為傳播自由化觀點的陣地。(註四十五)

中宣部副部長賀敬之更大量列舉文藝界自由化的種種現象，並號召與會者「拿起筆來，攜起手來迎接這次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嚴重挑戰。」而中宣部長王忍之亦表示「這個會開得很好！」(註四十六)並對大會的「革命氣氛、戰鬥氣氛」十分欣賞。會議更對鄧力群大加推舉，指他是「三中全會以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最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註四十七)

總的來說，在八七年這段期間，這些強調意識形態純潔化的幹部對改革開放持批判態度的有下列幾點：

- (1) 認為經濟形勢很糟，是經濟體制改革把經濟搞亂了；

- (2) 認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最深刻的根源來自經濟領域；
- (3) 把企業改革的承包租賃制看成是搞私有制，把廠長負責制看成是取消黨的領導，把農村改革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看成是破壞集體經濟基礎，並認為發展商品經濟就是幹資本主義，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根源。
- (4) 認為政治體制改革就是否定黨的領導，對黨政分開持懷疑態度，並藉口加強思想政治工作而要求擴大政治工作機構。
- (5) 強調對外開放是自由化泛濫的根源，並把對外政策說為「過去東倒，現在西歪。」(註四十八)

三 鄧小平、趙紫陽之反左

八七年四、五月，強調思想純潔之意識形態幹部的一系列行動，已為趙紫陽密切注視。在涿州會議後不久，趙紫陽命令其秘書鮑彤調走會議的全部錄音帶和會議簡報材料，並報告予鄧小平。

由於這些強調意識形態的幹部的討論及活動已觸及經濟改革，認為只有批判傾向西方及以市場化為導向的經濟改革方可徹底糾正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根源。對鄧小平來說，縱使他也否定旨在削弱黨領導的自由化浪潮，然而若任由批判的矛頭伸展至經濟領域，則將會危及其大力提倡之經濟改革路線。

當「第二次撥亂反正」的言論傳到鄧小平那裡時，他非常氣惱的說：「這是胡說八道，三中全會以來有什麼亂，反什麼正？」(註四十九)在此緊急關頭，鄧小平基於其一貫支持經濟要開放改革，而政治則要控制的思想下，果斷地否決了強調意識形態純潔化幹部的呼聲，並在其帶領下進行了一連串反左行動，而高潮則在八七年十月召開，以改革為基調的中共十三大。

- (1) 四月廿六日，鄧小平在會見捷克總理時提出：

「搞四個現代化，有『左』的干擾。我們黨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著重反對『左』，因為我們過去的錯誤就在於『左』。」(註五十)

(2) 四月三十日，鄧在會見西班牙副首相時更指出：

「這八九年的經歷證明，我們所做的事情是成功的。但不是說沒有干擾。幾十年『左』的思想糾正過來不容易，我們主要是反『左』，『左』已經形成了一種習慣勢力。現在中國反對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實行具體政策的時候，總容易出現有一點留戀過去的情況，習慣的東西就起作用……我們既有『左』的干擾，也有右的干擾，但最大的危險還是『左』。」(註五十一)

(3) 鄧小平在趙紫陽向其匯報工作時指出：

「去年發生的風波(指八六年底之學運)，不應該影響改革和開放，改革和開放不僅要堅持，而且要加快。」鄧更指示趙紫陽：「要開個會，組織寫一些文章，為改革做好宣傳工作。」在鄧小平明確的表態支持下，趙紫陽聯同楊尚昆、薄一波及胡啟立等起草了一個講話稿，在五月十三日「宣傳、理論、新聞、黨校幹部會議」上發表了著名反左的〈五一三講話〉。(註五十二)

趙紫陽的講話重點駁斥了自由化最深刻根源來自經濟領域等觀點，並正面指出社會主義初級階級論，重申改革、開放的重要性。趙強調：

「中央在四號文件中明確規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有明確的範圍，不要聯繫經濟改革的政策、農村政策以及其他等等」，「……試問，如果把現行政策說成是自由化，人心惶惶，生產不搞了，生意不做了，砍樹的砍樹，殺豬的殺豬，誰負這個責任？所以，所謂打破四號文件框框的論調，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言論，政治上是錯誤的，組織上也是違反紀律的。」(註五十三)

在鄧小平、趙紫陽及各中央領導人於四、五月間明確表態後，中國的傳媒又再呈現八七年一月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前的活潑開放氣氛，各大報刊紛紛發表支持改革開放的言論，例如：

1. 〈讓改革和建設張滿風帆〉八七年三月廿五日，《人民日報》社論
2. 〈改革開放不僅要堅持而且要加快〉八七年五月廿二日，《人民日報》社論
3. 〈中國經濟振興的出路在於改革〉八七年五月十八日，《經濟日報》評論員
4. 〈在開放的條件下〉八七年五月廿七日，《人民日報》評論員
5. 〈一靠教育 二靠改革〉八七年六月十二日，《人民日報》評論員
6. 〈改革要加快 理論要跟上〉八七年六月十三日，《人民日報》評論員
7. 〈把政治體制改革提到日程上來〉八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報》社論

以上文章只反映當時開放言論的一小部分，開放活躍的社會氣氛在八七年十月以改革為基調的十三大召開前後為高潮，直至八九年的六四事件為止。

九零年二月中旬，在八九年六四事件後，《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批判趙紫陽八七年的五一三談話，文章反映了代表著意識形態的幹部對趙紫陽反「左」的批判，文章指出：

「趙紫陽……在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三日的一個重要會議上的講話中，把思想文化界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下子改成為反「左」。從這以後，反自由化的大氣氛就來了個大逆轉……從反右突然轉向反左……」

「趙紫陽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後，陸續採取了一繫列當時和後來都證明給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以很大的鼓舞的組織措施，一些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人被包庇下來，鮑彤、陳一諮、嚴家其這樣一些人物得到提拔重用。」(註五十四)

註 釋

註 一 〈鄧小平在聽取經濟情況匯報時的談話〉載《堅持改革、開放、搞

- 活》，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第378頁
- 註二 鄧小平，〈改革政治體制，增強法制觀念〉載同註一，第380頁
- 註三 陳一諳，《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聯經出版社，一九九零年，第106頁
- 註四 同註三
- 註五 鄧小平，〈政治體制改革要有一個藍圖〉，同註一，第384頁
- 註六 同註三，第107頁
- 註七 《文匯報》 八六年八月八日
- 註八 張榮〈中共精神文明決議探秘〉《鏡報》月刊，一九八六年
- 註九 〈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載《鄧小平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137頁
- 註十 同註三，第105頁
- 註十一 〈胡耀邦同志在青海講話〉《人民日報》 八六年九月一日
- 註十二 《光明日報》 八六年四月十八日
- 註十三 林文〈政治體制改革與理論突破〉《鏡報》月刊，八六年十月
- 註十四 《人民日報》 八六年八月十五日
- 註十五 曾慧燕〈民主的辯論：萬里與方勵之對話實錄〉《新報》 一九八七年一月四日
- 註十六、註十七 《南方日報》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九日
- 註十八 方勵之〈知識份子和中國社會〉載《改革的呼聲》，集賢社，一九八八年第二輯，第12頁
- 註十九 《組織人事訊息報》 一九八六年十月九日
- 註二十 同註十八，第11頁
- 註二十一、註二十二 蘇紹智〈政治體制改革芻議〉載同註十八，第143頁
- 註二十三 同註十五
- 註二十四 同註十八
- 註二十五 《人民日報》 一九八六年八月廿三日
- 註二十六 船夫《十年學潮紀實》，北京出版社，一九九零年，第138頁
- 註二十七 同註二十六，第139頁
- 註二十八 《文匯報》 八七年一月十二日
- 註二十九 《明報》 八七年一月六日

- 註三十一 《明報》八七年一月四日
- 註三十二 同註二十六，第159頁
- 註三十三 同註二十六，第144-5頁
- 註三十四 同註二十六，第146頁
- 註三十五 香港《明報》八七年一月八日
- 註三十六 鄧小平〈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載同註九，第138頁
- 註三十七 張結鳳〈反自由化峰迴路轉〉《百姓》雜誌，一九八七年，138期
- 註三十八 〈中共中央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干問題的通知〉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第384頁
- 註三十九 同註三十四，第139頁
- 註四十 〈中共中央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干問題的通知〉載《十二大以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1253-5頁
- 註四十一 《大公報》一九八七年二月一日
- 註四十二 趙紫陽〈在宣傳、理論、新聞、黨校干部會議上的講話〉載同註三十九，第1406頁
- 註四十三 同註三，第111頁
- 註四十四 方文亮〈鄧趙聯手反左大揭秘〉《鏡報》月刊，八七年七月
- 註四十五 同註四十三
- 註四十六 《人民日報》一九九零年二月十四日
- 註四十七 同註四十三
- 註四十八 引自同註三十九，第1405-6頁
- 註四十九 同註四十三
- 註五十 《文匯報》八七年九月三日
- 註五十一 鄧小平〈吸取歷史經驗，防止錯誤傾向〉載同註一，第414-5
- 註五十二 同註四十三
- 註五十三 同註四十一，第1407頁
- 註五十四 同註四十六

第四十九章 改革的十三大——中央改革 措施與開放的人大、政協會 議（八七至八八年）

導 言

中國自從八四年開始便連續幾年(八四—八八年)發生經濟過熱，物價扶搖直上，嚴重影響民生。

與通脹及物價上升同時出現而令人民極端不滿的是官倒盛行。中國自從在八四年強調以市場化為導向的改革以來，經商熱潮便在大陸崛起，由於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雙軌制(計劃與市場並存)成為過渡期間無法避免的現象，由於計劃內的官價明顯地比市場價格低，一些掌權的不法官員，往往利用手中的財權及物資調配權，非法轉手倒賣，層層轉手加價，大發橫財，這不單導致市場流通領域混亂，更使已經上漲的物價火上加油。黨政官員這種利用改革空隙的腐敗現象引起市民強烈不滿，成為幾次學運的社會基礎，而在八九年更引發了一場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

在中共高層方面，在八七年初反自由化後鄧小平及趙紫陽等再強調全面改革開放。在十月召開的以改革為主題的中國共產黨十三次全國黨代表大會中，趙紫陽系統地提出「社會主義初階理論」，為全面深入改革奠定理論基礎。中國社會在八七至八九年又一次呈現寬鬆開放的氣氛，人民——尤其是知識分子及學生——亦在開放的環境中對經濟社會上各種不平現狀如通脹、黨風、官倒及教育經費不足等提出猛烈的批評。

經濟及社會危機與人民的不滿促使鄧小平及趙紫陽等高級領導人希望能儘快突破困局，他們提出勇闖物價關，藉著破斧沉舟的心態，希望通過一步到位的經濟改革，通過全面放開物價在短期內將經濟領域的雙軌制轉變為以價格調節為主的市場經濟。然而，中國當時投資、消費仍過度擴張，貨幣發行過多，通脹不單高據不下，還繼續上升。由於人民

對通脹的承擔力脆弱，價格改革遂引起軒然大波，人民預期物價會進一步上漲，因而瘋狂搶購，價格改革被迫停止。而中央領導人在面對經濟嚴峻的情況下，在八八年下旬決定對經濟進行更徹底的調整，是次以「治理整頓」為中心的調整進行了三年，一直推行至九二年春節鄧小平第二次南巡前後才正式結束。

這章將重點討論八七年的中共十三大，以開放見稱的八屆人大及政協會議以及幾項重要改革事項。下章則集中討論八八年中共的勇闖物價關以及失敗後隨之而來的治理整頓。

第一節 改革的十三大——人事組織與政策方針

在八七年十月召開的中共十三大的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兩項，第一是改組中共中央的領導班子；第二是闡明改革開放的理論、路線和方針。

一 十三大產生的中共中央領導班子

每五年召開一次的數千人出席的中共黨大會的主要功能是產生新的領導層，雖然根據黨章，新一屆的中央委員會由黨代表大會選舉產生，而新上任的中央委員則選出總書記、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成員。然而，由於人事權關乎不同派系的最重要方針利益，中國的實際情況是一些擁有威望實權的中共元老在黨大會前已通過互相協商，根據各派系的實力及社會需要，事先決定黨的名義最高領導層（總書記及政治局常委）。這情況在十三大雖無基本轉變，然而，由於中共高層勵志進行經濟及政治改革，促使十三大在選舉中央委員等方面實行了黨內首次的差額選舉，邁出了黨內民主重要的一步。

（1）鄧小平在人事方面的戰略部署

作為堅決推行中國改革開放的黨內最具有實力及威望的元老，鄧小平希望以團結的方針來平衡黨內不同派系在人事上的鬥爭，「鄧小平本人不

希望在中共十三大前政治局面出現動盪。他為了在十三大上取得一批政治老人的支持，把更多的年輕人推上政治舞台，甘願在一些問題上作出讓步。八月下旬，他不再提左是主要危險以及老化僵化問題……事實上，鄧小平現在承受的政治壓力是最大的，許多政治老人發難，都是繞過代總書記趙紫陽，直接到鄧小平面前叫陣的。鄧小平左右權衡，協調兩面，維繫著中共內部的安定團結。」^(註一)

另一點值得留意以及在中共政壇上史無前例的，是代總書記趙紫陽（趙於八六年底學運後兼任倒台的胡耀邦的總書記職務）三次提出希望繼續當國務院總理，不當總書記，箇中原因是趙感覺擔任總理可擁有實際的經濟決策及其他行政權力，並有龐大的政府架構落實其政策，而總書記則較著重意識形態的工作，而實際的人事任命權卻又由黨內其他元老安排。^(註二)針對趙紫陽的要求，「鄧小平說：如果一年換兩個總書記（指繼胡耀邦後趙紫陽任代總書記……）國際形象不好，總書記不動了，看來李鵬的爭議比較小，由李鵬擔任總理。」^(註三)

此外，鄧小平亦以「共同退出」的方式與一大批年紀較大的中共元老如陳雲、李先念等一起退出中央委員會，使中共領導層進一步向新老交替的方向前進。原來已半退的彭真、鄧穎超、徐向前及聶榮臻等完全退下來。而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則採取半退狀態，鄧小平留任中央軍委主席，陳雲改任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李先念由國家主席改任政協主席，這就是十三大確定的「三老半退、四老全退」的人事安排。

（2）黨內民主選舉與人事組織安排

為推行黨內民主改革，十三大對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等實行了候選人差額選舉辦法。在黨的歷史上，這是代表大會的代表們第一次有選擇的餘地。是次差額選舉令中外觸目的是強調意識形態的鄧力群落選，這顯示了黨內的人心背向，也反映了中共走向改革的大趨勢。

中共在十三大期間，民主氣氛較好、透明度也較高，會議期間幾乎天天都舉行記者招待會。此外，十三大更要求政治局常委向政治局、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定期報告工作；並增加中央委員會每年開會的次數，

使中委會更好地發揮集體決策的作用。

十三大基本實現了幹部年青化。根據黨章規定，十三大產生的中央委員會負責選舉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成員，選舉結果顯示，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及書記處的成員遠比上屆年青。趙紫陽當選為黨總書記，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及姚依林則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此五人成為新一代的領導核心。

是次會議雖然加快了黨內民主步伐，但由於中國社會及權力結構還沒有根本變動，中共由元老基本控制的局面還是保留下來，十三大後的第一次中央委員會（十三屆一中全會）作出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由鄧小平掌握。趙紫陽在十一月二日會見中外記者時明確表示：「今後還將就重大問題向鄧小平同志請教」。他說：「現在的中國領導人中間，無論是在職的還是退下來的，政治經驗和智慧還沒有一個人能比得上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決策人的地位和作用是經歷了歷史的考驗的」。（註四）

二 十三大的理論、政策與方針

鄧小平在十三大召開前曾鄭重指出「十三大實際上應該叫做改革、開放的大會，要加快改革步伐，深化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幾年前就提出來了，但過去把重點放在經濟體制改革上，這次才把政治體制改革提到議事日程上來」。（註五）

（1）「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

十三大在理論上最重要的貢獻是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這理論重點在於對改革的性質和目標進一步作出解釋。趙紫陽在會前致鄧小平的信中指出：

「確認中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是明確指出我們是社會主義，不能倒回去搞資本主義，全盤西化是害國害民的；二是明確指出我們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只能循序漸進，不能急於求成」。（註六）

確認社會主義初階，實為發展生產力，擺脫落後提出理論的根據。趙紫陽在十三大的報告〈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中明確指出：

「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是否有利於發展生產力，應該成為我們考慮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和檢驗一切工作的根本標準」。(註七)

趙紫陽進一步指出，在社會主義初階下，應確立下列指導方針：

1. 必須集中力量進行現代化建設；
2. 堅持全面改革；
3. 堅持全面開放；
4. 以公有制為主，大力發展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5. 以安定團結為前提，建設民主政治；
6. 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建設精神文明。

(2) 經濟體制改革理論

在強調生產力標準的方針鼓勵下，十三大進一步提出「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明確提出國家只以宏觀控制經濟的手段，如金融、財政等政策調節市場，而不參與個別企業的微觀決策，從而使企業改革及推行市場經濟在理論上邁向重要的一步。

(3) 政治體制改革

十三大強調政治體制改革的緊迫性和長期性，明確指出改革的長遠目標在於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備、富有效率、充滿活力的政治體制。至於短期的改革目標，在於建立有利提高效率、增強活力和調動積極性的領導體制，主要內容為：實行黨政職能分開；進一步下放權力；改革政府工作機構；改革幹部人事制度；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等等。

趙紫陽曾指出民主應從兩頭做起：

「一頭從黨內作起，從中央作起，中央從建立程序、制度、規則作

起……一頭從社會上作起，從基層作起。要保障基層民主，保障公民的民主權利，廣泛開展政治協商對話」。(註八)

雖然政治改革在十三大被鄭重地提上日程，然而，與過往的政改一樣，在執行方面卻是舉步為艱。基本的原因是權力調整觸動了既存勢力的切身利益，削弱他們的權力，舉例來說，黨政分家就必須撤銷部分黨組織或與政府對口的黨部門，以及撤換多餘的黨幹部，這樣馬上就遇到黨的這批幹部反對。

至於改革政府工作結構，同樣也遇上這樣的困難，每個部委都不願與其他部門合併，以免減低自己的權力範圍。在建立程序規則方面，正常運作時可依規則辦事，但在一些重要的緊急關頭或牽涉重大利益的情況下，中共的元老始終起極重大的影響力，程序章則會頓時失卻效力，一切仍然是遵照各握有實權的幹部之意見而發展。

第二節 十三大後中央的經濟發展及改革措施

一 實施沿海經濟發展戰略

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是趙紫陽提出並由黨中央於八八年三月召開十三屆二中全會確認的一項加快沿海地區經濟發展的決策。趙紫陽於八七年十一月兩次到華南沿海考察，寫成了「沿海地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的報告」，經鄧小平批示『完全贊成，放膽地幹』，並經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註九)

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的主要內容為：第一，充份利用國際產業結構調整帶來的有利時機，以及中國沿海地區勞動力資源豐富等多種優勢，在沿海地區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包括注重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第二，加工業實行兩頭在外，即把原料來源和產品銷售放到國際市場上去，大進大出；第三，鼓勵外商投資，大力發展外商獨資資經營、中外合資經營、中外合作經營的三資企業。

八七、八八年間，中央領導層的改革派提出沿海經濟發展戰略，實

有深刻的時代背景：

(1) 回應改革遇到的困境

在八四年中央提出全面經濟改革以來，中國便承受通脹的壓力，並在雙軌制下艱苦徘徊，無法突破以達到市場化的目標。當時一群中央的智囊向趙紫陽指出由於中國的發展和改革甚不平衡，根本不能設計出一套全面的改革方案，因此，他們認為應選擇一些重點，在一個一個的子系統中進行改革，以發揮出班疹效應。即是先是發展幾個點，而後連成面，最後擴展到全體，以這種試點方式進行改革。(註十)

由於沿海地區自七九年實行外向型經濟，得到明顯的效果，而開放程度大的廣東省最為成功，這些事實增強了決策者採取沿海發展策略的信心。

(2) 回應中國經濟在發展中面臨的挑戰

1. 物資短缺，原材料不足

中國沿海地區長期存在三缺——缺乏電力、用水和原材料。為了紓緩短缺困境，中共希望向海外尋找原材料，發展進口原料的加工工業。

2. 協助農村剩餘勞動力轉業

中國農村勞動力人口激增，而城市卻無法提供足夠就業機會安置過剩之農業人口。若中國可發展沿海勞動密集型企業，既可減輕勞力過剩，並可強化輕工業基礎，以及增強創匯能力。

3. 大陸沿海和內陸地區在經濟發展中矛盾增加，互相爭奪市場及原料。

中央認為解救之道在於加快實施外向型經濟，由沿海地區從外國進口原料，加工成產品後出售往海外市場，以舒緩與內陸地區爭奪市場、資源之情況。

（3）學術理論界的啟發

國家計委副研究員王建在八七年提出「國際大循環」之構思，促進了中央領導更加注視沿海經濟之發展。

王建的「國際大循環」理論認為農業與重工業之間有一種循環關係。認為發展重工業需要資金，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到非農業領域也需要資金，形成了爭奪資金的矛盾，而解決這個困境的出路在於「利用農業剩餘勞動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換取外匯，再用這些外匯購買設備和技術，發展重工業，從而溝通農業和重工業之間的循環關係，這就是國際大循環」。（註十一）

「國際大循環」理論一提出便受到各方面的重視和議論，持異議者認為這是過份理想的構思，因為外國不會拱手讓出市場，況且國際市場早已被其他眾多發展中國家佔領。此外，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及管理水平低，外貿、金融、價格等制度亦與國際規格脫離，要打入國際市場實非易事。而更根本的，是中國不能走四小龍倚靠外向經濟的道路，讓一個大國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受外國掌握。雖然如此，此戰略仍然受到各省市領導人的重視，他們迅速作出部署，制定各地區的發展戰略，務求加快改革步伐，盡快跳出舊體制，以國際市場為目標，加速地區經濟的發展。從後來的發展實況顯示，加強外貿，擴大出口等措施實是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的一條正確策略。

二 建立中央基本建設基金，改革投資體制

為解決固定資產投資被國家管得過死，故在過去的改革中，中央已把一般性的建設投資下放予企業及市場，但中央仍負責一些關係全局的重大和長期性的基建項目。當時面對的主要問題是中央資金來源不穩定，無法完成一些重點工程。為改變這情況，從一九八八年開始，決定就中央管理的基本建設推行基金制。即是將政府財政內的建設性預算收入，作為固定資金渠道，組成基本建設基金，實行專款專用，並與財政的其他部份分開。

這項改革有利於穩定投資資金的來源，約束各方面須嚴格根據資金的數量來安排建設項目，有利於控制資金需求的膨脹。(註十二)

三 改善物資管理和財政管理

改革開放以來，由國家統一分配調撥的產品數量已逐步減少。一九八八年，為了配合國務院的機構改革，中央決定進一步減少物資分配和管理的中間層次，將中央各個經濟部委的物資機構統一併入國家物資部。從此，由國家計劃分配的物資，直接由物資部分配到企業，這樣就實際削弱了各部門過往直接干預企業的經營運作之情況。

至於財政管理，國務院規定從八八年至九零年，在原定財政「包干」體制的基礎上，改進「包干」辦法，重點為在「包干」基礎上增加的收入，地方可以得到更多利益。新制度的目的是以中央的進一步讓利來刺激地方增加收入的積極性，其結果自然是中央財政收入佔全部財政收入的比重持續下降，因此，中央更缺乏財力支持全國性的重點項目。此新體制的另一缺點是地方為增加稅收而盲目發展價高利大的加工工業，和不肯支持基礎工業的發展，導致經濟結構更為失衡，而地方間之封鎖及市場割據等問題更為嚴重。(註十三)

四 分批進行住房制度配套改革

把職工的住房由企業分配的方法逐步改為企業增加職工工資，由職工通過房屋市場購買或租住房屋，使「住房」這個商品進入消品市場。

五 改革目標的連番更替

八七、八八年初另一件值得留意的經濟大事，就是中央決定經濟改革的目標由價格改革轉變為企業體制的改革。(尤其戲劇性的是，改革的重心在八八年四、五月又再一次偏向價格改革，這點在下章再評論。)從一九八七年起，由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推動的承包制迅速發展起來。八七年十月的十三大明確宣佈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是深化企業

改革，而完全沒有提及價格改革。八八年三月的人大總理工作報告中，雖然提到了要慎重進行農副產品和其他產品的價格改革，但深化企業體制改革仍是當時經濟改革的中心。

八八年三月，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李鐵映指出：「一九八八年，我國經濟工作總的指導方針是：經濟要進一步穩定，改革要進一步深化。全國經濟改革的主要任務是落實和完善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深化企業經營機制改革為重點」。（大略）（註十四）

第三節 八八年作風開放的人大、政協會議對中國時弊的猛烈批評

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政協會議於八八年三月分別召開。這是中國七九年改革開放後的政治傳統，即是由新組成的人大及政協落實剛召開的黨代表大會（十三大）的決議，以保證黨的決策由國家機關確認並具體執行。

全國人大選舉楊尚昆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萬里為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李鵬為國務院總理。而全國政協則選出李先念為主席。

由於七屆人大及政協是緊隨著以開放改革為主題的十三大而召開的一次人民代表大會及政協會議，故此兩個會議皆彌漫著活潑開放的氣氛，代表們暢所欲言，尖銳地針對社會不平狀況作出猛烈抨擊，為建國以來首見。代表們批評的事項包括下列幾個方面：

一 黨風問題

據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舉辦的首都知名人士「龍年展望民意調查」中，詢問「目前迫切需要解決哪些問題」，「共列出十六個方面，答卷居首位的是，黨風和社會風氣佔百分之七十點五」。（註十五）

浙江人大代表匡衍在人大上指出「當前存在的問題，要比（政府工作）報告中講的嚴重得多……大吃大喝，奢侈之風愈禁愈烈；索取回扣，行賄受賄、假冒詐騙盛行」。（註十六）

政協委員千家駒更指出「現在是循規蹈矩者清苦不堪；投機取巧、營私舞弊者生活優裕」，他更要求中共徹底拋棄刑不上大夫的政策。(註十七)

據光明日報八八年四月十二日題為〈政府要廉潔——七屆人大、政協會議側記〉的報導：「『越來越多的人看到，黨風不正，問題嚴重。』有人說：『我處理過一件案子，一一處理他的後台就出來，說這個同志不錯，給黨作過貢獻。他比你還厲害，訓你、罵你。』有人說：『現在似乎誰的官大，誰的真理就多。』有人說：『我們一些領導人談黨風都不滿意，但聯繫起自己就鬆勁了。有個單位，外商要給他賠償損失，單位領導人卻提出不要賠償，給奔馳車就行了。還有，買外國奶牛，提出要出國考察，對方說沒有經費；我方說，將奶牛價格提高，錢不就有了？』」

二 通脹與政府財政赤字問題

由於各地的基建規模過大，迫使中央發行過多貨幣，導致通貨膨脹。

北京市政協副主席關世雄指出：「當前大家普遍關心的是物價問題。今年物價比去年增長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今後，如果一些不必要的大工程還要上，基本建設還不收縮，物價就還會大幅度上漲」。

湖南師範大學教授劉筠亦指出：「我們對物價上漲的嚴重性估計不足，對由於物價上漲引起的人民的緊張心情估計不足……如不採取有效措施嚴格控制物價，必會影響社會安定。」

此外，由於中央政府在改革十多年間把財政權力及大部分政府收益下放予各省市，故其控制的財政資源逐年減少。然而，中央政府卻要應付眾多的開支，這就迫使其發行債券以彌補赤字，但這又引起很多地方的不滿，例如江西的人大代表指出：

「經濟工作急於求成的問題沒有解決，我認為財政形勢極為嚴峻，國庫券增加到九十億元。還要向地方借錢，江西這樣的窮省被借走了十個億。」(註十八)

三 教育危機

中國的教育是人大、政協們十分關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下列幾個方面：

(1) 教育經費嚴重不足

政協委員林宗彩曾舉出不同國家教育佔國民收入的比重：如美國佔百分之七點三，英國百分之六，蘇聯百分之八點六，印度百分之二點六，但中國只有百分之二點五六。(註十九)

由於教育支出偏低，各學校經費普遍嚴重不足，例如中國首屈一指的北京大學「每學期每個學生的實驗費僅夠買幾枝試管」(註二十)。該校教授朱德熙亦指出「高校經費除了直接用於教學外，還要用於補貼學生、解決教師的困難……不搞有償服務增加收入，學校就辦不去」(註二十一)。

(2) 挪用教育經費事件層出不窮

部分政府官員在安排財政支出的計劃時，往往先考慮基建工程，當一碰到災荒時，首先拿教育經費來救災，「某縣一所小學倒塌，只湊到修理費四十元，而縣教育局卻挪用一萬元教育經費為局長蓋了一座樓房。還有的學校花上萬元修校門，有的教育局挪用教育經費高級小轎車」(註二十二)。

基於教育經費不足，挪用教育經費又嚴重以及政府財政運用不合理等情況，在中國往往可見到學校危房倒塌壓死學生的慘劇，但另方面，豪華的黨政辦公樓、招待所和領導幹部的舒適住宅一批批地出現。(註二十三)湖南人大代表質詢：「上面口口聲聲財政困難，資金奇缺，可為什麼無錢辦教育，卻有錢買轎車……有些農村小學連一支粉筆都買不起，試問，一台奔馳車能買多少支粉筆？全國各地中小學危房倒塌消息四處傳來，為什麼領導幹部住房沒一所倒塌的？」(註二十四)

(3) 教師隊伍問題嚴重

這主要表現為教師的社會地位太低，工資待遇太低、住房條件及醫療條件太差等。據北京教師的代表符蘭指出：「在人少事多的狀況下，百分之八十以上中老年教師帶病工作，許多教師勞累早衰」^(註二十五)。

四 農民面對的困難

中國在八五年開始農業連年出現減產，李鵬總理在政府報告中亦指出，去年「糧食、生豬和其他一些農副產品的生產出現波動」，人大、政協的代表曾對此現象介紹了農民的順口溜：「高價化肥高價電，糧食、棉花價不變，農民靠什麼多貢獻」^(註二十六)。一語道破了農用生產資料價格昂貴影響農民生產積極性的狀況。

更令農民感到困難的，是由於化肥供應短缺，農民根本買不到化肥。化肥短缺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湖南省人大代表指出：「來京之前，農民盼望一定要解決化肥危機」^(註二十七)。基於農民的要求，湖南省人大代表寫了一個議案，要求和化肥部門對話。議案指出八七年六、七、八月，湖南發生二千多宗農民搶化肥事件，十七萬農民參加，死了十二人，傷八十多人，化肥短缺、農民反映多年但仍解決不了。農民拿錢買，買不到才搶。^(註二十八)

值得注意的，是代表們提出批評的，尤其牽涉城市人及學生的「永恆話題」如黨風、通漲及教育等，正是中國在八九年北京其他城市爆發大規模學運的原因之一。

註 釋

註一 和峰〈兩種力量過招，政壇相煎何急〉《鏡報》一九八七年十月

註二、三 陳一諮《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聯經出版社，一九九零年，第124頁

註四 蘇文敏《中共十三大與中國改革》，北京週報社，一九八七年，第3頁

註五 鄧小平〈關於召開黨的十三大的幾次談話〉

註六 何理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檔案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427頁

- 註 七 趙紫陽〈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第1至77頁
- 註 八 同註二，第117頁
- 註 九 《大公報》一九八八年三月一日
- 註 十 同註二，第133頁
- 註十一 《北京經濟日報》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 註十二 徐棟華、王亞平編著《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經濟簡史》，中國物資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230至231頁
- 註十三 同上註
- 註十四 《鴨綠江評論》一九八八年三月
- 註十五 《文匯報》一九八八年四月十九日
- 註十六 楊民青《中國大選舉》，湖南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19頁
- 註十七 新華社北京電 八八年四月二日
- 註十八 同註十六，第18頁
- 註十九 《人民日報》八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 註二十 《文匯報》八八年四月十四日
- 註二十一 新華社電 八八年三月三十日
- 註二十二 同上註
- 註二十三 《光明日報》八八年四月十二日
- 註二十四 同註十六，第19頁
- 註二十五 同註二十一
- 註二十六 新華社北京電 八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 註二十七 同註十六，第23頁
- 註二十八 《人民日報》八八年四月十六日

第五十章 勇闖物價關與治理整頓

第一節 八七、八八年經濟形勢及中央主導思想

為回應八四年投資與消費過熱，在八五年黨代表大會通過的「七五計劃建議」中提出，八六、八七年經濟工作重點為推行緊縮、抑制通脹及穩定經濟的「調整」政策。但經濟調整執行不到一年，由於生產迅速下降，引起地方政府恐慌，中央政府在企業及地方政府的壓力下，在八六年中旬提出「軟著陸」思想，放棄緊縮政策，放鬆銀行貸款，但這樣一來，通脹又進一步增加，一直延至八七年的秋季。

一九八七年九月，中央政府同時召開計劃會議和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會議，副總理姚依林分析八七年的經濟形勢，認為不穩定因素在增加。是次會議並決定把收緊財政和信貸、控制需求、穩定物價、保持經濟平衡和穩定發展作為八八年經濟工作的目標。而李鵬在出任代總理後，更明確提出「穩定經濟、深化改革」作為經濟工作的方針，李鵬並於八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的國務院全體會議上，提出八八年工作的五個「必須」：

「必須重視加強農業；必須進一步控制基本建設規模；必須進一步控制消費基金膨脹；必須做到財政收支和信貸收支的基本平衡；必須繼續防止追求過高速度的傾向。」

至於經濟體制改革方面，在當時社會需求過大、通脹持續等背景下，中央不敢推行價格改革，恐怕放開過往經人為壓低的價格會引起價格大幅上漲。故此八七年的改革重點是完善「企業經營承包責任制」，而在八八年三月七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亦提出以「深化企業體制改革」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

第二節 趙紫陽與李鵬的分歧與八八年中央經濟方針的轉變

穩定經濟的方針在八八年執行的過程中發生了變化，黨總書記趙紫

陽與總理李鵬就經濟形勢及發展方針出現了明顯的分歧。趙紫陽認為八七年經濟形勢相當好，批評有關部門將經濟形勢看得過於嚴重，他並不同意國家計委等部門提出物價上漲主要是因為總需求超過總供給，趙紫陽認為八七年物價上漲主要是蔬菜等副食品供應不足引起，與銀根鬆緊無關。堅持推行價格改革者更認為蔬菜與豬肉的生產之所以上去，主要原因是在價格改革上過份謹慎，調動不了農民的積極性。故此，應提高食品的收購價格，讓農民有利可圖，刺激生產。與此同時，政府決定改變以往通過人為壓低的產品「低銷售價格政策」。過往，為保持低銷售價格政策，政府要以大量財政補貼由於收購價高於銷售價而出現的虧損（這種情況叫做『暗補』），現時則改為將這部份購銷倒掛「暗補」的錢拿來補給市民，增加城市職工的工資，這樣既可安定民心，又可使銷售價格能反映成本。

趙紫陽於八七年十一月下旬，曾兩次到江蘇、浙江、上海和福建等地視察，發表講話，隱晦地批評李鵬等的謹慎、慎重主張。趙指出：

「在改革問題上，我們要謹慎、慎重。我們夠謹慎的了。小平同志多次向我們講，膽子要大一點，不要怕冒風險。如果老是猶豫來猶豫去，那麼甚麼事情也辦不成的，把時機都耽誤過去了。當然，我也不主張冒險主義，但該決斷的一定要決斷。」（大略）（註一）

八八年二月六日，趙紫陽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認為八七年全國生產、建設、流通和外貿的情況比較好，經濟生活中長期存在的某些不穩定因素正趨緩和，並主張以「改革總攬全局」。是次會議明顯突出趙紫陽與李鵬在判斷經濟形勢上的分歧。

二月十一日，《人民日報》在頭版發表一篇署名文章：「物價與形勢」，文章基本上完全採納趙紫陽的觀點，並分析八七年經濟統計數據，以及在天津、北京兩地經調查後提出的價格改革和加快發展的觀點。

文章指出：

「看形勢，不能不看物價，也不能只看物價……還要看價格結構。」

在價格不合理到可能危及農業這個基礎的時候，適當調整價格結構，雖然價格指數可能上升，不僅不會損害經濟穩定，還會促進經濟穩定。」文章又指稱：「一提到物價上漲，有的同志認為根本原因是總需求大於總供給，於是就用『抽緊銀根、控制需求』來解決問題」，……「解決物價上漲的根本出路是增加供給而不是抽緊銀根，抽緊銀根不但難以解決生活必需品的短缺和價格上漲問題，甚到可能不利於增加必需品的生產」。

在上述思想指導下，八八年開始推行的經濟政策實際改變了李鵬的穩定發展方針，並放鬆了對信貸及財政的控制，貸款規模迅速擴大。八八年六月底，各項貸款累計增加五百五十六億元，比上年同期多增三點五倍。由於貸款規模大幅增加，迫使中央銀行投放貨幣，通貨膨脹壓力遂不斷增加。

第三節 改革重點的轉變——勇闖物價關

在經濟發展政策轉向加速發展的同時，趙紫陽亦將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心由「企業改革」轉變到「物價改革」。八八年四、五月間（即相距李鵬在三月之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應以「企業改革」為重點只有個多月），以趙紫陽為首的中央領導層突然以幾種副食品價格的調升為契機，毅然決定推行「價格——工資」的配套改革，是項決定受到鄧小平大力支持。自始，中央領導人及輿論均大力提倡「勇闖物價關」。

四月八日，新華社發表一篇題為〈物價上漲的原因及平抑物價政策——首都經濟理論工作者的意見〉的文章，文章說：「我們宏觀政策的重點不應是穩定物價，不能片面強調穩定物價，要澄清把穩定物價與凍結物價等同起來的誤解，使人們能夠適應物價改革中的變動。」（註二）

五月十五日，鄧小平在會見阿根廷總統時說：「改革是有風險的，要迎著風浪進行就會有波折，甚至可能犯錯誤，我們要求避免大的錯誤。」（註三）

五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趙紫陽在講話中提到物價問題，表示對現有嚴峻形勢有足夠的心理準備。（註四）

五月十八日，鄧小平會見莫桑比克總統時，首次談到「物價上漲」問題，表示「改革不能停滯，停滯是沒有出路的。」（註五）

五月十九日，鄧小平會見朝鮮武裝力量部隊負責人時，系統地分析物價改革的重要性，他說：

「過去，物價都由國家規定。長期定得很低，……而城市銷售價格又不能高了，購銷價格倒掛，由國家補貼。一方面使農民生產積極性調動不起來，另一方面使國家背了一個很大的包袱。所以，不解決物價問題就不能放下包袱，輕裝前進。」他又說：「中國不是有一個『過五關斬六將』的關公故事嗎？我們可能比關公要過更多的『關』，斬更多的『將』。過一關很不容易，要擔很大風險。物價改革非搞不可，要迎著風險，迎著困難上……不要怕冒風險，膽子要大些。如果前怕狼後怕虎，就走不了路。」（註六）

五月廿四日，鄧小平會見美國大通銀行高級成員時說：「現在要過幾個險關，主要一個關是物價問題……現在要過物價關，就是最大的風險。」（註七）

五月卅日至六月一日，中共中央召開第九次政治局全體會議，會議認為：「目前我國改革進入了關鍵階段。隨著改革深化，現在一些難度很大而又不能繞開的問題擺在我們面前。國際和國內的實踐表明，改革的難題拖得越久，解決起來的難度越大。改革會有風險，但不進則退，退是沒有出路的。」會議還指出：「價格和工資制度改革需要有統盤的考慮和系統的方案。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要按價值規律辦事，理順原來很不合理的價格關係。」（大略）（註八）

六月三日，鄧小平會見「七十年代的中國與世界」國際會議的中外代表時，再次強調要不怕風險。（註九）

第四節 由「企業改革」轉變到「價格改革」的經濟原因

八八年中上旬，中央決定改革重點由「企業改革」轉變到「價格改革」，雖然有點出乎意料，但實際上也有深一層的原因：

一 承包制弊端湧現

八七年開始推行的企業承包制，希望通過權(利)、責(任)、利(益)關係的強化，盡速提高企業生產積極性，使企業能對市場訊息作出靈敏反應，為市場經濟體制構成良好的微觀基礎。

然而，由於承包制出現很多弊端，分別包括：

- (1) 企業(承包者)與政府(發包者)不斷討價還價，企業將主要精力放在與政府談判上，認為能向政府爭取到好條件比改善企業效率更重要。
- (2) 短期化傾向，即企業為在承包期內爭取到好成績，往往不注重企業長期發展及科研計劃。
- (3) 企業漲價衝動。
- (4) 約束與刺激不對稱，即企業只顧承包利益，而在面對經營困難時，只期望政府幫助或改變承包條件，而不著眼於企業內部潛力的發掘。

基於承包者未能協助企業達至完善經營機制的既定目標，故中央領導人遂傾向價格改革，以求經濟體制改革之突破。

二 價格「雙軌制」弊端嚴重

中國改革初期實行價格雙軌制，即在一種商品中計劃(即官價)與市場價格並存，以計劃價格計算價錢的商品主要供應給國營企業，而在中小企業及鄉鎮企業的交易中則以市場決定價格。

由於雙軌制容許自由價格的存在，故在改革初期有利於中小及鄉鎮

企業因應市場需要而生產，有利調動其積極性，並起了有效的配置有限資源的作用。然而，兩種價格存在亦出現很多弊端（這點在「十九年的經濟體制改革與經濟發展述評」一章中有詳細的論述），主要是官價與市場價格差幅過大，成為官倒溫床，只要有渠道拿到官價商品在市場上轉手出售，便能獲得極大利潤。此外，雙軌制亦不利企業公平競爭，對企業而言，只要能以官價購入原材料，產品成本就一定便宜，而在銷售產品方面，企業行為則剛好相反，希望壓低計劃出售比重（因為要以便宜的官價出售產品）而提高在自由市場的自銷比例。

總結而言，雙軌制使企業不能開展平等競爭，故政府為了締造一個公平的競爭性市場，就要推行價格改革，將雙軌制轉變為市場價格，以達兩價歸一之目的。

三 調整產業結構

由於價格結構不合理，市場信號失真，中國產業結構出現極大的失衡現象，例如生產消費品的加工工業過多（因價格開放），而農業及基礎工業則薄弱（因價格低）。故此，若不進行價格改革，以市場力量調配有限資源，從而達至矯正價格結構不合理的狀況，則不能調動各方面投資基礎產業及發展農業，並消除各地大量投資消費品加工工業的衝動。

四 價格改革並非導致通漲的原因

八七年中國放棄價格改革的一個原因，是害怕價格改革會帶來通漲，但放棄價格改革後，中國的通漲率仍高達百分之十，這即是說不推行價格改革也會產生高通漲，而價格體系卻依然不合理（有一失但無一得）。有此情況下，倒不如冒通漲的風險，推行價格改革，理順價格關係（有失也有一得）。（註十）

第五節 搶購風潮、價格改革失敗與嚴峻的經濟形勢

一 搶購風潮導致物價改革失敗

八八年五月三十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推行價格改革。會議後，價格改革步伐明顯加速，五月至七月全國先後開放了白糖、鮮蛋、大路菜和豬肉四類主要副食品的零售價格；五月以後全國彩色電視機實行浮動價格，國產的一般機型上升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七月並擴大了棉布、棉紗價格的浮動幅度，由百分之五至十擴大到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又放開了名酒名煙價，提高糧食、釀酒和部分高中檔卷煙的價格。此外有一些原由中央管理的工業品價格，在下放給地方管理後，而地方亦自行進行價格改革。（註十一）

八八年初，由於趙紫陽改變了李鵬穩定經濟的政策，放鬆了對信貸及財政的控制，經濟過熱又再湧現，通脹持續，一月為百分之九點五，三月達百分之十一點六。再加上放開物價為重點的物價改革措施出台，使物價升幅火上加油，六月達百分之十六點五，七月更上升到百分之十九點三。

八八年八月十五至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開全體會議，原則通過〈關於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儘管會議已看到經濟上的嚴重問題，提出要以強有力措施綜合治理通脹，厲行壓縮社會集團購買力等，但是次會議總的精神還是強調：「我國已進入全面改革的攻擊階段」，要勇敢闖關。（註十二）

一般老百姓由於多年受通脹困擾，對改革的心理和經濟承受力已降到極低點。此外，他們從實際經歷中認識到開放價格必引致價格上升，故為保值，他們對中央價格改革即的時反應是從銀行提出存款，搶購貨品：

搶購場面一：北京市前門某商店，櫃台上貨物已稀稀疏疏，倉庫裡積存了幾年的殘次洗衣機、電冰箱被顧客毫不猶豫地買走。

搶購場面二：北京市儲蓄所門前出現「人龍」等待提款，直至儲蓄所無錢支付才散去。

搶購場面三：黑龍江省七市四縣居民在搶購中消費結構出現畸型，如生活費支出比收入高百分之八點八；居民急欲拋出貨幣換成實物，造成提取存款比上年增加百分之十六；吃、穿、用的順序倒置，用的比重較上年大增。（註十三）

搶購場面四：在武漢，食鹽要漲價的傳聞蔓延到大街小巷，雖然街頭出現安定人心的標語，但鹽庫再滿也抵擋不住搶購潮。一位退休工人告訴記者：他算運氣，通過關係，已經買足了兩百公斤鹽，囤積在家裡。（註十四）

搶購場面五：在福州市，有人一次買了十台洗衣機和兩台電冰箱，還有人一次買了冰箱、空調和高級音響三大件。緊接著個人搶購潮的是企業生產部門對社會的「掃蕩」，某玻璃廠「在報紙上大登廣告，以『價格面議』為優惠，求購『二碼』，囤積了五千噸，以防日後之不測。（註十五）

在這次搶購風中，反映人們擔心今後人民幣購買力會減弱。

八八年的價格改革帶來價格全面大幅上升，市民不理會價格水平，盲目搶購以求保值，企業更無須改善效率和加強競爭而能輕易賣出劣質產品。在這情況下，原先期望價格改革能糾正過往比價失衡、以合理市場訊號（即價格）調配有限資源、刺激企業要通過競爭機制以改善效率等目的，因通脹的出現而完全落空。相反，社會更出現極大焦慮，銀行存款被擠兌，出現銀行大幅倒閉的金融危機。

八八年價格改革失敗原因，在於當時經濟根本過熱，就算不進行價格改革，通脹亦很嚴重，在這形勢下硬闖物價關，無疑火上加油，引發搶購。此外，價格改革涉及的商品太多，且升幅過大，而在宣傳工作中又不斷強調價格改革要攻擊閻關，呼籲老百姓要咬緊牙根，對承受力已很弱的老百姓來說，這類宣傳無疑加重他們對物價大幅上揚的恐懼，進一步促使他們搶購。

二 嚴峻的經濟形勢

物價是經濟運行的綜合反映。八八年的通脹，雖有推行價格改革具體措施失當的原因，但更為根本的，正如經濟學家劉國光指出的，是在經濟發展和改革兩個方面都「推行了一套急功近利、只求短期速效、從而損害我國經濟長遠利益的方針。」(註十六)具體來說，在經濟發展方面犯了脫離國情、超越國力、急於求成的老毛病，不顧實際條件而希望在短時期內能高速發展經濟，否定「穩定經濟」、循序漸進的發展方針。而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亦未能通盤計劃，在微觀層次上，企業的自我約束機制並未健全，而在宏觀層次上，調控機制亦未準備就緒，在這情況下推行價格改革，本身風險已很大，加上當時適值經濟高速增長、通脹嚴重的時刻，價格改革注定失敗。

一九八八年的經濟形勢是極為惡劣的：

- (1) 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膨脹，社會供求總量不平衡進一步加劇
- (2) 經濟結構性矛盾更加惡化

工業再次超高速增長，與能源、運輸矛盾加劇，能源運輸的滯後，成為工業生產的一大制約因素。更令中央領導人憂慮的，是在八八年未，糧食、棉花、食用植物油皆減產，庫存大幅下降，增加通脹的壓力。

- (3) 市場波動，物價上漲幅度過大。

受需求過大和各單位及地方攀比漲價等因素影響，八八年全年零售物價總水平比八七年上漲百分之十八點五，職工生活費用價格總指數更上漲百分之二十點七，為建國以來最高的漲幅。與此同時，生產資料價格亦急劇上升。物價升幅過大，加重了國家、企業及個人的負擔。(註十七)

- (4) 財政收支惡化，貨幣信貸投放過多

八八年全年財政收入雖有增加，但其增長幅度卻遠遠低於通脹，而

支出總額卻繼續高於收入，敗政赤字近八十億。（註十八）

受財政赤字和社會需求過大影響，銀行各項貸款激增，而城鄉居民的儲蓄率則明顯下降，貨幣形勢嚴峻。

（5）流通領域經濟秩序混亂

由於經濟開放的同時，政府並沒有制定嚴謹的法規，在無法制約的情況下，很多企業、部門、地方從局部利益出發而造出損害全局的行為，導致經濟秩序混亂。最令市民反感的是官倒行為，不少握有權力的人利用計劃與市場價格的價差，倒賣官價商品，圖取暴利；有的地方為增加外匯收入，不惜違法出口國內短缺原材料；有的為增加收入，大幅提高產品出廠價格；有的地方大搞保護主義，禁止外地產品進口，並限制本地區的資源外流，形成「諸候經濟」。

第六節 八八年的經濟調整——「治理環境，整頓秩序、深化改革」

面對惡劣的經濟形勢，關物價關的全面失敗，中共中央於八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召開十三屆三中全會全，確定了「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方針，從此中國經濟實際進入一次「調整」階段。（註十九）

「治理整頓」的政策與八八年初比較，明顯有兩大變化：第一，m 從加快改革步伐、加速經濟增幅轉為今明兩年以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為重點；第二，「價格改革」不能缺乏配套改革措施而孤軍直入，「企業改革」又重新被提上議事日程。

有評論指出，當時的主要負責官員是在八八年「大提款、大搶購、物價猛烈上漲的形勢下，是在大多數同志的堅持下，不得不同意治理整頓方針。」（註二十）在十三屆三中全會中，趙紫陽代表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呈交報告，指出「經濟生活中出現了明顯的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幅度過大。」他並指出：

「如果今年年初抓緊解決這個問題，就會更好一些。看來，我們還是見事遲了，抓得晚了。」(註二十一)

就價格改革問題，趙紫陽的報告間接承認闖物價關已失敗：「某些重要初級產品和原材料價格雙軌制不可能也不應當在短期內取消。」趙紫陽更指出：「明年物價上漲幅度必須明顯低於今年」，(註二十二)「能不能做到這一點，已成為對我們黨和政府的領導能力和駕馭局勢能力的考驗。人民現在就看這一條……這不僅是一個嚴重的經濟問題，而且已成為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註二十三)報告更針對投資規模過大的問題，一針見血的指出：

「教訓有兩條：上面的原因主要是手軟，抓得不實；下面的原因主要是本位主義作怪，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註二十四)

根據上述，會議對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深化改革等提出具體方針：

一 治理經濟環境

通過降低工業增長速度，壓縮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規模；控制消費基金過速增長，壓縮社會集團購買力；控制貨幣發行，辦好保值儲蓄；吸收社會游資、引導購買力分流等四大方法，務求能壓縮社會的總需求，控制通脹。

二 整頓經濟秩序

這主要是整頓在新舊體制轉換過程中出現的各種混亂現象：

- (1) 制住亂漲價風，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物價、財務及稅收檢查，制止非法哄抬物價行為。
- (2) 整頓公司，政企分開、官商分開、懲治官倒；
- (3) 確立重要產品的流通秩序，對緊缺的生產資料，要實行專營，對價格高搶購各種原料的風潮，必須停止；

- (4) 強化計劃、銀行、稅收、海關等部門職能，加強宏觀監督；
- (5) 制止各方面對企業的攤派和剝削。

八八年中國糧食減產，為解決糧食供應問題，趙紫陽嚴厲指出中央在全國各地的糧食儲備，必須服從中央的統一調度，他並警告：

「如果出現拒絕中央統一調度的無組織、無紀律行為，唯省委書記和省長是問。」(註二十五)

三 深化改革

會議提出經濟改革各環節必須相互配套地進行，價格改革不能孤軍深入，提出的改革包括如下方面：

- (1) 放慢價格改革步伐

趙紫陽在報告中指出「放開價格，實行市場調節，只能逐步進行」，並「要用五年或較多一點的時間初步理順價格」；

- (2) 重新強調企業改革，進一步推動政企分開，完善承包制，並逐步推行股份制；
- (3) 推進工資改革，解決收入不公問題，並以稅收作為收入的調節；
- (4) 推進一些對治理通脹有積極作用的改革，如加快出售公屋，以收回巨額資金；出售國有小企業產權；允許大中型國有企業發行股票，使市民的消費基金向企業集中而轉化為投資基金。

四 強調中央權威

八八年九月十二日，鄧小平在聽取回〈關於價格和工資改革初步方案〉匯報時曾反覆強調中央權威的重要性，他明確地指出：「中央要有權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須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中央定了措施，各地各部門就要堅決執行」(註二十六)

為堅決實行治理整頓，趙紫陽承認「治理經濟環境，不是一件輕鬆的事，需要忍受一定的痛苦，作出必要的犧牲。」他進而批評各顧各，

自行其是，「你有政策，我有對策」的有害全局的行動，並提出「對那些不顧大局、自行其是、目無組織、違反紀律的黨員幹部，必須嚴肅處理。」(註二十七)

第七節 治理整頓的推行

治理整頓的實質是中國在經歷經濟危機及結構比例失調後的一次「調整」。這次調整歷時三年，從八八年九月開始至九一年底，即鄧小平在九二年春南巡前後結束。治理整頓可粗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從八八年九月至八九年八月，中間經歷了震動中外的「六四事件」，這個階段的特點是通過大幅度控制需求，加強力度整頓流通領域，使經濟過熱情況迅速降溫，從而遏止通脹。在第二、第三階段，則在繼續壓抑通脹的同時，為回應第一階段緊縮經濟而引起的工業滑坡、銷售疲弱、企業破產及工人失業等情況而調整緊縮力度，並適當增加銀行貸款，啟動市場，使國內經濟恢復正常的增長速度。(第二、第三階段的治理整頓方針將在〈六四後中共領導層面對之危機及回應與經濟治理整頓政策〉一章中詳細討論)，這裡只集中討論治理整頓第一階段及其成果。

在八八年九月底的十三屆三中全會之前後的一個月，黨中央、國務院及其有關部委已就壓縮建設投資規模、制止亂漲價、穩定金融、治理流通環節及推行廉政建設等五大方面，制定了十五項具體政策，重點為：

一 壓抑社會總需求

八八年十月，國務院分別發出有關壓縮投資規模及從嚴控制社會集團購買力等多個通知，從抑制投資及消費兩個方面，控制社會需求。

在抑壓投資方面，主要是壓縮固定資產，尤其是預算外的投資規模，以扭轉過量投資帶動物價上升的局面。在消費方面，中央希望矯正延續多年的消費增長超過生產增長的現象，壓縮集團性消費，克服鋪張浪費，並嚴格控制各部門和企業發放工資及正常獎金以外的消費基金，

同時並改善工資和獎金的發放辦法，避免消費過高增長。

二 緩和通脹速度

為安撫民心，國務院在八月三十日發出〈關於做好當前物價工作和穩定市場的緊急通知〉，指出政治局第十次會議通過的價格工資改革方案，其中「少數重要商品和勞務價格由國家管理，絕大多數商品價格放開，由市場調節」，指的是五年或更長一些時間的長遠目標，而八九年作為五年改革方案的首年，價格改革步伐不會太快。(註二十八)

十月廿日，國務院再發出〈關於加強物價管理，嚴格控制物價上漲的決定〉，內容包括：

- (1) 穩定群眾基本必需用品的價格，恢復一些必需品由國家補貼、定量供應的辦法，以穩定糧食和食油的價格，並凍結公共與服務行業收費；
- (2) 制止農用生產資料亂漲價；
- (3) 嚴格執行計劃外重要生產資料的最高限價，對石油、銅、鋁、緊俏鋼材等實行統一經營，嚴禁倒賣；
- (4) 對已開放的工業消費品價格的提價，實行申報制度；
- (5) 整頓流通領域的價格，核定合理的購進銷售和批發零售差率，防止中間商謀取暴利，並取締中間剝削；
- (6) 嚴厲執行物價法紀，並搞好物價檢查；
- (7) 要保證八九年物價增幅低於八八年，並以此作為各部門及地方政府政績的主要考核指標。(註二十九)

三 穩定金融形勢

主要內容有兩個：首先是中央銀行抽緊銀根，控制貸款規模，並調整貸款結構，保證有足夠資金支持能生產市場需要商品的有效益企業，及支持政府對農副產品收購等，而對一些產品積壓、倒賣囤積物資及效益差的企業，則停止貸款。

其次是提高定期儲蓄存款利率及開辦長期保值儲蓄存款，對三至八年的儲蓄存款，保證存戶的存款收益不低於物價升幅，以吸引更多資金流回銀行，並達至引導購買力分流的目的。

第八節 中央加強「調整」力度與治理整頓的成效

一 經濟危機持續惡化

雖然上述緊急的措施到八八年底已取得一些成績，如銀行信貸規模得到控制、市民儲蓄回升、物價增幅有所放緩等。然而，由於不少幹部仍對治理整頓持觀望態度，所以固定資產投資仍有猛烈增幅，工業生產速度亦居高不下，市民消費仍然旺盛。更令中央領導層關注的，是由於中央銀行抽緊銀根，市場上資金短缺，不少企業為應付資金周轉困難，用各種名義以高利率向社會集資，而同時企業間相互拖欠和企業欠國家稅款的情況日趨嚴重。此外，企業為逃避銀行結算和監督，把一部分收入轉化為現金（不存入銀行），用以支付各項支出，增加了資金於銀行體制外的「體外循環」。由於企業於銀行存款減少，銀行大量到期的貸款又因為企業互相拖欠無法收回，以致銀行資金周轉出現危機，嚴重打擊銀行信用。

為緩解資金緊張，維護銀行信用，中央銀行被迫對各銀行增撥再貸款近三百億元，以改善銀行的支付能力，但這樣一來，中央銀行的貨幣投放則大幅增加。八八年一月至十一月，共投放貨幣五百七十五億，超出計劃高達一百七十五億，到十二月又增加投放一百多億元，全年的貨幣投放超過計劃百分之七十，比八七年增長百分之四十六點七，加劇了通貨膨脹。（註三十）

二 中央加強調整力度

為改善上述情況，並徹底推行調整措施，中央在十二月召開全國計劃會議及全國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會議，以及在八九年三月的七屆人大二

次會議中，提出種種進一步落實治理整頓的政策。

在十二月的全國計劃及經濟體制改革的聯合會議中，李鵬指出各地區及部門推行調整政策與中央提出的仍有不少差距，行動上的差距反映了認識上的分歧，李鵬形象地指出各地方官員的心態：

「有些同志怕速度降下來影響財政收入，日子不好過；有些同志捨不得辛苦上來的項目砍下來，怕影響後勁；有些同志總說自己情況特殊，強調你熱我不熱；還有些同志甚至抱著拖一拖、風就過去了的僥幸心理。」（註三十一）

針對不少地方及部門的官員游說中央不應以「一刀切」的態度削減投資項目，李鵬堅定的指出：

「有壓有保，那當然是對的。但是如果以不要『一刀切』為理由，不願意下決心壓縮自己地區和部門的投資規模，那就不對了。應當指出，區別對待，不搞『一刀切』，只能在『切一刀』的前提下來進行，如果各地區、各部門都強調自己的特殊情況，這也不能切，那也不能切，壓縮投資規模就會成為一句空話，投資結構也無法改善。」（註三十二）

「控制投資規模，這次必須動真的，要真砍、真壓……就是一些應該上的項目，甚至包括能源、交通和原材料工業在內，也要根據財力、物力的可能重新安排，有的也要停建緩建……我們力求少傷筋動骨，但要完全不傷筋動骨也不可能。」（註三十三）

國務院在八九年三月召開的第七屆人大二次會議中指出：「壓縮固定資產投資規模，是對壓縮社會總需求具有決定性影響的重大措施，是抑制通貨膨脹、穩定經濟全局的重要任務。」基於此，會議決定將八九年「全社會固定投資規模要比上年壓縮九百二十億元，減少百分之二十一。」（註三十四）

為實踐上述指示，李鵬重申要「堅決砍掉一大批在建項目……砍掉一大批樓堂館所和非生產性建設項目，還要停建一批生產性的建設項目」。（註三十五）與此同時，中央還決定下列三項重要措施：

第一為成立專門機構清理一大批在建項目；(註三十六)

第二為制定產業政策。國務院在八九年三月十五日作出〈關於當前產業政策要點的決定〉，「明確國民經濟各個領域中支持和限制的重點」，使各個經濟管理部門能按照中央訂定的產業序列去限制或鼓勵各個行業的發展。(註三十七)

是項產業政策的基本方向是「集中力量發展農業、能源、交通和原材料等基礎產業，加強能夠增加有效供給的產業，增強經濟發展的後勁；同時限制一般加工工業的發展，使它們同基礎產業的發展相協調。」(註三十八)

按照上述產業政策的序列，中央決定壓縮性能低下的普通電機產品、高電耗產品、國內緊缺原料生產的高消費品以及污染環境和浪費資源的產品。而在基本建設的領域，則壓縮經濟效益差及污染嚴重的小鋼鐵、小有色金屬、小煉油和小造紙廠等。

第三為減少銀行及非銀行金融機關的投資貸款。銀行貸款均實行指令性計劃管理，而對個體及城鄉集體，銀行更基本不給投資貸款。(註三十九)

三 治理整頓的初步成效

由於經濟調整方針及各措施逐步落實，治理整頓在八九年第三季度初見成效。

- (1) 據國家統計局指出，經過調整工作進一步開展，社會供求矛盾出現緩解出現了四個初步控制：
 1. 固定資產投資得到初步控制；
 2. 消費需求增長得到初步控制；
 3. 銀行貸款由於大力開展保值儲蓄、嚴格控制信貸和貨幣投放而得到控制，現金收支更明顯好轉；
 4. 物價漲幅逐步回落，通脹勢頭得到初步控制。(註四十)

- (2) 農業生產出現轉機，為全年農業尤其是糧食豐收打下基礎，八九年糧食更創歷史最高水平；(註四十一)
- (3) 工業速度逐步回落，市場銷售由熱轉平，工業內部結構好轉；(註四十二)
- (4) 市場秩序有所改善，偽劣商品、亂漲價和倒買倒賣現象減少。(註四十三)

雖然治理整頓成功達至經濟降溫，然而是次緊縮政策亦為八九年中下旬帶來市場銷售疲弱、工業生產大幅下降、企業虧損增加以及企業債務鏈(即企業互相拖欠的三角債)等問題。為防止經濟進一步滑坡，中共中央於八九年十一月召開十三屆五中全會，決定在堅持緊縮政策、控制通脹的同時，適當地調整緊縮力度，針對改善經濟結構而逐漸增加貸款及投資，啟動經濟，使經濟能穩步回升。有關治理整頓第二、第三階段的分析將於「六四後之危機與回應，以及經濟治理整頓政策（一九八九——一九九一）」一章中繼續討論。

註 釋

- 註 一 趙紫陽〈沿海地區經濟發展的戰略問題〉《人民日報》，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三日。
- 註 二 徐棣華、王亞平主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經濟簡史》一九七六——一九九一年，中國物資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234頁
- 註 三 李明主編《共和國歷程大寫真》(下卷)，檔案出版社，第1189頁
- 註四、五 同上註
- 註 六 鄧小平〈理順物價，加速改革〉(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九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262頁
- 註 七 同註三
- 註 八 同註二，第234-235頁
- 註 九 同註三，第1190頁
- 註 十 馬劍、宋建著《走出迷宮》，學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46-47頁
- 註十一 同註二，第235頁

- 註十二 同註二，第235-236頁
- 註十三 同註十，第 55頁
- 註十四 同註三，第1188頁
- 註十五 同上，第 1184頁
- 註十六 劉國光著〈改革·穩定·發展——穩中求進的改革與發展戰略〉經濟管理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139-140頁
- 註十七 國家統計局編著《八十年代的中國經濟——來自國家統計局的報告》，中國統計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 112頁
- 註十八 同註二，第238頁
- 註十九 薛暮橋《八七年代的中國經濟》，經濟管理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 90頁
- 註二十 同註十六，第141頁
- 註二十一 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 註二十二 同上註
- 註二十三 同上註
- 註二十四 同上註
- 註二十五 同上註
- 註二十六 〈中央要有權威〉(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二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277頁
- 註二十七 同註二十一
- 註二十八 同註二，第244頁
- 註二十九 〈國務院關於加強物價管理，嚴格控制物價上漲的決定(摘要)〉(新華社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公佈)
- 註三十 同註二，第 248頁
- 註三十一 李鵬《在全國計劃會議全國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五日)
- 註三十二 同上註
- 註三十三 同上註
- 註三十四 〈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日)

註三十五 同上註

註三十六 同註二，第249頁

註三十七 〈國務院關於當前產業政策要點的決定〉（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五日）

註三十八 同上註

註三十九 同註二，第250頁

註四十 同註十七，第128頁

註四十一 同註二，第252頁

註四十二 同註二，第253-254頁

註四十三 同註十七，第128頁

第五十一章 八九民運與六四事件

導 言——八九民運與六四事件的癥結

持續兩個多月的民間民主運動終於在八九年六月四日遭官方強力取締而終結。日趨開放的中國政權以高壓手段結束民運，令許多中國問題專家詫異。六四事件亦導致趙紫陽下台，使中共高層內部鬥爭展視於世。

六四事件使海外輿論對中國政權十分失望，不少人估計中共政權會於短期內崩潰，八九年下旬東歐各國共黨跨台更促使評論家認為中共跨台的預測將成為事實。然而，面臨各項危機，中共高層仍能堅持經濟建設為主的方針，維持政局穩定。

從宏觀歷史角度分析，官方與學生對於自發、向中共要求分權的民間運動有著截然不同的立場，雙方衝突加深，從而導致武力鎮壓。

從學生及其支持者來說，通過政治運動成立「一個能以相對於政府的反對團體」^(註一)或「壓力集團」^(註二)，最終成立反對黨，推行西方式多黨政治，乃是落實中國政治改革，順應社會發展及世界民主潮流的必然趨勢，他們相信這亦是深化經濟改革而需要政治體制改革配合的自然現象。成立民間、獨立於黨控制的民間制衡力量，更能協助政府反腐敗、懲治官倒及貪污，有利社會長期穩定及經濟建設。民運人士認為假如政府阻礙民主運動及阻止民間組織壓力集團，乃是為維護政府的既得利益，是違反民主潮流的行徑，必須加以反對。

相反，從官方立場來說，政治改革必須由政府穩步地推行，民間的政治運動只能令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所產生的各項危機惡化，壓力團體及反對黨帶來的連綿黨爭將導致社會政局混亂，失控的局勢會使國策偏離經濟建設的中心。外國政府對民運的支持亦只是西方國家意圖將中國融入國際資本主義體系，目的在於迫使中國無限制的開放市場供其剝削。中國政府希望學習亞洲、南美洲國家以強權政治、新權威主義^(註三)發展經濟的模式與經驗，維持國家穩定，盡速加快建設，而在這基礎上逐

步開展穩妥的民主改革。在這理念下，自然對自發的民運採取敵視態度。

對於八九民運，官方將其定性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並與四個堅持（核心為堅持黨的領導）相對立，民運人士則認為是專政獨裁與民主的鬥爭。由於雙方對自發性民間運動的根本性分歧，矛盾只會隨著眾多偶然突發的個別事件而加劇、升級，加上學運領袖未能控制學潮及官方的強硬態度，最終導致武力鎮壓。

這章主要討論八九民運出現的原因，過程與轉折、影響、教訓及評價等。

第一節 八九民運爆發及六四事件的社會、經濟及政治原因

一 八四年改革深化後伴隨而來的經濟、社會危機——表面原因

中國自八五年開展更深層次之改革以來，遇到更大的障礙，不同集團的本位利益衝突驟增，有人得益，但亦有人失利，中央與地方、沿海與內陸、以及社會各階層皆在改革進程中出現矛盾。此外，在改革政策方面，過渡性改革策略如放權讓利及雙軌制等亦帶來投資衝動、高通脹、官倒、貪污及收入不均，加深普遍市民的不滿。更重要的，是中共高層在文革後以改革和經濟建設的成就來鞏固政權之權威及合法性，官方提出宏偉目標，強化改革優點，低估改革過程中的風險及波折，給予市民過高的憧憬與期望。故當改革一旦遇上困擾，如通脹及失業等，市民便會對政府產生怨憤，形成八九民運的經濟社會基礎。

群眾的不滿，可分為對社會經濟狀況與政策兩方面。在社經狀況方面，可參考八八年底全國百多名新聞工作者組成的新聞觀察網座談會投票選出的十大難題，這些難題分別是控制物價、為政清廉、糧食生產、教育、控制基建規模、新聞改革、控制人口、治安、法制建設及樹立政府權威等（註四）。八九年三月，共青團對北京青年工人的思想調查中，發

覺他們的關注點依序為：腐敗、分配不公、個人成長、企業發展及物價上漲，他們並把腐敗看成萬惡之源，是全部社會問題出現的癥結。(註五)

政策層面方面，不少人對改革進程及策略不滿，認為政府未能根治通脹、反特權以及處理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

然而，值得留意的，是改革初期至六四事件後，中共高層也與老百姓一樣，同樣對上述各項經濟社會問題甚為關注，並希望加以改善。中共發言人袁木於八九年四月底與學生對話時指出：「同學們……希望推進民主化……懲治貪污，希望克服腐敗，這些同黨和政府的願望是完全一致的」。(註六)鄧小平也指出：「學生不過是提出繼續進行改革的要求，而我們是真幹。這樣就合拍了，隔閡就自然消除了。」(註七)可以說，完善改革、加速經濟建設及消除貪污等乃是人民與政府的共同願望。故此，雖然嚴重的社會經濟危機會觸發群眾的示威行動，但這卻只是八九民運的一個表層原因。

二 民間力量興起與一黨專政、政治參與管道不暢的矛盾——深層原因

隨著改革開放，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已面臨經濟社會多元化而帶來必然性之參政壓力。可以說政治上的一元化與民間社會多元化之矛盾上升，乃是構成八九民運的深層原因。

改革十年，不單傳入西方民主、自由及法治觀念，知識理論界亦空前活躍。隨著經濟權力大量下放及各項社經改革措施，更使個體戶、企業家及中產階級逐漸冒起，參政期望日高，不少學者如湯一介及方勵之等皆希望企業家能成為中國的新生力量，同先進的知識分子集團結合起來，從而使企業家階層變成中國民主運動的經濟基礎向政府施加壓力，為爭取民主而鬥爭。(註八)

一個落後的農業大國，在邁向現代化過程中出現多元化，知識分子以批判性面孔出現，而與有經濟自立能力的民營企業家結合，可說是眾多發展中國家如台灣、南韓、香港、菲律賓、泰國、甚至星加坡等的共

同經驗。正如方勵之指出：「在文明社會裡，知識分子越來越佔主導作用，應該認識到自己對社會負有責任感……有了知識，就要對社會干預、介入」^(註九)至於民營企業家方面，他們作為改革開放的既得利益者，對衝破各個領域的禁地往往表現得較為開放，並願意支持民間自發的文化學術及教育活動。由於經改使知識分子逐步在經濟生活層次擺脫中共之控制，再加上民營企業家的支持，不少民辦學術機構如「北京社會科學研究所」等得以逐漸成立，同時，社會上亦出現很多民辦及思想開放的刊物，如《世界經濟導報》及《經濟學周報》等。

由於民間力量逐步解放，「民間社會」漸具規模，其參政之期望自然日益高漲，這點中共領導人也十分清楚。鄧小平於六四事件後曾指出：

「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註十)

面對社會多元化趨勢而形成的參與壓力，中國官方卻缺乏足夠的政治參與渠道，讓群眾通過制度化的程序參與政務並向政府表達意見。更嚴重的是官方始終強調黨的一元化領導，對社會上脫離其控制、有組織之自發團體採取極其保留的態度，恐怕其自由發展會構成一種對社會不穩定的因素，影響改革的進行。基於此，當八九學運初期學生衝擊正統學生會，「希望學生自治聯合會能獲得合法地位，成為一個能相對於政府的反對團體」，^(註十一)以及工人成立自治聯會時，官方基於波蘭經驗不肯接受。

從政府立場來說，為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可以大搞權力下放。隨著改革深化、外國思潮傳入及多元化局面湧現，可以容許社會上有較寬鬆的氣氛，並接受各類會議、報刊雜誌較尖銳的評論。正如方勵之在八六年底說：

「說是社會進步太慢。不過仔細想想，現在又的確有很多與從前不同了……用順口溜說就是『東風吹、戰鼓擂，現在誰也不怕誰』」，「有的東西是你不去做，你真去做了就會發覺他也不敢怎麼樣」，「我在北京大學點名

批評北京副市長張百發，找了一通麻煩，不過現在誰也不敢怎麼誰了。」「我在記者招待會上點名批評了胡喬木，也沒把我怎麼樣嘛！」(註十二)

如方勵之所指，政府寬鬆度的確擴大，但假若民運人士希望組成壓力團體，繼而發展為反對黨，並推行西方式的多黨制政治制度，與中共爭奪中國政府的領導權，中產國共黨則肯定反對，然而這正是民運領袖的期望。方勵之曾指出：

「大陸知識分子爭取民主的長期目標是多黨制的民主制度，近程的目標是實現必要人權，爭取言論、思想、新聞等自由。」(註十三)劉賓雁亦指出：「用多黨並存的民主制代替一黨獨裁。」(註十四)

雖然多黨制是西方政治一個普遍模式，但中共高層則對之極為排斥，鄧小平指出：

「如果我們十億人搞多黨競選，一定會出現『文化大革命』那樣『全面內戰』的混亂局面。」「如果再亂，亂到黨不起作用了……這一派抓一部分軍隊，那一派抓一部分軍隊，這是個內戰的局面。一些所謂民主鬥士只要一拿到權力，他們之間就會打起來……血流成河，還談何『人權』？」(註十五)正如民運理論家王軍濤指出：「鄧小平的政治目標有三個要素：一是穩定、二是效率、三才是民主。這與西方政治學家評價不發達國家的政治指標頗為相似。」(註十六)

由於官方與民間對壓力團體及多黨制等問題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在雙方堅持原則、互不退讓之情況下，嚴重的衝突已是在所難免。

三 中共高層對學運的不同理解與權力鬥爭，以及學潮的失控

導致六四事件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乃是中共高層對民運性質觀點的分歧。趙紫陽主要智囊陳一諾曾分析：「八九民主運動中，自始至終貫穿了兩方面的鬥爭，一方面是群眾愛國民主運動與李鵬一夥的公開鬥

爭，另一方面是黨內改革力量與李鵬一夥的黨內鬥爭。」^(註十七)中共元老楊尚昆亦曾指出，「這件事發生在學生裡頭，但根子是在黨內。就是說政治局常委有兩個聲音……兩個司令部。」^(註十八)黨內意見分歧，不單延誤解決學運時機，更使雙方無法以妥協方針解決問題，最終帶來武力取締的悲劇。

黨內強硬派認為學生反腐化、加快改革的愛國精神為敵對分子所利用，全國各地皆出現示威、「大字報滿天飛，開始串連」，「提出取消黨的領導，現在成立這樣那樣的組織，奪合法組織的權」，^(註十九)其目的就是先搞壓力集團，繼而成立反對黨，「就是要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註二十)既然如此，他們便將是次學運定性為動亂。

在另一方面，以趙紫陽為首的溫和派縱使亦承認有「極少數人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利用學潮混水摸魚、製造事端，攻擊黨和社會主義」，但他們認為應把這些人與「廣大青年學生和社會上很多同情者……嚴格區別開來」，「避免把整個學潮籠統地作一個敵我矛盾性質的定性」^(註二十一)基於此，趙紫陽不贊成將學運定性為動亂，並建議盡量採取疏導方針，避免激化矛盾，以平息事態。

其實趙紫陽的疏導方針曾經被鄧小平接納，而成為八九年五月首兩個星期之最高政策，但趙紫陽和平解決學潮的方針由於得不到學生支持以及戈爾巴喬夫訪華引發的學生絕食而徹底失敗。整個六四事件，可以清楚看到中共有三個階段的對策變轉。第一個階段是強硬派的高壓手段和「四·二六」社論，但它卻引致四月廿七日的大遊行。

第二個階段為強硬派在未能平息事態後，由趙紫陽以疏導方針接手。鄧小平曾對趙說：「你們最重要的事情是穩定局勢，只要能穩定，就不要管我講過甚麼，你的主意行得通，就照你的辦。」^(註二十二)趙遂發表五四溫和講話，學生復課，但不料只過了一周，學生又利用戈爾巴喬夫訪華，全世界傳媒雲集北京的機會絕食以對政府加壓。在學生絕食期間，最同情學生的改革派高幹閻明復於五月十四日熱淚盈眶的苦勸同學：「如果你們一定要把黨中央分派，那你們的行動將很不利改革派，紫陽同志的意圖將很難實施。」^(註二十三)閻在絕望之際，不得已的把黨內

分歧向學生洩露，希望他們能顧全大局，停止絕食，使趙紫陽的疏導方針能持續為黨內主流，然而，閻善意的建議不為學生接受，遂使趙紫陽溫和方針完全失效。

在高壓和疏導兩政策皆不能奏效情況下，中央遂決定於十九日戒嚴，但卻仍沒有成效，市民照樣上街示威，天安門仍然被佔，軍隊無法入城而造成軍威受損，「埋下深刻的軍民矛盾」。^(註二十四)情況持續兩星期後，中共決定以強大軍力清理廣場，造成六四事件的悲劇。

從五月十九日戒嚴前後到六四期間，官方及民間的內部皆出現某程度之分裂，新增的矛盾使危機加劇。在政府內部方面，政府根本無法認真執行戒嚴令，同時亦出現了軍方高層不同意見，七位軍方元老要求軍隊不要進城，^(註二十五)楊尚昆亦提出：「我想大軍區一級的同志沒有問題，但軍以下會不會有人有問題呢？」「不執行命令，我要以軍法論處。」^(註二十六)此外，當時盛傳駐守北京的三十八軍對戒嚴令有抗拒之態度，而軍方出現分歧使強硬派大為緊張。此外，五月廿五日更有五十多名人大常委聯合要求召開人大，以討論當時一觸即發的形勢，上層的分歧促使強硬派加速調派軍隊的步伐，形勢更為緊張。

學生方面，自五月十三日絕食開始，便越來越激進，情緒亢奮，將多次光榮撤退、贏取勝利、保留力量的機會輕易放過，學生內只要有不同意見，結果一定是激進者佔盡上風。吾爾開希曾指出：「廣場上現在並不是少數服從多數，而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服從百分之零點一，如果有一個絕食的同學不離開廣場，廣場上的其他幾千個絕食學生也不會離開。」^(註二十七)在此情況下，不少希望堅持有節有理、較重視運動策略的學運領袖被辱罵為學賊，只要提出要同學撤離便有被即時罷免的危機，強硬派學運首領甚至說過這樣一段話：「同學們不斷問我，我們下一步是甚麼。我不能告訴他們：下一步是流血。唯有血洗天安門，整個中國人民才能被喚醒。」^(註二十八)作家遠志明在總結六四教訓的座談會上亦指出：「……最後學生堅持的立場是甚麼呢？是賭氣兒，學生說：『我們不能撤，我們撤出去就等於我們失敗了。』一開始堅持的東西都不重要了，剩下的只是面子。」^(註二十九)研究鄧小平的專家韓文甫曾一針見血的指

出：「學生雖然口口聲說，不讓學運被中共黨內鬥爭利用，結果不被改革派利用偏偏卻被保守派反面利用了，而且被利用了還不自知。」

由於強硬派為防止部分軍隊出現可能之事變，並要迅速回復北京的穩定及秩序而加派大軍圍城，學生方面亦持強硬態度，雙方矛盾加劇，在無法妥協情況下，六四慘劇終於出現了。

四 眾多歷史偶發因素，加促危機深化

由於民運人士及官方對自發性組成壓力團體的立場完全對立，雙方皆會借助個別偶發性的事件加以發揮，向對方施加壓力，以達至目的。在六四鎮壓後，雙方皆批評對方有意激起矛盾，製造事端，為「推翻政府」或「殘酷鎮壓」製造藉口。

八九年間個別歷史偶發事件很多，八九年本身就是一個令人興奮的年份，它是法國大革命二百週年、五四運動七十週年、建國四十週年、魏京生被捕和北京之春運動十週年及世界人權宣言發表四十週年等。此外，其他偶發事件有美國總統布殊到訪引來方勵之赴宴的外交風波；胡耀邦之死；在學運初期關鍵時刻趙紫陽、萬里出國；五月戈爾巴喬夫訪華；中共在五月十九日頒佈戒嚴令後竟無法執行戒嚴令，以致局勢更加失控；甚至中共在鎮壓時缺乏防暴裝置及水炮等可笑可悲現象。以上事件起著催化作用，終於釀成六四慘劇。

第二節 八九民運的幾個重要階段簡介

八九年中國民運，可追溯至年初知識分子簽名事件，於五月十三日因戈爾巴喬夫訪華，學生絕食，而達關鍵點，最後以政府武力清理天安門廣場為終結，其間經歷數次起伏，其過程可大略分為幾個主要階段。

一 酝釀期——山雨欲來風滿樓

八九年本身是一個充滿動感的年份，它是眾多重大運動及節日的周年紀念日子。政府高層與民間知識分子及學生，皆能敏銳地意識到此年

份的爆炸性，紀念民主的活動較容易發展成為市民宣洩對現實生活的不滿，以及爭取自由民主的群眾運動。

隨著經濟改革開放；西方思潮傳入；社會各種新階層如個體戶、企業家的興起；政府上層的政治開放改革氣氛如八六年下旬的言論假期、八八年氣氛空前活躍的人大政協會議、以及政治改革提上議事日程等等，皆自然地鼓舞著民間知識分子進一步提高其政治參與期望，冀能締造一個獨立於黨控制的民間社會，保證人權、言論及新聞等自由能真正確立。早在八八年下旬開始，知識分子如方勵之、金觀濤及任畹町等紛紛舉辦及參與各種研討會，並發表文章，批評現行制度，提出政治改革理想。

敏感的時刻終於來臨，八九年一月，方勵之致函鄧小平，促請他大赦十年前被捕的魏京生，並釋放所有政治犯，揭開八九年民主運動之序幕。呼應著世界的民主潮流，以及對中國政治將進一步開放的期望，在八九年二、三月間，多批著名文化界人士、第一流的自然科學家、以及社會科學學者等，分別聯名上書中共高層，支持特赦的建議，要求釋放政治犯及進行政制改革。

與此同時，北京各大專院校皆出現各式各樣的研討會及演講會，在抒發對民主的訴求時，尖銳、偏激，甚至出格言論的湧現已屬無可避免，部分言論批評中共的政治為空談、強權、獨裁及武斷，更有部分學生傾向黨內分派及西方式的多黨制，而廢除四項原則等主張亦再出現。

民間如雨後春筍般之自發行動，與政府期望有秩序、在可控情況下推行改革自然出現矛盾，形勢開始緊張。一月廿八日，方勵之在一個新啟蒙沙龍活動中說：「這類集會『對當局採取……徹底批判的態度』，『火藥味很濃』，『連開三次就要上街了』。」^(註三十)政府方面，中共中央宣傳部於一月下旬舉辦由各主要傳媒負責人出席的座談會中^(註三十一)，強調要防止有人藉紀念五四運動、宣揚全盤西化、新救亡運動、多黨制及私有化等思想，會議並審慎部署各項輿論策略，以引導將洶湧而來的民間思潮。在此期間，還出現了美國總統布殊於二月訪華，布殊刻意漠視中國官方反對，邀請方勵之出席其告別晚宴，從而提高方勵之國際影響力

的事件。由於方勵之在赴宴途中遭公安人員堵截而未能與會，故他隨即於當晚召開記者招待會，事件導致中美關係出現緊張，並使官方與人權運動領袖間之關係迅速惡化。

基於保持政治穩定心態與自衛本能，中國政府對要求釋放政治犯的浪潮採取了否定的態度，官方並批評方勵之及陳軍等發起的簽名運動，乃蓄意製造輿論壓力，影響司法獨立，違背法制原則。當然，官方的指責隨即為方勵之所反駁，方指出「憲法裡是有大赦的規定的。因此這項建議一點不關乎司法獨立。」^(註三十二)

為防止三月份召開的人大、政協會議中言論過份開放及出格，與民間呼聲遙應，中央定出兩會重點要主要講成績、強調穩定的基調，此項工作由趙紫陽負責部署。^(註三十三)在官方精密佈置下，會議基本上依循官方調子進行，相對八八年可謂平靜了許多。兩會後，政府的焦點已放到五月的五四紀念，並制定策略以穩定學生情緒，防止失控，然而，由於前總書記胡耀邦突然去世，使蓄發已久的學運藉此機會像火山般爆發出來。

二 矛盾的升級、強硬路線的失敗——胡耀邦去世、四二六社論與大遊行

（1）胡耀邦逝世與學生的要求

被指為反自由化不力而於八六年底學潮後被迫下台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八九年四月八日於政治局會議討論教育議程時心臟病突發，至十五日去世，民間隨即出現自發悼念活動。

胡耀邦一向予人開明、勵志改革的形象，他於七十年代末期衝破重重障礙，大舉平反文革以來的冤案，猶令人印象深刻。胡耀邦因學運而下台，故在不少學生心裡皆有「我們對不起胡耀邦」的情意結，在八九年這個令人屏息，期望爭取民主的年份裡，胡的去世自然就像地殼突然移動，把人民對社會現狀不滿，爭取民主的期望如火山爆發般引發出來。胡耀邦去世後，社會上的知識分子及學生，皆希望黨中央能就八六年學

學運及自由化事件給胡耀邦作一個結論，這實際是尖銳地重提及抨擊當時中央的反自由化政策。

由於當時中國持續通脹，政府正進行治理整頓，社會仍潛伏各項危機，再加上接近五四的敏感時刻，政府極不願意在人民情緒激動下再解釋胡於八七年辭去總書記職務的原因，並避免在八六學運及自由化事件上予胡一個評論，以免進一步挑起矛盾。為安撫民情，並表明對這位作風清廉的前總書記的尊敬，黨中央在胡的悼詞上稱他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我軍傑出的政治工作者。」(註三十四)而鄧小平及所有中共高層領導皆有出席胡耀邦的喪禮。

與此同時，悼念胡耀邦的情緒及行動越來越趨政治色彩。學生將胡的逝世與中國政治、經濟及社會等問題有意識地聯繫起來，藉悼胡的契機向中央施壓，「針對的是鄧小平和李鵬」。校園內一些大字報煽情地指出：「不該去的去了，該死的卻沒死」，有的提出政治理想：「取消共產黨，實行多黨制」，「早日敲響公有制的喪鐘，去迎接共和國新的明天」，「反對腐化」，「懲治官倒」，「推進民主政治」等。除發表意見外，學生更列隊遊行，四月十八日，三千學生遊行至人民大會堂，並向三位人大代表呈交請願信，當時學生的要求主要有七點：

1. 重新評價胡耀邦；
2. 否定反資產階級自由化；
3. 公佈領導人的私人收入；
4. 言論及出版自由；
5. 改善知識分子待遇；
6. 取消上街遊行的限制；
7. 增加教育經費。(註三十五)

學生爭取民主的行動並沒有因人大代表接受其請願信而停止，正如其他的社會運動一樣，連串行動終釀成衝突，矛盾升級並促使鄧小平對學運作出「動亂」的定性。第一次衝突是學生所指的「四·二〇」新華門血案。學生感到政府對其建設性的要求不理，並「用手中的宣傳機器對學生

運動歪曲報導」，在十八、十九兩晚，數千名學生列隊往新華門示威，「企圖強闖黨總部」。^(註三十六)二十日凌晨四時左右，武警終於採取行動，強行驅散學生，雙方發生衝突，學生指控武警「用皮帶、拳頭、皮鞋進行驅打，許多同學受傷。」^(註三十七)當然，學生的指控遭政府否認，事件迅速激化起雙方的矛盾。

第二次衝突發生在四月廿二日胡耀邦追悼會時，超過十萬名學生聚集天安門廣場，要求向總理李鵬呈交經修訂的七條請願書及與政府對話。然而，有關部門卻對同學的要求置之不理，「治喪辦公室的人為防不測，爭取時間讓中央領導人安全離開現場，竟稱聲李鵬總理預定十一時四十五分出來見廣大學生」^(註三十八)，其實，各領導人「已離開人民大會堂」。由於未見李鵬，幾名學生便在人民大會堂台階上跪下，堅持要將信親手交予李鵬。由於李鵬始終沒有出來，學生感到受騙，悲憤欲絕，抱頭痛哭，並決定將行動升級。

雖然追悼會後中央高層對學運性質的看法出現分歧，但基本上仍接受趙紫陽較溫和的處理方針。趙紫陽提出對學生遊行要勸阻，採取疏導方式，並與他們展開對話，但面對滋事者則要依法處理等三條。四月廿三日，(即追悼會的第二天)，趙紫陽出訪朝鮮，將處理學運的權力交予其他政治局常委。

（2）政府與學生矛盾升級後激化的形勢

由於學生認為政府對其民主要求沒有滿意答覆，再加上經歷了四·二〇衝突事件以及在人民大會堂前「被欺騙」，故決定將運動升級。當時社會上曾發生了下列連串事件：

1. 學生決定成立全國學聯籌委會，並號召全國高校實行無限期罷課

早在四月十七、八日，北京部分大學的教師已提出：「學生的行動必須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地進行，要成立學生自治會。」王丹亦於十九日指出：「沒有一個有組織的、由各高校和各階層民主人士聯合的組織，

是沒有力量的。」^(註三十九)在胡耀邦追悼會後，學生便決定成立全國學聯籌委會，發起獨立於政府控制的學生自治團體以領導學運，號召全國罷課，把爭取民主的運動升級，與政府進行長期較量。

2. 民主運動走向社會

民主運動向社會各階層蔓延，不少教師貼出支持學生的大字報，而同學亦走向社會進行宣傳及募捐，爭取市民支持，而包遵信、嚴家其及于浩成等四十七位知識分子，亦向政府遞交要求加快政改及清除腐敗的請願信。四月廿三日，官方《科技日報》發表了該報記者集體撰寫的文章，較客觀地報導學運，由此開展了新聞界支持學運之局面。

3. 西安、長沙等地發生暴動

數萬名民眾在西安市焚燒汽車，衝擊省政府，部分示威者更高呼打倒共產黨的口號，超過一百卅多名武警受傷，長沙亦發生同類事件，形勢混亂。此外，全國各大城市的院校皆出現大字報及標語，而上海、天津、西安、杭州等地亦有學生示威遊行，局勢一發不可收拾。

(3) 四二六社論——將學運定性為「動亂」

四月廿四日，李鵬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會議一致認為，當時的種種事態表明，在極少數人的操縱和策動下，一場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已經擺在我們面前。^(註四十)會議決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動亂小組。第二天，楊尚昆和李鵬向鄧小平匯報，鄧表示支持常委的決定，並指出：「這不是一般的學潮，而是一場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動亂。」雖然鄧小平是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但他卻不能容忍局勢失控以及壓力團體的出現，認為這樣將使中國走向混亂，他指出：

「如果搞團結學聯，就取締……現在的學潮性質變了，必須快刀斬亂麻。波蘭讓步不能解決問題，越讓越亂。」^(註四十一)

根據中央領導對學運定性為「動亂」的精神，《人民日報》於四月廿六日發表〈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指責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利用悼念胡之時機，反對共產黨，並針對「部分高等學校中成立非法組織，向學生會奪權」的情況，強調「決不允許成立任何非法組織」。^{註四十二}

四二六社論的強硬態度引來學生極大的反感，認為政府不單沒有誠意因應學生對民主的要求，還指責學運為動亂。被激怒的學生決定在四月廿七日不理政府禁止遊行的法令，再度組織大遊行。四月廿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四常委開會，決定不鎮壓，並命令軍警保持克制，讓示威和平進行。

四二七遊行為中共建國以來最大規模的民間自發遊行，遊行隊伍沿途衝破十八道由武警守衛的警界線，但雙方表現克制，沒爆發流血事件。為因應四二六社論對學運的指責，學生沿途高呼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的口號，示威和平地進行，充份表現了學生和政府冷靜處理事件的態度，而另一方面亦表現了政府強硬態度的失效，學生不理會四二六社論及禁止遊行的規定，不經申請進行示威。

三 趙紫陽溫和疏導學運的策略與失敗——發表五四講話、學生絕食與戒嚴

（1）趙紫陽的溫和、疏導學運政策

四二七大遊行，學生不理會中央強硬態度，加上在遊行過程中表現出有節有理，擁護中共的態度，令黨中央發覺強硬路線根本不能解決問題。雖然中央對處理學運方針一直有分歧，但在此階段主要傾向以疏導對話的溫和方針，緩和學生情緒，並進行反腐敗及政治改革以爭取民心，以結束這次學運。溫和路線在四月廿八日開始被接納，並於趙紫陽四月卅日回國後繼續採用，後來溫和對話路線由於學生堅持在戈爾巴喬夫訪華時絕食而遭動搖，中央認為採取溫和退讓方針亦不能解決矛盾，終於再次採納強硬路線，而溫和路線於五月十九日中國宣佈戒嚴時正式被放棄。

四月廿八日，政治局召開會議，較同情學生的統戰部長閻明復力主「中共高層盡快與學生、知識界建立通暢的對話渠道，疏導學生情緒」，閻明復的建議得到李鐵映的贊同。會議責成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政治秘書鮑彤起草《人民日報》社論〈維護大局、維護穩定〉，向大學生講道理。同一天，國務院發言人表示願意與學生對話。(註四十三)趙紫陽回京後，鄧小平更對其溫和政策撐腰，鄧並指出：「你們最重要的是穩定局勢。只要能穩定，就不要管我講過甚麼，你的主意行得通就照你的辦」。趙紫陽在五月發表溫和講話後，得到李鵬和應(註四十四)，而楊尚昆及喬石等亦表示贊許。(註四十五)鄧小平甚至說：「要抓住這個時機，把腐敗問題好好解決一下，要增加透明度。」(註四十六)李鵬後來更對學生指出：

「你們對於解決這些問題(筆者按：指腐敗等)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有些問題我們一直想解決，因為有許多阻力，未能及時解決，同學們很尖銳地提出了這些問題，能夠幫助政府克服前進道路上的困難。這一點，我認為是積極的。」(註四十七)

總的來說，中央當時的溫和路線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1. 發表社論及領導人作講話，正面肯定學生愛國熱情

中央領導人肯定學生愛國熱情，以及其提出希望民主化、深化改革、反貪污等主張，實際是間接否定四二六社論對整個學運定性為「動亂」的判斷，然而卻不肯正面否定社論。趙紫陽曾指出「我是想把廣大青年學生和社會上很多同情者的行為與極少數人的企圖利用學潮……攻擊黨和社會主義的行為嚴格區別開來，避免把整個學潮籠統地作一個敵我矛盾性質的定性。」

四月廿九日，《人民日報》在由鮑彤起草的〈維持大局，維持穩定〉的社論中，刻意迴避對整個學運定性為「動亂」的判斷，而多次有意識地提出「局部性的動亂」，將動亂範圍局限到西安及長沙，並為學運開脫：「一切單純的善良的青年學生，都應當懂得，在大規模的群眾性的事件中，

往往魚龍混雜，居心叵測者正等待著你們的感情衝動和行為失當而混水摸魚。」^(註四十八)袁木並代李鵬指出四二六社論中「關於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鬥爭的問題，是針對著極少數人的非法行為說的，並不是針對廣大同學的」。李鵬更指出：「黨中央，從來沒有說過，廣大同學是在搞動亂。」^(註四十九)而趙紫陽在其著名的五四講話更指出：「中國不會出現大動亂」，學生「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弊病改掉。」^(註五十)

2. 開展與學生、知識分子及新聞界的對話，疏導矛盾

四月廿九日，袁木、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等與學生對話；四月卅日，北京市政府領導也同市屬學校學生對話；農業部、機電部及司法部等也與所屬院校學生進行對話。而在學生絕食後，李鐵映和閻明復等亦與學生對話。

值得指出的是，袁木等第一次與學生對話並未能緩和矛盾，原因是被邀參與對話的皆是官方承認的學生代表，而於八九年湧現的學運領袖卻未能參與，而袁木指出中國新聞沒有檢查制度等言論亦引起學生及新聞界的反感。

3. 支持新聞改革，正面報導學運，回應學生要求公正報導學運的呼聲

五月六日，趙紫陽對主管宣傳的胡啟立及芮杏文指示：「對學潮的新聞放開一點，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不能違背潮流」。^(註五十一)趙更批評上海市委停止以言論開放聞名的《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職務的決定是把事情「搞糟了」^(註五十二)。

有了趙紫陽的指示，再加上新聞工作者的積極配合，八九年五月份上旬對學運的新聞報導較為客觀。此外，政府亦加緊「制定新聞法，以調動輿論界力量對社會各方面的監督」，而新聞法亦會交人大常委會審議，「並提交全民討論」。^(註五十三)

4. 進行改革，加強廉政及民主建設

趙紫陽為正面回應群眾反腐敗等要求，故在五月八日的政治局會議中提出六點意見，分別是：

- i 盡快公佈審查四大公司的結果；
- ii 取消高幹的特殊供應，並公佈領導幹部的財產；
- iii 在人大常委會中設立社會監督委員會，處理領導幹部及其子女違法案件；
- iv 盡快制定新聞法；
- v 司法獨立審判；
- vi 一切問題的解決都要在民主和法制軌道上進行。(註五十四)

趙的提議得到與會者的認同。(註五十五)

五月十一日，人大委員長萬里召開人大正副委員長會議，決定在六月廿日召開人大常委會，聽取清理整頓公司和學生遊行問題的匯報，審議集會遊行示威法與縣、鄉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時間的決定，並聽取關於新聞法草擬情況的匯報。《人民日報》於五月十二日報導這個消息，深得民心。

無可否認，由於中央採取了以疏導為主的溫和政策，故從趙紫陽五月四日的發言起，一直到五月十三日學生絕食之前，學運進入了八九年整個民運過程中最平穩的階段，這情況正如趙紫陽指出的：「在我講話以後，各大學校繼續紛紛復課」。(註五十六)然而，五四遊行中首次湧現了除學生外的新聞界遊行隊伍，而在以後的數天內爭取新聞自由更成為當時民運的重心，但總的來說，情況仍相對平靜。

(2) 學生藉中蘇高峰會議期間絕食，向中央施壓，以爭取成立壓力團體

運動表面的淡化及局勢的緩和，並不代表學生爭取民主的目標已經成功，學生期望政府承認「同學自發組織產生的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所產生的對話團的要求被拒絕。雖然中央願意進行廉政改革及擴大新

聞自由度，而趙紫陽本人對自發成立的民間團體基本持開放態度，但當時整個政府的立場仍不肯接受獨立的民間壓力團體。故此，站在爭取民主的立場分析，政府的溫和路線只是如方勵之指出的：「上面恩賜的不叫民主，而叫寬鬆……原來捆得太緊，直徑只有一尺，現在鬆到五尺，但直徑再大始終有個繩頭在牽著你」，「民主首先是我們本身應當有的權利，……那麼只有自己爭取，才能真正得到。」^(註五十七)由於政府及學生在承認壓力團體這個最關鍵的問題上無法妥協，學生及知識分子自然要利用有利的歷史契機，繼續向政府施加壓力，以爭取最大程度之成果。

當時，最令中國及全世界關注的是蘇聯改革派領袖戈爾巴喬夫於五月十五日訪華，並與中共最高領導層進行高峰會議的事件。五月十一日，北大學生發起萬人簽名，邀請戈爾巴喬夫於訪華期間，到北大演講。此外，北大亦出現大字報，指出：「鑒於目前嚴峻形勢，我們建議破釜沉舟，採取以下緊急措施：(1)集體絕食；(2)竭盡北京高校之全力於戈氏訪華之日，遊行進駐天安門，作最後拼搏。」^(註五十八)五月十三日，數千北京學生奔往天安門開始絕食，首都高校學生絕食團發表絕食宣言，「第一要求政府迅速與北京高校對話團進行實質的、具體的、平等的對話；第二要求政府為這次學生運動正名，並給予公正評價，肯定這是一場愛國、民主的學生運動。」^(註五十九)是次絕食行動實為八九民運一個重大的轉折點，導致民運人士與政府的矛盾迅速嚴重惡化。事實上，學運組織北高聯^(註六十)及在民間有重大影響力的知識分子陳子明等皆十分反對絕食行動。在六四後被政府重判十三年的陳子明認為絕食行動犯了三大錯誤，分別是「缺乏自我克制」、「把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攬在一起」，以及嚴重刺激老資格政治家的「政治自尊心」。^(註六十一)

然而，當時學生的絕食行動對社會造成很大的感染力，引發更多高級知識分子的參與及支持，他們發表很多聯名聲明如〈我們再也不能沉默了〉，〈我們對局勢的緊急呼籲〉，以及〈五一六聲明〉等。此等聲明基本上致讚揚學生的民主愛國精神，呼籲政府作實際讓步。當時影響力較大的〈五一六聲明〉，有意識地、明確地要求政府「必須承認在民主程序下產生的學生自治組織的合法性」，^(註六十二)以體現憲法規定的結社自由。然

而，知識分子基於政治觸覺，亦規勸學生要作適當的退讓，撤出廣場，他們極擔心學運失控，使已爭取到的成果付諸東流，並為中央內強硬分子找到武力鎮壓的藉口。

(3) 趙紫陽宣佈鄧小平是中共最高領袖與百萬人大示威

在學生絕食期間，中央一方面大為緊張，黨內溫和派領導人四出表態希望緩和情緒。趙紫陽的智囊深切明白「緩和對話政策必須被證明有效的，也就是說，學生們必須克制，否則局勢仍然是危險的。」(註六十三)趙紫陽於十三日與工人代表對話，希望學生顧全大局，不要損害中蘇高層會晤，而統戰部長閻明復更對學生明確地指出：「你們的行動將不利於改革派。紫陽同志的意圖將很難實施。」然而，知識分子及黨內溫和派的行動完全未能改變學生的行動。相反，學生的情緒轉趨激烈，開始否定所有妥協主張，吾爾開希曾指出：

「廣場上現在並不是少數服從多數，而是百份之九十九點九服從百份之零點一，如果有一個絕食的同學不離開廣場，廣場上的其他幾千個絕食學生也不會離開。」

由於學生執意在戈爾巴喬夫訪華時盤據廣場以吸引世界新聞輿論，以向中共加壓，故政府於五月十五日被迫把在廣場歡迎戈氏的儀式改為在機場進行，再加上學生舉出戈氏照像及俄文標語，此舉令中央政府大失顏面。

在另一方面，由於溫和路線也無法抑止學運，故中共中央內認為需採取強硬措施的觀點再度抬頭，兩種不同處理方針的鬥爭漸趨激烈，集中點在於中央「退與不退」——即是否否定四二六社論，承認學生是進行愛國民主運動，並肯定從鬥爭中產生的自發組織之合法性等幾個問題。

五月十六日，形勢急轉直下，在與戈爾巴喬夫的會面中，黨內開明派領袖趙紫陽有意識地向國內外宣佈鄧小平仍是掌握最高權力的領袖，「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註六十四)雖然鄧是黨內實際領袖的情況眾人皆知，但在此關鍵時刻刻意揭露此點，客觀上無疑

使國內外對中共不滿的矛頭全集中在鄧小平身上，認定他是反對學運的黑手，楊尚昆在其後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亦批評趙的做法：「把小平同志擺在前面，說明一切錯都是從他那裡得來的。」當時的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亦指出：「這個話講糟了，他講這個話也許是好意，但這個時候講這個話，鄧小平要起誤解的。」^(註六十五)可能趙紫陽真的是好意，他在向戈氏指出鄧小平為最高領袖後，亦為鄧小平解脫，趙指出：「鄧小平同志也總是全力支持我們的工作，支持我們集體作出的決策。」對照起趙紫陽在六四後的辯護，他確實有意為鄧小平說話，認為對學生採取強硬態度的責任應由政治局常委負責。趙指出四二六對學運定性的「社論主要是根據四月廿四日常委會精神寫的。小平同志的話是聽了李鵬同志主持的常委會的匯報後說的。小平同志的一貫態度是全力支持常委的工作。只要是常委集體做出的決定，他歷來都是支持的。」^(註六十六)

在趙紫陽公開鄧小平是實際最高決策者的第二天，北京爆發了百多萬人上街聲援絕食的大遊行，是次示威的特點，在於攻擊鄧小平的標語及大字報明顯增多：「共和國不要太后」、「小平下台」、「強烈要求小平退黨」、「小平你好——糊塗」等。

此外，以嚴家其、包遵信為首的幾十位知識界名人，共同聯署發表了〈五一七宣言〉，矛頭直指鄧小平，宣言指出：「中國還有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趙紫陽總書記公開宣佈，中國的一切重大決策，都必須經過這位老朽的獨裁者」，「這次學潮不是動亂，而是一場在中國最後埋葬獨裁、埋葬帝制的、偉大愛國民主運動」，宣言更提出具體要求：「推倒四二六社論」、「獨裁者必須辭職」。

(4) 中央內部分裂與趙紫陽溫和路線破產

在龐大的群眾壓力下，五月十六、十七日晚上，中共政治局常委會連續召開兩次緊急會議，而在同一時間中共的元老亦罕有地會面，楊尚昆指出：「多少年來，幾位八十歲以上的老人坐在一起討論中央事情，這是第一次。」^(註六十七)「鄧找來薄一波、李先念、楊尚昆、王震、彭真幾位老人，還通過電話找陳雲，討論對學生運動要不要在四二六社論基調上

往後退。」(註六十八)

總結這幾次會議的討論重點，就是中央應否在學生步步進逼，利用絕食、群眾示威及發表聲明，與及在國際輿論壓力下讓步，而雙方矛盾的焦點在於是否承認通過群眾運動自發組成的獨立學生組織，當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有兩個聲音」(註六十九)。

第一是以趙紫陽為首的觀點，認為應「承認學生是愛國的，承認學生組織是合法的，改變四二六社論的說法。」(註七十)趙提出這個建議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就是他在與許家屯討論到應如何看待學生及工人的自發組織時所指出的：「我們不要怕這些自發組織，可以讓他們活動，參加選舉，只要我們的群眾組織能代表群眾利益，不畏擔心有人競爭。」(註七十一)第二個原因是趙認為硬辦法根本不能真正解決問題，趙指出：

「硬辦法中，一種是空硬，就是發表四二六社論那樣的東西，公安局發佈十條，不許學生遊行、上街，這種辦法已被實踐證明是沒有效的。另一種辦法是實硬，也就是戒嚴、軍管，這種辦法短期內可能奏效，長期來講會使國家陷入動盪和不安當中。」(註七十二)

第二是與此相反的強硬派，他們認為在當時這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進逼下，讓步只會令學生及知識分子有理由追究政治責任，並導致反對力量增加，直至共產黨跨台。參與會議的上述眾元老「一致認為不能退。他們說，退一步，學生會進一步；退兩步，學生會進兩步。他們最終目的是要推翻共產黨。」(註七十三)代表強硬路線的李鵬亦指出：

「面對險惡的形勢，絕不能退讓，……如果承認《人民日報》社論有錯誤，承認學潮是愛國民主運動，他們必然要強迫黨和政府承認他們提出的一切錯誤的乃至反動的政治綱領，承認一切非法學生組織，進而成立其他非法組織，在中國搞反對派、反對黨，要實行多黨執政，最終逼使共產黨下台……這就是他們製造動亂的目的，不達目的，他們是絕不會罷休的。」(註七十四)

十七日晚政治局常委的表決結果，趙紫陽的意見遭否決，會議並決

定北京要進行戒嚴，趙紫陽在十七日的常委會上表示要辭職，但不被接納。

雖然中央高層以強硬路線為主導，然而，為避免有學生絕食死亡及出現流血衝突，而導致進一步激化矛盾，加深危機，影響政府統治威信，中央皆一致同意儘量以勸解手段在最後的關鍵時刻化解危機，促使學生停止絕食：

第一是五月十七日清晨，趙紫陽代表政治局常委會發表保證不對學生秋後算帳的溫和書面談話：「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同志，向同學們講幾句話。同學們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對腐敗、推進改革的愛國熱情是非常可貴的……同學們放心，黨和政府絕不會秋後算帳。」趙紫陽更保證中央「將進一步研究同學們和社會各界的意見和要求，提出和採取加強民主和法制建設、反對腐敗、推進廉政建設、增加透明度等實際措施。」他更勸諭同學要停止絕食。然而，這份溫和的常委書面發言完全無效。在同一天中午更爆發上述指出的五一七百萬人大示威。

第二是五月十八日凌晨五時，中央領導趙紫陽、李鵬、喬石、故啟立、芮杏文和羅幹等趕到協和醫院，慰問絕食病倒的學生，為學生們簽名，並苦勸其停止絕食。

第三是五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時，李鵬、李鐵映及閻明復等與吾爾開希、王丹及其他絕食學生領袖談話，李鵬表示希望學生能停止絕食，「以後有甚麼事好商量。」「現在救人是第一位的。」為平息學生情緒，李鵬更指出黨和政府「從來沒有說過，廣大同學是在搞動亂。我們一直肯定大家的愛國熱情、愛國願望是好的，有很多事情是做得對的……你們對於解決這些問題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幫助政府克服前進道路上的困難。這一點，我認為是積極的。」^(註七十五)

然而，由於李鵬並沒有承諾學運領袖吾爾開希提出的「《人民日報》發個社論，否定四二六社論，向全國人民道歉，承認這次學生運動的偉大意義」這個實質問題，故是次對話不歡而散。

五月十九日晚，在趙紫陽缺席情況下，中共中央、國務院首都黨政

軍機關幹部大會召開，李鵬在會上宣佈戒嚴令，並從外地調派解放軍進京，這行動標誌著學生與政府的矛盾進一步深化，黨內溫和路線徹底失敗。

四 從戒嚴到六月四日武力清理天安門廣場

(1) 群眾阻擋軍隊入城及軍威受損

雖然北京在二十日進行戒嚴，全市理應進入肅殺的氣氛，但學生及市民根本不怕，繼續上街遊行示威。由於得悉軍隊將很快進城，市民皆自發到京城四周，阻止軍人入城，市民傾盡全力，向解放軍訴說北京並沒出現混亂，很多人更含淚向軍人講述學生要求民主的情況。由於不少軍人在進京前根本不理解情況，他們每日只學習四二六社論及中央強硬派的宣傳文件，故不少軍人在直接聽到北京市民痛哭流涕的誠懇勸說，及市民以其血肉之軀阻擋其前進時，皆不期然的往後退。然而，市民堵截軍隊前進的行動亦「慢慢埋下深刻的軍民矛盾」，(註七十六)由於「軍威是軍隊的第二生命，軍威一受挑戰，軍人很容易失卻理智。」當時軍隊一要前進，市民就攔阻，但當軍人接受勸喻後退，市民就大聲叫好，由於軍人從來是前進才會受到市民歡呼，故不少軍人對要被迫後退感到氣憤。此外，很多解放軍要化裝才得以進城，而一旦為市民發現，就會被市民圍起來，迫令其於牆角邊蹲下，資深記者程翔曾生動地描述當時情況：「筆者親眼看到是，人民吆喝他們為什麼要鬼鬼祟祟，說『既然是軍隊，就應該穿好軍服，不應該像流氓般』……被圍起來的士兵，則有如鬥敗的困獸，目光充滿憤怒的神色。」(註七十七)

(2) 無政府狀態與自治組織初步組成

基於連串的大型示威，北京市已呈無政府及人民自治的狀態，京城內的工廠企業、國家機關亦均陷於半癱瘓，「由學生和市民組成的糾察隊也毫不鬆懈地監視著城區內各交通要道及一些可疑建築物內的一舉一動，人們將一些可容納數萬人，位於天安門廣場周圍的人民大會堂、故宮、中山公園及勞動人民文化宮等建築物出入口全部封鎖，甚至在一些

停止運作的地鐵出入口外也排出了一道道糾察人牆。」^(註七十八)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在五月廿二日抵達北京，接機的官員告訴許：

「北京市公安局已不能執行任務，市面上由工人、學生、居民沿途設卡，查詢行人車輛，遇到政府、軍隊車輛，隨時都有被扣留的可能。因此，現在黨、政、軍、機關用車，車牌一律都換用一般市用車牌。」^(註七十九)

當時北京在大軍圍城下，民間力量曾試圖聯合行動，組成市民自治政府。五月廿五日，廣場指揮部及北京各界人士，組成了首都各界協商聯席會議，希望集中各方面力量與政府長期抗衡。然而，由於當時形勢危急，這個組織又倉卒組成，故並無發揮足夠力量。

除已出現無政府狀態外，北京在戒嚴期間亦多次爆發大規模的群眾遊行示威，除了學生、知識分子、新聞界外，亦見到不少官方的研究機構、部份中央直屬機關的幹部，以及大工廠的工人。在戒嚴的頭幾天，示威群眾除高呼撤銷戒嚴令，打倒李鵬等口號外，還針對性地「要求立即召開人大緊急會議」，希望通過人大取消國務院提出的戒嚴決定。

（3）學生情緒失控

受港澳及海外華人及輿論的支持下，廣場上的學生情緒極度興奮，形成了更激進、容不下任何策略性妥協的情緒化形勢，學生執意死守廣場，不肯退卻。當時學運領袖吾爾開希分析形勢，感覺政府最終會採取強力鎮壓手段，為避免同學犧牲，故他建議撤離廣場，但提議旋即被否決，他並遭免去北高聯常委之職，更被一些激進學生攻擊為學賊。五月廿七日，首都各界聯席會議更召開記者招待會，發表十項聲明，宣佈在五月三十日光榮撤離天安門廣場，是項決定當時受到海內外人士的稱讚，認為學生這個有理有節的策略行動，不單可表明群眾能漠視中央戒嚴權威、又可化被動為主動，保留實力，以作長遠爭取。然而，是項理智的決定在第二天又被否定，學生把撤離廣場日期推遲到人大常委會於六月二十日召開會議之後。

(4) 堅守廣場的意義

可以說，學生某程度上非理性之行動，以及不講究爭取策略的情況，客觀上給予中央強硬派一個非以武力鎮壓不足以穩定局勢、克服無政府狀態的極佳理由。學生堅持死守廣場，除了由於同學們感到政府頑固、保守而感到屈辱，因而執意與之誓死對抗等情感化因素外，還基於外地大學生陸續抵京，他們與已筋疲力竭的北京大學生不同，這批學運「新血」精力旺盛，極希望能繼續盤據廣場以期將學運推向另一高峰。此外，天安門廣場已成為一種堅持民主的象徵，各方面組織及群眾皆向之凝聚、期望它成為另一個中心，集中各方面力量與政府長期抗衡。正如文革期間與政府抗衡的造反派組織面對之形勢一樣，假若社會上各個單位的造反群眾不能串連凝聚，一旦在運動後期重返自己原本隸屬之單位，一定會勢孤力弱，被個別擊破，故他們極希望能組成一個有利於運動延續的跨團體、跨行業的獨立群眾組織。

(5) 政府於戒嚴後的政策以及政軍內質疑軍隊入城的呼聲

雖然中共頒佈了戒嚴令，然而卻未有強制執行。當時中共軍方的聶榮臻、徐向前兩元帥，以及鄧穎超、楊尚昆等，皆指出軍隊入城是為維護首都秩序和安定，「絕不是針對學生」、「決不願意發生流血事件」^(註八十)。楊尚昆說：「軍隊是奉命來到北京，是維護治安，決不是對付學生的，你們不信以後可以看。」^(註八十一)從後來解放軍於六月四日強行進駐天安門廣場，據當時「絕食四君子」之一的侯德健目睹，以及九四年六月四日香港亞洲電視播放加拿大攝影隊於八九年六月四日即場拍攝的凌晨清場實況，加上其他之綜合報導^(註八十二)，解放軍在清理天安門廣場時沒有出現屠殺學生的情況可以看出，雖然強硬派執意對學生的成立壓力團體的訴求不肯讓步，但為著保持政府長遠威信，儘量減少仇恨，而避免引起的社會長期動盪不安，防礙改革與發展，政府仍不致於對已沒有抵抗能力的學生大開殺戒。

在戒嚴初期，有一件令強硬派感到震驚的事，就是除了黨內以趙紫

陽為首的溫和派反對戒嚴外，軍隊內亦有對戒嚴令表示反對的呼聲。根據趙紫陽的幕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諾指出：「在這次八九民運中，黨政部門裡司局級以下的幹部中，百分之八十都是同情和支持民運的。在正、副部長中，百分之七十都是同情和支持民運的……首先提出不贊成用軍隊的，是人大常委會三個軍內副委員長。離休的八百多名將軍中有五百多個將軍都明確表示反對動用軍隊鎮壓。」在政府宣佈戒嚴後，七位資深的軍事元老如楊得志、張愛萍、陳再道、葉飛及蕭克等，聯名向中央軍委上書：「鑑於目前事態極為嚴重，我們以老軍人的名義，提出下列要求：人民解放軍屬於人民，不能同人民對立，更不能鎮壓人民，決不能向人民開一槍。為了制止事態的進一步惡化，軍隊不能入城。」(註八十三)

在李鵬宣佈戒嚴的五月十九日，被社會上認為是趙紫陽的四個主要智囊團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國務院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中新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及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發表了〈關於時局的六點緊急聲明〉。他們呼籲學生「爭取盡快結束絕食」，並提出「立即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別會議，行使憲法賦予的最高權力，進行干預」。(註八十四)在戒嚴後兩天，隸屬於北京四通公司的四通發展研究所得到人大常委胡績偉的支持，以胡的名義廣泛接觸其他人大常委，爭取他們支持聯名致函人大委員長萬里，提議召開人大常委會非常緊急會議，「研討當前的嚴峻局勢，並通過法治軌道謀求正確解決中國當前危機的方法。」(註八十五)由於人大具有廢除戒嚴令及彈劾總理的憲法權力，故趙紫陽亦向正在美國訪問的萬里發電傳，請他訊速回國以召開人大會議。但當萬里的民航專機在上海降落後，隨即被江澤民接走，萬里並於稍後發表支持戒嚴的聲明，趙紫陽爭取人大推翻戒嚴令的行動終於落空。

（6）中央重新部署——準備武力平息學潮的措施

為爭取各大軍區及地方的支持，並統一各地方黨政領導人的思想，在五月十九日宣佈戒嚴的同一天，「鄧小平起程去武漢召開軍委擴大會議，說是組織第二指揮中心。」(註八十六)

在鄧小平離開北京的幾天時間裡，政府由於未及全面部署，並無堅持落實戒嚴命令，北京局勢十分混亂。直至五月廿三日，政府才採取幾項重要措施穩住陣腳，並開展了解決事件的部署。

1. 通令各大軍區及各省市領導人表態

當時中央已派工作組往各地區打招呼，號召他們發表聲明擁護中央戒嚴的決定。五月廿五日前，各省市的黨政領導分別被召到北京，進行個別談話表態，例如當時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被召往北京見楊尚昆時，楊對許說：「經常委決定，趙紫陽已停職，小平同志講，已經沒有路可退了，才採取戒嚴，動用解放軍平息動亂，希望你理解，支持中央決定。」(註八十七)

2. 中央召開軍委緊急擴大會議，由楊尚昆發表重要講話，以統一各軍事領導的思想

楊尚昆在會議上集中批評趙紫陽分裂黨的錯誤，並提出政治局常委會及黨內元老認為不可再退讓的信息。他更強調應該統一步伐，加強控制：「老幹部要注意，情況不清，不要發表意見，七位老將軍就是來龍去脈不清楚，現在明瞭了，表示要和中央保持一致。」「煽動動亂，報紙的錯誤導向很重要。」「現在各大軍區各大單位我們放心，軍以下不放心，要多做工作。」

3. 重新加強輿論控制

撤換同情學生的幹部、廣播員及記者，而被認為保守派的「胡喬木、鄧力群已被聘為中共意識形態領導小組的顧問」，(註八十八)以統一全國思想。

4. 撤換領導人

楊尚昆在軍委會議上指出：「中央領導要換人，跟大家打過招呼」，二十六日，姚依林向各部委傳達對趙紫陽事件的處理，彭真召集黨外副

委員長開會，稱趙紫陽幹了很多壞事，李先念在政協主席會議上說目前的複雜局面是個別領導造成的。(註八十九)

在上述工作後，黨內強硬派已完成武力清場的部署，數十萬軍隊包圍首都，各省、各大軍區紛紛致電擁護中央，支持和同情學運的幹部已被清洗，傳媒亦被軍隊及公安部門接管，外國記者被驅逐。

(7) 六月四日武力清理天安門廣場

由於戒嚴令根本無效，民眾堅守天安門廣場，中共強硬派終於出動強大軍力，動用裝甲車、坦克車及衝鋒槍等從京城四周迫近廣場，共軍與市民發生衝突，在廣場外圍造成流血傷亡，軍隊並成功進駐廣場，驅散學生，以武力結束八九民運。當時學運領袖及海外駐京傳媒指出共軍在清理天安門廣場時對學生及群眾進行大屠殺，而整個北京亦被屠城，成千上萬的學生與平民被殘殺，而官方發言人袁木卻指出天安門出現屠殺的消息不確，清理天安門時並無學生死亡。據後來各方面回憶及錄像等資料綜合，天安門清場時，有毆打但沒有出現屠殺，學生基本是和平撤離。(註九十)此外，據絕食四君子之一高新後來的調查及綜合研究，認為整個北京死亡人數約為四百人，而其他不同大學領導對全市死亡人數的估計在三百至六百之間。(註九十一)

第三節 六四強力鎮壓之影響

軍隊以強大武力清理天安門廣場，結束六四學運，並造成長安街群眾傷亡事件，對中國的政治、民心、國際關係、新領導層的政治經濟社會政策、以及對正進行的經濟之上之治理整頓皆有深遠的影響。

一 學運及民運份子被捕，中央高層改組

學運被鎮壓，不少學生領袖及其他知識分子流亡海外或被緝捕，中央強硬派更藉此機會順道清理自七八年改革開放以來站在前線鼓吹異見的活躍分子。較有組織的民運團體土崩瓦解，爭取民主的力量受到自七

八年改革開放以來一次最嚴重挫折。

在中央高層方面，對學運採取較開放態度的溫和派基本上被徹底打跨，趙紫陽、胡啟立、閻明復及芮杏文等高層官員下台，強硬路線抬頭。然而，在學運中堅持採取強硬路線的領導人卻未能登上中共總書記的職位。令人感到驚訝的是，總書記這個職位被以執行改革開放政策較成功，卻又堅持黨權威的上海市領導人江澤民出任，反映出中央希望中國繼續推行改革開放的政策。

二 政府及民眾矛盾加深

中國領導人在七八年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否定文革正統路線，以經濟建設成果、具體利益爭取人民的信任，從而保持黨的權威及政府的合法性。自八四年深化經濟改革開始，面對極其複雜的經濟社會形勢，政府已因為未能有效回應經濟體制深層改革過程中出現的通貨膨脹、失業、農業危機、官倒及貪污腐敗等問題而備受市民埋怨，統治權威受損。

是次六四武力清場使政府與人民之間結下更深的積怨，政府及解放軍在市民心中的形象被破壞，中共政權統治的合法性遭受質疑，人民、幹部與領導層間的不信任與對立情緒惡化。這情況雖然隨著往後兩年貫徹開放改革，以及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引來的經濟飛躍得到一定的緩解，然而，六四事件始終仍是市民與政府間一個心結，假若中國政府面臨嚴重的政治危機，如領導權的爭奪，或社會領域出現重大事故而引起群眾不滿時，六四事件則會被再提出來，成為攻擊政府的有力武器。

三 國際社會譴責

中共以武力平息民運，使其面對國際社會四十多年來最強烈的譴責，各國政府、人民及輿論開始重新評估中共，使中國政府的國際聲譽一落千丈。此外，眾多歐美國家亦開展對中國的經濟制裁，縮減投資合作、終止援助、限制高科技及技術產品輸華、並阻撓或延遲處理中國加入各國際性經濟貿易的合作組織等。

四 新領導層採取務實措施穩定形勢

由於六四鎮壓導致官民矛盾加劇，以江澤民為首的新領導層上台後，為保持政權穩定，除繼續逮捕民運人士、加強意識形態控制及提倡針對外國勢力滲透的「反和平演變」外，亦為爭取民心、強化政權合法性而推行反貪污的廉政建設，查處與高層有密切關係的五大公司，並改善與半官方團體及民主黨派的聯繫，吸納更多意見以制定國策。

針對國際社會的責難及封鎖，中國藉著強大的經濟實力與發展潛質，以及龐大的消費市場，推行與外國求同存異、互不干涉內政的外交政策，以突破外交孤立局面。至於外國政府方面，由於現實的國家及經濟利益，不願意在歐美諸國面對經濟衰退的時刻，過份制裁中國而損失一個龐大的市場，各國在八九年底，便開始通過各種不同的民間渠道與中國恢復交往（有關新領導層之治國方針及政策，將在下一章中詳細討論）。

五 加強推行經濟上的治理整頓政策

六四的強力鎮壓對中國社會及各地方皆產生強大的震懾效果。由於處理學運的強硬派如李鵬及姚依林等，同時亦主張要對自八八年起的經濟過熱採取較大力度的治理整頓緊縮政策，故六四事件後，中央的強硬方針促使經濟緊縮措施進一步加強，再加上當時市民認為政府會更決斷地推行經濟緊縮的政策，以及市民希望手持更多現金應付突發情況等因素，促使在八九年第三季度內，中國的消費需求、投資規模及工業增長等速度迅速回落。可以說，六四鎮壓的震懾效果客觀上促使以壓抑需求為主的治理整頓政策能更徹底的推行。

在分析六四鎮壓的影響時，有一點值得留意的，就是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始終清晰地強調要繼續推行改革開放的路線。基於政治平衡及對外形象的考慮，鄧小平決定以形象相對開明之江澤民出任總書記，並於五月卅一日會見強硬派領導李鵬、姚依林解釋此決定時，提出「要造幾個香港」，「要比過去更開放」等。（註九十二）基於鄧小平的影響及實際社會

經濟形勢的需要，雖然新領導層在六四後為求政權穩定，政治及經濟皆採取收緊的措施，然而，中國卻沒有回復到閉關自守、推行傳統計劃經濟的局面。此外，由於各地方政府懇切期望能加快建設步伐，以及民間對改革的大力支持，鄧小平遂針對新領導層在經濟發展速度及改革過程步伐過慢的情況，在九二年初南下深圳、珠海等地發表轟動世界的南巡講話，將經濟改革推向另一新高潮。

第四節 八九民運的反思與總結

要全面分析並總結八九民運，除要正視歷史、面對六月三、四日動用武力而造成的眾多傷亡外，還應從宏觀角度了解整個民運起源的基礎，參與社群之處境及心態，以及爭取策略等。只有根據理性的全面分析，我們才能從歷史教訓中真正總結經驗：

一 政府應推行政治改革，主動回應社會的客觀民主要求

為實現中國政治的長治久安，社會長遠真正的穩定，中國政府在推行經濟改革開放的同時，必須主動的進行政治改革，開放言論，容許人民根據憲法權利自由結社，以保證不滿情緒能於制度內疏導，並通過自由、民主渠道，監察貪贓枉法行為，從制度上促成中國的廉政建設。

八九民運正如鄧小平在六月九日會見戒嚴部隊時指出：「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正如此章前述民運興起原因時提出，隨著經濟改革及對外開放，中國和許多發展中國家情況一樣，一個多元化的民間現代社會漸具雛型，再加上意識形態開放帶來的思想啟蒙，促使知識分子和新興階層如企業家及個體戶有更大的參政欲望。面對著少數掌握軍權的精英超越憲法黨章，壟斷國家大權的局面，民間知識分子都主張爭取民主參與，制約政府的權力，他們認為：「中共的開放型的經濟改革是無法與專權式的黨專政並存」，「鄧小平本人是營造他所說的『大氣候』與『小氣候』的一個主要力量。」(註九十三)可以肯定地說，只要中國政

府仍然堅持改革開放，則多元化的民間社會必定會形成，群眾肯定會向政府爭取參政權力，這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決定論，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

此外，中國的經濟發展，須建基於如中國政府強調的穩定局面。要達至國家的長治久安，「真正的穩定，必須立足於民心的支持上，民心不服，實質來說並非穩定。」^(註九十四)有序的逐步推行民主，不單可加強政府的權威與合法性，更可保證政治能安穩的運作，使民間的怨氣得以疏導，在制度內解決問題，以避免各走極端。這亦可促使執政黨權力交替的制度化，避免在眾多共產國家發生的繼承權鬥爭，以及因此而產生的社會動盪。此外，社會輿論的監察，是建立廉潔政府的重要途徑。

鄧小平在推行現代化過程中強調穩定，以及黨的領導權威不受挑戰，故他同時堅持四項原則（實質為黨的領導）和改革開放的一手硬、一手軟政策。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鄧小平的執政原則是仿效六十年代巴西、七十年代智利、八十年代前期南韓及亞洲其他小龍在政府集權下推行市場經濟以達現代化目標的國策，故王軍濤認為鄧小平的治國方針「與西方政治學家評價不發達國家的政治指標頗為相似」。但是，要保證以獨裁政治能推進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以達至如星加坡、香港等地區較理想的效果，避免出現如國民黨統治大陸時的腐敗，以及菲律賓馬可斯及伊朗巴列維政權的崩潰（以上政權皆是推行獨裁下搞活經濟的模式），則必須保證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官員廉潔、尊重法制、重視市場上的公平競爭、以及政權機構及有權勢的官員不插手經濟，避免「權錢結合」的情況。

然而，中國由於幅員廣大、傳統官僚制度、大家族主義觀念、以及政府各部門仍緊緊掌握經濟領域上各個企業的實際權力，以至造成政企不分、產權關係模糊、權錢結合、官倒盛行及不公平競爭情況。中國政府在九二年開始進一步深化改革，進行產權制度改革時，很多政府官員及企業領導濫用手中的權力，利用改革過程中法制跟不上經濟改革步伐的空隙，把自己管理下的國有資產的估值壓低，把該等資產轉入自己或

與自己有緊密關係的機構名下，化公為私，造成國有資產大量流失。有關評論指出，在權力轉化為資本的運作下，一個「攀附著國家霸權、官僚政治及專制政制、一個以權力為資本及相當程度上姻親關係化的新階級或變種的官僚資產階級已經正在形成」。^(註九十五)「權錢結合」無可避免地帶來壟斷、不公平競爭、貪污及不規範的經濟秩序，直接損害以公平競爭為基礎的市場經濟體制形成。

簡單來說，要維持國家長治久安，徹底打擊貪污以建立廉潔政府，並保證市場經濟能真正推行，政府必須回應多元化的參政氣氛，採取主動，逐步推行民主改革，開放言論，容許市民自發結社。可以肯定，只要中共的群眾組織能反映市民實際需要，以及其治國的路線正確，它將無需害怕其他團體的競爭，仍能繼續保持其執政地位。

二 民間應支持中央政府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建設性地培養理性的民主土壤

從八九民運學生和知識分子的參與，以及政府內很多開明力量支持民主的經驗可以看出，為了使實踐民主的政治文化能在中國生根，中國各民間力量應支持中國政府推行改革開放政策，進一步促成民間社會的形成。此外，亦應結合政府體制內各種開明力量，上下結合共同推行政治改革。

正如中國資深民運人士王軍濤指出，「中國民主化並不僅取決於體制外民運的發展，而是取決於中國各界、各種政治力量的努力。」「由專制體制向民主體制過渡，必須考慮體制內各種政治力量與執政者的政治態度……這些因素甚至比民間因素更深刻地影響民主化演進過程。」^(註九十六)

王軍濤提倡上下結合爭取民主的改革方針，是十分符合中國實際需要的。要為中國民主運動培植根基，保證政府官員能認同民主改革，以及有序的進行爭取，一個重要的前提是民間力量必須參與、支持政府的改革開改政策，這樣不單能夠改善市民的生活，並能通過經濟改革及

開放，進一步培養「現代市民社會」及多元化局面的形成，為民主政治打穩基礎。

從發展中國家經驗及經濟社會學理論分析，（註九十七）經濟發展必定造成社會細緻的分工，各個經濟細胞或專業人士皆按照自己的經濟利益進行經濟活動。而市場經濟的發展亦會造成各個行業、各個階層湧現的多元化局面，這些經濟上的自由個體為保障自身的權益，保證政府政策能考慮到其需要，自然會結社，並在政治層面求取適當的位置，政治多元化局面隨即形成，這亦造就了現代市民社會的穩固基礎。雖然八九民運所出現的市民運動最終被強力取締，然而，只要經濟能繼續開放改革，則市民運動始終會在某種歷史契機下再次出現，以爭取成立獨立於黨控制的政治、專業或其他形式的團體，進一步推進民主政制開放。

三 珍惜穩定局面，以理性方式推行民主，避免出現天下大亂的局面

從八九民運中，民間產生的一些非民主及非理性的激進現象，以及蘇聯、東歐進行改革導致執政黨倒台，政治、社會、民族及經濟形勢混亂的經驗總結，在中國爭取民主之同時，應珍惜得之不易的經濟改革成果，以更理性態度爭取民主，避免革命、流血及仇恨，並保持社會穩定。

在分析中國民主化前景時，王軍濤深刻地指出：

「我對中國民主化的前景深信不疑，我擔憂的是代價太大」，「從中華民族的大局考慮，相對和平而有秩序的政治改革是更為可信的演進格局，這樣可以減少生命、財富和文化方面的代價，使民主化的每一進步都為民族、人民帶來實利，並且更符合民主所需要的政治文化。」

鄧小平反對多黨政治，其中一個論據是害怕會出現內戰的混亂局面。江澤民於九四年（六四五週年前後）會見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的談話中，肯定地說：「回顧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那場政治風波，如果沒有當時

的斷然措施，就不會有中國今天穩定的局面。」令中共領導人不考慮市民心結，堅持六四鎮壓的必要性，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親眼看到蘇聯、東歐進行政治改革而帶來共黨下台，一些一向堅持改革的共產黨開明領袖如戈爾巴喬夫、克倫茨等也逃不過被趕下台及遭批判的厄運，再加上經濟、種族、社會混亂、國家四分五裂的悲慘局面，而被迫進一步靠攏西方。在六四後一位《人民日報》領導向該報全體工作人員的講話中指出：

「如果黨被人推翻了，社會主義被推翻了，是一種什麼情況？東歐不是前車之鑒嗎？東德被西德吞併了，克倫茨把昂納克搞掉了，昂納克在受審訊、克倫茨也逃脫不了。東德黨的領導幹部受審判，黨員失業……有人以為幫助推翻共產黨，就可以邀功請賞，根本不是那回事。克倫茨推翻民德黨是有功勞的，命運如何？……趙紫陽支持學生，當時動亂精英研究了，他們得手以後，趙紫陽也就留個半年到一年。」(註九十八)

這個講話充反映到一些高層幹部在看到蘇歐局勢激變後，更肯定應採取強硬措施結束學運的心態。

李鵬在九四年七月訪問德國時更進一步為中國政府辯護：

「當時我們的國家處於一片混亂之中，採取這種措施是不得已的，是被迫的，我們並不願採取這種措施。但是當時如果不這樣做，不採取斷然措施，將會大亂，情況可能比今天歐洲一些國家的境況更糟糕、更悲慘。中國現在政治穩定，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改善，社會進步，民族團結，證明當時採取的措施雖是迫不得已的，但是必要的。」(註九十九)

雖然歷史在客觀上證明六四鎮壓後中國能保持穩定，並在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後帶來經濟飛躍，但是出現這個結果的原因十分多，並非只源於武力清理廣場，這些原因包括由於中國長期堅持改革，農村基本穩定；市民求穩怕變心態；中共擁有強大軍力，其在鬥爭中成長，而非如東歐共產政權般靠外來勢力扶持而在市民心目中較有威信；以及能有效控制輿論等。當然，中國領導人始終理性地堅持改革開放也是中國能維持穩定、保持經濟繁榮的重要原因，故此，不能片面地說政府當時的強

硬決斷措施是中國能保持穩定的唯一因素。

雖然歷史無法重演，但這裡希望指出的是假若中國政府在四月下旬學運開始時能更重視疏導市民的不滿情緒，或如趙紫陽指出的「應把廣大青年學生和社會上很多同情者的行為與極少數人的企圖利用學潮……攻擊黨和社會主義的行為嚴格區別開來，避免把整個學潮籠統地作一個敵我矛盾性質的定性……採取疏導方針，避免激化矛盾」，或是如李鵬說的：「當然，那篇社論還可以寫得更好一些，把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寫得更清楚一些……要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註一〇〇)再加上政府領導層能基於對共產黨的治國威望有信心，承諾市民可逐步享有結社及進行其他民主改革的話，可能學生根本不會進行一些令政府完全不能接受的非理性行動。例如構成八九民運一個重大轉折點是學生在戈爾巴喬夫訪華時進行絕食，以世界輿論向政府施壓，令中蘇高峰會議黯然失色。實際上，這件令中央認為是「嚴重干擾了國家的重大外事活動和損害了國家形象」的絕食行動根本被當時北京的學運組織北高聯否決及勸阻，絕食行動之所以可以不理北高聯聯勸告而被發動，一則當然是受某些過激分子或有意向中央施壓的人鼓勵所致，然而，中央在四二六社論對學運定性為動亂亦是引起學生憤怒的原因，導致某些過激主義者有機可乘。

從民主政制發展的歷史分析，群眾的爭取是促成民主政制開花結果的一個重要元素，故此，八九民運中大學生及知識分子懷著愛國愛民主的熱誠、坐言起行去爭取的行動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客觀地說，這次民運亦出現了眾多非理性情況，導致大多數服從少數的非民主行為及過激的錯誤。為了使將來進行的民主運動有所借鑑，以免重蹈覆轍，這些問題實要深刻反省。

首先要重視的是在爭取民主的同時，一定要保持理性化的態度，正如學運領袖翟偉民指出：

「學運期間人們的情緒正處於高漲狀態，所以理性的東西往往不易為民眾接受，而非理性的東西由於適合了民眾的心理，因此往往能夠贏得

群眾。」^(註一〇二)

學運期間同學情緒高漲至亢奮階段，在學生當中造成一種強大的無形道德壓力，只要有不同意見，激進者肯定佔上風，從而出現了如吾爾開希指出的大多數人服從少數的情況。

由於同學對有節有理、既爭取又協調的爭取策略表示懷疑，而純粹的道德主義更使他們不能客觀地審察時勢，配合中共高層開明的溫和處理學運路線，以達成和平結束八九民運並保留民間實力的效果。中共改革派官員陳一諮指出：

「是民眾，特別是學生沒有給予黨內改革力量的領導人以充份的支持。一直到最後，很多學生還將黨內改革力量視為鬥爭對象，以不肯與之合作來表現所謂追求民主的高尚純潔，這也是政治上幼稚的表現。」^(註一〇三)

四月底趙紫陽從朝鮮回國後，他的溫和疏導主張成為中央處理學運的主流，然而學生的過激絕食行動使其努力全面失敗。學生以「沒有理由參與黨內鬥爭」為理由，拒絕配合趙紫陽的溫和路線。翟偉民反省地指出：「事實上，我們已參與了政治，我們的姿態使我們被動參與政治，被動參與不如主動參與好。主動參與的結果可能避免六四的屠殺。」^(註一〇三)

既然中央採取如趙紫陽說的「空硬」及其採用的溫和路線皆不能平息學運，剩下來的只是矛盾更為激化，使強硬派觀點再度抬頭，並最終要採取真正的強硬手段結束學運，導致六四的悲劇。故此，除了譴責政府對學運作全面動亂定性以及以過份強大武力清場而造成流血的同時，實也應正視檢討部分過激學生之激烈行動，以及不予黨內溫和處理學運之機會。從上述政府與學生在八九民運中的互動接觸、互相激化矛盾的情況可以總結，王軍濤提出之和平有秩序的政治改革論點是十分切中時弊的，雖然中國社會有很多足以維持穩定的因素，但中國在八八、八九年間由於深入改革觸礁，社會經濟各領域皆充滿危機，假若處理不當，中

國實也有出現混亂的可能。在學生絕食後第五天，王軍濤指出：

「由於近幾年構成社會中堅的主要階層利益相對受損，不滿情緒蔓延在社會各層，嚴重的經濟問題又加劇了這種情緒，同時由於中國社會中構成中產階級的社會階層過於弱小和缺乏獨立意識，在社會態勢中難以成為主導力量。這就使得社會不滿很容易造成不負責、不顧後果的激憤情緒……這就給一些沒落社會勢力以可乘之機，不惜挑起事端，孤注一擲，從而激化矛盾，令各方失去克制。」(註一〇四)。

由於中國缺乏一個強大的、具現代理性意識的中產階級「現代市民社會」，假若國家在失控環境下，一些傳統性質的解體因素則甚有可能出現，使中國出現內戰及天下大亂局面。中國問題專家魯凡之指出：

「在國家相對失控及動盪癱瘓的空隙中，雛型的現代社會發展看來取得有利條件抵消不上不利條件……傳統性質的解體因素——例如惡化的地方傾軋，變相的地方割據，軍人勢力集團坐大，大規模遊民演變為民變……等等，現在都已經可以相當明顯地看到有關的跡象……即使是人民抗爭的民眾運動，也會是傳統式的民變，超過現代式的市民運動……當代中國如果再度出現一次新的天下大亂，那並非中國人之福，犧牲必然慘重」(註一〇五)。

為保證中國不會出現天下大亂的內戰局面，各方面政治力量在將來交往的過程中，應反省八九民運悲劇的經驗，採取容忍開放的理性態度，避免流血及激化矛盾，保持社會穩定，使經濟改革的成果得以維持。

第五節 總結

要使中國步向長治久安，步入現代化，一定要落實民主化，順應潮流讓多元化社會上各個階層、團體能參與政治。要達至此目標，中國應進一步推行改革開放，促成社會活躍多元局面無從逆轉，此外，政府領

導人亦宜認清社會客觀前進大氣候，主動推行政治改革，通過制度化渠道疏導社會上的不滿情緒，使各種利益衝突及困擾共產主義政權的繼承權問題能通過民主法制和平解決。再者，民間各種力量在爭取民主時，應理解中國國情，珍惜改革開放以來得來不易的穩定繁榮局面，支持中國政府的改革開放通過和平有秩序的方法進行改革，以更理性態度避免仇恨及流血，保持社會穩定，從而保證民主化能通過與政府的合作而穩步地落地生根。

註 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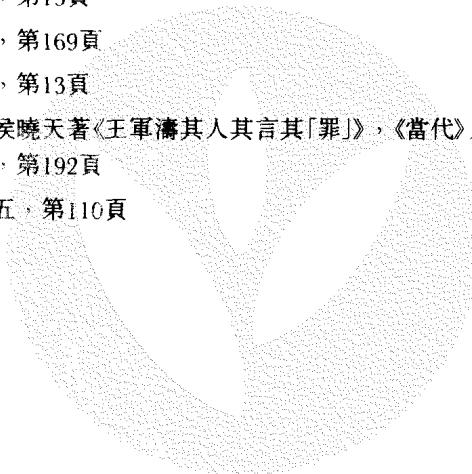
- 註一 <與吾爾開希對談>載何芝洲編著《八九年北京學潮資料集續編》，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一九八九年十月，第36頁
- 註二 陳希同<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載同註一，第89頁
- 註三 <今年六月初鄧小平聽取趙紫陽匯報時的講話>載張結鳳等著《血沃民主花——學運、民運、國運》，百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一九八九年，第241頁
- 註四 張結鳳「大陸社會人心混亂」載同註三
- 註五 船夫《十年學潮紀實》，北京出版社，一九九零年，第223頁
- 註六 <袁木等與學生對話>《文匯報》，一九八九年四月三十日
- 註七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300頁
- 註八 同註二，以及張結鳳<中國大趨勢：萌生獨立意識的土壤>載同註三
- 註九 方勵之<創造性、獨立性的現代人材>載《從魏京生到吾爾開希》，海風出版社，第183頁
- 註十 同註七，第302頁
- 註十一 同註一
- 註十二 方勵之<知識分子和中國社會>，香港大學學生會國事學會編，集賢社出版，一九八八年，第12頁
- 註十三 同註五，第218頁
- 註十四 華原《痛史明鑒——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泛濫及其教訓》，北京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116-117頁

- 註十五 同註七，第284-285及360頁
- 註十六 劉必〈鄧稱不挑社會主義這個頭〉《鏡報》月刊，一九九一年三月
- 註十七 陳一咨《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聯經出版社，一九九零年，第161頁
- 註十八 〈楊尚昆在中央軍委緊急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何芝洲編著《八九北京學潮資料集》，香港新一代出版協會，一九八九年，第91頁
- 註十九 袁木與學生對話內容摘要，載同上註，第118頁
- 註二十 同註二，第86頁
- 註二十一 〈趙紫陽為處理動亂自辯全文〉《信報》財經新聞，一九九四年六月四日，第9版
- 註二十二 孫石先〈鄧小平鎮壓學運的前因后果〉《鏡報》月刊，一九八九年七月，第42頁
- 註二十三 穆望〈中南海高層鬥爭真相〉《鏡報》月刊，一九八九年六月
- 註二十四 程翔《天安門的反思》，勵志出版社，一九九零年二月，第29頁
- 註二十五 同註二十三
- 註二十六 同註十八，第94及95頁
- 註二十七 〈李鵬與絕食學生對話摘要〉載同註十八，第52頁
- 註二十八 趙前〈方勵之張顯揚之流早就提出要搞『動亂』〉載同註一，第170頁
- 註二十九 〈八九民運為我們留下甚麼——普林斯頓紀今『六四』二週年座談會紀要〉《九十年代》，一九九一年六月
- 註三十 同註五，第221頁
- 註三十一 張結鳳〈五四七十週年中共嚴陣以待〉載同註三，第202頁
- 註三十二 同註三十一，第205頁
- 註三十三 傅中〈總書記親定兩會防亂基調〉《鏡報》月刊，一九八九年四月
- 註三十四 趙紫陽〈胡耀邦追悼大會的悼詞〉
- 註三十五 〈天安門『悼胡』人潮多達廿萬〉《快報》，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九日
- 註三十六 同註三十五
- 註三十七 〈告全國高校生書〉，北大籌委會，一九八九年四月廿四日
- 註三十八 同註註二十二
- 註三十九 同註五，第236-237頁
- 註四十 同註一，第93頁

- 註四十一 同註二十二
- 註四十二 〈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人民日報》，一九八九年四月廿六日
- 註四十三 同註二十二
- 註四十四 同註二十一
- 註四十五 許家屯《許家屯香港回憶錄》《香港聯合報》，一九九四年，第373頁
- 註四十六 同註二十一
- 註四十七 同註二十七、第57頁
- 註四十八 〈維護大局 維護穩定〉《人民日報》一九八九年四月廿九日
- 註四十九 同註二十七
- 註五十 同註二，第95頁
- 註五十一 李鵬〈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的錯誤的報告〉載同註一，第67頁
- 註五十二 同註五，第247頁
- 註五十三 〈李鐵映闡明復續與學生對話〉《大公報》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
- 註五十四 同註十七，第158頁
- 註五十五 同註十八引用之書籍，第87頁
- 註五十六 同註二十一
- 註五十七 同註十二，第15頁
- 註五十八 同註五，第252頁
- 註五十九 「絕食書」絕食團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四日
- 註六十 同註四十五，第375頁
- 註六十一 陳子明《陳子明反思十年改革》，《當代》月刊出版，一九九二年五月，第405頁
- 註六十二 〈北京知識界聯署發表『五·一六』聲明〉《經濟日報》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
- 註六十三 克里斯多夫〈強硬派怎麼贏的〉《紐約時報》雜誌，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 註六十四 〈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的談話〉載同註十八，第47頁
- 註六十五 同註四十五，第375頁
- 註六十六 同註二十一
- 註六十七 同註十八，第92頁

- 註六十八 同註二十三
- 註六十九 同註註十八
- 註七十 十 同註十七，第160頁
- 註七十一 同註四十五，第372頁
- 註七十二 同註十七，第160-161頁
- 註七十三 同註二十三
- 註七十四 同註五十一
- 註七十五 同註二十七
- 註七十六、七十七 同註二十四，第29-30頁
- 註七八八 〈戒嚴令下的北京城〉《新晚報》，一九八九年五月廿一日
- 註七十九 同註四十五，第375頁
- 註八 十 中共中央宣傳部編《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六月，第17頁
- 註八十一 同註十八，第93頁
- 註八十二 金鐘〈清場、屠城及其他〉《信報》，一九九四年六月十四日
- 註八十三 同註二十四，第78頁
- 註八十四 同註十八，第90頁
- 註八十五 〈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聲明〉同註一，第130頁
- 註八十六 同註二十三
- 註八十七 同註四十五，第377頁
- 註八十八、八十九 同註二十三
- 註九 十 同註八十二
- 註九十一 高新〈六四慘案：軍民死了多少人——兼答海外眾多有疑問者的疑問〉《中國之春》一九九一年六月
- 註九十二 同註七，第297頁
- 註九十三 金翟基〈天安門事件的解讀〉原載《信報財經月刊》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 註九十四 魯凡之〈中國與民主〉載匯點論政編委會編《歷史的回響》，匯點有限公司，一九九一年，第64頁
- 註九十五 魯凡之〈中國往何處去？——『六四慘案』之後的文化結構分析〉載王耀宗、郭少棠合編《神州四十年》，百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第120頁

- 註九十六 王軍濤〈強人之後的政治格局——中國民主化的前景〉《開放》雜誌
一九九四年六月
- 註九十七 David Brown and Michael J. Harrison: A Sociology of Industrialisati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78 P129-130
- 註九十八 同註十六
- 註九十九 《明報》一九九四年七月七日
- 註一〇〇 李鵬〈五·二二內部講話〉載同註十八，第84頁
- 註一〇一 同註六十，第13頁
- 註一〇二 同註十七，第169頁
- 註一〇三 同註六十，第13頁
- 註一〇四 王軍濤、侯曉天著《王軍濤其人其言其「罪」》，《當代》月刊出版，一
九九二年，第192頁
- 註一〇五 同註九十五，第110頁



第五十二章 六四後之危機與回應，以及 經濟治理整頓政策（一九八 九——一九九一）

導 言

隨著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央以強大武力清理天安門廣場靜坐之學生，以及清洗及逮捕黨內外持不同意見的民運人士等一連串事件後，中共迅速更換總書記，任命江澤民上台。當時中國政府面臨著城市部分人口對六四事件的不滿；經濟上由於治理通脹而引發的消極因素，如銷售疲軟、資金緊張、三角債、工業速度回落過猛及失業問題；西方國家對中國採取制裁，以及東歐共產政權迅速倒台之困境。

面對各項經濟、政治及社會危機，中國政府採取以穩定及爭取民心，基本仍堅持經濟改革開放的政策。在政治方面則強調「反和平演變」，在經濟領域則堅持經濟緊縮及上收權力的「治理整頓」措施，以解決通脹問題。中央政府在收回已下放經濟權力的同時，仍理性地利用需求減慢的時機調整物價，然而，中央傾向保守穩重的經濟政策廣泛受到地方政府的抗拒，而反和平演變措施亦有否定中國十年改革開放的趨勢。改革倒退的危機引起鄧小平警覺，他反覆強調再次擴大開放的迫切性，並在上海數次發表鼓吹改革開放的談話，以求扭轉政治經濟上的保守局面。上述的趨勢與危機最終引致鄧小平於九二年初發表南巡講話，使中國經濟的改革與發展又一次戲劇性地推向新紀元。

第一節 六四後中國政府面對的危機

一 城市不滿，但全國形勢仍基本穩定

在政治方面，中國政府在天安門的清場行動通過境外駐京記者等渠道迅速傳遍世界，再通過英國BBC電台及美國之音等傳回大陸，再加上

中國市民的輾轉相告，頓時引起中國部分主要城市的強烈反應，而海外華人社會亦極為震動，各處皆舉行集會，譴責中國政府鎮壓民運。

雖然在六四事件期間，學生號召總罷工及罷課以期挽回民運失敗局面，繼續向中央抗爭，但面對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的強大壓力及輿論，學生的呼籲顯得無力，各地學運被地方當局迅速瓦解。值得留意的，是中國政府的處理方式雖然引起外國政府、海外華人及大陸各主要城市的部分知識分子及群眾的反抗情緒，然而，由於中國的資訊傳遞相對落後，再加上農民樂天知命及安於改革成果的情況下，佔中國絕大部分人口的農村仍十分穩定，就算離北京較近的農村亦普遍對北京所發生的事件缺乏了解，平靜安穩的農村形勢有力地支持著中央政府統治的基礎，使其可以主動、有空間地採取回應危機及挑戰的政策措施。

二 經濟新難題——緊縮政策下的消費市場疲軟、企業倒閉、工人失業、三角債以及外債高峰期問題。

中國政府在八九年中旬除面臨自八四年便開始產生的經濟難題，如通脹、政府財政赤字增加、外資逆差、經濟結構失調、分配不公、權錢結合而來的貪污腐化及治安惡化等老問題外，還須處理由於回應八八年經濟增長過速、貨幣投放過大，以及搶購潮而實施的，志在壓縮總需求的財政、金融雙緊政策而帶來的負面經濟難題。

以壓縮總需求為主要措施的「治理整頓」政策在八八年九月正式開展，雖然在當年年底初步取得一點成績，然而多數地方及單位對壓縮經濟之決心不大，並普遍採取觀望態度，社會總需求仍保持膨脹的發展。八八年底和八九年初，中央通過召開多個會議，明確目標和手段，動員各地方落實「治理整頓」之緊縮政策，再加上八九年六四事件後，政治上的強化使緊縮措施效果加強，工業增長速度逐步回落，例如一至六月工業產值增長百分之十點八，比上年同期增幅回落六點四個百分點，第三季繼續回落，只增長百分之五點四。而固定資產投資規模也是逐季減少，第一季度縮減了百分之二，第二季度縮減了百分之六點八，第三季度

度縮減了百分之九點三。此外，消費需求亦出現同類情況。

雖然「治理整頓」政策於八九年中旬發揮了效果，但亦出現很多新的經濟困難，分別是：

(1) 市場銷售疲弱、工業生產大幅下降及企業虧損增加

自八九年八月以來，中國市場普遍出現逐月疲弱情況，大多數商品銷售量皆呈現下降，其中「穿用」商品銷量下降大於「吃」的商品，高檔商品降幅最大，此為近十年從未有過之現象。全國市場出現此變化，反映了國家採取宏觀緊縮政策，減少投資規模，控制集團性消費，分流社會購買力，使居民消費心理有所變化而持貨幣觀望者增多。當然，政府提高存款利率、實行保值儲蓄及過往消費品價格過高等，皆影響市民的消費意欲。

然而，從另一方面分析，是次市場嚴重疲弱亦反映了中國經濟結構失衡之問題。過往中國加工業（筆者按：即輕工消費日用品等）盲目發展，質量差，而農業方面則生產遲緩，農民收入低微，自然對工業品缺乏購買能力。經濟結構失衡問題過往由於投資、城市及集團消費需求旺盛，產品質量問題不單未被正視，反而更由於市場興旺而使生產進一步盲目發展，產品價格亦能高企。現時一旦經濟緊縮，消費品市場立即出現商品大幅滯銷。

市場疲弱對經濟產生嚴重的負面效果，第一是於工業發展陷入困境，工業生產下降，企業停產日多。第二是企業利潤下降，虧損面擴大，效益惡化，這不單使國家從企業的收入減少，更迫使政府為搞活企業而必須加大補貼支出，嚴重影響國家財政的收支平衡。第三是由於產品未能銷售，而使工業及商業庫存增加，大幅佔用企業資金，進一步加強了資金緊張局面。第四是企業倒閉，造成失業人口驟增。

八九年此經濟困局與十年前——即七九年調整之局面不同，那時由於大力發展個體及鄉鎮企業，使由於調整政策而多增的失業人口有出路。然而，八九年個體和集體企業亦不景氣，無力吸納失業人口，使社會之經濟穩定受到嚴重威脅。

(2) 企業債務鏈——三角債的困擾

企業由於商品積壓，資金無法回籠，以致資金短缺，同時政府因實行緊縮政策而導致企業固定資產投資的資金來源不落實，使很多企業無能力或不願意償還其對另外企業或銀行的債務。這種困境，嚴重影響提供原材料或其他產品及服務的企業，形成一個相互拖欠，一環扣一環的債務鏈，接近三份之二的企業陷入三角債的困境，八九年全國企業不正常的拖欠大體在四五百億元左右。（註一）

三角債不單使銀行無法收回企業貸款，影響貨幣回籠，更迫使銀行要增發鈔票以支持經濟發展，造成嚴重的通脹壓力。在另一方面，債務鏈更反作用於生產，各個企業由於缺乏流動資金，無力維持生產，經濟停滯不單帶來失業困擾，更嚴重影響國民經濟發展後勁，並使經濟、人心及社會的穩定受到威脅。

從上述事件分析中可以清楚看出，中國政府面臨著既要控制通脹，又要維持經濟增長及防止失業的兩難局面，為防止經濟停滯進一步加深，政府在一九九零年初起，便逐漸增加投資及貸款，促使經濟回升。

三 國際因素——外國制裁及東歐蘇聯震動

在六四事件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採取了一系列經濟文化制裁措施，如美國阻止外國政府及國際機構向中國貸款，停止中美商務往來、銷售武器以及停止高級官員間的接觸等。八九年七月召開的西方七國領袖會議，更通過譴責及制裁中國的宣言，聯合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

六四事件後不久，即從八九年下半年開始，一場聲勢浩蕩的群眾運動席捲蘇聯及東歐各國，使很多推行社會主義的國家產生了劇烈的變化。波蘭、東德、匈牙利、保加利亞、捷克及羅馬尼亞等國家的共產黨下台、分裂、解體，並紛紛更改國名，取消社會主義旗幟與制度，思想傾向西方的政治人物上台執政，經濟走向市場及私有制，而這些國家內一向被壓抑的民族矛盾隨著中央權威的崩潰而重新湧現，

東歐處於極度動盪之中。

令中國政府產生最大震動的，為八九年十二月下旬羅馬尼亞執政者、共產黨總書記齊奧賽斯庫這位中國政府親密朋友，被革命法庭處決。

蘇聯也處於政治動盪及民族分裂的困擾中，一年多之後，蘇聯發生了與東歐國家相同性質的劇變，導致蘇聯內各加盟共和國紛紛獨立，國家解體，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下台。

蘇聯、東歐大變使西方國家中希望推翻中共政權的勢力感到鼓舞，他們預言社會主義已徹底失敗，中國政府很快會垮台。對中國政府而言，國際局勢風雲變色，亦使其需要嚴肅考慮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資優越、蘇聯東歐產生巨變的原因和教訓、以及七八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改革開放政策之歷史地位、功能及前瞻等。

第二節 中共回應危機的總方針與組織——江澤民上台

一 鄧小平重申改革開放的國策不變

面對人心不穩、經濟衰退、東歐劇變、外國制裁及幹部對前程迷惘等危機，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明確地提出整體的回應策略。

其實早在六四強力清理天安門靜坐群眾的前幾天，鄧小平在會見李鵬及姚依林時便已清楚地指出要有一個「搞改革開放的班子，……做幾件開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機會就不要丟……要造幾個香港，就是說要開放，不能收，要比過去更開放。……如果沒有香港，起碼我們信息就不靈通，總之，改革開放要更大膽一些。」（註二）

八九年六月九日，鄧小平於強力清理天安門廣場後首次露面接見戒嚴部隊，強調要冷靜地考慮過去與思考未來，他提出兩個問題：

「第一，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是不是因為發生了動亂……就發生了問題？第二，黨的十三大概括的一個中心，兩個基

本點……即四個堅持和改革開放，是不是錯了？」（註三）

鄧小平接著作了十分清晰及堅定的回答：

「改革開放這個基本點……沒有錯，沒有改革開放，怎會有今天？」在未來建設中國的總方針問題上，鄧小平指出「以後我們怎麼辦？我說，我們原來制定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照樣幹下去，堅定不移地幹下去。」（註四）

從鄧小平在決定以嚴厲方法處理天安門學運前後的這些談話可以看出，即使在面對極其困難及關鍵的時刻，鄧小平還能夠高度理性地強調改革開放路線。六四後有部分強硬派領導及堅持傳統社會主義理論的意識形態幹部，十分希望將伴隨改革而出現的負面社會經濟問題以及學運等民間自發運動，全部歸咎到資產階級自由化，從而基本動搖改革開放路線，在這關鍵時刻若無鄧小平的堅持執著，中國實有回到閉關自守路線上的危險。

基於堅持改革開放，並提防某些人提出「全面清算趙紫陽在政治、思想、經濟等領域所犯的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錯誤」，挑戰改革開放的根本路線，鄧小平再三強調：「我再說一下不爭論的問題。十三大的報告不是趙紫陽一個人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一直講的，不要隨便觸及這些改革開放政策。」（註五）

二 沉著應付、韜光養晦、發展經濟

雖然中國堅持改革開放總路線不變，然而，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政權之崩潰，也使中央極為震動，某些強硬領導人要求在黨內批判戈爾巴喬夫和其提出的新思維，並提出中國要做「社會主義的中流砥柱」（註六），他們更聲稱：

「十年前我們沒有資格稱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現在事實已證明中國是社會主義唯一不倒的大旗……戈爾巴喬夫是東歐變化的罪魁禍首，現在看清楚了，他的新思維就是放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領導，迎合帝國

主義和平演變戰略搞資本主義。」(註七)

這些強硬派幹部以鄧力群作總協調，並以中共中央宣傳部集合起一群寫作班子，寫出大批文章，準備像六零年代中蘇大論戰般與蘇聯、東歐等進行大論戰。

然而，這次論戰行動未為鄧小平接受，鄧認為中國在當時的形勢下，穩定是壓倒一切的任務，他指出：

「現在西方制裁中國，我們再批蘇聯、東歐，兩面出擊，不是上策。……現在我們要把自己國家的事情，特別是經濟搞好，別的國家的事，管不了那麼多。」(註八)

鑑於要維持穩定及發展經濟，鄧小平提出了「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等十六字方針(註九)，重心為收斂鋒芒，把自己的事辦好，埋頭苦幹，把經濟搞上去。八九年九月，在會見幾位中央領導人時，鄧小平指出：

「在這些國家動亂的時候，中國要真正按計劃實現第二個翻番……首先中國自己不要亂，認真地真正地把改革開放搞下去……只要這樣搞下去，旗幟不倒，就會有很大影響……我看總的局勢是這樣，唯一的辦法是我們自己不亂，我們的基礎好，是幾十年打出來的。」(註十) 鄧並反覆強調「要冷靜、冷靜、再冷靜，埋頭實幹。」(註十一)

總的來說，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以繼續進行改革開放政策、發展經濟、保持社會穩定以及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幹實事的總體方針來回應六四前後國內外的危機。

三 領導層改組——江澤民上台

中共高層在確定新階段戰略的同時，亦開展對高層領導的大換班。六四事年後，八九年六月下旬，中共中央召開十三屆四中全會，撤銷趙紫陽中共中央總書記和其他職務，而幾位被認為在中共內對學生運動採

取較容忍的高層官員如胡啟立、芮杏文及閻明復等亦遭罷免。

是次會議通過了李鵬提出的〈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會議認為趙在國家生死存亡關鍵時刻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錯誤，並批評他主持中央工作以來，消極對待堅持四項原則問題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針，會議除決定罷免他的所有職務外，更對他的問題繼續進行審查（註十二）。在後來八月十八日的中共中央組織部召開的全國組織部長會議中，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宋平進一步批評趙紫陽的錯誤，他指出：

「決不能低估趙紫陽同志的錯誤所造成的影響……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同趙紫陽同志的錯誤是分不開的，他實際上放棄了四項基本原則，消極對待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針……給黨的事業造成了嚴重的損失。」（註十三）

除批評趙紫陽等外，十三屆四中全會更組成新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會議決定任命江澤民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增補江澤民、宋平、李瑞環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雖然江澤民的任命是於六月廿四日才對外宣佈，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安排其實早在六四前已確定。八九年五月廿一日鄧小平在會見李鵬及姚依林時，鄧小平為安撫這兩位在處理學生運動站於最前線的中央領導，指出：

「希望大家能夠很好地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很好地團結。」（註十四）
「不要互相不服氣，自己消耗力量。如果是你不信任我，我不信任你……小的不同就會變成大的衝突。」（註十五）鄧並告誡他們：「還有一個問題，黨內無論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註十六）

江澤民與鄧小平並沒太大的淵源，由這位在中共黨政軍內地位相對不顯赫的上海市領導出任總書記實有點令人感到意外，究竟為甚麼中共高層同意讓江澤民出任此重要職務呢？「知情人士稱，就在鄧小平考慮誰來接替趙紫陽的時候，李先念、陳雲等老人一再向鄧小平推薦江澤民……認為江是堅持『兩個基本點』的好幹部，力主調江到中央。」（註十七）

陳雲、李先念的建議很快就為鄧小平接受，而成為中共元老們的共識。鄧首先是希望尋找一個令人「感到是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班子」，鄧曾指出：「如果我們擺一個陣容，使人民感到是一個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將來鬧事的情形就還會很多很多，那就真正要永無寧日。」(註十八)

既然不能組織一個形象保守的僵化班子，那麼一些以保守強硬見稱的領導人就不能出任總書記，鄧小平深知這樣的安排會令那些在平息學運時表現積極及堅決的人士不服，故他反覆的勸告他們：

「考慮任何問題都要著眼於長遠，著眼於大局。許多小局必須服從大局」……「在選人的問題上，要注意社會公信，不能感情用事……我們現在就是要選人民公認是堅持改革開放路線并有政績的人，大膽地將他們放進新的領導機構裡。」(註十九)

正由於這個原因，江澤民及李瑞環這兩位直轄市領導人被選進中共的最高決策層——政治局常委會中。

中央選擇江澤民為繼毛澤東(第一代)、鄧小平(第二代)的第三代領導班子核心，主要是由於以往江澤民一直能既貫徹執行改革開放，亦能實行四項堅持——在經濟上開放、政治上集權的兩個基本點路線。此外，江澤民作為上海市領導，有管理城市經驗，再加上上海為中國經濟的龍頭，與外國打交道特別多，作為上海市的第一把手，江澤民經常需要與外商會面，而江澤民亦予外國一個改革開放的鮮明形象，故其出任總書記亦較容易為國內外接受。

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及黨的領導方面，江澤民的表現可以從八六年底的學運談起，當年上海學運規模極大，但沒有發生重大流血事故而平息下去。八九年的學運聲勢更為浩大，然而上海卻只有十萬多人參加，就算在北京六四事件後，上海亦沒有出現重大的武力衝突及流血事件，上海的相對平靜固然與八九年學運以北京為中心，以及六四強力清場的威懾力有關，但顯然江澤民在其中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令中共元老對江澤民欣賞及放心的，就是在八九年學運於四月中旬

發生不久，以江澤民為首的上海市委以堅決的態度，針對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刊登四月十九日於北京舉行的為胡耀邦平反、及為自由化翻案的座談會紀錄，而決定整頓此份改革形象鮮明的報刊，停止其總編輯欽本立的職務。由於當時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對江澤民的決定並不支持，並指責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動了」^(註二十)，再加上導報在八九年五月上旬就上海市委阻撓其刊登一份支持欽本立聲明，而打算以民法控告上海市委，使江澤民受到極大的壓力，但這在另一方面亦證明了江澤民維護中共政權不容侵犯的主動性及決心。此外，在對待一些社會性問題上，如對上海要求選美，江澤民亦以這是屬於精神污染而加以禁止，江澤民的決定被中共某些元老認為能自覺地與中央一致，也使他們對江澤民擔任總書記更為放心。

第三節 九零、九一年江澤民任總書記期間的重大政治措施

鄧小平在八九年五月底曾希望「新的領導機構應該做幾件改革開放的事情給大家看……學生不過是提出繼續進行改革的要求，而我們是真幹，這樣就合拍了，隔閡就自然消除了。」^(註二十一)然而，在鄧小平講話後的四天內，中央已用了強大軍力平息學運，整個社會處於極度敏感狀態中。由於中央高層內較同情學運的力量已被學運的發展及強硬派衝擊得七零八落，加上需要以決斷措施穩定局勢，促使江澤民先行向強硬派靠攏，所以那時江澤民的講話經常強調要反對和平演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

在平息學運後的半年內，中共新領導層為維持政權的生存和穩定，以回應各項危機，故此階段的工作重點多為強硬政策，如發出通輯令、逮捕在逃學運領袖、清洗幹部、加強意識形態控制、突破外國制裁等。在經濟領域方面，除了利用此有利時機繼續推行治理整頓外，更打擊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經濟基礎——個體工商業戶，以「限制其不利於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消極作用」^(註二十二)。個體戶雖為開放改革的產物，

但當時不少中央領導人把他們看為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經濟基礎，他們的經營也被視作剝削行為，經常偷稅漏稅，故需要從嚴處置。據權威資料指出：「江澤民主張對違法經營的個體經濟要不留情地整治，甚至令其傾家蕩產」（註二十三）。此外，為加強對個體經濟戶的控制，在發營業執照時多設關卡，不讓個體經濟隊伍擴展的同時，中央更清晰下令「有剝削行為的人不能入黨」（註二十四）。

然而，踏入八九年底，隨著社會經濟形勢的穩定，即時威脅政權生存的因素消除，可以清晰看到中央的政策開始寬鬆，這包括重新強調多黨合作及政治協商制度，釋放部分民運人士，並容許某些著名民運領袖如方勵之等出國，加強務實外交以及在經濟領域上增加放款，調節治理整頓的力度，以保證經濟不會出現更嚴重的滑坡。

一 鎮壓與整肅——八九年六月十三屆四中全會後的重點

（1）整黨、輯捕學運及工運的活躍分子

在決定江澤民當總書記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中，中央決定要抓好四件大事，一是徹底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二是繼續搞好治理整頓；三為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四是大力加強黨的建設，懲治腐敗。（註二十五）這四件事中，除了第二件是屬經濟性質外，其餘三件，正如江澤民在此會議上講的：「徹底平息反革命暴亂，是當前第一位政治任務……對製造動亂和暴亂的一切政治陰謀，一定要繼續清查和徹底揭露……對於……參與暴亂的反革命暴徒，務必依法懲處，堅決打擊，決不能心慈手軟。」（註二十六）中共隨即對學運、工運的活躍份子通輯逮捕。同時在黨內亦進行一次徹底的組織整頓和思想整肅。

和四中全會同時召開的中共中央紀律檢察委員會會議中，明確指出「對在這場動亂和反革命暴亂中喪失政治立場違犯黨的紀律的黨員，要嚴格執行紀律，直至開除黨籍。違法犯罪的由司法機關依法懲處。」（註二十七）為保持黨的純潔性，中央決定要下決心對各級黨組織從思想到組織上，進行認真整頓：重點是首先通過學習中央文件，並

對照檢查自己在學運中的行動和思想，而在思想整頓基礎上，進行組織整頓。是次整頓基本上採用中共過往歷次重大整風時的習慣，每個黨員均需參與，以學習文件、對照檢查等方式進行。「於中共黨內，隨著黨員登記活動的開始，江澤民及主管黨務的宋平均發表了從嚴治黨的強硬講話，以改變黨內嚴重的『思想不純、組織不純、作風不純』問題，清除仍在崗位上掌權的自由化分子。」（註二十八）

在搜捕民運分子方面，不少在八九民運期間活躍的學運、工運領袖被明令通緝。在搜捕過程中，中共利用告密、檢舉、自首從寬等多個方式。據中央宣稱，在六月十五至二十一日的一週自首限期內，僅上海市已有一百二十六人前往自首。

（2）整頓軍隊

由於槍桿子裡出政權，軍隊服從中央指揮是中共政權得以穩固的重大關鍵。六四期間北京曾出現過零星的軍事對抗，在中共新領導層基本控制局勢後，便開展對軍隊作大規模的整肅，對民運期間同情學生、執行鎮壓命令不堅決的軍事幹部進行清洗，其中較為突出的是國務院與中央軍委在九零年二月免除了武裝警察部正副司令員及正副政委四人的職務（註二十九）。在《解放軍報》六月二十二日的社論中，中共軍方高層承認軍隊中有與中央步伐不協調的現象：

「態度曖昧，搖搖擺擺者有之……個別的甚至走得更遠，一些人平常也講要同中央保持一致，然而關鍵時刻卻在這方面交了一份不太合格的答卷……在這一場重大的政治鬥爭中，難道不應該從思想深處認真地思考一番，在黨和人民的考驗面前，自己合格嗎？」（註三十）

為穩定軍隊，中共除更換部分軍事將領外，更強調對部隊之思想工作。九零年二月，中共總政治部發出通知，要求全軍幹部學習馬克思理論，並與之結合反和平演變及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此外，一些在六四時執行政策得力的軍事幹部被提升，軍費開支亦有所增長，以加強軍事設備，並增加軍官的補助與軍餉，在宣傳方面，各傳媒皆以大篇幅宣傳軍

隊，重新塑造解放軍之正面形象，並提高軍隊之士氣。

（3）寬鬆調整鎮壓力度

六四後半年，當中共領導層基本穩定局勢時，便開始對鎮壓緝捕的政策作了部分寬鬆的調整，例如在九零年一月釋放接近六百名因八九學運而被逮捕的人士（註三十一）。此外，更開始對一些重要民運領袖採取准許保外就醫或其他方式，促使他們離國，其中較出名之民運人士包括方勵之、工運領袖韓東方及侯德健等。

當時，中共元老陳雲亦指出對於黨員的處理要格外慎重，只要檢討了，就不要扭住不放，陳雲認為：

「扭住不放，不是我們黨的好作風，在這方面，我們黨是有很深刻的歷史教訓的。」陳雲進而為一些六四期間被批評的黨員開脫：「一九八九年的這場風波，是建國以來沒有發生過的非常複雜的政治事件，也是我們黨內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一場特殊的政治鬥爭。當時中央常委有兩種不同的聲音，加上中央有些報紙進行了錯誤的宣傳，使得中央和地方的不少領導同志都不了解真實情況。所以我主張，對於這場政治鬥爭，應該採取正確的黨內鬥針方針來處理……對犯有錯誤的同志的審查，應該是實是求是的。」（註三十二）

中共採取較理性的寬鬆政策，固然與國際輿論壓力、西方經濟制裁、以及將這批異見分子放逐海外，有利減輕國際政治壓力，並保證異見者無法在國內發生影響力等有關。然而，在另一方面，也可以視為中共在穩定局勢後，較有信心地推行相對開明的務實政策，以緩和社會對立之氣氛。

二 強化意識形態與反和平演變政策

（1）強化意識形態的措施

中央政府在建國以來一向重視思想工作，而八九年的學運亦被視為

「國際上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加緊進行思想、政治滲透和國內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的惡果。」^(註三十三)八九年十一月底，江澤民於新聞研討班上講話中強調控制輿論單位的重要性，他批評在八九學運中，「一些新聞單位不但不去揭露和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制止動亂，反而為動亂、暴亂的策劃和支持者提供輿論基地，對動亂的形成和發展起了煽風點火、推波助瀾的作用。」^(註三十四)

為加強思想控制，並「改變黨內相當嚴重的思想不純、組織不純、作風不純問題，清除仍在崗位上掌權的自由化分子」^(註三十五)，中央決定更換以往分管意識形態的胡啟立及芮杏文職務，並在管理意識形態的部門上換上了新的領導人，例如徐惟誠當上中宣部常務副部長，賀敬之擔任文化部代部長，高狄任《人民日報》社長等。

在整頓傳播媒體方面，除了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已於八九年五月停刊，言論較開放的《新觀察》以及立論較客觀的《經濟學周報》亦被迫停刊。而中央電視台、新華社、《人民日報》與及其他主要報刊也有由中宣部派出的工作組進駐，以保證其言論能與新中央領導層保持一致。當時中央高層的方針，是在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外，亦進行正面的宣傳教育，李瑞環在八九年十一月底於新聞工作研討班上作了「堅持正面宣傳為主的方針」的重要講話，強調要更正面的宣傳建國十四周年的巨大成就、宣傳廉政建設、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和法規等^(註三十六)。

由於各高等院校為八九民運的根源，故是中央必須整頓的重點。六四後，各地大學的黨委即時進行檢討學習及表態。六月廿七日，中宣部召集北京各大學的教育工作者學習十三屆四中全會精神，強調不能使高等院校成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市場，並須對教職員及學生加強馬克思主義教育。在隨後召開的全國高等學校工作會議中，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反覆強調要「切實加強黨對高校的領導，加強學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註三十七)。為落實黨對高校領導，中央組織部長宋平主持了北京高校黨委及校長工作會議，討論加強高校內黨的領導工作，會議明確指出高校黨委在學校中起著政治核心作用，要全面領導思想及政治工作，要管幹部，要加強對工會、共青團、學生會等群眾組織的領

導，黨的領導必須有組織領導作保證，否則就會變成名存實亡（註三十八）。六四後，中央政府決定多出版有關資本與社會主義比較，以及有關國情的叢書。此外，加強實施學生軍訓與勞動，此舉名為通過更多社會實踐及接觸，加深學生對中國國情的認識，但實際上亦可對學生產生震懾的效果。

（2）反和平演變

中共高層在六四後的理論及戰略重點為反西方對中國推行的「和平演變」，並認同八九學運在「國內範圍來講，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四項基本原則的尖銳對立，從國際範圍來講，是滲透與反滲透、顛覆與反顛覆、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的殊死較量。」（註三十九）中共指和平演變助長自由化思想氾濫，自由化思想普及又擴大和平演變的基礎，兩者實是相輔相成的。

據中共的理解，所謂和平演變，就是以軍事威懾力量為後盾，對社會主義國家以政治、經濟及思想等滲透的戰略，扶植反共勢力，「進而引發社會動亂，最終實現推翻社會主義政權的目的」，「打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以改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註四十）江澤民在八九年九月強調：

「國際反動勢力……在武裝干涉的一手失敗後，就把政策重點轉向和平演變，運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手段……支持、收買所謂持不同政見者，培養對於西方盲目崇拜……在他們認為有機可乘的時候，就製造謠言，挑起事端，策劃動亂，進行顛覆。」（註四十一）

中國政府在九零、九一兩年間，曾出版大量書藉，並組織文章，對反和平演變鬥爭策略進行廣泛宣傳和分析，簡單地說，中共認為西方顛覆社會主義國家之方法，約有下列幾個：

1. 在政治、外交方面施加壓力

就社會主義國家內之思想分歧、社會危機及種族紛爭等情勢，善加掌握利導，擴大矛盾，增加其內部不穩，從而施加壓力，進行封鎖、禁運及孤立，迫使社會主義國家右轉，其中具體例子為美歐實際上對西藏

獨立抱同情支持態度；支持波蘭境內的天主教抗拒政府活動；以及八九學運初期歐美明確支持學運等。

2. 經濟手段

經濟上以援助、貿易貸款、技術轉移等手段，誘使社會主義國家放棄社會主義之原則和立場，使其走上資本主義經濟的道路。如只要社會主義國家順從美國政府的要求，就可得到貸款、技術援助，推遲償還外債等，否則，便遭禁運及終止最優惠國待遇等。美國總統布殊在八九年十二月就戈爾巴喬夫改革作出評論時便明確指出：

「由於他堅定地支持和平演變……值得我們給予我們所能給予的支持，我認為戈爾巴喬夫搞得很好，……蘇聯和東歐發生和平演變同我們有重大利害關係。」(註四十二)

3. 進行思想滲透，開展攻心戰

這主要是通過新聞媒介如美國之音、BBC、學術研討會和文化交流，積極資助出版、報刊、新聞等部門，促使西方文化大量的滲透，並支持宗教以對抗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等。

4. 培養政治反對派和代理人

這主要是通過文化學術交流，物色持不同政見者，並以各種手段如頒授國際獎項或宣傳以提高其國際地位，促使其為社會主義國家內的反對派，同時更支持反政府組織，以與執政的共產黨對抗，以期從內部瓦解社會主義國家。

為反對和平演變，中共強調要分析國際形勢，深刻認識與和平演變鬥爭的長期性，加強意識形態領導，強化共產黨自身建設，保證各級領導權掌握在真正忠於黨的幹部手中，加強廉政建設，保持與民間溝通渠道暢順，做好這些工作，以消除產生動亂因素。而最為重要的，是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走改革開放之路，發揮社會主義優越性，避免重蹈

東歐各國改革滯後而帶來的經濟困境，從根本上增強戰勝資本主義的實力。

中共高舉反和平演變鬥爭，高潮為九一年中下旬當社會主義大國蘇聯面臨全面解體威脅的時刻。面對極為不利的國際形勢，江澤民在七月一日慶祝中共建黨七十週年的講話中坦然承認：「當前，世界社會主義事業遇到嚴重挫折……在嚴峻考驗面前，我們一定要……堅定社會主義信念和共產主義理想，築起抵禦內外敵對勢力和平演變的鋼鐵長城。」（註四十三）為回應急劇變化的國際緊張局勢，中共高層更醞釀成立一個以反「和平演變」為目的之領導小組，主要職能為反思想自由化，反政治多元化、反軍隊國家化及反經濟市場化等（註四十四）。在當時緊張形勢威脅下，中共反和平演變的調子十分高，甚至與鄧小平提出的一個中心（即經濟建設路線）相提並論，例如中共組織部長宋平便明確指出：「在新形勢下，我們面臨著兩項重要任務，一個是把經濟搞上去，一個是反對國內外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註四十五）

雖然鄧小平對自由化與和平演變持鬥爭態度，然而他卻不容許經濟建設最高的總方針受到挑戰，為使中央的政治天秤不過份地向強硬路線傾斜，他作出淡化宣傳對和平演變鬥爭的決定，並在九一年下旬、九二年初批評強硬派主將及意識形態主管鄧力群「是想藉反和平演變全面性恢復毛主席的主張」（註四十六），本質為反對改革開放。

三 廉政建設、加強與群眾聯繫，改善黨領導與推行務實外交

（1）廉政建設

六四事件給予中共一個重要的教訓，就是共產黨如果貪污腐化，勢必令群眾的反抗連綿不斷，鄧小平理智地指出：

「這次出這樣的亂子，其中一個原因，是由於腐敗現象的滋生，使一部份群眾對黨和政府失了信心。」他進而指出：「腐敗的事情，一抓就能

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們往往下不了手，這就會喪失人心，使人們以為我們在包庇腐敗。」^(註四十七)故此，鄧小平強調新領導層要抓緊懲治腐敗，「處理不能遲。」^(註四十八)

八九年七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舉行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近期做幾件群眾關心的事的決定〉，堅決懲治腐敗，會議決定抓七件事，分別是：一、進一步清理整頓公司；二、制止高幹子女經商；三、取消對領導人少量食品的特供；四、嚴格按規定配車，禁止進口小轎車；五、禁止請客送禮；六、嚴格控制領導幹部出國；七、嚴肅認真查處貪污、受賄、投機倒把等案件，特別是要抓緊查辦大案。^(註四十九)

為落實上述決定，中央相繼制定法規，分別包括〈關於進一步清理整頓公司的決定〉；〈關於貪污、受賄、投機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須在限期內自首坦白的通告〉；〈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貪污賄賂行政處分暫行規定實施細則〉；〈關於加強黨風廉政建設的意見〉及其他眾多規定等。

中共是次廉政建設可謂雷厲風行，其中較突出的是著力解決既擁有所行政權、又可從事經營活動之「權錢」結合、政企不分現象。直至八九年六月底，全國政企不分的公司已解決四千八百多戶，佔此類公司約百分之四十六，其中撤銷或停辦的有一千二百五十多戶，收回政府行政管理權的有二千七百多戶，不再從事經營的有八百九十多戶。此外，在八月中發佈關於〈貪污、受賄、投機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須在限期內自首坦白的通告〉的十二天內，全國就有一千多名犯罪分子到檢察機關投案自首。再者，據有關部門統計，八九年七月至九零年七月，全國黨員因貪污、行賄受賄等問題受黨紀處分的有七萬四千多人，其中有一萬八千多人被開除黨籍。另外，被監察機關給予行政處分的有三萬九千多人，其中移送司法機關的近四千八百人。^(註五十)

令海內外最為矚目的，為八九年八月十五日，國家審計長呂培儉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公佈對中國五大公司——即以鄧小平兒子鄧樸方為首的中國康華發展總公司、以現任國家副主席榮毅仁為首的中國國際信托

投資公司、以政協副主席王光英為首的光大實業公司、中國工商經濟開發公司及中國農村信托投資公司的審計結果，審計署批評這五大公司有不少違法經營行為，並對其沒收非法所得等共五千一百多萬元，更審判了違法的幹部。八九年七月，中共中央及國務院再作出決定，撤銷康華發展總公司和中國工商經濟開發公司，並對此兩公司派出工作組，處理清算及解決資產與債務等事宜。

（2）改善與群眾的關係

在廉政建設的基礎上，中共十三屆六中全會於九零年三月召開，作出了〈關於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繫的決定〉，對於全面恢復和發展近一年來緊張的黨群關係作出九個方面的規定，會議承認「這些年來在一些黨組織和黨員幹部中滋長了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形式主義和消極腐敗等嚴重脫離群眾的現象」（註五十一），並主張以較溫和寬厚的態度改善黨群關係，用李瑞環的話說，就是「活血化瘀」、「疏通」的方針，理由是：黨和政府與人民之間的矛盾、對立，主要原因不是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從中作梗，而是由於黨和政府的工作失誤所造成的。（註五十二）

隨著六四後緊張形勢稍為緩和，中共喘息過後，便著手恢復改善與半官方團體及民主黨派的關係。八九年十二月下旬，中央分別制定了〈關於加強和改善黨對工會、共青團、婦聯工作領導的通知〉，以及〈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通知〉，江澤民更於九零年三月作了題為〈關於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講話，在重申黨需對各級行政機關領導的同時，更肯定〈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主張（註五十三）。上述兩個文件及江澤民的講話主要突出幾點：

1. 重視發揮人大的作用。強化人大的立法、監督及聯繫群眾職能，黨要尊重和支持人大行使職權，並要注意吸收有專業知識的人以強化人大常委及其專門委員會的質素。
2. 重申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原則。

3. 在堅持黨對工會、共青團及婦聯實行領導的大方向下，支持其較自主地開展工作，以維護各自所代表的群眾的利益。

（3）務實靈活的外交政策

在對外政策方面，中共高層基本上推行鄧小平建議的冷靜、低調、沉著的靈活務實外交戰略。隨著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崩潰、美蘇關係緩和、冷戰結束、以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波斯灣戰爭勝利，使國際形勢面臨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深刻的變化。面對風雲變幻的國際環境，中共一方面對世界形勢重新評估，另方面在獨立自主的國策下，推行靈活外交政策，突破西方的制裁與封鎖，並積極推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加強其在國際舞台上之影響力。

中國政府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出發點，強調各國間應求同存異，尋找共同利益，反對將意識形態論爭放在首位及干涉別國內政。中國更積極爭取第三世界的支持，推動睦鄰外交，廣泛同周邊國家建立友好的關係，並以此為基礎，逐步恢復與西方國家的聯繫，以突破制裁及封鎖。

至九零年尾，中國在外交方面已基本突破西方制裁的困境，其中包括與沙地阿拉伯、新加坡建交，與印尼復交，並改善與蘇聯、蒙古、越南及印度等周邊國家的關係。在國際舞台中，中國以既堅持立場，又靈活務實的方針，在推動南北韓對話、柬埔寨和平方案、波斯灣危機和中東戰爭和平方案等地區問題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第四節 「治理整頓」與其他重大經濟決策

在這章討論到六四後中國政府面對的經濟形勢一節中，曾提到財政、金融雙緊的「治理整頓」政策，在八八年九月開始實施的一年內，已帶來了企業產品銷售疲弱、企業「三角債」債務鏈，以及因之而來的種種困擾。實際上，由於緊縮政策，使很多企業虧損擴大，不少沒財力應付危機的企業被迫倒閉。生產的滑坡及大批工人失業引起地方領導人的強

烈反對，他們在八九年中至八九年十一月十三屆五中全會前的各個重要經濟會議中，不斷以實際困難為由向中央反映，爭取中央放鬆緊縮政策的力度。

各地領導人對治理整頓所產生的負面影響的質疑態度得到了鄧小平的支持，在多次指示中，他不斷強調「經濟不能滑坡」（註五十四），並要「力爭在治理整頓中早一點取得適度的發展」。（註五十五）

一 中央開始調整經濟緊縮之力度

在八九年十一月召開的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中，中央制定〈關於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會議雖然關注市場銷售疲弱及產品滯銷等問題，但由於中國仍面對龐大通脹壓力，社會總需求遠超總供給，經濟結構如工業、農業，基礎工業如能源、交通與加工工業，仍嚴重失調，故此必須強調把「治理整頓」工作進一步引向深入，而不能動搖對「治理整頓」方針的貫徹實行，會議更決定用三年或更長一點的時間，以完成「治理整頓」任務。

十三屆五中全會更認為「治理整頓」工作必須抓住四個重要環節進行，這分別是：

- (1) 繼續控制社會需求和堅持財政及信貸雙緊的方針，以解決總量經濟由於需求過盛而引發的通脹問題；
- (2) 大力調整產業結構，加強農業、能源及交通等行業的發展，抑制不合市場需求及過度生產的加工工業，期望通過增加適應市場需要的有效供給，能抑制通脹，並增強經濟發展的後勁；
- (3) 整頓經濟秩序，通過整頓公司、加強物價、市場管理及糾正亂攤派等行動，克服生產、建設、流通及分配領域的嚴重混亂現象；
- (4) 通過強化企業管理，推廣科技成果，開展增產節約、增收節支運動，期望提高各方面的經濟效益。（註五十六）

中共在進一步推行「治理整頓」的決定中，有兩點特別值得留意的：首先是〈決定〉用相當大的篇幅來討論產業結構的調整問題，此點之

所以被強調，原因在於調整產業結構不單為徹底解決中國通脹問題的關鍵決策，並可加強國民經濟發展的後繼力。中國自八四年來出現通脹的一個深層原因，是由於農業、基礎工業與加工工業嚴重失衡，造成嚴重短缺而引發的，農業生產連續四年下降，引起農產品和以農產品為原料的輕工業產品價格大幅上升，普通工資及成本推高了整個物價水平。此外，加工工業發展過快，超過了能源、交通及原材料工業的供應能力，由於這些基礎工業的制約，使中國經濟雖然面對強盛的需求，仍無法通過預期的價格上升機制，誘使企業增加供應，促使供需趨向平衡，而只是讓企業平白的拿取由於價格上升而帶來的超額利潤。基於此，調整失衡的產業結構遂成為中共高層從根本上搞好經濟，抑制通脹的主要經濟方針。

第二點值得注意的是會議在堅持「治理整頓」的大前提下，亦回應了經濟滑坡等危機，而在一定程度上放寬經濟緊縮力度。十三屆五中全會制定的決定指出：「要在宏觀上採取必要的疏導措施，積極開拓國內國際市場，努力增加有效供給，保證經濟穩定發展。」「根據新的情況，採取必要的靈活措施，按照產業政策有重點地解決某方面資金困難的問題。」(註五十七)

二 進一步啟動經濟的措施

秉承十三屆五中全會精神，李鵬在九零年三月呈交的全國人大會議之《政府工作報告》上，有系統地提出有關提高工業增長的措施，主要包括：

- (1) 適度放鬆金融的控制力度，增加貸款，主要用於增加企業流動資金、增加商業、物資和外貿收購資金；
- (2) 降低利率，在貸款上實行差別利率，引導投資資金的走向，以支持重點扶持的產業；
- (3) 增加投資、主要用於計劃內重點建設項目、企業的技術改造和城市建設中一些中低檔職工住宅，並支持水利和公路建設；

(4) 大力開拓市場，通過多條渠道促進城鄉的物資交流。

上述的經濟措施除了稍為刺激投資和消費的需求外，亦兼有調整結構的意義。如開展水利及公路建設，有利吸收剩餘勞動力，並能促進農業的發展。而投資於中低檔住宅，更可以分流一般市民的消費力，舒緩居民儲蓄過度膨脹，並有利於進行房屋改革。

新華社在九零年三月中報導召開的銀行系統電話會議時，實已透露了銀行在九零年上半年的新增貸款中，將會支持經濟效益好、產品關係國計民生並能滿足社會有效需求的中小型企業、城鎮集體企業、鄉鎮和三資企業等，以避免治理整頓初期的一些混亂狀況，啟動經濟增長。事實上，在九零年為啟動經濟，避免工業滑坡，銀行的貸款規模急劇增加，銀行全年各項貸款增幅高於現價國民生產總值增幅約百分之十三，是八十年代以來(除一九八六年)超經濟發行最大的一年。(註五十八)

三 「治理整頓」的三個不同階段

中國自八八年開展的「治理整頓」可分為三個階段，每一階段的政策各有其特點。第一階段為八八年九月至八九年八月，重點在於多管齊下，壓抑需求，使經濟過熱情況迅速降溫，遏制通脹。第二階段為八九年九月至九零年八、九月，政策重點在於調整緊縮力度，針對銷售疲軟、工業滑坡過猛及失業人口劇增等困境，在穩定中求適度發展。第三階段為九零年九、十月至九一年底，通過放寬對固定資產投資及對商業企業的流動資金貸款，推動投資建設，擴大商業對工業企業產品之需求，再加上降低銀行儲蓄利率，逐步刺激消費等方法，加速經濟的增長。

四 中國經濟領域的其他重大事件

在九零年至九一年底的兩年間，中國於經濟領域還有下列幾件大事：

(1) 上海浦東的開放

九零年四月，中央制定上海浦東開發政策，提出浦東新區為中國今

後十年開放的重點，通過浦東的帶領作用，推動整個長江地區的發展。此外，更通過優先發展第三產業，促使上海發展為遠東的金融及貿易中心。

除浦東外，中央更批准海南省吸收外資開發備受爭議、被某些中國領導人士批評為出賣國土的洋浦經濟開發區，另外，更批准黑河、綏芬河、琿春和滿洲里作為邊境地區的新開放城市，通過與俄羅斯等邊境貿易促進這些一向較貧困區域的經濟發展。

(2) 於九零年十二月中共召開的十三屆七中全會中，審議並通過〈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的建議〉

由於經濟路線與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在制定十年規劃與八五計劃時，以鄧小平為首的強調發展加速的經濟改革路線，與以陳雲為首的較強調經濟權力集中之穩進路線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政治角力（有關此角力的較詳盡情況，將於下一節討論），而十年規劃與八五計劃可說是兩種經濟路線、中央與地方以及各個不同經濟集團角力妥協的結果。

簡而言之，此計劃要求今後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六。在計劃的指導方針上，中央強調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堅定地推行改革開放，並圍繞著增加企業活力，對計劃、投資、財政、金融、價格、物資及外貿等領域進行改革。

在經濟發展方面，決定貫徹持續、穩定、協調的發展方針，保持社會總需求與總供給平衡，並保證投資規模需與國力相適應，中央並決定加強農業、基礎工業、基礎設施、科技和教育的建設，並發展電子工業，改造加工工業，積極發展建築業和第三產業，以保證經濟結構平衡，協調並進。（註五十九）

(3) 召開改善國營大中型企業的中央工作會議

九一年九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研究改善國營大中型企業之問題。經過兩年多的治理整頓，中國經濟仍面對效益差及政府財政赤字擴大等問題，而這些困難的出現亦同佔國民經濟位置相當重的國營大中型企業

活力不強、經濟效益不高有直接關係。

長期以來，國營大中型企業由於政企不分，缺乏經營自主權，並受指令性計劃束縛，企業活力已相當弱，再加上治理整頓之衝擊，更進一步使企業產品滯銷、資金緊張、虧損增加，不少企業資不抵債，瀕臨破產。

為改善國營的大中型企業效益，中央決定以增加技術改造、新產品開發、資金、降低利率、縮少指令性計劃、減稅、給予外貿自主權等方法改善企業的外部環境，並進一步將企業推向市場，以銷定產，改進企業的經營效益。(註六十)

(4) 於九一年十一月下旬召開中共中央十三屆八中全會，作出進一步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決議

自八四年以來，中國面對嚴重的農業問題，分別為人口增長對糧食生產造成極大需求壓力，各項建設項目大量佔用耕地，使人多地少之矛盾再推向極端，加上九一年的華中、華東發生旱災水災，加深農民生活的困難。

在農業面臨嚴峻困擾的背景下，中共重申要繼續實施家庭承包責任制，落實科技、教育興農政策，控制農業生產資料價格，制止亂攤派、亂收費，以減輕農民負擔。此外，更增加農業投資，加快發展農用工業，推動農業機械化，支持發展鄉鎮企業，並加快大江大河的治理，開展農田水利建設等措施，以加強農業發展的後勁。(註六十一)

五 對兩年半以治理整頓為中心的經濟狀況之評論

經過兩年半治理整頓及推展其他重大經濟措施後，至九一年底，中國經濟狀況出現一定之變化，其中較明顯的是通過緊縮政策，使供求失衡矛盾緩解，過熱的經濟降溫，通脹受控。此外，基礎產業得到加強，發展的樽頸矛盾有所緩解，進出口貿易更由逆差轉順差，國家外匯儲備大量增加，各項急切性經濟危機逐步緩解。

雖則如此，中國經濟自改革開放以來的一些深層次問題並未通過治理整頓而獲徹底解決，例如：

- (1) 是企業經濟效益還是相當差，虧損嚴重；
- (2) 國家財政依然困難，主要是由於中國這兩年半正值還債高峰期；企業效益差，需要補貼支持多；分配不合理，財力分散，特別是國家財富向個人及預算外轉移；以及財政支出結構不合理，如大量價格補貼，機構臃腫等四大原因；
- (3) 經濟結構，主要是既有的「存量」結構不合理，而調整加工工業結構（通過關閉部分無效益的企業）以適應市場需要的工作根本不能落實，如彩電、冰箱、洗衣機、啤酒、卷煙及錄音機等十九種加工產品生產能力的利用率十分低，出現閒置生產力，庫存積壓情況嚴重，造成大量浪費，影響企業效益。

在上述三個經濟問題中，政府無法進行經濟結構調整是最根本的問題，嚴重制約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及政府財政狀況。中國在治理整頓時面臨的一個最困難問題是經濟結構的扭曲情況已相當嚴重，輕工業生產能力過度擴張，不單超過基礎產業的支持力，更遠超市場的需求量，如上述十九種加工業產品出現供過於求的積壓現象。事實上，中國經濟治理整頓在成功壓縮總需求時，主要矛盾已由產業間失衡（農業、基礎工業與加工工業）演變為市場需求約束的矛盾。由於加工業品供過於求，故經濟滑坡、產品積壓的困境遲遲無法解決，主要問題在於「存量」調整少，高檔耐用的消費品根本不能脫手，這說明企業產品的結構與市民需求結構不符的現象十分嚴重。

企業產品賣不出去，無可避免會造成資金停滯，大量流動資金被放於倉庫的產品佔用，為避免因企業倒閉造成失業，政府只好放鬆銀根，大量發放貸款以維持企業的生產。然而，由於企業的產品根本不合市場需要，銀行增加貸款的結果只會令企業佔用更多資金，增加庫存而對銷售情況毫無改善。故此，中國經濟的重點問題並非是沒有經濟增長，而是企業在現有結構上發展生產，根本不能賺錢，這也是中國企業利潤下降、產品庫存增加、三角債前清後欠、經濟效益差，而影響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原因。

「存量」經濟結構調理緩慢，主要是中國缺乏一個有效的市場調整機制。此外，國家宏觀調控能力弱化，只能進行新增的調整，「存量」調整根本無法有效落實。更重要的是，中國缺乏一個社會保障機制，失業問題無從解決，故政府也不敢貿然關閉虧損企業，這是「存量」調整難以進行的主因。

在兩年半的治理整頓期間，另一個值得留意的地方是政府在實施嚴格控制投資審判權、加強物價管理、增加對部分產品的指令性計劃指標等種種收權政策的同時，亦開展了住房、醫療保險、社會保障及價格等方面之改革，以解決國家財政負擔。其中尤為突出的調價措施，是九零年國家相繼提高油脂油料、糖料等收購價格，並於九一年提高原油，成品油、鋼材、生鐵等基礎工業產品和鐵路貨運價格，更提高二十五年未變動過的平價糧油價，調整幅度是近幾年中最大的。

此外，鄧小平決定躍升主政上海的朱鎔基為國務院副總理，使其成為主管企業生產，清理三角債，企業經營管理和技術改造等經濟事務的實際負責人。

第五節 圍繞經濟建設大方向——姓社姓資等問題的政治角力

一 經濟建設方向的分歧與角力

在八九年六四事件後，雖然鄧小平曾多次強調過往的改革開放政策不變，然而中央高層對中國發展改革的大方向問題出現了觀點分歧。在爆發六四事件及東歐劇變的根源問題上，以陳雲（中國經濟穩進派首腦）、李鵬、姚依林及鄧力群（重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思想幹部代表）為首的一些高層幹部，認為中國出現通脹、腐敗及政治動亂等，部分原因乃由於改革方向失誤所造成，部分幹部更擔心改革開放會走向資本主義，甚至認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及和平演變等主要危險乃來自經濟領域，並把改革開放過程中很多政策看為會引進資本主義及政治上之動亂。尤

令海外輿論矚目的，是有權威報導指出陳雲曾在九零年三月致中央之信中說：「十年改革是極右，處理六四是極左。」^(註六十二)部分幹部更強調要劃清改革的性質及根本方向，究竟是社會主義的改革，還是資本主義的改革，更主張對改革的各項措施皆要問清楚是姓社還是姓資。

為平衡鄧小平式的改革路線，上述穩進及強調意識形態幹部進行了大量工作，以圖將改革方向納入其認為是堅持社會主義的軌道。

（1）傳媒大力推廣陳雲經濟路線及陳雲加強活動

在中共最高領導層中，地位聲望能與鄧小平相比的，首推陳雲。陳為五六年黨中央副主席（主席為毛澤東、鄧小平為總書記），他一向強調穩健發展的經濟路線，並強調計劃經濟的作用。在中共建國後的多次經濟危機如五年的冒進、五九年的大躍進及七八年的洋躍進等，皆是背離陳的經濟建設路線而釀成的災難，而最後亦是由陳領導以解決經濟危機，故陳在黨內外享有極其崇高之威望。然而，由於陳雲經常強調穩健發展政策，並堅持計劃經濟的作用，故其路線與鄧小平的加速發展及改革的政策出現相左，部分學者更批評陳的理論已不能解決新時期錯綜複雜的市場經濟發展問題，如從根本上調動企業的積極性，並處理好資源調配等，而陳雲亦被視為中國保守派的總後盾。

八九年中下旬，中國曾召開了一次陳雲同志論著研討會，而《人民日報》等傳媒更於八九年九月間刊登了多篇頌揚陳雲經濟理論的文章，稱讚陳雲經濟思想一貫正確，例如《人民日報》於九月十日的一篇文章指出：「今後，有關怎樣制定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機制，方式和範圍……還有待於我們深入學習陳雲同志的思想。」^(註六十三)

八九年九月，部分由中央控制的輿論工具於制定八五計劃的十三屆七中全會前（七中全會由於鄧小平對草擬的八五計劃草稿不滿而推遲至十二月召開）大力鼓吹陳雲思想，明顯是為了爭取通過以陳雲為代表的穩進經建總指導方針，並進一步否定鄧小平的實用主義經濟路線。

事實上，陳雲亦加強活動，他「與鄧不接觸，自己活動有時卻很活躍，找人談話，作批示……他不理會鄧……要求中顧委解散的政治暗

示，不但自己堅持不退，還要求中顧委繼續為黨中央當好參謀，把好關。(註六十四)陳雲更理直氣壯的指出：「在黨內展開思想意識爭論是正常的，這是黨內民主的一個重要體現，黨的、國家的大事不能由一個人講了算。」(註六十五)，陳更要求幹部實行「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要「交換、比較、反覆」等十五字真言。(註六十六)

在九零年十二月之十三屆七中全會書面發言中，陳雲更批評趙紫陽主政時的經濟發展政策是「重犯左傾主義……造成空虛的效益……損害了人民對黨和政府的信任和期望」。(註六十七)就計劃經濟而言，陳於九一年中上旬又重申：「(計劃經濟)不到位，不甘心、不放心。」(註六十八)

(2) 以計劃經濟為主導思想，制定八五計劃，並通過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及和平演變等運動，否定市場經濟，以取代帶有市場取向的改革

中國在八九年中下旬鼓吹學習陳雲思想的同時，中央部分高層領導人亦遵照陳雲思想，以計劃經濟為主導起草八五計劃，據大陸經濟界人士透露，中共在制定八五計劃和十年規劃時，基本上抽掉改革的內容，更多強調的是加強農業、加強計劃指導，加強重點建設(由國家集中投資)和自力更生，把恢復和強化計劃經濟體制作為八五計劃和十年規劃的主要內容(註六十九)。

當時中國經濟政策爭論的焦點，反映在計劃與市場的問題上。在六四事件後，中共十三大提出「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市場導向改革方針，已逐漸為「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的提法代替，實際意義即計劃為主、市場為輔，當時在不少內部與公開的輿論中，市場取向改革的提法受到批評，認為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取消公有制，這就是說，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搞資本主義。」(註七十)「這種理論上的失誤造成了工作上的失誤，并被宣傳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所利用。」(註七十一)

在堅持計劃經濟、逐步否定市場方向改革的同時，以鄧力群為首之強調意識形態的幹部，亦針對六四前的自由化思潮，國際上和平演變及

東歐劇變等形勢，發表了很多長篇文章，加強宣傳，強調「中國要在全世界扛起社會主義的大旗、拯救社會主義事業的歷史。」此外，鄧力群更重提要全面學習和領會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並認為不堅持這個學說就不能堅持四項原則，並強調要「對資產階級及其黨內的代理人開展政治、經濟、文化等全面的階級鬥爭」，個別幹部更直指胡耀邦及趙紫陽就是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註七十二）。鄧力群甚至批評鄧小平的實用主義「貓論」，指其「不講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根本區別……讓資產階級的實施和平演變戰略有可乘之機。」（註七十三）十分明顯，鄧力群等意圖將大陸過往幾年以市場導向之經濟改革，納入高度意識形態的範疇，並批評其為走資本主義方向，從而鞏固計劃經濟的路線。

二 鄧小平對挑戰的全面回應

面對中央高層及經濟形勢困擾的挑戰，鄧小平始終堅持其市場導向、加速經濟發展的方針。鄧小平基於黨政軍內崇高的地位、十年改革開放的豐碩成果、人民群眾的支持和地方首腦對其政策的認同，作出有力的反擊。

十三屆七中全會前夕，面對以中央收權、堅持計劃經濟為基調的八五計劃初稿，鄧小平突然通過江澤民說，「對這個稿子，許多人有意見，我看了也不滿意……我看還是要搞改革開放，要跳出一些框框，大膽一些，爭取比前十年搞得更快一些。」（註七十四）鄧更當面批評姚依林，表示不要他起草文件的工作，並決定延期召開七中全會（註七十五）。此外，鄧更對堅持改革開放提出六點意見，其重點為改革開放是付出重大代價換來的，絕對動搖不得，八五計劃和十年規劃要以加快和完善改革開放步伐為總方針，並批評前階段以治理整頓來壓抑改革是不對的，整頓目的是為了繼續改革開放等。（註七十六）

九零年十二月，在十三屆七中全會前夕，鄧小平再會見江澤民、楊尚昆及李鵬等領導人，提出八條意見，其中針對當時爭論焦點的計劃與市場問題，鄧小平明確地指出：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區別，不在於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不要以為搞點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道路，沒有那麼回事。計劃和市場都得要……不要怕冒一點風險……為什麼這次治理通貨膨脹能夠見效這麼快……原因就是有這十一二年改革開放的基礎，改革開放越前進，承擔和抵抗風險的能力就越強。」（註七十七）

基於鄧小平之堅持，十三屆七中全會改變了調子，加重改革開放的份量。

雖然鄧小平在制定八五計劃的關鍵時刻發揮了重大的影響力，然而由於中央各宣傳部門仍掌握在鄧力群等人手中，鄧小平的講話並未能大規模的擴散出去。九一年春節前後，鄧小平在上海發表了一系列談話，他離京前曾指出：

「我現在講話沒有人聽，這樣下去，我只有到上海，到上海發表我的文章。」（註七十八）

在上海期間，他對上海開發晚了表示惋惜，並表示很多人對改革有所保留是因為怕出問題，故此，他指出「要克服一個怕字，要有勇氣……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註七十九）

九一年三、四月間，即人大會議前後，上海《解放日報》以皇甫平名義發表了〈上海要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等三篇文章。皇甫平為黃浦江評論的縮寫諧音，為上海市委宣傳部寫作班子的集體創作，直接向朱鎔基負責，文章大談解放思想、開拓改革新局面，並批評開放步子慢與一些幹部思想不夠解放有直接關係。這幾篇文章後來在中國輿論界產生了爆炸性的影響，引起九一年中旬姓社姓資問題的論戰，並直接促成九二年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在〈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的文章裡，提出「如果我們仍然囿於姓社姓資的詰難，那就只有坐失良機。」，文章針對鄧力群等提出的姓社姓資問題提出了不同看法。

九一年三月至七月，一些省、市之領導人亦紛紛發表談話，討論加快改革的份量，明確顯示經過兩年治理整頓後，地方領導皆希望加速發展的願望。

然而，皇甫平的文章在北京輿論界引起甚為強烈的反響，中宣部及《人民日報》皆派出要員訪查皇甫平文章之背境，個別高層領導人更指出：「皇甫平的文章影響很壞」（註八十）。為抗拒皇甫平文章帶來之震動，主管意識形態的幹部在京發表多篇文章，在一些有影響力的報刊雜誌上開展對皇甫平的批評，其中主要有兩大問題，第一是對於進一步解放思想，防止思想僵滯的觀點強烈批評，認為現時不是解放思想不夠，而是過了頭，並提出問題重點不在乎思想僵化，而在於改革是朝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方向。

而更為重要的是第二個問題，即姓社姓資的爭論，對皇甫平責難的文章指出：

「在自由化思潮嚴重泛濫的日子裡，曾有過一個時髦口號，叫做不問姓社姓資……結果呢？在不問姓社姓資的掩護下，有人確實把改革開放引向了資本主義化的邪路。」（註八十一）

有些文章指出，實行改革開放一定要問姓社姓資，因為現實生活中確實存在著姓社姓資兩種不同的改革觀。（註八十二）又有些文章從經濟領域批判過往的改革：

「首先是經濟方面，有一個時期，這方面幾乎成了一個禁區……似乎在這個領域裡怎麼講，怎麼做都行……你姓資的那一套怎麼行？鼓吹私有制和完全的市場經濟。」（註八十三）。

除了大量文章批判鄧小平的改革觀外，掌管意識形態的幹部亦默認並鼓勵毛澤東熱，當時全國各地大量印發毛澤東圖像，大批製作歌頌毛澤東的歌曲及唱片，此行動之實際政治意義，是以高舉毛澤東的形象來間接平衡鄧小平的影響力，為較穩進及重視計劃的路線剷除障礙。

從針對皇甫平的大量文章及毛澤東熱等可以看出，縱然鄧小平路線

有強大的支持及實力基礎，然而，由於掌握意識形態等部門仍有相當強大的力量，可以說，鄧小平的路線確實受到一定的干擾和動搖。在這宏觀背景下，鄧小平經過深思熟慮，於九二年春節南巡，發表影響重大的南巡講話，使中國經濟發展在九二年又進入另一飛躍階段。

註 釋

- 註一 周正慶《中國貨幣政策研究》，中國金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243頁
- 註二 鄧小平〈組成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集體〉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297頁
- 註三 鄧小平〈在接見首部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同註二，第305頁
- 註四 同註三，第307頁
- 註五 賀安邦〈六四以來中共高層鬥爭大揭秘〉《鏡報》月刊，一九九零年七月號，第33頁
- 註六 張沐〈鄧小平警告勿批十三大〉《鏡報》月刊，一九九零年一月號
- 註七 同註五，第29頁
- 註八 同註五，第30頁
- 註九 《跨世紀的角逐》，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第137頁
- 註十 同註二，第320頁
- 註十一 同註二，第321頁
- 註十二 廖蓋隆等主編《中國政治大事典》，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第993-994頁
- 註十三 同註十二，第1000頁
- 註十四 同註二，第301頁
- 註十五 〈鄧小平對李鵬、姚依林的講話〉轉引自《歷史的創傷》下冊
- 註十六 同註二，第300頁
- 註十七 曉羽〈元老為何選中江澤民〉《鏡報》月刊一九八九年 七月
- 註十八 同註二，第296頁
- 註十九 同註二，第300頁

- 註二十 陳希同〈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載《血淚中華》，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出版，第90頁
- 註二十一 同註二十一，第300頁
- 註二十二 江澤民〈在慶祝建國四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載同註十二，第1007頁
- 註二十三、二十四 張沐〈鄧小平稱外交不會一面倒〉《鏡報》月刊，一九八九年十一月號
- 註二十五 〈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四中全會公報〉載《十三大以來》（中），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545頁
- 註二十六 江澤民〈在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上的講話〉載同註二十五，第548—549頁
- 註二十七 〈中紀委第四次全體會議〉載《中國改革大辭典》，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108頁
- 註二十八 張沐〈清自由分子聲浪高〉《鏡報》月刊，一九九零年二月號
- 註二十九 新華社 九零年二月十三日
- 註三十 《解放軍報》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 註三十一 《人民日報》 九零年一月十九日
- 註三十二 陳雲〈要反對動亂〉載《陳雲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368至369頁
- 註三十三 〈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開全國宣傳部長會議〉載同註二，第995頁
- 註三十四 江澤民〈關於黨的新聞工作的幾個問題〉載同註二十五，第767頁
- 註三十五 同註二十八
- 註三十六 李瑞環〈堅持正面宣傳為主的方針〉載同註二十五，第734—735頁
- 註三十七 李鐵映〈高等教育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載《求是》雜誌，一九八九年 第十六期
- 註三十八 《人民日報》 八九年九月一日
- 註三十九 徐達深〈論和平演變與反對和平演變的鬥爭〉載袁木等主講「社會主義若干問題講座」，紅旗出版社，一九九零年，第85頁
- 註四十 謝文生主編《反和平演變教育答問錄》，法律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17頁
- 註四十一 同註二十二
- 註四十二 〈布殊展望90年代〉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廿一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

報道

- 註四十三 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七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載同註二十五，第1651—1652頁
- 註四十四 莊蒙〈防演變正醜醜成立四反小組〉《鏡報》月刊，一九九一年九月號
- 註四十五 摘自《當代思潮》一九九年第3期
- 註四十六 劉義〈鄧制止全面恢復毛主張〉《鏡報》月刊，一九九二年二月號
- 註四十七 同註二，第300頁
- 註四十八 鄧小平〈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當務之急〉載同註二，第313頁
- 註四十九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近期做幾次群眾關心的事的決定〉載同註二，第555—557頁
- 註五十 牛進出《不倒的紅旗》，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337頁
- 註五十一 〈中共十三屆六中全會〉載同註十二，第1014頁
- 註五十二 同註五，第29頁
- 註五十三 江澤民〈關於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載同註二十五，第940頁
- 註五十四 同註四十七，第312頁
- 註五十五 鄧小平〈國際形勢和經濟問題〉載同註二，第354頁
- 註五十六 〈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載同註二十五，第680頁
- 註五十七 同註五十六，第684、689頁
- 註五十八 《八十年代的中國經濟》，中國統計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第173頁
- 註五十九 李鵬〈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建議的說明〉同註二十五，第1352—1359頁
- 註六十 李鵬〈關於當前經濟形勢和進一步搞活國營大中型企業的問題〉載同註二十五，第1690—1696頁
- 註六十一 〈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決定〉載同註二十五，第1762—1775頁
- 註六十二 宋衣蒙〈陳雲批評極右與極左〉《鏡報》月刊，一九九一年一月號
- 註六十三 《人民日報》一九八九年九月十日
- 註六十四 孫直良〈鄧小平對中國前途的思考，向江李揚面授機宜談八條〉《鏡報》月刊 一九九一年四月號

- 註六十五 陳潔弘〈陳雲說中共現時最腐敗，黨內不能一個人說了算〉《鏡報》月刊，一九九零年九月號
- 註六十六 同註六十三
- 註六十七 陳潔弘〈陳雲反對決策層搞一言堂〉《鏡報》月刊，一九九一年一月號
- 註六十八 莊蒙〈北戴河會議議十四大人事〉《鏡報》月刊，一九九一年七月
- 註六十九 碧天生〈七中前夕中共兩派大較量〉《鏡報》月刊，一九九零年十月
- 註七十 《人民日報》 九零年十二月十七日
- 註七十一 《真理的追求》 一九九一年第二期
- 註七十二 同註六十四
- 註七十三 峻風〈姓社姓資之爭緣何來〉《鏡報》月刊，一九九一年十一月號
- 註七十四 柯良〈中共七中全會年底才開的真相〉《鏡報》月刊，一九九一年一月號
- 註七十五 劉燕英〈鄧當面批評姚依林，打破國務院家天下〉《鏡報》月刊，一九九一年五月號
- 註七十六 張沐〈鄧仍為七中全會把舵〉《鏡報》月刊，一九九一年一月號
- 註七十七 鄧小平〈善於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載同註二，第364頁
- 註七十八 劉必〈鄧小平發動北伐解放思想〉《鏡報》月刊，一九九一年五月號
- 註七十九 鄧小平〈視察上海時的談話〉載同註二，第366—367頁
- 註八十 莊蒙〈江楊李在意識形態上掃左風〉《鏡報》月刊，一九九二年一月號
- 註八十一 〈改革開放可以不問姓社姓資嗎？〉《當代思潮》，一九九一年第二期
- 註八十二 〈問一問姓社還是姓資〉《光明日報》，九一年八月七日
- 註八十三 〈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思想武器〉載《高校理論戰線》一九九一年第六期

第九篇

經濟騰飛 宏觀調控

(1992-1995)

第五十三章 鄧南巡旋風與中共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鞏固江澤民的核心地位

第五十四章 鄧小平南巡後的中國——經濟騰飛、改革深化

第五十五章 宏觀調控(九三至九五)(上)兩大經濟困擾——局部過熱與混亂及其深層原因

第五十六章 宏觀調控(九三至九五)(中)——十六條、改革五十條 反腐敗與強調中央權威

第五十七章 宏觀調控(九三至九五)(下)——成就及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第五十三章 鄧南巡旋風與中共十四大 ——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鞏固江澤民的核心地位

導 言

經歷了三年的「治理整頓」後，中央經濟政策微妙地傾向收權，在輿論高呼「反和平演變」，改革方向要問「姓社姓資」的環境下，為扭轉政治經濟上的保守局面，一向提倡經濟建設、改革開放為主導國策的鄧小平，於九二年春南下深圳、珠海及廣州等地，發表震動全國、符合民心的南巡講話，頓時令全國經濟活躍起來。

南巡講話之思想不單主導了九二年十月的中共十四次全國黨代表大會的路線，而影響尤為深遠的乃是令整個國家呈現了翻天覆地、不可逆轉的變化，思想解放的爆炸力促使各地區競相爭取加速發展，沿海、沿江、沿邊全方位大開放，外資大幅增加，社會空前活躍，幹部、教師爭相下海經商，房地產、開發區及股票等領域出現熱潮，第三產業迅速發展，以市場經濟為目標的改革方向被確認。無可置疑，鄧小平南巡講話促使中國經濟及社會更快的發展，令改革迅速地邁向更高台階。

由於投資擴大，經濟過速增長，經濟體制在轉軌（由計劃到市場）過程中未能迅速建立法制及適合市場經濟之新型調控體系，加上權錢給合、貪污腐化、經濟混亂等原因，故此中國在九三年開始便面對通貨膨脹、人民幣匯價大瀉等危機。在嚴峻的經濟形勢下，中國於九三年六月發出六號文件，提出十六條，正式開展宏觀調控。與過往之經濟調整不同，中央在致力整頓經濟的同時，亦加速制定具體落實經濟體制改革的方案。在九三年十一月召開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中，一份整體全面的改革行動綱領被確認，為中國邁向市場經濟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而宏觀調控在開展三個月後已初見成效，整個九四年的經濟亦能穩定發展。

除了影響深遠的十四大外，這期間的其他重大政治事件還包括了楊

白冰被削兵權、中共雷厲風行的反腐敗，以及江澤民為保證鄧小平等老一輩元老去世後，中國政局能持續穩定而進行的一連串穩定軍心的措施。

除面對經濟體制轉軌所引起的各種問題，中國在九十年代中期亦要應付眾多跨世紀社會難題，如人口就業、資源匱乏、環境污染、民工潮、中央與地方矛盾、區域衝突和貧富差距擴大；經濟領域上的國營企業嚴重虧損、三角債、通脹潛伏危機及經濟波動；還有政治上的權錢結合、貪污腐化、政治權力平穩繼承、中央政令權威下降及人民參政呼聲等。以上各種社會、經濟及政治問題在不同程度上貫穿影響著十九年改革開放的中國，並制約著下世紀的發展。

第一節 鄧小平南巡的背景

九二年春節期間鄧小平南巡，是一個經過周詳計劃的行動。鄧小平南巡前，「找人談話，翻閱材料，聽取匯報，精心準備了一個多月。」(註一)鄧小平及其支持者如楊尚昆及劉華清等這樣慎重的行動，實有其背景原因以及形勢的需要：

一 蘇聯、東歐巨變以及世界經濟形勢的機遇與挑戰

面對八九民運以及隨後的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體制的崩潰，促使中共領導人對歐美列國的和平演變策略提高警惕。然而，在冷靜總結歷史經驗後，不少中共領導人認為這些國家之所以能給予外國勢力有機可乘，最根本的內在原因在其經濟建設及改革失敗。鄧小平針對蘇聯東歐劇變的教訓時指出：「不改革就沒有出路，舊的那一套經過幾十年的實踐證明是不成功的。」在總結六四時，鄧又指出「如果沒有革開放的成果，六四這個關我們闖不過，闖不過就亂，亂就打內戰。」(註二)

此外，世界兩極對立的冷戰格局隨著蘇共集團崩潰而瓦解，國與國間之角力從意識形態轉向經濟實力。九十年代的中國面臨世界高科技之發展，不同地域的國家走向經濟區域集團化，區域內諸國憑藉更緊密的

經濟合作及對外的保護主義以加強國際經濟競爭力，而在中國周邊的一些國家及地區的經濟發展比中國快，以上的經濟環境對中國產生很大的壓力，鄧小平擔心「如果我們不發展或發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較就有問題了。」（註三）

鄧小平認為中國內部條件良好，政府能集中力量辦大事，再加上國際環境相對平靜，應可效法日本、南韓及東南亞諸國等能經歷一段高速發展時期。鄧小平指出：

「要抓住機會，現在就是好機會。我就擔心喪失機會……時間一晃就過去了。」（註四）

為加速發展以回應國際經濟挑戰，鄧小平隱晦地貶低以穩為主的三年治理整頓：

「經濟發展比較快的是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八年……如果不是那幾年跳躍一下，整個經濟上了一個台階，後來三年治理整頓不可能順利進行」，「對於我們這樣發展中大國來說，經濟要發展得快一點，不可能總是那麼平平靜靜、穩穩妥妥。」（註五）

十分明顯，鄧小平南巡是希望使中國加速經濟發展速度，強化經濟建設成果，從根本上回應和平演變以及世界經濟的挑戰，「人民，是看實踐。人民一看，還是社會主義好，還是改革開放好，我們的事業就會萬古長青。」（註六）

二 徹底反擊左傾思潮，進一步推動改革開放

六四後中國不單政治保守，經濟改革在某程度上亦被衝擊。受九一年蘇聯瓦解的影響，中共中央將反和平演變鬥爭推向高潮，其調子之高甚至與鄧小平提倡的經濟建設總方針相提並論。保守的意識形態配合著中國需貫徹治理整頓而採取的強化中央權力措施，將全國經濟拉回到計劃經濟為主的軌道去。當時中央決定的經濟體制之總方向是強化中央政府對各種資源，企業的行政性控制，而掌管意識形態的理

論家更反覆宣傳「市場取向就是資本主義取向，自由化在經濟上表現就是市場化」等。(註七)用鄧小平的話總結這股思潮，就是「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註八)

當時以開放著名的副總理田紀雲曾明確的指出，鄧小平「在關鍵的時刻，講了一系列關鍵性的問題……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田紀雲指出鄧小平尖銳的在南巡講話中提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不能改變，「誰要改變這條路線，誰就要下台」，箇中原因「是因為有人不贊成這條路線，並且採取各種辦法，明的暗的，企圖否定和改變這條路線。」田指出在農村改革開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時，反對聲音便指出這是復辟資本主義，後來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優越性的顯示，這種聲音逐步消失了。然而，「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發生政治風波之後，有人站出來公開反對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說甚麼政治上的自由化來自經濟上的自由化，經濟上的自由化來源於農村的家庭承包。」(註九)

在點出鄧小平南巡的一個重要背景後，田紀雲形象地總結他認為左的思潮：

「『左』的東西表現很多，你要多宣傳一點改革開放，他就會說，這會破壞來之不易的不大好形勢，喪失治理整頓的成果……；你說要多利用點外資，他就會說，多一個外資企業，就多一分資本主義，就會威脅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你要劃出一塊地方包給外商承包開發，他就會說，這是出賣國家主權、喪權辱國；你要多發展一些鄉鎮企業，他就說，鄉鎮企業是不正之風的風源……；你要多發展一些私營企業、個體戶，他就說，這會改變社會主義性質；你講要搞廠長負責制，他就說，這是走單幹的道路，不利於集體經濟的發展……。」田紀雲更批評「有人做了這樣的高度概括，三資企業是和平演變的溫床，鄉鎮企業是不正之風的風源，農村承包責任制是集體經濟瓦解的根源。他們改革開放以來最基本、最實質的東西幾乎全都否定了。」「有人至今還留戀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那一套，總覺得，你鬥我，我鬥你……人人不得安寧，幹群關係

非常緊張，沒有這樣一種情況就不是社會主義。」（註十）

由於反和平演變在九一年八月蘇聯瓦解時一度成為主導中國輿論宣傳的重點，為抗衡社會輿論的偏差，鄧小平路線的忠實支持者楊尚昆在九一年十月九日紀念辛亥革命八十週年大會上，發表了針對性很強的講話：

「我們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對經濟建設這一條要始終扭住不放……所有其他工作都要服從和服務於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決不能衝擊和干擾這個中心，決不要分散和轉移自己的注意力。」「改革會有風險，這種風險我們能承受；而停止甚至倒退，是決沒有出路的。」（註十一）

然而，楊尚昆的講話被「左」派掌握的傳媒低調處理，以致無法發揮影響力。離楊尚昆講話不到兩星期，被視為「左」派理論領導權威的鄧力群，在十月二十三日於《人民日報》發表實質對革開放強烈質疑的長篇文章——〈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掌握處理矛盾的主動權〉，指出：

「我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誰勝誰的矛盾，遠未解決。」鄧力群進而尖銳的指出：「國際國內的反動勢力總是精心玩弄誘導與逼迫兩手策略，妄圖把我國的改革開放引上資本主義軌道，溶化進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去，最終把中國變為西方大國的附庸。」

鄧力群還提出共產黨為要掌握矛盾的主動權，必須做到三點，分別是：一、對上述提出的矛盾要有充份的認識；二、緊緊抓住階級鬥爭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三、要與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作鬥爭。（註十二）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報》在發表這篇文章時加了一段「編者的話」，明顯地針對鄧小平所提倡的、一向被視為「實用主義」的理論，指出：

「嚴酷的鬥爭事實已昭示我們，實用主義能為和平演變打開缺口。」

「左」派理論權威除在輿論上大力強調反和平演變及堅持在改革的具體措施上要問清楚是姓「社」還是姓「資」外，他們另一個平衡鄧小平權威的策略便是鼓吹毛澤東熱。鄧力群巧妙借用別人說話指出毛澤東熱的出現，乃由於「妖霧又重來」，（註十三）他更刻意抬高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同志最早提出了和平演變警告……是唯一對東歐、蘇聯目前發生的情況作過預言的馬克思主義戰略家。」（註十四）「考察一下毛澤東思想，毛澤東的實踐，毛澤東的理論，是怎樣使我門贏得勝利，怎樣使我們在如此驚心動魄的動亂、暴亂中堅持下來。」（註十五）鄧力群這個論斷與鄧小平曾提出的中共所以能闖越六四這個關，乃是因為改革開放的偉大成果的觀點完全相反。十分明顯，「左」派理論權威的策略是希望通過重新奠定毛澤東反和平演變及鼓吹階級鬥爭理論之地位，在意識形態層次與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理論相對抗。故此鄧小平在南巡前曾明確的指出：「鄧力群是想藉反和平演變全面恢復毛主席的主張。」（註十六）

也正是為了徹底反擊「左」派理論思潮，進一步全面牽起改革開放的巨浪，鄧小平決定展開南巡步伐。

三 統一幹部思想，在政治組織及意識形態上為九二年召開的中共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定調

中共的十四大於九二年下旬舉行。一向以來，歷屆黨代表大會皆對中國的發展路向及人事組織有重大的決定性意義。在經歷三年治理整頓及六四事件後，鄧小平極希望其親手策劃的開放改革政策能在十四大上再獲肯定，而在人事組織上能保證貫徹執行改革開放政策。鄧小平有針對性的強調，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要講百年，要全面貫徹，不能隨便加減。（註十七）中國副總理田紀雲曾指出：

「小平同志在籌備召開黨的十四大前夕的南巡講話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針對性很強，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小平同志的談話為十四大的召開做了思想和政治上的準備。」（註十八）

鄧小平在南巡期間除了發表防左和有關改革開放及經濟發展理論之

談話外，還隱晦地批評治理整頓政策，鄧指出：「評價功勞，只算穩的功勞」，「發展才是硬道理，這個問題要搞清楚，否則……是喪失時機，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然而，鄧小平對胡耀邦、趙紫陽主政的八四到八八年的總評價卻是：「那五年的加速發展功勞不少，胡耀邦、趙紫陽雖然後來在反自由化的問題上有錯誤，但是他們在經濟上沒出大問題，這是我的評價。」（註十九）

針對在中共人事組織系統及意識形態上有重大影響力的高級幹部，鄧小平指名道姓的批評：「有些理論家，像鄧力群那幾個人，政治家像宋平、李錫銘等，拿大帽子嚇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註二十）在回應一些「左」派理論家曾批評並調查鄧小平大力支持的皇甫平文章時，鄧尖銳的指出：「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些……這個話我這幾年總講，去年在上海講的更多，但是有人聽不進去，還派人來上海查底細，現在你們可以告訴他們，讓他們來查我好了。」（註二十一）

此外，為保證改革開放路線能貫徹推行，鄧小平甚至公開的不點名批評在黨內地位崇高的陳雲，以展示他破釜沉舟的無比決心：「有的人，中國搞特區這麼大的事，自己從來就不來看看，站在老遠指手劃腳，其實沒有甚麼發言權嘛！」「回過頭來看，我的一大失誤就是搞四個特區時沒有加上上海，那時阻力很大，黨內有很高位置的老同志就反對……當時我沒有堅持，要不然，現在長江三角洲，整個長江流域，乃至全國改革開放的局面都會不一樣。」（註二十二）

鄧小平這些詞鋒尖銳的言論，迫使「左」派理論家及「經濟緩進派」領導人不得不退避三舍，使其路線及人事政策在十四大上再次獲得肯定。

第二節 鄧小平南巡策略與經過

九二年一月中下旬，鄧小平在家人及隨員數十人陪同人，由北京南下。鄧在湖北省的武昌作短暫停留，又繼續其南巡旅程，於一月十九日至廿九日視察了深圳、珠海兩個特區與及廣東省的順德縣，沿途作了很

多有系統、針對現實性很強以及全面反映其思想理論體系的重要談話。鄧小平的專用列車於一月卅一日抵達上海，正式結束其南巡行程。

鄧小平除卻參觀一些著名的旅遊點、公共建設、先進商業大廈及高科技企業外，還於一月廿二日下午與軍事領袖、國家主席楊尚昆及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等，與廣東省及深圳市的黨政軍領導人會面。

綜觀鄧小平整個南巡行程安排、所發表的言論、南巡後其支持者的跟進工作、以及其所引起的巨大迴響等觀察，可以清楚見到鄧的南巡絕非一時即興之作，而是經過深思熟慮安排的行動。

首先，鄧小平是次南巡各地、發表言論的行動方式與一九七一年毛澤東為針對林彪而視察大江南北極為相似。毛與鄧皆是每到一地，便向當地的黨政軍領導人發表針對性甚強、甚至點名批評個人的談話，從而達至爭取地方實力派的支持，並向對手施加壓力的目的。

其次，由於「左」派理論權威等鼓吹恢復計劃經濟、有政治目的地鼓吹毛澤東熱、重新強調階級鬥爭等言論已充份表現，故此，當鄧小平發出批評「左」的講話時，十分容易引起地方領導人及群眾的共鳴，以致能更有效的向對手施加壓力。

再者，鄧小平選擇訪問因改革開放政策而迅速發展起來的深圳、珠海特區，也是企圖以實際建設成果來回應「左」傾思潮的責難。鄧小平一抵達深圳，看到這些有現代化城市氣息的地方後，便針對「左」傾思潮說：「對辦特區，從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擔心是不是搞資本主義。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註二十三)

此外，鄧決定在九二年春節期間南巡，在時間上也是經過深思熟慮，因為春節過後便要召開人大、政協會議，同年下旬更要召開中共十四大。為保證經建及改革開闊路線能被貫徹推行，鄧小平在一月廿二日中午會見廣東省及深圳市的領導時，便大力為改革開放路線打氣：

「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准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就走不出一條好

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幹不出新的事業。」（註二十四）

另外，鄧小平在南巡時選擇與楊尚昆、劉華清及王瑞林等高級軍事將領同行，明顯地向各方面顯示其開放政策除卻有實質的成效，受到各地方黨政幹部及群眾衷心支持外，對中國政局有舉足輕重影響力的解放軍也積極支持其經濟建設路線。後來當楊尚昆返北京後，便隨即組織中國各大軍區的司令及政委到特區考察學習，為鄧小平路線增加聲勢，使「左」傾理論家及政治家大感壓力。

最後，鄧小平南巡所帶來的震撼性，相信亦是經過精心安排的。鄧抵達深圳後，其南巡訊息在當時已不脛而走。然而，廣東省委書記謝非曾三次詢問鄧小平是否可以報導其行程，皆遭鄧小平拒絕。（註二十五）後來，其南巡消息終於由香港傳媒率先報導，並引起世界輿論的廣泛關注，海外輿論指出鄧小平此行意義重大，最後，更通過「出口轉內銷」的策略傳回大陸，這不單能在中國人民心中加強鄧南巡的戲劇性與震撼力，更可以通過海外傳媒不經審查的報導，保留鄧講話中帶有強烈現實針對性的神髓，更大大加強其影響力。

第三節 鄧小平南巡講話的精髓

鄧小平南巡講話，不僅系統地將其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作出扼要的論述，更利用其威望對六四以來中國領導高層及思想理論界就圍繞「姓社姓資」及其他爭論作出總結，並為中國的發展方向及人事安排作出規範。

一 以經濟建設為本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變

鄧小平尖銳地指出：

「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為什麼『六四』以後我們的國家能夠很穩定？就是因為我們搞了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所以，軍隊、國家政權，都要維護這條道路、這個制度、這些政策。」（註二十六）

在這裡，鄧小平以堅定的語調，否定了在六四後部分中共高層及理論界之領導人過份強調之反和平演變，鄧並以經濟建設發展的觀點衝擊反和平演變及階級鬥爭理論。

鄧小平強調一定要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同時強調四個堅持及改革開放，才是避免中國走往死路的唯一方法。從過往鄧小平多次講話得知，其所謂死路，主要是兩種情況，第一種是走蘇聯東歐共黨下台、經濟崩潰、社會動亂、民族分裂，甚至出現戰爭的局面；另一種情況是放棄改革開放，退回以反和平演變為主、強調階級鬥爭、推行僵化社會主義模式的道路，這亦會導致社會出現政治及經濟危機。基於上述情況，鄧小平深刻的指出：「右能葬送社會主義，『左』也能葬送社會主義。」(註二十七)

二 抓住時機，加速發展經濟步伐

面臨著國際經濟競爭壓力增加、中國周邊國家高速的經濟發展、以及中國內外部政治環境相對平靜等因素，鄧小平強調中國一定要抓住機會，在「講效益，講質量，搞外向型經濟」的方針下，「發展才是硬道理」。(註二十八)

在南巡講話中，鄧小平進一步突出了他有關經濟發展可以隔幾年上一個台階的戰略思想：

「看起來我們的發展，總是要在某一個階段，抓住時機，加速搞幾年，發現問題及時加以治理，爾後繼續前進。從根本上說，手頭東西多了，我們來處理各種矛盾和問題時就立於主動地位。」(註二十九)

基於這個信念，鄧小平對胡耀邦、趙紫陽主政的八四至八八年這五年間的高速發展作出高度評價，而對八八年底開始的治理整頓，則認為「只算穩的功勞」。(註三十)

鄧小平這個觀點十分重要，回顧鄧南巡後幾年間中國改革開放步伐大幅深化，經濟發展速度急劇增加，整個經濟社會狀況出現了邁上另一台階的變化。然而在同一時期，由於發展速度過快，投資過速，以及在

體制轉換之過程中國家法規及控制市場經濟的各種措施跟不上，以致中國在九二年下旬、九三年初開始出現通貨膨脹、經濟秩序混亂、貧富差距擴大、以及農業受衝擊等種種難題，中央不得不在九三年下旬推行宏觀調控措施、反貪污及制定落實經濟體制改革的具體方案。

基於上述情況，自九三年中旬開始，中國及海外便陸續出現了不少分析鄧小平南巡效應或功過的文章，部分評論指出鄧小平鼓吹高速發展乃是造成經濟困難的一個重要因素。然而，假若從上述鄧小平「隔幾年上一個台階」的戰略方針考慮，加速發展雖然令社會經濟加深了種種危機，但由於南巡後那幾年的發展已使中國出現更深的改革開放，人民思想出現了「質」的變化，再加上經濟發展使市場物質供應豐富，「手頭東西多了」，國家領導人實際是可以如鄧小平指出的「立於主動地位」^(註三十一)來設計中國發展的路向。

三 提倡防左，闡述社會主義標準，總結兩年多來的爭論，以及鼓吹更大膽的改革開放

針對六四後籠罩著的沉重氣氛，鄧小平在南巡期間指出要「大膽地試，大膽地闖」，鄧還指出「改革開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註三十二)為了使各級官員在經濟建設中不受意識形態干擾，鄧小平提倡「不爭論」及「防左」的理論：

「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甚麼也幹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農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應如此。」在防左方面，鄧小平指出：「右的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註三十三)

除了在理論上強調實踐、敢闖、不爭論及防左外，鄧小平更為過去一年多以來使改革者不敢邁步向前的姓社姓資問題作出結論：

「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

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註三十四)

鄧小平提出這三條實際上是增強一個國家生產力的具體標準，其中並沒有意識形態上的束縛。基於此，鄧小平指出：「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註三十五)根據鄧小平的三條標準，澄清了幾個備受爭論問題之結論。

(1) 計劃與市場問題

鄧小平在回應有關社會主義必需是計劃經濟的提法時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通過這個講話，鄧小平正式為中國推行市場經濟亮了綠燈。

(2) 利用外資問題

鄧小平針對有些人提出多一分外資，就多一分資本主義時尖銳地批評：「這些人連基本常識都沒有。」鄧小平認為引進外資，不單國家可拿稅收、工人可拿工資等外，中國還可以學習技術，並獲得信息，以打開國際市場。

(3) 地區貧富差距問題

針對改革開放以來不同地區間之貧富差距擴大問題，鄧小平提出了一部分地區先發展起來，然後多交點利稅，以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希望最終達至共同富裕的目的。

四 打擊犯罪活動、反腐敗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這裡反映了鄧小平在堅持改革開放及經濟建設的同時，亦強調共產

黨一黨專政、維持社會穩定、純潔社會風氣以及反腐敗等。

在南巡講話中，鄧小平提出「打擊各種犯罪活動，掃除各種醜惡現象，手軟不得。」（註三十六）而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腐敗，並將廉政建設當作大事來處理。

此外，鄧小平亦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二十年，並指出：「在苗頭出現時不注意，就會出事。」（註三十七）

五 批評政治對手，影響人事安排

直接批評以陳雲為首的經濟漸進派，及以鄧力群為領導的「左」派理論權威，並針對中央的高層領導，提出誰不搞改革開放誰下台

鄧小平在提出其建國路線後深刻的指出：「正確的政治路線要靠正確的組織路線來保證。」（註三十八）鄧以老年人不應阻礙中央現時領導開展工作為引子，不點名的批評陳雲，務求以直接挑戰的姿態壓倒經濟漸進派的影響力，從而有利其在十四大中挑選支持其改革開放路線的領導人。鄧小平批評陳雲說：「老年有長處，但也有很大的弱點，容易固執。」（註三十九）鄧並進一步批評陳雲從不實地考察特區，而卻站在老遠指手劃腳。鄧小平亦批評理論家鄧力群，政治家宋平及李錫銘等，說他們「拿大帽子嚇唬人」。

在批評政治對手後，鄧小平更對中共的最高領導作出必須堅持改革開放的要求，他指出「對改革開放熱不熱心，是檢驗幹部堅不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最重要的標準，其他標準不能超越這個標準，更不能取代這個標準。誰堅持改革開放誰就上台，誰不搞改革開放誰就下台。」（註四十）

第四節 對貫徹南巡講話的爭持，以及政治局、人大及政協會議的召開

一 「左」派理論家對南巡講話的抵抗

鄧小平南巡講話傳返北京後，引起左派理論家極度不滿，他們認為

「中國的戈巴契夫不是胡耀邦、趙紫陽，而是鄧小平……不讓批趙紫陽，就是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捲土重來創造條件和機會。」(註四十一)

這裡值得留意的，是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只提出防「左」而不是更主動反「左」，鄧小平就這點曾解釋道：「關於黨內『左』的問題不是一兩年就能解決的，『左』的根源在黨內很深，在社會上有市場……我南下時在深圳、廣州、上海講到適當對『左』要反一反，但考慮到一些同志可能受不了，所以改提主要是防止『左』。」(註四十二)

由於鄧小平對反「左」並無表態，這就給「左」傾理論家一個較主動的生存空間，部分支持「左」傾理論的領導在維護「左」傾思潮時指出：「小平同志說主要是防止『左』，而不是要我們把批『左』當成當前的主要任務，不爭論，把全黨的注意力放在加快發展經濟上去。」左傾理論家對是「左」還是右的問題上不爭論表示同意，認為可以「在當前形勢下保護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完整性、統一性、『神聖』性的一個措施。」他們更「擬就了一百多個針對資本主義改革開放進行全面批判的理論專題」，以待機會反撲，「把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意志重新統一在科學社會主義的旗幟之下。」(註四十三)

針對鄧小平南巡講話，「左」傾理論家通過其控制的傳媒工具對鄧講話封鎖及作出反擊，其中較突出的例子是《人民日報》在二月二十日，即鄧小平結束南巡後的二十天，刊登了一個書刊廣告，宣傳二十日出版、代表「左」傾理論之《當代思潮》雜誌。此廣告中亦刊登了《當代思潮》那期的目錄如〈評兩種不同的改革觀〉、〈要掌握改革代價的度〉、〈反傾向的重點搞錯了會翻船〉以及〈增強反和平演變的信心〉等等，鼓勵讀者趕快購買這份與南巡講話對著幹的雜誌。

在上述文章中，〈反傾向的重點搞錯了會翻船〉一文最為露骨，把矛頭直指鄧小平南巡時的防「左」講話。文章指出：「在大海中行船，有時向左邊傾一點，有時向右邊傾一點，有經驗的船長，對傾向判斷準確，掌握適度，就會乘風破浪地前進。如果判斷不準確，把重心搞錯了，就會翻船。」文章接著以批評趙紫陽的錯誤為名把矛頭指向鄧小平：

「趙紫陽同志主持中央工作，自由化嚴重泛濫的局面本來尚未扭轉，危險嚴重存在，他卻把反傾向的矛頭指向反左，於是自由化思潮惡性發展，終於導致了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那場幾乎傾覆了人民共和國大廈的政治風波。」在文章結語中認為「國內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仍然嚴重存在著。在這樣形勢下，科學地認識和把握反傾向的重點，就大為重要了。」（註四十四）

二 改革派為貫徹南巡講話的全面攻勢

在民心背向、鄧小平慎密的策劃下，「左」傾理論家的抵抗根本是蒼白而無力。然而，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一點兒也沒有放鬆，他們藉著民意，與各方面緊密配合，務求把南巡講話的精髓融入中央官方各類法定文件，在法律、政策及社會輿論上形成共識，使改革開放觀念更深入地植根於各級領導及群眾腦海中，成為中國最高的意識形態，從而保證改革開放大業不會再受「左」的干擾而逆轉，並為九二年底召開的十四大定下全面改革的基調。

（1）改革風與輿論響應

鄧小平南巡講話引起的最大即時效應，乃是各地傳媒紛紛發表文章支持進一步改革開放。

在九二年上旬大量發表的文章中，較全面及觸目的包括深圳《特區報》於二月二十日起，陸續發表八篇〈猴年新春評論系列〉文章，強調「要搞快點」、「要敢闖」和「多幹實事」。此外，深圳《商報》亦於三月中上旬起，推出〈八論敢闖〉之評論文章，鼓吹「為進一步解放思想鳴炮」、「快馬加鞭」、「防右更防左」、「實事求是貴在『敢』」、「敢用他山之石」、「險處敢登攀」、「胸懷大局才敢闖」，最後到「借鑑香港互利共榮」。

通過大量支持改革開放的文章之發表，瞬息間改變了中國自六四以來的沉重氣氛，社會一下子活躍起來，這更為中國往後兩年飛躍式的发展提供了強而穩固的群眾基礎。

(2) 解放軍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

鄧小平南巡講話後，支持者如楊尚昆等在軍中迅速開展工作，人民解放軍隨即作出積極反應，全軍上下掀起學習鄧小平南巡講話的高潮。

從九二年二月起，楊尚昆更積極組織各大軍區司令、政委分三批到深圳及珠海兩個特區參觀學習，這三批考察團中有三十八名中將及二十六名少將，都是中國解放軍的支柱，他們在考察期間均對兩個特區的繁榮表示讚賞，將軍們說：「到這裡來看一看，對深圳堅持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就感同身受，深深認識到了鄧小平同志所說的『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變的英明、正確；不改革開放，中國就不能富強，社會主義就不能發展。」(註四十五)解放軍將領的表態自然對「左」派理論家造成壓力。

在三月下旬，中央軍委秘書長、總政治部主任楊白冰更明確的代表軍方對改革開放表態：「人民解放軍要更加堅定不移，始終如一地擁護、支持、參加和保衛改革開放，要為改革開放、發展經濟『保駕護航』。」(註四十六)

三 中央改革決議、人大政協會議召開與加速改革步伐

- (1) 鄧小平南巡講話對中央領導層及各項政策也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在二月底，中共中央整理了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並刪除了其中較尖銳的觀點，作為中央2號文件下發至縣團級黨委，向全體黨員傳達。三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全體會議，強調須抓住有利時機，加快改革開放，集中精力進行經濟建設。
- (2) 總理李鵬在九二年三月初召開的國務院全體會議中，宣佈治理整頓任務已經完成，國民經濟轉入正常發展階段，為加速發展經濟在政府政策上亮了綠燈。
- (3) 中央開始了「紅頭文件大清理」，所謂紅頭文件，即指國務院各部委、各地方政府及人大通過頒佈執行的條例及法規等規範性文件。從九二年三月開始，各有關機構根據鄧小平南巡講話的精神，清理有礙於改革開放的紅頭文件，被修改的主要集中在改革深度不夠、

政府對企業管得過多過細、以及在治理整頓期間發佈而不利於九二年經濟發展速度所需要的文件。通過是次文件整理，中國進一步明確界定政府的行為，擴大了企業的權限，為推行市場經濟創造了有利的基礎。

- (4) 在改革開放大氣氛籠罩下，中國自九二年三月開始，逐步推出一系列推進改革開放的措施，如肯定經過接近十年爭論的股份制企業制度、提高糧食統銷價格、批准海南省吸引外商、開發洋浦經濟開發區、以及珠海對一批有貢獻的科學家頒發超過一百萬元獎勵等等。
- (5) 在九二年三月召開的全國人大會議中，很多代表對李鵬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有關：一、國民經濟增長只是百分之六；二、不提八四至八八年加速經濟發展的功勞；三、不提防左等三點表示保留態度。

經過人大代表們的批評與不同意見的爭議下，政府工作報告作了一百五十多處修改，重要的部分有十多處，主要增修部分包括：

1. 加上「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的提法，並增加「貫徹基本路線要一百年不動搖，要更加堅定、準確、全面」等論述；
2. 對於認為百分之六的增長率太低的批評，修改後的報告雖未更改此指標，但增加了「如果今年各方面的工作都能夠做得更好一些，八五計劃後三年經濟的加快發展就有了更為堅實的基礎。」
3. 報告就各種批評與建議，增加下列強化改革的內容：
 - i. 關於股份制，認為有利於促進企業機制之轉變；
 - ii. 市場和計劃並不是區別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標誌；
 - iii. 繼續發揮個體、私營經濟有益的補充作用。

四 鄧小平五月北巡講話，中央高層領導的積極配合

為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鄧小平於九二年五月二十二日視察首都鋼

鐵廠，他提出九三年百分之六的經濟增長速度不行，並對首鋼負責人周冠五說：「他們不動，你就叫！」而後來「據報總理李鵬已於六月廿日在北京舉行的黨外人士情況通報會上透露，今年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將超過原定的百分之六，而可達到百分之九。」(註四十七)

此外，鄧小平並鼓勵人們要進一步解放思想「『要換腦筋』，要有『新招數』……敢闖、敢試、敢幹。」(註四十八)他還分析三種對改革開放的態度，分別是說說拉倒(筆者按：即只說不做)、等待觀望和真抓實幹。鄧更提出要讓懂經濟的人管經濟。鄧說：「現在懂經濟的人不多，我也不懂，但是我聽得懂誰講的對，別看朱鎔基過去只是個處長，田紀雲只是個副廳長，他們講的還差不多。」(註四十九)

在鄧小平視察首鋼後，中共中央黨校隨即成為中央最高層的演講中心。六月初，三位政治局常委江澤民、喬石和宋平皆往做報告，其中喬石的講話較為尖銳，他指出：「高層『左』的問題不解決，我們要『亡黨、亡國、亡頭』。」(註五十)與此同時，田紀雲及朱鎔基也分別發表講話及文章。田紀雲在廣東講話時透露鄧小平南巡講話的重要背境，指出其講話是為十四大的召開作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準備，田亦強調改革開放的路線不能改變，否則「誰就要下台……就要被打倒。」他還提出在清除「左」的影響時，「要特別警惕那些『風派人物』，這些人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一有機會就跳出來反對改革開放。這些人一旦掌權，對黨對國家的事業會造成極大的危害。」(五十一)

而朱鎔基的上海講話主要是論述有效益的加速發展，他著重強調「不能把由於解放生產力的改革所激發的高速度，同過去依靠強制性政策導致的高速度混為一談。」也就是不能同毛澤東的大躍進，以及七六年後兩年的洋躍進混為一談。朱鎔基這實際是反擊「左」的勢力在當時提出經濟要反右的策略，並提出具體落實加速發展的四條辦法：「一、要加快改革開放的建設；二、要加快經濟結構調整的速度；三、要加快提高企業經濟效益的速度；四、加快科技進步的速度。」(註五十二)

五 各級地方領導對改革開放的積極回應

在刮起的「鄧旋風」中，中國各地方領導皆就加快改革開放速度，代表自己地區向中央提出各式各樣要求，這客觀上論證了鄧小平提倡的發展路線，符合了中國各地區渴望加速改革開放的要求：

中、西部地區希望中央批准增設開放城市，以加速資源開發；東北、西北地區希望中央下放權力並提供優惠政策，將南方特區政策引向北方；貧困地區則要求進一步實施中央特別支持其發展的傾斜政策，加速扶貧，避免東西發展差距擴大；邊境地區則期望開放更多口岸，擴闊邊貿範圍，積極推行富民興邊政策；而沿海及經濟特區則希望作進一步開放的嘗試，增設股市、建立外匯市場、廣泛推行政企股份制改革。而大連、海南、廣東及上海等皆有人提出「再造香港」的構想。

第五節 鄧小平主導十四大——確立市場經濟與跨世紀人事安排

一 鄧小平、陳雲協議與中共十三屆九中全會之召開

在鄧小平改革旋風與各級官員、軍隊、輿論及人民支持下，以穩健慎重見稱的經濟漸進派領袖陳雲，亦對新一輪的改革開放高潮作出基本支持態度。陳雲在會見上海市領導吳邦國及黃菊就開發浦東的匯報時指出：「我非常贊成開發浦東、開放浦東。」他並「鼓勵上海同志要解放思想，大膽實踐，善於總結，按照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狠抓振興上海、開發浦東的各項工作的落實」。（註五十三）

而更令海內外評論家矚目的，就是七月二十三日在悼念中共元老李先念去世悼詞中，陳雲為其從沒到過特區作出解釋，直接對鄧小平南巡期間不點名批評他「中國搞特區這麼大的事，自己從來就不來看看，站在老遠指手劃腳。」（註五十四）作出回應：

「先念同志和我雖然都沒有到過特區，但我們一直很注意特區建設，認為特區要辦，必須不斷總結經驗……這幾年，深圳特區經濟已經初步從進口型轉變成出口型，高層建築拔地而起，發展確實很快。現在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規模比過去要大得多，複雜得多，過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當前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很多已不再適用。」(註五十五)

此外，為保證十四大能順利召開，有評論指出鄧小平及陳雲曾作出一定之協議。「陳雲主動提出：一、辭去中顧委主任職務……二、十四大人事安排問題，由小平同志代表我們參與意見，我個人不介入……當然，陳雲的退讓並非毫無條件，例如『江、李體制不變』的提法就出於陳雲之口。」(註五十六)「陳雲對浦東的表態，實際上是鄧、陳兩位中共最具實權的人物，在中共『十四大』前達成政治協議的一種動作。據消息人士稱，這個協議是有著非常實質性的內容的，這就是：(一) 陳雲有條件地支持鄧小平的改革改開放路線，包括對經濟特區的支持。……(二) 鄧小平在中共『十四大』人事上將作出讓步，就江李體制不動，除了個別人事調整外。」(註五十七)

在鄧陳達協議後，籌組十四大工作的領導幹部也進行了調整，例如政治報告起草小組改由丁關根主持，而人事小組實權則由宋平轉到楊尚昆手中。九月下旬，鄧小平再向政治局表示：「一、朱鎔基必須進常委，二、宋平必須退。否則十四大就推遲召開。」(註五十八)

總而言之，鄧小平經過南巡以及其後的部署，已化被動為主動，使改革開放成為十四大的主導力量。十月五日，中共十三屆九中全會召開，確定十四大召開時間，審議十四大報告及黨章修正案，而最重要的，是就前總書記趙紫陽繼續審查部分作出定性結論，全會「同意維持十三屆四中全會對趙紫陽同志所犯錯誤的結論並結束審查。」(註五十九)中共「十四大」亦於十月十二日正式召開，十九日召開由十四大選出的中央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產生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和中央軍事委員會成員，完成新領導層的建立。

二 十四大的決議與新領導層的建立

十四大由總理李鵬主持，其主要議程有下列三項：

- (1) 通過江澤民代表十三屆中央委員會作題為〈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最大勝利〉的報告。

此報告分析了十四年改革開放實踐的總結；以及九十年代改革和建設的主要任務，在討論這問題中，江澤民十分有系統的勾劃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十個重要策略，其重點為建立市場經濟；擴大對外開放，更多地利用國外的資金、資源、技術和管理經驗；調整產業結構，重視農業，並加快發展基礎工業、基礎設施和第三產業；加速發展科技及教育，重視知識分子；就中國各地區優勢來加速發展，並促進全國經濟佈局合理化；推動政治體制改革；進行機構改革，精兵簡政，並轉變政府職能；精神文明建設；控制人口及加強環境保護；加強軍隊建設和增強國防實力。

- (2) 審查中央顧問委員會及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報告，並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

這裡較為重要的是這次黨代表大會同意不再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以便新領導層能獨立的運作。在修正黨章方面，大會決定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黨的路線寫進黨的章程，以統一全黨就經濟建設的主導思想。

- (3) 選舉中央委員會

「十四」大選舉了一百八十九位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委員，一百三十位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及選舉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一百零八人。

緊接著十四大閉幕的第二天，十四大一中全會隨即舉行會議，產生中共新的最高領導層，其主要名單如下：

中央政治局常委：

江澤民、李鵬、喬石、李瑞環、朱鎔基、劉華清、胡錦濤

中央書記處書記：

胡錦濤、丁關根、尉健行、溫家寶、任建新

中央軍委會：

江澤民(主席)、劉華清、張震(副主席)、遲浩田(國防部長)、張萬年(總參謀長)、于永波(總政治部主任)、傅全有(總後勤部主任)

三 十四大路線及新領導層的特點

(1) 以黨最高架構充份肯定鄧小平建設中國社會主義之思想

在十月十五日《人民日報》〈評述黨的十四大的歷史功績〉文章中，強調「如同黨的七大(筆者註：即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黨代表大會)的歷史功績是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為全黨指導思想，黨的十四大的歷史功績是確認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章有意識地將鄧小平理論與毛澤東思想等量齊觀，從而使鄧小平理論成為中國發展的最高指導、不能挑戰的原則。

在江澤民近三萬字的報告中，亦得出「我們要在九十年代把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推向前进，最根本的是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加快改革開放，集中精力把經濟搞上去」的結論。(註六十)

(2) 確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江澤民的報告中重申鄧小平南巡時有關「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之論述，並突破地肯定中國需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江指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抓好幾個相互連系的環節：

1. 轉換國有企業，特別是大型企業的經營機制，把企業推向市場；
2. 加快市場體系之培育；
3. 加快政府職能的轉變；

4. 深化分配制度與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註六十一)

驛眼看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似乎只是一個簡單語句，但在中國這個長期堅持計劃經濟、強調階級鬥爭、以及「左」傾正統理論深入民心的社會中，實在需要無比勇氣及開拓精神，通過各級官員及理論界長期艱苦奮鬥，方能衝破「姓社姓資」及被批評為走上「和平演變」道路的責難，而理直氣壯的走上現代經濟所須的以市場為調節有限資源的經濟運行機制。

(3) 協助鞏固江澤民接班實力，以及保證改革開放政策能貫徹的人事安排

正確的建設中國方略有賴於建立一個穩定及開放的領導班子，基於此，鄧小平為十四大的人事佈局作了精心的安排。

1. 撤銷有機會干預新領導層的中央顧問委員會，讓「新生一代」中央領導人放手推行工作。
2. 清除「左」派人物，提升改革派幹部。在鄧小平「誰不支持改革誰下台」的指示下，一批被視為「左」派的主管經濟及意識形態工作的高級官員如宋平、姚依林、李錫銘、王忍之及高狄等被撤換。而被視為改革派的官員如朱鎔基、胡錦濤、以及鄧小平在軍中的親密支持者劉華清則被提升至政治局常委會，而政治局的組成亦給予外界一個較活潑的改革形象。
3. 年輕地方幹部崛起。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前提下，經濟高度開發的地方幹部較受重視。沿海、沿邊、沿江、沿路「四沿」經濟發展戰略的提出，以及開放城市、經濟特區及各類經濟開發區的建立，皆使這些地區的領導人更獲重視而得以加入中央委員會。據統計，這類地方幹部有六十三名被選任為中央委員，佔全體中委人數百分之卅二點八。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領導人為謀求發展本區經濟，提高其地區的生活及就業水平，他們一般較願意採取靈活務實的態度，拋棄不

合時宜的意識形態束縛，以創新、改革，以及實事求是的處事方針以回應其地區所面臨的種種挑戰。客觀上他們自然成為改革開放政策的積極支持者。

4. 楊白冰軍權旁落、劉華清及張震輔佐江澤民掌軍權。中共自六四後，江澤民雖接掌軍委主席職務，惟軍隊實務大半歸楊尚昆及楊白冰負責。楊白冰作為軍委秘書長，軍級以上幹部的任命均需通過其上報軍委批准，再加上其管轄總政治部，實掌管軍中幹部的思想人事檔案。雖然楊氏兄弟一向對鄧小平忠心耿耿，並提出要為改革開放保驾护航，但是由於他們勢力迅速膨脹，引起軍內老資格將領的不滿。而更重要的，就是在楊白冰掌權期間，江澤民無法直接掌握軍隊，而與楊白冰處於一種微妙的競爭關係。

鄧小平在十四大釋楊氏兄弟兵權，除了是順應老資格將領的要求外，亦是從維護江澤民作為第三代真正核心，以及政治長期穩定的角度考慮。為防範在其去世後擁有實際軍權者會以「槍指揮黨」，挑戰江澤民領導地位，鄧小平在權衡政治穩定的需要下，決定解除楊白冰軍中職務。然而，由於楊白冰在治軍期間並無明顯過錯，故鄧小平仍安排其加入政治局，並阻止軍中進行清洗其影響力之行動，從此可以證明，鄧小平處事乃從大局出發，目的是建立一個團結穩定的領導層。

由於能實際掌握軍隊乃是當中共最高實際領導人的必要條件，故為鞏固江澤民的核心地位，鄧小平決定重新起用在軍中有尊崇地位、年齡已屆七十六及七十八歲的劉華清及張震為軍委副主席，輔佐江澤民實際掌握軍權。鄧相信這兩位老將軍在負責一屆五年的軍方工作後，必然會引退，所以不會以軍事強人的架勢挑戰江澤民的權力。

(4) 推行民主改革，以人大及政協制約國務院的權力

中共的十四大及其一中全會雖然已產生了黨的最高領導，但根據中國憲法規定，這些黨領導要正式進入國家領導機構，還有待下年(即九三

年)三月召開的人大及政協會議。

九三年三月五日，中共召開十四屆二中全會，為當年三月中旬召開的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政協各項安排最後定音，決定新一屆國家機關領導人。

九三年三月人大會議中，經國家憲法程序選出江澤民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席，而另外中共六名治局常委中，李鵬任國務院總理，喬石任人大委員長，李瑞環任政協主席，朱鎔基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劉華清任國家軍委副主席，唯有胡錦濤專心黨務，名義上不擔當國家行政機關的職務，這種安排隨即被境外輿論譏為「人大黨政『一家親』」。無可否認，上述中共黨中央及全國人大領導層的人事安排重疊，明確顯示黨政一體化。國家機構內的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人大委員長、政協主席及國家軍委正副主席，皆由共產黨的政治局常委出任。雖然中國過往四十多年來國家機構的各最高負責人亦同樣是由黨內最高層領導出任，但由政治局常委完全分管黨、政、軍、人大、政協等「五套班子」，也屬建國以來所罕見。

驟眼看來，新的人事方案加強了「黨政合一」，甚至是「以黨代政」，而離鄧小平多年前提倡的「黨政分家」之制衡概念相去更遠。然而，在另一個角度分析，將握有實權的政治局常委放入人大及政協，客觀上使人大及政協的權力增大。

過往四十年，中共一直以黨及國務院為尊，把人大及政協置於微弱位置，一些被排斥、已退下來或無實權的民主黨派之領導人物才被安排到人大和政協裡去，故此，過往社會曾諷刺中國政權為「黨委揮手，政府動手，人大舉手，政協拍手」、行政權力為絕對主導之力量。

現時從客觀情況及實際效果分析，將在政法系統及在地方政權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喬石及李瑞環放進人大及政協，實為下一步增強人大作為立法的權力機關，以及政協以議政產生輿論壓力的實際功能打下基礎，從而出現中國政壇上「兩翼牽制核心」(註六十二)，即是人大及政協從兩個側面發揮功能制約著黨和國務院的行政權力之情況。自九三年以來人大立法速度頻繁，各級行政機關領導被指令要依法辦事的趨勢來看，縱使

上述之安排仍與部分西方發達國家政體中立法與行政分家的制衡模式仍有一定之距離，但無可否認，這種將共產黨最高領導安排入國家各類機構，而由各機構間在實力基礎較平等情況下作出互相制衡之安排，極有可能是較適合中國實際國情，將政治紛爭制度化解決，並逐步建立制約式政治架構之有效過渡性安排，對權力制約、法治及逐步民主化有正面的意義。

註 釋

- 註一 霍斯方〈鄧小平能推動第二次改革嗎？〉《鏡報》月刊，一九九二年四月號
- 註二 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371頁
- 註三、四 同註二，第375頁
- 註五 同註二，第376-377頁
- 註六 同註二，第381頁
- 註七 吳敬漣〈中國此次經改高潮有深厚基礎——兼回顧改革十三年歷史〉九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於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的演講
- 註八 同註二，第375頁
- 註九 孫勤輝〈田紀雲透露鄧小平南巡講話背景〉《廣角鏡》月刊，一九九二年七月
- 註十 參閱同上註
- 註十一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1716頁
- 註十二 《人民日報》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 註十三 〈鄧力群同志答中流記者問〉《光明日報》，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 註十四 《新華文摘》一九九二年第一期
- 註十五 張明遠〈鄧小平反擊左傾回潮背景透視〉《明報月刊》，一九九二年四月號

- 註十六 劉必〈鄧制止全面恢復毛主張〉《鏡報》月刊，一九九二年二月號
- 註十七 《文匯報》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七日
- 註十八 同註九
- 註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 同註一
- 註二十三、二十四 同註二，第372頁
- 註二十五 《文匯報》一九九三年二月十六日
- 註二十六 同註二，第370-371頁
- 註二十七 同註二，第375頁
- 註二十八 同註二，第377頁
- 註二十九 同上註
- 註三十 同上註
- 註三十一 同上註
- 註三十二 同註二，第372頁
- 註三十三 同註二，第375頁
- 註三十四 同註二，第372頁
- 註三十五 同註二，第373頁
- 註三十六 同註二，第378頁
- 註三十七 同註二，第379頁
- 註三十八 同註二，第380頁
- 註三十九 同註一
- 註四十、四十一 霍斯方〈鄧小平講話三大意向〉《鏡報》月刊，一九九二年三月號
- 註四十二 陳潔弘〈鄧再談防左反左，讚江澤民柔中有剛〉《鏡報》月刊，一九九二年六月號
- 註四十三 沈博〈鄧公重申『不爭論』陳雲主動『二退讓』〉《鏡報》月刊，一九九二年十月號
- 註四十四 《當代思潮》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日
- 註四十五 元上、漢竹著《鄧小平南巡後的中國》，改革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165頁
- 註四十六 新華社北京電 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 註四十七 劉必〈鄧小平北巡『隱情』種種〉《鏡報》月刊，一九九二年七月號
- 註四十八 同註四十五，第289-290頁
- 註四十九 同註九
- 註五十 同上註
- 註五十一 同註九
- 註五十二 同註四十七
- 註五十三 同註四十五，第 79-80頁
- 註五十四 同註一
- 註五十五 同註十一，第 2126頁
- 註五十六 同註四十三
- 註五十七 莊蒙〈楊尚昆促使鄧陳達成『協議』〉《鏡報》月刊，一九九二年 六月號
- 註五十八 柳江〈十四大鄧理論取代毛思想〉《鏡報》月刊，一九九二年十一月號
- 註五十九 同註十一
- 註六十 袁木等《邁向21世紀 的行動綱領——學習黨的十四大報告》，新華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14頁
- 註六十一 同上註，第16頁
- 註六十二 吳國光、王兆軍著《鄧小平之後的中國——解析十個生死攸關的問題》，世界書局，一九九四年，第15頁

第五十四章 鄧小平南巡後的中國 ——經濟騰飛、改革深化

第一節 鄧南巡後中國社會出現深刻變化，經濟發展迅速飛躍至另一台階

九二年鄧小平鼓吹改革開放的談話像一聲春雷，在中國大地引來爆炸性的迴響。鄧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以及「抓住時機，加速搞幾年，發現問題及時加以治理」^(註一)的觀點，深深打動了普遍群眾以及希望在改革大潮中一展身手的各級官員，當時一般人的心情可以用「急」字來形容。

九二年三月人大會議中，一些中級官員的心情可反映當時社會希望經濟能加速發展。四川省樂山市長指出：「會議期間，代表們想的議的都是怎樣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盡快把本地的經濟建設搞上去。我這個市長真有點坐不住了。」雲南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則指出：「我總在想，再過幾年，國家經濟就會再上一個新台階，想我自己該做些甚麼。」^(註二)而在中共中央黨校中，接受再培訓的官員亦希望大幹，例如一位市長說：「小平同志講話發表以後，改革開放的形勢發展很快。我們那裡已經熱火朝天地幹起來了……而作為一市之長，卻要在這裡坐半年，心裡真是著急，恨不得明天學習就結束，回去大幹一場。」

在整個社會的心理狀態希望能加速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的情況下，中國在鄧南巡後出現了深刻的變化：

一 投資狂潮，經濟發展速度急劇增加

在加速發展的氣氛下，中國各部門、各地區紛紛修改原來之發展計劃，大幅提高增長率，使大陸經濟進入另一新躍進階段。而高速的增長，亦促使近三年來已受控制之通貨膨脹有捲土重來之勢。

山東省委書記姜春雲在九二年四月率領省內各領導，到福建、海

南、廣東三省進行學習，深感穩定之中求發展的山東式經濟模式，有「靈活不足」的缺憾。姜春雲並說：「在考察過程中，邊聽邊看，內心的壓力就越大。」吉林省委書記何竹康則認為：「當前最重要的是要驅除猶豫和徘徊、抓住時機，發展自己。」吉林省更提出一個帶有悲壯感的口號：「拚搏三年，背水一戰，上新台階。」(註三)河北省則在短短四個月內，建立了石家莊新技術開發區，開通了唐山港的五千噸新碼頭，實現了秦皇島對外開放的全面鋪開。(註四)而在廣西，「作為自治區領導決心大幹一場的佐證，是一九九二年全面動工建設的十五項大工程。」(註五)

上述一連串的講話，反映了地方領導幹部在經歷三年治理整頓後，強烈希望經濟能迅速發展的心態，各地隨即掀起投資狂熱，各地為加速發展本地區經濟，紛紛擴大投資規模。在大陸經濟改革的十數年間，對各種投資項目的批准權已層層下放，為地區擴大投資造就了制度容許的有利條件。部分極希望加速投資的幹部甚至揚言：「誰不批准誰保守。」一份官方內部文件指出：「現在各個地方都在搞『翻番』(使當地的國民產值或工業產值等成倍增長，謂之『翻番』)，有條件的翻了要再翻，沒有條件的也要翻；省、市、縣、鄉、村都建開發區，項目不管重覆不重覆，效益不管好不好，都要上。」(註六)

另一份官方文件亦指出：「現在、整個中國就像一個幅員遼闊、日夜施工的『大工地』，到處都是正在興建的高樓、廠區，到處是正在工作的推土機、挖掘機……一哄而起、急功近利等過去曾造成經濟波動的流行病又開始冒頭。波及全國的『上項目熱』、『開發區熱』、『房地產熱』、『集資熱』不斷升溫。」(註七)

二 三大熱點——房地產熱、開發區熱、股票熱

(1) 房地產熱

南巡講話後，中國的房地產業從南至北出現了一系列加快發展的趨向：各級政府紛紛劃定開發區；建設用地和房地產用地迅速增加；地價與房價持續上升；外商大規模投資開發房地產，外銷樓盤的樓花在中國

境外大規模推出；而在大陸，僅在九二年，全國房地產公司就一下冒出近萬家；九二年一月至十月，全國共出讓土地的數量為一九八七至九年五年總和的五倍。

無可置疑，據多個國家經濟發展的經驗，房地產業的發展不單可改善人民的居住條件，還可通過房地產的高利潤迅速籌集建設資金，製造就業機會，帶動建築、機械及金融等行業，如銀行推出樓宇按揭貸款之供樓業務。而更不可忽視的，是中國搞市場經濟，必須擁有一個健全的，包括商品及各類生產要素如資金、勞動力、技術、以及房地產的市場體系。

然而，由於房地產業的發展過速，政府法規及調控措施跟不上，造成不少弊端，影響著房地產以及整個經濟健康的發展。較突出的例子是有些地方開發土地過多過濫，在市場前景秀麗的幢影下，不少地產商藉著與官員的關係，平價收購囤積地皮以作炒賣，造成泡沫經濟。部分地產商根本無資金興建房屋，只是藉在地產買賣中，以極其吸引的境外廣告賣「藍圖」或「模型」，吸引海外用家入市，而這些實力薄弱地產開發商所發展的地產項目有的根本建不成樓，或樓宇質素極為惡劣。有的地方地價太低，審批失控，導致國有土地資產收益大量流失。由於協議形式出讓土地量大，人為因素多，容易出現貪污受賄情況。

（2）開發區熱

中國政府自八四年以來，陸續批准在十六個沿海城市開辦「經濟技術開發區」，以優惠政策及加強基礎設施吸引外資投入。

過往經嚴格控制而成功發展起來的「經濟技術開發區」的示範效應，使急欲發展經濟的各級地方政府紛紛仿效，不僅省一級有開發區，就是市、縣，甚至鄉村裡也闢建開發區。僅九二年上半年，全國各地自辦的開發區就有一千八百多個，然而，由於資金缺乏，大部分開發區只見圈地、掛牌，卻無能力進行基本建設。有關文件指出：「這麼大的面積，僅僅做到『三通一平』（指通電、通水、通訊及平整工地），就需要投資幾萬億元，即使把去年的投資規模全部用於這些開發區的基礎建設，也要六

年才能完成。」(註八)

伴隨開發區熱而來的，是許多地區宣稱：「可以給與比經濟特區更優惠的政策」、或「可以比任何地方更多的優惠」，上述優惠實已超過中國政府規定開發區擁有「三減兩免」(三年減稅、兩年免稅)的稅收政策。

由於有不少地區妄顧客觀條件，為吸引外資而不設實際的作出過多承諾，故令國家利益受到很大的衝擊。而超越本身能力籌建的開發區，亦難以產生預期之經濟效益。

(3) 股票熱

中國經濟學者如蔣一葦及童大林等早在改革開放初期便力倡推行企業股份化改革。從世界各國的經驗來看，先有股份企業，然後才有股票市場進行股票買賣。在股份制改革呼聲越來越高時，中國的股票和股票市場於八六及八七年在上海及深圳誕生。

股票市場是企業籌集資金的重要途徑，有助市場經濟之建立，而通過投資者的監督與市場壓力，更會促使企業改善經營，為股票投資者提供良好的投資機會與回報。

鄧小平九二南巡後，中國隨即出現股票熱，這年中國投資買股市的人數難以估計，僅上海之股民就從年初的三萬多人猛增至一百二十多萬人，有關股票投資等書藉更成為最暢銷的熱門書。

九二年八月九日，深圳市在發售新股認購抽籤表時，來自全國各地超過六十萬人湧入深圳三百多個發售點，由於股民認為每張表格的中籤率極高，而只要中籤則有權購買股票，獲取豐厚利潤，然而，由於抽籤表供不應求，並傳出政府舞弊案件，遂引發大規模示威，示威群眾打出反貪污之口號，更有公安車輛被焚燒，事件並造成三百多人受傷，數人死亡。

一九九二年對中國在八十年代中期開始便參與股票買賣的首批股民來說是一個豐收年。舉例來說，八七年在深圳發行的發展銀行股票，在九二年它給八七年投資者每一萬元投資所帶來的利潤，早已超過一百萬元。八八年上海發行面值一百元的豫園商場股票，到九二年七月，其市

值已超過十萬元。

然而，九二年深圳、上海股票市場的發展，則可謂驚濤駭浪。大起大落，對政府的證券管理者及股民都是嚴峻的考驗，例如上海全面開放股價後，股票價格隨即暴升，隨後大量新股上市，市場缺乏相應的托盤資金而狂瀉，終於在九二年底前邁入冷靜期，股票市場得以較健康的發展。

中國政府管理股市部門當時認為市場情況仍存在很多缺陷，如股票供需嚴重失調、證券法規不健全、股民缺乏承擔投資風險心理、發行股票不公平及上市公司會計制度混亂等，故決定加緊管理股票市場的立法。在九二年十月，負責管理中國證券市場發展的國務院證券委員會正式成立。

三 中國全方位的對外開放

中國進一步擴大開放，主要包括加速各地區對外開放步伐；大力吸引外資；以及爭取加入國際貿易組織如「關貿總協定」等三個主要方面。

（1）加速各地區開放步伐

中國政府除呼籲繼續辦好特區、沿海開放城市及沿海經濟開發區外，更以上海浦東為龍頭，進一步開發長江沿岸城市，新開放地區東起浦東，西至四川重慶，橫貫大陸東、中、西三大經濟帶。

此外，中國更希望加快內陸的對外開放，開放沿邊（界）城市，形成周邊對外開放格局。其中較突出的例子，是西北的新疆、陝西等五省，提出了「聯合起來走西口」的構思，計劃擴大與中亞細亞的通商；而西南的雲南、廣西、貴州等省，則提出「走向東南亞，開發大西南」；東北三省更傾力拓展前蘇聯、南韓及日本等東北亞地區之經濟聯繫。此外，中央宣佈十一個內陸地區省會城市如蘭州、銀川、太原、南昌及西安等，一律推行沿海開放城市政策，給予外商各種投資優惠。九二年十月，據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國務院批准三百多個開放城市，大陸全方位開放格局初步形成。（註九）

(2) 吸引外資

1. 外商在大陸投資的新優惠

為加速引入外資，中國經貿部在九二年八月中旬，公佈外商在大陸投資的十項優惠政策，重點包括：實行低稅政策，稅率比國內的企業低；允許外商在境外聘用專業管理人才；不限制外商投資企業年限；對外資在合營企業所佔股份比例不加限制；允許興辦外商獨資企業；在合資企業中容許外方股東出任法人代表及可出任董事長等。(註十)

2. 逐步開放外商准許投資之領域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對外商投資在工業生產，基本上限制很少，而限制及禁止的，主要是第三產業，即廣泛意義上的服務業。鄧小平南巡講話後，為適應改革開放的深化、加速第三產業發展、符合關貿總協定開放第三產業的要求及吸引更多外資等原因，中國逐步開放第三產業予外商投資。僅於九二年，中國就批准了外商投資金融機構二十五家、保險公司一家、會計事務所三家、房地產項目四百多個以及五個商業零售項目等，擴闊外商投資的領域。

3. 批許外商在國有經濟作更深入的參與

九二年八月十八日，海南省洋浦三十平方公里土地使用權出讓予香港熊谷組有限公司，成為中國當時批出最大的一塊外商開發經營土地，從而結束了在八九年初就有關國土出租而開展爭論的「洋浦風波」。此外，成都首次將國營大型企業四川省客車廠租賃給外商投資經營十五年，以引進資金、技術與管理。武漢市政府則宣佈批准四千多個大中小市屬企業予外商投資，使舊企業得到迅速改造。

4. 成立保稅區

保稅區是指在國境內一個設有特定隔離設施的小區域，國家賦予它許多特殊的優惠政策。在保稅區內，國外貨品進入該區免交關稅，在保

稅區的貨品出口往其他國家，亦不用繳納出口稅，但如國外貨品從保稅區輸入國內銷售則必須繳納進口稅。在保稅區內，外商可從事倉儲、加工、中轉、貿易、房地產及金融等在其他地方不能隨便進行的投資。從理論上分析，保稅區的概念在某程度上類似香港般的自由港，國家准許保稅區用極靈活及特別優惠的政策吸引外資，並可以重點拓展轉口、過境貿易和加工工業。到九二年底，中國在沿海地區如大連、天津、上海外高橋、深圳沙頭角及海口等十二個地方設有保稅區。

(3) 重返「關稅及貿易總協定」

自九二年下半年以來，中國政府即為重返「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作準備，舉辦各類會議與培訓班，提醒各企業中國入關對其帶來的衝擊，各報章雜誌亦連篇累牘地進行有關中國入關的各方面影響的討論，形成中國的「關貿總協定」熱潮。

「關貿總協定」是一項各國通過談判而簽定的有關規範關稅與貿易規則的多邊國際協定，亦是一個正式的國際貿易組織。「關貿總協定」的宗旨是通過談判促使各國削減關稅與逐步取消各種非關稅壁壘，促進世界貿易自由化。

重返關貿，將為中國帶來機遇與嚴厲的挑戰：

1. 改善貿易外部環境。中國復關後，即可享受四十年來各締約國為開放貿易進行談判而取得的各種成果，如享受多邊、無條件的最優惠國待遇，可謂「坐享其成」，對擴大出口、消除部分國家對中國出口商品採取的歧視性行為與壁壘等有正面幫助。換言之，中國重返關貿後，即可解除由爭取最惠國待遇、每年需受美國國會審查責難的困難。
2. 根據關貿總協定無歧視待遇原則，中國在引進先進技術時再不受西方技術出口管制的限制。而且，各締約國須互相公開其貿易制度、法規及政策，這將有利中國及時掌握國際經濟貿易動態和發展趨勢。
3. 重返關貿需要中國的外貿體制作出改革，重點為減少非關稅壁

壘，減讓關稅並使關稅發揮調節貿易的中心作用。這樣，將促使中國的進口管理體制大幅簡化，原來的計劃限制、外匯限制、許可證限制及進口審查等都要作出改變，再者，「關貿」要求各成員國，建立與「關貿」各締約國所採用的經濟運行機制，縮小國家計劃管轄範圍，減少及取消對企業的補助以杜絕出口之不公平競爭，建立以市場為資源配置，由供求定價格的經濟體制。這些要求，皆有利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

在挑戰方面，隨著關稅大幅減讓及非關稅壁壘的逐步徹除，進口將會大幅增加，並對部分僵化的國有企業、高度保護下的加工工業，以及組織尚欠嚴謹的商品市場帶來難以想像的競爭壓力，造成大規模企業破產，引發失業狂潮以及貿易逆差增加，外匯收支嚴重惡化等情況。

首當其衝的是一些長期依賴高關稅保護的國內價格大大高於國際市場價格的產品，包括電子、家用電器、轎車和醫藥等。此外，資本密集而採用高新技術的行業，如重型機器、大型成套設備以及冶金方面的特殊鋼和高純度合金材料業，入關後由於進口障礙減小，也令此類產品面對較大之影響。

面對上述挑戰，中國在復關談判中堅持要享受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優惠待遇，保護特定的重要產業和「新興幼稚工業」。另一方面，中國現時正進行企業轉換機制之改革、組織企業集團及行業協會、協調對外貿易、提高產品質量及策劃開拓國際市場戰略、培養外向型管理人才及進口高新技術等措施，以應付未來之挑戰。

可以說，在九二年下旬產生之「關貿總協定熱」，可促使中國各界及早知悉入關後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未雨綢繆，作出準備。

四 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1) 「砸三鐵」的轟動效應與結束

在九一年下旬到鄧小平南巡後的半年多時間裡，打破企業的「鐵交椅、鐵工資、鐵飯碗」的「砸三鐵」行動，被不少國營企業及地方視為促進

企業轉換內部經營機制和推動扭虧轉盈的突破點。各大報刊在這一段期間，幾乎每天都登載各地「砸三鐵」的消息。

「砸三鐵」無疑是直接針對中國過往僵化經濟體制中的幹部終身制及鐵飯碗的一個相應行動。然而，在九一年秋此行動被鼓吹時，主張朝市場發展的眾多經濟學家「多持保留態度」(註十一)，這些改革派經濟學家認為三鐵是計劃經濟下的產物，在經改後期，它一定會被取消。但中國假若仍未進行失業、保險、醫療、住房及建立人才可自由流動之勞動力市場等一列改革行動之前便推行「砸三鐵」，那麼被解僱的工人便會無法重新就業，其個人及家庭之生活便頓入困境，他們對整個改革必然反對，社會並會發生混亂，實際上對改革毫無好處。

基於上述原因，中國著名改革派經濟學家吳敬璉指出：「一定要致力於基本制度改革再動三鐵，不要倒果為因。」而中央及國務院各領導亦於九二年中旬相繼指出「砸三鐵，不能一窩蜂，不能亂砸，不能傷了大多數工人的感情。」(註十二) 在這情況下，「砸三鐵」的轟動效應便沉寂下來了。

(2) 開放價格、建立市場

為深化改革，建立市場，中國政府決定縮減計劃管理範圍，並全面開放價格。繼九二初提高糧食訂購價格後，九二年四月，再度提高糧食的統銷價格，實行購銷同價，使糧食朝全面放開之目標邁進。

九月，國務院宣佈開放生產資料價格，取消原油、鋼材等計劃外生產資料全國統一價格，國家控制的生產資料價格品種，由一九九一年底的七百三十七種，減為八十九種，國家訂價的農產品只剩下計劃購銷的糧食、棉花、煙葉、桑蠶繭及統配木材等。在廣泛及全面開放價格的政策下，九二年底由市場調節的商品比重已達百分之八十，而在一些沿海及經濟特區，其比例則高達百分之九十五或以上。

在價格邁向全面開放的步伐配合下，國家級的生產資料市場及農村的專業市場亦相繼成立。中國過往的主要生產資料，全由中央直接調撥，不通過市場流通。為配合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央決定在天津、上

海、瀋陽、鄭州及武漢等地建立國家級汽車、機電產品、鋼材、建材及煤炭等交易市場，使生產資料流通邁向商品化。（註十三）

此外，中國廣大農村和城鎮，亦出現了很多經營銷售農副產品及各類工業品的農村專業市場，其中較為突出的例子包括廣東普寧縣流沙日用工業品市場，經營的商品包括傢具、五金、電器、香煙、服裝、鞋帽等，全國差不多所有省市均有客戶前來交易，成為廣東省東部日用工業品的重要集散地。（註十四）專業市場亦有專注一種產品，例如離北京數十公里的白溝鎮，建立了中國最大的箱包批發市場，擁有攤位多達一萬多個，吸引著全國各地的訂貨商。

（3）國營企業的改革

九二年六月，國家體改委公佈了一系列股份制試點企業的實行辦法，為國營企業推行股份制鳴鑼開道。七月，又公佈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共五十四條，賦予企業更充份的經營權，如投資決策、產品定價、產品銷售、進出口及僱用工人等，務求使企業能適應市場需求，作出經營之決定，同時亦要求政府轉變政企不分的狀況，將政府管理經濟的方式從行政管理型轉向機構經濟實體型。

（4）發展第三產業

鄧小平南巡後，中國決定大力發展一向不受重視的第三產業。長期以來，中國政府由於受到傳統馬列主義經濟思想的影響，「重生產、輕流通、輕服務」，忽視價值規律、商品生產和市場作用，輕視第三產業，使其在「三多」（即限制多，抑制多及管、卡、壓、清、整多）的抑制下，得不到應有的發展。在九二年中國決定進一步改革開放後，各方面開始再重新重視第三產業的重要性，使其得到飛躍的發展。

根據中國經濟學界的定義，第一產業為廣義的農業，第二產業為廣義的工業，第三產業為廣義的服務業。第三產業可分為兩大部門：一為流通部門，二是服務部門，具體又可分為四個層次：第一、流通部門，包括交通運輸、郵電通訊、商業、飲食、物資供銷和倉儲業；第二、為

生產和生活服務的部門，包括金融、保險、房地產、旅遊、諮詢訊息；第三、為提高科學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質服務的部門，包括教育、文化、電視廣播、科研、衛生、體育和社會福利；第四、為社會公共服務的部門，包括國家機關、社會團體、軍人和警察等。

中國政府認為加快發展第三產業，既可以滿足人民生活提高後的現實需要，亦是緩解中國就業壓力的重要出路。由於第三產業內行業多，門類廣，勞動密集和技術、資金密集行業可以並存，可以吸收各種不同層次之人員就業，成為中國解決就業壓力及企業改革的重要措施。此外，通過發展交通運輸、基礎建設、商業、諮詢及倉儲業等，將有利改善中國過往流通渠道不通暢狀況，協助第一、第二產業貨暢其流。市場資訊的迅速回饋有助企業能根據市場需要而調整生產，從而達致優化產業結構、提高效率和效益的有效途徑。

為發展第三產業，中國政府訂出下列策略：

1. 中共中央及國務院於九二年六月十六日作出〈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決定〉，提出第三產業發展速度要高於第一、第二產業，並爭取在本世紀末，第三產業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達至發展中國家水平；
2. 十月，國家工商局公佈新政策，容許企業進行跨行業及綜合性經營，以鼓勵第三產業；
3. 十一月，在北京舉行「全國加快第三產業發展會議」，提出放手興辦第三產業、支持工業企業發展第三產業及積極利用外資發展第三產業等一系列政策。

五 經商「下海」大潮

(1) 文人「下海」及從事「第二職業」

鄧小平南巡效應轟動社會每個角落，前所未有的發財慾望籠罩著整個社會，中國隨即出現經商熱潮，不少在政府、文化或科研學術機構工作的人員為把握千載難逢的機會紛紛「下海」到私人機構工作，甚至自己

創業，回應社會大潮。

對於習慣受國營企業保護的人來說，辭職「下海」經商是一項挑戰性甚高的抉擇，但基於商場「大海」的誘惑，就算是面對驚濤駭浪，他們也希望能把握機會，決心去闖。而較為謹慎的人，也在正職之外尋找第二職業，例如有些從事科研的人員，除在原單位工作，又到一些鄉鎮企業任技術顧問，賺取更多金錢，並建立商界網絡，一待時機成熟便正式「下海」。

從九二年中開始，無論在沿海或內陸，或是在黨政機關、大專院校和科研院所，均出現蠢蠢欲試、雄心勃勃的「下海者」，在各傳媒中亦經常可聽到「下海者」的心聲和傳奇故事。人們追求高收入的觀念加強，紛紛湧向可以增加個人財富的各個角落，加上企業破產的壓力加重，已往被視為「鐵飯碗」的國營企業，其優越性已被大大削弱了，這情況亦導致職工流動速度大大加速。

(2) 「下海」或從事第二職業的原因 (註十五)

1. 致富觀念的湧現。在國營機構雖可受國家的保護照顧，但卻不能以個人知識賺取大量財富。
2. 轉換環境，在自由市場經濟下，施展自己所長，肯定自我價值。
3. 社會分配不公，收入分配體制「腦體倒掛」。直至九十年代初期，部分從事腦力勞動的工作者收入往往低於體力勞動者或個體戶，出現了「操手術刀不如拿剃刀」、「搞原子彈不如賣茶葉蛋」的中國特有的畸形現象。在高通脹持續下，腦力勞動者微薄的工資往往入不敷支，為解決生活困境，他們只好「下海」或從事第二職業。
4. 精簡機構之形勢所迫。一些精明的幹部意識到政府體制改革勢在必行，與其將來被精簡，不如抓緊機會、迅速下海，乘競爭者仍未大批湧現時在市場中霸佔最有利位置，開創一翻事業。
5. 勞動市場發展的結果。從宏觀經濟體制分析，「下海」或從事第二職業的現象乃由於勞動市場漸趨成熟、以及非國營企業加速發展的客觀經濟結果。在過往計劃體制下，個人受聘於國家，工作受

國家分配，人才不能自由流動。中國為確立市場經濟，除發展商品市場外，亦需建立起勞動力市場，以保證各企業能在市場上尋找到其所需的人才，以拓展業務，加強競爭力。故此，「下海」等現象乃是勞動力市場初步發展的一個客觀反映。

中國經濟在九二、九三年出現高增長，主要是由集體所有制、私營經濟及外資企業經濟的高增長促成的，在經濟增量中，非國有經濟約佔百分之六十（註十六）。非國營企業之加速發展，為國營企業以外的就業機會提供更多選擇，也為人才流動市場、勞動市場的湧現，提供了客觀基礎。

第二節 一九九二年經濟高速增長及所引起的問題

一 九二年經濟高速增長

自九二年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要求經濟上新台阶，中國經濟遂進入高速增長階段：

- (1) 工業生產及整體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全年工業總產值比上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一點七，而國內生產總值則增加百分之十三點二，增長迅速。
- (2) 固定資產投資高速增長，投資需求拉動乃是帶動工業、特別是重工業持續高速增長的主因。
- (3) 貸款投放增幅由高趨低。

九二年，隨生產、投資的高速增長，以及內外銷市場的拓展，各方面對資金的需求旺盛，銀行貸款一度呈較高的增幅，但隨著國家適度控制銀根政策的出台，貸款高增長的趨勢在九二年八月後便開始減弱。

- (4) 市場物價水平基本穩定，但大、中城市的物價和生產資料價格漲幅則較大。
- (5) 進出口快速增長，利用外資明顯增加。

二 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 (1) 在總量平衡方面，固定資產投資過大，貨幣投放過多，社會總供求關係開始緊張，令潛在通脹壓力繼續加大。
- (2) 經濟結構出現矛盾。農業基礎不穩、經濟基礎設施和工業發展的瓶頸日益擴大，港口擁塞和鐵路運輸能力不足等情況日益嚴重，而消費品與市場需求不適應，不少工廠邊生產邊積壓，產銷不銜接情況嚴重。
- (3) 面對經濟新形勢，政府未能及時加以管理控制，市場秩序出現混亂。(註十七)

上述經濟過熱及市場混亂情況在九三年前後繼續加劇，促使政府採取宏觀調控措施，這點將在下兩章中詳細討論。

第三節 總結——對鄧小平南巡的歷史評價

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後，中國隨著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很多危機亦開始呈現。以支持改革見稱的學者吳敬璣在擁護九二年經改高潮的同時，亦對可能導致革新潮流失敗的三個變數作出警惕，這分別是經濟過熱、政治過激(如部分人攻擊鄧小平在政治改革方面不徹底，提出給六四平反和要求讓趙紫陽復出等)、以及改革失誤(如炒股票一哄而起，部分人藉權操縱股市發財，破壞市場秩序，令群眾不滿，影響改革信譽，並最終釀成動亂，使改革失敗)。(註十八)

王山在《第三隻眼睛看中國》中則指出，「經濟高速增長也會刺激社會固有矛盾的激化」，在政府新體制尚未建立時，「社會將會發現自己突然陷入了一個空白期……空白期將是更大的社會危機」。(註十九)

九三年經混亂及過熱等危機，促使政府推行宏觀調控，以維持市場秩序。部分人質疑在新調控體制尚未健全建立前，鄧小平應否發表南巡講話，引起全國躁動，並導致後來的經濟危機。

正如很多重大歷史事件一樣，出現突變的一刻無可避免會為社會帶

來震盪，但假若這變化能順應歷史潮流，民心所向，對經濟民生有利，則過渡期的混亂狀態會很快過去，並能締造一良機予政府建立更健全的新體制。北京不少政界人士更認為，如果沒有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中國大陸今天可能還沒有走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軌道。鄧小平對此也十分瞭解，故在南巡時，他精闢地指出，「……在某一階段，抓住時機，加速搞幾年，發現問題及時加以治理，彌後繼續前進，從根本上說，手頭東西多了，我們在處理各種矛盾和問題時就立於主動地位。」

總結而言，鄧小平南巡講話雖然是促使經濟局部過熱及混亂的一個因素，然而，鄧小平南巡帶來社會翻天覆地的變化，改革開放潮流不被逆轉。中國正式走上市場經濟的軌道，人民生活水平進一步提高，以及新領導層又能即時以改革為基調，加速建立調控經濟的新體制等，鄧小平南巡的行動應被歷史充份肯定。

註 釋

- 註 一 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談話要點〉《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377頁
- 註 二 元上、漢竹著《鄧小平南巡後的中國》，改革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72-73頁
- 註 三 同上註，第115頁
- 註 四 同上註，第108頁
- 註 五 同上註，第118頁
- 註 六 姚松〈金融秩序混亂極待解決〉，內參選編(北京)一九九三年，第十九期，第16頁，引自《中國大陸研究》第三十六卷，第十期
- 註 七 叢亞平〈過猶不及，適度為佳——基建投資面面觀〉，內參選編，一九九三年第二十三期，第6頁，引自《中國大陸研究》第三十六卷，第十期
- 註 八 同上註
- 註 九 《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九二年十月七日
- 註 十 《紐約世界日報》一九九二年八月七日

- 註十一 吳敬漣〈中國此次經改高潮有深厚基礎〉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於美國德州大學奧斯丁校區的講話
- 註十二 同註二，第226頁
- 註十三 洛杉磯《國際日報》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廿日，第22版
- 註十四 林炳熙、莊容開《改革先行的廣東》，廣州文化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 註十五 可參閱王凱、許光建主編《93中國經濟熱點透視》，電子工業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98-106頁
- 註十六 國家統計局編《93中國發展報告》，中國統計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8頁
- 註十七 引自中國「國家統計局」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三十日發表的報告，及同註十六，第3-16頁
- 註十八 千家駒〈論可能使改革逆流的三個變數〉，引自一九九二年七月廿四—廿八日《信報》
- 註十九 王山《第三隻眼睛看中國》，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228-229頁
- 註二十 任慧文〈鄧小平從『南巡』到『南移』〉《信報》，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二日
- 註二十一 同註--

第五十五章 宏觀調控(九三—九五)(上) 兩大經濟困擾——局部過熱 與混亂及其深層原因

導 言

九二及九三年，在鄧小平南巡講話及中共十四大改革開放精神鼓舞下，中國經濟進入了飛躍時期。然而由於過高的發展速度，經濟體制從計劃迅速轉往市場過程中出現種種問題，如市場法規及秩序未能及時建立，以及政府未能採取適應新時期的調控經濟措施等，導致在九二年下旬開始中國經濟出現了局部過熱及混亂之失衡現象。

對此，中央領導人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在九二年底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上，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提出要防止經濟過熱問題。九三年四月，面對經濟形勢進一步緊張，黨中央專門召開經濟情況通報會議，強調各地方首腦要全面領會鄧小平九二談話及中共十四大精神，既要抓住機遇，加速發展，又要注意穩妥，避免損失。接著，總理辦公會決定派出七位由現任部長帶領的檢查組，前後兩次赴十四個省考察，實地研究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房地產和開發區過熱、銀行間違章拆借、社會大規模的非法集資，以及農村出現白條子等混亂情況，為後來中央提出加強宏觀調控措施準備了意見。五月十一日及六月十四日，江澤民又在華東和西北地區召開經濟工作座談會，指出經濟已明顯出現過熱苗頭，要十分重視加強和完善中央宏觀調控經濟的能力。

可以說，中央自從九二年末便開始正視經濟發展過程中種種局部過熱及混亂的因素，並在加強開發區和房地產管理、制止社會非法集資和銀行違章拆借，以及調整銀行利率等各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措施。然而，由於在新舊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新經濟現象不停湧現，各種經濟活動往往在開始時不太規範，而新經濟法規及市場秩序又未能及時建立，以致一些握有權力者有機可乘，通過權錢交易獲取暴利，並擾亂了正常經

濟秩序。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利益多元化，中央與地方對經濟形勢的分析往往不一致，各地區皆希望抓住機遇加速發展，迅速改善當地人民生活水平，並提高政績。一些沿海及經濟基礎較好地方，認為當地的經濟基礎好，有條件再搞快一點，根本不存在過熱的問題。經濟落後的地區則認為它們剛起步，還沒有「升溫」，根本沒有過熱問題。這些思想也影響了中央調控經濟措施的貫徹，使經濟生活中之矛盾日益加劇。

為解決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問題，中央以改革和反腐敗為重心，在九三年六月開始提出並執行三大互相緊密聯繫的重大措施，分別是一、頒佈宏觀調控十六條措施（以中央六號文件下達）；二、在九三年十一月召開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該決定以深層的改革措施來根治中國經濟過熱及混亂問題）；以及三、開展反腐敗鬥爭等。

踏進九四年，中央繼續推行宏觀調控措施，有效地抑制經濟過熱及混亂情況，並重點落實各項經濟改革方案，如匯率併軌、推行財稅改革及組建政策性銀行等，務求市場經濟能迅速有效地運轉。然而，由於農產品價格改革幅度過大，中國於九四年出現了百分之二十一的嚴重通貨膨脹，同時面對國營企業效益低下、農業發展後勁不足等問題，中央遂決定要集中力量去解決。為此，總理李鵬在九四年九月提出抑制通脹的十項措施，中共中央在十二月更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七條措施，以一線兩點，即「平抑市場物價，控制通貨膨脹」為主線，同時抓住企業和農業這兩個重點，以回應中國經濟的深層問題。該十項措施亦在九五年三月李鵬總理呈交人大的工作報告中落實。

研究九三至九五年中國經濟發展對深入理解中國最新的情況及發展前瞻十分重要。這一章（上）主要討論中國經濟在九三年面對的問題，以及深入分析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第五十六章（中）主要討論中央為解決經濟難題的三大政策措施，分別是宏觀調控十六條、改革綱領五十條、以及反腐敗等。第五十七章（下）主要探討九四年宏觀調控成果、落實經

濟新改革階段之措施，以及中央各項重點部署等。

第一節 過熱與混亂及並隨出現之經濟危機

九三年上半年，隨著經濟高速運轉，經濟運行出現了局部過熱及金融秩序混亂兩個現象：

一 經濟局部過熱

九三上半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3,542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百分之七十點七(註一)，而新工程項目、在建工程投資總規模，均超過上年同期一倍多，其增幅之大是歷史罕見的。投資過大導致社會需求總量超過社會供給總量，上半年的供求差率達到百分之十，超過正常水平四個百分點。(註二)

中國經濟發展主要倚靠一種「粗放型」的增長方式。其特點是依靠大量投入生產要素、上新項目，而並非通過提高技術水平、增加效率以實現經濟的增長。

中國原來的經濟結構已嚴重失衡：農業與工業的發展脫節、工業內部加工工業與基礎工業脫節、加工工業重複建設、生產力過剩及產品不適應市場需要。

九二、九三年的工業生產高速增長，投資膨脹，使經濟失衡狀態進一步惡化，突出的例子是一些瓶頸產業如能源、原材料、交通及通訊等遠遠追不上工業發展的需要，形成對經濟整體發展的制約。在供不應求的環境下，原材料價格大幅上升，鐵路運輸頻頻告急，港口、車站壓船壓貨嚴重，產品無法運送，釀成重大浪費。

伴隨著投資高速增長，大量資金流向沿海的開放區，用於炒股票、炒地皮和炒房地產，過量的投機活動把股票及地產的價格推至不合理的水平，形成「泡沫經濟」。房地產及股票市場由於投機者互相轉手追捧而形成的虛假高利，必會繼續吸引大量投機資金，一旦這些投機產品無人承接，其市場價格必會隨著恐慌性拋售而暴跌，不及將商品脫手的投機

者便陷入債務危機，並牽連向其企業融資的銀行。

作為「泡沫經濟」風眼的房地產業，由於缺乏法規規限，導致批地過多、房地產項目建設規模過大，加上部分政府官員貪污受賄，廉價批地，令國有土地資產流失。此外，房地產業亦出現了高檔房和普通房的投資結構不合理現象。

中國房地產市場的需求十分大，而供應最短缺的是一般城市居民的住宅。九二、九三年，在高回報率的驅動下，一般房地產發展商皆傾向興建可供外銷的高級賓館及別墅，而對建造普通居民住宅缺乏興趣，從而造成了商品結構及市場供求皆失衡的現象。例如九二年大陸向香港推出九萬套別墅，由於供應量過大，香港市場只能承受三分之一，大量高級商品房滯銷。

另一方面，全國城市中仍有四百四十萬住房困難戶，這種情況明顯表示房地產熱的基調是投機，而並非立足於市場的真正需要。（註三）

二 金融秩序混亂

隨著投機性的泡沫經濟不斷膨脹，不少金融機構人員及企業領導人，利用不健全的法規與漏洞，運用本身職權，從各個渠道調動銀行及社會上的閑散資金，往沿海各地參與投機、炒賣股票及房地產，使九三年上半年中國的金融形勢日趨嚴峻：

（1）銀行間違章拆借失控

銀行同業拆借原屬金融機構間的短期借貸，拆借的資金基本上仍留在金融體系內，不會流向社會而造成有效的購買力。然而，在九二及九三年，不少銀行利用同業拆借方式繞開既定的貸款規模限制而向社會放款，這些「繞規模」發放的貸款，除了用作企業的資金外，主要還有兩種用途：一是貸給企業用於擴大投資規模，彌補建設資金缺口；二是貸給房地產公司、證券公司，用於炒賣房地產、股票，有的銀行甚至直接參與炒賣股票及房地產，助長了中國的泡沫經濟。

(2) 部分地區的銀行與辦經營性公司

證券公司、股票公司及房地產公司紛紛向銀行拆借資金，利用國家及人民的儲蓄去參與投機。此外，有些地區的政府及銀行亦越權成立金融機構，並以高利率吸收存款以用作貸款業務之用。

以上違章拆借及辦經營性金融公司的目的，在於把銀行或金融機構的存款大量轉入一些與領導者個人有密切關係的銀行或金融公司裡，實行存款搬家，並把這些資金作高息貸予固定資產投資或調往沿海參與炒賣，而有權調動款項者亦從中收到大量好處。在這些違法亂紀的情況下，貪污受賄之事層出不窮，不少銀行在貸款時並不管借款的企業是否有抵押或還款能力，而只管是否能收到紅包或回扣。在市場提供高利率的情況下，銀行一般皆不願依循政府指示，以官價低息貸予政府規定支持之項目，基於此，有些以大局為重的人士沉痛地指出：

「現在凡低利率的都是奉命貸款，都不準備收回的，反正風險都在國家，貸掉幾千億也沒人管，而自己搞的都是高利率，收了錢就用來發獎金，蓋大樓。」(註四)

(3) 市場利率紊亂及社會非法集資情況嚴重

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各地區政府皆希望加速經濟發展，紛紛成立開發區，再加上房地產及股票的熱潮，企業及個人都對資金有強烈的需求。由於銀行無法滿足這些需求，因此中國出現種種由政府機構和企業進行的大規模集資。由於資金的短缺及房地產與股票等預期超常利潤，市場上一般集資年利率在百分之十五至三十左右，個別更高達百分之四十以上，以致大量資金在銀行系統外「體外循環」。據調查資料顯示，九三年一至四月政府計劃外集資在五百億元以上，這些資金主要用於固定資產投資，或在沿海炒股票及房地產，以及興辦企業等。(註五)

在社會集資的狂風中，九二年北京長城機電科技產業公司負責人沈太福在幾個月內以年息百分之二十四的利率集資十億元，就是這股社會集資的典型。然而，人民銀行後來查核發現長城集資並未經其批准，而集資所得的巨款，並沒有用於開發高技術的新產品，而用於房地產開發

的資金也有限，大部分資金被用作發付長城公司在各地的分支機構的開辦費、償還貸款、支付利息、或被個人挪作他用、甚至交納不存在的盈利稅以及賄賂等，這事遂成為中共建國以來最大政經醜聞。沈太福後來被判死刑，而牽涉入此事件內的政府官員亦遭查處。

(4) 資金的地域及存貸失衡，銀行資金短缺，難以應付提款等危機

中國自從在八八、八九年推行治理整頓，儲蓄存款出現較大的增幅，當時部分經濟學家憂心儲蓄存款變為「籠中之虎」，假若居民大量提取存款購物，將對市場造成難以抵受的衝擊，引致嚴重的通脹。九二年開始，隨著股票、債券等投資工具湧現，資金出現分流，儲蓄增長受到抑制。然而，經濟過熱及泡沫經濟的出現，資金分流亦出現了幾個嚴重後果：

1. 資金地域失衡

沿海地區房地產及股票之超常收益吸引了各地區的資金，即使一些經濟落後、生產資金十分短缺的邊遠貧困地區，也把資金投向東南沿海地區炒房地產及股票。

2. 銀行存貸失衡

由於社會上出現不少投資渠道，再加上大規模高利率之社會集資，在銀行存款利率仍處低水平的情況下，居民皆不願意在銀行存款，導致銀行資金來源減少，中國不少地區儲蓄存款更呈負增長。然而，在另一方面，由於銀行普遍借貸過多，而地方經濟建設及企業所需的資金卻並無減少，銀行遂出現存貸失衡的情況。

3. 「白條子」、「黃條子」及「綠條子」的出現

在銀行存款減少、借貸增加及壞帳不斷上升的情況下，銀行資金愈來愈短缺。為應付資金不足，不少銀行擅自挪用中央政府預留給重點建設及收購農產品的貸款「專款」，造成重點建設資金到位率低，助長企業間出現三角債。在農村，出現了利用「白條子」收購農產品的現象，「白條

子」是指政府收購農副產品的部門在購了農民的農副產品後，由於沒有現金支付予農民而開出的收購單據(實際是商業欠條)，日後農民可憑這些單據領取現金。由於農民不能即時收取現金購買再生產用的原材料及生活必需品，導致農村極大的不滿。

中國除了出現白條子外，在九三年更一度出現「黃條子」及「綠條子」，「黃條子」是指中國的銀行因不能按付款者的要求付款，而給收款人開出的延期付款的條子。有一些城市，相距僅一公里多的兩家銀行的匯款竟需時二十多天。曾經有位承包商從一家銀行將一筆工程用款轉往當地另一家銀行帳戶，可是十五天過去了，音訊全無，為免工程誤期，這商人只得請當地官員出面解決。(註六)

「綠條子」的情況與「黃條子」差不多，意謂一些郵局缺乏現金，無法按匯款人的指示付款，只好給予受款人綠條子，請其延期領取匯款。由於大量的農民離鄉到外地工作，每逢節日總會將賺到的錢寄回家去，令出現「綠條子」的情況日益嚴重。在中國，匯款收款一般由郵局辦理，城市的郵局多在中國工商銀行開戶，農村的郵局則多在農業銀行開戶，在城市工作的農民將現金通過城市的郵局匯進工商銀行的帳上，工商銀行遂將款項匯往農業銀行，再由農業銀行轉往收款人所指定的郵局，由收款人往該郵局領取現金。

綠條子的出現反映了銀行內部清算系統的不健全。從九二年開始，各地經濟飛躍，資金缺口日大，為先滿足本地區對資金的需要，資金匯出銀行往往不向資金匯入銀行劃撥資金，當匯入銀行無能力支付匯款時就只得開出「綠條子」。

由於銀行資金嚴重短缺，對存戶及提款者的支付能力下降，造成民間怨氣沖天，銀行聲譽掃地。主管中國經濟事務的朱鎔基副總理曾嚴肅的指出：

「這次過熱失控的衝擊與八八年不同，八八年是群眾衝進商店，今年如果控制不住，群眾衝的是銀行，如果銀行垮下來，這種衝擊就大了，我們就要垮台。」(註七)

在金融秩序出現混亂的同時，各地區為大幅吸引外資，各種不合理的稅項減免和逃稅、漏稅使國家財政收入大幅流失，中央的財政赤字進一步惡化。

三 經濟局部過熱及金融秩序混亂帶來的經濟危機

上述經濟局部過熱及金融秩序混亂直接造成的後果是信用、財政、外匯、物資等領域全面出現危機，這分別包括：

(1) 儲蓄下降、資金緊張

城鄉銀行出現了（自改革以來僅於一九八八年由於居民搶購商品而出現過）儲蓄存款下降現象，導致專業銀行資金極為緊張。早於九三年二月，中國各銀行基本上已把全年的信貸指標全部用完，為避免由於儲蓄戶不能提取存款、銀行未能即時清算匯差，以及收購農產品時發出的白條子等影響市民對銀行的信心，中國「信貸基本上要靠加印鈔票支撐」，導致貨幣投放量較以往歷年大增。（註八）

在七九至九二年十四年間，除八八年上半年出現淨現金投放十二億外，其餘各年上半年都是現金回籠的。（一般來說，現金投放規律是上半年淨回籠，下半年淨投放），但在九三年由於強大的資金需求，上半年淨投放現金已高達五百二十八億元，形成過量的貨幣供應，帶來通脹壓力。（註九）

此外，很多企業不理會市場實際需要，生產無法賣出的產品，這麼一來，銀行借給企業的貸款就無法收回，這些貸款實際上變為企業的成品資金，積壓在倉庫裡，造成資金沉澱。再者，中國在九二、九三年基建規模過大，重複建設嚴重，建築材料供不應求，再加上資金到位情況不足，大量工程陷於停頓，資金無法回籠，銀行的呆帳、壞帳急劇上升。

(2) 通貨膨脹嚴重，生產資料市場混亂。

九三年初以來，中國物價快速上漲，全國零售物價漲幅在三月開始

已超過百分之十的安全界線。尤其是生產資料在強大投資需求帶動下猛漲，六月份七大類生產資料價格總水平與九二年六月相比，上漲了百分之五十二點九，其中水泥、鋼材及平板玻璃等建築材料漲幅均超過百分之七十。（註十）

由於生產資料價格暴升，不少投機者遂囤積居奇，炒買炒賣來賺取利潤，一些生產資料如鋼材等往往要轉賣數次，造成虛假需求，並進一步抬高物價，加劇通脹。

（3）進口大增及國家外匯儲備大幅下降

由於供求失衡，為彌補國內資源不足，國家被迫擴大進口和壓縮國內緊缺的能源及原材料出口，從而對中國的國際收支平衡帶來沉重壓力。

從九三年開始，國家的外匯儲備下降，現匯結存比上年減少百分之二十五，人民幣迅速貶值，調劑市場上美元兌人民幣匯價從年初的一兌七滑落至六月的一兌十，外匯市場上人心浮動，外商更基於外匯風險而減慢在中國投資的步伐。另一方面，人民幣貶值亦加重了國內企業償還外匯貸款之負擔，同時帶動物價的上升。

（4）國家財政困難加劇

國家在九三上半年的收入僅微增一點四個百分點，與經濟快速增長形成強烈對比，全年財政赤字突破預算，迫使政府向人民銀行借款補償，因而加重了中國貨幣發行的壓力，進一步推動通脹。

第二節 造成九三年經濟局部過熱及金融秩序混亂的主因

簡要來說，造成九三年上半年種種經濟危機之主因有三個：一是地方強烈期望加速經濟發展的衝動；二是中國經濟體制各主要環節如各要素市場、企業、地方財政及政府金融調控體制之改革不徹底（最根本及重要原因）；最後是貪污腐敗。

一 鄧小平南巡講話鼓吹，以及地方首腦期望加速經濟發展的強烈慾望

由於經過三年治理整頓，經濟發展緩慢，正如前章指出，鄧小平在九二年南巡講話中強調「抓住時機，加速搞幾年」，深深引起普遍群眾及各級政府官員的共鳴，他們皆期望能通過加速經濟發展來提高當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並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由於中國經濟發展主要依靠高投入，而非提高效率，以及改善技術來實現，故此，加速經濟發展便意味著各地皆大建新項目，形成投資狂潮，投資者一窩蜂的向銀行爭取貸款，迫使銀行增加貨幣供應，結果造成通脹加劇。過量投資也推動生產資料物價上漲，使進口猛增，因而減少外匯儲備。

除大量投資外，各地區為加速發展，均爭相興建對外經濟開發區，以減免稅收及各項優惠投資政策吸引外資。同時，各地也爭相發展一些短、平、快的工業加工及房地產項目，期望投資能較快收回。由於銀行不能滿足龐大資金需求，社會遂出現非法集資、資金由內陸區域轉移到沿海參與投機的情況，引致資金「地區不平衡」，銀行貸款擴張，「存貸失衡」。此外，過寬的對外優惠政策使國家財政收入大量流失，加上各地皆不願投資於基礎工業，而加工工業亦生產過剩，經濟結構進一步失調。

二 經濟體制改革不徹底，使經濟在高速發展中出現混亂

經濟體制各環節改革不徹底是造成經濟秩序出現混亂的主因，這涉及三個因素，分別是：房地產及資金等「要素市場」的初步發展；地方及企業之投資衝動；以及銀行體制內部制約寬鬆。

簡單來說，「要素市場」不規範的初步發展，為企業及地方政府提供賺取超高利潤的機會。在中國，企業只需負盈而不負虧，以及地方政府在財政包乾經濟體制下，皆產生強烈的「投資飢餓」衝動，再者，由於銀行體制內部管理不嚴，造成很多不理會經濟效益的貸款，貨幣供應過度膨脹，使「泡沫經濟」及經濟混亂現象更一發不可收拾。

(1) 股票、資金及房地產等「要素市場」的「初步」發展，是導致金融秩序出現混亂的誘因。

九二、九三年，全國性的「股票熱」、「房地產熱」及「集資熱」大幅升溫，房地產及股票為「集資熱」的源頭，吸引著大量資金流向。

十分值得留意的，是上述描繪的表面現象實際標誌著中國的市場改革已從發展「商品市場」深化到發展「要素市場」的重要階段，「生產要素」是指商品生產所需的土地、資金及勞動力三大要素。九二、九三年的房地產、開發區熱，反映著土地被政府容許作為商品進入市場，容許市民買賣。而「集資熱」及「炒股熱」等則反映資金作為商品正式進入市場。九二年前，即使在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熱潮下，「要素市場」基本仍不開放。土地、資金及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仍須由政府分配，故從更宏觀的歷史角度分析，股票、房地產市場及集資等情況出現，標誌著中國的市場改革已邁向更成熟的階段。

可惜的是九二年以來「要素市場」的發展乃屬自發性，並非由政府策劃帶動。因此，在缺乏必要的法律規範及有效管理之情況下，混亂、取巧、欺騙及貪污受賄之事必會層出不窮，並造就了一批暴發戶。

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原為解決居住問題，並協助推行企業改革（企業不用再提供職工住宿）的一條必然出路，正如在其他發達國家一樣，地產發展商為籌集資金而預售商品房，本是一種正常的經營模式，屬於期貨市場的一種，問題在於政府的法規及政策不完善，沒有對預售房子作出嚴格規定、對發展商亦無審慎的評估，因此經常出現買家到期收不到房子或貨不對辦的情況。

此外，不少發展商根本無意興建住房，他們只想藉著與地方政府的關係，以建房為名，申請取得土地再轉讓以獲取暴利，因此形成泡沫經濟。

資金市場亦出現同一問題。政府由於對資金市場的集資行為缺乏管理經驗，亦缺乏一套適當監管的政策法規，造成了放任自由的狀態，再加上一般群眾在參與集資時缺乏風險意識，誤認為社會集資既經國家批

准，風險便順理成章由政府或銀行承擔。在這情況下，一些根本效率欠佳或無發展潛力的虧損企業，也可通過不符現實的宣傳吸引市民投資，將企業虧損及風險轉嫁予投資者，長城公司集資時的欺詐行為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中國股票市場的發展也經歷了類似上述的情況。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後，股民以為投資股票必可獲利，故爭相瘋狂搶購數量不多的上市公司的股票，那時股民完全缺乏風險意識，更不懂分析上市公司的財務狀況及盈利潛力，而政府亦對企業缺乏足夠的監管，就企業上市的規模也缺乏通盤計劃。後來由於上市公司的數量和規模增多，投資者未能即時適應新增的股票供應量，股票市場由於缺乏足夠的投資而狂瀉，股市的大上大落打擊了投資者的信心，並對企業融資和資金市場的發展產生負面影響。

（2）地方政府及企業行為所引發的需求拉動

1. 地方財政包乾制引發地方投資衝動

自經濟改革以來，中國改變了過往地方政府財政的「收入向上交，花錢向上要」的「大鍋飯」財政體制，而實行「地方財政包乾制」，或俗稱「分灶吃飯」的財政制度。

「地方財政包乾制」指地方的年度預算收支指標經中央政府核定批准後，由地方包乾(或承包)負責完成。地方政府只要繳交與中央事先協定的上繳稅款後，多收部份歸地方分配。例如在河北及北京等九個省市，八八年開始推行的「收入遞增包乾制」，即以八七年的決算為基數，而確定一個地方財政收入遞增和留成、上繳比例，規定地方財政每年必須有一定的增長率，對中央上繳數額也必定要相應增加，而超過遞增率的部分，全部留給地方。在「分灶吃飯」的制度下，不論是定額上交(指較富裕)，還是定額補貼(較貧困)的地區，都在各自的財政收支範圍內，較主動的力求財政上的收支平衡。實行財政包乾制，既可保證中央財政有穩定的收入，又可增強地方政府增加財政收入的積極性。

然而，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也造成地方利益不斷膨脹，促成「諸侯經濟」。由於地方政府基本上不須對其投資決策承擔風險，為保護地方利益及擴大地方財源，不少地方千方百計發展生產，與辦企業，尤其是那些盈利高的加工工業，他們甚至在投資時不考慮全國市場的供求及需要狀況，重複和盲目建設，造成某些產品供過於求。例如全國彩電生產能力過剩一半，冰箱和洗衣機生產能力分別過剩三分之二。此外，由於各地財力有限，許多企業的規模都過小，沒有達致規模經濟。

在九二、九三年經濟過熱時，再一次暴露了財政包乾制的弊端。為了將地方的經濟發展推上另一台階，各地大興土木，並設立了數以千計的經濟開發區，全國變成一個大工地，導致投資膨脹，對資金的需求大增。

與此同時，財政包乾制還加劇了地方保護主義，不少地方政府為了維護本地區利益，尤其是本地政府的財政收入，皆採取不同的保護措施，如限制外省市商品進入本地市場以保護地方企業，限制本地的天然資源銷往外地，以確保這些礦產農務資源所帶來之增值利益不會流往外地。這些做法皆有礙一個全國統一、無分割的市場的形成。此外，在九二、九三年股票、房地產及各類社會集資出現狂潮時，有些內陸地區鼓勵調出資金往沿海地區參與炒賣，但亦有地區希望將資金挽留。要留住資金就必須給其出路，鼓勵其在本地區投資。為達此目的，有些地方政府甚至強令地方銀行對某些企業貸款。或批准當地企業向社會集資，以擴大生產規模，因此加劇了通脹壓力。

2. 國有企業由於產權虛置、缺乏約束機制而形成的投資擴張衝動

除了「分灶吃飯」財政體制加速地方投資慾望外，國有企業的產權虛置、缺乏約束機制亦是造成企業投資飢渴症的原因之一。

一般來說，作為市場經濟活動主體的企業，必須具備明確的產權關係，清楚界定企業財產歸誰所有，誰對企業財產享有權利並承擔責任。只有這樣，才可使企業由於利益驅動而產生激勵和約束機制，真正做到

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及自我約束。

然而，在中國的「國家所有制」國有企業制度下，究竟誰能真正行使「國家」這個所有者的權利，並對企業財產承擔責任，則是相當含糊。政府雖是國家的行政機關，但政府卻非經濟實體，並不對國企的經營及財產狀況承擔責任。

由於國企「產權虛置」，企業還是國家的，再加上為保持社會穩定或不斷宣傳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政府一般對虧損企業多加照顧，不容許其破產，避免失業。在政府的保護政策下，一般國企實際經營者對經營國有財產所承擔的風險意識相當薄弱，他們一般只關心怎樣提高本企業職工的薪酬福利，擴大企業生產規模和提高個人的業績。在缺乏企業自我約束機制下，於是出現企業「投資飢渴症」，導致不少盲目和重複建設的情況。從這裡可看到中國常見的情況，就是政府一號召，權力一下放，投資就猛增，出現一輪又一輪的經濟過熱；政府一旦對企業讓利，企業利潤就猛降，原因是企業首先照顧職工的收入與福利，即使虧損，也要先從企業裡「挖」一塊給職工。

企業體制的缺陷以及並隨的投資飢渴症也促成九二、九三年中國經濟過熱。

(3) 金融體制的缺陷，形成貸款的過量供給

股票及房地產等要素市場開放，及地方和企業爭相擴張都導致強烈資金需求。另一方面，銀行體制也由於存在種種缺陷，造成貨幣的過量供應：

1. 中央銀行並未能建立有效的宏觀經濟調控機制

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中央銀行是貨幣發行的銀行、銀行的銀行，以及負責宏觀金融調控、保持貨幣穩定的重要機關。

然而在中國，中央銀行（中國人民銀行）的政策目標，既要穩定貨幣，也要肩負支持經濟成長的重擔。事實上，中國人民銀行往往把發展經濟放在首位，採取擴張性貨幣政策，通過增加貨幣供應以支持經濟增

長。再者，由於中國人民銀行一向以來既執行中央銀行任務、又辦理各項具體商業銀行的業務，並經常經營專項貸款等具體業務，這勢必影響中央銀行的超然地位及執行貨幣的政策。

最致命的是中國的中央銀行不如外國的中央銀行般實行預算制，不須考慮自身的盈虧，亦不似外國之中央銀行般為其官員提供較好的待遇及社會地位，使中央銀行官員不需考慮自身利益而公正地實施穩定貨幣的政策，在中國，中央銀行無法保證其職員的待遇和開支需求，於是實行了省和省以下分支機構的利潤留成制，即中央銀行實現利潤的多寡會直接影響職員的生活，因此，中央銀行也具有利潤動機，有多貸款的需要和衝動。(註十一)

中央銀行除卻其本身目標及體制出現問題外，其貨幣和信貸管理方法亦出現很多問題，導致過量發行貨幣。

第一，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主要運用存款準備金率、中央銀行貸款利率及公開市場業務等三大貨幣政策來引導其貸款規模。但在中國，中央銀行仍執行傳統的「貸款規模計劃指標」之貨幣發行計劃，由中央銀行以指令性的行政命令規定每一家銀行的信貸指標，以達致一個既定的總信貸規模。

這種規模控制的貨幣發行計劃不能適應複雜多變的經濟活動需要，而在實際執行上，每年的貨幣投放和信貸規模都大大突破計劃指標，因此無法實現貨幣調控目標。由於中央銀行必須服從於計劃部門的經濟增長計劃和財政部門的預算安排，當這些部門把計劃調整或宏觀經濟出現失誤而導致金融失控時，中央銀行便被迫增加貨幣發行，貨幣計劃隨即失去約束力。

第二、在計劃體制下，銀行只是一個附屬於財政系統的貨幣出納機構，宏觀金融決策權掌握在黨中央和國務院手中，貨幣政策缺乏獨立性。當基建超支而導致政府財政呈現赤字時，政府便向銀行透支，中央銀行遂被迫增發貨幣，因此，中央銀行根本難以發揮有力的調控作用。

第三、由於中央銀行的分支機構按地方行政區域設置，因此各地方分行極難擺脫地方政府的干預。由於地方上的中央銀行官員的居住、子

女教育及其他生活需要往往有賴地方政府的合作來解決，因此，地方若擴大投資，需要銀行增加貸款，中央銀行很多時也被迫依循。

此外，不少地方的國有專業銀行在農產品收購淡季時，將銀行的閒置資金貸放出去，但到收購季節時，貸款仍未能及時收回，各基層銀行便層層向上要錢，逼得中央銀行不得不增發貨幣，以上的「倒逼機制」使整個銀行的信貸失控。

2. 國有專業銀行行為不規範

中國的專業銀行並未向真正的商業銀行過渡，政企仍然合一。國有專業銀行既經營一般銀行業務，又執行政策性銀行的職責，例如要辦理一些不賺錢的項目，貸款支持虧損企業，甚至要發放「安定團結貸款」。換言之，專業銀行未能將一般性經營業務與其他政策性貸款分開，而實際上又往往後者擠前者，銀行根本不能達至商業化。

在另一方面，國有專業銀行仍未能自主經營，無需自負盈虧。由於其壟斷地位，因此並無受到市場機制下的風險責任機制約束，而利潤留成制度更使專業銀行傾向多貸款以追逐利潤。在缺乏嚴格控制貸款投向的機制下，專業銀行的信貸資產質量大幅下降，呆帳、壞帳增多。

與中央銀行一樣，地方的國有專業銀行亦按行政區域設置，受地方政府重的干預。例如專業銀行包企業的資金供應，失去應有的評估貸款自主權，形成了迫使中央銀行過量投放基礎貨幣的機制。此外，由於利潤驅使，專業銀行的貸款均流向當時利潤最高的行業如房地產、股票或部份加工工業項目，造成一些國家重點建設項目或急需貸款的行業得不到應有之貸款。

3. 利率不能反映資金供求關係而出現金融混亂

作為貨幣的價格，中國的銀行利率遠未能反映市場資金的實際供求關係。在九三年第一季度，銀行儲蓄存款年息率為百分之七點五六，而同期零售物價上漲百分之九點一，城鎮居民生活費用上漲百分之十二點三，因此形成了明顯的負利率。（註十二）

負利率促使企業爭取大量貸款，如一年固定資產貸款利率為百分之九點三六，而九三年一季度生產資料價格上漲了百分之三十八，企業向銀行貸款搶購材料轉賣即可獲利。在另一方面，在社會集資年利率高達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利誘下，市民均不願意在銀行存款，或從銀行提款競往購買股票、債券或參與集資，從而導致銀行儲蓄存款金額下降。

銀行利率大幅偏離市場利率，引致不少任職銀行的幹部受賄批出貸款，地方的中央銀行及專業銀行亦興辦各式各樣經營性融資與投資公司，銀行則通過違章拆借將資金以低息貸予這些投資公司，再由這些投資公司以高息向各企業貸款而轉手獲利。此外，銀行佔用專項資金——如國家預留作重點建設及收購農產品貸款，並提前用掉貸款指標，以及各地紛紛成立信托投資公司等金融機關，通過各種非正當方式挖走銀行貸款，造成金融秩序紊亂。

三 貪污腐化，「通貨腐敗」

導致九三年金融秩序混亂、股票及房地產等新興領域出現泡沫經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部分在金融領域工作的幹部，濫用權力，做成「權錢交易」。「江澤民、朱鎔基都發現，經濟過熱和一些地方政府官員的貪污腐化是互相驅動、轉化的一種共生狀態。」

其中較普遍的現象是如前面曾指出的，部分銀行系統幹部在貸款給企業時，完全不管企業效益及其是否能提供抵押，只看紅包回扣及賄賂，部份更擅自挪用銀行資金投放到自己有密切關係的私人公司作炒地皮、炒股票之用，並打著支持企業搞活經濟的旗幟，進行權錢交易，在各方面不給好處不辦事。

針對九三年中國經濟混亂情況，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主任魏杰教授分析指出，九三年中的經濟過熱「只發生在一部份領域裡、主要在生產領域和新興的領域內，如房地產業、股票業、期貨業、開發區內等。一句話，當前的資金大部集中在投機領域很強的領域內。這些資金在上述領域內四處亂竄、竄到哪裡哪裡就熱起來，而正常的投資領域資金極為短缺。」

魏杰繼續指出，八八年中國由於物資短缺，「官倒」們都是倒汽車、化肥等，可稱為「物資倒爺」，而現在「官倒」們則炒房地產、炒股票、炒期貨，可稱為「貨幣倒爺」，其破壞性遠大於「物資倒爺」，魏杰稱這種情況為「通貨腐敗」。

由於中國經濟面臨飛躍，但經濟體制改革仍未徹底，出現種種法律漏洞，有效的監督制度亦未臻完善，部份掌管金融財政的幹部便乘機進行權錢交易，利用權力經商，嚴重擾亂中國的金融秩序，進一步助長泡沫經濟。

總 結

由於在九二、九三年中國出現經濟危機，因此政府採取了嚴峻的手段治理經濟環境，除了運用必要的行政手段以迅速防止情況再度惡化外，還運用經濟及法律手段，希望通過進一步深入徹底的改革和反貪污鬥爭，根治經濟的過熱與混亂。

然而，徹底的經濟改革難以在短期內完成，而中國需要面對殘酷的現實是，假如改革仍不徹底、市場法規仍出現漏洞、市場利率仍高於銀行利率，必然會為種種貪污及不規範謀利行為提供土壤。正如宏觀調控推行了長達一年半時，朱鎔基在九四年底還提出：

「去年（指九三年）銀行界約法三章，鎮住了一段時間，但現在又舊病復發，亂拆借、亂提利率等問題又開始抬頭。」同時他亦提出：「現在拆借又以新的形式出現，以各種形式流向非銀行機構，它們再出去放高利貸，好多貸款不是走正途，而是成為他們做生意的調控手段。」（註十三）

註 譯

註 一 國家統計局編《1994中國發展報告》，中國統計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179頁

註 二 鄭新立《宏觀經濟政策分析》，（一九九三至一九九四），中國計劃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21頁

- 註三 中國改革與發展報告專家組《中國改革與發展報告》（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三），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82頁
- 註四 《大公報》一九九三年七月一日
- 註五 秦池江《金融體制變遷與鬆緊轉換》，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169-170頁
- 註六 《明報》一九九三年六月十八日
- 註七 《文匯報》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八日
- 註八 《明報》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三日
- 註九 同註一
- 註十 同註一，第181頁
- 註十一 同註三，第115頁
- 註十二 同註二，第48頁
- 註十三 中國通訊社北京電 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第五十六章 宏觀調控(九三—九五)(中)

——十六條、改革五十條、 反腐敗與強調中央權威

導言與背景——處理經濟危機的三大改革政策與主導思想

一 三大政策協調並進，解決經濟問題

為解決九二、九三年經濟過熱及混亂情況，黨中央、國務院於四月中旬開始，數次派出由部長帶領的調查隊赴各地考察，聽取意見。根據調查結果，黨中央及國務院於九三年六月廿四日，聯合發出〈關於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中發一九九三年六號文件)，提出了以改革為主調、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十六條措施。

在中央派出調查隊研究解決即時的經濟危機之同時，中共中央政治局於九三年五月決定，在下半年召開十四屆三中全會，專門討論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問題，以及如何對中國經濟體制進行徹底改革，中央並成立由書記處書記溫家寶為組長、成員達三十餘人的文件起草小組，從五月底開始工作(註一)。總書記江澤民在起草小組的第一次會議上，就起草文件的意義、指導思想和重要內容，提出了原則性意見。六月二十二日，起草組擬定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的提綱，交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審議，小組於六月二十六日討論並同意，後來再經過五個多月的反覆諮詢研究，十易其稿，才於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中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簡稱〈改革五十條〉)(註二)。

起草〈宏觀調控十六條〉與〈改革五十條〉的時間基本是同步進行，政府於六月廿四日公佈〈宏觀調控十六條〉時，亦在審議〈改革五十條〉之提綱。〈十六條〉以加快改革為原則，而〈改革五十條〉則以徹底深化的通盤

改革為基調。由此可見，宏觀調控並非如很多中國問題專家聲稱的是恢復計劃經濟，而是基本上採取經濟手段和經濟立法以調控經濟，並附以一些行政手段，解決由行政或非法行為導致的經濟秩序混亂問題。

此外，基於江澤民和朱鎔基都認同經濟過熱與一些地方官員的貪污腐化互相驅動，形成共生狀態，故要在經濟上治亂、治熱，「就必須在政治上反腐倡廉，否則，單方面開展其中一項工作，都無法達到加強中央宏觀調控能力的目的。」（註三）

除貪污腐化外，另一個導致經濟危機之政治問題，就是地方的本位主義，「地方不聽中央，中央權威下降」，「許多事情，儘管中央三令五申，地方仍然我行我素，繼續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那一套。」（註四）

這裡值得一提的是以穩進見稱的中央元老陳雲，在九三年六月下旬曾向中共政治局和國務院寫了題為〈略提我的看法和建議〉的信，他主要提出三個問題：

第一，「現在是……一手夠軟，軟得黨風惡化，腐敗蔓延，影響和損害了黨的中心工作」；第二，「經濟發展有失控的危機，還是要有計劃按比例地穩步前進，否則，造成過熱、失控、混亂，難免要有反覆，結果是影響全局的發展戰略……」；第三，「中央採取一些行政措施是很有必要的，中國地方這麼大，發展又不平衡，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協調和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不能削弱，應當加強。」（註五）

在九三年九月十七日國務院全體會議中，總理李鵬發表講話，闡釋九三年中下旬中國政府的三大政策：

「近幾個月來，黨中央、國務院著重抓了三件大事：

一、是作出深化改革，加強和改善國民經濟宏觀調控的決策，主要運用經濟手段解決經濟發展中出現的一些突出矛盾……

二、是從總體上系統而全面地研究加快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問題，著重研究了金融、財政、稅收、國有資產管理、投資體制和外貿體制等方面的配套改革措施……

三、是部署反腐敗鬥爭，推進廉政建設。

這三件事都非常重要。抓好這三件大事，對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保證國民經濟持續健康、又快又好地發展，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註六)

二 三大政策的主導思想——改革與結構調整

面對經濟及政治危機，江澤民和朱鎔基達至一個共識，即「這次經濟上治亂、治熱、政治上反腐倡廉，都要有新思想、新辦法，要突出改革的主調，從體制改革上找到解決問題的途徑，而不能再走老路，用老辦法來解決新問題。」(註七)

負責推行九三年宏觀調控的副總理朱鎔基強調，加強宏觀調控不是全面緊縮，而是進行結構調整，而且範圍主要限於金融領域。他並尖銳地指出：

「是要像鄧小平所說的『抓住機遇』，但如不善於把握也會壞事。」(註八)

朱鎔基更對經濟是否過熱問題，精闢地提出四個標準：

「一、要看各地發展資金是否過緊，特別是農業的收購資金能否應付，會不會『打白條』。二、要看各地新建大項目……手中有無足夠資金作為保證。三、如果工業發展速度快，要看是否依靠對現有企業的挖掘潛力形成，還是靠大量貸款，增加投入來形成。四、要看重工業的發展速度，是否高於輕工業。市場消費需求是否和生產增長相平衡。以上四條，只要一條有問題，就表示這些方面出現過熱現象，就必須加以緊縮。」(註九)

江澤民在八月下旬於華北、東北八省、區、市經濟工作座談會上亦明確重申：

「中央採取的宏觀調控措施……目的是深化改革，轉換機制，優化結構，提高效益」，他進而十分形象化地描述整頓金融秩序時，「必須堵邪

門、開正門」。意思是指：「一方面要堅決制止違章拆借和非法集資，另一方面確保必需的資金及時到位，保證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決不能把資金缺口留在國家必保的重點上。」（註十）

至於強調「加速搞幾年，發現問題及時加以治理，彌後繼續前進」的鄧小平（註十一）在面對經濟過熱及混亂而需要進行宏觀調控時，亦明確表態支持江澤民及朱鎔基：「現在你們在第一線工作，有甚麼問題，採取甚麼方法解決，你們拿主意就可以了，我支持你們。」他並要求其他人「對朱鎔基不要干擾」（註十二）。然而，雖然鄧小平認為宏觀調控是必要，但其目的不是抑制經濟發展，「而是為發展創造正常的條件。」（註十三）他亦警惕切勿把宏觀調控變為計劃經濟，故他曾明確地表態：

「加強宏觀調控和中央權威是必要的，但不要用過去計劃經濟那一套老辦法……中央……不能把所有權力都拿在手裡，搞得地方、企業都沒有了積極性。這就要從改革上找出路，靠改革建立中央宏觀調控職能。」（註十四）

「總的還是要抓住機遇發展，現在發展是機遇，改革也是機遇，都要抓住……」（註十五）「不能把發展性的地區的發展速度降下來。發展是硬道理。」（註十六）

基於鄧小平的期望，江澤民在九四年六月視察廣東、福建等地時表示：「我一直主張有條件快的地方，就應該快；暫時還沒有條件快的地方，要創造條件快。」（註十七）

在下幾節，將討論宏觀調控措施；改革五十條；反貪污及強調中央權威等三大措施。

第一節 宏觀調控措施和十六條的實施及評價

一 治理經濟危機的各項緊急措施

中國政府在九三年六月成立由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主持之「財稅金融

體制改革領導小組」，六月二十四日頒佈實施中發(1993)6號文件，提出宏觀調控十六條，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嚴格執行。

七月開始，中央更召開一連串會議，分別是金融工作會議、財政工作會議、稅務工作會議、建設主任建設廳局長工作會議、物價局長會議、外匯管理分局長會議等，並派出十個工作組分赴二十多個省，檢查中央文件的貫徹落實情況。為貫徹六號文件之執行，國務院各有關經濟建設部門還頒發了關於整頓金融秩序、加強固定資產投資宏觀調控、抑制物價總水平過快上漲及平抑糧油價格等通知。當時較為重要的措施還包括下列各方面：

七月二日，中央決定由朱鎔基兼任中國人民銀行(中國的中央銀行)行長，免去國務委員李貴鮮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職務，以示他應對金融秩序混亂負責。對於是次職務調整，全國人大委員長喬石的解釋是：「……任由金融機構非法炒地產、炒股票、炒外匯、擅自集資和發行證券，造成資金流通短缺和緊張，造成金融市場混亂」(註十八)，而李貴鮮亦指出：「……前一段時間銀行界的混亂腐敗情況，主要發生在基層分支行，但中央銀行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註十九)

七月八日，中央銀行向全國銀行系統提出約法三章，要求其做到「三要」和「十不准」。「三要」即各級領導幹部要與中央保持一致，一切金融活動要符合中央方針；執行統一的貨幣政策；各項金融業務要遵守金融法律和規章制度。「十不准」則為：不准違章拆借資金；不准非法集資；不准擅自變動利率；不准超過貸款限額發放貸款；不准用信貸資金炒賣房地產、有價證券或興辦實體；不准越權審批機構擅自辦理其他金融業務；不准亂收手續費；不准濫發錢物；不准以權謀私、索賄；不准弄虛作假或發現問題隱瞞不報。(註二十)

七月十一日，中國人民銀行公佈再次調高存貸利率。

七月十二日，人民銀行首次對大陸的外匯調劑市場匯價大規模干預，抬高人民幣兌美元匯價。人民銀行在當天於北京、上海市場拋出數以千萬美元，以後並陸續投入數億美元。

二 宏觀調控十六條措施出台

九三年六月二十四日的〈6號文件〉，提出了改善宏觀調控的十六條措施。（註二十一）十六條大體分為治亂和治熱兩大方面，而其中有關金融政策和體制的就有十一條。

（1）整頓金融秩序為重點的「治亂」措施：

1. 素正違章拆借資金。人民銀行要停止對非銀行金融機構發放貸款，已經發放的貸款要限期收回；嚴禁非金融機構參與拆借資金，各級各類銀行要在規定限期内完成全面清理拆借的工作，限期收回不合理的拆借資金。
2. 堅決制止各種亂集資，並要嚴肅查處幾個大的亂集資案例，予以公佈，對全民進行法制和投資風險教育。
3. 完善有價證券發行和規範市場管理，對不符合發行和上市條件的股票及債券不予審批，並取締有價證券的黑市交易。
4. 加強房地產市場的宏觀管理，制止炒房地產獲暴利的行為，所有房地產開發公司在獲得土地使用權後，必須抓緊時間開發利用，否則要收回土地使用權，而金融機關和土地管理調控部門一律不得開辦開發經營房地產的公司，已開辦的要限期脫鉤。
5. 強化稅收管理，堵住減免稅的漏洞。要求地方財政預算開支，不准打赤字，並由國務院組織全國財稅大檢查，重點檢查偷漏稅和越權減免稅的行為。

十分明顯，中央希望規範房地產及股票市場，限制靠炒賣獲取暴利的行為，抑制社會集資及銀行非法拆出資金投往這些熱點的趨勢，從而有助銀行吸收存款，減輕增發貨幣之壓力。在另一方面，強化稅收可減輕國家財政赤字，防止通脹進一步惡化。

（2）使過熱的經濟降溫的「治熱」措施

1. 對在建項目進行審批，嚴格控制新開工項目。對不符合國家產

業政策、資金來源不落實、建設條件不具備、市場前景不明朗的項目，如高檔賓館、寫字樓、渡假村等，要下決心停建緩建，騰出資金保證國家點建設項目。所有新開工項目，必須是有正當資金來源、產品有銷路和經濟效益好的項目。

2. 嚴格控制社會集團購買力過快增長，精簡各種會議，減少過多的出國活動、無實際效益的招商和辦節活動。
3. 靈活運用利率槓桿，大力增加儲蓄存款，並對三年、五年和八年期的定期儲蓄存款實行保值。
4. 專業銀行要壓縮一般貸款，清理收回不合理貸款和拆借出的資金，並大力組織存款，以增強銀行的支付能力，要建立存款支付責任制。如果不能保證存款支付，當地之專業銀行行長和該總行行長須負上責任。
5. 限期完成國庫券發行任務，在完成國庫券發行任務後，才可以發行國家計劃安排的其他有價證券。
6. 嚴格控制貨幣發行，切實加強現金管理。
7. 嚴格控制信貸總規模。銀行貸款首先要支持農業生產收購，支持產品有銷路、效益好的國有企業的流動資金需要，對於產品無銷路、炒地產和股票的企業要減少以至停止貸款，固定資產貸款要集中於國家計劃的農業、交通通訊、能源、重要原材料、水利等重點建設項目。
8. 穩妥地推行物價改革，抑制物價總水平上漲過快現象。
9. 改進外匯管理辦法，穩定外匯市場價格(這措施旨在打擊炒賣外匯，遏止人民幣匯價進一步下跌，以緩和因進口商品價格上升而造成之通脹壓力。)
10. 加快金融改革步伐，強化中央銀行的金融宏觀調控能力，使之成為全國信貸、貨幣進行管理的中央銀行，並規定人民銀行及各類銀行與其興辦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和其他公司徹底脫鉤。
11. 進行投資體制改革，盡快建立政策性銀行，以實現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活動相分離的目標。

上述十一條治熱的措施清楚顯示，治熱的目標是要穩住經濟，避免其大起大落，並側重以改革手段抑制通脹，將投資集中於有市場、高效益或符合國家整體需要的重點或基礎建設項目。

（3）推行十六條的三大重點

為保證貫徹落實十六條的精神及具體措施，中央在下達六號文件時，強調要把握好下列三點：

1. 統一思想認識。堅持從長遠的持續發展出發，處理好局部與全局的關係。要求各級領導幹部對當前經濟形勢要有正確、清醒的認識，並要全面地領會鄧小平南巡講話，貫徹「在經濟工作中要抓住機遇，加快發展，同時要注意穩妥，避免損失。」
2. 要著眼於加快改革步伐。文件明確提出當前經濟中出現的矛盾，「從根本上講在於原有體制的弊端沒有消除」，「那種盲目擴張投資、競相攀比速度，缺乏有效約束等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在這種情況下，解決當前的問題必須用新思路、新辦法，從加快新舊體制轉換中找出路。」
3. 要運用經濟辦法，也要採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和組織措施。文件強調要「強化間接調控，更多地採取經濟手段、經濟政策和經濟立法。」「加強宏觀調控要注意從實際出發，進行分類指導，不搞『一刀切』」然而「對那些主要是由於行政行為導致經濟秩序混亂的問題，也要採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加以解決。特別是在當前經濟運行機制不健全的情況下，行政手段更不可少……同時採取必要的組織手段……以保證中央政令的通行。」（註二十二）

三 宏觀調控的成果與新問題

（1）宏觀調控的經濟成果

通過推行中央六號文件及其他一連串措施，經歷了九三年七、八、九三個月的工作，中國政府在經濟治亂、治熱方面均取得積極的成果。

1. 過高的工業增長速度回落，固定投資膨脹增長減弱，社會集團購買量增幅下降，經濟供求失調得到控制

這主要表現在全國鄉及鄉以上工業總產值增幅，自六月份達到頂峰後逐步回落。九三年下半年固定資產投資比上半年百分之七十點七的增幅回落到百分之十七點四(註二十三)。而社會集團購買量由上年的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增幅下降到百分之二十一點六，社會總供求的供需差率由上半年偏離正常範圍百分之四縮小到百分之一(註二十四)。

2. 開發區熱、房地產熱及股票熱降溫

通過整頓金融秩序、房地產及股票等要素市場，政府成功地打擊導致這些領域出現「泡沫經濟」的投資行為。房地產的投資回落，據建設部部長侯捷報告，沿海各地的地產價格，八月已平均下降二成，地產投機浪潮受到控制(註二十五)。同時，股票市場的秩序亦好轉，股價趨降。

3. 金融混亂現象得到整頓

違章拆借、非法集資及非法設置金融機構等混亂情況得到制止。九三年九月份，各銀行收回拆借資金達人民幣一千億元，佔應收回資金一半以上。在中央銀行兩次調高利率後，居民儲蓄逐月回升，國庫券發行工作順利。而由於銀行資金緊張情況得到緩解，貨幣高投放勢頭得以抑制，農產品收購、重點項目資金到位，農副產品收購「打白條」現象減少，結構失調問題開始解決，人民幣在調劑市場的匯價亦趨上升，穩定於較反映市場現實的1美元兌八點七元人民幣的水平。而由於整頓金融秩序，投機資本活動收斂，主要生產資料和高檔消費品價格亦明顯回落，由於預期價格看跌，社會上虛假需求基本消除。

4. 財政收入逐月增長

通過強化國庫券發行工作，制止過份讓利之減稅行為及打擊各類逃稅活動，國家財政逐步好轉。

（2）經濟滑坡與深層困擾

然而，政府的緊縮政策，亦帶來國有企業生產過度下降及三角債重新湧現等問題。中共中央曾下令各銀行需於九三年八月十五日前收回違章拆借資金，但由於這些資金大都已貸予房地產開發之用，已變成鋼筋混凝土，實際無法收回，許多基層銀行為完成上繳資金任務，只得挪用企業正常的流動資金貸款，以彌補借差，從而導致不少企業因缺乏流動資金購買原材料而停產，或支付發生困難，三角債出現上升趨勢，而企業由於虧損面擴大，經濟效益（利潤）下降。九月全國國有工業增長速度已下降百分之六點八，十月進一步下降百分之三點六，經濟出現負增長之危險。

針對經濟大幅滑坡的危機，中央針對資金緊張困境，在九三年第四季度適度放鬆了銀根，緩解國企資金緊張情況，使經濟能維持增長。中央領導人曾指出：「第四季度放一下是大有好處的，否則就無法生產，生產就會大起大落。這說明，宏觀調控的力度，中央掌握得恰到好處。」
(註二十六)

無疑，九三年的宏觀調控由於政策及力度把握準確，故能有效地在短時間內壓抑經濟過熱及混亂所產生的矛盾。然而，一些長期及帶有根本性的困擾中國經濟發展的深層問題卻仍然存在，這主要表現在：

1. 固定資產投資猛烈增長的勢頭雖被壓抑，然而，只要企業繼續出現「軟預算約束」，產權虛置，缺乏需承擔風險的制度，一碰到適當氣候，投資飢餓症就會死灰復燃。
2. 中國的價格體制雖曾經歷重大改革，但價格關係仍未完全理順，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農副產品價格雖然上升，但農用的生產資料漲幅更大，影響農民收益及種植的積極性，對農業發展有負面影響。

在生產要素市場發展方面，由於整個市場環境、法規、人民思想觀念及配套改革措施仍不健全（例如與房地產業關係密切的銀行按揭制度仍未建立等），因此秩序混亂及不規範行為的情況仍然

經常出現。其中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由於銀行利率與市場利率仍有差距，因此違章拆措、非法以高息吸收存款及借貸等行為仍屢禁不止，金融混亂情況無法根治。

3. 九三年宏觀調控中政府雖甚為自覺的儘量運用經濟手段，但有些方面還得依靠行政措施及組織紀律，帶有明顯的直接調控色彩，與成熟市場的經濟調控機制仍有一段距離。
4. 調控措施對解決一些影響經濟穩步發展的問題如總量失衡等較容易見效，但對解決根本性的經濟結構問題卻收效甚微。價格由於成本推動及流通領域秩序混亂而居高不下，各階層地區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等問題仍然存在。

以上的深層次問題，不能期待由針對短期經濟困難的宏觀調控措施來解決，必須有待整個經濟體制進行徹底的深化改革方能根除。因此，中國政府積極籌備十四屆三中全會，以推行整體經濟體制改革。

四 宏觀調控經驗以及與八八年治理整頓之比較及評析

在分析宏觀調控時，很多論者皆喜歡將九三年由朱鎔基主持之「宏觀調控」與八八至八九年由李鵬主持之「治理整頓」相比較，認為兩者在處理經濟危機時所採取的手段及力度均不同。

八八年中國進行治理整頓主要採取行政手段，九三年宏觀調控則主要採取改革和經濟手段，選準影響經濟正常運作、導致經濟混亂的症結——即固定資產投資過大和金融秩序混亂這兩個源頭，作為宏觀調控的突破口，並以提高利率、控制貨幣供應及拋售外匯以平抑人民幣匯價等經濟手段，對症下藥。而在宏觀調控的力度上，九三年的宏觀調控不採取八八年的一刀切的全面緊縮政策，而是進行經濟結構調整，並在經濟開始出現滑坡及三角債再度上升時及時調控力度，避免出現八八年經濟下降速度過猛的情況。故九三年在穩定經濟的同時，仍保持經濟快速增長的成績，標誌著中國政府能以較有效及成熟的方式駕馭經濟。

然而，在比較八八年治理整頓和九三年宏觀調控時，亦應注意兩個

時期的社會經濟環境上的重大客觀差別。首先，八八年經濟出現嚴重危機時，黨中央仍對是否需要治理經濟出現分歧，互相爭持不下，經濟過熱問題進一步惡化，市場並出現恐慌性搶購，這時政府才決定採取以急剎車的行政手段對經濟進行調整，因此力度就必然過大。反觀九三年六月推出宏觀調控前半年，由於黨中央領導人的認識較為一致，故針對經濟過熱的問題，採取了逐步調整措施，做好輿論措施上的準備，這就避免由於問題已發展到十分嚴重，而被迫採取一刀切之急剎車辦法。

其次，八八年由於經濟需求過旺，消費品奇缺，出現了瘋狂搶購之危機。然而，九三年人民收入增長與物價上漲基本成正比，市場上消費品供應充足，而且整個經濟市場化程度亦較高，例如在九三年，百分之八十五的農副產品、百分之九十五的工業消費品和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生產資料已實行市場價格，在這情況下，必須採取經濟手段為主的調控手段，單靠行政手段必然難以奏效。（註二十七）

上述提出的九三年消費品供應足夠及市場化程度較高，是由於八八年開始的三年治理整頓期間，政府利用市場疲軟的時機持續地開放物價，而市民在這三年間儲蓄較多，故有能力在九三年購買政府債券以彌補赤字。鄧小平曾指出治理整頓的成果與前五年加速發展有關：「如果不是那幾年跳躍一下……後來三年治理整頓不可能順利進行」（註二十八）同樣地，假如沒有三年治理整頓期間所儲蓄起來的經濟實力及持續推行之物價開放，九二年的經濟起飛及九三年的宏觀調控可能不會這樣成功。

第二節 十四屆三中全會與市場改革五十條

九三年中央政府除了加強宏觀調控外，還同時繼續深化經濟改革，全面推出加速整個經濟體制邁向市場化的改革方案。中共中央委員會於九三年十一月召開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這個以市場改革為方向的重要文件，不單明確勾劃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總體框架，更在國營企業、金融、財稅、投資等重要領域提出了突破性的改革目標與策略。

負責制定市場改革五十條的仍是主持宏觀調控十六條的副總理朱鎔基，為完善市場改革五十條總體框架設計，朱鎔基親自跑了二十多個省、市、區，徵詢各地方領導的意見。而在三中全會召開前的十一月十四日，朱鎔基在中南海懷仁堂，親自主持向資深專家學者徵求意見的會議。（註二十九）

三中全會召開之前，中共中央出版「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此文選彙集了鄧小平自一九八二年九月至九二年二月這十年間的重要講話和報告，文選的結束篇〈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中強調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及防「左」等論點，正是中共十四次全國黨代表大會的重要指導思想。

在十四屆三中全會前高姿態地發行及宣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明顯是希望藉鄧小平改革開放、要求社會穩定的觀點統一全黨的思想。此外，文選中亦有多篇文章提到要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以及「黨中央的權威必須加強」等（註三十），故此，大力宣傳推廣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明顯對進一步樹立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領導人權威有很大的幫助。

一 制定市場改革五十條的背景與原因

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市場改革五十條，是邁向市場經濟新體制的行動綱領，對中國政府來說，是次改革是整體推進、重點突破的深層次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是要將中國社會主義要求平等均富的理想與以價格、市場為手段的資源配置機制（即注重效率的市場經濟）連結起來。中國政府在九三年十一月推行市場經濟改革五十條，實有其深刻的背景：

（1）經濟發展新格局

自從七八年中國政府開展以市場為導向之改革以來，經過十五年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大力發展農村中的鄉鎮企業、擴大城中的企業自主權、調整及開放價格、建立多渠道的流通網絡，以及大力發展對外經濟關係等，已使整個中國經濟運行的機制和格局發生基本及深刻的變化，這主要表現在：

1. 價格已大部分開放，各類市場均蓬勃發展。由國家定價的生產資料的比重下降到百分之二十，而國家定價的消費品比重不到百分之十。
2. 原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正轉變為整體上無約束力的指導性計劃。工業生產指令性計劃由七九年佔工業總產值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減少到百分之五以下，農業生產亦已取消指令性計劃。
3. 所有制結構發生深刻變化，從過往單一的公有制，轉變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如鄉鎮企業、三資企業及私人企業等多元化所有制結構。
此外，國有企業亦逐步由政府附屬物轉變為較重視效益、強調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
4. 由於投資主體以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出現，並日趨多元化，再加上投資資金來源已從過往單靠政府調撥而發展至從多渠道籌集，故企業及地方政府的投資決策權明顯擴大。
5. 經濟從過往的半封閉轉向開放模式，並與世界經濟密切聯繫，形成沿海、沿江、沿邊及內陸地區全方位開放的經濟格局。（註三十一）

在這樣一種深刻變化的經濟運作格局下，原來計劃經濟下的政府調控經濟的手段已明顯地不符合新時代的需要，因此必須建立能適應市場經濟的新型經濟調節體系。正如鄧小平指出：「要從改革上找出路，靠改革建立中央宏觀調控職能。」

（2）經濟各環節改革不徹底所造成的困擾，呼喚著更全面的改革

雖然中國經濟在過往十五年已朝市場方向發展，然而，半市場、半計劃的雙軌制，在實踐中被證明無法適應穩步發展經濟的需要。其中最明顯的弱點，就是中國在改革期間始終無法擺脫「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的經濟惡性循環。當政府鼓勵發展，放鬆銀根及投資審批的行政控制時，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就急速膨脹，這種擴張帶來嚴重的經濟過熱、通貨膨脹及經濟產業結構失調，於是政府不得不以嚴厲的行政手段

將失控的經濟納入較強的控制之下，於是又出現生產嚴重滑坡、企業虧損面擴大、企業相互拖欠的三角債，以及工人失業等困境。

中央領導人理解到惡性循環出現的主因是經濟體制各環節改革不徹底，如企業產權未能徹底改革、負盈不負虧和財政包乾體制下形成的地方保護主義等，均引致企業及地方政府對投資及貸款的強烈需求，再加上房地產及資金等要素市場缺乏完善的法規監管，在鄧小平鼓吹加速經濟發展下，經濟迅速出現某程度的失控。此外，國企「產權虛置」，虧損面不斷擴大，政府為避免失業及社會動盪而被迫承擔責任，嚴重影響政府財政收支的平衡。

另一個令中央領導人擔心的問題，就是在改革過程中，由於推行地方財政包幹制，中央財政收入佔整體財政收入比重不斷下降。然而，中央需承擔的開支卻未有相應減少。這不單造成中央出現財政赤字，中央銀行被迫增發貨幣而加強通脹壓力，影響更深遠的，是政府駕馭經濟發展的能力愈來愈弱，對中國這樣一個仍須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參與經濟發展及改革的國家來說，政府不能有效地調控及引導經濟，極有可能由於改革及迅速發展過程中的種種磨擦及不協調，造成社會動盪。

基於上述原因，進一步推行全面深入的整體經濟改革，如完善企業產權制度；培育消費及要素市場與流通體系；推行金融、財政分稅制、計劃及投資的宏觀經濟調控系統改革等，可避免經濟重蹈惡性循環、國企經濟效益低下及中央財力下降的困境。

（3）發展市場經濟，建立法治社會，消滅貪污腐化的經濟土壤

由於計劃與市場經濟並存，以及經濟體制各環節改革不徹底，例如資金及房地產等要素市場發展不規範、國企資產擁有權不明確、計劃內外產品價格差別大，以及中央銀行及政府對控制貸款及批准投資計劃時，存在依個別官員標準的隨意性及制度不完善等，對貪污腐敗的滋生提供一個非常大的體制基礎。

不少握有實權的官員利用以上所述的漏洞，做出很多以權謀私的損害國家利益的行為，如低價出售國有資產和土地使用權、賤價向企業內

部職工售股份、毫無原則地減免稅收及給予企業各種優惠政策、倒賣計劃內平價商品以謀暴利、不負責任地批出銀行貸款以求回扣及不顧效益的批准企業集資與投資項目等。

市場經濟是一種主體多元化的法制經濟，經濟活動間有著複雜的經營、交換和產權等關係。此等極其錯綜複雜的經濟活動和利益關係，必須受法律引導、規範和約束。此外，市場經濟亦是競爭性的經濟，客觀上必須有一個公開、公平、公正的平等競爭環境，使各種經濟活動規範化。

基於上述分析，建立規範化的市場經濟，堵塞經濟轉軌過程中各種漏洞，將有利於剷除貪污腐化的土壤。正是這個原因，江澤民和朱鎔基皆認為「政治上反腐倡廉，都要有新思路，新辦法，要突出改革的主調，從體制改革上找到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而不能再走老路，用老辦法解決新問題。」（註三十二）

二 市場改革五十條內容、貫徹推行及其歷史意義

被中國政府定位為深化改革，從深層回應當前和今後經濟改革和發展問題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於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召開，全會通過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此文件是一九七八年以來中國最重要的經濟體制改革綱領。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副秘書長曾培炎曾指出《決定》把「十四大確定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和基本理論、基本原則具體化、系統化，是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規劃，行動綱領」。（註三十三）

《決定》共分為十個部分，第一部分為總論，第二至第五部分為分論，是整個《決定》最重要的內容，第六至第九部分為四個專題，論述農村、對外經濟、科技教育及法制等事項，而第十部分則討論政治上的配合問題。（註三十四）

（1）第一部分為整份文件的總論

論述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面臨的新形勢，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

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作用」。它主要包括五大特點，分別是：

1. 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的現代企業制度；
2. 全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
3. 轉變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建立以間接手段為主的宏觀調控體系；
4.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制度；
5. 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

(2) 第二部分詳細論述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指出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現代企業制度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

(3) 第三部分詳細論述培育和發展市場體系

提出要推進價格改革，建立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並指出目前應著重發展金融、勞動力、房地產、技術和信息等市場。規範市場行為，打破地區、部門的分割和封鎖，創造平等競爭的環境，形成統一、開放、有序的全國性大市場。

(4) 第四部分論述轉變政府職能，建立健全的宏觀調控體系

重點指出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主要是制訂和執行宏觀調控政策、搞好基礎設施建設、培養市場體系、監督市場運行和維護平等競爭、調節社會分配和組織社會保障、控制人口增長、保護生態環境，以及管理國有資產和監督國有資產經營等。

在有關建立健全的宏觀調控體系方面，「決定」分別就財稅、金融、投資及計劃等四大體系的改革提出具體的政策建議。財稅改革的核心，是把現行導致各地區由只著眼於本地區發展的財政包乾制，儘快改為合理劃分中央與地方事權的分稅制。金融改革的核心為加強中央銀行對貨幣供應量的控制，從而保持人民幣幣值穩定。投資改革的核心是通過建

立企業投資和銀行信貸的風險責任制，從而約束投資行為，在機制上徹底改革不負責任、只負盈不負虧的「投資飢渴症」行為。而計劃改革的核心則是規定國家的計劃要以市場為基礎，總體上應當制定對企業無硬性約束力的指導性計劃。

(5) 第五部分是論述建立合理的個人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

在個人收入方面，〈決定〉同意以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制度，意思是拆除卻勞動者的報酬要引入競爭機制，多勞多得，容許拉開差距以打破平均主義外，還容許並鼓勵居民儲蓄和投資，即允許屬於個人的資金參與投資及收益分配。

在社會保障方面，則提倡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分別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濟、社會福利、優撫安置、社會互助和個人儲蓄積累保障，並強調要重點完善企業養老和失業保險制度，強化社會服務功能以減輕企業負擔，使企業能較暢順地進行內部組織結構調整，以提高其經濟效益及競爭能力。

(6) 第六部分關於農村經濟體制改革

提出要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與由分散的家庭以及統一的集體所形成的雙層經營體制，作為農村一個長期及基本的制度。此外，作為農村經濟重要支柱的鄉鎮企業，亦應發展股份制，進行產權制度和經營方式的創新。再者，此部份亦強調政府要不斷加強對農業生產的支持和對農民利益的保護。

(7) 第七部分為對外開放政策

提出中國要全方位開放，積極參與國際經濟競爭與合作，使國內經濟與國際經濟互相銜接，並進一步改革對外經濟貿易體制，國家主要用匯率、稅收和信貸等經濟手段調節對外經濟活動，減少行政干預。

(8) 第八部分討論科技和教育體制的改革

強調要促進科技經濟一體化，協助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

在教育方面，提出要將教育事業作為戰略任務來實施，加快教育體制改革的步伐，並提出要強化義務教育，發展職業和成人教育，優化教育結構，確保教育投入。此部分還提出要改革人事與幹部的選拔制度，逐步實行公開招聘，平等競爭，促進人才合理流動，從而創造出人盡其才的社會環境。

(9) 第九部分提倡法律制度建設

加快立法步伐，廢止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相適應的法律，並加強廉政建設、反腐敗、以及強化黨的紀律檢查機關和司法、監察及審計部門的工作。

(10) 第十部分為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

提出要嚴肅黨的紀律，增強全局觀念，使全黨在行動上步調一致，並加強社會主精神文明建設，反對拜金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及腐朽的生活方式。

三 江澤民就貫徹市場改革的談話

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江澤民在三中全會閉幕會議發表談話，他除提出要加強黨的建設和領導外，更重點提出關於貫徹五十條決定的幾個重要問題。

第一是為改革創造較為寬鬆的環境，即要抑制過度需求，嚴防繼續走盲目追求產值和擴大投資規模的老路，要重視農業及國企，提高效益，使社會供需能達至平衡。在經濟能持續穩步增長及通漲能被有效控制下，將更有利各項經濟體制改革措施的開展。

第二是在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配置資源的同時，亦需加強國家宏觀調控，以克服市場的盲目、滯後性及各種混亂現象。江澤民提出要推進價格改革、培養生產要素市場及加強對市場的管理和監督。

第三是重視精神文明的建設，保持社會穩定，加強社會治安的綜合治理及反對腐敗。

第四是強調地方的局部利益須服從全局，江澤民特別強調：
「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眼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註三十五)

四 市場改革五十條的意義

〈決定〉揭示的企業、金融、財稅、投資及外貿等改革，覆蓋的領域相當廣，其意義在下列幾個方面；

(1) 勾畫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及總體藍圖

〈決定〉提出社會主義市經濟是在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的前提下，由現代企業制度、統一的市場體系、政府的宏觀調控、合理的個人收入分配制度以及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這五個方面構建而成。這些主要環節，是互相聯繫的有機整體，都是建立新的經濟體制所必須的。故此，要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要圍繞這五大方面，缺一不可，配套協調的實行全局性之整體改革。這種對經濟體制改革深刻的理解，實為中國改革事業的一大里程碑。

(2) 明確提出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

指出企業有全部的企業法人財產權，企業並成為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責任的法人實體，不受政府干預，並在市場競爭中優勝劣敗，資不抵債的破產，這種對企業明確產權關係的論述，是中共理論界一個甚具意義的突破。

(3) 改變政府影響經濟的宏觀調控手段

中共在決定中提出要透過財稅、金融、計劃及投資體制的改革，來形成一個有效的間接經濟調控體系，而非過往慣用的直接命令的調控，財稅改革主要是實行中央和地方的分稅制；金融體制改革主要為加強中央銀行對貨幣的調控；投資體制改革的核心則是約束企業和地方的投資行為，保證投資者需全面承擔投資風險，以上各種改革皆是將政府過往的直接控制微觀的經濟行為改變為間接宏觀的調控體制。

(4) 要素市場的充份發展

〈決定〉首次正式承認勞動力及資本市場。由於中國政治及理論界過往皆基於傳統社會主義思想，不肯承認這兩個市場的存在，故是次正面肯定這兩個市場，無疑對中國市場體系的整體建設創造一有利的條件。

(5) 將法制制度建設納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軌道

由於市場經濟是競爭型經濟，必須有完善的法律來規範，以保證各項經濟競爭能公平、有序的進行。健全的法制不單可幫助中國推行市場經濟，更是中國逐步走上法治社會及長治久安的保證。

第三節 反腐敗與強調中央權威

一 經濟混亂、貪污及地方主義

江澤民及朱鎔基皆理解到，九二、九三年的經濟混亂與各級官員的貪污腐化及地方主義呈現一種互相驅動的關係，故要在經濟上治亂及治熱，除推行徹底的經濟改革外，亦必須推行反腐敗及在各級政府中增強全局觀念，以建立廉潔政府及全黨在行動上做到步調一致。

面對伴隨經濟混亂而出現的貪污腐敗狀況，鄧小平在九三年中下旬指出：「……腐敗之風蔓延……我看這個估計至少在相當程度上，在有些部門和地區那裡是準確的……要抓準了狠狠打擊一批，抓大的打……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經濟犯罪……兩手硬，看來是對的。」此外，中共元老陳雲及彭真等亦提出：「腐敗敗壞了黨的存在基礎……這是現實的最大威脅。」(註三十六)

在地方主義問題方面，江澤民指出：「有些事情，上面三令五申，有的人卻仍然我行我素，繼續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註三十七)朱鎔基亦尖銳地批評：

「當前經濟形勢十分嚴峻……要害不是中央的方針、政策對不對頭的問題……而是某些部、委、辦和地方的本位主義和地方主義膨脹，對中

央的方針、政策任意曲解和各取所需……打亂了中央的部署。」(註三十八)

二 反對地方主義，從制度建立中央權威

為針對地方主義，中共中央與國務院於九三年六月二十日召開了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政負責人的緊急電話會議，江澤民堅定地指出：「……如果地方違背中央的方針、政策、措施擠了漏子(作者按：出了大的差錯)，誰做的誰負責，中央要追究責任、決不搞下不為例。」朱鎔基亦指出：「……對一些問題嚴重的部門和地方，中央會及時從組織上予以解決，中央也要求地方對所屬部門和地區以中央方針、政策為基調進行一次自上而下的調查。」(註三十九)九三年七月，中央派出十個工作組分赴二十多個省檢查中央政策的落實情況，以保證地方與中央步伐能保持一致。

此外，江澤民與朱鎔基等亦理解，要徹底解決經濟上的混亂，都要有新思路、新辦法，「要突出改革的主調，從體制改革上找到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註四十)，這思路就正如鄧小平指出的：「加強宏觀調控和中央的權威是必要的，但不要用過去計劃經濟那一套老辦法……要從改革上找出路。」(註四十一)

在上述以改革為基調的背景下，中共在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倡全面經濟體制改革中，提倡分稅制，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權及收支比例，從制度上解決過往由於實施地方財政包乾等財政制度，而使地方政府過份著眼於局部利益，發展該地區經濟的狀況。此外，市場改革五十條中提出的強化中央銀行的貨幣調控功能，其分行將成為跨行政區的機構，徹底脫離地方政府控制，政府的財政赤字不再向銀行透支，以及實行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分開等政策，也涉及從體制上調整中央和地方利益關係。正如江澤民指出：「這樣做，有利於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中央要考慮地方的困難，地方則要樹立全局觀念，全局照顧局部，局部服從全局。」(註四十二)

三 反腐倡廉的具體措施

九三年的反腐敗鬥爭，摒棄舊做法，不搞運動，不搞人人過關，而

儘量發揮各級政府中的紀律檢察及監察機關的功能，從查辦大案為突破口，結合輿論攻勢，提出反腐與倡廉結合（註四十三），具體工作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召開各類會議

九三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紀委召開第二次全體會議，提出反腐敗鬥爭的思路與對策，江澤民在會議中發表講話，提出是次反腐敗重點放在黨政領導機關和司法、行政執法及經濟管理各部門，針對各類案件，務必一查到底，而對於阻礙查案工作的，要堅決處理。九三年九月，公安部召開反腐敗電話會議，部長陶駒駒指出公安機關要集中力量查處領導幹部貪贓枉法、索賄受賄案件。

同年十一月，在國務院反腐敗工作座談會上，李鵬宣報了元旦、春節期間各級幹部廉潔自律的五條規定，並重申國務院各部要帶頭大力精簡會議和各種慶祝表彰活動，禁止用公款大吃大喝及搞高消費的娛樂活動，以及不得贈送和接受各種禮金與禮券等。

（2）發出指導文件，頒發各項規定

中共中央及國務院在十月五日發出〈關於反腐敗鬥爭抓好幾項工作的決定〉，要求近期抓好三項工作：分別是 1. 黨政機關領導幹部要帶頭廉潔自律、2. 查辦一大批大案、3. 狠剎幾股群眾反映強烈的不滿之風。此決定明令幹部不准經商、不准在各類經濟實體中兼職、不准買賣股票及接受各種利益等。〈決定〉並提出要重點治理國家機關擅自把職責範圍內的工作變成收費項目，擴大收費範圍，及將一部份職能轉移到下屬的經濟實體搞有償服務。

為配合中央反腐敗鬥爭的工作部署，中共中央辦公廳及國務院辦公廳於十日期間連續發出〈關於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廉潔自律『五條規定』的實施意見〉、〈關於嚴禁用公款變相出國（境）旅遊的規定〉、〈關於治理亂收費的規定〉及〈關於黨政機關與所辦經濟實體脫鉤的規定〉等。（註四十四）

（3）派遣反腐敗調查組

為更積極推行反腐敗鬥爭，中共中央決定邀請民主黨派參與中央反腐敗工作檢查組，先從二十個中央國家機關著手，並對中央反腐敗鬥爭工作部署的落實情況進行檢查。

十一月上旬，中央又另組十個調查組分赴全國二十個省進行檢查，對存在的問題作出研究，並檢查中央就反腐敗的各項規定是否落實。

四 反腐敗成效不大

在中國大陸，由於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不容挑戰，以致社會無從對執政黨及其控制的政府形成一種有效的制約機制和外部監督，這樣就容易出現官官相護，反腐敗難以突破。此外，中國法制不完善，亦缺少真正的司法獨立制度，以致黨政機關皆可通過不同渠道對司法系統進行干預，這亦是中國對黨政機關腐敗懲治不嚴、表現得軟弱無力的主因。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底，國務委員李貴鮮主持召開了一次國務院反腐敗的座談會，李鵬在會上表示當前反腐敗鬥爭的發展勢頭較好，但他同時亦指出：

「……成績絕不能估計過高……在一些政府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中，在一些領導幹部中存在的腐敗現象，還相當嚴重……行業不正之風屢禁不止，有的部門和單位抓得還不夠得力。」（註四十五）

可以說，反腐敗是一項長期的工作，不能指望短時間內得到明顯改善。要打擊貪污腐化，一定要從堵塞經濟體制轉軌期間出現的各項體制漏洞入手，集中規範政府行為，加速廉政法制建設，並要認真推行經濟體制及政治改革，落實司法獨立，更容許民間及輿論對執政黨實行監察，並在國家可負擔的財政狀況下，提高政府官員的待遇，這樣方可從體制、法律、政府廉政建設、民間監督及聘用條件等幾個主要方面，促使反腐敗能獲得有效的成果。

註 釋

- 註一 文匯報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廿四日
- 註二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系列講座》，學習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2頁
- 註三 顧敏文〈中共高層反腐有共識〉《鏡報》月刊，一九九三年十月
- 註四 任慧文〈中共黨內對金融危機的歧見〉《信報》一九九三年七月九日
- 註五 陳潔弘〈陳雲談經濟要消熱〉《鏡報》月刊，一九九三年八月
- 註六 《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典》，中國經濟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2203頁
- 註七 同註三
- 註八 謝星〈中國金融問題來龍去脈〉《廣角鏡》月刊，一九九三年八月
- 註九 紐約「世界日報」一九九三年九月廿二日
- 註十 新華社大連 八月三十一日電
- 註十一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377頁
- 註十二 謝鳴九〈江朱聯手巧施金融剎車〉《鏡報》月刊，一九九三年八月
- 註十三 任慧文〈鄧小平的宏觀調控觀評析〉《信報》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五日
- 註十四 同上註
- 註十五 同註十二
- 註十六 同註十三
- 註十七 同註十三
- 註十八 同註四
- 註十九 《明報》一九九三年七月八日
- 註二十 中新社北京電 一九九三年七月八日
- 註二十一 〈中共中央文件：一九九三年六號〉，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四日轉載《中國大陸研究》第37卷第2期
- 註二十二 同上註
- 註二十三 國家統計局編《94中國發展報告》，中國統計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187頁
- 註二十四 鄭新立《宏觀經濟政策分析》一九九三至一九九四，第24頁
- 註二十五 紐約「世界日報」一九九三年九月廿八日
- 註二十六 《文匯報》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 註二十七 同註二十二，第195頁
- 註二十八 同註十一
- 註二十九 張沐〈三中五十條顯示理性改革〉《鏡報》月刊，一九九三年十二月號
- 註三十 同註十一，第301，310，319頁
- 註三十一 同註二，第28-29頁
- 註三十二 同註三
- 註三十三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編《當前幾項重大經濟體制改革——電視系列講座專輯》，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44頁
- 註三十四 同上註，第1-30頁
- 註三十五 同註三十三，第39-42頁
- 註三十六 同註三
- 註三十七 《文匯報》一九九三年七月五日
- 註三十八 同註四
- 註三十九 同上註
- 註四十 同註三
- 註四十一 同註十三
- 註四十二 同註三十三，第31頁
- 註四十三 雙川〈中共反腐新對策〉《鏡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二月號
- 註四十四 章琅〈三中全會與中共反腐敗鬥爭的問題〉《中共研究》27卷，一九九三年十二月12期
- 註四十五 同註四十三

第五十七章 宏觀調控(九三—九五)(下)

——成就及深化經濟體制 改革

第一節 九四年經濟平穩發展——宏觀調控推行 一年的成果

九三年六月開展的宏觀調控，在實施三個月後已初步見到積極成果。再經過九四年全年的努力，中國經濟局部過熱及混亂的形勢在九四年內進一步有明顯的改善，主要表現為下列幾點(詳一)：

一 固定資產投資膨脹過猛情況有所遏制，過高的工業 生產速度平穩回落，新開工項目得到較好控制

九四年全社會完成固定資產投資一萬五千九百多億，比九三年增長了百分之二十七點八，但相對增幅卻回落了三十點八個百分點。

此外，國家嚴格審批建設項目，使新開工項目比九三年減少兩成。投資結構亦有所改善，例如國有單位投資中，能源工業及郵電通訊的投資比重皆上升。而列入國家計劃的一百五十一個重點建設項目，九四年完成投資一千零五十一億元，超額完成了年度計劃，鐵路建設新線、港口吞吐能力、水利建設、大中型發電機組等基礎設施能力的增加都比最近幾年高。

二 市場貨源充裕，社會供需總量實現基本平衡

這主要表現為市場秩序好轉，生產資料供應由緊張轉趨緩和，消費品市場一直處於平穩狀態，九四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比九三年實際增長百分之七點八。據國內貿易部統計的五百四十二種工業消費品中，供大於求和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佔百分之九十五，少數供不應求的主要為

名牌商品。在投資品市場方面，生產資料亦出現供大於求情況。上半年，十六種主要生產資料實物銷售增長百分之四點四，比去年同期回落百分之十三，社會物資庫存逐步上升。

由於投資受控，市場貨源充足，社會供需總量實現基本平衡。九四年頭六個月，社會總供給達一萬九千多億元，而社會總需求為一萬七千多億元，供需正差率百分之八點九，比九三年同期上升百分之三點五，基本處於百分之十的合理界限。

三 出口增強，外貿順差、外匯收支平衡，外匯儲備大幅增長

九四年全年出口比九三年大幅增長百分之三十一點九，進口則只增長百分之十一點二，由於外貿順差，再加上外國企業在中國投資增長等因素，中國的外匯儲備大幅度增加至五百多億美元。

四 財政、金融形勢保持平穩

在新的財稅體制下，財政收入增長較快，九四年上半年，國內財政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長了百分之二十二點六。

由於市場狀況基本穩定，社會上儲蓄增加，九四年底國家銀行各項存款餘額接近三萬億元，比九三年增長達百分之三十七。而居民儲蓄存款餘額達二萬一千多億元，比上年末大幅增長百分之四十一點五，貨幣回籠情況轉好。

居民將閑散資金投向儲蓄，有利中央政府國庫券的發行，而這兩個因素亦導致流通中的貨幣減少，全年銀行信貸規模和貨幣發行得到了較好的控制。

此外，中央銀行亦加強了對各類金融機構的監管，違章拆借、非法集資及不規範地設立金融機關的混亂現象得到制止，銀行辦的經濟實體逐步與銀行脫鉤，這情況有利於控制全社會的信用量。用於支持國家重點建設項目、產業結構調整、有市場的國有企業及國家重要物資的進口

和儲備等方面的貸款則增加。

雖然宏觀調控政策在九四年已獲得成果，然而，這一年卻由於物價改革措施推行過多、市場流通與監督體系不完善，以及農產品供應不足等因素，以致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

第二節 改革攻關——九四年經濟體制改革措施 出台

一九九四年，是中國改革攻關的重要年份，在中共中央於九三年底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市場改革五十條〉指引下，政府在九四年初推出了財政，稅收、外匯管理、金融、企業制度、流通體制及價格等改革，在一年之中有這麼多的改革措施出台，是前所未有的。

一 財政體制改革

財政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是將現行的分灶吃飯的「財政包乾制」，改造以合理劃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職權為基礎的分稅制。

改革開放以來，中央不斷向地方放權，而在稅收方面亦循放權方向發展，放權政策有利於地方財力壯大，但卻形成中央窮、地方富的局面，嚴重削弱中央調控全國經濟的能力。由於中國為一整體，若中央不能協助縮少沿海內陸間的差距，不單會帶來貧富不均會進一步擴大，造成不穩定的局面，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最終也會受到影響。此外，興建全國性大項目和涉及國防、科研及教育等支出，亦需中央統籌策劃。因此，一個財力處於弱勢的中央政府並不能有效地帶領國家建設經濟。

分稅制的主要內容包括：

- (1) 明確劃分中央及各級地方政府的事權，在此基礎上再劃分各級政府財政的支出；
- (2) 根據有效徵管及收益性質，劃分中央與地方不同稅種收入，將各稅種劃分為中央稅、地方稅和中央與地方分享稅，目標是使中央財政

佔總收入的百分之六十。

- (3) 中央稅務機關與地方稅務機關各自設立相應的稅管部門；
- (4) 確定地方財政收支基數，訂定中央對地方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這分別包括「專項撥款」和「稅收返還」。「專項撥款」是指將部分中央財政資源轉撥予收入水平較低的省份，以縮少地區間的經濟差距。「稅收返還」乃按照各地方一九九三年的收入基數，核定各地方財力，目標是保證沿海較富裕地方之既得利益，新稅制的實施若導致這些地方的財政收入減少，中央則須對其返還差距，從而確保其財政收入不會減少。

二 稅收體制改革

稅收改革主要按統一稅法、公平稅負、合理分權的原則規範稅制，目的是理順分配關係，促進公平競爭。其重點為：

- (1) 推行以增值稅為主體的流轉稅制度，在商品的生產、批發、零售及進口環節，全面徵收增值稅。流轉稅統一適用於本國及外國投資的企業；
- (2) 建立統一的企業所得稅制度，對不同性質的內資企業，包括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私營企業等，實行統一的企業所得稅。但外資企業仍可享有某些所得稅優惠，而很多地方，如經濟特區和沿海城市等地的所得稅率較低。
此外，將個人所得稅、個人收入調節稅、城鄉個體工商戶所得稅合併，建立統一的個人所得稅制，並採取超額累進稅率；
- (3) 實行複式預算制度，並對政府公共預算實行硬約束，政府再也不能為彌補赤字而向銀行透支或增加貨幣發行，而只能以發國債填補不足。

三 外匯管理體制改革

為實現人民幣的完全可兌換，中國政府決定分兩步走，第一步為取

消雙重匯率制，實現經常項目下人民幣有條件可兌換；第二步則邁向取消對資本流動的控制，實現人民幣的完全可兌換。

九四年初，政府即時取消了雙重匯率並存制度，將「官方掛牌定價」和「調劑市場價格」合併，實行匯率併軌，建立了單一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人民幣浮動匯率制度。由中國人民銀行根據前一天銀行間外匯交易市場形成的價格，每天公佈人民幣兌美元和其他主要貨幣的匯價。

在匯率併軌的同時，中國亦推行「結匯制度」，取消過往出口企業外匯上繳和外匯留成制，並取消進口用外匯的審批制度。在新制度下，企業在收取外匯後要全數將外匯售予銀行，而當企業要用外匯購買進口貨品時，則可憑有效憑證用人民幣到銀行兌換。

經過上述改革，實際上實行了在經常項目下人民幣有條件的可兌換，取消經常項目下對外支付的行政限制，大幅度放鬆外匯管制，為中國重返關貿總協定創造了重要條件。

而在資本項目方面，例如國內企業向境外投資、貸款、捐贈等匯出，繼續實行審批制度。

四 金融體制改革

金融體制改革方面，首先，是強化中央銀行的職能，明確中央銀行的責任為運用各種經濟手段，調節貨幣供應量，以保持幣值穩定，並實施對各種金融機關的監管，維持金融秩序。

其次，是推行現有之國有專業銀行的商業化經營，其中重要步驟是將這些國有專業銀行承擔的、由國家規定的政策性貸款業務分離出來，並使其轉變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擔風險的真正商業銀行。

第三，為實行商業性銀行與政策性銀行分離之目標，國家決定組建政策性銀行，以承擔過去原來由國有專業銀行承擔的政策性業務。政策性銀行有三間，分別為國家開發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和中國進出口信貸銀行。

上述幾間政策性銀行進行的貸款項目包括國家重點建設項目的融資，如跨地區的基礎設施、農副產品收購、農業開發及糧油棉儲備，以

及為大型成套設備進出口提供信貸及出口信用擔保等。

五 企業改革

從過往放權讓利政策進入「制度創新、轉換機制」的階段，主要任務是建立起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及管理科學的企業制度。全國人大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國務院更推行按照公司法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試點。

六 流通領域和價格體制改革

九三年十一月，即十四屆三中全會後，廣東等沿海省份到內地產糧區搶購糧食，造成部分地區糧價猛漲，嚴重影響人民的生活。出現搶購糧食現象，一則是由於廣東等沿海省份因過多發展工業及房地產等造成耕地減少，二則是一些地方政府認為只要有錢，便肯定能購得需要的糧食，從而忽視了糧食生產。

全國部份地區糧價暴漲引起了中央警覺，為避免在市場開放下糧價大幅波動而影響市民生活，政府遂開展了以糧食為核心的農產品如原油、棉花及成品油等之購銷流通體制的改革工作。

在糧食購銷體制方面，國有糧食部門發揮糧食購銷主渠道作用，即根據國家政策收購糧食，將糧源掌握在政府手中，根據市場狀況批發予零售商，以調控糧價穩定市場，保證市場供應。（註二）

在實施流通領域體制改革的同時，政府於九四年六月上旬開始，大幅提高了政府的糧食收購價格，並相應大膽地放開了糧食的銷售價格，這項價格改革對調動農民種糧的積極性有很大幫助，亦是旨在改變城市與農村居民收入差距增加的趨勢的一項重要措施。

第三節 改革的成就與不足

九四年的多項改革中，財稅改革和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進展較為順利，新體制已開始穩定運作，然而，國有企業改革、金融體制改革，以

及個人分配與社會保障體制建設仍處於研究方案階段，明顯滯後。(註三)

一 進行較為順利的財稅及外匯改革

從九四年實施一年分析，新稅制框架已形成，按稅種劃分收入的分稅制改革已實現，全年財政運行正常，對改善國家財政狀況產生積極影響。

外匯體制改革方面，成功地實現了官方匯率和外匯調劑市場匯率併軌，取消雙重匯率制，初步形成以外匯指定銀行為交易主體的銀行間的外匯交易市場，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浮動匯率制。九四年外匯市場運行正常，銀行間外匯市場交易活躍。在外匯市場機制下，人民幣匯率不單沒有出現下瀉，反而穩中有升，國家外匯儲備增加。統一人民幣匯率的客觀效果，實質上就是讓人民幣先貶值，由外匯改革前的官定匯率五點八元人民幣兌一美元，貶值至八點五元人民幣兌一美元，這有助中國的出口，效果十分大，全年出口增長總額比九三年增長高達百分之三十一點九。此外，九四年國家的外匯儲備已超過五百億美元，比九三年增加逾三百零四億元，主管中國經濟的副總理朱鎔基也說：「這是萬萬沒有預料到的。」(註四)

二 滯後的改革——企業、金融體制、社會保障

上述三個方面的改革明顯滯後，仍無法有效地普遍推行

國有企業，尤其是大中型企業仍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企業機制尚沒有根本性的轉變，企業依然是在原行政主管機關的領導下，由政府直接任命企業的管理人員，政府與企業的「父子依附關係」仍無改變，企業在政府保護的「父愛主義」下，軟預算約束問題仍舊存在。

在金融體制改革方面，中國人民銀行(即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尚未落實，中國人民銀行仍需運用傳統的直接控制手段，通過貸款限額來控制貨幣供應，而在市場經濟下所採用的公開市場操作、運用票據貼現率及調整存款準備金率的間接調控貨幣供應量的手段仍未能運用。

此外，在國有專業銀行商業化方面，亦進展緩慢由於國營企業嚴重虧損，銀行面對龐大的壞帳負擔。再者，貸款利率市場化步履艱難，專

業銀行在貸款利率極低乃至負利率的狀態下，只得通過行政手段來分配貸款，在這種行政權力分配資金體制下，銀行工作人員的腐敗行為無法制止。

在社會保障制度方面，中國市民一向缺乏自我保險的意識。此外，國家和企業一方面對部分人士照顧包攬過多，如醫療等保障由於濫用情況普遍而出現很大浪費。另一方面是社保覆蓋面小，只集中照顧主要是國有企業的職工，而城鎮及農村的勞動者，在養老、醫療及失業等方面的權益得不到保障。再者，各級政府由於財政困難，以及社會保險管理體制不善，竟出現了挪用社會保險金炒股票及房地產等情況，造成社會保險基金難以收回，使社會保障制度難以為繼。在這情況下，政府需有強大的財政支持並作出徹底的改革，方能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然而，在政府財政存在龐大赤字的壓力下，九四年的社保改革並無突破性之進展。

企業、金融體制及社會保障改革緩慢，反映了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已進入最核心及艱難的階段。經濟體制內各個環節如企業、金融、財政及社會保障制度等實際為一互相聯繫及制約的系統，各項改革須互相配合，某一方面改革的滯後將影響全局的有效運作。而在各個環節中，企業改革佔有最重要的地位，假若企業不對其經營決策負責，只負盈不負虧，則銀行始終要面對很大的企業壞賬風險。如果容許企業破產，而這些企業又負債深重時，則銀行的損失將更大。當企業沒有作出真正的經營機制改善，轉虧為盈，則銀行根本無法像外國市場經濟般，朝銀行商業化方向發展。同一道理，假若企業自恃有政府的最後支持，盲目投資，而對銀行貸款的需求不隨利息的升降而調整，而只顧爭取貸款，那樣，利率機制就不能使資源分配合理化。

基於上述原因，只有在作為整個經濟體制核心及細胞的企業狀況能真正好轉後，銀行狀況方能根本好轉，國家財政能力方能真正加強。當然，國企問題，也不僅是國企本身就能解決，而有賴於各方面的配合，例如國企經營失敗要破產，為緩和工人失業而引發的社會震盪，則社會保障制度就一定要推行。朱鎔基曾指出：「企業要破產，工人轉業搞別的。企業要裁人，就要有社會保障制度。」（註五）

第四節 對九三年實施的宏觀調控的總結

一年多的宏觀調控成功地抑制了中國經濟過熱形勢，然而，從上述企業、金融等環節經濟改革滯後情況可得知，企業由於仍存在軟約束預算，缺乏有效的風險機制，又缺乏改善經營的動力，使宏觀調控的效應不能牢固，只能治標，不能治本，一旦遇上適當氣候，如政府同意大幅放寬銀根，加速審批投資項目以刺激經濟時，企業的投資飢餓症又會舊病復發。

此外，由於仍缺乏社會保障制度，企業無法破產，經濟格局無法改變，經濟現存結構調整見效甚微。

除上述深層次的改革問題外，中國經濟運行中亦面對通貨膨脹、農業落後、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各階層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及生產要素市場發展滯後，無法有效配置資源等問題，這將有待深化改革才可得到解決。

註 釋

- 註 一 請參閱1.《人民日報》〈一年來宏觀調控的回顧和啟示〉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六日；2.蘇寧〈一九九四年我國經濟回顧與一九九五年經濟發展趨勢〉，引自《一九九五中國經濟展望》國家信息中心編一九九四年，第21頁；3.一九九四年國民經濟主要統計資料《經濟導報》總2410期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三日出版。
- 註 二 何亮亮〈中國改革攻堅初戰告捷〉（上，下）《文匯報》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三及十四日
- 註 三 吳敬璉一九九五年中國經濟改革的重點，中國經濟體制的下一步改革國際研討會文件之二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三至二十六日
- 註 四 〈朱鎔基去年十二月底的內部講話〉《開放》雜誌，一九九五年二月
- 註 五 《信報》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第十篇

江澤民——挑戰與回應

(1995-1997)

第五十八章 江澤民面對的挑戰(一)——十大內政問題
(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七)

第五十九章 江澤民對的挑戰(二)——外交形勢與「中國威脅論」
(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七)

第六十章 鄧小平的交班計劃與江澤民的治國總方針

第六十一章 新領導層的組織策略——軍權、建黨、民主制衡

第六十二章 反腐敗、反罪惡，與思想道德建設

第六十三章 台海危機、釣魚台糾紛及新時期中國外交政策

第六十四章 經濟建設——跨越九七年的經濟持續發展

第五十八章 江澤民面對的挑戰（一） ——十大內政問題（一九九四—一九九七）

導 言

踏進九四年，即江澤民當中共總書記已有五年的日子，隨著鄧小平年邁引退，中國開始進入後鄧小平時代。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領導人最關的任務是需要面對在政治交接、經濟體制全面轉軌及迅速發展的進程中所產生的複雜而充滿荊棘的挑戰，盡快建立統治權威，保證實質的權力交接能順利進行。

這章主要討論在九十年代中下旬中共領導人面對的十項政治、經濟及社會問題，下章則討論外交，而在往下幾章會進而分析新一代領導人的治國總方針和各項具體政策，並會討論幾個影響深遠的中共中央委員會決策及幾項重大的政治事件。

總的來說，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領導面對的挑戰包括下列十點：

一 政治順利交班，建立新領導層統治權威

在各國共產黨政權的歷史上，一個最艱巨的政治挑戰就是繼承問題。在中共歷史上，可以說所有過往既定的接班人，包括劉少奇、林彪、華國鋒、胡耀邦及趙紫陽等，由於缺乏實際權力及軍事基礎，他們不是被最高領導人（即毛澤東與鄧小平）所放棄，就是在權力繼承的過程中失敗。雖然在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及在九二年十一月十四大後，鄧小平向江澤民交權，讓新領導層釐定所有重大決策，並對其統治作出支持，然而，國內外始終把注意力放在鄧小平身上，面對此不健康的情況，鄧小平在生前曾清晰的指出：

「我的份量太重，對國家和黨不利……國際上好多國家把對華政策放

在我是不是病倒或者死去了上面……是很不健康的……一出事就不可收拾。」^(註一)

為著權力的順利交接，鄧小平指出：

「讓國內外都知道，不是我們這些老人起了甚麼作用，是現在在第一線工作的同志出色，是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集體領導真正挑起了大樑。一個有堅強核心的集體領導，一個有權威的中央，這兩條特別關鍵。我們不在了，這兩條就能保證大局穩定，就能把改革開放的道路繼續走下去。」^(註二)

新領導層與鄧小平一樣，亦了解在鄧小平身後要真正建立統治權威，仍須走邁長的路。

副總理朱鎔基曾指出：

「我們現在能在中央幹一點事，還是吃前代人的老本，托同志的福，如果老同志不在了，我們何以自處？所以要抓緊時間多做些事，做些令全國上下都信服、都叫好的事，建立權威還是靠這個！」^(註三)

基於此，儘速團結全黨、保持政令暢通、牢固掌握軍權、改善經濟、提高人民生活和懲治腐敗，乃中央爭取全國民心、建立權威的優先工作。

二 中央與地方的矛盾

第三代中共領導人面對的另一個問題，就是中央政府的權威被嚴重削弱。九四年三月，中共高層從上海、四川、北京、廣東、遼寧等地抽調了一批幹部就黨的建設、政治體制改革、鄧小平身後的局勢預測、經濟宏觀調控及中央與地方關係等幾個議題開展調查活動。^(註四)根據調查的結果，中共高層認為「許多政令、政策得不到貫徹執行，中央說話不算數，各級黨政機構各行其是，分離傾向日趨加劇。」^(註五)中共元老陳雲曾形容這種狀態為「各路諸侯太多，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各自為政。」^(註六)江澤民亦指出：

「在改革和發展中一個突出的問題，是要解決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如果地方保護主義嚴重，就會阻礙國家的發展。現在有些地方保護主義抬頭。」（註七）

中國在財政「分灶吃飯」的體制下，各地方政府為了維護本地區的利益及收入，往往互相封鎖，防止本省地區的短缺資源外流，並加快本地區較高增值的加工工業發展，以充份利用本區的資源。此外，並設置關卡，防止外省製成品的入口，窒息區域間的聯合協作，影響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和優化組合。在此情況下，封鎖壟斷促使各區域自成完整經濟體系，「大而全，小而全」，分工及規模效益十分低下，重複建設多不勝數。再者，各區域為爭奪各種資源，亦展開了一幕幕羊毛、蠶繭、生豬、桂皮等爭奪戰，各外省均以高價爭相擁購某地區之資源，而此地區之政府又以種種方法制止資源的外流，造成互相爭持之局面。

地區保護和封鎖的結果，造成地區分割，形成了按行政區域劃分的分割市場，嚴重阻礙了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形成「諸侯經濟」。然而，「諸侯經濟」只是一種較生動的比喻，不能理解為中國已出現了諸侯割據的局面，正如朱鎔基指出：

「中國在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問題上，不存在哪個地方敢鬧獨立的事情。」「一些政策一牽涉到地方的利益，往往不能很好地貫徹落實，要三令五申，費很大的勁。但這只出現在經濟方面，而在政治方面。」（註八）

雖然如此，為使中央政令暢通，從而建立新領導層權威，並形成全國統一的市場，完滿的處理中央與地方關係遂被提上新領導層的日程。

三 黨政軍基層組織散漫，凝聚力下降，嚴重阻礙政府政策的推行

九四年五、六月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多名常委紛紛往各地考察，發

現黨的基層組織中滋生許多嚴重的問題，如思想渙散、黨風不正、以權謀私及凝聚力下降等。^(註九)據市民反映，當前社會治安空前惡化、社會風氣空前不正、信仰危機空前嚴重、黨政官員空前腐敗、黨的基層組織空前渙散，正是這五個「空前」，導致黨的凝聚力空前下降。江澤民對黨的基層組織渙散情況深表憂慮，他曾強調：「基礎不牢，地動山移。」^(註十)

令中央領導人更為震動的，就是在軍隊中亦出現類似情況，據中共軍方領導人和軍投的透露，軍隊出現了「軍不像軍、軍不管軍」的嚴重情況：

- (1) 是鄧小平過往指出的腫(機構臃腫)、散(紀律性差和搞派性)、驕(脫離群眾的驕氣)、奢(追求享受的生活方式)、惰(意志衰退)等五大問題仍未全部糾正；
- (2) 部隊經商導致地方主義、走私、貪污腐化日益嚴重，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並損害了本身形象；
- (3) 落實命令流於形式主義，部分軍隊更離開正式法規條令搞「土政策」；
- (4) 官僚主義作風惡化了官兵關係，侮辱士兵人格、打罵體罰士兵和侵佔士兵利益的行為時有發生。^(註十一)

在上述背景下，中共在九四年九月底舉行的十四屆四中全會中承認：

「面對新的情況，我們的工作還不適應。一些地方和單位黨不管黨、治黨不嚴、紀律鬆弛、組織渙散，思想上組織上作風存在著種種不容忽視的問題。」^(註十二)

四 腐敗貪污嚴重

據中共中央黨校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份聯合調查報告顯示，中國當前最受詬病的社會問題，除了物價，就是腐敗，這兩個問題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兩大因素。^(註十三)就貪污腐敗問題，江澤民曾警惕：

「一些領導幹部包括有的高級幹部……他們有的……以權謀私，搞錢權交易；有的利用職權侵佔國家、集體財富。……他們的行為已經嚴重損害我們黨和政府廉潔奉公，執政為民的形象……如果以權謀私，勢必喪失民心」，「失去民心，腐敗盛行，政權就保不住了。」（註十四）而中共元老彭真更驚呼：「腐敗之烈，使中共的執政地位，四十多年來面臨最大的挑戰！」（註十五）

雖然中國政府在九三年下旬提出反腐敗，在九四及九五兩年，亦不斷將各項行動深化，但從經已查處的腐敗大案中顯示，中共政權的腐敗問題已愈來愈多涉及高級幹部，民眾對腐敗的憤怒情緒也愈來愈大。據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思卿分析，從檢察機關查辦案件的情況看，當前中共部份官員「以權交易」為基本特徵的貪污賄賂犯罪，出現了一些新特點：（註十六）

- (1) 犯罪分子具有更大的貪婪和冒險性。盡管司法機關加大了打擊力度，但仍有人挺而走險。例如九四年查辦的案件有大約百分之六十是在當年作案的。
- (2) 經濟熱點部位以及管理經濟的宏觀調控、司法和行政執法部門的發案增多，而很多案件都是以跨地區及跨部門的形式出現。此外，犯罪手段的技術性、專業性強，利用電腦和有組織犯罪增多，新形式不斷出現，而在案背後往往還隱藏著更大的要案。
- (3) 一些犯罪分子用錢鋪路，在國家幹部中尋找靠山，編織關係網，而一些秘書或親人憑藉父輩、丈夫或領導幹部的權力，下海撈錢，其中更出現官官相護，搞地方保護主義，瞞棄不報，設置障礙，阻礙查處。
- (4) 將國有資產變為集體資產，再變為私人財產，並將財產移往境外，或利用公款吃喝玩樂，種種吃公家的集團畸形消費，每年高達一百億元人民幣以上。（註十七）
- (5) 利用隨意性審批的權力，在一些沒有制度明文規定事件上，可批可

不批；可以多批，也可以少批；可以早批，也可以遲批等的權力，來接受行賄。朱鎔基曾一針見血的指出：「一些部門之間爭來爭去都是爭這個權。」^(註十八)

九五年四、五月期間，中共高層曾告誡各級幹部在改革開放進程中，要特別過好「五關」，從這「五關」描述中，也可從側面形象地理解各級官員的腐敗情況：

第一、「名位關」——名位思想嚴重，熱衷於擴大個人影響，整天考慮自己陞遷，伸手要官，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第二、「權力關」——濫用職權，以權謀私，利用權力侵吞國家財富、安插親信及為自己親朋好友找肥缺，有的更利用職權欺壓群眾，稱王稱霸。

第三、「金錢關」——錢迷心竅，收受禮品，官商勾結，違背政策，為行賄者疏通關節，從中牟利。

第四、「色情關」——燈紅酒綠，紙醉金迷，出入色情場所。

第五、「人情關」——對親朋戚友，只講感情，不講原則，對他們的違法行為不鬥爭，更包庇縱容；或為他們的提拔，調動、處分四處說情。^(註十九)

據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於九七年三月呈交人大的工作報告中，指出九六年被立案偵查涉及腐敗的處級以上官員比九五年上升了約百分之十，這一方面反映了中國政府內貪污腐敗之風嚴重，以及中央推行的反腐敗行動的成效。

此外在查辦案的過程中，貪污、賄賂幾十萬、幾百萬，挪用公款幾百萬、幾千萬的案件佔相當的比例。報告還特別提出，少數國有企業負責人利用股份制改造、兼併、承包及出售等改制的機會，採取多種手段將國有資產壓價賣出，化公為私，導致國有資產流失，故九六年檢察人員在虧損嚴重的國企查辦經濟犯罪過程中，全年共查辦嫌犯三萬多人。

更令人擔心的是在執法監督方面，有的地方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少數不究，少數司法人員濫用職權，不依法辦事的現象仍然

嚴重。（註二十）

五 通貨膨脹嚴重

雖然中國領導層在九五及九六年成功將通脹控制在百分之十四點八及六點一的較低水平。但防止通脹高企，始終是新領導層在九十年代面對最嚴重的經濟問題。中國自從九二年鄧小平南巡開始，便連續幾年受到高通脹問題的困擾，九四年更出現了改革開放十六年來最高的通脹率，商品零售價格指數上漲高達百分之二十一點七，竟超過了八八年百分之十八點五的漲幅。

通脹幅度過大，使固定及低收入群眾的生活大受影響，由於這部分群眾佔中國社會的絕大多數，故導致社會怨聲載道。此外，物價上漲亦引起企生產成本增加，盈利減少，企業虧損更難扭轉。為拯救企業，政府只好增加支出以補貼企業，但這樣一來，政府改善財政赤字的難度亦加大。再者，在經濟運行方面，持續的通脹亦導致市場的價格訊號失真，在物價看漲的心理預期作用下，企業往往盲目擴大生產，無視改善效率及市場真正的需要，生產過剩及庫存過高的危險大幅增加。而在整個經濟環境緊張的局面下，亦影響外商投資大陸的信心，對吸引外資產生負面影響。

雖然高通脹對中國經濟產生不利影響，但九四年的經濟環境與八八年高通脹時的嚴重「供不應求」及瘋狂搶購情況有極大分別。國家計委主任陳錦華曾分析中國市場中「吃、穿、用」三個方面，「吃」是需求過旺，物價昂貴；「穿」是供求平衡；「用」是供大於求。（註二十一）國內貿易部統計的五百四十二種工業消費品中，「供大於求」或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佔了百分之九十五。從投資品市場分析，生產資料市場亦出現了供大於求的局面，九四年上半年，十六種主要生產資料實物銷售僅增長百分之四點四，比九三年同期回落百分之十三，企業庫存更有逐步上升的趨勢。

中國在九十年代中上旬出現了這種在「供求平衡」下出現嚴重通脹的反常現象，是由各種新時期經濟矛盾的綜合作用所造成的。（註二十二）

(1) 九二年鄧小平南巡開始，連續幾年固定投資和消費基金增長過快，導致貨幣發行太多，從需求拉動和成本推動這兩個方面引致物價上升。

固定資產投資過熱會從需求方面直接拉動生產資料物價上升，而亦必帶動消費過速增長。在一般情況下，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中會有百分之四十左右會轉化為消費基金，即企業以多發工資及獎金等形式，從消費方面加大社會的總需求。此外，這亦意味著企業內的勞動成本上漲，為彌補利潤減少，企業亦會提高產品價格以將額外負擔轉嫁予消費者，從而導致社會價格輪番上漲。

上述投資與消費的雙重膨脹，造成社會資金緊張，迫使中央的貨幣投放不斷加大，通脹情況更趨嚴重。

分析九四年及以後的高通脹尤需注意經濟過熱的滯後作用。中國的商品零售物價上漲，在時間上和經濟增長有半年到一年的「滯後期」，即經濟增長比物價上漲早半年至一年。舉例來說，一九八四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幅高達百分之十四點五，但當年物價只上漲百分之二點八，到八五年物價上漲百分之八點八，真正影響在一年後才出現。

「滯後期」產生的原因是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通常由投資帶動，首先受影響的是生產資料價格，然後才影響消費增長及零售物價上漲。九二、九三年的投資過熱，導致消費猛增，進出口貿易失衡，人民幣貶值，增加生產消費品的成本，經過一年多的「滯後期」，最終引起消費品物價大幅上漲。經過九三年推行宏觀調控，九四年中國的生產資料及工業消費品供需已趨平衡，生產資料價格亦已下落，但由於九二、九三年生產資料價格上漲滯後影響，增加了生產成本，推動了九四年的消費品物價上漲。

(2) 成本上升而推動的「改革型」通貨膨脹

九四年調高和放開價格的改革較多，包括糧棉、石油、化肥及運輸調價；煤炭價格放開及外匯併軌。此外，中國農業生產的基礎薄弱，形

成了從成本推動的「改革型」通貨膨脹。

九三年底財稅改革出台時，不少消費者及廠家，誤以為價外要增收百分之一點七的增值稅，故爭相提前搶購，使九三年底和九四年初，出現了一個漲價的高潮。

此外，九四年百分之二十一點七物價漲幅中的百分之六十，(即約百分之十三)，是食品類價格上漲帶動的。九四年六月政府調高糧價，隨即引起八月食品價格迅速上漲，形成九四年物價上漲的另一高峰。

九四年國家大幅提高糧食收購價格，主要糧食收購價平均上漲幅度高達百分之四十或以上，由於中國糧食的「銷售價」已經放開，收購價上漲即時通過「成本」及「比價」的因素，引起以糧食為原料的食品以及其他農副產品銷售價格的上漲。可以說，中國自九三年以來調高並開放糧價，對增加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帶來正面的刺激作用，然而在另一方面，這亦引致糧價及其他農產品價格的上漲。故此，朱鎔基曾指出：

「這是一個進行市場經濟改革的國家不可避免的，經過這一段必須的陣痛以後，物價指數就會逐步回落。」(註二十三)

另一方面，從農產品的供給來看，由於不少地方政府對發展農業有所忽視、投入不足，而開發區、房地產熱等也減少了一些耕地面積，再加上農用生產資料價格上升幅度過快，地方政府對農民作出不合理攤派與收費等原因，導致農民種糧的比較利益受損，影響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對農業生產造成不良影響。最後，九四年中國部分地區受災嚴重，不少農產品供應趨緊，亦引起市場價格上揚。

（3）流通體制及價格監督體系不完善

一些關係市民基本生活需要的重要商品中，國營企業經營比重過低，未能起到平抑物價之作用，在九四年的通脹中，趁機亂漲價、壟斷性漲價以謀取暴利等因素都對通脹起了很大的推波助瀾作用。

上述情況在肉菜產品市場表現最明顯，這類產品在八六年已基本由市場調節，然而，由於價格調控監督體制沒跟得上，國營商業亦大量

退出市場競爭，故使國家缺乏渠道發揮平抑物價之功能。舉例來說，北京的國有菜店從過往的一千三百多家減到三百家，個體菜販成了市場主角，形成某程度的市場壟斷，他們利用壟斷的有利位置，在農產品批發價上加價一倍左右，形成市場零售價，造成農民獲利不多、城市居民付出高價，菜販獲利甚豐的現象。故此，缺乏物價管理、交易缺乏競爭、以及國家沒有通過有效銷售渠道平抑物價，亦是導致副食品價格大幅上漲的主要原因。

六 農村情況不容樂觀

雖然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以來有迅速的發展，然而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運行中仍暴露出很多值得重視的問題，直接制約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故此，第三代領導人始終將發展農業放在極為重要的位置。

（1）農業滯後於整個經濟的發展，一些農產品供應趨緊

糧食方面，從九一至九四年四年中，有兩年減產，九四年糧食總產量雖屬歷史上較高水平，然而，人均（即中國平均每人）佔有量比八四年下降了十六公斤。（註二十四）與之同時，社會消費量卻大幅增加。進入九十年代以來，南方不少省、市的糧食產量呈下降趨勢，成為調進糧食較多的地區，影響到全國糧食市場供求的平衡。

棉花生產在九二、九三兩年連續減產，九四年雖增長百分之十三點六，（註二十五）但供求矛盾仍存在，部分棉紡廠因缺乏來料而被迫停產，嚴重影響財政收入和出口創匯。

此外，油料、糖料庫存減少，需要進口，而肉類生產增長速度仍趕不上市場需要。

由於農產品供求趨緊，構成消費品價格過快上漲，據江澤民指出：「肉、菜價格的上漲，使低收入居民很難承受，大專院校學生反映也很強烈。」（註二十六）

九五及九六年中國的糧食獲得較大豐收，然而，朱鎔基仍清醒的警

告，中國「農業的基礎設施依然薄弱，靠天吃飯的局面並沒根本改變。現在的糧食增產是年度性的，還不敢說能保持穩定增產，糧食的結構也不層合理。」故此，切不能盲目樂觀。（註二十七）

（2）農業基礎薄弱，耕地驟減

首先是農業基礎性投入總量不足。儘管中央政府一再提出加大對農業的投資，但實際上國有單位對農業的固定資產投資佔其全部固定資產投資比重下降，企業和個人對農業的投入亦缺乏長遠考慮，例如七八年農業投入佔總的基本建設規模百分之十點三，八八年下降到百分之三點三，八九年上升到百分之四，但到了九四年卻下降到百分之一點七。（註二十八）此外，農業信貸資金增長幅度也低於國家信貸總規模的增長幅度。農業投入不足、使農業生產條件停滯，而落後的農業基礎設施亦減弱了農業抵抗自然災害的能力，例如現有的水利建設大多是五十、六十年代修建，老化失修嚴重，防洪抗旱能力薄弱，影響農業生產穩定的發展。

另一個令人擔憂的情況是全國耕地面積萎縮，擋荒和亂佔耕地情況嚴重。九二年下旬以來，不少地區忽視農業生產，房地產、開發區佔用大量耕地，從七八到九三年，中國人口淨增二點二億，但耕地面積卻淨減六千四百多萬畝，九四年的耕地又再減六百萬畝，嚴重影響農業發展。（註二十九）

（3）農業「比較效益」低，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打擊農民生產積極性，並引致嚴重的經濟、社會問題。

從九零年到九四年，中國糧食平均價提高了百分之五十六點三，但同期農用生產資料價格上漲幅度卻高達百分之六十一點一。雖然九四年政府大幅提高了農產品收購價格，然而由於農村中物價迅速上漲，尤其是農業用生產資料價格過速上升，使農業比較利益過低的矛盾依然得不到徹底改善。

由於農民收入增長較慢，而農民到城市打工和發展鄉鎮企業，卻可

更快地提高收入，這樣一來，民工潮的規模必定愈來愈大。據估計，全國流動的民工至少有五千萬人，其中跨省流動的約二千萬，(註三十)民工潮普遍出現盲目無序流動(擇業無目標，信息不準確，流動性大，聽到哪裡有工作便趕到那裡)以及不穩定(農民在某地方及部門就業時間較短，城市出於社會穩定及治安的考慮，經常驅逐進城民工)的情況，對農業及整個經濟發展皆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

在九五年二月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江澤民提出工農業發展速度、城鄉居民收入及發達與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差距都在擴大，這情況如延續下去，將會產生嚴重後果：

「一是農產品供求矛盾將會更加突出，牽動物價上漲；二是農民收入增長慢，就難以如期實現農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的目標，這不僅會影響廣大農民的積極性，還將影響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三是如果農民購買力水平提不高，農村消費市場不能日益擴大甚至縮少，就會直接制約工業和整個經濟的發展；四是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經濟發展差距拉得過大，將導致整個經濟社會嚴重失衡。」(註三十一)

(4) 鄉鎮企業效益下降

由於鄉鎮企業普遍經營管理及技術水平不高，虧損面大，例如九四年一至九月份，鄉村工業企業的虧損面為百分之七點五八，比上年同期增加接近四個百分點，(註三十二)這表明鄉鎮企業必需進行技術改造，加強管理，方能在新時期中加強競爭能力，在農村中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帶動農民生活的提高。

(5) 農村存在不穩定因素

據江澤民指出，中國有「相當一部分農村基層組織軟弱渙散，有的處於癱瘓狀態，不起作用。有的基層組織被宗教、宗族勢力把持，甚至出現黑社會勢力和幫會組織。」(註三十三)一些鄉村中封建迷信抬頭，偷盜賭博成風，車匪路霸猖獗，犯罪集團橫行，使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得不到保

障，農村出現不穩定情況。

七 國企改革面對重重阻力

（1）改革開放以來國企面對的難題

企業是經濟體制最重要的細胞，負責組織生產，直接創造財富。中國自從一九五三年推行社會主義改造以來，企業便歸國家所有及控制，故國有企業於國民經濟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多數國企的管理及實力雖有所增強，但亦存在不少問題：

1. 虧損面大，政府財政流失。

國企面臨種種困難的一個綜合性指標，就是虧損國企的數量大，與非國有企業相比，國企增長速度緩慢，在虧損方面，虧損企業「按個數」計算所佔的比重甚大。這裡值得注意的是虧損個數比重大於產值比重。(註三十四)九四年末國企個數虧損面達百分之三十四點三，而到九五年五月，國務院副總理吳邦國指出虧損面已高達百分之五十點一。(註三十五)此外，在九一至九五年的「八五計劃」期間，工業虧損額呈急劇增加形勢，九一至九四年以每年百分之十四點二的高速遞增，四年累計虧損達二千三百多億人民幣，相當於八一至九零年累計虧損的兩倍，平均每年約有五百億元的利潤被虧損企業抵銷，沖抵同時期利潤總額的百分之四十七，而此中的工業企業多為國有企業。(註三十六)在上述情況下，國有企業作為國家財政主要來源已日漸枯竭，而虧損企業需要財政及銀行的支持，國營企業遂成為經濟持續發展的一大負擔。

2. 國有資產大量流失

國務院研究室為中共高層提供的一個報告中曾指出，八二至九二年十年間，共約有五千億國有資產流失。(註三十七)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部分政府機關、企業及外商，皆從各自利益出發來蠶食國有資產。九二年鄧小

平南巡後，一些握有權力的人，以經濟發展為名，通過批出資金、批物資及土地等等將國有財富輕易的轉讓到與自己有利益關係的組織手中，成為「千萬富翁」。而在九四、九五年，由於國有資產權界定不清，有些人利用權力倒賣企業，將國有資產價值大幅壓低轉予與自己有關係的「外方」，盜取更為豐厚的收入，成為「億萬富翁」，國家損失慘重。（註三十八）

（2）國企問題帶來影響

由於國企在整個經濟中的不少領域佔有近乎壟斷的地位，其缺乏效益、改革滯後嚴重制約著整個經濟發展步伐。

1. 影響中國經濟的競爭能力及國家調控功能的發揮

隨著改革開放，非國有經濟的高速發展及國際經濟的競爭，國有經濟面臨更為激烈的競爭形勢。若國有經濟在競爭中失敗，不單其主導經濟的作用將無從發揮，其大幅虧損更使國家有效調控經濟的功能也難以保存。

2. 中國宏觀經濟面對的問題如通脹、三角債、企業資金缺乏、產品積壓滯銷及財政收入減少等皆與企業效益欠佳有直接關係

國企產品由於未能適應市場需要而滯銷，以致造成企業積壓大筆資金無法回籠、無力償還債務及國家財政收入減少的局面。面對政府財政困境、企業間三角債大幅上升及企業資金短缺的情況，銀行被迫增發貸款以挽救經濟，這樣一來又將導致貨幣供應增加，通脹持續上升的困境。

此外，假若企業不能生產社會需要的產品，擴大市場供應，則不能從增加供給方面徹底解決通脹壓力。而企業改革滯後，無法調整自身產品結構，亦會使整個宏觀的經濟結構及產業結構的調整難以實現。

3. 企業缺乏效益，大大拖慢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

企業效益低落，制約著國家專業銀行轉變為依據市場需要而貸款的、自負盈虧的國有商業銀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銀行信貸資金根據

市場需要而分配，是優化資金配置、提高資金效益的重要條件。然而，由於眾多企業背負大量不良債務，但又不能破產，銀行只得為虧損的國有企業繼續「輸血」，以維持其生存，但這樣一來，國家專業銀行也難以貫徹擇優貸款、信貸市場化的原則。同時，一些國家專業銀行被企業拖欠大量本息，嚴重影響資金周轉，部分基層銀行更陷入困境，出現了支付危機，（註三十九）使金融改革無法開展。

（3）國企面臨嚴重虧損的原因

1. 統計、會計方面的原因

與非國企相比，國企基數較大，雖然改革以來國企增長的絕對量變動甚大、但與較大的基數相比，其增長速度顯得並不高。

至於在虧損方面，由於中國在九四年七月改變了過往前蘇聯的會計制度，新的會計制度把過往的假盈、虛盈實虧變為虧損，從而使虧損在帳面上顯示出擴大趨勢。然而實際上，正如副總理朱鎔基在九四年底指出的：「國有企業今年的虧損面不是擴大，而是縮小。」（註四十）

此外，朱鎔基亦指出企業有大有小，而中國的情況是越是中小企業越虧損。朱鎔基解釋：

「中國的中小企業很多是大躍進時代的產物，甚麼街道企業，甚麼縣辦企業，搞得很小，設備陳舊落後，包袱很重，離、退休人員很多，沒有不虧損的。相反，大型企業有國家投資，進行技術改造，虧損面很小。」（註四十一）

2. 負擔沉重

簡單地說，就是國企負重發展，而非國企則是輕裝前進，從而構成兩者在效益及發展速度上之差異。

- i. 稅賦。在九四年實行國內企業統一稅賦前，國企納稅負擔遠高於非國有企。此外，國家一方面對國企懲管嚴格，但同時國企的一些支出項目卻未能計入成本，造成國企稅賦負擔過重，據

有關部門估計，從八零年至九三年，預算內工業國企業上交的利稅和「兩金」、佔其實現利稅的比重平均高達百分之八十六。

(註四十一)

- ii. 利息。過往國企資金主要由財政撥款，企業通過國家的投資而成立。然而，自一九八三年國家推行「撥改貸」(即由撥款改為銀行貸款)，國家對國有企業基本沒有資本金注入，至使國企的資產負債率不斷提高，甚至出現了一批沒有資本金，全部靠貸款建成的企業。在這情況下，企業債務負擔迅速增加，國企的資產負債率平均達百分之七十以上。據國家體改委調查的十六個城市分析，這些城市長期貸款餘額為一千二百五十多億元，若按三年期貸款利率百分之十二點二十四計算，一年需支付的利息就高達一百五十三億元，相當於這些企業當年實現利潤的百分之五十六。由於利息負擔沉重，有些企業不敢貸款，形成資金短缺，影響企業正常運作和發展後勁，有的貸了也償還不起，形成銀行須面對嚴重壞、呆帳的局面。
- iii. 企業須負責大量應由政府承擔的社會職能。國企長期推行低工資、高就業政策，現時國企的冗員一般高達三分之一。此外，一些老企業的離退休職工多，其相應地需支付的養老金，醫療費也多，有些企業「在職」與「離退休職工」之比為1:1，甚至達到1:2及1:3，大大加重企業的支出。
- iv. 攤派。國企經常承擔各類贊助、捐款、各方面政府部門的攤派，名目繁多。不少廠長都感慨地指出：「大企業是誰都想交一口的『唐僧肉』。」(註四十二)

3. 非國有企業的不公平競爭

在過往計劃經濟下，大型國企在市場具壟斷權，輕易獲得高額利潤。然而，自實行改革開放後，國企壟斷地位面臨鄉鎮企業、三資企業及外來商品的競爭，而國家為鼓勵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對這類非國有企業採取了特殊的優惠和稅收政策，例如對某類型的新辦企業實行減免稅收，而

受減免政策優惠的企業更經常通過種種方法延長享受優惠政策。此外，非國企的偷稅、漏稅問題嚴重。由於非國有企業與國有企業出現不公平競爭，使國企在經濟效益、發展速度和資金積累等方面顯得遜色。

4. 國企產權虛置，企業管理不善

在「國家所有制」的國企制度下，誰行使「國家」這個所有者的權利，對企業的財產承擔責任，始終混淆不清。在國有產權虛置情況下，廠長只關心自己個人及企業職工即時生活的改善，而對企業的長遠發展後勁及資本積累則較不關心，企業大多不願意投資在科研及人才培訓方面，出現了企業行為短期化傾向，嚴重制約企業的長期發展。

由於產權虛置，企業缺乏有效的責任制，以致不少企業管理混亂，制度鬆弛，浪費嚴重。企業內部的勞動、人事、工資制度改革無法開展。企業內部管理制度中亦缺乏競爭、激勵和約束機制。

由於管理不善，企業往往決策失誤，盲目決定投資項目，出現投資飢渴，重複建設並導致生產能力過剩，投資效益差，根本無法面對進口商品和外資企業的強力競爭。這具體表現為對市場資訊掌握不足，缺乏預見性、項目可行性論證不充份，導致決策時市場的產品仍暢銷，但到真正投產時，這些產品在市場上可能已過剩而滯銷。此外，企業不從自身長處特點出發，而是看到甚麼賺錢便即時改產，盲目上項目，由於市場調查工作落後，生產出來的東西往往銷不掉而積壓，資金無法回籠，企業間出現大量「三角債」的拖欠現象。^(註四十四)就企業內部管理鬆弛及短期化傾向的問題，朱鎔基曾形象的批評：

「領導班子不是真正去辦好企業，而是到處亂跑，追求時髦，出國考察，到處炒股票，不務正業。企業技術落後，又不重視改造，盡去搞生產關係去了，生產力不去抓。」^(註四十五)

（4）企業改革目標及難點

中國政府充分理解企業改革的重要性，故改革開放十九年來企改方案

不斷，而在九三年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改革五十條中，明確提出國企須進行產權改革，明晰產權關係，並提出企業擁有全部的「企業法人財產權」，不受政府干預，依市場規律經營，自負盈虧，在自由競爭中優勝劣敗，資不抵債的企業依法破產。（註四十六）

雖然政府為企業改革提出了完整的架構，然而，在推行企改的具體運作中，改革者卻感到障礙重重。基於下列原因，企改無法有突破性的展開：

1. 政府職能轉變遲緩，各部門對企業干預仍過多，企業自主權無法落實

國企要成為自負盈虧、自主經營的法人實體，則政府必須真正轉變職能，實行政企分開和政資分開。然而，一些政府部門仍然採用計劃經濟的辦法管理國企，把國企視為其部門的財產，即使它們虧損累累，也不願意對企業放權，並採取種種手段截留國家賦予企業的自主權，對企業進行不合理干預，妨礙企業經營機制轉換和制度創新。

現時仍有政府部門要求企業根據對口的政府管理部門設置機構，造成國企內部機構臃腫；眾多政府部門仍對國企進行種類繁多如稅務、衛生、消防、計劃生育、質量等幾十項的檢查評比，同一內容有時還重覆檢查；某些部門仍不適當的控制企業自主經營範圍內的權力，不須報批的，也要層層報批。（註四十七）在政府嚴重的干預下，企業無法自主經營，國企改革無從落實。

2. 產權評估困難，導致產權難以界定，阻礙了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

產權界定是明確產權關係的大前提。然而，由於長期以來國企資產數量模糊不清，產權關係紊亂，給界定國企產權帶來極大困難。

在盤算國企資產方面，在評估企業的固定資產時，往往只參考某項資產購置時的原值，和扣除折舊後的淨值，而沒有按重置價格來評估企業的資產。此外，在考慮資產時，往往不考慮債務，缺乏淨資產的概念，帶

來計算資產值時出現很大的偏差。再者，中國長期以來皆忽視無形資產，對無形資產之評估也缺乏科學根據。最後，就是土地使用權作價入股及其帶來的問題，過往企業佔用的土地往往由政府無償或以極低微的徵費而調撥使用，然而，根據國家最新規定，企業涉及國有土地使用權時必須作價入股，這樣就即時牽涉假若國家收回土地，企業可能無法繼續經營；或土地使用權期滿後，國家有權收回土地及其上面由企業出資興建的建築物，或國家要企業繳付很高的地稅才容許企業繼續使用國有土地，這種種情況皆會使企業及其股東的利益大受損害。（註四十八）

除卻國企資產難以評估外，國企產權關係紊亂，即企業資產的歸屬權爭論，也是另一大問題。某些地方政府提出：有些國企資產的形成，與地方的減稅讓利及一些政策有關，所以應撥一塊歸地方所有。而有些企業又提出：企業中的國有資產有一大塊應歸企業所有，不應屬於國家，企業指出自從一九八三年後，國家沒有再把資金投入企業，企業的資金全來自貸款，因此企業認為償還貸款本息後而形成的資產應歸企業所有。

產權關係紊亂一個較明顯例子為上海匯麗集團公司，此企業在八十年代初靠三萬元銀行貸款起家，以後一路迅速發展，成為規模甚大的多元化經營集團公司。國家對此企並沒有注入資本金，三萬元貸款亦早已償還銀行，但由於當初成立時掛了一塊全民所有制牌子，現時這企業的產權界定就成為一件異常複雜的事情。（註四十九）

由於上述國企資產底數不清及產權關係紊亂的兩大困擾，國企清產核資工作進展緩慢。有關法律、法規及條例亦未臻完善，影響著國家管理國企內的國有資產，從而影響國有資產保值、增值體系的建立。正是基於這個原因，國有資產管理上出現了幾個無法解決的嚴重問題，分別是：

- i. 國家所有、管理責任不明確，造成大量國有資產流失，而在追究責任時，竟然搞不清應由甚麼人負責；
- ii. 在企業內國家所有者代表缺位，出現缺乏所有者在企業內部對

國有資產的監督，使企業在出現短期或非正常行為如盲目投資、不合理的增發工資等時，國家根本缺乏代表來保障國家資產的權益與增值；

- iii. 由於產權代表沒進入企業，以及企業再發展所需的資金仍要由上級主管部門批準，故企業「需要由所有者作決策」的權力依然留在政府，而不在企業的董事局，在這「政資不分」的情況下，企業重大決定就得通過政府內不同部門分管審批，政府部門遂對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加以干涉，但這些政府部門卻又不承擔干預後果，使企業狼狽不堪。（註五十）

3. 昂貴的企業改革成本

要解決企業內的冗員、辦社會、以及債務的包袱，必須籌集改革成本，在此基礎上，政府方能使企業破產、兼併機制得以順利進行，以達經濟結構（針對現存資產）調整的目的。

此外，要使國企能輕裝上陣，與非國有企業進行公平競爭的一個大前提也是國企能卸下各種沉重的包袱，並改善設備陳舊、技術落後的情況。然而，要解決上述問題，需要有大量的資金支持，但這對於財政收入已日漸枯竭的中央政府來說，是一個十分大的難題。副總理朱鎔基曾於九四年底指出：

「如果不形成企業的破產機制和裁人機制，國有企業的效益要想有很大的改變總是困難的……企業要破產，工人轉業搞別的。企業要裁人，就要有社會保障制度。」（註五十一）

然而，在國企的富餘人員平均高達三分之一、企業長期虧損及負債纍纍、中央政府又財政困難的情況下，中國的社會保障體制改革進展十分緩慢。由於冗員過多及支出過大，長期以來，即使企業的社會保險費率已高達國際公認的百分之二十的警戒線，但企業職工醫療、養老、待業保險費用仍然不足，造成這幾項費用大量超支。而在社會上，也缺乏有效安置、吸收企業分流人員的能力。在缺乏社會保險的情況下，大規

模的失業將引發社會動盪，使國企改革投鼠忌器，不敢大量裁減冗員，無法按經濟規律辦事。

此外，現時國企大多債負沉重，資產負債結構極不合理，不少國企根本無法償還沉重的本息。目前企業在轉軌、改制過程中往往使用「金蟬脫殼」之計來擺脫債務問題。有些把企業「分裂」為很多小企業，而把債務仍掛在老企業的空殼上。另一些企業去工商部門領取新的營業執照，將承擔債務資產損失的責任推向原企業，讓其走上破產之路，而新註冊的企業則利用原企業的資產啟動經營。

以上逃債的結果使銀行貸款被懸空而出現大量呆帳，銀行信貸資產大量流失，這不單影響了專業銀行的正常運作，更由於銀行的資產絕大部分來自存款，尤其是個人存款，故若國企債務問題處理不好，極有可能引起整個社會的信用危機。

據大陸權威經濟部門預測：九五計劃期間進行國企改革的成本估計高達五千億元人民幣，這其中包括由政府注資以降低國企的資產負債率，增加對國企的技術改造投入，推動企業技術進步，加大分流國企冗員的力度，以及為十八個試點城市企業破產準備衝銷呆賬準備金等等（註五十二）。

4. 意識形態阻礙國企改革

基於思想觀念的歷史慣性、維護既得利益以及維護共產黨絕對執政地位等考慮，部分幹部及理論研究工作者皆對國企進一步改革出現抵觸情緒，他們擔心國企改革會削弱公有制地位，影響國有經濟主導經濟的作用，導致國有資產流失（部分人認為國企中的設備、廠房就是實實在在的國有資產，一旦這些實物性資產被變賣，國有資產就沒有了，然而，他們卻看不到政府可通過賣出資產而掌握更多資源，運用在其他更有效益的方面），喪失社會主義下傳統國企為職工提供「鐵飯碗、大鍋飯」的優越性，從而影響政治和社會的穩定性等。

上述幾項改革面臨的障礙皆使國企進一步轉換經營機制舉步困難，促使中央在一九九五年期間採取更務實的方針以回應上述的挑戰。

八 就業問題嚴重

一向以來，中國政府採取「高就業、低工資」的就業方針，以維持社會穩定。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由國有企業吸納每年新增的勞動力，而造成企業及政府機關皆冗員充斥，不充份就業情況嚴重。

然而，由於人口不斷增加及經濟發展形勢出現變化，中國失業及不充份就業的困境日趨嚴重。據有關統計資料顯示，九五年上半年職工失業人數已達四百八十萬人，失業率達百分之二點八。（註五十三）到九六年六月底，失業率更上升百分之零點一，達百分之二點九。（註五十四）在不充份就業方面，據國家科委調查顯示，國企職工平均每周投入的有效工時僅佔原先制度工時的百分之四十至六十，佔五日工作制制度工時的百分之四十八至七十二。根據勞動部信息中心統計，九四年底中國國企職工1.1億人，富餘總數在三千萬左右（其中公開閑置約1500萬人，隱性閑置為1,500萬人），佔全部職工人數的百分之二十八。（註五十五）

城市中嚴重的失業及不充份就業情況，不單增加了企業的生產成本，降低勞動效率，更加深社會上不安定的因素，而下列情況的存在，更使我國的就業形勢不容樂觀：

（1）勞動力供求矛盾形勢持續存在

中國擁有十二億人口，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勞動力供給大於需求的形勢客觀上不會改變，據勞動部門預測，中國每年新增的城鎮勞動力為一千萬；農村剩餘勞動力跨地區流動約為二至三千萬；在〈破產法〉實施及國企停產半停產情況下，國企中三千萬富餘職工安置問題將更形突出。（註五十六）

在巨大勞動力供給面前，由於國企已大幅虧損，無能力再吸納新的勞動力，而鄉鎮、私營和個體工商業在現階段面對的經濟不景氣，不但不能吸納更多勞動力，反而會因無力經營而分流出大量失業者。

(2) 國企改革與城鎮安置就業的矛盾

九五年中國開展了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主要內容的新階段經濟改革。現代企業制度中重要的一條是落實企業用人權。為加強企業的經營效率，企業必定會對現有的資本和勞動力重新組合，對不必要的就業「存量」進行必要的排擠。若國企破產機制真正形成，則會有更多員工由於企業破產而被推向社會，使就業形勢更為嚴重。

(3) 勞動生產率提高與增加就業量的矛盾

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經濟增長和投資的就業邊際效益呈遞減趨勢(即企業生產效率的持續提高會減少企業吸收勞動力的能力)。例如七八至八七年相對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為0.4618，然而到了八八至九三年這個就業彈性就大幅下降到0.2132。(註五十七)

顯而易見，雖然隨著經濟不斷發展，就業規模不斷增加、但由於新技術、新工藝的使用，減少了對新增勞動力的吸收，國民經濟每新增一個百分點，其帶來的擴大就業作用卻逐步縮少，這亦加大了安置勞動力的難度。

(4) 企業停產、半停產情況嚴重

自從八九年以來，由於中國在其中幾年實行了經濟緊縮政策，使部分國有和鄉鎮企業經營困難，出現不同程度的停產半停產，企業職工長期「在職無業」現象日益嚴重。據全國總工會調查顯示，九三年為三百萬人，九四年上升為四百五十萬人，大量職工被迫長期放假在家，使大量勞動力處於閑置，既造成了勞動力的浪費，也增加社會的不穩定。(註五十八)此外，許多企業經濟效益差，長期拖欠工資，例如黑龍江省九六年上半年拖欠工資達十七億元，本溪市有些企業拖欠長達五十九個月，在通脹環境下，拖欠現象的存在加大了工人的不滿，更使他們成了新的城市貧困群。

（5）勞動力市場不完善、失業保險不健全與轉變就業機制的矛盾

雖然改革開放十六年來，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有所發展，但遠不能適應就業機制轉變的需要。一些國企廠長反映：「國有企業只有職工炒老板，沒有老板炒職工。」^(註五十九)其主因是國企對在職職工於福利、保險和住房方面有很大的保障，而由於失業保險制度的不健全，職工一旦失業，失業人員只能領取很少的失業救濟金。例如河南省一個對六千多名失業職工的調查顯示，有百分之三十四的職工靠節衣縮食和變賣家產度日，有百分之二十職工靠親友接濟生活，有百分之四的職工靠借款和揀破爛為生，有百分之三點三的職工靠救濟金維持，有個別人被迫沿街乞討。^(註六十)

另一個現實情況是，在勞動力供給遠大於需求的情況下，對許多國企的中年職工來說，退出國企就意味著長期失業，令他們很難接受。東北的廠長向計委的官員反映：「有時好不容易處理一個人，結果街道和派出所又把他送回來了，要求我們從維護社會和家庭穩定的角度重新進行安置，並說難道你們企業就只多這一個人？」^(註六十一)

（6）農村剩餘勞動力增加及民工潮，對就業及社會穩定構成壓力

七八年改革開放以來，城市經濟及沿海地區快速的發展，為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作出巨大貢獻。在七八至九四年間，農村中的鄉鎮企業就業人員增加了近一億人，但基於農村人口基數仍然龐大，並不斷產生著新的勞動力，現時在全國的農村人口中，仍然有一億二千萬的剩餘勞動力。^(註六十二)

令人憂慮的，是鄉鎮企業現時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吸納勞動力增幅銳減，八三至八八年鄉鎮企業每年平均能增加就業量高達一千二百多萬，但在往後的發展中，平均每年只能增加就業量不到四百萬人，再加上近幾年出現了資本替代勞動的趨勢，鄉鎮企業原有「離土不離鄉」模式

對吸納農村的剩餘勞動力之功能愈來愈小。

由於農民對城鄉之間和地區收入差距的預期遠高於勞動力轉移費用，因而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趨勢日益擴大，形成日益洶湧的「民工潮」，造成嚴重的交通及治安問題。

九 貧富縣殊與城鄉差距日益擴大

(1) 人民收入差距擴大的情況

隨著改革開放，市場經濟進一步發展，競爭日益激烈，社會分配不公增加，這集中反映在貧富和城鄉差距的日益擴大，高低收入層的分化亦日漸明顯。

據國家計委人力所的調查結果顯示，高收入層主要由十四類人員構成：股票證券的獲高利者；部分收入高的個體工商戶；部分私營企業主；部份新辦公司的負責人；部分經營者與承包者；部份「三資」企業中的中方管理人員；緊缺的專業人才；承包開發科技成果的科研人員；出租汽車司機；部分銀行工作人員；經濟效益好的企職工；部分從事第二職業的人員；再就業的部份離休人員；以及出場費很高的歌、影、舞星。(註六十三)

與高收入層對比，一個低收入層亦在形成，農村的低收入者主要是中、西部地區的貧困農民，中國仍有八千萬的農村居民溫飽問題未能徹底解決。據九四年上半年的統計，城鎮中人均月收入在103元以下的居民有二千萬人，其中大部分為經濟效益不好的國有、集體企業在職職工家庭和退休職工家庭成員。(註六十四)

一九八五至一九九五年，城鎮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比差(以後者為1)從1.7:1擴大到2.5:1，這還不包括城市居民在住屋、醫療、福利、物價等方面所享受的補貼和待遇。(註六十五)

貧富差距的擴大是與城鄉和地區差距擴大密切相關的，無論是農村還是城鎮居民中的高收入者，大部分皆集中在東南部沿海地區，而低收

入層則主要集中於中、西部落後地區。另一個值得分析的現象為高、低收入層的群體特徵，若以傳統的企業、事業、機關這一區分方法，則在經濟發達地區，一般為企業職工收入水平高於事業單位職工收入水平，而事業單位又高於機關。經濟落後地區情況則正好相反，多是機關高於事業單位，事業單位又高於企業。

（2）收入差距擴大的成因

影響中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集中來說為下列幾點：

1. 市場化進程中分配制度的改革

由於中國在經濟改革過程中重視對個人的激勵機制，以發揮員工生產的積極性，在擴大企業自主權之基礎上，告別了傳統的八級工資制，代之以重視市場效益及崗位貢獻等為依歸的新工資制度。在這制度下，不同企業間職工由於企業的營利狀況不同，其收入水平進一步擴大。此外，在同一企業內，不同職工因技能及對企業的重要性不同，亦促使企業內職工的收入差距擴大。（註六十六）

2. 地區差距擴大

從地域角度分析，不同地區的地理和資源條件有異，影響著經濟增長速度和效益。

然而，地區間收入差距擴大的主因，是傳統體制下「扭曲產品價格」為特徵的宏觀經濟環境，致使某些地區「經濟上」的相對比較優勢和該地區「資源結構上」的相對比較優勢相背離。（註六十七）例如，具有工地和礦產資源優勢的中、西部地區，由於其資源產品的價格受抑制，致使這些地區無法靠其資源的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

除價格不合理外，投資流向還受到其他因素影響，這分別包括沿海優惠政策及地區保護主義等。由於沿海經濟發達，落後地區的資金及人才皆大量地向發達地區轉移，形成「孔雀東南飛」的現象。

3. 非正常及非法因素

這些因素歸納起來有四個方面：(註六十八)

- i. 市場發展過程中的機會壟斷和競爭條件的不平等，使某些企業或個人在不平等的競爭條件下獲得壟斷利益。例如某些單位獲得銷售短缺商品的專利，或某些企業被選擇為改革試點而享有大量特權及免稅權利等，皆使財富大幅向這些單位集中；
- ii. 在股票、期貨及房地產交易中投機致富；
- iii. 尋租行為。部分社會成員利用體制上各種漏洞，以各種方式侵吞公共財產。例如在八八年前後，國有資產通過一批擁有特權者，倒賣水泥、鋼材等緊缺物資而致富。在九二年間，鄧小平南巡後，國有資產如資金及土地又通過一批有權勢者大量低價的批出而大量流失。而在九四、九五年國企產權改革期間，在國有資產產權界定鬆弛情況下，某些人通過倒賣企業，將國有資產價格大幅壓低，轉入個人名下，大量吞佔國有資產；(註六十九)
- iv. 各種犯罪行為，如漏稅、貪污、受賄、勒索等。

4. 政府調節經濟手段及能力不足

中央政府平衡經濟能力十年來大幅削弱，如財政開支佔國內收入總產值的比重不斷下降、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及政府財政緊張等，也使政府無力對低收入者實施有效保障。

(3) 貧富差距對社會的影響

雖然中國目前巨富和赤貧者佔總人口比例不大，但他們的差距卻高達幾十倍以致百倍，某些省區尚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縣市由於財政緊張，長期沒有對機關和事業單位的在職人員調高工資，西部一些地區連機關幹部也發不出工資，而整個國家失業形勢亦日趨惡化。面對大幅通脹，及政府對一些過往的補貼服務如醫療、住房、教育及勞務服務實

施有償化的改革政策而大幅漲價，皆使低收入階層市民的生活雪上加霜。

沉重的生活壓力及貧富差距已使群眾不能負荷，他們尤其是對那些以權謀私、貪污腐化分子更是深痛惡絕，如不儘速進行整頓，社會不穩狀態將更增加。

除高、低收入階層問題外，地區過份差距亦帶來嚴重後果，湖南省委書記王茂林曾甚有見地的指出：(註七十)

1. 地區間的差距過份懸殊會影響社會穩定。目前，中國省一級地區間最大差距可達至七至八倍，「考慮到一九八八年解體前的南斯拉夫的地區差異為7.8倍，一九八九年東德沖垮柏林牆時，東部的平均工資只有西部的同等勞動者的35%，中國現在的情況要引起警覺。」
2. 地區間的差距過份懸殊易引發民族矛盾。王茂林認為「民族問題實質上是經濟發展問題。」
3. 導致移民潮，引發社會經濟的嚴重失衡。

十 社會治安惡化及道德、意識形態崩潰

(1) 社會治安形勢

中國在改革以來，國內治安形勢每況愈下。由於社會不良風氣盛行，部份市民期望在短期間發財致富，加上人口大流動使社會控制力下降，無業游民增多，部份執法部門貪污腐敗，成為罪惡保護傘，使治安問題已威脅到社會安定。

九四年全國重大刑事案件仍繼續增加，破獲的已高達七萬二千多宗，比九三年上升百分之十九點七。(註七十一)部份農村地區治安情況較差，群眾欠缺安全感，有些農村中的宗族勢力、地痞流氓等惡勢力橫行。在某些地段、列車上，車匪路霸猖獗；而賣淫嫖娼、賭博及販毒等行徑雖經政府多次打擊，惟仍屢禁不止。更令居民深痛惡絕的，為警

匪、官匪勾結，使市民生活毫無保障。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民意調查指出，社會治安是僅次於物價上漲的社會問題，群眾普遍對社會治安不滿。（註七十二）

除一般的刑事犯罪外，在農村一個令政府警惕的問題為部份地區的宗族勢力大幅膨脹，在宗族力量強大的地方，族長或宗族成員有權處理本族大小糾紛，處置違反族規的族人。有時候，一個宗族的族長甚至掌握著宗族成員的生死大權，族規竟然凌駕國家法律之上，並公然與基層政權相互抗衡。（註七十三）

（2）影響政治及社會安定的問題

在九三年十二月下旬的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中，中國有關官員發表重要講話報告，有系統地從中國官方的角度分析在新形勢下影響政治穩定和社會安定的突出問題：（註七十四）

1. 境外敵對勢力的滲透破壞活動加劇，報告指出在九三年七月，美、英、法等國的情報部門在法國召開了第三次國際安全首腦會議，明確提出當前對華工作重點為製造民族分裂，等待機會制裁中國。這些國家採用「放蛇出洞」策略，支持境外組織及逃到境外的「民運」分子，將活動重點轉向國內，以經商辦企業等為掩護，並重操演變波瀾的故技，大肆向境內敵對分子提供財物支持，他們並極力支持民族分裂活動，挑動宗教紛爭，製造動亂；
2. 國內敵對分子與境外敵對勢力遙相呼應，千方百計與政府進行「合法鬥爭」，並預備成立反對黨，報告指出這些國內人士有的裡通外國；有的打著防「左」、反「左」的旗號攻擊黨的方針政策；有的以研討市場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為名，鼓吹私有化、西方議會制、人權及自由，並為「暴亂份子」鳴冤翻案；有的經商辦企，擴充經濟實力，以商養政，伺機而動；
3. 國內民族分裂主義活動猖獗，在西藏、新疆及內蒙等地區進行分裂活動；

4. 國內非法宗教活動突出，煽動宗教狂熱，甚至控制了基層政權，破壞局部地區的社會穩定；
5. 嚴重刑事犯罪案件持續上升；
6. 貪污賄賂犯罪等腐敗現象，破壞政府與人民群眾的關係；
7. 一些群眾中的不滿和偏激情緒增長、群眾性鬧事增多。九三年上半年，全國發生群眾性上訪、請願、遊行、罷工、罷課等鬧事事件多達四千九百多宗，參加人員二十八萬人，「涉及面之廣，衝突程度之激烈，都是一九八九年暴亂之後最嚴重的，且有發展之勢。」

（3）意識形態崩潰

在改革開放十九年間，中國出現了意識形態崩潰、道德滑坡及社會凝聚力下降等嚴重社會問題，政府未能建立一套取代文革期間極左思潮的新思想。文革期間，由於社會極端政治化，不少傳統道德概念被徹底否定，四人幫下台後，隨著很多在文革期間被隱藏的社會問題被逐步揭露，人民感到過往備受欺騙，空想的理想主義幻滅，加上在推行開放改革以來，相應的倫理道德觀念未能及時建立，為補償過往清教徒的生活方式，人民從一個極端走往另一極端，他們對政府再三強調的艱辛建國號召再不相信，並表現為個人主義膨脹、一切向錢看的拜金主義、短期行為傾向滋長、享樂主義叢生，形成新時代的思想危機。

註 釋

- 註 一 任慧文〈鄧小平交班部署能否防身後不亂？〉《信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日
- 註 二 陸祖辛〈鄧小平的身體狀況及其心事〉《鏡報》月刊，一九九五年三月號
- 註 三 任公芳〈江澤民喬石朱鎔基談中央權威〉《鏡報》月刊，一九九五年五月號
- 註 四 于家驥〈鄧小平擔心黨不像黨——兼談中共四中為何只有一個主題〉

《鏡報》月刊，一九九四年十一月號

- 註 五 同上註
- 註 六 胡鞍鋼《挑戰中國——鄧後中南海面臨的機遇與選擇》，新新聞文化事業，一九九五年，第25頁
- 註 七 任慧文〈江澤民對中國經濟形勢的評估〉《信報》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日
- 註 八 〈一九九五年中國經改形勢——朱鎔基去年十二月底的內部講話〉《開放》雜誌，一九九五年二月
- 註 九 任慧文〈中共四中全會主題敲定——經濟為中心，黨建為核心〉《信報》 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 註 十 任慧文〈中共四中黨建決策的背景〉《信報》 一九九四年十月七日
- 註十一 任慧文〈『軍要管軍』列入中共軍委重要議程〉《信報》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 註十二 〈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四屆四中全會文件學習輔導》，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1頁
- 註十三 任慧文〈中共腐敗是否病入膏肓〉《信報》 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 註十四 《人民日報》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
- 註十五 同 註十三
- 註十六 張思卿〈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轉載《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177頁。
- 註十七 同註十三
- 註十八 張沐〈五中將敲定政經新決策〉《鏡報》月刊，一九九五年六月號
- 註十九 中新社北京電 一九九五年五月一日
- 註二十 《文匯報》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二日，及《經濟日報》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日
- 註二十一 《文匯報》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 註二十二 請參閱：1. 〈堅決控制物價上漲幅度〉《當前經濟發展與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42頁；2. 〈一九九四年我國經濟回顧與一九九五年經濟發展趨勢〉《一九九四年中國經濟展望》(上) 國家信息中心編，中國經濟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21頁

- 註二十三 同註八
- 註二十四 陳錦華主編《一九九五年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報告》，中國計劃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113頁
- 註二十五 魏禮群、鄭新立主編《新的征程新的綱領——學習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文件》，新華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76頁
- 註二十六 〈江澤民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九四年四月六日轉引自《中國大陸研究》第37卷第9期
- 註二十七 《商報》一九九七年三月五日
- 註二十八 《當前經濟發展與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81頁
- 註二十九 同上註
- 註三十 同註二十六
- 註三十一 同註二十八，第82頁
- 註三十二 同註二十四，第114頁
- 註三十三 同註二十六
- 註三十四 同註二十八，第5頁
- 註三十五 默然〈中國高層駕馭國企改革〉《廣角鏡》月刊，一九九五年十月
- 註三十六 同上註
- 註三十七 宮俊輝〈國企改革方向又起爭議 新的經改方案推出〉《鏡報》月刊，一九九五年八月號
- 註三十八 同上註
- 註三十九 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九五改革問答錄 重點 難點 熱點》，改革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103頁
- 註四十 同註八
- 註四十一 同上註
- 註四十二 魏杰主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企業、市場與政府》，企業管理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99頁
- 註四十三 蘇星《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一月，第93頁
- 註四十四 同註四十三，第94頁

註四十五 同註八

註四十六 〈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轉載《當前幾項重大經濟體制改革》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1頁

註四十七 同註四十三，第48頁

註四十八 周振華《步履艱難的轉換——中國邁向現代企業制度的思索》上海譯文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143-144頁

註四十九 同上註

註五十 十 趙憶寧——訪國家經貿委副主任陳清泰《瞭望》新聞周刊，一九九五年，第31期

註五十一 任慧文〈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內情〉《信報》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註五十二 《華南經濟新聞》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註五十三 國家信息中心編〈一九九六年我國勞動市場分析與預測〉《一九九六經濟展望（中）——中國市場展望》，中國計劃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63頁

註五十四 江流、陸學藝等主編《社會藍皮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一月，第11頁

註五十五 同註五十三，第63-64頁

註五十六 同註五十三

註五十七 國家計委社會發展研究所課題組〈九五期間就業形勢總體分析與對策〉《管理世界》雙月刊，一九九五年第5期

註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 同上註

註六十三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綜合部 葛延風〈一九九四年收入差距報告〉轉載江流等主編《一九九四——一九九五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104頁

註六十四，六十五 同註五十四，第31頁

註六十六 同註六十三

註六十七 中國改革與發展專家組《中國改革與發展報告(1992-1993)》，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163頁

註六十八 同註六十三，第108-109頁

註六十九 同註三十七

註七十 王茂林〈中國地區差距淺析〉《管理世界》雙月刊，一九九五年，第5期

註七十一 〈任建新在人大會議談治安問題〉《大公報》 一九九五年三月十四日

註七十二 同註六十三、第26頁

註七十三 彭劍良〈宗族活動 中共頭痛〉《廣角鏡》月刊，一九九五年三月

註七十四 〈任建新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轉載《中國大陸研究》第37卷，第11期。

第五十九章 江澤民面對的挑戰（二） ——外交形勢與「中國威脅論」（一九九四—一九九七）

第一節 六四後中國對外關係面臨的挑戰

中國在八十年代致力的和平外交，在八九年開始面臨外交的挑戰。在八九年六四事件後，中國面臨西方國家的政治抨擊，以及經濟制裁。根據中共的觀點，爆發八九年學運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國際大氣候，即西方國家以政治、經濟、外交、思想及文化等滲透社會主義中國的結果。故此，中國相應提出「反和平演變」的對策。後來，由於鄧小平擔憂過份渲染反和平演變將會衝擊其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的國策，故在九一年下旬及九二年初下令淡化此方面的宣傳。

此外，九零年八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及九一年蘇聯解體亦對中國帶來國際關係上的變數。一方面，海灣戰爭的爆發促使中美關係在六四事件後有出現改善的轉機，為爭取中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支持美國出兵「懲罰」伊拉克，美國總統布殊在打破中美兩國關係低潮上採取了一些積極措施，然而，在另一方面，東歐共黨跨台及蘇聯解體卻使中國成為當今世界上「獨存的社會主義大國」，而對中國更為致命的，是西方各國基於對社會主義的厭惡，在蘇東劇變期間皆持「樂觀」的情緒，認為中共很快便會跨台。此判斷促使西方國家以強硬措施調整其對華政策，其中較為突出的例子是美國售賣先進武器予台灣，進一步支持台獨，而英國則改變對華的國策，採取強硬態度推銷新任總督彭定康的「九五政制改革」方案。

面臨海灣戰爭及蘇聯解體的形勢，中國對美國輿論多次提出由美國領導的建立世界新秩序，以及「霸權穩定論」^(註 1)的觀點表示關注，鄧小平曾指出：「強權政治正在升級，少數幾個西方發達國家想壟斷世界」^(註 2)，針對此情況，鄧相應提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

付、韜光養晦」等十六字方針，並強調要集中力量發展經濟，在對外關係上，中共強調在堅持反對霸權及強權政治的同時，自己絕不當頭，並繼續以和平共處等五項原則，推動睦鄰外交，與各國，尤其是周邊國家保持良好的關係。就中美關係，鄧小平強調中國威脅不了美國，美國也不應該把中國當作威脅自己的對手^(註三)。

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在特區發表鼓吹進一步改革開放及加速經濟發展的談話，中國經濟迅速邁上另一台階。

第二節 中國威脅論的提出與中美關係出現低潮

一 中國威脅論的湧現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與綜合國力增強的時刻，西方開始出現「中國威脅論」的言論。一九九二年九月，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司令在夏威夷就亞洲安全問題發表講話，提出南海將是亞洲下一個戰爭熱點，並首先提出「中國威脅論」。

站在美國的立場，中國已成為美國在亞洲發展的主要牽制力量，在朝鮮半島形勢、台灣問題及南中國海幾個島嶼的領土爭端等問題上與美國抗衡。此外，美國亦對中國將來的走向掌握不定，美國除卻擔心中國政治繼承過程出現危機及出現動亂外，更擔心中國將會隨著經濟的強大而令有擴張性質的民族主義興起，成為在亞洲有能力與美國對抗的強權。一九九三年開始，國際輿論開始刊登一連串有關「中國威脅論」的專文，例如：

「中國的勢力正在深入地向南中國海腹地伸展，它的鄰國已經開始感受到這種壓力。」^(註四)

「俄羅斯和西方的國防開支已經下降，而中國的這項開支卻在劇增。」^(註五)

「華盛頓也沒有認識到中國日益增強的軍事實力的影響……日本、台灣和資本主義的東南亞全部為中國在這一地區新的顯露鋒芒的態度感到

不安。所有這些國家都急切地盼望著美國保持它在這個地區的軍事存在。^(註六)

從上述種種西方傳媒的觀點，十分扼要來說，中國威脅論包括下列幾項內容：

- (1) 擔心中國的強大會演化為軍事實力，並改變世界實力對比，實際上是懼怕中國的崛起會影響美國主導國際社會的角色；
- (2) 認為中國有軍事擴張之企圖。部分傳媒更將中國比喻為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德國，認為這類野心勃勃的政權，將對世界造成威脅，故務必趁早圍堵，並破壞這個政權之威信。從此理念出發，西方學術界和傳媒密切關注中國的軍事行動，將注意力集中在南沙群島、台灣、中國國防預算、出售武器及向俄羅斯等國家購買武器等；
- (3) 指出中國是亞太區最不穩定的因素，並提出人們將目睹一個「中國霸權下的和平」的來臨。

二 中美關係陷於低潮

西方傳媒曾指出：「蘇聯擴張主義……曾是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大部份時間裡兩國關係的重要粘合劑，既然它已溶解，現在幾乎沒有什麼東西把美中兩國結合在一起」^(註七)。

從九三年開始，中美關係出現惡化現象，雙方衝突的事件包括：

- (1) 美國國會通過了阻止中國申辦奧運會的決議，並就此事件廣泛聯絡各西方國家反對中國；
- (2) 九三年夏天美國海軍以中國貨輪運送危險化學武器原料為由，強行阻攔「銀河號」輪船，後經第三國(美國亦派專家參與)查証，船上根本未載有美方指控的貨品。在真相清楚的同一天，即九三年九月四日，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批評美國肆意向別國施加壓力，這是地地道道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表現，銀河號事件只不過是其中一例；

- (3) 九三年八月，美國以中國向巴基斯坦出售導彈技術為由對中國實施新的制裁，中方反應強烈，批評美國在對華政策上仍堅持強權政治；
- (4) 中美在人權等領域出現矛盾；
- (5) 在經濟貿易領域衝突日增，其中較為突出例子在於恢復中國在「關貿總協定」中的地位事件，美國帶頭對中國復關提出苛克要求，而中國堅持以發展中國家地位加入。基於美國的態度，中國未能於世界貿易組織在九五年一月成立前恢復其在「關貿總協定」中的地位。中國復關受阻加深兩國的矛盾；
- (6) 美國在台灣、西藏等問題上與中國發生矛盾，其中影響兩國最為深遠的是台灣問題，九四年下旬，美國決定提升美台關係，於九五年中旬批准李登輝訪美，並擴大對台售賣武器，進一步支持台獨力量，明顯的利用台灣牌來牽制中國，基於中國從來將台灣看成是內政，美國的態度促使雙方關係進一步緊張。

第三節 中國的回應與外交對策

一 對中國威脅論的分析與回應

針對「中國威脅論」，中國各領導人皆在眾多場合提出申辯，而中國傳媒亦相繼發表文章，反駁外國的指責。在眾多文章中較具重要性的，當數《人民日報》觀察家的〈駁「中國威脅論」〉（九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報》）、國防大學校長邢世忠的〈「中國威脅論」可以休矣〉（《求是》九六年 第三期），以及訪問前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徐信的〈到底誰威脅誰？〉（《瞭望》九六年 第八—九期）等三篇。

這些文章認為製造中國威脅論的真實意圖是：一、製造輿論，以便干涉中國內改。「他們向台灣出售軍火，借香港問題做文章，在中國內政上攬混水，正是在這個名目下幹的。」（註八）；二、離間中國與其他亞太區國家的關係，藉以達到控制別國的目的；三、「通過製造緊張氣氛

來為某些國家在亞太地區謀求霸權尋找依據。」「為他們在這一地區維持軍事存在、銷售軍火、干涉別國內政、推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製造理由。」(註九)

而對於外國就「中國威脅論」提出的論據，中國亦提出理據詳細的回應：

- (1) 中國集中力量進行經濟建設，決定了中國需要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

中國政府提出從歷史教訓看，一味追求龐大的軍事力量，也不能最終確保一個國家的安全。況且，每個國家在下世紀的地位，很大程度取決於以經濟和科技為核心的綜合國力競賽。故此，盡可能縮減國防開支，以確保最大限度發展經濟，已經或正是絕大多數國家的國策(註十)。

- (2) 就針對中國軍事擴張的種種指責，中國提出四方面事實作出反駁

1. 中國軍費在世界上屬低水平之列。九四年中國的國防費只相當於美國的百分之二點三、日本的十三點九、英國的十八點三。若按人均水平計算，中國為五點三六美元、日本為三三六美元，而美國則高達一四一二美元。

從國防費構成來看，中國百分之三十四的國防費用屬於部隊的生活費，以保證軍人生活的水平不因通脹而下降，而武器裝備購置所佔比重則低於許多國家。此外，從中國於八五年便率先裁軍百萬的事實，可以證明中國的軍事戰略是防衛型的。

2. 在核試問題上，中國核試次數不及美國的二十五分一和前蘇聯的十七分一，亦低於法、英等國。
3. 就售賣軍火問題，從九零至九五年，美國武器在全球市場分額，從百分之三十四劇增到百分之五十六，是中國的一百倍。
4. 中國率先走上軍事工業轉為民用工業的道路，直至一九九六年，民用品生產佔中國軍事工業部門產量的百分之八十(註十一)。

(3) 提倡以協商解決領土爭端

針對南沙群島的領土爭端，中國除重申對當地擁有主權外，更在出現爭議後，首先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建議，並以談判解決爭端。

(4) 引用外國政要談話加強自己的理據

例如，法國三軍前總參謀長指出：「我不認為中國想擴大他們的勢力範圍，中國需要一個安全的地區環境，需要同所有鄰國保持令人滿意的關係，以便能夠完全致力於發展經濟。」澳洲前總理霍克亦提出：「一些人擔心中國有稱霸企圖，我認為，無論從歷史還是從滿足其自身需要來看，這種擔憂是沒有根據的。」馬來西亞總理更指出：「把中國看作威脅並以此為前提來安排安全事務的輕重緩急，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糟糕的、危險的政策。」(註十二)

中國除提出上述理論外，中國國務院更於九五年十一月發表〈中國的軍備控制與裁軍〉白皮書，提中國出的國防政策是防禦性的。中國不謀求世界或地區的霸權，中國不在外國派駐軍隊，不在外國建立軍事基地，中國的國防建設不針對任何國家，不對任何國家構成脅。(大略)(註十三)

二 後冷戰期（指蘇聯解體後）中國外交總取向

就西方的圍堵，江澤民於九二年的中共十四大中指出「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存在，始於是解決和平與發展問題的主要障礙。」，在九五年，當美國進一步支持台灣，批准李登輝訪美的時刻，江澤民再於同年九月底召開的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上就當前世界局勢及總對策作出談話，他批評美國等國家對中國進行遏制的國策不會改變，他們不願看到一個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中國，他們並將長期利用台灣、西藏、人權等問題給中國製造麻煩，牽制中國的發展，「中國的改革和發展需要一個長期和平的國際環境。我國經濟和技術水平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仍有較大差距，又面臨國際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壓力，對此，我們必須居安思危，奮

發圖強，抓住機遇，加快發展。」^(註十四)

在轉變的國際環境下，中國於九十年代的外多政策呈現下列幾個特點：

- (1) 雖然中國仍強調和平與發展是國際政治的大主題，但基於強權政治的存在，中國不得不與部份國家如美、日等產生矛盾，關係出現降溫及時好時壞；
- (2) 中國對內在集中力量發展經濟的同時，繼續以開放態度爭取更多參與國際社會，並積極發展與俄羅斯、周邊國家及發展中國家的關係，爭取更多的國際認同，從而加強其回應西方圍堵的實力。
- (3) 在面對外國挑戰時，中國一方面採取強硬的，維護主權的態度，但在戰術上則採取靈活及實用的方法以作回應，務求能繼續維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使經濟建設不致被外國刻意挑撥而受到衝擊。這其中較為突出的例子包括台灣、釣魚台主權糾紛及香港等問題。

註 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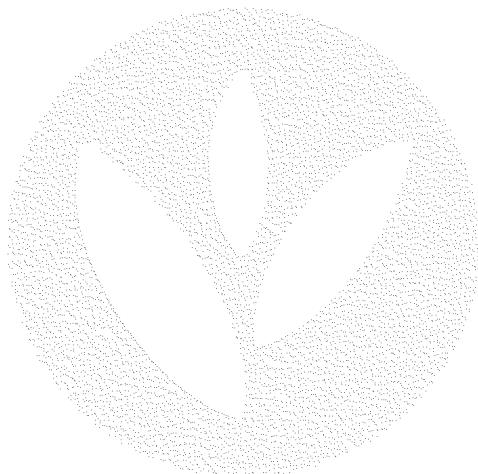
- 註 一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綜合研究組及《黨的文獻》編輯部編《三中全會以來的重大決策》，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339頁
- 註 二 鄧小平〈社會主義中國誰也動搖不了〉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329頁
- 註 三 鄧小平〈中美關係終歸要好起來才行〉，同上註，第350頁
- 註 四 美國《時代》周刊，一九九五年七月三十一日，轉載自孫恪勤、崔洪建主編《遏制中國下》，中國言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858頁
- 註 五 同上註
- 註 六 美國《政策研究》一九九二年秋季號，同註四，第861頁
- 註 七 同上註
- 註 八 《人民日報》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 註 九 方知〈到底進威脅誰？——中國國際戰略學會會長、人民解放軍原副總參謀長徐信談「中國威脅論」〉《瞭望》一九九六年，第八至九期
- 註 十 邢世忠〈中國威脅論可以休矣〉《求是》雜誌，一九九六年，第三期

註十一 同註八、九、十

註十二 同註十

註十三 《人民日報》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日

註十四 江澤民在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閉幕時的講話，載《中國大陸研究》一九九六年二月



第六十章 鄧小平的交班計劃與江澤民的治國總方針

導 言

在分析過以江澤民為核心的新領導層在九十年代中期面對的十項內政問題與外交挑戰後，在第六十至六十四章將討論新領導層的回應。這章主要討論鄧小平的交班計劃，以及江澤民的治國總方略——論十二大關係。下章（第六十一章），將分析江澤民為鞏固第三代領導層權力的組織措施，分別為鞏固軍權、進行黨的建設與建立權力制衡機制。第六十二章將論述中國政治社會領域的幾件大事，分別為江澤民提出要講政治、建設精神文明、反腐敗以及嚴打罪犯。第六十三章將討論台灣海峽危機；釣魚台領土糾紛以及新時期中國外交領域的最新發展。第六十四章則分析影響深遠的經濟問題，包括反通貨膨脹措施；九五計劃及二零一零年遠景目標以及九七年經濟工作的部署等。

第一節 鄧小平交班計劃

一 政治及組織的交班

為保証以江澤民為首的中共新領導層能順利過渡到「鄧後時期」，鄧小平在「六四事件」後便積極部署交班工作，交班分別為「政治交班」和「組織交班」。「政治交班」是制定一條保証能使中國持續發展、領導層受群眾擁護的治國路線。當政治路線確定後，共黨及政府內各級幹部是否能團結一致，執行正確路線就成為關鍵。而「組織交班」就是指安排好能夠執行正確政治路線的接班人，正如中共指出的：「正確的政治路線是確立正確的組織路線的前提，組織路線為政治路線的實現提供組織保證。」^(註一)

鄧小平的政治路線為七八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一個中心（經

濟建設)、兩個基本點(四個堅持及改革開放)」，以及九三年出版的包括鄧小平九二年南巡講話在內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組織交班則指八九年六四後十三屆四中全會中確定江澤民為中共總書記、第三代核心。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後於同年十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中，再次確認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集體領導，以及一九九四年九月中共十四屆四中全會中，再重申全黨要「團結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註二)以上各中央高層會議的正式決議，可視為鄧小平的組織交班。^(註三)

鄧小平深切理解，一個有堅強核心的集體領導及一個有權威的中央的重要性，故在九二、九三年經濟高速增長而出現通脹、農業衰退、腐敗蔓延、失業增加、盲流暴增及治安惡化等危機的時刻，鄧小平贊成將中央的三個最重要黨、政、軍職務(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都集中在江澤民一身，以樹立江澤民的政治權威、軍隊領導權威、經濟權威以至理論權威。鄧小平認為維護江澤民的權威為一個全局概念，並指出：「要把全黨、全國上下的注意力集中放在這個全局上，維護和把握好這個大局，誰搞亂子就不得民心。」^(註四)

二 鄧小平向江澤民反覆強調的治國方略

(1) 鄧小平向新領導層建議的治國方略

鄧小平除向江澤民交班外，多年來還不斷向江澤民建議治國方略，其中最主要的有下列五條：

1. 必須緊緊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放，解決中國所有問題都需依靠經濟建設，這是一個不容衝擊的「硬道理」。
2. 要抓好軍隊，堅持黨指揮槍

鄧小平對江澤民指出：「事情再多，對軍隊工作也要捨得花氣力、花時間去抓。軍隊不出問題，是最主要的……軍隊穩不住，大局穩不住。」^(註五)「文化大革命那麼亂，政權沒發生動搖，就是毛澤東始終抓住軍隊

不放，沒有把軍隊輕易交給四人幫。」（註六）

可以說，軍權是保證政權穩定的關鍵力量，而經濟建設則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

3. 在發展過程中，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鄧小平認為把改革開放說成是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機來自經濟領域等觀點，就是左的表現，對這個問題必須頭腦清醒，而誰在意識形態上挑事，就把誰拿下去，不要爭論。（註七）

4. 中國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

要注意培養和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領導班子。鄧小平曾指出：「幹部不是只要年輕，有業務知識，就能解決問題，還要有好的作風，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要敢說真話，反對說假話，不務虛名，多做實事；要公私分明，不拿原則換人情。」鄧更指出：「哪一天中國出現一大批三四十歲的優秀的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就好了……真正關係到大局的是這個事。」（註八）

5. 要維護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央領導層

除了培養幹部外，鄧小平並提出：「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第三代領導集體也必須有一個核心，就是江澤民。要注意樹立和維護這個集體和這個集體的核心，只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別是一個好的常委會，只要它是團結的、努力工作的，能夠在艱苦創業反對腐敗方面成為榜樣的，什麼亂子出來都擋得住。如果中央自己亂了陣腳，那就難說了。」（註九）

（2）中央反覆強調要堅持「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為維護「後鄧時期」政治、社會的穩定，江澤民曾於九五年一月期間先後召開多次會議，強調以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根本方針、統一全黨思想。根據中央指示，《人民日報》於九五年元旦社論提出的「統一思想、總攬全局、加強協調、紮實工作」之指導思想，以及

一月中依據這四句話依次發表的四篇文章，以廣泛宣傳中央之政策。

在九七年鄧小平去世後，江澤民再次重申鄧小平留給中國的最寶貴的財富「就是他創立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在這個理論指導下制訂的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江澤民指出鄧小平的理論「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初步回答了中國這樣的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和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註十)

第二節 江澤民的治國方略——正確處理「十二大關係」

一 江澤民的「十二大關係」

雖然鄧小平向江澤民提出上述幾點帶有根本性的治國原則，但新領導層在中國經濟進一步改革開放及高速發展的新階段時，卻不斷面對很多新的具體問題，這些問題影響深遠，並且是伴隨經濟高速發展時一同湧現的，屬於中國社會在現發展階段某些無法迴避的難點。處理這些帶有全局性的問題，需要審察時勢和高度技巧，以回應不斷湧現的新情況，這樣方能在眾多矛盾中找出平衡點，尋求解決方案，把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更好地推進。

一九九五年九月下旬中共召開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二零一零年遠目標的建議〉。江澤民在會議開幕儀式時發表長篇講話，闡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搞現代化建設所遇到的涉及全局的新矛盾和新問題，(註十一)並系統地指出在經濟社會新階段所需處理好的十二大關係：

(1) 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係

這是十二大關係中最重要的一環，其餘十一方面的關係，都受制於此大局。

江澤民提出改革、發展、穩定三者存在著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繫。「發展」是硬道理，中國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要靠自己的發展。此外，由於「改革」能增強企業及個人的生產積極性，解放生產力，故改革遂成為推動發展的強大動力。中國人口眾多，問題複雜，發展和改革必須有一個大前提，就是「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

基於此分析，江澤民提出在今後十五年的經濟建設中，務需把握「抓住機遇、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發展、保持穩定」的大局，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三者之關係。

(2) 速度與效益的關係

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最期望的是走一條發展既快又有效益的道路，但正如江澤民指出：「我們講發展，難就難在把速度和效益有機地結合起來。」中國經濟問題往往出於偏重數量擴張、追求高速增長，而忽視質量及效益。

江澤民強調將來的發展應重視效益，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依靠建新廠房、增加生產線及多聘人手)轉向集約型(依靠技術進步及勞動者質素提高)。要完成此過渡，務必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加強激勵機制，以及重視科技和教育。

(3) 經濟建設和人口、資源、環境的關係

江澤民強調要實現可持續的發展策略，一定要將控制人口、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放至重要位置，絕不能走「斷子孫路，走浪費資源和先污染、後治理的路子。」

此外，要平衡好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安排富餘人員間可能出現的矛盾、積極發展鄉鎮企業和小城鎮，並加強農業的基礎。

(4) 第一、二、三產業的關係

為回應中國經濟產業結構中第一產業(農業)基礎薄弱，第二產業(工業)素質不高，第三產業(服務性、金融等)發展滯後，以及三者關係仍不

協調的情況，江澤民強調要大力發展農業，調整提高第二產業，加強基礎工業，大力振興支柱產業和積極發展第三產業，以促進經濟結構的協調發展，並緩解就業壓力。

(5) 東部和中西部地區的關係

為解決東部與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差距擴大，中央期望中西部地區能加快改革開放，充份發揮資源優勢。中央決定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優先安排這些地區的資源開發和加強中西部基礎設施建設，鼓勵各方面到中西部地區投資，以及提高中西部具有優勢的資源性產品的價格等。

(6) 市場機制和宏觀調控的關係

這點主要提出在經濟建設中引入市場競爭機制的同時，為避免市場盲目性和滯後性(指市場不能事先調節經濟)，國家必須運用各項經濟、法律及行政手段，以達至抑制通脹、實現經濟總量平衡和優化經濟結構的目標。

(7) 公有制經濟和其他經濟成份的關係

江澤民提出要確保公有制(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在關鍵領域需佔支配地位，並在整個經濟發展中起主導作用。

在發展公有制經濟的同時，允許及鼓勵個體、私營、外資等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而國家對公有及非公有企業一視同仁。

(8) 收入分配領域中，國家、企業和個人的關係

中國在收入分配中出現了：一、國民收入分配過份向個人傾斜，國家所得比重過低；二、部分成員間收入差距懸殊等兩大問題。

為回應國家財政赤字增加及國有資產流失的困擾，江澤民提出要開源節流，提高財政收入佔國民生產總值、中央財政收入佔全國財政收入

的兩個比重，以及搞好對國有資產的監督。

在個人分配方面，應防止兩極分化，保護合法收入，取締非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並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

(9) 擴大對外開放和堅持自力更生的關係

雖然上述兩者並不排斥，但江澤民提出中國在搞建設及開放時，應將立足點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礎上。

(10) 中央和地方的關係

針對有些地方和部門過多考慮本地區、本部門利益，而出現「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現象，江澤民強調必須加強中央的統一領導，維護中央權威，並要求地方要自覺服從和照顧大局。

為更好地發揮中央和地方的積極性，應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經濟管理權限，明確各自的事權、財權和決策權，並力求將此法制化及規範化。

(11) 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的關係

提倡國防建設必須服從經濟建設的大局，走防禦的戰略方針及精兵之路。

(12) 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關係

為回應改革開放以來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抬頭、治安惡化及腐敗等現象，江澤民強調要加強愛國、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的教導，提高人民道德素質，並提出精神文明建設要同經濟發展戰略配合，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規劃。（註十二）

江澤民提出的十二個關係，皆為中國在高速發展階段過程中帶有全局的問題。從江澤民的講話中，可以清楚看到中央認為經濟效益比速度重要；希望優先處理人口、資源和環境保護；鞏固公有制；加強中央財力；防止貧富過份差距；強調自力更生；維護中央權威，國防

從屬經濟需要；加強精神文明建設；以及正確處理發展、改革和穩定的關係。

二 其他中央仍須處理的難題

其實，中央除面對上述問題外，亦需審慎處理下列兩個問題：

(1) 人民參政期望、政治改革與社會穩定及經濟發展的關係

只有暢通的參政議政渠道，方能將社會各階層、利益團體的聲音，以及各方面對社會現狀的不滿及建議在制度上吸納及解決。只有在人民不滿情緒得到宣洩，及以制度化、法制化為原則處理難題及糾紛時，社會才能保證有真正、牢固的穩定。

(2) 建立宏觀調控體制，推行各項改革的開支與有限財政資源的矛盾

中國推行各項經濟體制改革，需籌集龐大的改革費用。在現階段國民收入向個人傾斜，財政連年出現赤字的困境下，可以預期各項改革，尤其是支出龐大的國企改革只能循步漸進地進行。中國唯有通過漸進的改革和各種經濟力量的增強，方能為政府提供更多的財力，在「良性互動循環」的運作下支持中國的改革事業向前推展。

註 釋

- 註 一 〈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引自《十四屆四中全會文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1頁
- 註 二 同上註
- 註 三 任慧文〈鄧小平交班部署能否防身後不亂〉《信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日
- 註 四 陸祖辛〈鄧小平的身體狀況及其心事〉《鏡報》月刊，一九九五年三月
- 註 五 同註三

- 註 六 任慧文〈江澤民排除軍隊隱憂的舉措〉《信報》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 註 七 同註三
- 註 八 張沐〈中共醞釀跨越世紀接班體制〉《鏡報》月刊，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 註 九 同註三
- 註 十 〈在鄧小平同志追悼大會上江澤民同志致悼詞〉新華社北京電 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 註十一 江澤民〈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係〉《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文件》，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9—28頁
- 註十二 有關十二大關係的內容，參考江澤民〈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係〉，同上註

第六十一章 新領導層的組織策略——軍權、建黨、民主制衡

導 言

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新領導層除卻提出治國的十二大關係外，更積極的開展一連串組織措施以鞏固其領導地位，以保証各級幹部能貫徹落實他們提倡的治國方針。這章主要討論江澤民在鞏固軍權的措舉；中共建黨的部署；以及中共有意認的加強人大、政協對國務院的制衡，逐步推行民主的策略。

第一節 江澤民鞏固軍權

「槍桿子裡出政權」，中共倚靠軍事革命，於四九年取得了大陸的政權，毛澤東及鄧小平在一九四九年前的革命戰爭時代戰功顯赫，深得各路將領敬重。中共建國後，這些軍事將領仍對其領袖忠心耿耿，形成了毛與鄧權力穩固的基礎。在中國這個法治未完全上軌道、軍隊未習慣服從文人政府的國家中，誰掌握軍權，誰就能即時保持政治上絕對的優勢。故此，江澤民要真正的接班，必然要建立其在軍隊中的領袖地位。

一 江澤民鞏固軍權的長期部署

(1) 軍隊高層人事大調整

鄧小平在八九年十一月召開的黨十三屆五中全會中，執意辭退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位，將軍權正式交予江澤民，江澤民深感擔子不輕，曾指出：

「這次決定我當中央軍委主席，我感謝同志們的信任。十三大以來我沒做過軍事工作，沒有這方面的經驗，深感責任重大、力不從心。黨把這副重擔交給我，我一定努力學習軍事，盡快熟悉軍隊情況，認真地、

積極地履行職責。十多年來，在小平同志領導下，我們軍隊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已經奠定了良好基礎。尚昆同志擔任軍委第一副主席，劉華清同志擔任副主席，楊白冰同志擔任秘書長，軍隊還有一批身經百戰、軍事經驗豐富的老同志，新上來一大批很有才幹、很有希望的中青年同志，又有無堅不摧的英勇戰士。這些都是繼續做好工作的有利條件。」（註一）

由於江澤民過往的工作主要是在政務及黨務方面，在軍隊內並無深厚的基礎，故很多軍隊事務遂交托予軍委副主席及其他高級軍事幹部處理。

江澤民在八九年從上海入主中央當總書記時，由於缺乏足夠威望及實力基礎，故不得不受制於中央高層各種不同的政治力量。此外，在六四後危機重重的環境下，為維持政權的穩定，中央政策不得不偏向謹慎保守。面對外國的干預及蘇聯東歐劇變，中國的輿論及理論界更出現反和平演變及質疑改革開放政策是「姓社姓資」的言論。

針對「左」的意識形態，鄧小平在九二年春南巡時發表「防左」講話，並隱晦地批評中共新領導層的過份謹慎措施。鄧的行動得到楊尚昆、楊白冰的大力支持，楊白冰更在軍中提出軍隊要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的口號。

在北京，江澤民對鄧小平講話作出即時回應，在中共中央黨校表態擁護，並迅速將鄧講話內容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向各級黨政組織傳達，號召貫徹執行。在這情況下，鄧小平決定繼續維護江澤民作為中共新領袖的立場。既然要維持江澤民的領袖地位，鄧小平則須為其實際掌握軍權創造優勢和條件。

楊尚昆、楊白冰在中共軍中工作多年，無可置疑是鄧小平路線的忠實支持者，他們貫徹鄧制定的裁軍政策，推動軍銜制，在八九年平定學潮，以及配合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而提出軍隊要為改革「保駕護航」的口號，領導軍隊支持經濟建設。鄧小平在世，由楊氏兄弟掌管軍隊，輔助江澤民是可行的，然而在鄧後，究竟江澤民是否真正有能力駕馭軍隊，

避免握有軍權者擁兵自重，威脅及挑戰江的領袖地位，則是一個重要問題。況且，當江澤民任軍委主席，楊白冰任軍委秘書長期間，雙方已就軍隊編制、建軍口號等問題上出現角力。(註二)此外，江澤民在就任軍委主席後，曾多次以軍委主席身份探望部隊，當時各高層軍事將領均有陪同視察，唯楊白冰未曾出現，而江澤民對軍隊的某些指示，到了楊白冰那裡亦被擋置，(註三)江澤民以「黨指揮槍」的局面無法形成。

基於江澤民與楊白冰在軍內出現競爭，黨與軍關係存在著某程度的不協調，鄧小平為了鞏固江澤民的領袖地位，避免中國出現另一軍事強人挑戰江澤民的統帥地位，從而影響政權穩定，毅然於九二年十一月的中共十四大中釋楊尚昆及楊白冰的軍權，解除他們在軍中職務，並任用在軍中享有崇高地位，年齡已達七十六歲的劉華清及七十八歲的張震出任軍委副主席，輔助江澤民掌握軍權。此外，由於楊白冰在掌管軍隊期間並無顯著過錯，故鄧仍安排他加入中共中央政治局。

在九二年中共十四大後，江澤民在劉華清及張震的輔助下，對軍隊進行大規模的人事調整，對三總部(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大軍區及幾乎所有兵種的人事作出調整，部分在楊白冰掌軍時期受到特別重用的軍人被調離重要職務，或被乾脆以退休離職等原因調離軍隊，從而保證新的軍事領導層能絕對服從江澤民的指揮。(註四)。

配合中央軍事領導層的人事大調整，中央軍委於九三年六月宣佈提升六人為上將，而在九四年五月初人大常委會通過〈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軍銜條例〉修正案後，江澤民即於六月根據此條例，晉升十九人為上將。江澤民通過晉升高級將領，客觀構成了扶助江澤民治軍的領導班子。

在九五年九月下旬召開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中，中央軍委高層人事再出現變動，會議決定增補總參謀長張萬年及國防部長遲浩田為中央軍委副主席，王克、王瑞林為中央軍委委員。將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由兩人增至四人，目的為方便新老交替，劉華清和張震已達七十九及八十一歲高齡，現時在他們的領導下，增補較年輕的張萬年及遲浩田當軍委副主席，明顯要張與接替劉華清和張震的班。可以說，九五年的這次調整，使中共軍權從第二代向第三代過渡，並結束了中共第二代軍人對第三代

領導人的輔助時代。（註五）由於張萬年及遲浩田是江澤民的同時代人，由他們出任軍委副主席將更有利江澤民實質掌握軍權。

通過兩次晉升上將及數次軍內人事調動，對鞏固江民於軍內實質領導地位，產生積極的效果。

（2）提高江澤民在軍中的權威，三總部相繼表態

在九四年五月人大常委通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軍銜條例〉修正案中明確指出：1. 中央軍委會主席不授予軍銜；2. 中央軍委副主席、軍委委員、三總部負責人、各大軍區正職主管、各兵種及軍事部門的負責人全以上將軍銜任用；3. 被決定任命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委員職務的軍官而晉升為上將的，由中央軍委主席授予上將軍銜。

上述條例對文人治軍、中國的政治組織走向理性化及現代化有極其深遠的影響，由於條例明確表明軍委會主席不設軍銜，即表明軍隊日後將由文人領導，從而實行黨的文官首長（即黨的總書記）領導軍隊的軍事體制，實踐「黨指揮槍」，杜絕軍人干政。此外，由軍委會主席向軍委副主席及軍委委員授予上將軍銜，更進一步加強軍委主席的領導權威。再者，推行此條例將使軍隊中的上將人數大幅增加，客觀上出現各將領互相平衡的作用，避免出現個別軍事強人專權的情況。

在修改此軍銜條例的前後，中共及軍方宣傳喉舌經常發表社論，強調軍隊要聽黨的話，例如在九四年八月一日中共建軍節中，中共《解放軍報》的社論便強調：「軍隊必須服務於全黨大局，在思想、政治上，同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九四年九月下旬，中共中央召開十四屆四中全會，會議號召全黨要「緊密地團結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並把「維護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權威」作為軍事命令放到全軍面前。（註六）

十四屆四中全會後，三總部的高級將領紛紛表態，維護江澤民在軍隊中的權威，總參謀長張萬年指出：「要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總政治部主任于永波則提出：「保證我軍堅決聽從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中共軍委指揮」，而總後勤部部長傅全有則表態說：「更加自覺地

維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權威。」(註七)

(3) 軍要管軍，抓好基層連隊支部建設

鑑於在改革開放大潮下，部分軍隊出現了參與經商而導致走私及貪污腐敗、落實中央政策流於形式並搞脫離中央精神的土政策、以及官僚作風普遍等問題，反映了「軍不像軍、軍不管軍」的嚴重性。

九四年開始，中央軍委便將加強軍隊的管理列入重要議程。在十四屆四中全會召開前兩個星期，中央於九月十五日在北京舉行為期六天的全軍管理工作會議，就如何從嚴治軍、加強軍事管理作出決策，以保證軍隊忠於黨及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江澤民在會議上指出，在新的形勢下，一定要從嚴治軍，強化官兵的紀律意識，做到令行禁止，一切行動聽指揮。(註八)

要貫徹「黨指揮槍」，中央決定首先要維護中央軍委、江澤民在軍中的權威(見上述)，其次是抓緊基層連隊的建設。在十四屆四中全會後，江澤民和劉華清、張震兩位軍委副主席分赴各大軍區宣傳落實黨指揮槍、維護中央軍委權威及軍要管軍的方針。為加強江澤民在軍隊基層的影響力，中央軍委在新修訂的〈軍隊基層建設綱要〉中注入了「江澤民概念」，從而建立江在軍隊基層中的領導形像。(註九)新綱要把江澤民提出的「政治合格、軍事過硬、作風優良、紀律嚴明、保障有力」五句話總結作為綱要的核心，部隊在貫徹新綱要時，要以江澤民的五句話為要求規範軍隊基層的建設。基於此，江澤民對新綱要的落實十分重視，要求部隊做到兩個務必：務必抓好落實；務必使基層建設有一個全面進步。

江澤民等中央軍委大員，一向皆強調要抓好基層連隊黨支部的建設，並提出要發揚毛澤東提倡的「黨的支部建在連上」的建軍路線，保證黨的各項政令軍令能直接貫徹至士兵中去。江澤民指出：「建設好基層連隊黨支部極為重要，這是實現加強中共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的重要原則。」(註十)

實際上，江澤民在擔任中央軍委主席後，就十分重視軍隊的基層工作，他在高級將領的陪同下，走訪了三十多個省市的地方軍區與駐軍，

探視各大兵種，視察百多個基層連隊。江澤民每到一地區務必與當地官兵見面，詢問軍務，了解各方面實際情況，從而建立他與部屬穩定的關係，貫徹黨指揮槍。

（4）提高部隊待遇，爭取軍心

在九四年全國工資改革後，中國官兵的月薪大幅提高，一般來說，軍人比在政府中同等的官員的待遇為高，而軍隊的實物發放額度和伙食補貼，亦比行政部門為高。

此外，為穩定軍心，國務院作出規定，在公務員的考試中，退役軍官將與其他人員分開考試，考試內容也適應退役軍官的特點。再者，對於在服役中立過二軍功以上者，將來公務員錄用時給予優先照顧。（註十一）中央希望通過一連串優待軍人的措施，提高他們對「黨和政府的向心力。」

二 鄧小平逝世後江澤民治軍的措施

鄧小平在九七年二月逝世後，中央領導層相繼推行政策、繼續鞏固江澤民於軍中的領導權威。

（1）要求軍隊繼續維護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權威

江澤民曾指出「維護黨中央領導集體的權威，是鄧小平同志的政治囑託，是黨、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江澤民的講話得到中國各級軍事將領的擁護，中央軍委四位副主席劉華清、張震、張萬年和遲浩田表示要做到「四個堅定不移」，其中包括要維護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中央權威，與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一致，以及聽從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指揮。

（2）強調黨指揮槍、軍隊服從黨的領導，突顯文人領軍的思想

九七年三月全國人大通過中國首部《國防法》，把「黨指揮槍」的原則法

律化，並且確定了中共對武裝的領導，並規定全國人大對軍隊的制衡機制。

(3) 江澤民提出「兩國武裝」的號召

江澤民向全軍發出用「正確的思想理論」和「現代科技特別是高科技知識」武裝官兵的「兩個武裝」的構思，一個是建軍之本，一個是強軍之舉，對軍隊革命化、現代化和正規化建設有重要涵意，若能貫徹落實，將使軍隊的思想與作戰水平大幅提高，而江澤民的領導地位亦會更為牢固。（註十二）

第二節 強化黨政組織，整頓基層，選賢任能，維護中央權威

江澤民掌握軍權，保證他在中共高層的核心地位。與此同時，面對伴隨九三年進一步改革開放而來的嚴重地方主義、黨政基層組織渙散及幹部貪污腐化問題惡化等困擾，中共中央於宏觀調控已進行了一年的時刻，即九四年九月下旬召開十四屆四中全會，會議以「黨的建設」為主題，強調要維護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整頓基層，強化黨政組織。緊接是次會議，中央於十月及十一月分別召開「全國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工作會議」及「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以落實十四屆四中全會的決定。在是次會議後，中央對全國幹部進行調整，推行幹部輪換制度；並落實人大、政協制衡國務院的制度，以加強中央決策民主化的進程，從政治改革方向進一步樹立中央的權威。

一 十四屆四中全會——黨的建設，維護中央權威

中共十四屆四中全會在九四年九月廿五日，即中國經濟進行宏觀調控一年的時候召開，並出人意表地將會議主題由兩個（其中一個是重申經濟上宏觀調控的重要性，並著重研究解決國有大中企業和農業問題）變為一個——即黨的建設問題，中共高層對此的解釋是：中共自十四大

後，各方面政策方針已定，當前的關鍵為建立強而有力的黨的領導，加強黨的組織建設，以保證大政方針的貫徹落實。（註十三）中共高層在近年來多次往各地視察，發覺在由計劃經濟轉變到市場經濟的時期，中共在自身建設中存在問題的嚴重性超過經濟建設碰到的困難，若黨政組織渙散，根本無能力推行改革開放。中央高層的考慮亦得到鄧小平同意。鄧指出：

「召開這次會議專門研究一下黨的建設問題，這很好。黨不像黨，黨不管黨，有再好的方針政策也沒用。你們這次會議提出抓基層組織建設，抓年輕幹部的選拔培養，抓民主集中制，都是對頭的，這幾個問題是關鍵。我的意見是這幾個東西要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制度比人強，是長治久安的路子。」（註十四）

（1）四中全會的決定——建黨的三大方針

十四屆四中全會在九月廿八日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並特別提出解決黨的組織建設三個主要問題：

1. 堅持民主集中制，注重制度建設

全會強調以制度保障黨內民主，加強民主基礎上的集中，重大問題必須由集體討論決定。全會更強調必須維護中央權威，經集體決定的政策必須堅決執行，保證政令暢通，全黨在重大問題上的統一行動，這樣才能保證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全會更指出：

「以為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可以不要黨和國家領導制度中的民主集中制或者以為堅持民主集中制就是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上，都是不對的。」……「民主不夠和集中不夠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註十五）

2. 加強黨的基層組織的建設，保証黨路線得到貫徹落實

黨的基層組織負責直接聯繫群眾，把黨的路線落實到基層，故務需不斷改進黨基層組織的工作方式，嚴格黨內生活，加強教育和管理。全

會更指出各級黨委要建立健全抓好基層組織建設的責任制，使基層組織成為團結群眾、帶領群眾進行改革和建設的戰鬥堡壘。

3. 培養和選拔德才兼備的領導幹部

全會指出在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及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全新事業過程中，對各級領導幹部提出更高的要求。全會號召必須重視人才的發現和任用，積極培養年輕幹部，造就大批能跨世紀擔當重任的領導人才，並加快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等重要制度的改革，擴大民主，完善考核，推進交流，加強監督，逐步形成優秀人才能夠脫穎而出，富有生機以及活力的用人機制。（註十六）

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增補上海市長黃菊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並增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吳邦國（上海市委書記）及姜春雲（山東省委書記）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2）四中全會的歷史意義——提高江澤民權威，建跨世紀組織架構

十四屆四中全會作出〈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共高層希望在全會中奠定後鄧時期的思想和組織架構，提高江澤民作為中央核心的權威，建立跨世紀領導體系，〈決定〉以非常清晰的言語指出，中共在組織建設方面已「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和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交接」，更強調「全黨同志緊密地團結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奮鬥。」（註十七）

此外，從四中全會的〈決定〉分析，可以清楚見到中共高層將以下列思想及組織政策，進一步強化以江澤民為首的中央領導層的權威：

1. 確立鄧小平理論在黨內的主導地位，以其理論統一黨員幹部思想，並進而強調鞏固江澤民領導核心的重要性

〈決定〉高度評價鄧小平思想在中國共產黨歷史的作用，為其崇高的歷史地位作了總結，〈決定〉以非常明確的語言指出，黨的建設「是以鄧小

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創的，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正在領導全黨繼續進行的新的偉大的工程。」（註十八）

2. 為壓制地方政府權力過大，增加中央權威，維護中央政令暢順，《決定》強調健全民主集中制以維護中央權威（註十九）

近數年來，在中央與地方關係上，出現了愈來愈多的地方黨政機關與中央分庭抗禮，「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況日趨嚴重。地方上黨政合一，不少地方的黨政兩系統都為維護地方利益而與中央對抗，中央政令因缺乏可以由中央有效控制的機構而不能貫徹落實，可以說，地方黨委已逐漸失去代表黨中央監督和控制地方政府行為的職能，長此下去，將動搖中央的領導地位。（註二十）為使政令暢通及有效控制地方領導人的行為，四中全會突出強調民主集中制，加強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維護中央權威，要求地方要無條件的落實中央決策。

值得注意的，是民主集中制的具體內容，鄧小平曾指出：「我們需要集中統一的領導，但是必須有充份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確的集中」，「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註二十一）鄧小平強調要實施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是希望在建立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央權威的同時，形成一套完整的集體領導制度，來維護基本路線的實施。這就既要維護江澤民的權威，又要防止個人專斷乃至凌駕於全黨之上，避免類似毛澤東晚年發動文革而造成的大破壞，（註二十二）只有民主基礎上的集中，才能真正服眾，防止山頭林立，做到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

基於中共高層對民主集中制的共識，《決定》提出凡屬方針政策性的大事，都要由中央或地方黨委集體決定，並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表決。對集體的決定，任何個人無權改變。（大略）（註二十三）

3. 加強整頓黨的基層組織

江澤民對中共黨基層組織空前渙散狀態表示憂慮，他曾指出「基礎不牢，地動山搖。」（註二十四）在一些貧窮落後的地區，黨組織根本沒有威信，「說話沒人聽、辦事沒人支持，黨的路線政策也得不到落實。」群眾

尖銳地批評「你不為群眾辦事，為啥擁護你。」情況嚴重的地方，黨的基本層組織形同虛設。^(註二十五)為改善上述情況，中央在十四屆四中全會中決定：

- i 各級黨委要建立健全基層黨組織建設的責任制。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的責任在縣委，加強城市基層黨組織建設的責任在市委，而中央要把基層黨組織建設做得好不好，作為考核市委和縣委書記工作成績的一個重要依據；
- ii 力爭在三年內分期分批整頓渙散的黨支部；
- iii 在各種類型的企業中，要加強黨的工作，並在仍未有黨組織的企業中創造條件建立黨的組織；
- iv 用三年時間開展黨性教育。^(註二十六)

4. 培養大批跨世紀的領導幹部，是中共高層十分注重的大事

鄧小平曾指出：「真正關係到大局的是這個事。」中央決定按照四化（革命、知識、年輕、專業）原則選拔幹部，並分期分批對縣以上黨政領導幹部進行培訓，對其學習情況作出考核，以為提升標準。此外，中央決定推行領導幹部交流制度，同各級領導班子的任期制度結合起來，並制定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使選拔任用幹部的工作能達至制度化。

二 中央在圍繞黨的建設推行的各項工作——強調集中

(1) 召開「全國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工作會議」，整頓農村黨的基層組織

在十四屆四中全會閉幕後一個月，中共於九四年十月廿六日召開「全國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工作會議」，以落實四中全會整頓農村黨基層組織的決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中專責管理幹部的胡錦濤在會議中指出要加強培訓，提高基層幹部質素，他更要求省、地、縣等各級黨委要切實負起建設農村基層組織的責任。

在十月三十日，會議結束後的一天，《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指出農

村黨基層組織問題若不認真解決，「將嚴重削弱甚至動搖黨在農村的工作基礎。」在十一月廿四及十二月下旬，中共分別發出〈關於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的通知〉和〈關於進一步整頓軟弱渙散和癱瘓狀態黨支部的意見〉，具體方針是健全村民自治組織、集體經濟組織和群眾組織，促進村級各項工作的制度化，並加強鄉鎮黨委及政權的建設，確定黨委書記為總負責人，由其負責整頓支部領導的班子，使支部黨組織肩負村級組織建設的責任，並改變經濟發展緩慢的農村的貧困狀態。

（2）召開全國組織工作會議

十四屆四中全會將培養跨世紀幹部列為黨的建設三大重要任務之一，在「全國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工作會議」閉幕後一個月，中共中央隨即召開「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會議主題環繞培養跨世紀的德才兼備的領導幹部。

胡錦濤在會議上強調要有緊迫感的加快選拔優秀年輕幹部的工作，江澤民亦發表講話，強調選拔優秀年輕幹部的任務要落實，在一定時期內需要有點硬性要求，並期望能「從國情出發，通過深化改革，逐步創造一個公開、平等、競爭、擇優的用人環境，建立一套幹部能上能下，能進能出，充滿活力的管理機制，形成一套法制完備、紀律嚴明的監察體系。」^(注二十七)

新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張全景亦在會議指出：要加大幹部交流的力度，擴大交流範圍，在交流中培養幹部。

十二月五日，《人民日報》發表〈培養選拔年輕幹部要有緊迫感〉的評論員文章，提出當前一個突出問題，是一部分領導幹部在思想上缺乏緊迫感，由於目前相當一部分領導班子成員的年齡沒有形成合理的梯次配備，若不抓緊選拔年輕幹部，將會出現後繼無人的情況。

然而，培養年輕幹部並非單純一個選賢與能的問題，其中還包括許多複雜因素，最常見的是提升幹部過程中任人唯親，以個人好惡或關係取人，從而建立私人勢力，在這情況下，根本不會注重幹部工作能力。

基於此，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用人環境及紀律嚴明的監督體系就更為重要，這樣方可改變任人唯親的局面。

(3) 人事調整及廣泛實施幹部輪換制

維持政令暢通，處理好中央與地方關係歷來都是中央領導人所必須面對的難題。胡錦濤曾指出：「經濟能否發展，搞上搞不上去，全在第一把手的能力、素質；能否與中央保持一致，關鍵在於第一把手的黨性原則。」^(註二十八) 中共中央並決定由李瑞環負責處理此棘手問題，協調中央與地方、貧窮與富裕地區以及民族之間的關係。

九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新華社發表措詞強烈的〈自覺維護中央的權威〉的《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重申「一個有權威的、能夠對社會發展進程實施有效領導的中央政府，是社會變革時期能以較小代價贏得快速平穩發展的重要保證」，文章並以嚴厲的口吻斥責：「一些單位和部門存在程度不同的貫徹落實不力的情況。有的人借口特殊不盡力去辦，有的人用取巧的辦法搞所謂『變通』，有的人虛應敷衍、只說不做，有的人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那一套。這是不能允許的。」

這篇文章發表以來，河北、山西、上海、黑龍江、山東、陝西等十五個省市黨政領導人事出現了程度不一的調整。^(註二十九)

與人事調整相配合，並加強中央與地方的溝通，提高幹部的閱歷及工作能力，中央決定廣泛實施幹部的輪換計劃，將各類幹部調往不同崗位。幹部輪換不單是省市之間或中央部委之間的幹部輪換，還包括地方的幹部到中央去，中央的幹部到地方來。

廣泛推行幹部輪換制有助幹部擴闊眼界，並可防止某些部委或地方領導長期在自己勢力範圍內經營關係網，造成中央「水潑不進」的尾大不掉之局面。此外，更可通過把中央幹部調到地方，從而有利中央政策的落實。再者，中央與地方以及部委間的幹部對調，亦有助雙方切身處地理解對方實際面臨的處境，對將來制定更合適的政策有重要參考價值。

第三節 加強人大及政協對國務院的制衡——落實民主

一 「四頭馬車」之分工

為維護中央權威，保證政令暢通，促使中央堅持民主集中制。中共高層亦理解集中統一的領導，必須有充份的民主，這樣方可集思廣益，使制定的決策能符合實際，照顧各受影響單位的利益，得到各方面衷心的擁護。就民主集中制，鄧小平曾指出：「民主和集中，都要加強，如何結合是領導水平、領導藝術的問題。」（註三十）

中共在九二年底召開的十四次全國黨代表大會後，有意識將黨中央的核心領導人物、中央政治局常委喬石及李瑞環安排分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全國政協，從而使中共最高的首四名領導人物各有專職：江澤民統籌黨、政、軍大局，為中國第三代領導的核心；李鵬主持國務院，負責國家機關的行政工作；喬石為人大委員長；李瑞環則為全國政協主席。

中共核心領導的「四輪馬車」分工，有強烈的政治制衡意義，實力派人物喬石及李瑞環主持人大及政協，客觀上強化了人大之立法權力及政協議政的功能，制約著國務院的行政權力。權力制衡的佈局有助國家決策的民主化，使中央的決策有更強大的民意基礎。

二 強化人大及政協之權力及監督功能

九四年的十屆四中全會後，中共中央一方面大幅度進行人事調動，進行幹部輪換制，並開會議落實整頓基層組織及培養人才之決定。而在另一方面，從九五年以來，則通過再加強人大及政協的功能與地位，來重塑中央權威的民主基礎。

喬石委員長曾在人大常委會內部的講話聲稱：「人大的監督是整個國家監督體制的重要組成部份，代表人民進行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監督。」（註三十一）為使人大改變橡皮圖章的形象，而成為對政治有實際控制能的權力組織，人大副委員長田紀雲進一步指出：

- (1) 人大代表通過差額選舉產生，以增強代表性；
- (2) 人大代表的選舉制度要改革，引入競選機制；
- (3) 人大要通過立法，以落實對政府工作的監督，人大並要有自己的輿論機構；
- (4) 人大會議要建立大會辯論程序，對政府官員決策及行政失誤進行彈劾和質詢等等。(註三十二)

據田紀云指出，從九三至九七年，全國人大已制定九十五個法律和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除此以外，人大更加強對法律實施情況的監督，並將此放在與立法同等重要的位置，例如在九六年以來，由人大八位副委員委組織了二十個執法檢查組，檢查了多個法律的實施情況，增強了執法檢查的力度和深度。(註三十三)實際上，由於人大常委會多由一些資深的退休官員出任，他們憑著其專業知識及崇高地位，往往能更有效的對行政機關進行監督，發揮人大監察政府的功能。此外，人大並正起草監督法，以使人大對政府機關的監督工作制度化及法制化。

至於政協的功能，根據九五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提綱，指出要繼續推行多黨合作，發揮政協參政議政及民主監督的功能，並朝向制度化的方向發展。(註三十四)

全國政協設有超過十個與國務院各部委對口的專門委員會，如政協的經濟委員會與國家計委及經濟貿易對口、政協的法制委員會與監察部及司法部對口，以及政協的教文委與教育部及文化部對口等等。此外，政協的專門委員會更因囊括了國務院各部門眾多主要負責人參加，而被稱作「小國務院」。(註三十五)

總結而言，利用人大立法機制和政協參政議政功能制衡行政機關，有利於中國進行民主政治改革，對樹立中央權威有積極的促進意義。

註 横

註一 江澤民〈在黨的十三屆五中全會上的講話〉(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
引自《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第709—720頁

- 註二 魯人〈鄧時期中軍隊的調整〉《鏡報》月刊，一九九一年一月
- 註三、四 同上
- 註五 任慧文〈江澤民掌軍的又一精心設計〉《信報》 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日
- 註六 冷眸〈三總部表態維護江權威〉《廣角鏡》月刊，一九九四年十一月，第6—9頁
- 註七 同上
- 註八 任慧文〈軍要管軍列入中共軍委重要議程〉《信報》 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 註九 任慧文〈江澤民排除軍隊隱憂的措舉〉《信報》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 註十 同註六
- 註十一 楊中美《江澤民傳》，時報文化，一九九六年，第280頁
- 註十二 上述資料引自任慧文〈江澤民治軍的三個新動作〉《信報》 一九九七年三月七日
- 註十三 于家驥〈鄧小平擔心黨不像黨——兼談中共四中為何只有一個主題〉《鏡報》月刊，一九九四年，第28—31頁
- 註十四 同上註
- 註十五 〈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引自《十四屆四中全會文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一頁
- 註十六、十七、十八、十九 同上註
- 註二十 任慧文〈中共四中黨建議的背景〉《信報》 一九九四年十月七日
- 註二十一 任慧文〈鄧小平要中共堅持民主集中制〉《信報》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九日
- 註二十二 張沐〈中共醞釀跨越世紀接班體制〉《鏡報》月刊，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第26—29頁
- 註二十三 同註十五
- 註二十四 同註二十
- 註二十五 《瞭望》週刊 一九九四年十月七日
- 註二十六 同註十五
- 註二十七 《人民日報》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日

- 註二十八 《聯合報》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 註二十九 何頻〈大風吹——吹走不自覺維護中共的人〉《中國時報週刊》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九至二十五日，第44頁
- 註三十 同註二十一
- 註三十一 高新〈喬李兩院派抗衡江李體制〉《中國時報週刊》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二至十八日，第12頁
- 註三十二 任公芳〈江澤民喬石朱鎔基談中央權威〉《鏡報》月刊，一九九五年五月號
- 註三十三 《文匯報》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一日
- 註三十四 容叢〈中共四頭馬車有分工——政治局擴大政協職能〉《廣角鏡》月刊，一九九五年二月
- 註三十五 同註三十四

第六十二章 反腐敗、反罪惡，與思想道德建設

導 言

為回應中國在進一步改革開放期間貪污腐敗嚴重；社會治安形勢惡劣；及道德、意識形態崩潰等社會危機，以江澤民為首的中國第三代領導層在九四年開始，便雷厲風行的進行了一連串反貪污及嚴打行動，包括以打擊「警黑(道)一家」的情況，這裡值得特別指出的，是中國有很多大案，皆涉及黨政機關與犯罪分子的勾結，故此反腐敗與嚴打往往是相輔相成的。與此同時，中共更推行思想道德建設，提倡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希望從治標及治本兩個方面克服上述的社會危機。

第一節 反腐敗行動與陳希同下台

一 中共高層強調要反腐敗，查辦大案

在九四年九月的中共四中全會後，中共高層進一步推行反腐敗行動。九五年一月中共召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江澤民在會中尖銳的指出：「腐敗現象是侵入黨和國家機關肌體的病毒。如果我們掉以輕心，任其氾濫，就會葬送我們的黨，葬送我們的人民政權。」^(註一)總理李鵬在同年三月的人大會議中，亦強調「必須從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來認識懲治腐敗的重要性。」

為落實反腐敗行動，江澤民於九五年的中紀委會議中提出：「根據一定時候腐敗現象滋生的狀況和特點，選擇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集中力量，加強鬥爭力度。」^(註二)中紀委書記尉健行亦指出：「查辦案件，打擊腐敗分子，是反腐敗鬥爭的重要方面，也是群眾十分關注的熱點」，故要「加大案件查辦的力度，使辦案工作有新的突破。」^(註三)

由於中共腐敗情況與「一些地方和單位黨不管黨、治黨不嚴」有關，

故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思卿表示，務須突出查辦大案、才能取信於民，並能「解決地區、部門的領導權問題。」^(註四)無疑，貪污腐敗已使部分政權組織不能取信於民，威望驟減，為扭轉這個局面，朱鎔基強調：「在反腐敗問題上中央是有決心的，也是要給全國人民一個明確說法和實際答覆的，這個問題不解決，中國就無法保證長治久安，中央也不會真正樹立起權威來的。」^(大略)^(註五)朱鎔基深知要真正反反腐敗並不是簡單的事，但他亦堅稱「先打老虎（指較高級官員犯的大案要案）後打狼」，^(註六)他並悲壯地指出：「絕不姑息手軟！準備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無非是個同歸於盡，可以換來國家長久穩定地發展，讓老百姓對國家對我們的事業有信心。」^(註七)

九五年初開始，一場觸動人心的廉政風暴在中國掀起。

二 反腐販風暴與陳希同下台

(1) 反腐敗的幾件大案

在九三年推行經濟宏觀調控期間，江澤民曾要求各地反腐敗要取得階段性成果，結果在九四年處決了長城公司非法集資案的主腦沈太福，而國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時亦因受此案牽連而判監。

九五年開始，在中紀委會議召開前後，中央加強查處大案的力度。九五年一月，原貴州省政協常委、貴州省委書記夫人閻健宏因貪污罪被判死刑；九五年二月，首都鋼鐵總公司黨委書記兼董事長周冠五之公子、首鋼之香港關聯企業董事長周北方被中央下令審查，周冠五亦宣佈辭職；周北方於九六年下旬被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此決定於九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公佈。九五年三月，在全國人大會議召開前後，中央最高人民檢察院下令拘留廣東省人大副主任、原東莞市委書記歐陽德，控訴其受賄人民幣五十多萬，並於九六年六月判處其有期徒刑十五年；更具爆炸性的是北京市常務副市長王寶森因涉及經濟違法問題，於一九九五年四月四日自殺身亡，至四月廿六日，原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因王寶森案件向中共中央

提出辭職，隨即獲中共高層批准，翌日，中央即任命政治局委員、中紀委書記尉健行接管其職。四月廿七日當天，中央政治局七個常委接見北京市委全體人員、宣佈陳希同辭職及尉健行接任的決定，並隨即向省一級下達文件，通報陳希同事件。兩天後，中央再向省一級下達文件，重申全力反腐敗，並針對性地指出「無論甚麼人，有甚麼後台，如有貪污也要懲處。」(註八)

就王寶森案件，中紀委經過幾個月的調查，於九五七月四日公佈結果，尉健行用「駭人聽聞、觸目驚心」八個字來形容王寶森的罪行，他並說：「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查處的案件中最嚴重的。」(註九)王寶森被指犯了下列幾大罪狀：貪污公款並挪用公款供給與他關係密切的人進行營利活動，結果造成一千三百多萬美元的損失；揮霍大量公款，營造豪華別墅，長期包租賓館客房作為享樂場所；違法批貸巨額資金，造成大量資金流失；道德敗壞，生活糜爛。(大略)(註十)基於王寶森罪行嚴重，中紀委負責人認為王寶森「死有餘辜」。(註十一)在九五年九月廿八日的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中，中共中央通過了中紀委〈關於陳希同同志問題的審查報告〉，批評陳希同在擔任北京市委書記及市長期間，犯了四大錯誤，分別是一、嚴重失職，對王寶森的違法犯罪活動負有重大責任；二、腐化墮落，生活奢靡；三、利用職權，為其親屬等人謀取非法利益；四、利用職務之便收受貴重禮品。(註十二)

(2) 中央查處陳、王案件的策略

為深入調查王寶森、陳希同案件，以及將反腐敗鬥爭更徹底的進行，並同時保持全國的穩定，江澤民提出：「反腐不搞突擊，不搞運動，重在抓大案要案，分階段深入。」(註十三)而中央亦就反腐敗行動訂出五條規定：

1. 反腐敗鬥爭要按中央的要求有秩序的進行；
2. 反腐敗鬥爭要由各級黨委領導，充份發揮紀委、監委的主導作用；

3. 不搞群眾運動；
4. 在此鬥爭中要防止可能出現的犯規、犯法和犯制度(如不上班去搞串連)的行為；
5. 反腐敗不受外界輿論干擾，要警惕海內外敵對勢力趁機煽動，製造混亂。(註十四)

由於陳希同與王寶森是北京市的最高領導，其下台引起整個北京市政府官員人心惶惶，為穩定北京市的局勢，江澤民於九五年十一月率領中央高層要員，花了三天的時間，專門視察北京市的農村、工廠、學校、民居及各方面的建設。對於北京之行，江澤民指出：「我這次來，就是要給北京市的廣大幹部和群眾鼓舞幹勁、鼓舞士氣、鼓舞信心的。」江並提出：「決不能因為陳、王的問題，就看不到北京市的工作成績」，「要把陳希同和王寶森同北京市的幹部劃開來。」(註十五)

(3) 總結教訓——北京反腐敗的六條規定

在處理陳希同、王寶森案件的過程中，尉健行提出應要從此事件中總結教訓和具體經驗：「我們現在需要的不是從大的原則高度去上綱去總結，而是要研究中間層次的問題，也就是從制度上、機制上去總結，從具體問題出發來看漏洞在哪裡，以尋找對策。」(註十六)他並提出要以王寶森等人為戒，從市委、市政府領導成員的行為規範上提出若干有針對性的具體要求。(註十七)

九五年十月十日，北京市委常委將其起草的〈關於吸取陳希同同志嚴重錯誤教訓的報告〉提交北京市委討論，尉健行在總結報告時指出，總結陳希同錯誤的教訓，務須見諸行動，馬上去做，並要認真遵守六條規定：

1. 在政治上與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保證中央政令在北京的暢通，做到令行禁止；
2. 要抓黨風廉政建設，抓反腐敗，領導幹部由於失職，使所屬部門發生重大經濟犯罪案件，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的，要追究其責

任；

3. 加強決策民主化、科學化，按照各自分工和規定的權限，履行職責。重大問題、重大項目和較大額度資金的安排和使用，要經集體討論和決定，不能個人說了算；
4. 提拔幹部必須嚴格按規定程序認真考察、審批，多數群眾不贊成的暫不提交常委委討論；
5. 市級領導幹部要管好自己的配偶、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由於縱容、支持甚至包庇發生嚴重問題的，要追究領導者責任；
6. 認真貫徹中央關於廉政建設的一系列規定，今後一律不准用公款在酒店包房、接受的禮品，必須按規定登記，超標準的要上交、不得超標準裝備汽車、不得用公款裝修住房以及不准參加高級消費俱樂部和高消費活動。（註十八）

此六條規定的內容實際是回應陳希同及王寶森的錯誤，並能一般針對全國貪污問題的重要環節，對中央反腐敗工作有重要價值。

（4）對中共反腐敗行動的評析

1. 打大老虎，提高第三代領導人的權威

北京市的腐敗確實已到了極其嚴重的地步，作為地方的最高領導，竟然利用手中的權力，縱容下屬，結黨營私，中飽私囊，揮霍無道，此等行徑實嚴重影響執政黨的公信力。江澤民推行的反腐敗行動，敢向政治局成員開刀，在中國這個人事錯綜複雜、極重視關係的社會裡，實在絕不容易。依法懲治陳希同，對其他地區的腐敗分子產生極大的震懾力，有利反腐敗鬥爭的深入發展，這對糾正老百姓深痛惡絕的貪污腐化行為有極大幫助，並能在市民心目中建立起以江澤民為首的第三代領導的統治權威。

2. 解決中央地方關係，保證政令暢通

無可否定，江澤民打擊北京市的貪污，除卻平抑民怨外，客觀上更

達至宣揚地方須與中央保持一致之重要訊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錦濤在北京市委領導幹部會議上指出，處理陳希同事件有「四個有利」於，其中一個是「有利於北京各方面工作的順利進行」。四月三十日，即中央批准陳希同辭職後的數天，《北京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認為中央批准陳希同辭職充份顯示「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集體領導是堅強有力的」，並表示「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保證中央的政令暢通。」而在十月北京市委制定的反腐敗六條規定的第一條中，亦提出要「保證中央政令在北京的暢通，做到令行禁止。」

上述事件清楚顯示，陳希同下台的原因除卻貪污腐化外，亦因他沒有在政治上與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一致，沒有維護中央權威，不顧全大局，不執行中央政策，實際上搞「獨立王國」。

在中央查處貪污事件前，北京市政府已因部分外商投資項目之建設立項擅自突破中央對地方之審批金額限制，並破壞北京市總體發展等問題，遭國務院中央嚴厲批評。此外，據審查陳希同錯誤的資料顯示，王寶森曾在陳希同的支持下，向中央隱瞞北京市財政收入約幾十億元，並把這筆隱匿不報的資金進行違法活動。此外，王寶森更按陳希同的指示，在香港進行違反中央禁令的投資。基於此，中央處理陳希同事件不僅是反腐敗問題，亦是解決地區或部門領導權的問題(註十九)，最終的目的，是要各級黨委自覺地與中央保持一致，保證中央政令暢通，維護中央權威。

三 深化改革，健全監督機制，根治腐敗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出現嚴重貪污問題，最根本原因是經濟體制改革不徹底，即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由於政府宏觀調控手段及經濟法例跟不上，計劃價格與市場價格並存與及其他漏洞，造就機會予掌權者可以利用調動物資的權力，通過簽發一紙批文倒賣受計劃價格限制的平價物資予自由市場，或鑽其他經濟體制運作不健全的空子，賺取數額龐大的利益。

要根治貪污，最重要的是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完善經濟法規，加強政府宏觀調控經濟的手段，進一步消滅計劃內外價格並存的雙軌制，並更深入分析市場經濟之運作，堵塞漏洞，杜絕貪污腐敗的經濟體制溫床。

此外，政府應加強體制內外對官員運用權力的監督。可以說，北京市委提出的六條規定，尤其有關決策民主化的一條更是切中時弊，避免個人專權。除此之外，中央應逐步推行政治體制改革，進一步強化人大、政協以及社會團體的監察功能，加強輿論監督，提高新聞的透明度，這樣方能充份發揮社會對政府的監察功能，配合中央長期堅持的反腐敗工作，在最大程度上杜絕貪污。

四 九七年中國反腐敗的部署

一九九六年十月初中共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有關加強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決議中，指出「腐敗現象在一些地方蔓延，黨風、政風受到很大損害。」^(註二十)基於此，中共提出在今後五年，應認真處理群眾關注的重要問題，其中第一項就是「堅決制止黨政機關和幹部隊伍中存在的消極腐敗現象，進一步樹立密切聯繫群眾、勤政務實、廉潔奉公的優良黨風政風。」^(註二十一)

根據黨中央的決定，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思卿在九七年三月全國人大會議上指出，九七年要繼續反腐敗查辦大案要案，促進黨風廉政建設；加強執法監督，推進依法治國。^(註二十二)而中國監察部副部長馮梯雲亦指出，九七年監察部查辦的案件著重於黨政機關、行政執法機關、經濟管理部門、司法機關，縣處級以上的領導幹部作為主要關注對象，並關注查處組織人事工作上的違紀行為，發現買官賣官從嚴查處。查處基層幹部違法、侵犯群眾利益的問題。要認真查處國有企業幹部以權謀私、侵佔國家財產。其中尤以金融、証券、房地產、土地批租、建築工程項目承包發包等作為查案重點。^(註二十三)

馮梯雲指出，九七年監察部的工作突出兩大重點：

(1) 嚴格政治紀律。各級黨政機關要與中央保持一致，絕不允許有令不

行；絕不允許地方、部門的保護主義；反對組織人事上的任人唯親、買官賣官違紀行為，並要追究當地領導人的責任。

- (2) 強調艱苦奮鬥，從世界觀上解決問題。中國人口多，底子薄，地區發展不平衡，決不能鋪張浪費。只有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才能抵抗腐敗現象。治理腐敗的根本之道，一是教育，一是法治。（註二十四）

第二節 嚴打懲匪幫

一 嚴打行動的背境

九六年一月至二月，全國公安機關重大刑事案件立案比九五年同期上升十二點六。其中突出問題包括：

「重大搶劫案件明顯增多，接連發生犯罪分子以金融單位、運鈔車、珠寶行為目標，持槍搶劫巨額財物的惡性案件，車匪路霸在一些地段又有抬頭；殺人犯罪案件增多，影響惡劣；連續發生犯罪分子蓄意報復社會的爆炸案件；一些地方犯罪團伙活動猖獗，尤其是一些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犯罪團伙和流氓勢力為非作歹、橫行不法、欺壓百姓，成為一些地方治安混亂的主要原因；制販吸食毒品、拐賣婦女兒童、賣淫嫖娼、制黃販毒、賭博等社會善惡現象仍在不少地方繼續蔓延；相當數量的槍枝彈藥、爆炸物品、管制刀具非法流入社會，對社會治安構成極大威脅。」（註二十五）

令全國更為震動的，是九六年二月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沛瑤，在家中被潛入行竊的歹徒刺死，殺死李沛瑤的兇手，竟然是負責保衛李沛瑤的武裝警察部隊士兵。

二 中共的部署

(1) 公安部對嚴打鬥爭的具體部署

針對日益惡化的治安形勢，中共中央決定於全國範圍內開展一場以

「抓現行、破大案、追逃犯、挖團伙」為主要任務的「嚴打」行動，並於九六年三月下旬成立「中央嚴打領導小組」，以及在四月中旬成立隸屬於此領導小組的「嚴打指揮辦」。與之配合，國務院公安部亦成立「嚴打工作領導小組」，以領導準備開展的嚴打犯罪的行動。

九六年四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任建新在公安部召開的「嚴打」工作會議中指出：「迅速組織『嚴打』鬥爭，是黨中央作出的重要的決策。」他更提出各級黨委、政府的領導要認真負起責任，切實搞好社會治安和穩定，「任何時候都不能有半點疏忽。」（註二十六）任建新進而要求各政法部門在「嚴打」中要緊密配合，協同作戰。公安機關要集中力量攻克特大惡性案件，限期破案，而各級檢察、審判機關要加快辦案速度，「依法從重從快」懲處犯罪分子。（註二十七）

公安部副部長白景富受公安部黨委委托，對是次「嚴打」鬥爭作了具體的部署，重點為：

1. 各地公安機關要精心組織，因地制宜，明確重點，組織相對集中的行動；
2. 運用法律，依法從重從快懲處犯罪分子，並加強「嚴打」聲勢；
3. 將「嚴打」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及維護社會政治穩定的工作結合起來；
4. 廣泛發動群眾，與各有關部門協作配合，並抓好隊伍的組織動員，以嚴明紀律保證嚴打鬥爭能順利進行。（註二十八）

在召開部署「嚴打」工作的同時，中國政府對殺害李沛瑤的案犯所在的武警部隊，從總隊長、政委至基層警官皆進行了全面撤換，對此，江澤民指出專政機關和公安、武警隊伍必須搞純潔，發現不純分子要及時果斷地清理出去。（註二十九）

（2）嚴打的幾個階段

此外，中國政府基於不少犯罪組織與當地黨政機關有聯繫，故北京市委書記尉健行便針對性的指出：「有些大案是內外勾結的，對涉及到黨政機關、政法部門或某些企業單位內部的人員要徹底清查，嚴加懲處，

不留後患。」(註三十一)

九六年四月底，在對台灣海峽的軍事演習結束後不久，中央正式宣佈「嚴打」鬥爭開始。「嚴打」第一階段所針對的對象主要是車匪路霸、具黑社會性質的犯罪組織、入屋搶劫殺人及販黃製黃的分子，故此，在九六年中，中國各地不斷出現犯罪集團被偵破的震撼性新聞。

而在六月上旬伊始，中國的嚴打目標出現細微轉變，掃毒、掃黃、緝槍的案件增多，而適逢中美知識產權談判在即，各地打擊非法盜版電子出版物的行動大幅增加。(註三十二)此外，大規模的「嚴打」行動更暴露了某些公安人員與犯罪集團勾結的事實，江澤民在看到有關此方面的報告後更嚴厲批評某些地方的公安部門是「警黑(道)一家」。(註三十三)

踏進九六年冬季，為防止刑事犯罪活動在冬季發案高峰期內反彈，及打擊政府內部包庇罪犯的「保護傘」，中央政府決定開展「冬季嚴打」。在九六年十一月下旬召開的全國公安廳、局長電話會議中，公安部要求各地公安機關繼續「破大案、打團伙、追逃犯」，「狠狠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堅決掃除『黃賭毒』，集中整治一批治安混亂地區和部門」。(註三十四)在是次會議中，公安部長陶馯駒指出四月開展的「嚴打」已取得成效，然而，亦付出沉重代價，在四月至九月，死了一百零三名公安人員、受傷的達到四千一百名。(註三十五)

九七年一月下旬，中共中央紀律檢察委員會及監察部發出通知，要求「掃黃」及「打非」(打擊非法出版物)。*(通知)*指出，非法出版物的泛濫，往往與地方官員的腐敗和地方保護有密切關係，一些地方負責人為了當地經濟的一時發展，或是為了得到經濟上的好處，而索賄受賄，包庇犯罪分子，為非法出版活動和「制黃」活動開綠燈，這就是非法出版活動屢禁不止的原因。

為配合中央工作，各地區皆作出部署。廣東省公安於九七年一月發出糾正並檢查「不正之風」的通知。這些不正之風可從側面顯示部分地方執法機關腐敗的情況：(註三十六)

1. 在執法中以案謀利，辦人情案，以罰代刑；

2. 在辦理登記城市戶口和各類證件、牌照中，刁難群眾，從中取利；
3. 以緝私為名，亂扣物品、亂罰款；
4. 要特權，刑訊逼供，濫用槍支警械；
5. 擅自設立收費項目，巧立名目在公路上亂設站卡，亂收費；辦案收取「辦案費」或要「捐贈」；向所屬區域單位索取贊助，並要求這些單位支付應由其單位或個人支付的各項費用；
6. 越權辦案，插手經濟糾紛，為他人追款討債；
7. 涉足「黃賭毒」，為這些違法人員充當保護傘；
8. 利用公安職權搞壟斷經營、違法經營，強行規定購買指定產品，指定施工單位、收取工程保證金等。

經過三個月的冬季嚴打，直至九七年二月，中國公安機關破獲各項刑事案件共三十八萬餘宗，查獲各類非法犯罪伙團一萬餘個，並抓獲各類逃犯二萬三千名，在此基礎上，中國政府在九七年三月中下旬開始部署九七年春季嚴打，重點打擊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犯罪組織，集中整治一批治安混亂地區，繼續收繳非法槍支彈藥。（註三十六）

三 對「嚴打」的總結

中國社會經濟正處在變革階段，貧富差距擴大、流動人口增加、社會保障不足、過往道德規範崩潰，人人爭相「向錢向」。在法律、社會福利及各種社會管理措施未及跟上的情況下，一方面，部分握有權力的政府官員利用職權包庇罪犯，並徇私舞弊、貪污枉法，在另一方面，不少離鄉別井的「盲流」或不擇手段求富的人士，則跳下法網犯罪，導致犯罪率上升。

可以預見，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社會福利增加、國民素質提高、法制及監察力量的健全，中國的犯罪率將會逐漸下降，然而，這將是一個長期的趨勢。故此，縱使中央的「嚴打」行動能有助抑制犯罪，但

要整體的較全面的改善中國的社會治安，除卻中央要持續的推行反腐販、「嚴打」犯罪，加強政法隊伍建建設外，還必須繼續推行全民的道德文化教育、不懈推行禁毒禁黃行動、健全法制、加強各項社會保障、逐步改善政府官員的待遇、強化社會及輿論監督、完善經濟體制改革、堵塞各項漏洞，免給握有權力官員可乘之機，這樣才能從長遠更根本的改善中國的社會治安狀況。

第三節 思想道德建設——從「講政治」到「精神文明建設」

除進行嚴打及反腐敗外，為保証幹部及人民有正確的思想，江澤民在九五年九月底的十四屆五中全會召集人會議上，強調「領導幹部一定要講政治」，而在九六年十月十日的十四屆六中全會上，中共央更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實際上，中國政府自從五中全會以來曾做了大量工作，包括江澤民多次發表談話，並通過各種媒體發表大量文章，宣傳幹部要講政治及建立精神文明，此外，中央更樹植正氣，宣揚先進事蹟，鞭撻醜惡，揭發壞人壞事。上述工作皆顯示中央高層進行思想道德建設的決心。

一 中共強調幹部講政治及建立精神文明的原因

(1) 針對幹部政治思想素質下降

這點與中共高層連續出現各種腐敗現象有直接關係。江澤民曾尖銳的批評：

「有的幹部不讀書，不看報，不研究文件，不調查研究，很少從政治上觀察形勢。有的對黨的方針政策和決策，合意的就執行，不合意的就不執行，我行我素。為了他那一點局部利益或者個人利益，甚至連犯罪的問題都加以保護。有的是非不分，違背黨的基本路線和政策的錯誤言

行也不反映、不報告、不抵制、不鬥爭。有的為了追求個人名利，熱衷於拉關係，串門子。有的精神不振，遇到問題繞著走，工作敷衍塞責。有的群眾解決實際問題，甚至欺壓群眾，有的以權謀私，嚴重損害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有的在對外交往中，不維護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有的在對外交往中，不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甚至喪失國格和人格，等等。」（大略）（註三十七）

（2）針對各種影響中國社會政局穩定的危機

中共高層多次強調越是改革開放，越要講政治，這是因為在改革開放踏進新階段後，中國需面對很多影響政局穩定的因素。江澤民曾經指出九七年下旬的「中共十五大能順利召開，關係到中國共產黨能不能將一個發展的、繁榮的中國帶入下個世紀的大問題，而這在很大程中上取決於政治的穩定。」中共高層認為近期影響政治穩定的因素主要有下列幾個方面：

1. 西方反華勢力和海外敵對勢力對中國的「分化」、「西化」陰謀，江澤民曾經對這「兩化」下個定議：「所謂『西化』，就是企圖在政治上用西方的多黨制和議會制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在經濟上用資本主義私有制取代社會主義公有制，在思想文化上用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取代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所謂『分化』就是利用一切手段和各種機會，企圖分裂我們的黨、我們的民族和我們的國家，使我國重新陷入舊中國那種四分五裂、一盤散沙的狀態。」（註三十八）
2. 為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進行翻案活動；
3. 黨政幹部的腐敗行為；
4. 各種社會犯罪活動；
5. 族分裂活動；
6. 城市失業職工的不滿行為；
7. 地區差距和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註三十九）

(3) 回應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精神生活方面的問題

正如精神文明決議指出，這些問題包括「道德失落、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滋長；封建迷信活動和黃賭毒等醜惡現象沉渣泛起，假冒偽劣、欺詐活動成為公害；文化事業受到消極因素的嚴重衝擊，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東西屢禁不止；腐敗現象在一些地方蔓延，黨風、政風受到很大損害；一部分人國家觀念談薄，對社會主義前途發生困惑和動搖。」(註四十)

二 講政治及建設精神文明的內容

(1) 反腐敗及發揮群眾的監督作用

在十四屆五中全會及後來的講話中，江澤民首先反覆強調反腐敗的重要性，他並強調領導幹部「要堂堂正正做人」，「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以身作側，樹立好的榜樣」，「要求別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禁止別人做的，自己堅決不做。有些事情群眾能做，我們領導幹部不能做。比如夜總會、高級舞廳等高消費娛樂場所，我看我們的領導幹部還是不要去」，為落實對幹部的監督，江澤民更提出要「擴寬黨內外監督渠道，發揮群眾監督和輿論監督的作用。」(註四十一)

(2) 重視政治大方向並與中央保持一致

至於幹部必須重視政治，江澤民首先引用鄧小平的話警告，以「防止一些同志，特別是一些新上來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復雜的鬥爭中迷失方向」，江澤民進而指：「我們搞現代化建設中心任務是發展經濟，但是必須有政治保証，不講政治，不講政治紀律不行。這一點對高級幹部尤其重要。西方敵對勢力要『西化』、『分化』我們，要把他們那套『民主』、『自由』強加給我們，李登輝要搞『台獨』，我們不講政治行嗎？不警惕不平鬥爭行嗎？樹欲靜而風不止，這是不依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此外，江澤民並意有所指的批評：「我們的高級幹部，絕大多數政治上是好的，是同中央保持一致的。但是有的幹部，也確實存在鄧小平同志所說的『在日益

複雜的鬥爭中迷失方向』的問題。」（註四十二）

（3）十四屆六中全會的精神文明決議

1. 建設精神文明的目標

在九六年十月通過的這份精神文明的決議中，中共中央提出今後十五年中國精神文明的目標是：在全民中牢固樹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並樹立對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的信念；提高公民素質、文化生活質量，並實現以社會風氣、公共秩序、生活環境為主要標誌的城市鄉文明程度的提高。（註四十三）

在此目標下，文件提出要解決當前精神文明建設中五大群眾關心的問題：

- i 制止黨政機關幹部的腐敗現象，樹立聯系群眾，廉潔奉公的黨風政風；
- ii 素正損害群眾利益的行業不正之風，反對假冒偽劣商品、欺詐行為，培養愛崗盡責、優質服務的敬業精神；
- iii 掃除黃賭毒等社會醜惡現象，反對封建迷信，形成文明、崇尚科學的社會風尚；
- iv 禁止製造和傳播文化垃圾的行為，初步呈現優秀精神產品大量湧現、文化市場活躍有序的繁榮景象；
- v 治理一些地方治安不好和環境臟、亂、差的狀況，創建更多的文明村鎮和文明城市。

2. 增加對建設精神文明的資金投入

中共深切理解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長期的複雜的任務，需要持之以恒。這主要是由於中國道德崩潰是在建設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引起經濟和社會生活的許多大變動的結果，但體制、法律、管理的完善卻需較長的過程。（註四十四）

要提高全民道德素質及發展文化事業，除卻倚靠教育及健全法制

外，更需要切實的加強財政的支持，江澤民曾指出：

「精神文明建設要有物質基礎，特別是一些現代化的宣傳手段，是要花錢的。對精神文明建設，各級政府要提高認識，採取自覺態度，給予實際的而不是口頭的支持。應該算這個帳。」（大略）（註四十五），

此外，更需建立有效的籌資機制，形成對精神文明多渠道投入的體制。為落實增加投入的主張，中國政府決定：

- i 中央和地方財政政府宣傳文化事業投入的增加幅度不低於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
- ii 健全宣傳文化事業的財政專項資金制度；
- iii 運用稅收、貸款、價格等經濟手段支持宣傳文化事業；
- iv 鼓勵並調動社會力量資助；
- v 對政府興建的圖書館、博物館、科技館、文化館等公益性事業，應給予經費保証。

此外，中央更提出在大中城市應重點建設好圖書館、博物館，有條件的還應建設博物館。有計劃地建成國家博物館、國家大劇院等具有重要影響的國家重點文化工程。（註四十六）

3. 為加強協調，決定更提出中央成立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各地方亦可建立相應的機構。（註四十七）

三 對中國政府推行思想道德建設的評析

（1）建設精神文明刻不容緩

隨著七六年毛澤東去世及四人幫被捕，「文革派」的極左路線徹底的破產，改革開放十九年來，人民開始意識到改革前那種「泛道德主義」思想的偽善。理想的幻滅，再加上物質主義的衝擊，促使不少中國人為求發財致富，彌補過往的「創傷」而不擇手段。此外，中國在經濟進一步發展，經濟體制從計劃邁向市場的過程中，很多法律、體制及社會規範仍未建立起來。在此大環境下，中國社會出現嚴重的道德失範，例如黃賭

毒等現象泛起；為求在短期內謀取暴利，假冒偽劣、欺作活動、不守商業信用等事件層出不窮；拜金主義盛行，市民爭相「向錢看」；貪污受賄等腐敗現象迅速蔓延，屢禁不止；個人主義滋長，社會缺乏守望相助的互愛精神，社會缺乏一份安全感。

在此情況下，政府及不少憂國憂民之士開始冷靜思考：文革期間的「泛道德主義」固不可取，過猶不及。但是，一個健康的社會卻仍需要進行思想道德建設，實際上「精神文明搞不好，物質文明也要受破壞，甚至社會也會變質」（註四十八）。誠然，指望幾個重大會議、領導人講話及輿論的提倡便能改變中國精神文明領域出現的問題是絕不可能的事。在現今中國社會，市民的注意力還是集中在賺錢及個人經濟之上，這是不爭的事實。然而，這卻不等於政府在面對上述困境時，袖手旁觀，坐視不理。無論推行精神文明建設是多麼的艱辛，多麼的虛渺及遙遠，但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實須正視此問題，並在可以影響的範圍內提出措施，儘量改變道德失範的情況。

基於此，中共在九六年召開中央委員會，通過〈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是一件合理的事，儘管思想道德設不可能在短期內見到戲劇性的翻天覆地效果，但朝此目標進發是正確的，也是對歷史負責的一項工作。

（2）中共的〈精神文明決議〉是一份實事求是，操作性甚強的文件，其中有很多分析精闢的論斷

〈決議〉清楚指出建設精神文明是「長期的、複雜的」，建立良好的社會風尚「要靠教育，也要靠法制」而「體制、法律、管理的完善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此外，文件亦精闢的提出反腐敗的觀點，「強調黨要加強精神文明建設的領導，必須狠狠地抓，一天不放鬆地抓，從具體事件抓起，關鍵是黨風建設和領導幹部以身作則。」並「嚴格防止把經濟活動中的商品交換原則引入黨的政治生活和國家機關的政務活動」中。

此外，〈決議〉十分實際的提出要花錢進行精神建設，故提出加強政府財政支持並建立籌資機制。九六年十二月下旬，中央更擬花十多億元

在人民大會堂西側興建國家大劇院(註四十九)，以支持高質素的文化活動。

再者，〈決議〉提出中央和地方可成立「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以加強對精神文明建設工作的協調，只要此等組織不重蹈泛空頭政治的覆轍，則這無疑是一種可保證精神文明建設能持續推行的一個有效的制度性措施。

(3) 「講政治」的真正含義

自從九五年江澤民提出「講政治」，以及中共輿論提倡建設精神文明以來，部分黨政官員和理論界人士皆擔憂「講政治」會衝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並容易受到「政治掛帥」一類「左」的干擾。

對此，江澤民指出「問題的實質，是看你講的是甚麼政治。現在，在中國如果搞『左』的政治，當然會不靈，而且會害國殃民，這是『文革』災難已充分證明了的」(註五十)，「我們講政治，絕不是像境外一些報刊歪曲的那樣，中國又要回到過去搞甚麼階級鬥爭為綱，搞甚麼『左』的那一套了。更是是也絕不會去搞其麼運動。」(註五十一)

客觀上，江澤民提出的「講政治」可包括下列幾點內容：

1. 堅持黨基本路線不變

江澤民曾指：「講政治，絕不會影響經濟的發展，更沒有任何意思要以政治代替經濟，恰恰相反，而是為了創造更加充份的政治條件和提供更好更快地搞上去。」(註五十二)故此，他指出「集中力量把經濟搞上去，實現中國的現代化，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註五十三)

2. 與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一致

江澤民曾指出「我這裡所說的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紀律、政治鑒別力、政治敏銳性。」(註五十四)

江澤民提倡的「政治方向」，實際是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黨的基本路線，「政治紀律」則是自覺與中央保持一致，對中央的決策貫徹執行；「政治立場」是指用政治方向及其紀律去處理日常具體面對的問題；而「政

治鑒別力」和「政治敏銳」則是指明辨是非，留意國際及社會動態，以作出正確的政治決定，在上述各種「講政治」的方面中，與中央保持一致，以面對國內外空前複雜的形勢，是甚為關鍵的一條。

3. 反腐敗、推行廉政建設

基於黨風關鍵重大，牽涉改革成敗，故此，中共極為重視黨政幹部應樹立聯系群眾、廉潔奉公的黨風。

以上三點，可總結為「講政治」的現實內容。

註 釋

- 註一 《人民日報》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九日
- 註二 江澤民〈在中央紀委第五次全會上的講話〉載《中央紀委四次、五次全會專輯》，中國方正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17頁
- 註三 〈尉健行同志在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日載《中央紀委四次、五次全會專輯》，中國方正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36頁
- 註四 任慧文〈中共腐敗是否病入膏肓？〉《信報》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 註五 任公芳〈江澤民喬石朱鎔基談中央權威〉《鏡報》月刊，一九九五年五月號
- 註六 同上註
- 註七 同上註
- 註八 《經濟日報》一九九五年五月八日
- 註九 《文匯報》一九九五年七月五日
- 註十 同上註
- 註十一 同上註
- 註十二 《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文件》，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6頁
- 註十三 野潭〈江澤民首次進京視察。北京市反腐又有大案〉《鏡報》月刊，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 註十四 任慧文〈中共處理陳希同事件的政策宣示〉《信報》一九九五年五月五日
- 註十五 同註十三
- 註十六 蕭路〈陳希同事件真相〉《廣角鏡》月刊，一九九五年十月，第6—8頁
- 註十七 《文匯報》一九九五年七月五日
- 註十八 《文匯報》一九九五年十月十八日
- 註十九 同註十四
- 註二十 〈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載王夢奎主編《邁進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中國言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1-31頁
- 註二十一 同上註
- 註二十二 《文匯報》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二日
- 註二十三 《大公報》一九九七三月十一日
- 註二十四 同上註
- 註二十五 《人民日報》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 註二十六 《人民日報》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 註二十七 同上註
- 註二十八 同註二十六
- 註二十九 王山…〈中國社會治安問題嚴重〉載《廣角鏡》一九九六年三月
- 註三十 《人民日報》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一日
- 註三十一 《大公報》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日
- 註三十二 〈北京要摧毀黑道保護傘〉載《亞洲週刊》一九九七年一月六日至一月十二日
- 註三十三 同上註
- 註三十四 同註三十二
- 註三十五 《商報》一九九七年一月十二日
- 註三十六 《文匯報》一九九七年三月十八日
- 註三十七 江澤民《關於講政治》，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6-7頁
- 註三十八 草蕭〈江澤民在六中講話〉載《鏡報》月刊，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 註三十九 周穎如〈六中為中共十五大鋪路〉載《鏡報》月刊，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註四十一 同註二十

註四十二 江澤民〈領導幹部一定要講政治〉載《劃清在重大原則問題上的基本界限》，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2-3頁

註四十三 同上註，第4頁

註四十四 同註二十

註四十五 野潭〈六中『文建』決議含七大內容〉載《鏡報》 一九九六年十月

註四十六 同註二十

註四十七 同註二十

註四十八 同註二十

註四十九 《文匯報》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註五十 同《文匯報》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註五十一 同註三十七，第4頁

註五十二 同上註，第3頁

註五十三 同上註

註五十四 《領導幹部要講治》，中國方正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4頁

第六十三章 台海危機、釣魚台糾紛及新時期中國外交政策

導 言

完成中國的統一大業，以及維護國家的領土完整，乃中國政府的一貫國策。在九四年的十四屆四中全會後，即中國第三代領導人進一步全面接班的時刻，江澤民於九五年元旦發表對台政策較寬鬆的「八條」講話，然而，江澤民的講話並未得到積極的結果，除著台灣總統李登輝的訪美，兩岸關係呈現緊張，並引發九六年上旬台海的軍事危機。

緊接台海危機後不久，日本從其國際戰略考慮出發，並考慮到中國第三代領導人需要和平國際環境建設經濟等原因，刻意挑起釣魚台領土主權糾紛，企圖打擊中國的建設步伐，此舉引起海外華人的大規模抗議，以及中日關係一度緊張。

站在中國立場，兩岸關係緊張及釣魚台領土糾紛，皆與美國對華戰略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基於此，中國於九十年代中期在爭取改善與美國關係的同時，積極開展「均衡外交」，加強與世界各國的合作，以抗衡針對中國的強權政治。

這章主要討論台海危機、與日本於釣魚台的領土紛爭以及九十年代中旬開始的中國外交政策。

第一節 台海危機

一 江澤民「八點講話」——中共新領導層寬鬆的對台立場

九五年農曆除夕，江澤民在由中共台辦及國務院台辦等七個部門共同舉辦的新春茶話會上，發表題為〈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的講話，提出「八點主張」。江澤民選擇在九五年初發表這個講話，一

則象徵中國政府將以更務實的態度處理台灣問題，另則表示在九四年下旬的十四屆四中全會後，其作為中共第三代領導人的地位已進一步鞏固，故此希望提出類似鄧小平解決統一問題的綱領性文件，對兩岸關係的未來發展作出政策性的提示。江澤民的八點建議如下：（註一）

- (1)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與前提。中國的主權和領土決不容許分割。任何製造「台灣獨立」的言論和行動，以及主張「分裂分治」、「階段性兩個中國」的主張，則堅決反對；
- (2) 對於台灣同外國發展民間性經濟文化關係，不持異議。惟會反對台灣以搞「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為目的之「擴大國際生存空間」的活動；
- (3) 進行海峽兩岸和平統一談判，談判過程可以吸收兩岸各黨派、各團體有代表性的人士參加。建議舉行「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進行談判」；
- (4) 努力實現和平統一，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中共並提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決不是針對台灣同胞，而是針對外國勢力干涉中國統一和搞「台灣獨立」的圖謀的；
- (5) 大力發展兩岸經濟交流合作。不論在什麼情況下，都會維護台商的權益；
- (6) 五千年文化是維繫全體中國人的精神紐帶，實現和平統一的重要基礎；
- (7) 尊重台灣同胞的生活方式和當家做主願望，保護台灣同胞一切正當權益；
- (8) 歡迎台灣當局領導人以適當身份前往大陸訪問，中國大陸官員亦願接受台灣的邀請前往台灣。中國人的事我們自己辦，不需借助任何國際場合。

「江八點」與中共過往對台政策相比，作了三項重大修訂，表現了中共對台政策的誠意。首先，是提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提倡進行結束兩岸敵對狀態的和平談判，更明確提出對台動武的兩個原則，客觀上排除其他對台動武之理由。

其次，建議談判可以吸收台灣國民黨政府以及其他政治團體參與，等於為接受提倡「台獨」的民進黨參與談判製造有利基礎；此外，歡迎兩岸領導人互訪，增加友好氣氛。

雖然中共了解李登輝自任台灣總統以後一直縱容「台獨」觀點，並刻意將台灣建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開拓國際政治空間，推行一種維持台灣現狀、重視穩定而又偏向「台獨」的政治路線，但只要李登輝沒公開提倡「台獨」，中共對他仍立足於爭取。其實，在江八條發表前，曾發生過台軍誤擊廈門事件，事件發生後，中共軍方態度強硬，認定是台灣刻意對抗，並要求中央召開擴大會議來討論對策。然而，江澤民為保持兩岸緩和氣氛，以便「江八條」這個綱領性的文件發表，批示避免擴大事態。（註二）

二 台灣對江八條之回應——李登輝六條及其訪美行動

(1) 李登輝六點講話之政治涵意

九五年四月八日，李登輝在台灣國家統一委員會改組後的第一次會議閉幕時發表談話，提出「六條主張」，（註三）正式回應江澤民的「八點主張」。李登輝的六條主張重點為：一、在兩岸分治的現實上追求中國統一；二、以中華文化為基礎，加強兩岸交流；三、增進兩岸經貿往來，發展互利互補關係；四、兩岸平等參與國際組織，雙方領導人藉此自然見面；五、兩岸均應堅持以和平方式解決一切爭端；六、兩岸共同維護港澳繁榮，促進港澳民主。

縱觀李登輝整篇講話，可發覺其語氣緩和，提出推進兩岸的文化與經貿交流，協助大陸改善農業。然而，在一些與中共有原則性分歧的重點上，則立場不變，沒有絲毫鬆動。此外，有關「促進港澳民主」的提法，更顯露台灣政府「進一步參與港澳事務」的決心，在港澳問題上與中共角力：

1. 李登輝強調台灣與大陸為「互不隸屬的政治實體」，形成了「海峽兩岸分裂分治的局面」，台灣政府「持續擁有對臺澎金馬主權與治

權」，並提出只有客觀對待上述現實，方能對「一個中國」的涵意，獲得較多共識。（註四）相當明顯，李登輝的提法直接否定「一個中國」就是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與大陸「互不隸屬」，亦間接否定了中共提出的「一國兩制」，台灣將成為中央政府統治下的「臺灣特別行政區」之觀點，不願將台灣變為地方政府。

2. 堅持兩岸「平等參與國際組織」，並批評中共「處處否定、排擠我們在國際上應有的發展與地位」，（註五）此觀點表明台灣希望能自由擴闊其政治經濟等所有領域之國際活動空間，杜絕北京將來阻礙台灣參與各個國際組織如經濟上的亞太經合組織，體育上的亞運，甚至聯合國等。此點亦可引伸台灣將來可與各國，包括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邦交的國家，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容許這些國家同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中華民國，至此，台灣領導人便可自由出入各國，擴大台灣的國際政治影響力。
3. 李登輝提出台灣已於九一年承諾「不再對大陸使用武力」，而大陸卻以針對「所謂『臺獨勢力』或『外國干預』作為拒不承諾放棄對臺用武的理由，是對中華民國立國精神漠視和歪曲」，故希望大陸「聲明放棄對臺澎金馬使用力」。（註六）在兩岸軍事力量對比有一定差距之情況下，台灣根本再無反攻大陸的力量，然而，對中共來說，不承諾無條件放棄武力則可對台灣及島內台獨力量產生震懾作用，有效打擊外國介入，迫令台灣進行談判，促進兩岸統一。
4. 李登輝提倡「積極回應港澳居民的要求」，「促進港澳民主」，是台灣「無可旁貸的責任」，此訴求除卻隱晦帶出對中共就民主問題的批評外，更顯示台灣希望與中共在港澳事宜上爭權，加強對港澳政策的影響力。這點的政治含義十分重要，台灣領導人以具體介入港澳問題的政策，清楚表明中華民國才是「一個中國」的正統，故李登輝指出「香港和澳門是中國固有領土」，「中華民國政府一再聲明，將繼續維持與港澳的正常連繫」，（註七）充份顯露李登輝希望在影響中國發展的某些問題上，以整個中國的領導人身份與

中共爭權的氣派。

(2) 台灣對大陸的具體政策

九五年五月卅日，台灣召開高層次的「大陸工作會議」，從行政院長連戰與「陸委會」負責人蕭萬長的講話中，可以更清晰看到在李登輝六條講話的大原則下，台灣對大陸的判斷與具體政策。連戰的講話重點包括：

1. 影響統一的癥結，不在外力干預和台獨，而在兩岸政經制度和生活方式差距太大；
2. 今後大陸工作的目標在於維持台海兩岸關係的穩定和諧，而工作重點則以經貿為主軸，文化為核心；
3. 工作中要注意的問題，大陸目前有「六座大山」不易越過，即：黨意與民意落差、中央與地方對立、城市與鄉村失控、經濟與政治失衡、制度與現實失衡、物質與精神矛盾。大陸內部是穩定還是動亂？政經改革是成是敗？是今後制定大陸政策的依據。（註八）

蕭萬長則提出對大陸工作的基本立場為視正統、法統及中國代表權等是分裂中的兩岸政府共同擁有；「反對以地方政府待我」；而在具體工作方面則提出：絕不是聽中共一手安排；中華民國存在的歷史與現實必須受到尊重；台灣的安全必須有一定保障；以及台灣必須有國際生存空間。（註九）

是次會議在李登輝宣佈訪美期間進行，可視為台灣對中共及美國打出的政治試探氣球。

(3) 李登輝訪美及爭取加入聯合國之行動

九五年五月二十二日，美國正式宣佈批准李登輝赴美作私人訪問，而令國際尤為關注的，是李登輝在訪美前夕，即從九五年五月底至六月初不到十天的時間裡，台灣出動飛機、大砲、坦克、艦艇舉行四次「反制大陸進攻」的軍事演習，不尋常的是，李登輝在各高級將領陪同下，親自

校閱三次軍事演習，並發表講話，批評中共「政權一向詭譎多變，口是心非」，指出「可以百年沒有戰爭，不可一日沒有戰備」，並勉勵台灣官兵「有所警惕」。^(註十)李登輝的行動使兩岸加添緊張氣氛。

李登輝的訪美行動得來不容易。九四年秋天，美國參議眾議兩院通過議案，提出不應發出簽證予台灣高層官員入境，然而到了九五年五月四日，眾議院卻以三百九十六票對零票，通過〈台灣關係法〉修正案，指示「美國國務院不得以可能對美國外交政策不利為由，禁止台灣的民選總統訪美。」五月十四日，參議院再以九十七票對一票，支持李登輝回其美國母校作私人訪問。^(註十一)為爭取李登輝訪美，台灣以每年一百五十萬美元的代價，聘請以華盛頓為基地、與美國政府和國會有良好關係的卡西迪公司收集美國及有關國家的政經資料，同時委托其協助台灣開展外交工作，以拓展台灣的國際政治空間，推動李登輝訪美只是其中一個工作，其他為「促成中華民國加入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註十二)在此公司與台灣官員的努力下，終於成功游說參、眾兩院批准李登輝訪美。

李登輝訪美名義上以私人性質進行，然而此行對拓展台灣的國際政治空間實有極大意義：

1. 增強國際對台灣「政治實體」的承認

十分明顯，李登輝訪美是為了引起國際社會對台灣作為一個「政治實體」之承認。

當李登輝抵達洛杉磯時，美國派出大量警力接送他，一名警官說：「除車子沒有插國旗外，其他與元首待遇並無兩樣。」^(註十三)此外，雖然美國國務院務為使李登輝的訪問符合非官方性質，故對各接待單位提出「不掛國旗、不用國號、不稱總統」的「三不指導」原則，但觀乎李登輝訪美之行，這些規定根本無人遵守，甚至連美國政府發言人亦毫無顧忌地「一口一個『李登輝總統』」。^(註十四)美國以上措舉，巧妙地配合台灣政府通過對李登輝的尊崇，從而達至加強台灣在國際社會中作為「政治實體」之訊息。

2. 為台灣加入國際組織及聯合國鋪路

通過加強台灣作為政治實體的訊息，有助加強台灣加入各國際組織的籌碼。英國《金融時報》以〈李先生的大躍進〉為題，指出李登輝赴美訪母校，看似小事，實質是大躍進，中華民國可藉此要求更多「有形承諾」。報章進而指出，中華民國迄今被拒於「世界貿易組織」會員國外，顯得極不公平，為何一定要等到中共成為「世貿」會員後，中華民國才能加入。（註十五）

3. 鼓勵其他國家效法放棄「一個中國」的政策，以加強台灣與各國在外交上之聯繫

透過美國這個超級大國批准李登輝訪美的先例，鼓勵更多其他國家效法放棄一個中國政策。此外，由於台灣政府清楚沒有美國的支持，要對抗中共十分困難，故李登輝希望通過是次訪問，加強台灣與美國在政治、外交、經濟及軍事上的聯繫，壯大台灣的實質國際支持基礎，並造成骨牌效應，使更多國家對台灣作出支持。

李登輝結束赴美訪問後，台灣緊接著宣佈行政院長連戰訪歐，而李登輝在返抵台灣後，先後在各縣市舉行接近三十場演講，場場罵中共「無知」、「大棵呆」、「不理性」、「文化水準不夠」、「要學點現代知識」，每罵一次群眾狂熱鼓掌。（註十六）

六月二十六日，李登輝以中華民國總統名義發表文章，而錢復則以中華民國外交部長名義致函聯合國秘書長加利，以及除中國大陸及外蒙古以外的各聯合國會員國之外交部長，要求加入聯合國。李登輝和錢復的主要觀點是台灣經濟強大，政治民主，但卻被剝奪在聯合國的代表權，故極希望參加聯合國，而只要能參與聯合國，可以不計名稱，並承諾可以運用豐厚的資金援助聯合國各項發展計劃。（註十七）

李登輝謹密的部署，實際上已將台灣在國際社會中發展至一個擁有獨立國家內容的政治實體，誠如九五年下旬民進黨主席在美國指出：「台灣事實上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即使將來民進黨執政，台灣也沒有必要再一次宣告獨立」；他更指出台獨是「中華民國模式的台獨，即李

登輝總統日來一再重申的『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意義內涵。」(註十八)

值得注意的，是李登輝在訪美前後，中共的態度仍相當克制，故引起全世界的輿論都譏諷中共中央軟弱無能，甚至斷言中共第三代領導人之繼承出了問題，大陸將趨不穩。在台灣的政治外交攻勢下，中共開始採取強硬措施。

三 中共採取強硬對台立場——實施軍事演習

九五年六月十五日，中共得悉連戰將出訪歐洲，台灣再度開展外交出擊。在軍方的強烈要求下，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召開緊急會議，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及張震列席。是次會議決定推遲召開「辜(振甫)汪(道涵)會談」，召回駐美大使李道豫，發動輿論公開批判李登輝，以及對台進行軍事演習。(註十九)這裡將重點討論中共對美台的立場；中共對台新政策之內容；以及發射導彈之涵義與影響等三個方面。

(1) 中共對美、台立場的分析

中共認為九五年兩岸關係緊張，是李登輝鼓吹台獨及兩個中國，以及美國慾惠台獨勢力而造成的。

中共指出一直以來他們皆希望用和平方針解決台灣問題，江八條是誠意友善的表現，惟李登輝卻置若罔聞，在九五年六月訪美後，在分裂的道路上愈走愈遠，其大陸政策實為「一國兩體、分裂分治、先實後名、假統真獨」，在行動上則以「對抗代替溝通」，而對外國勢力則不惜工本大搞溝通，以便籠絡國外勢力對付「中共威脅」，其所作所為已不像一個中國人。(註二十)

北京亦視美國干涉為兩岸關係緊張的另一原因。北京認為過往台灣問題的產生，亦主要是外國勢力介入的結果，例如一九四五年中國抗戰勝利後，國民黨依仗美國支持，發動內戰，失敗後退踞台灣；一九五零年，美國派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第十三航空隊入駐台灣；五四年，美國與台灣政府簽訂《共同防禦條約》，將台灣置於美國保護下；七九年中美建交後，美國又通過《與台灣關係法》(註二十一)；九五年，美國批准

李登輝訪美，公然違反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美國更違反與中共簽訂的〈八一七公佈〉，出售大量先進武器予台灣；九五年六月八日美國更改〈與台灣關係法〉，使其地位凌駕〈八一七〉公佈，意味美國今後出售武器予台灣將不再受任何質量和數量的限制；在同一天，美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更通過「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及世界貿易組織的修正案」。^(註二十一)上述事件清楚表明，外國勢力加緊插手台灣事務，是害怕大陸改革開放帶來巨大發展，故繼續打台灣牌、實行以華制華，不願看見中國統一強大。^(註二十二)故此，李登輝的種種行動實際上是配合美國實行通過干涉中國內政來擾亂中國現代化的對華戰略。^(註二十三)

就美國的對華戰略，江澤民曾感慨地指出，「要充份認識美國外交政策的兩面性。美國當局稱『一個強盛的、統一的、開放的中國符合美國利益』，對抗、孤立、遏制不是其選擇，這話不能輕信」^(註二十四)，江澤民進而提出十一個「為什麼」：

「(1) 他們私下裏講話說中國根本構不成威脅，為什麼又會公開地、大張旗鼓地宣揚所謂「中國威脅論」？(2) 為什麼把北大西洋組織的觸角伸到中國身邊？(3) 為什麼在中國周邊國家有種種可疑動作？(4) 為什麼有些國家人均收入超過中國，在世界貿易組織享受發展中國家的地位，而美國卻拼命堅持中國必須以發達國家的身份恢復其締約國地位？(5) 為什麼要在東亞保留十萬駐軍，並且加強日美安全合作？(6) 為什麼在南沙問題上推波助瀾，實際上鼓勵一些國家向中國提出主權要求？(7) 為什麼對華那麼嚴格地控制所謂軍民兩用技術的轉讓？(8) 為什麼不時向台灣出售進攻性武器，而且允許李登輝訪問並發表分裂中國的言論？(9) 為什麼總統要順便見一見一直從事分裂中國活動的達賴？(10) 中國已經人滿為患，為什麼還要在那裡攻擊我們的計劃生育工作？(11) 為什麼他們總是在人權問題上大做文章，惟恐天下不亂？」^(註二十五)

在九五年九月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中，江澤民指出：「美國等西方國家中的反共、反華勢力對我進行遏制的圖謀不會放棄；他們不願意看到在二十一世紀世界經濟快速增長國家的行列裡，迄立著一個繁榮富強的

社會主義中國；他們以我國為潛在對手，將長期利用台灣、西藏、人權等問題給我們製造麻煩，企圖牽制我們的發展。」(大略) (註二十七)

就台灣問題，江澤民進而指出：「美國政府允許李登輝訪美，這是一個涉及我國主權的重大事件，這一事件絕不是孤立的，是美國調整對華政策新的重大步驟，李登輝訪美徹底暴露了他推行『分裂分治』製造『兩個中國』的『台獨』面目。」(註二十八)

(2) 中共對台、美的立場

1. 中共新階段對台的新八點方針

針對李登輝、連戰的出訪歐美，以及台灣的對抗行動，中共在九五年六月中旬開始召開多個會議，並訂定新時期的對台政策，重點如下：

- i 江澤民九五年提出的江八條，仍是中共對台的總體方針政策；
- ii 堅決反對李登輝和台灣當局，借助美國對華的霸權戰略，甘當美國手中的一張牌，加速在國際進行「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和「台獨」活動。李登輝是台獨勢力的總代表，中共對他已不存任何幻想，必須將他作為頭號打擊對象；
- iii 在台灣當局不確認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兩會(海協會、海基會)會談無必要展開，不能讓李登輝藉兩會會談製造假像，實際上卻使分裂中國的台獨得逞；
- iv 對台商在大陸的投資，無論發生什麼情況，都要依法保護其合法權益，台資進撤自由，對台灣當局把兩岸關係擴大到經濟方面，諸如煽動、限制台資撤走等，要有準備；
- v 對台的政治和官方交流，必須暫停，而對兩岸的民間交流，則要盡力地維持，有機地推進，不首先中止；
- vi 對台灣當局的「務實外交」、「拓展國際生存空間」和「重返聯合國」等活動，必須採取有實質作用的斷然措施，包括局部的政治、軍事手段，而中央對台工作，即時提上重要議事日程，並根據台灣當局分裂活動的演變，即時採取對策；
- vii 對台政策必須文武並行，以硬為主，而對台動武二原則(即台

獨及外圍勢力干預)「尚不足以抑制半隱性台獨」的拖延統一策略，必須考慮重定政策，提出第三原則；

- viii 美國邀請李登輝訪問，是美國圍堵中國、分裂中國陰謀的一部份，必須強硬加以對待，惟採取強硬措施時要慎重，避免影響世界戰略平衡。(註二十九)

可以清楚看到，中共對台政策的總方針仍是兩手準備，一方面是堅持爭取和平統一，另一方面是不承諾放棄武力，正如鄧小平指出的：「還有台灣、西藏問題，不能讓搞祖國分裂的那些幾個人為所欲為，要警惕，保持一定壓力是必要的。」(註三十)

2. 中共的三大戰略方針

為落實上述幾點新時期對台政策，中共更提出三大戰略方針：

- i 「干預台政」。即由過去實行不介入台灣內部鬥爭的政策，轉為用軍事、外交和輿論的手段去影響台灣島內的政局，包括九五年底台灣立法委員選舉以及九六年三月的總統選舉。
- ii 「限期統一」。自李登輝訪美後，中共已意識到台灣問題不能無限期的拖下去，所以決定以明確統一的時間表，瓦解台灣無限期拖延統一的策略。
- iii 「武力保台」。中共「已經看透李登輝虛化『中國』，挾洋自重、誤導台灣民意、建立台灣國的圖謀，決定現階段以各種『文攻武伐』策略，逼台灣當局揚棄『台獨』，選擇『一個兩制』；倘若台灣當局執迷不悟，非搞『台獨』不可，中共一定不惜任何代價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註三十一)

至於對美政策，江澤民於九五年十月十一日接受美國傳媒訪問時揭露，美國曾於同年四月十七日向中國表示，李登輝即使は私人訪美，亦違反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但估不到數天後，白宮突然宣佈批准李登輝訪美，並稱這不違背「一個中國」政策，美國這些翻雲覆雨的表現令中共大為惱火，故江澤民重申他處理中美關係的十六條方針：「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註三十二)此外，中共高層更明確提

出：「台灣問題始終是影響中美關係的一個關鍵問題。」「中美關係重要，但是中國統一大業則高於中美關係，更重要。」「由於美國實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對華戰略，我們要準備面對任何挑戰……我們絕對不會容忍外國干涉中國內政、插手中國主權，如果我們在主權、內政原則問題上動搖、妥協，人民有權起來反對這樣的政府。」（註三十三）十分明顯，中共領導人這些話背後的意思就是「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和統一，即使因此導致中美關係決裂，中國也堅決面對，絕不會有半點退讓。」（註三十四）

（3）外交、文宣、軍事出擊——導彈演習

1. 外交攻勢——中共領導人頻密出訪

中共為執行對台、美政策，分別從外交、文宣、軍事三方面出擊。在外交方面，先後有李瑞環訪問拉美，展開民意游說；江澤民、李鵬分訪莫斯科，聲明中國外交立場；江澤民、錢其琛訪歐，與德國大做生意，爭取歐盟支持「一個中國」政策，不與台灣發生任何政治關係的立場；而錢其琛又訪汶萊，分別重申中國外交及對台政策。此外，中國外交部亦藉經常召開的新聞發佈會，迅速回應海峽兩岸事態的進展，明確中國的立場。

2. 全面系統地批判李登輝

在文宣方面，中共在九五年六月開始以高姿態抨擊李登輝。六月二十七日，新華社發表措詞十分強硬的文章，警告：「力爭用和平方式結束國家、民族分離之苦，這不意味著……統一進程無限期地拖延下去。」「如果有人膽敢把台灣從祖國版圖分裂出去，中國人民就必然用鮮血和生命來捍衛國家領土和主權的完整。」

七月二十四至二十七日，《人民日報》評論員和新華社評論員罕有地聯名發表〈四評李登輝在康奈爾大學的演講〉的文章，系統地從理論到實際全面批判李登輝，這四篇文章經中央審核，措詞之強烈為十年來罕見。用兩家聯名發表文章，在中共建國以來是第四次，前三次分別為五十年代抗美援朝、六十年代中蘇爭論以及抗美參加越戰等。

第一篇文章針對美國部分人士「把台灣當成對付中國的一條『不沉的航空母艦』」，從而批評李登輝「甘當美國手中的一張牌」，文章更攻擊李登輝「早年加入過中國共產黨，後來背叛了」，並指出李登輝背叛了不搞台獨的蔣經國。(註三十五)

第二篇文章從李登輝指出的「台灣今天與許多國家維持著極為密切的經濟貿易與文化交流關係」來反證，說明中共並無封殺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中共要反對的是「兩個中國」、「台灣獨立」的生存空間，文章更指出中共的基本立場：「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也是中國在聯合國的唯一代表，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註三十六)

第三篇文章針對李登輝提出的「主權在民」理念，中共提出：「眾所周知，在國際法上，國家的主權不能分割，不能轉讓，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政府對外行使主權，台灣作為中國的一部分，並無主權可言；台灣同胞作為有十二億人民的中華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員，不能單獨分割出去談主權。」(註三十七)

第四篇直接批評「李登輝是破壞兩岸關係的罪人」，針對其提出「一國兩府」、「兩個對等政治實體」、兩岸「分裂分治」、在國際上提出「階段性兩個中國」等主張，尖銳的指出「指望李登輝這樣一個不知道中國為何物的人來改善和發展兩岸關係，無異於緣木求魚。全體中國人對李登輝切不可抱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註三十八)

除卻上述一系列重頭文章，《人民日報》再於八月三日至九日發表四篇文章，「評李登輝的『台獨』言行」，中共並發動大陸傳媒廣泛批評李登輝，加強輿論攻勢。

3. 中共軍事演習的政治涵意

中共解放軍在九五年七、八月以及九六年三月台灣進行總統選舉期間，進行過兩輪大規模的導彈及軍事演習。兩次軍事演習發射的導彈落點與台灣十分接近，而演習亦包括海陸空登陸作戰及搶灘等，實際為模擬攻台。

中共的軍事行動一度引起台灣局勢緊張，金融動盪，而在九六年三月台灣總統選舉期間，美國派遣航空母艦進駐台灣海峽附近，增加兩岸緊張氣氛，成為國際政治焦點。雖然兩岸關係在李登輝以大比數勝出當選台灣首任直接民選總統後已趨緩和，惟九五、九六年的兩次軍事演習仍有兩大政治涵意：

- i 雖然中共沒有真正進攻台灣，但通過是次軍事行動的震懾效果，促使台灣及國際社會更了解並重視北京的對台立場，那就是制止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以及反對外國干涉中國內政，並逼使台灣與大陸和談。假若台獨情況將來真正出現，北京將以武力解決，縱有犧牲，亦在所不惜；
- ii 影響台政的具體表現。中共以導彈實習，實為採取中共國防部長遲浩田提出的「用準封鎖對付準台獨」的策略，具體為影響台灣政策的走向，準封鎖的第一個戰役為打退台灣欲於九五年九月加入聯合國的企圖；第二是抑制李登輝於九五年十二月立法院選舉中獲取多數議席的計劃；第三是針對九六年三月的台總統直選，希望引導台灣民意，反對台獨（大略）。(註三十九)

（4）對海峽兩岸形勢的走向分析

1. 台灣問題使中美關係蒙上陰影

雖然台灣在近十數年經濟、政治及社會發展的成就是獲得美國國會及輿論支持的原因，然而，同樣不能忽略的，是台灣問題始終是美國圍堵中國的全球戰略之不可分割部分。

美國固然不希望中國落後到不存在著一個龐大市場，更不願意看到中國政權、社會解體，出現大規模動亂，難民出走，影響亞太區局勢穩定。但在另一方面，蘇聯解體後，美國需要聯結中國對抗蘇聯的重要性已大幅降低，而中國更是一個敢於並有實力抗衡美國的唯一亞洲大國，在此情況下，美國總要利用台灣來牽制大陸，以維持美國在亞太區的地位，避免中國這個奉行社會主義、強調民族獨立的國家成為美國在亞太

區的潛在對手。基於此，台灣實際上是美國圍堵大陸的最佳「不沉的航空母艦」，而更理想的是可利用台灣成為徹底改變大陸政權的橋頭堡。

其實，只要回顧歷史，便可以發覺由於奉行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相同，美國一直就是支持國民黨打擊共產黨的最大外國政治勢力，當國民黨政府於四九年退守台灣，及中共在一九七零年差不多可以成功爭取聯合國取代中華民國政府的地位時，美國便於七一年提出「雙重代表權」案，即既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加入聯合國，但亦不剝奪中華民國的代表權，提倡兩個中國的政策。基於此，九四、九五年台灣爭取加入聯合國的行動，實質上是一九七一年美國「雙重代表權」的重演，台灣的訴求根本完全配合美國的圍堵社會主義中國之戰略國策。

由於大陸與美國就台灣問題上之分歧實質反映著兩國力量的對抗，故可以預期，台灣問題始終是影響中美關係改善的最主要障礙。

2. 台灣將繼續循建立「政治實體」的方向邁進

在台灣，台灣本省藉人口佔百分之八十，而外省藉者只佔五分之一。支持提倡台灣獨立的民進黨選民約有三分之一在九六年總統直選上支持李登輝，而李登輝亦以過半的百分之五十四得票率順利當選，可見李登輝的政策符合台獨者的要求。

李登輝高票當選，反映台灣市民與國民黨心態較一致，那就是要維持現狀，穩定高於一切，不可統一，亦不能獨立，因為獨立與統一皆要對現狀作出重大改變，故此，就必須以拖待變，以拖緩和大陸統一的要求，維持現狀的最佳策略就是拖。

雖然台灣島內主流意識傾向維持現狀，不急於獨立，但是由於島內新生代全是在台灣土生土長，與大陸關係日益疏遠，而台灣經濟力量強大，社會制度及政治的開放程度亦與大陸有一定的差異，民間的參政改革要求強烈，在這大環境下，台灣群眾肯定會要求政府能擴大其國際政治活動空間，爭取在各國際政經組織中的合法地位，結果將使獨立運動在台灣的民間社會中繼續深化，而台灣政府為延續其統治，一定會順應民眾的要求，在國際上繼續循建立「政治實體」的方向

邁進。

3. 國民黨仍將是台灣最強大的政治力量，除非有重大變故， 兩岸關係將在一定期間內呈現膠質狀態

國民黨自四五年在台灣執政以來，與各大財團及地方派系建立互相依附的緊密關係，各集團為維護既定利益分配格局，均願意支持國民黨繼續執政，形成國民黨強大的政經基礎。

此外，李登輝的個人質素亦不容忽視，他是一個精於謀略的戰略家，善於審察時勢，調動各方面力量為其所用。首先，李登輝在一九零九年召開國是會議，邀請海外台獨分子回台，並特赦台獨分子出獄，客觀上促進民進黨的發展，機巧地利用黨外力量，打擊國民黨內反共但較堅持中國統一的國民黨元老，至九三年基本成功將大陸藉勢力趕出國民黨領導核心。其次，李登輝理解必須爭取到美國支持方能擴闊台灣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國際政治活動空間，故他趁中國大陸專注經濟發展及政治權力交班的關鍵時刻出訪美國，並維持辜汪會議和經貿交流，以拖延大陸對中國統一的要求。他亦期待到一九九九年自美法購置的二代機艦可運用後，可以從軍事上對抗大陸。第三，當台灣島內民進黨力量及台獨呼聲日益強大時，李登輝巧妙地利用中共的軍事演習，提醒台灣民眾必須面對現實，不可盲目迅速追求獨立，從而令支持民進黨的部分選民反投其一票，幫助他以更大比數當選。他這種策略，實與一九五八年台灣總統蔣介石利用毛澤東對金門、馬祖的發炮攻擊，而抵消美國迫國民黨放棄統治金馬（美國實際上要求台灣獨立）而施加的壓力，有極其相同之處。第四，雖然大陸政府在台灣於九六年三月直選總統前，反覆強調「無論台灣領導人產生方式如何改變，都改變不了台灣是中國領土一部份的事實。……如果有人企圖以台灣領導人產生方式的變更為由，為其分裂祖國的活動披上所謂合法的外衣，這完全是徒勞的。」（註四十）然而，後果是李登輝利用大陸的軍事演習，得到更多的選票，他得以利用受到群眾廣泛支持的客觀現實，加強國民黨與中共談判的實力。

從上述政治事件的發展，可見李登輝是一個殊不簡單的政治人物，若再聯繫他於九五年四月回應「江八條」的六點建議中，有關爭取港澳民主的提法，更可顯示他除卻希望穩定台灣外，更有以整個中國導人身份與中共爭權的魄力。

在另一方面，站在中共角度分析，雖然軍事演習並不能影響李登輝當選，但卻有力地打擊台獨氣焰，申明中國為維持領土完整將不惜一戰的底線，以及成功的震懾美國戰艦不敢進入中國領海而只是按兵不動，可以說，軍事演習亦已達至預期的效果。

既然台灣政府並不急於獨立，而中共亦需穩住陣腳、發展經濟、打擊貪污及推行黨的建設以進一步樹立第三代領導人的權威，從而保證鄧後時期不會出現混亂。在這大環境下，除非中國兩岸出現重大事故或一些非理性決策，在一定期間內兩岸關係基本上將維持現狀，呈現膠質狀態，不致出現太大變動。

第二節 中日釣魚台領土主權糾紛

一 中日於釣魚台鬥爭的由來——美國圍堵中國的戰略

從歷史角度，釣魚台列島在明朝初期開始已屬於中國，中國漁民從此時期開始已於此地區的海域作業。一八九五年中國於甲午戰爭戰敗後被迫將台灣割讓予日本，而在第二年日皇將釣魚台劃歸日屬的沖繩縣管治。

中日釣魚台鬥爭的歷史性根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拒不執行「波茨坦公報第八條」及「開羅宣言」，不肯把日本侵佔中國的領土全部交還中國，首先將釣魚台托管，並於一九七零年將之交予日本。

美國此舉，絕不是對歷史的無知，而是建基於極長遠的戰略考慮。美國於二次大戰後，基於冷戰氣氛及「反共為主」的立場，對日本軍國主義的舊體系以及其政商界的主要附從者網開一面，不單不追究其戰爭責任，更刻意扶持，使之成為其反共團堵政策的新盟友。^(註四十一)而將釣魚台交日本，更是蓄意製造釣魚台領土糾紛，讓中日去爭奪，在中日兩個亞洲大國之間的關係上埋下計時炸彈，形成鷸蚌相爭局面，這不單有

利於中日互相牽制，而中日爭端一旦出現，美國便可以高姿態的介入，以收漁人之利。

二 九十年代前中日就釣魚台領土主權的三次較量

一九六八年、聯合國經濟委員會發現在釣魚台附近海域蘊藏數十億噸石油。一九七零年七月，日本宣稱擁有對釣魚台的主權。同年十一月，港台等地發起了第一次民間保衛釣魚台行動。七一年，美國和日本在簽訂歸還沖繩協定時，美國有意識的將釣魚台列島划入歸還區域內，七一年十二月，中國政府發表聲明，反對「美日勾結」侵略釣魚台，並申明對釣魚台列島的主權。七二年五月，美國在歸還沖繩島時正式將釣魚台交予日本。然而，當時中國為了制衡蘇聯，向美國及日本示好，並促成尼克遜及田中角榮訪華。七二年九月中日建交，雙方同意暫擱置處理釣魚台問題，雙方並同意不採取單方面涉及主權的行動。

一九七八年、即四人幫下台後兩年，而中國正醞釀全面開展改革開放方針的時刻，中日兩國再就釣魚台主權事宜再起爭端。在七八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署期間，日本看準中國對內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對外則聯絡美日牽制蘇聯的國策，知道中國極需要穩定，在此背景下，「日本青年社」於七八年首次登陸釣魚台設立燈塔，此舉引發了中國百多艘漁船前往釣魚台水域抗議。

一九九零年「六四事件」後，日本更乘西方列強譴責中國之際，日本海上保安廳準備宣佈承認燈塔為正式航海標誌，以確定釣魚台為日本領土，當時港台及海外華僑再發起第二次保釣行動，而中國政府則派海軍艦隻在釣魚台附近海域活動，並在外交上與日本交涉，最終迫使日本放棄將燈塔作為正式航海標誌的行動。

三 中國威脅論與日本於九六年挑起釣魚台主權的鬥爭

(1) 日本有意識的挑起釣魚台領土主權論爭

從九二年鄧小平南巡，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期間開始，包括日本

在內的西方國家在國際上策劃了「中國威脅論」的宣傳，企圖挑起中國與亞洲各國的矛盾，以達牽制中國發展的目的。日本防衛廳在其九六年的白皮書指出，中國「推進核戰力和海空軍力量的現代化，擴大在海洋的活動範圍，在台灣周圍進行軍事演習，從而導致台灣海峽局勢緊張等，對這一動向必須注意」。此外，日本國際關係論壇呈交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的一份報告亦指出「種種跡象表明，中國在謀求超級大國地位和霸權，這是危險的。」日本過往一直極反對中國進行核試，並為此凍結對華貸款，這與日本對美國等進行核試的態度形成極大的反差。（註四十二）

在散佈「中國威脅論」的同時，日本更有意識的推行其外交上的鷹派強硬路線。

1. 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選擇在他生日，亦即日木戰敗紀念日的兩周前，不顧亞洲各國的強烈反對，以首相的官方身份參拜供奉包括二次世界大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
2. 縱容日本右翼團體青年社登上釣魚台豎立燈塔，並派出武裝艦隻在釣魚台海域加強巡邏，並趕走中國大陸和台灣的船隻。
3. 值得留意的，是九六年月初日本外相池田行彥一行訪問香港時，有意識的在香港這個實際是全中國保釣行動中心地區上發表釣魚台一直以來都是日本不可分割的領土，日本並在此島上行使了有效的統治，故不存在與中國在領土上有紛爭等言論，以刺激港人的保釣情緒。

此外，在九月十一日，針對釣魚台問題，中國駐日大使強調釣魚台屬於中國的同時，亦指出：「中日雙方在這問題上曾經達成共識，同意將這一問題暫時擱置，留待以後解決」，而日本的回應則是「尖閣列島（註：日本對釣魚台的稱呼）是日本的固有領土。日本從未同意將領土問題擱置處理。」這是日本首次公開否定中日存有擱置爭議的共識，十分明顯，日本是其有策略的煽動中國境外華人的情緒，以迫使中國政府要立即處理釣魚台主權這個極度敏感的問題。

（2）日本挑起爭論的背後

究竟日本為甚麼要在九六年挑起與中國的矛盾呢？

1. 國內角度

首先，持較反戰態度的前首相社會黨首腦村山富市下台，意味著日本政壇對國內「總保守化」的傾向已喪失牽制力量，這自然導致外交上的鷹派路線抬頭；其次，鼓吹民族主義，將有利爭取民心，對自民黨於九六年十月的大選極為有利；第三，日本一向不甘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擊敗，並一向期望建立強大的軍力，假若中國因釣魚台問題被激怒，與日本出現局部的軍事對峙，則日本就可以藉此向國內外宣示，其擴軍只為防衛，日本的軍國主義得以再抬頭；第四，日本雖然是經濟上的超級強國，但卻極度缺乏資源，而釣魚台水域卻蘊藏豐富的石油資源，自然會引起日本侵佔的野心。

2. 國際戰略因素

首先，日本一向害怕中國強大，成為亞洲的領導者；此外，由於中國提出和平外交，對東盟國家的南海爭端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主張，逐漸贏得東盟國家的信任，並加強彼此關係，這客觀上對日本強硬的對外路線產生某程度的制約，日本要打擊這種制約，一定要挑撥中國與東盟各國的關係。假若日本能利用釣魚台爭端，迫使中國與日本兵戎相見，則會加強東盟各國對中國的戒心，認為中國在南島嶼的爭執始終也會用武力解決的。（註四十一）第三，日本持仗美國支持而挑戰中國，而美國則利用日本軍國主義以遏制中國。九六年四月，美日簽署了新的安全條約，將日本的防衛圈擴大至整個亞太區域，使美日的軍事合作更加強化。根據此條約，在亞太區內，美國和日本認為有任何地方威脅其安全，它們便可出兵。挑起釣魚台鬥爭，將有利日本緩和國內在美軍基地上面對的地方群眾壓力，更可增加美日軍事擴張，為圍堵中國製造有利藉口。

3. 看準中國領導層的顧慮

日本深切了解中國處於「後鄧小平時代」，極需要一個穩定的國內外

環境，讓以江澤民為首的第三代領導人建立統治權威，集中力量搞經濟建設，並回應重工業化及建立市場體制過程中面對的各種難題。例如在九五、九六年間處理「慰安婦」（即在二戰時期被日本強迫做軍妓的婦女）事件中，中國採取極為低調，甚至阻止國內民間自發，脫離政府而行動的立場，以保証國內穩定的局勢不受任何可能之干擾。

基於此，日本認為他們於釣魚台問題上將居於不敗之地。假若中國政府為國內「穩定」的大局而低調處理釣魚台糾紛，則日本將對釣魚台的佔領進一步持久化，並成功製造一種中國民間鄙視政府不保衛國土的情緒，動搖中國領導人的威信；而北京若有強烈，甚至軍事的反應則可幫助日本擴軍、挑撥中國與東盟關係，並配合美國圍堵中國之政策。

四 中國政府的戰略考慮

（1）中國政府的克制態度

日本挑起釣魚台紛爭，激起中國人的憤怒，海外華僑及港台等地再次牽起自七零年代開始的第三次保釣行動。然而，大陸的民間保釣行動卻因政府的限制而顯得甚為冷清。中國政府認為中日於釣魚台的鬥爭，應循外交途徑解決，並全由中央進行。中央此態度，在其於下達予各地方政府的〈關於對社會各界對日本侵佔釣魚島的反應要注意引導的意見〉的〈通知〉中得到體現，此〈通知〉包括下列幾點：（註四十四）

1. 要理解各界人民的愛國情操和對日本侵佔釣魚台的軍國主義復活行徑的氣憤；
2. 要對愛國行為加以引導，勿使演變成影響社會秩序的激烈行動；
3. 要勸告和阻止民眾搞自發的集合、遊行及示威；
4. 不准搞跨地區、跨行業、跨部門、跨學校之間的串連活動；
5. 不准大字報上街、印發宣傳品和利用通訊進行宣傳活動；
6. 要警惕外來敵對勢力和國內敵對勢力藉機搞政治性動亂，干擾全局。

（2）中國政府的戰略考慮

中國政府在釣魚台糾紛中採取低調，抑制民間自發行動，以外交而非軍事行動與日交涉，主要是基於下列的戰略考慮：

第一、中國進行經濟建設及「後鄧時期」的權力交接，極需要一個穩定的國內外環境。鄧小平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原則來解決南海諸島的領土糾爭，就是為了睦鄰，促進中國周邊環境的穩定，為國內經濟建設締造一有利的國際環境，實際上，中國在對台政策、對英國在香港問題上的爭論，以及對美立場等，皆希望以談判、忍耐，在維護主權及統一的前提下，採取息事寧人態度，以解決爭端。在國內，中國政府希望在政權轉移期間，將所有可能影響社會及政局穩定的因素「消滅於萌芽狀態」，就抗日保釣事件，中國政府擔心有少數以反共為目的人，打著民族主義旗號，發動大規模的極端行動，「甚至企圖操縱民間向日索賠，串聯成立顛覆現政權的組織。（註四十五）

第二、美日等國已廣泛宣傳「中國威脅論」，若中國出兵與日對峙，可能會使和中國於南沙群島事宜上有領土紛爭的東盟各國加深對北京的疑慮，影響中國長期致力於和平外交的努力；

第三、釣魚台極為接近台灣，北京若出兵，將會使兩岸關係更為緊張。此外，北京亦擔心日本會打出台灣牌，容許李登輝利用其母校——日本京都大學建校一百週年的機會訪問日本，配合台灣政府，開展務實外交，不利中國統一。實際上，日本親台傾向在九十年代開始又再抬頭，例如在亞運會期間不理會北京反對批准台灣高級高員徐立德到訪，日在台海危機期間為美國航空母艦提供方便，此舉實為配合美國牽制大陸對台政策的行動。

第四、北京深切理解軍事對峙將會刺激日本整個社會進一步轉向右傾，助長軍國主義抬頭。

第五、中美日微妙關係的考慮。兵戎相見始終是各國在處理外交問題上在迫不得已時才採取的行動，考慮到中美日相微妙的既聯合又牽制的格局，中國仍有一定的空間以外交手段處理與美日的紛爭。

雖然美日在針對中國發展及防止中國在亞洲政治舞台扮演重要的角色上有充份的合作，但美日間卻存在著嚴重的貿易磨擦，以及日本欲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等問題上，中美間仍有一定的默契；而對美國欲主導亞洲事務，中日間的合作抵制亦發揮一定的功能。此外，日本對中國外交政策上與美、歐諸國亦有一定的分歧，例如，在八九年六四事件後，是日本率先解除對中國的經濟制裁。

基於上述相互牽制的外交格局，亦促使中國相信仍可倚仗外交手段以解決與日本的領土紛爭。

五 中國回應日本的方針與措施

九六年十月十日，江澤民在中共十四屆六中全會的閉幕講話中，就中日關係，強調並總結中國政府對釣魚台爭端的國策：

- (1) 對歷史留的領土爭端，通過談判解決，一時解決不了，暫時擱置，留待條件成熟時再解決；
- (2) 對日本軍國主義抬頭，需及時揭露和鬥爭；
- (3) 對釣魚島問題，要通過外交途徑嚴正交涉，但要避免發生衝突；
- (4) 處理問題，要從國家大局改革開放及建設的全局出發，若採取無謂的過激行動，不僅於事無補，反而會影響大局；
- (5) 日本在台灣問題上的戰略企圖，要堅持政治上從嚴的方針。（註四十六）

此外，江澤民還專門談到對日圓貸款的看法，「最近，日本又醞釀改變貸款方式和貸款方針，要將原來的『多年度方式』改為『單年度方式』，還想將日圓貸款項目集中用於我國東北三省，把我國東北地區變成日本所謂『單獨的開發地區』，其政治圖謀是十分明顯的。對此，我們要十分警惕，不能單純以經濟上考慮，還必須從政治上考慮，日圓貸款要由中央統一考慮相應的對策，避免經濟上受制於人，各地區、各部門不要擅自行動。」（註四十七）

基於上述的政策，中國政府在九月開始通過外交途徑與日本進行幾十次交涉，提出強烈抗議。在九月十八日，人民日報及解放軍報分別發

表措詞強硬的文章，將矛頭直指軍國主義，人民日報的文章〈日本面臨嚴重抉擇：從整個宏觀中日關係角度出發，指出「日本確有少數人死抱著軍國主義僵屍不放……他們一再拿歷史教科書做文章，美化侵略，矢口否認南京大屠殺，掩蓋罪行；公然參拜靖國神社，對戰犯頂禮膜拜，向亞洲人民挑衅。」（大略）

此外，文章亦批評日本某些政客起勁地煽動狹隘的民族主義，公開要求修改憲法，為日本對外擴張勢力掃除障礙；竭力散佈「中國威脅論」，離間中國同亞洲各國的關係；想方法向海外派兵，在國際上顯示力量。不久前，日本強化了同美國的安保體系，有人自以為得計，更顯得有恃無恐，這種動向值得警惕。

從這篇文章以及江澤民等的指示可以清楚的見到，中國將釣魚台糾紛看成是整體中日關係及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假若日本刻意堅持對抗立場，則中國自當維護民族立場，奉陪到底，並將矛頭直接指向軍國主義。

與此同時，中國海軍於九月十八日在東海海域進行大規模的「海上補給」演習，其後，中國亦發表了上海導彈演習「反入侵」的新聞，這一切行動蘊含著對日本的警告。

基於中國綿裡藏針的對策，迫使日本政府表態不支持右翼團體行動，還承諾橋本龍太郎任首相期間不再參拜靖國神社。然而，只要日本政壇內的右翼勢力仍繼續發展，以及美日聯手遏制中國發展的戰略不變，釣魚台領土爭端始終會再次浮現。

第三節 世界多極化——中國外交新戰略

一 中國對美的外交政策

站在中國政府立場，兩岸關係緊張及中日於釣魚台的衝突，皆與美國的對華戰略有密切的聯繫。在中美關係出現波折的時刻，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曾於九六年下旬一個內部會議中就中美關係作出專題報告，系統及全面的分析中美關係，其報告內容重點如下：

- (1) 中國在國際事務上堅持獨立自主、和平共處五原則，反對強權政治，不會喪失立場去謀求中美關係。而中美關係的正常化，關鍵在於美國要有誠意的執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即不能在台灣問題上屢屢作出干預中國內政的事。
- (2) 美國最近表示願意和中國建立長期的建設性的合作關係，不對中國採取圍堵戰略，這是由於美國的全球戰略經常受阻和中國日益強大的緣故。此外，美國此舉亦有利於換取中國在核武擴散、朝鮮半島、中國與伊朗關係，中國與中東國家關係上與美國合作，以利於美國的全球戰略。
- (3) 美國會繼續利用台灣來阻撓中國的統一，干擾中國的經濟發展。美國更會繼續對中國進行思想意識、宗教文化上的滲透，甚至會利用中國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來促使中國的政制體制、社會制度向西方模式轉變。
- (4) 中美關係從現在到二零二零年，總體上會處於緩和、磨擦、制裁、局部對抗交替出現的局面。因此，中國對美國在戰略上一定要有兩手準備。原則問題絕不能妥協，政策策略則可因時制宜。(註四十七)
其實，在對美關係上，中國始終都希望貫徹江澤民提出的「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註四十八)十六字方針，以締造一個有利中國經濟建設的和平國際環境。

二 中美關係逐步改善

在另一方面，美國亦就對華政策在國內進行了一場辯論，並最終決定改善與中國的關係。美國總統克林頓政府在制定其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時，亦將美中關係放在重要位置，並承諾將繼續奉行「一個中國的政策，遵守三個聯合公報，謹慎而妥善地處理台灣問題。」

在中美雙方共同努力下，一些曾困擾兩國關係的問題得到緩解，兩國高層互訪增加。進入九六年第四季度以來，美國方面依次有助理國務卿、中央情報局長、助理貿易代表、副國務卿和國務卿等訪北京。而中國方面則有財政部長、國防部長及國務院外事辦主任等訪

美。尤令人矚目的，是江澤民和克林頓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在馬尼拉會面，雙方就包括一九九七和一九九八年實現中美兩國首腦互訪等一系列問題達至共識。克林頓並兩次強調美國願意看到一個強大、穩定、安全的中國。兩個國家在許多問題上有共同的戰略利益，美國願與中國建立合作夥伴關係。

三 中國開展「均衡外交」

在修補與美國關係的同時，中國亦致力於加強與俄羅斯的經濟軍事合作。九六年四月，江澤民會見俄羅斯總統葉利欽，雙方宣佈發展不針對第三國的戰略伙伴關係，並就建立高層定期會晤制度、成立中俄領導人熱線電話聯繫、成立中俄友好、和平與發展委員會、加強國際合作等問題達成協議。

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李鵬總理訪俄，會見了手術康復後首次會見外賓的葉利欽。李鵬此行十分成功，中俄決定建立兩國總理定期會晤機制。為協調此機制運轉，設立了政府首腦定期會晤委員會，中國副總理李嵐清和俄羅斯第一副總理博利沙科夫任委員會兩主席，此委員會並設經貿、科技、能源、運輸等分項委員會。在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美、俄、中、法、英之中，定期舉行總理級會晤並形成組織架構的，只有中、俄兩國，足以突顯兩國密切的關係。此外，雙方亦討論了蘇愷第二十七型戰機合作及商討了機械製造、航天航空、運輸、能源及農業等領域的大型合作項目。雙方更簽署了〈連雲港核電站框架合同原則協議〉和〈中國人民銀行與俄羅斯聯邦中央銀行合作協議〉。

中國積極加強與俄羅斯的外交關係，實有深遠的外交經濟戰略考慮：

（1）體現世界多極化，實質為抗衡美國的強權政治

原蘇聯解體後，美國成為後冷戰期的唯一超級大國，國際政治力量失卻均衡。為抗衡美國，中俄雙方皆急切期望加強合作。在李鵬訪俄行程中，他與葉利欽皆表示不贊成由一國主宰的單極世界，並認為一國的

事情應該由該國人民自己決定，世界的事情應由各國平等參與決定，互不干涉內政應成為國際關係中一條重要原則。葉利欽更明確指出，當前世界不需要有一個「主宰者」，不應有所謂「領導國家」和「被領導國家」，針對美國的態度極為明顯。

(2) 中俄利用遼闊市場，加強經濟合作

中俄九五年的貿易額僅為十五億美元，九六年猛升至七十億，預計到二零零零年將增至二佰億。中俄雙方皆有龐大之國內市場，經濟有極大的互補性。俄國科技基礎雄厚、自然資源極豐，而中國亦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只要雙方願意向對方讓出市場，雙方便可創造重大的經濟利益。

(3) 加強軍事合作

原蘇聯是實力甚強的軍事大國，因此，從俄國獲取先進軍事科技，將會加速中國的國防現代化進程。直至九七年，俄國已是中國最大的軍火供應商，而製造蘇愷二十七型戰機亦正是李鵬訪俄所商討的重要合作項目。

此外，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於九七年四月二十二日訪俄羅斯，與葉利欽簽署〈中國和俄羅斯關於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聯合聲明〉，再重申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實質為針對美國經常干涉他國內政的「霸權主義」。在江澤民訪俄期間，他更與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四國元首簽署〈關於在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的協定〉，這一協定將各方面在邊境地區的軍事力量裁減至最低限度。

為進一步開展「均衡外交」，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於九七年一月上旬訪法，於十一日會見法國總統，並繼續提倡「世界多極化」之觀點，錢其琛指出：「世界應該是多樣化的。只要各國相互尊重，世界就會避免發生衝突；反之，試圖推行單樣化，倒會引起國家之間發生矛盾，甚至衝突。」

四 中國民間的民族情緒，「中國說不」書籍的熱潮

一本由五位青年寫成的書《中國可以說不》在九六年中旬推出，作者站在民間的立場猛烈抨擊西方列強圍堵中國的國策。由於此書代表了中國國民意識在遭受外國圍堵及遏制下的反彈，引起社會很大的共鳴，書籍很快便被搶購一空。

《中國可以說不》的出版在中國出版界引起了「說不熱」，很多有深度的書籍相繼推出，其中較為著名的包括《中國何以說不》、《中國為甚麼說不》、《中國還是能說不》、《中國不僅僅說不》、《遏制中國》、《妖魔化中國的背後》及《為中國聲辯》等等。

從上述書籍受歡迎的程度可折射出社會公眾對於中國國內外形勢的心勢，反映了中國市民對美國經濟制裁中國、截查銀河號、阻撓中國申辦奧運、阻止中國復關、支持台獨及提倡「中國威脅論」等壓制中國的事件的抗議與反感，正如《中國可以說不》指出的：「中國說不，不是尋求對抗，而是為了更平等的對話。」

市民心態更可從一些社會調查反映出來，例如根據中國青少年研中心於九五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對北京、上海、山東、四川、安徽、江蘇等四省二市三十五歲以下人士之問卷調查顯示，百分之九十點三的青年認為美國政府在對華問題上表現出來的態度是霸權的；百分之九十三點八的人認為美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對中國不友好；百分之九十一的人認為美國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問題上設置障礙；百分之八十點三的人認為美國政府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指責是惡意的，百分之八十九的人認為這是干涉中國內政。（註四十九）

中國民意對國際強權政治的反彈，客觀上加強了中國領導人推行維護主權的外交政策的實力，這亦是分析新時期中國外交政策時值得留意的情況。

註 輯

- 註一 《人民日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 註二 丁振武〈鷹派已主導中國對台政策〉《信報》一九九六年三十四日
- 註三 臺灣《中央日報》一九九五年四月九日
- 註四 同上註
- 註五 同上註
- 註六 同上註
- 註七 同上註
- 註八 李雪嚴〈李登輝訪美的利害得失〉《鏡報》月刊，一九九五年七月號
- 註九 同上註
- 註十 臺灣《中央日報》一九九五年五月三十日
- 註十一 劉義鈞〈李總統訪美的時代意義〉載台灣《國魂》雜誌，一九九三年七月
- 註十二 臺灣《中央日報》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 註十三 本社〈李總統訪美凸顯中華民國屹立中國領土之上〉載《中共研究》一九九五年六月
- 註十四 一九九五年六月十日(台北)《中國時報》引自《人民日報》文章
- 註十五 同註十二
- 註十六 李雪嚴〈李登輝搞『台獨』的新動作〉《鏡報》月刊，一九九五年八月號，第68—71頁
- 註十七 同上註
- 註十八 漸東〈台灣問題已臨決定性的關鍵時刻〉《鏡報》月刊，一九九五年十一月號
- 註十九 同註二
- 註二十 任慧文〈中共軍事演習給台灣的信息〉《信報》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五日
- 註二十一 任慧文〈中共再申對台戰略與策略〉《信報》一九九六年二月十六日
- 註二十二 同註二十
- 註二十三 同註二十一

- 註二十四 任慧文〈中共權威人士談對美、台政策〉《信報》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 註二十五 張沐〈江總仿鄧南巡發宏論，中共協調經建新模式〉《鏡報》月刊，一九九六年十一月號
- 註二十六 同註二十五
- 註二十七 〈江澤民在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閉幕時的講話〉(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八日)載《中國大陸研究》第三十九卷第二期，第77頁
- 註二十八 同註二十七
- 註二十九 任慧文〈中共內定對台政策『新八條』〉《信報》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及丁振武〈鷹派已主導中國對台政策〉《信報》一九九六年三月十四日
- 註三十 任慧文〈專家促中共對台作突破性決策〉《信報》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 註三十一 任慧文〈中共對美對台政策更趨務實〉《信報》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 註三十二 同上註
- 註三十三 同註二十四
- 註三十四 同註二十四
- 註三十五 《人民日報》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 註三十六 《人民日報》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 註三十七 《人民日報》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 註三十八 《人民日報》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 註三十九 任慧文〈中美在台灣問題上角力內情〉《信報》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 註四十 新華社北京電 一九九六年一月三十日
- 註四十一 陳明錄〈美國縱容日本軍國主義貽害無窮〉載《信報》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 註四十二 《文匯報》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 註四十三 周夢五〈日本新遠東陰謀〉載《廣角鏡》一九九六年十月
- 註四十四 任慧文〈中國對日本為何硬不起來？〉載《信報》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 註四十五 張沐〈中南海保釣外交新思考〉載《鏡報》一九九六年十月
- 註四十六 草蕭〈江澤民在六中講話〉載《鏡報》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 註四十七 同上註
- 註四十八 任慧文〈錢其琛宣示中美關係「八條」〉載《信報》一九九六年八月三十日
- 註四十九 《大公報》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註五十 《大公報》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第六十四章 經濟建設——跨越九七年的 經濟持續發展

導 言

搞好經濟、改善民生，是維護中國政局長治久安的最根本保證。中國自從九三年下旬開展宏觀調控，及通過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五十條決議以來，經濟在持續發展的同時，亦面臨著高通漲、農業後勁不繼、國營企業缺乏效率、就業形勢惡化及貧富與城鄉差距擴大等深層問題之困擾（這些問題已在第五十八章江澤民面對的挑戰（一）中詳細分析。）此外，九五年是中國八個五年計劃的最後一年，第九個五年計劃（九五計劃）在九六年已正式開始，直到二零零零年。

面對極其複雜的經濟形勢，為回應各項深層次經濟問題的挑戰，中共領導高層自九四年以來進行了多方面的部署，這章主要討論三件對經濟大局有深遠影響的事件。第一是九四年九月李鵬召開的國務院加強物價管理工作電話會議，及九四年十二月的中央經濟會議，以部署反通漲的工作。第二是九五年九月下旬召開的中共中央十四屆五中全會及與之相關的八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九六年三月），這兩個會議的重點是通過制訂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二零一零年遠景目標，能掌握上述幾個重要會議的內容，對理解中國在九十年代中旬的經濟形勢及未來十五年（到二零一零年）經濟政策的思路有極為重要的參考價值。第三就是論述跨越九七年經濟工作的各項具體部署。

第一節 反通漲的工作部署

一 國務院加強物價管理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九四年九月）

通貨膨脹是中共高層需面對的首要經濟問題。九四年中國出現了自改革開放以來最高的通脹率，而且這是在九三年高通脹基礎上再出現的

高通脹，這情況假若蔓延，勢必對中國經濟帶來嚴重的破壞。

正如在第五十八章的分析，九四年的通脹主要不是由於貨物供應短缺或濫發鈔票引起，而是基於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後投資與消費增長過速，再加上九四年物價改革措施出台過多、流通體制及價格監督體系不完善，以及部分農產品供不應求等因素所綜合造成。基於此，九四年的通脹可概括稱之為「改革型的通脹」或「經濟體制轉型中的通脹」。(註一)

九四年一月至七月，中國通脹升幅相當大，全國零售物價指數上漲百分之二十，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升了百分之二十二點四。針對物價漲幅過大的情況，黨中央、國務院決定將抑制通脹作為九四年下半年及之後一個時期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

九月六日，國務院召開「加強物價管理工作電視電話會議」，會議由朱鎔基主持，並在各省市設了分會場，眾多中央及地方領導人在中央及各分會場參加會議，總理李鵬在會議上發表抑制通脹的講話，並號召各級政府部門落實下列以增加農產品供應、整頓流通秩序及強化監督體制為主要任務的十項措施：

(1) 各級政府要切實負起穩定物價的責任

中共並決定在九四年不再提出新的調價項目。為加強對物價工作的領導，中央決定在機構改革中，物價機構一律不撤不并、不降格及不分散職能；

(2) 抓好農業生產，增加農產品供給

除了呼籲要加強田間管理，以增加糧、棉、油、糖等主要農產品產量外，李鵬更強調要發揮儲備糧的作用。

國家平時購進儲備糧，用於平抑物價，穩定市場，在糧價上漲較高的地區，國有糧食部要及時動用儲備糧，以低於市場價格發售，增加供給，穩定市場；

(3) 抓好「菜籃子」工程（即落實發展農業的措施），保證副食品供應

(4) 建立糧食和副食品風險基金

這基金是政府用於調控重要商品的市場供求關係、穩定重要商品價格的一種資金。舉例來說，當某類商品供應過多，價格下跌，政府便動用風險基金收購商品，防止市場價格不斷下降，從而保護生產者利益。然而，假若某類商品在某一地方供不應求，市場價格漲幅過大，政府則動用風險基金在另外地方購買一批商品投放於供應緊張的地區，以平抑物價，保護消費者。

(5) 推動流通體制改革，整頓流通秩序

(6) 繼續嚴格控制固定資產的投資規模

(7) 加強對消費基金的管理，控制消費基金過快增長

(8) 加強物價管理和監督檢查

各級政府要建立肉、蛋、食油等的提價申報制度，大宗疏菜要制定進銷差率，或公佈零售參考價格，政府於必要時可實行最高限價。

國務院更責成國家物價局向部分城市派出特派員，督促檢查各地落實控制物價上漲措施的情況；

(9) 加快價格立法工作，堅持依法治價

政府宣佈不久將頒佈實施〈關於制止暴利行為的暫行規定〉，打擊壟斷性行業亂漲價及價格欺騙行為。

(10) 發揮群眾和輿論監督的作用 (註二)

二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九四年十一月底）

(1)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訂定的發展策略

九四年九月中共中央召開十四屆四中全會，專門討論黨的建設的問題，然而，這並不表示中央對嚴峻的經濟困境視若無睹，在九四年十一

月廿八日至十二月二日，為部署九五年經濟發展計劃，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召開中央經濟會議，是次會議規格可媲美中共中央會議，中共七位政治局常委和所有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政領導、中央和國務院各部門的主要負責人都有出席，江澤民、李鵬和朱鎔基均在會上發表講話。

會議提出九五年經濟工作的任務為：繼續加強宏觀調控，抑制通脹；以深化國有企業為重點，推進各項配套改革；增加農業投入，確保產品供應；以及加大經濟結構調整力度，推進技術進步，提高整體經濟效益。

為達到九五年經濟發展的目標，會議決定必須做好七個方面的工作：

- (1) 保持適當的經濟增長速度。通過控制國定資產投資規模及消費過速增長，加強宏觀調控，並把注意力轉移到經濟構調整及提高效益，以保持適當的經濟增長速度；
2. 控制物價上漲幅度。繼續推行李鵬在同年九月提出的抑制通脹的十條措施；
3. 大力發展農業，增加對農業的投入；
4. 認真抓好工業交通，將經濟結構調整放於首位，要求各企業面向市場，生產市場需要的產品；
5. 增收節支，嚴格執行財政預算；
6. 改善投資環境，擴大對外開放；
7. 抓緊時間制定「九五計劃」。

(2) 會議並對九五年經濟體制改革作出的決定

1. 國有企業改革邁出重要步伐。中央和省市分別選擇一批企業，進行現代企業制度的試點，並對上市公司進行規範；圍繞經濟結構的調整，對部分企業進行關、停、併、轉，並建立破產機制。
2. 围繞企業改革，配套推行以養老和失業保險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保障

改革；

3. 在宏觀調控體制改革方面，鞏固九四年出台的措施；
4. 積極培養市場，抓緊經濟立法，改善經濟秩序。(註四)

(3) 「一線兩點」的方針

由於九四年是自七八年改革開放以來通脹最高的年份，故中央領導層對九五年經濟發展方針十分重視，中央工作會議的經濟戰略方針，可以概括為「一線兩點」，「一線」是指平抑物價，控制通脹；兩點是抓住農業和企業這兩個重點，以加強生產效率，增加市場供應，從供應這個更根本的方面抑制物價上升。

中央經濟會議在九四年十二月二日結束，當天，《人民日報》發出〈認清形勢，明確任務〉的社論，文章從政治的角度指出，為確保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任務的完成，各級黨委和各級政府，要自覺貫徹中央經濟工作指導思想和政策方針，維護這些方針政策的嚴肅性和權威性，確實做到政令暢通。

三 一九九五年的經濟成就與問題

(1) 一九九五年經濟的成就

為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決定，九五年三月八屆人大三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總理李鵬提出要將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定為百份之八至九，並將衡量通脹幅度的商品零售物價指數從九四年實際的百份之二十一點七漲幅壓低到九五年期望達至的百分之十五(註五)

為達上述具體經濟目標，中國政府在一九九五年繼續推行自九三年下半年以來即實施的宏觀調控政策。經過一年的努力，通脹逐月下降，而經濟卻在物價平穩回落中仍保持較快增長：九五年國內生產總值比九四年增長了百分之十點二、零售物價漲幅從百份之二十一點七回落到百分之十四點八，(註六)基本完成了九五年經濟的具體目標。

總結分析，中國政府在九五年的調控經濟方法包括下列幾個方

面：

1. 推行從緊的貨幣、財政政策。嚴格控制貨幣供應和信貸規模，並推行量入為出的財政方針，強化稅收徵管，嚴格預算約束。
2. 控制固定資產投資規模，抑制消費基金過快增長。由於國有單位缺乏投資約束和風險機制，項目建設失誤所形成的債務最終須由國家承擔，負盈不負虧的制度引起企業的投資飢渴。因此，中央決定通過行政手段來控制國內投資需求過快的增長，具體工作包括嚴格基建項目的審批，控制房地產的投資，不批准新的高檔建築項目，限制公款消費，禁止企業在營利不足時仍大幅增加工資等，以保證消費基金增長低於經濟增長。
3. 實施連串有關市場和價格方面的法規，促進市場體制建設，減少流通環節，降低流通費用、並加強對物價的管理和監督檢查，整頓流通秩序，打擊價格欺詐、牟取暴利的行為。
4. 自九零年開始價格調整步伐較大，直接從成本推動價格上升，故九五年的任務是消化前幾年價格調整的影響，不再出台新的調價措施，而把價格改革的重點放在建立健全市場管理和價格調控體系上。
5. 調整經濟結構、增加供應。這包括增加緊缺工業產品生產，並加速能源、交通、通訊等基礎產業建設。此外，基於糧食價格上漲為九四年通漲的主要成因，故中央決定大力發展農業，主要辦法為增加對農業的投入，切實保護耕地以及從政策上扶持化肥、農藥和農機骨幹生產企業等。
6. 運用外貿進出口的調節作用，組織國內短缺商品的進口，降低進口成本，增加國內市場供應，抑制物價上漲。

(2) 深層經濟矛盾仍無法突破

雖然持續的宏觀調控政策在九五年能達至預期的控制通脹目標，然而，長期困擾中國的深層經濟矛盾仍然無法舒緩，再加上在緊縮政策

下，中國經濟亦面臨很多短期性的困擾：

1. 企業經營面臨困境，失業嚴重

在緊縮政策下，企業經營困難，盈利水平大幅下降。同時，不少企業結構調整緩慢，未能生產市場需要的產品，滯銷嚴重，並過量佔用資金，以致企業資金緊張，再加上中國缺乏嚴厲的反拖欠法律，不規範的結算秩序頻生，企業間拖欠問題十分突出。基於此，企業經營的困難，並非通過放鬆銀根及增加資金注入就能解決，而必須著眼於企業一定要生產市場需要的商品；

企業經營的困境，亦帶來就業問題九五年失業率由九四年的百分之二點八上升到百分之三，停產、半停產職工亦增加；(註七)

2. 通脹壓力仍大

九五年的物價回落很大程度上是靠拖延價格改革措施、行政性限價及財政性補貼壓價來完成的。投資過大、消費基金增長過快及農業發展仍薄弱的情況下，任何一方面的變化，皆足以使物價再度大幅上升；

3. 投資效益較低，結構不盡合理

九五年在建規模過大，項目嚴重超預算情況普遍，低水平重複建設問題突出，(註八)利用流動資金搞固定資產投資等問題仍經常出現。可以說，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增長過快在短期內很難控制，主因是原有固定資產投資體制尚未得到改革。此外，房地產開發投資增幅繼續偏高，一月到十月比上年同期增長了百分之三百二十九點六，(註九)而制約著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農業生產仍十分薄弱。

4. 經濟體制改革進展緩慢

九五年十二月下旬召開的全國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會議透露，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面臨六個方面的困難，其中主要包括：國企改革進展不理想，投資主體不明確，企業內部管理缺乏制衡機制；企業改組受債務、

人員包袱的限制，未成氣候；政企分開和政府職能轉變步伐緩慢，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仍落後，國有資產增值保值實際無人負責的情況無根本扭轉；社會保障與住房改革未臻理想；宏觀管理體制改革任務艱辛，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才開始制定方案，中央銀行仍要依靠信貸規模管理等行政手段進行宏觀調控；國家銀行向商業銀行轉變步伐緩慢，資本市場的發展亦較慢。（註十）

5. 經濟領域的不規範活動有所增加

這主要包括：一、國家銀行的資金又以新的方式和途徑泄漏，一些金融機構為獲得資金，利用種種變通辦法，從銀行拆入資金，用以高利息轉貸吃利息差；二、一些重要商品的流通秩序不好，例如實行重要商品自求平衡和省長負責制後，地方封銷加重；三、分配活動不規範，職工收入分配方式不透明。據測算，在居民收入中近一半是工資外收入，約百分之二十以上的收入為非正常來源。

上述深層次矛盾的長期存在，對中國經濟發展有重大影響，要徹底解決問題，必須通過長時期的工作，而九六年三月人大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二零一零年遠景目標綱要〉，可被視為這方面的努力。

第二節 「九五」計劃與二零一零年遠景目標

一 〈九五計劃與二零一零年景目標〉的〈建議〉與〈綱要〉的制定過程

四九年建國後，中共學習蘇聯每五年制定一次國家發展計劃，簡稱為「五年計劃」。「九五計劃」的全稱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九個五年計劃〉（一九九六至二零零零年）。此外，中國政府還制定遠期規劃，是次通過的規劃長達十五年，被稱為「二零一零年遠景目標」。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執政黨，其決策對政府機關有決定性影響。由於〈九五計劃及二零一零年遠景目標〉是中國經濟領域中最重要的決策，

故中共先於九五年九月下旬召開「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就〈九五計劃及二零一零年遠景目標〉的〈建議〉，這個〈建議〉較為原則性，但對政府機關——國務院具有指導意義，而國務院則根據〈建議〉的原則，制定較為詳盡的〈九五計劃及二零一零年遠景目標〉的〈綱要〉，呈交一九九六年三月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立法通過，從而使〈綱要〉正式成為指導國家發展的「國策」。

雖然〈建議〉與〈綱要〉側重點不同，前者重視原則性，具指導意義，後者則技術成份較重、為有具體執行性質的文件，但此兩份文件之內容皆圍繞九五計劃及二零一零年遠景目標而起草，所以實際上這兩份文件是同步草擬的。

從制定這兩個文件的過程，可看到中國領導層是持極為審慎、理智及開放的態度來處理經濟及社會發展的問題。制定九五計劃及二零一零年遠景目標，早於九三年中共十四屆二中全會就提出來。九四年八月，國務院聽取了國家計委就「九五」計劃和二零一零年遠景目標基本思路的匯報、九五年三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成立〈建議〉起草組，並同時部署了十五個專題調查研究，為草擬〈建議〉和〈綱要〉作準備。在〈建議〉的起草過程中，中央國務院領導人多次聽取起草組的匯報，起草組還召開了四次座談會，諮詢經濟專家的意見。九五年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審議了〈建議〉的送審稿，並發到全國黨、政、軍省部級以上單位徵求意見。及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又召開了幾次座談會，諮詢各方面人士意見，起草組根據種種意見進行修改，又經政治局通過後，才交九五年九月下旬的中共中央十四屆五中全會議論及通過。（註十一）

與此同時，〈綱要〉的起草組亦根據〈建議〉的精神，制定較具體的政策，交九六年三月的人大會議討論通過。

二 〈建議〉與〈綱要〉的基調與內容

（1）九五計劃與二零一零年遠景目標的基調——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作為指導「九五」計劃及二零一零年遠景綱領原則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二零一零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極力

突出「兩個根本轉變」，一是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二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

基於建國以來經常遇到經濟大幅波動，以及九三年經濟局部過熱及混亂的經驗，負責中國經濟事宜的朱鎔基發覺必須改變各級幹部對發展經濟的基本觀念，方能使經濟能持續及健康的發展。

在制定九五計劃的過程中，朱鎔基感慨地指出：

「發展是硬道理，這個發展必須既是快速的，又是持續、健康的。」「心急吃不到熟飯，欲速則不達。我們過去就有過多次這方面的教訓」。在通過〈建議〉前，朱鎔基表示：「現在回頭看，一九九二年進入了一個高速發展的新階段，，應該說成績很大，但毛病也不小。……本來應該在改革開放、經濟效益、科技進步方面做文章，但卻在鋪攤子方面大做文章，開發區熱、房地產熱，把農業也丟掉了，幸虧中央採取及時、堅決的措施，制止了那些過熱的現象，穩定了當時的局面，這說明，這一條歷史經驗很不容易汲取，還應該進一步提高認識。」（註十二）

基於期望經濟能平穩、持續的發展，避免大起大落造成經濟波動，朱鎔基在制定「九五」計劃期間，曾提出對九五計劃的三點思路：（註十三）

1. 九五期間的發展，主要不是依靠大量的投入，不能靠鋪新攤子，而應依靠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與效益，依靠現有企業發揮生產潛力；
2. 國民經濟要快速、健康、持續發展，必須倚靠科學技術。要快速發展容易，但在快速下，要使財政沒有赤字，不發生通貨膨脹就非常難。要達這一點，必須倚靠科技，提高產品技術含量比重，增加附加價值，否則的話，「九五」計劃只會是一堆項目表，最後要吃大虧。
3. 「九五」計劃的速度要建立在調整產業結構的基礎上。工業發展速度不能太快，因為投入太大，特別是國有企業改革沒有完成前，發展主要靠投入，國家承受不了，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第一產

業也不能忽視。(大略)

(2) 〈建議〉的內容——未來經濟發展的九大方針

與朱鎔基的思路相同，中共中央高層在聽取各不同專家及各級幹部的意見後，基本對中國經濟發展總方向達至共識，形成九五年九月廿八日由中共中央通過的「九五」計劃與二零一零年遠景目標〈建議〉。

〈建議〉確定「九五」(一九九六至二零零零年)計劃的三大奮鬥目標：一是在二零零零年(即人口比一九八零年增三億)的情況下，實現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比一九八零年翻兩番；二是基本消除貧困，人民生活達小康水平；三是加快企業制度建設，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到二零一零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二零零零年增一倍，並形成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註十四)

為實現上述目標，中共提出關鍵點是實行兩個根本性質的轉變，分別是經濟體制由計劃轉向市場，以及增長方式從粗放轉向集約。此外，中央將江澤民提出的「抓住機遇、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發展、保持穩定」的方針，作為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關係的最高原則。中央並提出將來中國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要貫徹下列九大方針：(註十五)

1. 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這即表示假若經濟增長和經濟穩定出現矛盾，尤其是出現高通脹時，應以「經濟穩定第一、經濟增長第二」。(註十六)而總理李鵬亦明確提出：「必須把抑制通貨膨脹作為『九五』期間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首先要努力做到使物價上漲率低於經濟增長率。」(註十七)

2. 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把提高經濟效益作為經濟工作的中心

基本上，中國政府從三個層面把握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第一是從經濟層次上，核心問題是經濟效益，即投入是否能取得合理的回報；第二是從社會層次上，核心問題在經濟增長中實現社會公正、社會穩定和社會進步；第三是從人與自然關係的層次，核心問題是保護人與自然的

協調關係，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增長，用江澤民的話就是不能吃「斷子孫」的飯。（註十八）

正由於中國高層從多角度全面分式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故於「九五」計劃及二零一零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及〈綱要〉兩份文件中，皆可看到中央高層在倡議發展經濟的同時，亦相當強調社會、科教、環保、社會保障及拉近貧富差距等各方面工作。

3. 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促進科技、教育與經濟緊密結合；
4. 把加強農業放在發展國民經濟的首位；
5. 把國有企業改革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
6. 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
7. 實現市場機制和宏觀調控的有機結合，把各方面的積極性引導好；

中央期望政府本身能成為經濟增長的穩定器，不斷提高中央財力，加強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從而強化中央宏觀調控經濟能力及權威，不允許各地方、各部門不顧全局的自行其是。（註十九）

8. 堅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逐步縮小地區發展差距；
9. 堅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步步，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

在十四屆五中全會閉幕時，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發表重要講話，提出其治國總方針——正確處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十二大關係。江民更提出「實現『九五』計劃和二零一零年遠景目標，最根本的保證在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他並重申九四年九月中共十四屆四中全會的精神，指出「要進一步堅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保障黨內民主，維護中央權威，嚴格黨的紀律、增強黨的團結和統一，保證全黨在重大問題上的統一行動。（註二十）（有關十二大關係的重點內容，已有前面第六十章中詳細論述。）

此外，江澤民更提出領導幹部一定要講政治的主張：「黨的高級幹部要成為馬克思主義政治家……在政治問題上，一定要頭腦清醒，我們搞

現代化建設，中心任務是發展經濟，但必須有政治保證，不講政治不行。」(註二十一)

(3) 中央經濟會議 (九五年十二月) 與〈綱要〉內容 (九六年三月)

1. 九六年經濟工作的四大重點

九五年十二月五日至七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北京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九六年經濟工作，為「九五」計劃的第一年執行創造良好開端，是次會議提出九六年經濟工作有四大重點，分別是：

- i 繼續加強農業基礎地位，力爭農業和農村經濟有新的發展；
- ii 加快國有企業改革步伐，務求取得明顯進展；
- iii 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把抑制通脹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
- iv 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積極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註二十二)

2. 〈綱要〉的內容

此外，在九六年三月的八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正式中，正式通過〈九五計劃和二零一零年遠景目標綱要〉。〈綱要〉是落實〈建議〉原則的行動綱領，內容廣泛豐富，共分為十一章，涵括政府對未來十五年中國經濟及社會發展的種種政策，極具參考價值。(註二十三)

第一章是「『八五』計劃完成情況」，著重分析「八五」計劃(一九九一—一九九五年)的經濟成就和仍存在的問題。

第二章是未來十五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指導方針和奮鬥目標」，主要討論未來十五年的國內外環境和條件；重申〈建議〉提出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九條方針；以及九五期間和二零一零年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目標。

「九五」期間的主要目標為經濟總量持續增長，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產業結構進一步改善，有效供給能力增強；科技教育得到加強，社會事業全面進步；以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取得成效，國民經濟整體素質和效益進一步提高。至於二零一零年的遠景目標，基本是

在上述「九五」目標的基礎上進一步推進。

第三章為「宏觀調控目標和政策」。此章強調務須強化和改善宏觀調控，實現經濟總量基本平衡，促進經濟結構優化，並把抑制通貨膨脹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

這章為七個重要衡量經濟表現的指標定出數字或目標，分別是『九五』期間經濟增長速度」能按國民主產總值年均百分之八的幅度增長；「價格總水平」能低於經濟增長率；「固定資產投資」率按百分之三十來把握，考慮價格因素，年均增長百分之十；在「財政收支」方面，期望能做到財政收入高於財政支出增長，減少赤字，實現收支平衡，並控制國債規模；「貨幣供應」方面，推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以保持人民幣的幣值穩定，狹義貨幣供應量年均增長百分之十八左右，廣義貨幣供應量年均增長百分之二十三；在「國際收支」方面，希望在二零零零年經常項目中的進出口貿易基本平衡；資本項目由於通過吸引直接投資，保持適當順差；「人口和就業」問題，希望將人口自然增長率控制在年均百分之十點八三，而城鎮失業人口率力爭控制在百分之四。

第四章題為「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重點討論經濟結構的升級轉變，分析產業政策，提出切實加強農業；加強基礎設施和基礎工業：振興機械、電子、石油化工、汽車製造和建築業等支柱產品，並提高調整輕紡工業；積極發展第三產業；以及加強國防現代化建設等。

第五章為「實施科技興國戰略」，在加速科學技術進步方面，提出加強科技成果商品化和產業化，以適應市場需求，積極發展電子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海軍等高技術及產業，以及加強基礎性科學研究。在發展教育方面，〈綱要〉提出要加強城鄉九年義務教育、大力發展職業和成人教育、改善高等教育結構、提高教育質量、加快教育體制改革、推進教學改革以及加強師資隊伍建設等。

第六章為「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提出應按照市場規律和經濟內在聯繫以及地理自然等特點，突破行政區所劃定之界限，逐步形成七個跨省區市的經濟區域；在縮小沿海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內陸地區的發展差距方面，中央提出要優先在中西部地區安排資源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項

目，提高中西部有優勢資源性產品的價格，增強中西部地區發展能力，實行規範的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增加中央對中西部地區發展的支持，加快中西部地區改革步伐，引導更多外資向西部投資；加大對貧困地區的支持力度，以及加強東部沿海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的經濟聯合與合作，如鼓勵東部沿海地區更多向中西部投資等。

第七章「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中，中央從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完善市場體系、轉變政府職能、改革投資體制、規範分配制度、加速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以及加快經濟立法等七個方面，推進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

第八章「擴大對外開放程度，提高對外開放水平」中，強調要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加速開放步伐，逐步開放國內市場、發展境外投資，參與區域經濟合作；堅持以質取勝和市場多元化的對外貿易戰略；以及積極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資等方法擴大對外開放的程度。

第九章「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推進社會事業全面發展」中，從國土資源保護和開發、環境和生態保護、城鄉建設、文化、衛生及體育等六個方面，以保持社會穩定，並促進社會公正、安全、文明及健康的發展。

第十章為「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設」，主要討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民主和法制建設，以及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第十一章為「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此章提出香港和澳門回歸中國大陸後，將推行一國兩制以及推進兩岸關係的發展，加速實現「三通」，保護台商正當權益，促進和平統一大業。

第三節 九七年經濟工作的部署

一 一九九六年經濟成就——成功實現「軟著陸」

全國人大在九六年三月通過「九五」計劃後，九六年（即九五計劃第一年）經濟發展良好：既保持快速的經濟增長速度（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為百分之七），又抑制了通漲（物價漲幅回落到百分之六點一），當年社會總供需平衡，市場貨品供應充足，財政金融穩定，國際收支狀況滿意，而

外匯儲備更超過一千億美元，經濟成功實現軟著陸(即指在成功壓低通漲的同時，並無引起經濟滑坡的蕭條現象)。

與過往的經濟形勢相似，九六年的中國在總體經濟改善的同時，由於影響深遠的深層次問題如國企改革、投資體制改革(重點在建立投資約束機制)及財政基礎薄弱等仍未解決，故中國經濟仍面臨不少困擾。這分別包括：國企虧蝕增加、經營困難；各地區重複建設嚴重、規模經濟無從發揮；農業基礎薄弱之狀況並無根本改變；各單位的投資飢渴症隨時死灰復燃、以及社會整體上的益低落等等。

二 九六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內容

九七年為中國歷史發展上重要的一年，有兩次舉世矚目的大事：一是中國對香港恢復主權；二是中共召開的第十五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並進一步落實第三代領導人的統治地位。為部署九七年的經濟工作，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於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在北京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會議除總結九六年的經濟狀況外，更提出九七年經濟工作的六個環節：(註二十四)

- (1) 繼續加強農業基礎地位。重視糧食生產、保護耕地、增加投入、加強水利建設、並推進糧棉等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等。
- (2) 加快國企改革與發展，並決定九七年需把搞好國企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為創造一個有利國企改革的環境，提倡和鼓勵使用國產設備和產品，多渠道增資減債，緩解企業虧蝕及資金短缺等困難、制止各方面向企業亂擁派及收費、加快配套改革，特別是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積極實施再就業工程；
- (3) 加大經濟結構調整力度，並針對低水平的重複建設問題，會議強調要發展規模經濟、不能盲目加速投資，上新項目，而要立足於現有企業的改組改造，走集約經營路子、更提出從城鎮居民住房和電子信息產品等入手、開發經濟效益高，順應市需要的產業，使之成為新經濟增長點、並大力開拓國內外市場；

- (4) 保持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進一步規範和整頓經濟秩序。這包括繼續執行適度從緊的財政金融政策、從嚴控制新開工項目。規範經濟規序，加強監管證券市場，解決偷稅漏稅、生產假冒偽劣產品及走私等；
- (5) 提高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的水平，提出繼續有效的利用外資，並支持國內企業的壯大，增加其競爭力，並加速和完善涉外經濟立法；
- (6) 促進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這包括要解決居民住房問題，要增加扶貧開發資金、完善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聯工最低工資制度、實施科(技)教(育)與國、保護生態環境，控制人口增長、並著力建設精神文明。

會議最後要求各地區及部門要切實做好糧棉等農產品收購，搞好生產，保證市場供應，加強稅收徵管，嚴格控制開支，以加強國家財力。此外，更號召各級幹部與中央保持一致，自覺維護中央權威。

三 對九七年各項經濟工作的具體部署

在九六年底及九七年初，國務院繼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後，一連召開了很多帶有全局性的工作會議，及作出各個經濟領域的重要指示，以總結過往經驗，並為未來訂出發展方針，其中較重要及牽動全局的會議及事件如下：

(1) 全國計劃會議（九六年十二月五日）

會議強調必須加大經濟結構調整的力度，嚴格控制新開工項目，以「增量調整」帶動存量調整；加強農業基礎地位；為搞好國企改革創造必須的宏觀經濟環境，繼續實行從緊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保持工業適度增長；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提高利用外資質量；加快實施「再就業工程」，廣開就業渠道，落實必要資金，幫助失業人員再就業。

(2) 全國經貿會議（九六年十二月七日）

加快國企改革是九七年經濟工作之重點任務，中央就此提出要：

一、搞好「抓大(型企業)放小(規模企業)」，轉換企業機制；二、搞好企業管理；三、優化企業的管理層，對國企領導層進行一次普遍的考核，實行優勝劣汰；四、為國企改革創造條件。

針對基於企業規模不經濟——即各個地區經濟結構趨同化，及產品結構不合理而產生企業效益差，經營虧損的問題，國務院副總理吳邦國提出要：一、以市場為導向調整產品結構，開拓國內外市場，尤其重視中國的農村；二、對現有企業進行重組，在發展大企業集團的同時，對一些長期虧損企業要加大兼併破產力度；三、開發新技術、新產品，推動「產學研」結合，提高生產效率及產品的科技含量，以開拓市場。

國家經貿委副主任王忠禹亦指出，國企改革要打好「現代企業制度試點、企業兼併破產、結構調整、扭虧增益、治理對企業亂攤派、亂收費」等的五個攻擊戰。

(3) 針對股票市場暴漲，打擊過度投機(九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中共的喉舌《人民日報》於十二月十六日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題為〈正確認識當前股票市場〉的重頭文章，針對中國於九六年十月以來出現的股票市場暴漲及過度投機、機構大戶操縱市場、部分金融機構違規調動資金入市場炒賣、部分不負責任的新聞媒介推波助瀾，以及普通股民跟風等不正常情況，發出警告，提醒投資者過度投機、股市暴漲必將帶來暴跌，並將產生對投資者及社會相當嚴重的後果。

文章重申國務院證券市場發展需循「法制、監管、自律、規範」的八字方針，並強調證券監管部門的主要任務為制定法規、加強監管、規範市場、保護投資者利益及促進證券市場健康發展。文章最後更提出八項措施以抑制過度的投機。

在文章發表後，中國證監會發言人亦發表類似談話。而通過政府的大量工作，股市過度投機情況得到初步抑制，股價向合理方向發展。

(4) 全國財政工作會議(九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財政部長提出九七年財政工作任務為繼續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政

策，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強化稅收征管；堅持量入為出，控制支出總量，保證重點需要；壓縮財政赤字，控制債務規模；整頓財經秩序，深化財稅改革。

(5) 全國體制改革工作會議（九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會議提出經濟體制改革要以國企改革為重點，推進社會保障和住房制度改革，並加大投資融資體制改革的力度。

國家體改委主任李鐵映強調在解決國企債務問題上務須邁出實質步伐，除多渠道增加國企的資本金外，還將開展國企債務重組的試點工作，探討處理企業和銀行不良資產的有效方法。

投融資體制的改革要以引入市場競爭機制為重點，凡經營性項目都要由企業充當投資主體，由其負擔風險，自負盈虧。

(6) 九七年一月一日的《人民日報》社論

每年年初的人民日報社論基本上反映了中國政府的政策總取向，在九七年篇題為〈把握大局，再接再勵，同心同德，開拓前進——元旦獻辭〉的社論中，中國政府強調九七年中國歷史發展上很重要的一年，並提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正處於攻擊階段，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任務相當艱巨。故此社論提出中國必須十分注意社會、政治環境的穩定，而全黨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要牢牢把握大局，且同心同德，開拓前進，這是做好九七年各項工作的重要保證。

(7) 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九七年一月十日）

基於對農業的重視，故中央最高層負責人江澤民、李鵬及朱鎔基在農村工作會議期間與部分與會代表座談。在聽取會議情況和各地區代表發言後，江澤民提出在農業連續豐收的情況下，切不可盲目樂觀，決不可掉以輕心，麻痹鬆懈。他進而提出九七年應重點做好四項工作：

1. 保證糧食等主要農產品持續穩定增長，防止滑坡。要特別重視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防止「穀（價）賤傷農」。

2. 保證農民收入持續增長，要積極發展以農產品加工為主的鄉鎮企業，帶動種養業的發展，把生產、加工、銷售聯結，實行貿工農一體化。
3. 加強水利建設，保證大江大河安全度汛；
4. 保持農村社會的穩定，集中解決地方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註二十六)

最後，是次會議決定為加強農業的地位，應加快農村體制改革步伐、加大農業技術推廣力度，加強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優化農村產業結構，切實減輕農民負擔，確保農業增產、農民增收，及農村穩定。

(8) 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九七年一月十三日)

全國金融會議提出九七年的金融工作應繼續推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整頓金融秩序，防範並化解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並配合國家經濟及產業政策，慎重處理貸款的投放方向，支持有效益的企業，並協助克服各地方低水平重複建設問題，以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

在金融會議進行期間，中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皆召開各銀行的全國分行行長會議。這些銀行將據全國金融會議的總體精神，分別制定九七年信貸工作的方針。

舉例來說，中國銀行決定九七年信貸方向應支持有信譽的國有進出口企業，以發展有效益、有市場的進出口業務；支持國有大型企業發展；嚴禁對盲目競爭、沒有效益、挪用銀行資金的企業貸款；支持國家重點項目，限制重複建設，無市場前景、缺乏資本金的固定資產投資；及支持高利稅、高創匯、高銷售額的外商投資企業等。(註二十七)

(9) 八屆人大第五年會議(一九九七年三月)

在是次人大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總理李鵬花了相當大的篇幅，闡述國有企業的改革，他提出了推進國企改革的六大措施，分別為集中力量抓好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進一步放活國有小企業；規範破產，鼓

勵兼併，推進再就業；多種渠道為企業增加資本及減低債務；加強企業的經營管理；以及認真抓好企業扭虧增盈的工作等。

國家計委主任陳錦華在其工作報中強調，中國搞好經濟的關鍵在於加大經濟結構力度，只有這樣，才能緩解企業生產經營困難、使中國經濟發展走上新的軌道。所謂結構調整，就是要解決經濟建設中企業和地區「大而全、小而全」(即各領域不依據相對優勢而生產)，以及盲目重複建設的問題。為此，陳錦華提出：「要繼續從嚴控制新開工項目」。堅決停止那些規模不經濟、技術落後、投產後必然出現嚴重虧損的在建項目，凡屬全國生產能力過剩的重複建設和資金不落實的項目，堅決要撤銷，並不准開工。(註二十八)

在是次會議期間，朱鎔基副總理亦提出國務院已決定撥出三百億元人民幣進行國有企業的兼併、破產和職工再就業工程。(註二十九)此外，朱鎔基亦提出爭取在九七年後數年，改善銀行的經營及貸款效益，將銀行的不良貸款率每年降低百分之二，對達不到這個要求的銀行，要追究銀行行長的責任。(註三十)

(10) 成立委員會以處理企業破產兼併及貨幣政策事宜

九七年四月下旬，為解決一些長期虧損的企業破產問題，並避免部分企業藉破產而逃避銀行債項，以及安排被影響職工再就業，以保持社會穩定，國務院決定成立由國家經貿委帶頭組成的全國企業兼併破產和職工再就業工作領導小組。

四月二十二日，中央政府公佈「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條例」，訂出由中央多個重要主管經濟部委的負責人所組成的貨幣政策委員會，是人民銀行(中國的中央銀行)制定貨幣政策的諮詢議事機關，委員會在綜合分析宏觀經濟形勢的基礎上，根據國家的宏觀經濟調控目標，制定中國的貨幣政策。此委員會的成立顯示中央銀行有更獨立的制定貨幣政策的權力，從而使中央銀行能更像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般，根據客觀的宏觀經濟形勢，而非國務院中央的行政指令，來制定適合中國實況的金融政策。

四 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十大基本取向

從九五計劃、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及各方面經濟工作的具體部署，可以看到將來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十大基本取向（主要參考國家計委國家信息中心的研究報告）：（註三十一）

- (1) 繼續採取適度從緊的宏觀經濟政策，控制經濟增長速度；
- (2) 加大經濟結構調整，加快產業政策的實施。國家將加強第一和第三產業，穩定第二產業。加強以居民住房為主的建築業，以高新技術為特點的電子信息和汽車、機械、石化、建材等行業；
- (3) 加強對國有大中型和經濟效益好的企業的支持。各大銀行將各有側重地支持不同行業和特點的國企，新發行股票也將重點選擇國有大型，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骨幹企業；
- (4) 加快培育城鎮住宅和電子信息產業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國家將加快房屋改革步伐，控制住宅建設成本，將住房制度從傳統的企業福利型實物型分配轉向商品化，提高職工收入，使其有能力購買房屋，國家更鼓勵商業銀行開展住宅儲蓄，增加個人資產抵押貸款的規模；
- (5) 加強農業，國家將保證收購農產品的資金到位，杜絕「白條子」，增加對農業之投入，並減輕農民負擔；
- (6) 繼續對固定資產投資規模控制，嚴格控制新開工項目，而對於住宅建築、農業、電子信息產業、汽車、高新技術、高附加值產業和基礎設施建築，將加大投資力度；
- (7) 加強控制通漲，保證通漲低於經濟增長率，為中國經濟改革及持續發展提供一健康、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
- (8) 加強股票、債券等資本市場的規範化建設，切實保障投資者利益，推動資本市場的穩步發展；
- (9) 擴大出口。國家將擴大企業自營出口，推行外貿出口代理制；改進出口退稅審核辦法，並保證足額退稅；
- (10) 加快社會保障，落實再就業工程，加強職業培訓，並採取有力措施。

回應中國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情況，以維持社會穩定。

註 釋

- 註一 程宇〈內地經濟評析〉《紫荊》雜誌一九九五年二月
- 註二 《經濟日報》一九九四年九月七日
- 註三 《文匯報》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日
- 註四 同上註
- 註五 請參閱李鵬程交八屆人大三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
- 註六 《文匯報》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九日
- 註七 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課題組〈1995年經濟形勢回顧與1996年展望〉《管理世界》一九九六年，第一期
- 註八 同上註
- 註九 同註七
- 註十 《信報》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 註十一 《大公報》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 註十二 楠石因〈中國未來發展規劃總檢閱〉《廣角鏡》月刊，一九九五年九月
- 註十三 任慧文〈朱鎔基為『九五』計劃定基調〉《信報》一九九五年九月十五日
- 註十四 〈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八日）載《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文件》，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1頁
- 註十五 同上註
- 註十六 楠石因〈江核心內政外交雙考驗，北戴河會議增添新內容〉《廣角鏡》月刊，一九九五年七月
- 註十七 李鵬〈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建議的說明〉（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五日）載《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文件》，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67頁
- 註十八 楠石因〈五中全會發佈九五計劃建議書——中國跨世紀發展之路〉《廣角鏡》月刊，一九九五年十月
- 註十九 同註十二

- 註二十 〈江澤民在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閉幕時的講話〉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八日載《中國大陸研究》第三十九卷、第二期，第77頁
- 註二十一 同上註
- 註二十二 《大公報》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八日
- 註二十三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九九六年三月十七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批准)、載《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40—106頁
- 註二十四 《文匯報》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 註二十五 《文匯報》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 註二十六 《文匯報》一九九七年一月十四日
- 註二十七 新華社北京一九九七年一月十六日
- 註二十八 《商報》一九九七年三月三日
- 註二十九 新華社北京一九九七年三月三日
- 註三十 《信報》一九九七年三月六日
- 註三十一 新華社電 一九九七年一月十六日

第十一篇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第六十五章 香港前途問題與一國兩制

第六十五章 香港前途問題與一國兩制

導 言

中共領導人對完成台灣及港澳的統一極為重視。就香港問題，從四九年中共建國開始，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及周恩來等，從整個中國宏觀戰略角度出發，採用靈活的彈性政策，容許香港受英國繼續統治，從而發揮香港對中國大陸發展的巨大貢獻，這務實政策就算在文化大革命的動亂期間亦沒有動搖。七八年底中國開始全面推行改革開放政策，香港對中國走向現代化所起的作用更為重要。然而，就在同一時間，中國領導層基於不肯再簽出賣國土的協議，決定向英國收回香港，推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政策，隨之而來的便是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問題的艱辛談判，兩國終於在八四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標誌著香港將於九七年回歸中國，之後便是〈基本法〉的制定及頒佈（一九九零年），香港隨即進入「後過渡期」。九一年由於蘇聯、東歐劇變，各國共產黨垮台。基於冷戰全面結束，美、英等西方國家遂開始調整對華的外交策略，美國積極介入台灣事務，英國亦改變對華立場。隨著英國重量級政客彭定康出任港督，中英兩國在香港問題上出現了新的磨擦，影響九七年香港的順利過渡。

這章會討論一國兩制方針及中國政府長期對香港的政策；中英談判與聯合聲明；從基本法看中國對香港的政策，以及彭定康政治改革方案引發起的中英鬥爭等。

第一節 一國兩制方針及中國政府長期對香港的政策

一 一國兩制方針的提出

「一國兩制」的構想最先是為解決台灣問題而提出來的，中國領導人一向期望能將由國民黨統治的台灣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以完成統

一大業。四九年中共建國初期，中國大陸致力武力統一台灣，到五零年中期，毛澤東與周恩來等領導人開始探索以和平方式收復台灣，例如一九五五年四月的萬隆會議上，周恩來便提出「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註一)雖然統一並沒有預設最後期限，但永遠的拖延只會令「台獨」意識強化，使中國永遠無法統一。七八年末，中國推行改革開放，務實的路線促使政府願意採取更靈活的方式解決治灣問題，鄧小平在七八年底便多次提出：「我們希望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我們會尊重台灣的現實，可以保留原來的社會制度、經濟制度、生活方式可不動。」(註二)在一九八四年六屆人大二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中國政府正式使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作為解決台灣、港澳問題的概括性語言，使其具有法律效力。八四年六月，鄧小平更具體的指出一國兩制「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十億人口的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註三)

對於正衝破重重「左」的障礙、致力推動整個中國改革開放大業的領導人來說，推行一國兩制解決統一問題是一種務實的理性抉擇，這是基於：第一，中國大陸正進行經濟建設，需要穩定的環境及台、港澳經濟的配合，所以有需要保持這些地區的資本主義制度；第二，台、港澳地區在過往幾十年的經濟有驕人的發展，人民已習慣於既有制度，要維持這些地區的經濟持續繁榮，就必須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

一國兩制的本質，是中國領導人從宏觀國家發展戰略出發，以廣闊胸襟及尊重歷史遺留的問題的態度，提出一條符合中國現狀的統一道路。然而，推行此方針亦受到不少幹部及老百姓的質疑，他們從人權、平等的民主概念出發，認為國家給予台、港澳居民種種權利(如可隨時往返大陸，但大陸居民到這些地區卻有極為嚴格的限制；在持外國護照的同時亦可享受中國公民的身份；容許以獨立身份參與國際的經濟、文化組織，而大陸各省市卻無此權利等等。)實際是對中國人民不公。中國領導層對此種反對意見，亦有深刻的理解，鄧小平曾指出中國政府對香港政策五十年不變的同時，亦必須強調「兩個不變」，這就是一方面保持香港五十年不變，另一方面保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

社會主義制度不變，「說不變不是一個方面不變，而是兩個方面不變。」^(註四)

客觀來說，推行一國兩制是需要勇氣和膽識，並要冒著被指責為「對中國人民不公平」的責難。設想假若不是憑藉中央領導人的威望，以及政府不斷的工作和向人民反覆宣傳對港澳採取特殊政策的重要性，很難想像普遍大陸人民會接受和理解一國兩制的方針。

基於香港問題的特殊性，鄧小平曾感慨地指出，推行一國兩制政策：

「沒有點勇氣是不行的」，「沒有中國共產黨，沒有中國的社會主義，誰能夠制定這樣的政策？沒有那個人有個膽識……沒有一點膽略是不行的，這個膽略是要有基礎的，這就是社會主義制度，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中國。」「如果這方面變了，也就沒有香港的繁榮和穩定。要保持香港五十年繁榮和穩定……就要保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註五)

推行一國兩制，維持香港持續繁榮及民主發展，有賴於權力集中的共產黨政權，驟眼看來這似乎難以理解，但事實上，這是客觀的歷史現實，試想假若中國大陸推行全民投票的民主方式決定香港的未來，中國人民站在人權、平等概念出發，投票結果實較難保障中國會容許香港能擁有眾多與大陸人民不同的「特殊優惠」。

二 建國後中共對港的政策

與台灣性質相似，香港及澳門在中共四九年建國後仍歸英國及葡萄牙統治，未歸入中國版圖。然而，港澳與台灣不同，就是港澳地區與大陸相連，只要中國政府下決心收回這些領土，外國殖民地政府根本無法維持其統治。

中國政府要收回港澳實輕而易舉，然而，在中共建國開始，一貫強調民族主義的共產黨政府始終沒有收回港澳地區的意圖，反而容忍並支持其存在，並提出「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構想，當時中共是基於宏觀

的國際戰略考慮：

(1) 保持與西方國家的溝通渠道，平衡蘇聯

中共建國初期，百廢待興，維持香港現狀，保持與英國的對話關係，既可為中國大陸開闢一條與西方國家聯繫的國際通道，又可利用英國在香港問題上必須爭取與中國合作的關係，製造英、美(美國是四九年後圍堵中國的最強大西方力量)對華政策的分歧。(註六)

此外，中共當時雖然推行「一面倒」向蘇聯的外交政策，但毛澤東及周恩來等於四九年前的解放戰爭期間及建國初期，實與蘇聯有很多衝突，深刻的歷史經驗迫使中共領導層不完全信任蘇聯，而推行「留下對外口岸」政策，與西方保持關係。從後來中國奉行獨立外交政策、中蘇分裂、中美建交及現代化建設等歷史事件，均證明保留港澳由外國統治的戰略符合中國利益。

(2) 經濟利益的考慮

經濟角度分析，正如周恩來於一九五七年提出的，中國大陸「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香港可作為我們同國外進行經濟聯繫的基地，可以通過它吸收外資，爭取外匯」，「保持和擴展香港這個陣地有好處。」(註七)

在五十年代後期至七十年代初，中國在面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挑戰時，香港作為中國溝通中外民間往來橋樑，以及引進海外技術、資金的作用就更為突出。一九五九年，毛澤東針對黨內部分人對港政策的急躁情緒，明確的指出：「香港還是暫時不收回來好，我們不急，目前對我還有用處。」(註八)

一九六三年，針對美國共產黨對中共處理港澳問題的責怪，中國領導層理直氣壯的指出：「香港、澳門這類問題，屬於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帝國主義列強加於中國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問題。」「我們一貫主張，在條件成熟的時候，經過談判和平解決，在未解決以前維持現狀。」「中國人民並不需要在香港、澳門問題上顯示武力，來證明自己反對帝國主義的勇氣和堅定性。」(註九)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分析，為維持香港的現狀，中國政府對港澳地區採取了極為務實的政策：

第一是不容許中國大陸內地頻繁的政治運動波及香港。例如周恩來在五七年上旬，即中國基本完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後便指出，香港「是純粹的資本主義市場，不能社會主義化，也不應該社會主義化，香港要完全按資本主義制度辦事，才能存在和發展，這對我們是有利的。」（註十）

第二是以優惠價格大量供應香港必需的食品、日用品及工業原料等。在價格上，七十年代初由中國進口的食品價格平均較國際市場價格便宜五成以上，原料便宜約百分之三十，衣服等消費品便宜百分之二十五，這對抑制香港的通脹、減低生產成本、改善市民生活及促進香港工業的出口與起飛起著重要的作用。（註十一）

從建國以來中共對港政策可看到，一國兩制的提出實有深遠的歷史背景，並非是中國領導人在中英談判前隨意提出來的，這政策實際上符合國家及港澳市民最大的利益。

第二節 中英就香港前途的談判及聯合聲明的簽署

一 中、英、港人對香港的立場及中國「被迫」收回香港

（1）中、英、港人對香港的立場

正如上文分析，中共對香港的政策為「長期打算，充份利用」，保留香港特殊地位對中國整體發展有甚大好處，尤其在七八年底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國家領導層的焦點集中於經濟建設，香港為中國提供百分之四十的外匯，是中國引進資金、技術與投資的窗口及重要轉口港，堪稱一隻為中國生金蛋的鵝。按理來說，既然中國在文革期間仍能容忍香港受英國統治的現實，根本無須在改革開放的經濟建設期間收回對香港的主權。

中國不一定要在九七年收回香港的主權在法理上亦是有根據的。中

國從來不承認不平等條約，早在七二年中國便對聯合國重申：「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完全是屬於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註十二)基於中國根本不承認滿清時代帝國主義列強強加於中國的條約，故中國可以及有實力在九七年前或之後的任何時間收回香港，而無須被一九九七年的期限約束。

站在英國及英資財團而言，香港能為其提供重大的經濟利益，在港英資財團基於與英政府千絲萬縷的聯繫，佔盡其他企業無法比擬的優勢，幾個英資大財團之代表傳統以來一直為香港最高決策行政機關——行政局的成員，對港英政府決策往往能洞悉先機，此外，香港眾多關鍵行業往往由英資壟斷，而香港政府很多重大工程合約亦批予英資財團。再者，英國本土人士可以自由來港並工作，香港亦負擔大部分駐港英軍的軍費，實際上為英國人提供就業機會及「養兵」。

除卻經濟利益外，香港地處亞洲，並與中國大陸毗鄰，對英國及西方國家來說，更具地緣戰略價值，香港既是英國及西方與中國大陸及整個亞洲溝通及發展聯繫的跳板，又是英國及西方勢力影響中國及整個亞洲的重要橋頭堡，香港更能使英國通過香港加強與澳洲、新西蘭及太平洋群島等英聯邦國家的聯繫。況且，擁有「亞洲四小龍」之一的統治權，能提高英國的國際威望。前英國外交部次官雷里 (Sir Anthony Royle) 曾私下透露，英國曾下令香港政府研究香港對英國的重要性，結論是「香港為英國帶來的經濟利益無從評估，也無可能將有關利益數量化，因為涉及很多無形的貿易及多種服務性收益。」(註十三)基於香港對香港無可比擬的經濟及戰略價值，早在四九年開始，英國便宣稱「不惜一切代價保衛香港。」(註十四)

對於香港市民來說，雖然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關心中國大陸的發展，並擁護七八年開始的改革開放政策，但在八十年代初期，香港市民畢竟仍對中國自大躍進及文革以來的歷史表示疑慮，再加上兩地經濟及生活水平的差距，皆使香港市民當時對中國收回香港主權的決策產生憂慮。

在這背景下，八十年代初期的香港市民出現極其矛盾的心情，他們一方面基於民族感情及對改革開放的信心，對九七年後實施「港人治港」

的建議表示支持（見八二年「新香港學會」就港人治港民意調查報告。）（註十五）但在另一方面，港人又同時期望維持現狀，延長九七年後英國對香港的統治，認為這是解決香港前途問題的最佳方法。（香港觀察社委託顧問公司進行的民意調查）（註十六）

（2）中國被迫於九七年收回香港

雖然英國希望延長九七年後對港統治，香港人普遍期望維持現狀，而穩定不變的香港形勢亦會為中國繼續帶來經濟利益，然而，歷史的諷刺是滿清政府與英國簽署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將於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到期，屆時英國一定要將佔香港地區總面積百分之九十二的新界交還中國，除非英國能得到中國的同意重新簽訂條約，容許英國繼續在九七年後統治新界，否則，根據上述條約，英國將喪失統治新界的法理及權力。

站在中國領導人的立場，他們可以尊重歷史，承認英國統治香港的政治現實，但若要他們將自己的領土重新割讓，簽署一條將自己國家的土地予外國管治的條約，則卻是萬萬不能。基於中國在領土主權上沒有回旋餘地，而百分之九十二的新界土地歸還中國後，餘下百分之八地方亦難以獨立存在，故此，中國決定在九七年收回整個香港。鄧小平曾於八二年九月會見英國當時的首相戴卓爾夫人，指出假若中國不收回香港，「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如果十五年後還不收回，人民就沒有理由信任我們，任何中國政府都應該下野，自動退出政治舞台，沒有別的選擇。」（註十七）

二 中英談判及英國政府的談判策略

（1）英國於中英談判前深思熟慮的部署

在中英於八二年談判前，英國政府早於七九年便清楚了解中國要收回香港主權的立場，並精心謀求對策。

首先，英國於八零年七月公佈《英國國藉法白皮書》，將持有英國護

照的香港居民列為無權在英國居留的「英國屬土公民」，關上移民大閘，杜絕香港市民由於香港政治地位轉變而移居英國的機會。當時，以鍾士元為首的香港的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得悉英國此行動，希望游說英國國會否決《白皮書》的建議，以維護香港市民一向擁有的權利，但議員此舉受到當時的香港總督所反對，一位立法局議員曾在事後回憶道：

「……及後兩局議員發覺真相，他（指當時的港督）又多次阻撓非官守議員的挽救行動，並且一再反對兩局議員前往倫敦進行游說工作……結果，上議院僅以二票之差通過了國藉法。」（註十八）

其次，英國開始部署非殖民化策略，將過往完全壟斷的政治權力逐步移交香港人，並開始培植九七年後的親英力量。一九八一年，香港政府先後公佈《地方行政白皮書》和《區議會條例》，設立區議會，並開展地方選舉。英國之非殖民地化策略、使英國在撤離香港後，仍能通過預早部署的英式政治架構，以及在過渡期間培養的親英勢力，繼續發揮英國對香港的影響力。

（2）中英談判的展開

一九八二至八四年，中英兩國政府就香港問題開展了艱辛的談判，談判主要環繞三個問題，分別是一、中國收回香港主權問題；二、一九九七中國收回香港主權後採取甚麼方式管理香港，以維持香港持續繁榮；三、過渡期保證香港繁榮，避免社會動盪，促使平穩過渡。

為保證中國收回香港的主權後香港能繼續維持安定繁榮，中國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思，在收回主權的前提下，實施港人治港，容許香港社會及經濟制度不變，以解決九七後的香港能得以繼續發展。

（3）英國政府的立場與談判策略

英國方面，雖然英政府已清楚理解到中國要收回香港主權的主場，但英國仍認為中國會基於經濟利益，最終會同意延長英國對香港於九七後的統治。一位立法局議員形象地指出英國繼續對香港九七年後統治的

重要性：

「香港能夠保持繁榮，其中主要因素，是有一個國際投資者信任的行政管理制度，而英國人在這方面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香港仿如一隻在蜘蛛網上的蜘蛛，經過數十年努力，才建立起來的國際關係和聯絡，若因改變現狀而突然切斷，勢將似蜘蛛網被割破一樣，整隻蜘蛛立即會掉下來。」(註十九)八二年九月，英國當時的首相戴卓爾夫人在會見趙紫陽前指出：「……我希望能和中國討論如何確保香港穩定和繁榮，這點對中國是如此有利——以中國的外匯來說，其中40%是從香港得到的——同時香港居民生活如此美好，很多香港居民將前途付託給我們。」(註二十)

戴卓爾夫人提出，香港市民很大部分從中國內地遷到香港，意識形態與大陸不同，故多讚成英國繼續統治。上述的立場即為英國對抗中國的「經濟牌」及「民意牌」。由於中國政府對香港主權的執著，英國對港的立場亦作出多次調整，在談判開始時，戴卓爾夫人堅持英國與滿清政府簽署的「三個條約」有效論，迫令中國政府對英妥協，後來當中國表示不承認列強於滿清時代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而導致談判停滯不前時，英國政府在內部提出：

「(1)若談判仍無進展，便在港發展民主架構，在短期間內讓香港獨立或進行自治，就像英國以前在星加坡所做的一樣；(2)亦可考慮在聯合國主持下就香港前途問題實行全民投票。」(註二十一)

由於這些建議不切實際，故經過詳細考慮後，英國便提出以「主權」換取整個香港的「治權」，延長英國於九七年管理整個香港的權力，英國所持的理由是港島及界限街以南的土地，按照條約是永遠屬於英國，而港人又極希望維持現狀，故此，英國願意以交回整個香港主權給予中國，以換取九七年後英國繼續管理香港的權利，(註二十二)並建議中英簽署英國得以於九七年後管理香港的「管理合同」。(註二十三)基於主權換治權的概念實際上重申不平等條約有效論，自然再次受到中方的拒絕。

在這場「主權」爭奪戰之談判階段，英方頻頻開展活動，加強對中方

的壓力：

1. 「民意牌」，鼓吹三腳凳，英國一改過往防止香港市民議論九七問題的做法，大力鼓勵市民就前途問題發表意見，利用港人「恐共」情緒，向中方施壓；
2. 「經濟牌」，散佈悲觀情緒，強調英國管治對香港經濟繁榮的重要性，並巧妙地利用中英在主權問題談判上的僵局而導致的股市、港元匯價危機，增強對中國的壓力。
3. 「國際牌」，讚揚英國統治的重要性，並提出假若中國收回香港，則無論中國政府對香港實施怎樣的開放政策，誠心的保留資本主義制度，但香港由於始終被劃入「紅色共產中國」的版圖，各國政府將不會保持與香港的國際聯繫，香港亦將不會被外國准許參與各個國際經濟、貿易、科技及文化組織。基於香港的生存極端倚靠對外開放，切斷香港的國際聯繫無疑等於對香港宣判死刑。

面對英方施加的種種壓力，中國政府始終屹然不動，在此情況下，英國只得同意放棄主權，及以主權換取治權的構想，而提出在九七年交還香港予中國的前提下，正式保持英國與香港的聯繫，並希望「使(未來的)香港在不受北京牽制及影響下實行自治。」(註二十四)當時英國與行政局議員同意的談判底線是：「不反對九七年後港督由中國委任，但交換條件是設立副總督職位，並由英國負責委任；藉此令九七年後的香港仍和英國保持一定的聯繫。」(註二十五)此外，英方更提議持有香港身份證的海外官員可以擔任香港公務員系統中直至最高層官員的職務；由英國人出任「敏感性部門」的關鍵性職務如律師司、按察司、警務司、銓敘司等，務求九七年後英國能名正言順的在香港政府體制內扮演決定性的角色，並試圖將香港變成一個英聯邦成員或準成員。(註二十六)基於上述構思與中國的主權相抵觸，故仍為中方拒絕。

由於中國立場堅定，英方只得轉而尋求中國落實其對九七年後香港的承諾，談判得到徹底突破，中英兩國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終於在一九八四年九月簽署。

三 中英聯合聲明內容與中國談判成功的原因

(1) 聯合聲明的主要內容

聯合聲明的主要內容包括下列幾個方面：(註二十七)

1. 中國政府聲明將於九七年七月一日，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英國政府聲明將於九七年七月一日將香港交還予中華人民共和國；
2. 中國政府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的基本政策是：根據中國憲法等三十一條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港人治港，除國防與外交外，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香港現行社會、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香港繼續保持自由港、獨立關稅地區、以及國際金融中心之地位，保持財政獨立，並能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單獨地同各國及各有關的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經濟和文化關係等等；
3. 中英兩國聲明，在過渡期內，英國政府負責香港的行政管理，保持並維護香港經濟繁榮及社會穩定；對此，中國將予以協助；
4. 聯合聲明並載有三個附件。《附件一》為中國對香港於九七年後所採取的政策的具體說明，這些內容後來被納入未來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條文內；《附件二》為「關於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規定，在中英協議生效時，中英組成聯合聯絡小組，工作至二零零零年一月一日為止。中英雙方同意該小組為聯絡而非權力機關，其職責為就聯合聲明的實施進行協商，討論與九七年政權交接有關的各項事務；《附件三》論及批地契約，重點為批准香港政府可批出超越九七年的土地，而香港政府批出新的土地，每年局限五十公頃。此外，中英雙方還交換了關於國藉和旅行證件問題的備忘錄。

(2) 中國談判取得勝利的原因

中國能成功收回整個香港主權，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有強大的國勢，再加上地緣政治的關係，英國根本無可能再以軍事力量繼續佔據香港；

其次是中國利用改革開放優勢，以龐大及有潛質的大陸市場擴大與各國的經濟關係，大大增強中國在外交上的影響力。此外，由於反對殖民

地侵略已成為國際社會的主流，故英國在國際層面極難尋求支持力量；

第三是中國領導人在堅持主權及治權的同時，又提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及維持資本主義制度不變等方針，在不損害主權的大前提下，實事求是，極為靈活地處理香港問題，盡量照顧中、英、港三方面的利益。其誠意逐漸消除部分人士的疑慮，促使更多人士支持中國對港的立場。

第三節 從基本法的制定看中國對香港的具體政策

一 基本法的本質與制定過程

基本法是九七後香港特別行政區憲法文件，用以取締香港在英國統治下的憲法——英皇制誥與皇室訓令，並落實中國對香港的各項具體政策。

基本法在一九八五年中開始制定，其中經歷五年多的時間，直至九零年三月由全國人大正式通過。制定基本法是由中國政府首先提出，當時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兼秘事長魯平曾指出：

「……當時香港沒想到要搞個基本法，英國人也沒有提到，是我們主動提出來的。當時我們就考慮到香港人不放心，擔心將來中央的政策會不會變，後來我們想，既然是這樣，可以作為一個法律的形式定下，成為了一個法律，依法辦事，就不會改變。」(註二十八)

中國政府在八四年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一》中宣佈，全國人大制定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後不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保持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註二十九)隨著八四年聯合聲明的簽署，中國政府便開始制定基本法的工作。八五年四月，全國人大議決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草委會)，任命草委會委員共五十九人，香港人士佔二十三位，同時為吸納更多港人意見，草委會並決定在香港成立一個由香港各界人士共一百八十人組成的基本法諮詢委員會(諮委會)。

草委會在八五年下旬開始工作，八八年四月提出《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在內地及香港廣泛徵詢意見，然後進行修改。一九八九年二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基本法(草案)》，並再次在內地和香港徵求意見，經過這「兩上兩下」過程，全國人大在九零年三月通過並頒佈《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為加強港人信心，並提高基本法的權威地位，中國政府以開放、廣泛諮詢的態度制定基本法。草委會、諮委會每次大小會議都向新聞界公佈，而「第一次徵求意見後……修改了一百多處。」^(註三十)八八年七月，英國外相賀維在英國下議院指出，基本法「起草過程非常公開，草委會內能自由交換意見，起草過程中已公佈的訊息十分豐富。」^(註三十一)

二 基本法內容分析

(1) 基本法所涵括的內容及兩大重心——中央與地方關係及香港內部矛盾

基本法分九章共一百六十條，第一章為總則；第二章為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第三章為居民的權利和基本義務；第四章為政治體制；第五章為經濟；第六章為教育、科學、文化、體育、宗教、勞工和社會服務；第七章為對外事務；第八章為基本法的解釋和修改；第九章為附則，此外，基本法還有三個附件，分別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以及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

基本法內容十分豐富全面，主要處理四個問題，分別是：第一，一國兩制的總體構思；第二，中央與地方關係；第三，九七後香港的政治制度。由於中央承諾九七年後港人治港，中央不派幹部管理香港事務，故基本法有必要明確九七年後香港行政長官、立法機關產生辦法，以及各政治架構間之關係；第四，居民權利義務，以及中國大陸對香港經濟、教育、科學、文化、體育、宗教、勞工及社會服務等總體方針。

若更深入分析，上述四大問題主要仍環繞著兩個重心——「中央與地

方關係」及「香港社會內部矛盾」，而制定整個基本法的過程，實際都是圍繞這兩個重心作出討論。

(2) 中央與地方關係

在制定基本法的過程中，由於中央政府堅守一國兩制的國策，並以開放寬鬆的態度靈活地處理中港關係，中共將可以下放的權力盡量下放予港人，故與中央與地方關係有關的條文普遍為香港人，甚至國際社會(包括英國)的接受。草委會在八八年中下旬第一次諮詢港人意見後，將備受港人關注的有關中央與地方之條文大幅修改，深受港人歡迎。

當時曾參與採訪基本法起草過程的記者事後回憶：在中央特區組內最大的「反對派」在小組會議後也喜形於色，雖然他多次提出的「內部緊急條款」始終未為小組討論，但他也對小組的成果感到滿意，他喜孜孜地對記者說，在中央與特區關係的重要條文上，中央下放了很多權力給特區，此經驗顯示，對香港有利的事，港人應盡量爭取。(大略)(註三十一)從上述港人的反應可論證，中央政府希望將可以下放的權力交予香港，而中方的主要制約，乃是需要考慮中國境內其他省市及人民之接受程度，這亦是一國兩制中「一國」的原則。

基本法在九零年通過之前，經歷了令香港人震驚的八九民運及六四事件，香港出現了移民潮，社會並普遍擔憂中方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的可能性。而在另一方面，中國政府指出中央根本從未改變對港政策，但亦批評香港市民投身及以財政支持北京學運乃是干預中國內部事務，違反一國兩制的原則，故此，在基本法條文上加強了對香港的限制，目的在防止香港將來再「干預」大陸的事務。然而，假若分析基本法最後通過有關顛覆及禁止與外國政治組織聯繫(這類條文在香港過往一直存在)的條文，皆可發覺中央容許香港自行立法加以禁止，將處理此等事件的主動權交予香港，使大陸干預香港事務的機會大大降低。

另一個引起港人懷疑之例子是基本法第十八條有關「緊急狀態下」中國可將全國性法律引入香港，若細心分析，此條文將香港的動亂明確界定為香港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表明中央政府

所期望的是港人不要介入大陸事務，而並非刻意要改變一貫的「港人治港」承諾，以加強對九七年後對香港的控制。

上述兩個例子可從另一角度印證六四後中央對香港政策基本維持不變，而在基本法中加進有關條文，目的是使港人有所警惕，不在大陸進行一些香港市民認為是爭取民主，但中國大陸認為是影響其政治穩定的行為。

（3）基本法內政制條文的激烈爭論——香港內部階級矛盾的反映

在基本法制定的過程中，香港內部曾出現激烈的論爭，爭論的主要議題是環繞九七年後香港政治制度的設計。由於香港內部對政制事宜出現極為對立的意見，故基本法最後通過的政制部分基本上反映了很多不同、甚至對立的意見，是不同政治力量角力及協調的結果。由於政制是各方面妥協的產物，故客觀上政制部分無法被香港某一派人士百分之百同意，否則它將是對另外或持對立觀點的人的絕不尊重。

基本法內政制設計的爭論反映香港內部不同階級的取向。扼要來說，作為工商專業界，由於缺乏參與社會運動經驗，較難於一人一票的直接選舉中取勝，為維護工商界之利益，這類人士希望基本法的政制設計能傾向穩定，民主發展步伐能較循步漸進，並推行保證工商專業界能有代表參與立法局的「功能團體」及「選舉委員會」選舉制度。而在另一方面，站在中下階層利益立場的人士，則希望擴大選舉範圍，加速直接選舉步伐，使其代表能參與政府決策，令社會的經濟資源分配能更多的傾向中下階層，擴大社會福利。

雖然中央政府曾多次呼籲並期望香港各界能自行協商一個政制方案，但由於香港內部出現反對港人協調的觀點，以致港人內部無法出現共識，為平衡各方面利益，中央政府遂接納一種循步漸進式的方案，這方案基本的原則是在九七年初期推行相對謹慎發展的政制模式，避免香港在主權移交的關鍵時刻出現政治動盪，影響香港的繁榮穩定。而在二零零七年社會較平穩的時刻，則容許香港自行決定是否用全部直選方式產生行政長官以及所有立法會議員。

雖然基本法政制內容偏向穩重，但假若站在可比較的宏觀歷史角度分析，基本法政制條文實比統治香港百多年、基本全以委任制為主、總督權力極大的殖民地憲法民主開明得多。（註三十三）

（4）維護香港現行制度不變的條文

除卻中央地方以及政制等條文外，基本法其他部分主要申明香港現有制度不變，並保護居民權利，對維持香港於九七年後的持續繁榮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其重點如下：

1. 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2. 香港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3. 香港原有法律，除與基本法有抵觸者外，予以保留；
4. 保護私人和法人財產。香港九七後的財政、稅收、貨幣金融制度獨立；不實行外匯管制政策；
5. 香港特別行政區可在經濟、貿易、金融、文化、通訊及航運等領域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單獨與世界各國及各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簽訂有關協議；
6. 中央政府各部門及各地方政府均不得干預特別行政區的事務；
7. 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結社、遊行等自由。

三 從中英談判及制定基本法過程分析中國政府對香港的政策

從整個基本法的制訂過程，可以清晰理解中國政府對香港的政策，此分析對香港將來處理與中國大陸的關係甚有意義。

（1）堅持對香港的主權

這點解釋了在可能帶來社會動盪的情況下，中國政府仍堅持收回香

港；在中英談判及制定基本法過程中阻止英國對九七年後中國主權下的香港作出政治干預；堅持屬於港英架構的立法局一定要通過英國才能向中方反映意見，從而防止立法局以代表港人為名而配合英國向中方施壓；強調基本法一定要帶動香港過渡期的政制改革，不容英國非殖民地化策略製造既定政治制度，強迫基本法接受；以及中央保留一定權力，以體現對香港主權的象徵。

（2）維持香港經濟繁榮，保留資本主義制度，偏重工商界利益

維持香港經濟繁榮，除可以避免由於收回主權影響香港經濟而加重中央負擔，更可保持香港作為中國對外經濟窗口的地位。最重要的，是中國在邁向市場經濟過程中，能借鑑香港各方面成功之經驗，加速中國經濟建設。

要保持經濟繁榮，避免動盪，即要維持現有資本主義制度不變；要保證資本主義能順利運作，則必需吸引本地及海外資本家繼續投資。考慮到資本家害怕共產黨的心理，以及香港的華人資本家很多是在四九年中共佔領大陸時逃往香港，為安定他們的信心，及為他們提供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即在香港賺取的利潤率不會比其他國家低。中國政府在處理香港問題時，特別注重投資者的意願，例如中國領導人接見的多是工商界首腦，並邀請資本家出任草委、諮委、人大、政協等架構之成員，從而使這些架構中的香港資本家佔絕對的優勢。此外，又在基本法中特別開闢經濟一章，詳述各項對現存經濟制度的保證，以及在政制問題上也較傾向資本家提出的意見。

基於資本主義結構性限制 (Structural Imperative of Capitalism)，中國政府不得不維護資本家的利益與資本累積的需要，避免資金流往外地，故此香港在面對九七時，出現了一個非常有趣但十分合理的現象，就是共產黨與大資本家結成緊密的聯盟，很大程度上決定香港之發展走向。

（3）維護政府權威，平衡各階層利益

雖然中國政府必須維護香港資本主義運作，但正如任何一個國家

的政府一般，若政府過份偏向某一階層的利益，必會引起其他階層人士的不滿，影響政府的權威及合法性。故此，在維護資本家利益的同時，中國政府亦支持一些與資本家利益相違背的政策，如反對輸入勞工、支持成立中央公積金及支持改善某些公營企業員工福利等。而在制定基本法過程中，中方扮演持平角色平衡各方面利益的例子隨處可見：

1. 強調「民主協商」

在草委、諮委會中，中方經常強調要以「民主協商」而非一人一票的方法解決問題，這實際上是中方希望平衡資本家利益的政策，可以想像假若在資本家佔大比例的草委會港方成員會議及諮委會中以民主(即一人一票方式)決定問題，則由於這些機構的組成先天性已偏向資本家，所作的結論很自然會主要反映資本家意向而未必能顧全整體社會利益。若上述情況不斷出現，將使強調要尊重新整體港人意願的中國政府事事受制於資本家，這固然是中央政府所不願意見到。若政府處處奉資本家旨意行事，結果會引起社會階級矛盾加劇，造成社會動盪，最終可能動搖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故一個有遠見的政府，往往會以維持現存經濟制度的大前提出發，站在較為超然的立場，平衡各階層的利益，保持社會穩定。

基於上述因素，中國政府遂提出「民主協商」方法，解決問題。

「民主協商」強調不以投票方式決定事務，而希望各個政治架構中不同利益或意見的人士能以民主、理性、協調的態度，通過討論協商，達成彼此皆能接受的結果。假若各方不能協調，則政府在平衡各方利益後，作出決定。故此，「民主協商」的本質實為「互讓式的討價還價」決策模式，以及在各方僵持已見下出現的「開明、理性獨裁」。

2. 提出循步漸進方案，以化解香港內部分歧

在港人內部分歧大的政制問題上，不斷鼓勵港人自己協調，而在香港內部無法協調的情況下，基本法最終以逐步發展民主政制的時間表方案，循步漸進，容許直選比例逐步增加，盡量化解香港內部的分歧。

3. 在基本法經濟一章中，平衡各階層之利益

在基本法經濟一章裡，中方不贊成主要是資本家提出的硬性規定將來特則行政區稅收及政府支出上限等之建議，以保證香港政府將來的支出水平能按實際社會需要而制定。

(4) 防止英國非殖民化及香港介入中國大陸政治而帶來震盪

這不單要從「中共本質為獨裁」的角度分析，(因中共十九年改革的特點便是將權力過度的下放，以及在經濟上放權讓利，引致社會出現某程度之失控)，更需考慮香港過渡期間的複雜情況。中方一直對英國非殖民化、培養親英勢力的政策有所警惕，鄧小平早於八二年會見戴卓爾夫人時便提出其顧慮：「我擔心的是今後十五年過渡時期如何過渡好，擔心在這個時期中會出現很大的混亂，而且這些混亂是人為的……主要的是英國人，製造混亂是很容易的。」

此外，香港市民在八九民運期間支持大陸學運的行動，促使中國加強控制香港的決定，故此，基本法條文中規定香港需自行立法，禁止顛覆及危及國家統一安定或安全的動亂(基本法第十八及二十三條)。其實早於一九八七年，鄧小平已清楚表明態度：

「……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特別行政區是不是也會發生危害國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北京過問不過問？」「香港有時候會不會出現非北京出頭就不能解決的問題呢？」「……一九九七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充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干預首先是香港行政機關要干預，並不一定要大陸的駐軍出動。」(註三十四)

第四節 中英論爭及直通車模式遭破壞

一 香港政制平穩過渡九七，中英主權移交的直通車安排

根據《中英聯合聲明》，英方將於九七年七月一日將香港交還予中華人民共和國，隨著殖民地統治的結束，港英的所有政制架構亦自然隨之終結。雖然港英規定立法局、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區議會的任期為四年，到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尚未屆滿，但由於這些政治架構屬於殖民地政府政制組成部分，就如同英國的港督及殖民地憲法一樣，它將隨殖民地的結束而終結，到九七年時中國將按基本法的規定重訴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會及各級議會。按理來說，英國是無權插手九七年後香港事務的。然而，中國政府從維持香港平穩過渡的良好意願出發，在與基本法銜接的前提下，通過與英國的磋商合作，希望容許九四、九五年產生出來的香港三級議會能順利過渡，超越九七主權移交。

為此，中國在制定基本法的過程中，多次與英國商討，並通過九零年初兩國外長互換信件，雙方達成協議，同意過渡期的香港政制安排在與基本法銜接的前提下，在殖民地統治下產生的立法局議員可在有條件情況下，自動成為在中國主權下之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議員。為保證「直通車」的安排和各級議員的順利過渡，中國全國人大在九零年四月通過《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指出原香港最後一屆立法局的組成如符合本決定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其議員擁護基本法、願意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並符合基本法規定者，經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確認，即可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議員。(大略)(註三十五)當時基本法草委會主任姬鵬飛曾指出：「這樣安排，是為了保證香港在整個過渡時期的穩定以及政權的平穩銜接。」(註三十六)

基於香港在九四、九五年產生的各級議會議員均面對過渡九七問題，所以中英雙方必需就九四、九五年的選舉事宜充份合作與協商，務求達至統一意見，以保證「直通車」的安排能順利推行。

二 中英出現政制論爭的背景

中英就香港政制的論爭其實可追溯至七九、八零年當英國得悉中國要收回香港時開始。站在英國民族立場及利益出發，英國從來不希望將香港交還中國，在中英談判期間英方提出三個不平等條約有效論，接著又提出以主權換治權，及後又再提出香港九七年後英國實行某程度對香港的「參與」，最後迫於形勢無法不接受現實。但在另一方面，英國早於八十年代初期，即得悉中國決心收回香港主權後，便進行兩手準備，一改百多年殖民地制度的獨裁統治模式，通過地方行政，推行非殖民地化計劃，其目的是在交還主權前，將香港演變成一個與中國大陸產生巨大離心力的實際「半獨立」政治實體，正如英國人喜歡提出的，只有「十二年大變」、才能保證「五十年不變」，及後港英政府提出的代議政制綠皮書及白皮書，直至九二年香港總督彭定康提出的政制改革方向，皆循此策略進行。

針對英國政府大幅修改香港的政制，中方於八五年便明確表示：「我們不希望看到十二年中大變，把香港的根本制度改變了，再五十年不變，這是不符合中英《聯合聲明》的。」^(註三十七)對中方來說，英國在同意交還主權之前不斷鼓吹香港政制之優越性，各重要官員如律政司等更提出「香港政制：繁榮之所繫」的論調，^(註三十八)提出香港當時以行政為主導的高效與穩定的政治體制的重要性。然而，英國在同意交還主權予中國後卻即時改變上述立場，加速香港政制的民主改革，這就不得不引起中國政府官員的懷疑和憂慮，認定英國是刻意針對中國，通過非殖民地策略，培養九七年後的親英代理人，以保持英國對香港以至整個中國大陸的影響力。

香港新華社社長周南曾指出：

「英國殖民統治一百五十年，到今天還是總督專政獨裁，那裡有甚麼民主？現在的安排九一年直選議席由零一下子增加到十八名，然後陸續增加，到二零三零年增加到三十名，達到百分之五十。在此以後如何增加，完全由港人自行決定。去年九十高齡的英上院議員蕭克羅斯勳爵

來看我，我說按照已達成的協議，在短短的十二年中，直選議席從零增加到半數，你說這個速度是快了還是慢了？他說：這當然是很快了，我們在英國自己用了四百多年的時間才完成議會民主進程，而且到現在還保留了由委任產生的上議院，說香港的民主進程還不夠快，是荒謬的，不現實的。」(註三十九)

三 英方改變對華政策，及彭定康政制改革方案的論爭

英國對中國於制定基本法期間所採取的開明態度一向表示欣賞，然而，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不單使港人震驚，更促使英方要求加快香港政制改革的步伐，務求香港於九七年前儘速推行直接選舉。英方提出「修改一九八八年」《白皮書》規定的一九九一年立法局選舉計劃，大幅度增加直接選舉的議席與比例，一九九五年使其佔議員總數的一半，至一九九七年全部由直接選舉產生，任期延續至一九九七年後。」(註四十)然而，後來由於中國政府迅速穩定局面，英方遂改變對中國態度，並回復六四前雙方的關係。在此背景下，中英兩國外交於一九九零年初曾就香港政制直通車的安排互相交換(七封)信件，而中國於九零年初頒佈基本法後，港英政府更向香港市民推薦。

真正促使英國政府改變對華策略的事件是一九九零年開始的蘇聯、東歐各共產主義國家之激變，這些國家的共產黨政府在極短時間內紛紛跨台，西方各國基於長期對社會主義的厭惡，在此期間皆出現極為樂觀之盲目情緒，並認定蘇聯解體後中國也將發生類似的變化，中國共產黨勢將跨台。基於此判斷，西方各國自然對中共政權採取強硬態度，例如美國向台灣出售先進武器，進一步支持台獨，而英國則撤換與中國關係較好的總督衛奕信，進而採取強硬策略。

一九九二年十月，上任未到三個月的總督彭定康，在事先未根據《中英聯合聲明》規定與中方磋商的情況下，推出題為〈香港的未來：五年大計展新猷〉的施政報告，提出其九四、九五年政制改革方案，揭開中英衝突的序幕。

中國政府認為《彭定康政改方案》從內容到提出方式皆違背《中英聯合聲明》、違反中英雙方已達成的協議及違反與基本法銜接的原則，具體表現如下：

- (1) 改變立法局內功能團體選舉的原則，改變過往英國一貫主張的功能團體為保障專業團體利益的間接選舉，而進行分行業的直選，將選民人數從九一年的不足十萬增加到二百七十萬人；
- (2) 關於選舉委員會(可產生十位立法局議員)組成建議，政改方案認為應「讓全部或大部分委員由直接選舉產生的區議會內的區議員擔任」，這就明顯的違反中英兩國外長於一九九零年初的協議，即工商金融、專業、勞工基層宗教、以及政界人士各佔四分之一的安排。
- (3) 在兩個市政局及區議會組成上，政改方案全部取消委任制。中方認為這種做法違反了聯合聲明及基本法中規定的循步漸進原則。

四 中英談判破裂，直通車安排改變，中國決定成立臨時立法會。

基於中英雙方對政制的嚴重分歧，雙方政府於九三年開始便進行艱辛的談判。令中方感到不滿的，是英方無視九七年後中國對香港的主權，極希望影響九七年後香港的政制安排。據中國政府指出：「英方卻在會談一開始並在以後一再提出三個問題與中方討論。這三個問題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香港委員應由中英雙方磋商產生；如香港特別行政區同意，中國政府應支持在二零零七年立法會實行普選；一九九五年的選舉委員會應作為今後產生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的推選委員會以及產生以後各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的模式。」

由於雙方就上述及其他問題的嚴重分歧，談判進展極為緩慢，最後更由於英方單方面於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將政改方案提交立法局審議，直接導致中英談判的徹底破裂。港英政府則根據彭定康政改方案於一九九五年九月推行立法局選舉。

針對九五年的立法局選舉，中國政府明確提出是次選舉模式是按照彭定康政改方案而進行，內容違反基本法，為不公平及不合理，故香港最後一屆的三級議會，將會隨殖民地統治的結束而終止。九七年香港特別行政區三級議會將按照全國人大及基本法的決定重新組成。至此，為香港政制平穩過渡的直通車安排正式取消。

考慮到九七年主權移交後制定選舉法及組成第一屆立法會約需一年的時間，為避免這一年內立法真空，中國政府決定在九六年下旬成立全由港人組成的臨時立法局，以任命法官、審閱香港九七年前法律是否違反基本法、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財政預算案及辯論第一屆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等必須由立法機關處理的事項。

一九九六年初，負責處理香港過渡事宜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正式成立，標誌著中國收回香港主權的具體工作進入最後的階段。

第五節 組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及中共對港人治港的部署

一 筹委會的組成與第一屆特區政府的產生

九六年一月，負責籌備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事宜、及籌組香港特別行政區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以下簡稱籌委會)在北京宣告成立，籌委會委員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任命，在一百五十位籌委會委員中，九十四位是香港人。

在籌委會下，設立了推舉委員會小組、第一任行政長官小組、臨時立法會小組、法律小組、經濟小組、慶祝活動小組等六個工作小組，具體負責籌組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及立法機關等工作。由於推舉委員具體負責選出第一任行政長官及臨時立法會，故其地位甚為關鍵。九六年四月份，籌委會就如何組建推舉委員會在香港舉辦了十六場諮詢會，邀請香港三百六十多個社會團體、千多名代表參加發表意見。

九六年八月，籌委會通過了由四百人組成的推舉委員會的具體產生

辦法。推委會原則上採取雙重差額選舉方式產生：即第一輪選舉為有意參選成為推委會成員的香港市民可向籌委會報名，在截止報名日期後，籌委會從各報名人士中選出推委會的「候選人」名單，「候選人」名單人數多於推委會應選委員（四百人）的百分之二十，即「候選人」名單為四百八十人，而在第二輪選舉中，籌委會再從四百八十名「候選人」中選出四百名推委會委員。

雖然推委會成員只是由籌委會通過兩次選舉產生，但值得注意的是，是推委會的參與辦法是全面開放，不設置條件排斥任何人士，極具民主理念下的包容精神，籌委會主任錢其琛在籌委會通過推委會產生辦法的籌委會議上極具針對性的指出：「在香港還有一些人，他們贊成香港回歸祖國，但在香港發展民主的道路和速度問題上有不同的意見，只要擁護祖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希望香港平穩過渡和繁榮穩定，有這樣一個共同的基礎，大家就應該而且可以坐在一起，共商港事，把香港的事情辦好。這就要求我們兼容並蓄『求大同，存小異』。」實際上，推委會的報名辦法十分簡單，報名人只要具備四項資格：年滿十八歲；為香港永久性居民；擁護一國兩制方針及基本法（按：無界定具體定義）；願意履行推委會推舉第一任行政長官和選舉臨時立法會的兩項職責。

報名者無論過往發表過甚麼言論及進行過甚麼政治行動，只要簽署報名表後就完成報名程序，以一個「愛國愛港」人士的身份參與推委會的選舉。九六年八月十五日至九月十四日，有接近六千名港人報名參選推委會。十一月初，籌委會以差額選舉的方式，選出了四百名推舉委員會委員。

客觀來說，推委會的組成，是「港人治港」關鍵的一步。由香港人自己組成一個機構選出行政長官，這在殖民地統治下是不可想像的事。英國雖然標榜民主，但在其百多年統治香港期間，港督由英國委任，從來不會諮詢港人意見。故此，可說，以包容精神而組成的推委會是香港逐步走向真正民主、落實「港人治港」的里程碑。

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推委會提名工商界人士董建華、吳光正，前香港首席大法官楊鐵樑三人為第一任香港行政長官候選人。中國政府對

這次選舉態度慎重而中立，避免對任何一位候選人發表意見。針對選舉初期香港社會上曾有中國政府「欽定」的說法，錢其琛反復強調：「有人可能會問，對這次選舉中央有甚麼態度。我認為，要實行港人治港，就要尊重港人的意願，這就是中央的態度。」十一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推委會舉行幾場答問大會，三位候選人分別向推委會成員報告施政設想並回答推委們的提問。十二月二十一日，推委會選舉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以三百二十票的高票數當選。

基於期望香港能儘量平穩的過渡，並加強臨立會的權威性，在選舉臨立會成員期間、香港社會及中國政府個別有代表性官員，皆提出希望推委會能選舉一些具立法經驗的香港人士出任臨立會議員。臨立會選舉共有一百三十候選人，其中三十四位是現任——即在一九九五年在香港經選舉產生的立法局議員。十二月二十一日，推委會在深圳選舉產生臨時立法會議員。在當選的六十名議員中，三十三位是現任立法局議員的人士當選，使臨立會的具體人選有一定的代表性。

九七年二月二十日，董建華公佈由其提名，經中國中央政府同意任命的香港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名單，除卻外藉官員的律政司以及將退休的廉政專員外，其餘二十一名現任司級官員全部留任。從港英高官原位留用，再一次反映中國政府支持香港平穩過度的用心。

據年九七年三月十日中國副總理、籌委會主任錢其琛向全國人大報告籌委會的工作時指出，籌委會在一年來為籌建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了六項關鍵性工作，包括：

- (1) 組建特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
- (2) 主持推舉特區第一位行政長官人選；
- (3) 主持選舉產生特別行政區臨時立法會；
- (4) 開展對與香港政權交接和平穩過渡有關的重大問題經濟問題的研究；
- (5) 對香港原有的法律進行審議並提出處理建議；
- (6) 對國歸慶祝活動進行組織安排。（註四十一）

二 中共對九七年恢復行使香港主權的部署

面對九七年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江澤民在九六年十月十日的中共十四屆六中全會閉幕講話中，專門談到香港問題。江澤民除卻重申「一國兩制」的國策、並對香港的平穩過渡及長期穩定和繁榮表示有信心外，更著重給內地各省市、部門打招呼，強調全國也要尊重「一國兩制」：

「在香港回歸問題上，切不可自己搞亂自己。收回香港不同於當年的『大軍南下』。」「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後，中央各部門以及各省市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及各部門之間，不存在上下級隸屬關係，未經中央批准不得在港設立機構，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今後內地人去香港，無論是因公還是因私，都要按有關規定辦理手續。」（註四十一）

在九七年三月的全國人大會議期間，香港新華社社長周南重申：「中央也制訂了一系列方針，在香港回歸後要求內地各省市和政府有關部門在處理涉港事務時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以保証『一國兩制』構想和體現這一構想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法能夠得到全面的不折不扣的實施。」（註四十二）

九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候任行政長官董建華訪北京，接受中國總理李鵬頒發的任命書，雖然任命的儀式簡單，但卻打破了中央從來不就委任地方官員舉行任命儀式的習慣，突顯出香港在中央領導人心目中重要的地位。

江澤民在會見董建華時亦再重申：「一國兩制」是中國既定的國策，不是權宜之計。從這次行政長官的選舉，就可以看到中央在貫徹落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面的決心和誠意。今後在處理香港問題時會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決不會去干預屬於特別行政區自治權範圍內的事務。他請董建華對此放心。江澤民更提出，如果行政長官遇到甚麼問題，需要中央幫助，中央一定會全力支持。

此外，據北京消息，九七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以辦好香港回歸為

重點，要求各級黨委維護政治和社會穩定，為香港回歸提供有利環境。(註四十四)

九七年一月下旬，與香港毗鄰的廣東省公安局長會議作出部署，務求全省警方確保治安大局穩定，迎接香港回歸。廣東省公安廳長指出，由於粵港兩地唇齒相依，香港回歸已日漸臨近，廣東省要求省內各地警方嚴密細緻地做好為香港平穩過渡的各項安全保衛工作，加強反偷渡外流，嚴格邊防管理，繼續與香港警方合作，加大打擊跨境犯罪力度，促進兩地治安穩定。

五月六日，江澤民再強調一國兩制的重要性，他指出：「維護香港基本法的權威，就是維護國家法制的權威，這是全國人民的共同責任。」(註四十五)

註 釋

- 註 一 《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第318頁，轉載本書編寫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輔導，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149頁
- 註 二 王炳林、徐付群《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闖關奮進》一九八四至一九九零年，紅旗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108頁
- 註 三 鄧小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58頁
- 註 四 鄧小平〈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載同註三，第217頁
- 註 五 同註四，第 217 -218頁
- 註 六 余繩武、劉蜀永主編《20世紀的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一九九五年，第241頁
- 註 七 《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第353、355頁轉載同註六，第242頁
- 註 八 同註六，第242頁
- 註 九 《人民日報》社論：〈評美國共產黨的聲明〉，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轉載同註六，第242頁
- 註 十 《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第252-355頁，轉載同註六，第243頁
- 註十一 黃思奇〈中港經濟關係的回顧與發展〉。見《香港社會剖析》(2)，一九

- 八四年 香港廣角鏡出版社出版，第120頁載同註六，第243頁
- 註十二 《香港問題文件選輯》，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17頁，轉載同註六，第244頁
- 註十三 司馬義著《榮輝全歸鄧小平的香港前途談判》信報有限公司出版，一九八四年，第25頁
- 註十四 卡特倫：《中國與香港(1945-1967)》(G.W. Carton, China and Hong Kong, 1945-1967)，一九七一年 美國哈佛大學博士論文，第104頁
轉載同註六，第248頁
- 註十五 香港前途民意調查小組，「港人治港」民意調查報告《新香港學會一週年紀念特刊》，第60-77頁
- 註十六 同註十三，第17頁
- 註十七 鄧小平〈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載同註三，第12頁
- 註十八 同註十三，第95頁
- 註十九 同註十三，第19頁
- 註二十 同註十三，第26頁
- 註二十一 瑪格麗特·撒切爾《唐寧街歲月》第488頁，轉載同註六，第259頁
- 註二十二 同註十三，第55頁
- 註二十三 同註六，第254頁
- 註二十四 英《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 週刊，一九八四年一月七日，第20-21頁，轉載同註六，第266頁
- 註二十五 同註十三，第67頁
- 註二十六 同註六，第267頁
- 註二十七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
- 註二十八 魯平〈自由港地位可續保持〉載《基本法的誕生》，香港文匯出版社，一九九零年，第116頁
- 註二十九 同註二十七
- 註三十 同註二十八，第117頁
- 註三十一 陳明球、賈德偉編《香港基本法研究：中國主權下的“繁榮安定”？》文獻篇，第124頁，一九九一年倫敦出版，轉載同註六，第284頁
- 註三十二 張結鳳等《不變，五十年？——中英港角力基本法》，浪潮出版，一九九零，年第215頁

- 註三十三 請參閱《從英皇制誥及皇室訓令與基本法比較香港現行與未來的政治體制》，香港華人革新協會、新香港聯盟、穩定香港協會三會聯席會議印行，一九九五年七月
- 註三十四 同註十七，第14頁
- 註三十五 請參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
- 註三十六 姬鵬飛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及其有關文件的說明——一九九零年三月二十八日在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
- 註三十七 香港《廣角鏡》月刊，一九八七年二月第173期第12期，轉載同註六，第309頁
- 註三十八 《香港1993年》，一九九三年香港政府印務局出版，第1頁
- 註三十九 賴其之編《彭定康政改方案面面觀》，廣宇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46-47頁
- 註四十 陳明珠、賈德偉編著《香港基本法研究：中國主權下的『繁榮安定』？》分析編，第20頁；文獻篇，第246-255頁。轉載同註六，第314頁
- 註四十一 《文匯版》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一日
- 註四十二 草蕭〈總書記談香港回歸〉載《廣角鏡》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 註四十三 《大公報》一九九七年三月四日
- 註四十四 《東方日報》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 註四十五 《文匯版》一九九七年五月七日

第十二篇

總結與前瞻： 改革十九年的宏觀政策

(1978—1997)

第六十六章 基本國情——發展之制約因素

第六十七章 開放十九年的經濟體制改革與經濟發展述評

第六十八章 建國方略——官方與民間

第六十六章 基本國情——發展之制約因素

導言 分析國情之重要性

國情是指國家在相對穩定時的客觀狀況，亦是指那些會對一國發展起最重要作用的「發動因素和限制因素」（註一）。由於國情對國家長遠的發展有關鍵性的影響，故此，研究中國國情可使我們更理解中國發展所必須面對的客觀制約、政府制定某項政策，以及社會出現種種現象的背後原因，很多時候這些政策或現象是基於各種客觀限制而無可避免。而最重要的，理解一國的國情可協助預見政府政策及社會發展的總方向。

這一章會簡單描述中國在改革期間所面對的國際環境，繼而討論國內的十項重要制約因素，並分析這些因素出現或加深的種種原因，最後探討中國的國情對中國發展及路向之影響。

第一節 八十年代開始中國面對的國際環境

九十年代的中國政府工作報告中，（註二）判斷世界局勢的總趨向仍是錯綜複雜，新舊矛盾互相交錯，國際形勢仍然動盪不定，局部戰爭時起時伏，蘇聯帝國的瓦解及東歐共黨的崩潰使整個局勢變得更為複雜。即使如此，維護和平與發展經濟已成為世界發展之主流，從而給中國一個相對穩定的國外環境，使她能專心經濟建設。

一 走向緩和的國際形勢與錯綜複雜的挑戰

自從八五年戈爾巴喬夫當政以來，他便一直致力改善與美國自五十年代開展的冷戰關係，冷戰的結束對國際政治形勢帶來極大影響，美蘇主宰世界的局面已不復存在，多極化及集團化已成為世界政治的潮流。九十年代的蘇聯解體及經濟危機，直接促使中國解除了來自北方的軍事

威脅，並使其與越南在七十年代中期便出現對抗的局面得以緩和。縱使中國的領導人在六四事件後強調要預防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策略」(即西方各國支持中國境內的反對力量以期動搖共產黨政權)，以及六四事件使中國與西方關係出現了某程度的緊張，但總體而言，從八十年代開始，中國面對的仍是較穩定的國際環境，從而使中國能集中資源進行經濟建設。

雖然國與國間大的衝突可以避免，但中國仍必須面對國際經濟及政治領域上的種種挑戰：

- (1) 冷戰結束後，西方發達國家更重視國與國之間的經濟競爭，使世界市場上對市場及資源的爭奪日趨激烈，部分西方國家有意識的誇大中國經濟實力，提出「中國威脅論」，阻止中國重新進入「關貿總協定」和成為世界貿易組織之始創國；
- (2) 泰國、印尼、越南、印度等亞洲國家經濟迅速發展，其廉價勞動力對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帶來極大的威脅。在另一方面，大多數高科技含量的高附加值產品都集中於先進的發達國家中生產，而中國的出口主要只是低增值的中初級加工製成品，這狀況對中國極為不利，此外，九十年代以來，以貿易區域化為特徵的貿易保護主義迅速發展，這亦加深了中國拓展出口的困難；
- (3) 在吸引外資方面，國際資金供求關係亦趨緊張。東歐和俄羅斯的經濟恢復、亞洲經濟的起飛、以及中東地區的重建，都對世界資本市場提出巨額的資金需求。而在另一方面，發達國家的內部需求擴大，將使資金的對外供應減少，利率上揚，加重了中國使用外資的難度及成本；
- (4) 在利用國外資源方面，基於各國已將經濟發展作為基本國策，故增加了各國對世界稀缺產品的追求。中國經濟正邁向重工業化，而重工業是以礦產品及能源為主要原料的產業，可以預計，在重工業化的過程中，中國對礦產品和能源的需求將持續增加。現時世界銅、鋁、鐵礦石及石油等商品的供求差距不斷擴大，價格連續上升，這

勢必增加中國進口成本，導致輸入型通脹，嚴重制約中國經濟的發展；

- (5) 在政治方面，中國亦面臨西方大國的政治壓力，這些先進國家將中國的崛起看成是一種潛在挑戰，江澤民在九五年九月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中曾指出，美國等西方國家不願看到一個繁榮的社會主義中國，故長期利用台灣、西藏、人權等問題給中國製造麻煩，企圖牽制中國的發展，並將中國變成「完全西方附庸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註二）

二 加快經濟發展，強大綜合國力是各國之共同需要

在國際總局勢趨向和緩的情況下，軍事實力作用相對下降，經濟實力作用明顯上升，甚至可以說，世界局勢的緩和也來自經濟方面因素的考慮。冷戰期間的緊張國際局面，使各國（尤其美蘇之經濟發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在經濟面臨困難時，美蘇為現實經濟利益而調整戰略，把視線由國外轉回國內的經濟建設，並減少軍費、縮減海外軍事基地。

從冷戰基本結束的判斷出發，各國將展開一場新的、以增強綜合國力為主體的經濟較量。在這場競爭中，科技與經濟實力將扮演重大作用。誰能成為經濟強國，其在國際舞台上越能發揮更重要地位。這場新的經濟競爭也迫使中國要更專注發展經濟。

三 科技革命與相互依存之國際格局

由於新科技革命形成的先進科技對經濟發展十分重要，為直接吸收較先進的新興科技，以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縮少與先進國家的差距，中國進一步推行對外開放政策。一般而言，發展中國家現代化所需的設備及技術很多都是進口的，而進口所需之外匯資金需倚靠出口提供，出口能力限制著進口的規模。此外，中國亦希望擴大出口以發展生產。在此世界經濟格局下，中國於八十年代開始便更全面的捲入相互依存的世界經濟體系當中。

第二節 基本國情——制約中國長期發展的十項因素

從中國的國策來說，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已成為最重要的任務。七九年後的改革開放無疑是中國自一八四零年以來的歷史中最輝煌之時代，人民生活大幅改善，國力加強，世界聲譽提高。然而，中國領導人從未忽視經濟持續的發展會受到國內多方面因素的制約。對於國情的特點，鄧小平及陳雲皆有高度的概括，鄧小平說：

「要使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至少有兩個重要特點是必須看到的，一個是底子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長時期的破壞，使中國成了貧窮落後的國家……我國工農業從解放以來……增長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較高的。但是由於底子薄，現在中國仍然是世界上很貧窮的國家之一。」「第二條是人口多，耕地少……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生產還不夠發展的條件下，吃飯、教育和就業都成為嚴重的問題。」(註四) 鄧小平、陳雲亦指出農民的因素，陳雲指出：「我們國家……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革命勝利三十年了……但不少地方還有要飯的……如果老是不解決這個問題，支部書記會帶隊到城裡要飯……需要改善生活，我們是在這種情況下搞四個現代化的。」(註五)

重點地說，中國在十九年改革開放期間之國情有如下十個特點，在不同程度上制約著經濟、社會的發展。

一 人口多，社會經濟負擔重，就業壓力大，影響社會穩定

在現階段中國人口發展的主要特徵是：(1)人口基數大；(2)文化素質較低；(3)人口密度高；(4)勞動力多；(5)人口的增長類型、城鄉的分佈和產業的結構轉變快。(註六)

中國數量龐大、素質低下及持續增長的人口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由於人乃消費者，人口增加過多，使新增的國民收入過多地花

耗在新增人口的消費方面，影響了投資所需的累積資金，使技術裝備程度不能迅速提高。再者，人口的沉重壓力激化了其與耕地、糧食、環境、能源、教育、就業、資金、福利和自然生態的矛盾。例如製造一個新的工作職位，需要一定固定資產的投資，龐大的勞動人口對國家的財政負擔構成重大壓力，這些矛盾的尖銳化，形成了一個以人口為中心的社會經濟及自然的綜合危機。

持續增長的龐大人口也為就業帶來極大的壓力，在城市的企業中，八八年已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員是多餘勞動力。^(註七)自九十年代以來，勞動適齡人口每年增加一千萬，對就業市場帶來極大壓力，從一九八三年到九四年的十一年中，中國城鎮失業率一向維持在百分之三以內。一九九五年，中國城鎮失業率突破了百分之三，九六年進一步上升。高失業率產生大量社會問題，造成更多的貧困與犯罪，給家庭、社會帶來了經濟、心理和政治的衝擊，影響社會穩定。這裡值得留意的另一個情況是雖然中國統計上的失業率只有百分之三，但由於在九十年代開始企業普遍效益下降，企業內下崗（即不用上班）的員工日增，這類職工只能拿百分之四十至六十的工資，有的甚至數月領不到工資，若將這部分職工與很多沒有登記的失業人員計算在內，城鎮失業率已達百分之八。此外，據部分老工業基地的省份調查，國有企業拖欠工資情況嚴重，例如到九六年六月末，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停發、減發工資的職工佔職工總數的百分之十五，這部分職工在面對通脹時，無疑受雙重打擊，成為新的城市貧困階層。^(註八)

在一九六三年及文革後期，為解決城市人口失業問題，中國政府大力推行上山下鄉政策，將城市人口下放農村，然而，在改革開放的階段，這種政策已極難推行。城市人口不肯到鄉村固然是重要主因，而另一方面，農村本身的隱蔽性失業亦到了難以容忍的地步，一九八五年的農業剩餘勞動力已達一億四千萬，到二零零零年，農業的失業人口將高達三億人。^(註九)若中國推行取代人力的現代化農業生產，而非農產業又無法吸納過剩的勞動力時，將造成一個龐大的流民階層，並使「盲流」湧入城市，造成「城市過度膨脹」及「城市貧民窟」現象，嚴

重影響社會穩定。

八九年二月「盲流」湧向廣東是個明顯例子，二百萬農民在春節過後從全國各地抵達廣州，造成火車的嚴重擠塞。由於廣東省也是人多耕地少，省內已有數百萬失業人口，故此只好以疏導或強行遣返來解決。

更嚴重的是中國在二十一世紀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將進入人口三大高峰，即「勞動年齡人口在二零二零年達到十億，總人口在二零二零至二零三零達到十五至十六億，二零四零年老年人口達到三億以上。」(註十)

二 人均資源少，耕地不足，供水能力弱

中國雖然地大物博，但由於人口高達十二億，人均佔有國土、耕地、林地、煤、鐵礦等資源的水平都遠遠低於世界的個人平均水平。(註十一)

中國的耕地一向都存在著面積少、分佈不平衡及質量差等問題，耕地面積更年年減少，一是生產及建設佔地；二是水土流失及風沙鹽碱等自然因素之侵蝕。根據城鎮、村莊、交通、工礦和水利等五方面預測，到二零零零年共需佔用八千六百一十萬畝耕地，再加上其他方面佔地，在二零零零年中國將失去一億畝的土地。(註十二)基建的佔地多是交通便利的好地，故此，經濟越發達之地區，耕地流失問題就越嚴重，(註十三)耕地短缺造成中國傳統農業的「二低一高」情況，即是農村勞動生產率、農副產品商品率低，以及土地生產率極高的情況(註十四)

耕地減少及人口膨脹必會造成對糧食需求之增加，這又反過來加強了對耕地的利用，結果又必是耕地肥力下降，土壤質素更為惡化。這些惡性循環將導致中國人民生活得更困苦。

此外，淡水资源短缺對農業、工業和人民生活有很大的影響。目前，中國用水問題的主要困難在於：一、農業用水不足，缺水城市逐年增多；二、水環境日趨惡化、不同水源受污染；三、用水浪費，節水工作做得不足；四、水管理體制不健全，水投資比例失調。(註十五)除上述原因外，水價過低的價格結構，也導致企業與人民在生活中難以建立起節約用水的習慣。

三 環境污染、自然生態的惡化與自然災禍頻繁

中國的環境污染已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中國並被列為世界上污染排放較高地區之一，除上述指出的農地減少及水資源短缺外，中國的環境污染表現為如下：

- (1) 污染物排放過高，這包括了廢氣、廢水及工業體廢物。大量的廢物排放造成酸雨，對人畜及農作物產生很壞的影響。
- (2) 森林採伐過度，草原退化，水土流失量不斷增加，導致野生動物日趨減少，自然災禍更趨頻繁。
- (3) 土地沙化與鹽面積擴大，導致土壤退化，使可以種植的耕地面積進一步減少。
- (4) 鄉鎮企業的嚴重污染使環境問題向農村大幅發展

嚴重的污染不單危害著國民的發病率及生命安全，更增加了生產成本，如工業的三廢(水、氣、渣)造成廠房、設備的受腐蝕，企業運作受阻及產品質量下降，制約著工業生產。而更重要的是污染損害了中國的生態平衡，使自然災害發生的頻率加快。

造成環境問題原因在於環境乃一公共物品 (Public Goods)，生態資源沒有被視作為稀缺物品定價而被合理運用；而欠缺環保概念是很多國家在工業化時期所經常碰到之現象；此外，科學技術落後也導致資源過度消耗與浪費，由於中國很多企業仍用落後技術生產，造成原料、燃料消耗過高及綜合利用率低的情況，舉例來說，在化工行業中，只有三分之二的原料轉為產品，其餘都以三廢的形式排入環境；再者鄉鎮企業由於資金投入少、技術及管理水平低，也使環境問題進一步惡化。

四 二元經濟結構——城市與農村

二元經濟結構是美國經濟學家W.A. LEWIS提出的，意謂在發展中國家裡同時存在先進的工業部門以及傳統的農業部門。這個描述對中國亦適當，當七十年代中國開始大規模建設時，有八億農民的農村基本上

還是進行手工勞動、城鄉的差距形成強烈對比。中國現代化的難點，在於使落後的農村進行現代化建設，因為這需要對農業進行根本之技術改造，並使幾億的農村勞動人口轉向非農業發展，所需的資金數量十分龐大，是難以在短期內完成的。

中國自四九年建國以來，為了盡快建立工業基礎，推行了主要從農業部門累積資金的策略。政府運用對農產品的低價收購、向農民高價出售工業品的「剪刀差價格」政策、以及推行農業實物稅等，從農村調走大部分資源以支持工業。由於政府人為地壓低農產品價格，故工業遂能享受低成本的生產(因工業資源多來自農業)，從而累積大量利潤，加速重工業化的步伐。

另一方面，農村的發展由於受到資源的限制而長期停滯不前，在農村基本還是以手工具操作，技術基礎薄弱，農民在小規模、分散經營的土地上幹活，加上文化程度低，生產率低下，半自給自足的消費結構沒有改變。

在五八至六零年，中央將城市的剩餘人口遣送農村以緩解大躍進失敗後的經濟危機，農村從而成為城市人口的蓄水池。但在另一方面，城市對農村的大門則緊緊關上。

與經濟二元結構並行的是二元社會結構，中國在戶籍、住宅、糧食供給、副食品和燃料供給、生產資料供給、教育、醫療、養老保險、勞動保護、婚姻制度等方面(註十六)，長期實行嚴格的城鄉區別政策，把城市和鄉村分為兩大板塊。二元社會結構的其中一個功能，就是將龐大的人口強制地留在農村，避免他們變為城市中大量的公開失業人群。

此外，二元社會結構在八十年代改革期間開始有所改變，包括默許農民大規模遷移，政府制定更靈活的法規使部分農民得以進入城市工作，以及支持「離土不離鄉」的鄉鎮企業發展等。在討論農村問題時，一個絕不能忽視的現實是農村相對於城市的穩定性，八億農民在經濟改革中是得益者，經濟上的改善使他們成為穩定中共政權的一個重要因素。

五 地區差距與區域經濟封鎖

地區發展不平衡是指比較發達的沿海地區，與寧夏、陝西、青海、貴州等不發達或貧困的區域同時並存。四九年前中國東西部之間的經濟差別十分大，四九年後，中央曾推行地區均衡發展的策略，把重點建設的項目放於內地，使東西的差距縮小。在八十年代初期改革開放後，國家為盡快發展經濟，以展示改革的力量，又把建設重點放在東部沿海各省經濟效益可以較快提高的地區，再加上中央特殊優惠政策，使東部有更加速之發展，這政策客觀上重新擴大了發達和貧困地區之差距。(註十七)下面圖表較了九十年代前不發達地區與東部沿海地的經濟政策。(註十八)

| 地 項 目 ／ 區 域 | 東部沿海地區 | 不發達地區 |
|----------------------------|--------------------|-------------------------|
| 投資政策 | 投資重點，人均投資額高於全國平均水平 | 非投資重點，人均投資額低於全國水平。 |
| 價格政策 | 加工工業比重大，價格高，獲利多。 | 農業、能源、原材料工業比重大，價格低，獲利少。 |
| 外匯留成政策 | 外匯留成比例高，獲利多。 | 外匯留成比例低，獲利少。 |

從整體來看，沿海地區人口密度高，經濟基礎好，加工工業多但資源相對貧乏，而廣大內陸地區雖然經濟發展程度較慢，但資源則豐富。此外，中國價格體系並不合理，相對輕工產品而言，農礦產品比價偏低，在這種不等價交換體制下，落後地區所擁有的大量農副產品生產的盈利大大低於發達地區的加工部門，這價格差距對不發達地區造成極為不利的環境。一方面，不發達地區向發達地區輸出原材料的過程中，由於所賣的原材料價格偏低而將大量利益轉移至東部；另一方面，不發達地區向發達地區購買由不發達地區原料所做的製成品時，卻又要付出較高的價格，造成雙重利潤損失。各省曾估計這雙重利潤損失高達幾十億元，比國家給予這些貧困省份的補貼還要多。(註十九)

為回應不合理的交換情況、以及八十年代中央對各省的財政實行「分灶吃飯」政策——意謂各省要負責自己的收入與支出，很多地方尤其是不發達地區實行了區域封鎖壟斷，主要是設置關卡，以行政手段阻止本省的資源自由外流，以及不許外地加工產品自由流入本區，割斷了中國的統一市場，就在此背景下，為爭奪稀有資源，「羊毛大戰」、「茶葉大戰」、「蠶繭大戰」連綿不斷。此外，在封鎖經濟下，不發達的地區自成經濟體系，自行多建加工工廠，以充份利用本省資源，造成各地區產業結構趨於同化。這樣做的結果，固然可在某程度上保障落後地區之利益，但從長遠來說，封建式的市場割裂，以及各地區皆建立自足的地區經濟體系，促使重複建設以及地區優勢不能發揮，資源因調配失調而浪費，導致整體國民經濟效益低下，經濟結構畸形化，並不利於統一市場的形成。

六 教育及科研基礎薄弱

教育科研是現代經濟發展的最重要因素，決定著一個國家的經濟競爭能力。在中國，嚴重制約著經濟的，是人口素質過低及科技相對落後，不能適合經濟之需要。總括來說，中國的教育有下列問題：

(1) 教育水平落後制約社會經濟的發展

雖然建國以來中國的教育事業有一定之發展，但由於許多因素，中國的教育情況仍十分落後。據一九八二年的全國人口普查，中國總人口中具大學文化程度的只佔百分之零點六，文盲、半文盲佔百分之二十八點二六，而在農村中文盲和半文盲人數在二億以上，雖然經過政府的重大努力，中國於九五年的文盲、半文盲人口已減少為一點四五億人，佔全國人口的比例下降至十二點零一，然而，龐大的文盲、半文盲人口始終會嚴重制約著社會經濟的發展。

(2) 社會分配不公，學生厭學現象嚴重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上出現分配不公，在八十年代末期更出現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報酬倒掛現象，簡單勞動的報酬很多時竟比複雜的腦力勞

動為高，出現了「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搞原子彈不如賣茶葉蛋」等反常現象。新的「讀書無用論」導致厭學及退學等成為大學生的流行病。

此外，中小學生流失情況亦對中國人力質素帶來極大危機。據國家教委的統計，一九八九年全國「小學生……流失率為百分之三點二、留級率為百分之六點七。」由於留級率過高，以致小學生按時畢業率只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註二十) 廉學工作是造成小學生流失的主因之一，學生流失現象除了降低教育投資的效益外，更形成新時代的新文盲。

(3) 各類教育的協調發展不夠，基礎教育長期處於困境

教育結構不合理，基礎教育、職業教育薄弱，質量不高的問題突出，農村教育貧乏現象無法改善。此外，高等教育出現學科與社會實際需要差距大，人才培養的規格和質量不能適應企業之需要。此外，在大專教育中，亦出現了專業門類過度狹窄，重理輕文的情況，這不單使大學較少培養出創造性人才，更造成經濟、財經管理等社科及文科人才缺乏，制約經濟建設。(註二十一)

(4) 教師隊伍面對的問題

在改革開放年間，合格教師嚴重短缺，教師結構不合理、工作負荷過重。此外，教師待遇微薄、住房緊張、醫療保健條件差、健康狀況欠佳及地位低微等問題，嚴重影響教師的質素，並打擊了他們的教學士氣。

造成上述四大問題的主因，在於中國人力資本投資嚴重不足，教育經費甚為缺乏，據政協委員林崇彩於一九八八年指出，中國教育投資佔國民收入的比重只有百分之二點五六，(註二十二) 而全世界教育經費佔國民收入生產總值的平均比例為百分之三點三。(註二十三) 直至一九九五年，全國教育經費雖比上年大幅增長，但當年國家的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為百分之二點四六，比上年還稍低，離國家規定的到二零零零年這一比例應達百分之四的目標甚遠。(註二十四) 不少政府領導人實際上仍注重物質資本投資，人力資本投資相對被忽視，「經濟

要上，教育要讓」的思想仍有一定之市場。另外，中國人力資本投資結構亦不合理，方向有所偏差，造成效益低下及人力資原嚴重浪費的情況。

七 收入差距擴大，社會分配不公

隨著經濟開放改革，人民收入來源多元化，以及各地區、行業利潤收益差別擴大，出現了下列現象：

- (1) 城鄉居民收入相對差距以及絕對收入差距在擴大；
- (2) 在農村中，則出了下列三種情況：第一，從地域分佈看，東、中、西三大地區的差距進一步擴大；第二，從農民內部分化來看，城鎮和農村內部居民收入差距在擴大，非農產業之發展乃加劇農民內部分化之主因；第三，近年來不僅低收入農戶的比重有所增加，而且他們的收入水平更有所降低。(註二十五)
- (3) 根據國家統計局於八七年的調查資料顯示，城市分配出現如下四種情況：第一，居民家庭收入上升；第二，居民收入由單一工資形式向多元化發展；第三，在政府及企業單位內，平均主義仍是收入分配的主要傾向；第四，城鎮居民家庭收入差距正在拉開。(註二十六)此外，從有關統計資料分析，一九九四年最高收入戶與最低收入戶人均生活費收入比為四點一倍，而九零年這差距為三點二倍。(註二十七)
- (4) 違法、強烈性分配不公情況出現。這主要是指權力資本化現象，即某部份官員藉手中權力，受賄貪污，進行官倒——即利用職權從國家收取平價產品，再以高價轉手賣向市場而獲暴利，以及不法商人進行走私、生產和售賣假冒劣質商品而致富的情況。(註二十八)在市場機制不健全及競爭機會不均的情況下，只要給誰一張批文、一筆貸款、一個擺賣的攤位，或給某個企業一個改革試點權，就等於給誰致富。
- (5) 在改革開放後，先富起來的人包括：第一，個體經營者及私營企業主人；第二，租賃、承包企業的承租人；第三，出租汽車司機、涉

外服務單位人員、部分設計單位的工作人員、合資企業職工等。

《經濟參考雜誌》於八八年報導了其對高收入者調查的結果，發覺先富起來的人主要是最先脫離舊經濟體制束縛的個體戶勞動者，而仍在黨政、企業、教學機關的人，則由於國家財力限制，仍然無法大幅增加收入，出現了知識分子收入相對下降的不合理「反向傾斜」現象。（註二十九）造成凡是政府政策不到、監督無力的地方，那個階層就能獲得較大利益。

出現分配擴大是很多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起飛過程中經常面對的現象，然而，中國的分配差距擴大卻令人發生心理失衡和產生極度不滿之情緒，這主要原因有兩點，第一，是某些領導人藉著特權，在經濟改革過渡期所出現的「雙軌制」——即計劃（低價）與市場（一般較高價）並存情況下，以官倒手段獲取暴利，損害市民利益；第二，是前面所述讀書無用論的體腦倒掛情況。

八 改革期間經濟起飛與經濟體制轉變所面臨的發展危機

自從七九年來，中國經濟進入新的發展期，經濟體制改革亦開始，在這階段中，中國也產生發展中國家經濟起飛以及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改革所面臨的難題：

（1）經濟效益低，國際競爭力弱

經濟改革最根本目的在於提高資源調配的效率，也即是以最小的投入創造最大的產出，然而，中國主要工業的勞動生產率遠低於發達國家，單位產品的物耗和能耗較高，可以說，中國宏觀經濟形勢緊張、短缺、通脹、財政赤字與外匯短缺，都與這點有密切關係。簡單地說，效益低下主因是：第一，微觀上企業依附國家，根本無機制迫使企業節約並賺更多利潤；第二，中觀層次是國家經濟結構失調，這包括產業結構失衡，地區發展結構趨同；第三，宏觀的經濟周期波動，大起大落的經濟環境使企業受到通脹及衰退的輪番打擊，影響企業的生產計劃。（註三

十) (這點在下章有關經濟部分中會詳加討論。)

(2) 經濟及科技結構失調，薄弱環節多

中國在七九年後經濟起飛以及經濟體制因素影響下，出現了下列問題：

1. 農業基礎不穩，生產下降，影響農村支援城市的功能。七九年中國推行承包制後農業有較大的發展，然而在八四年開始，由於土地產權不明確，農產品價格偏低而農用生產資料價格上升、以及承包制後農村土地過份分散，加上農村過剩勞動力限制了先進技術的使用，使農民不願擴大對農地的投資，直接導致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農業生產徘徊局面。
2. 基礎工業(能源、原材料、採掘及交通運輸等)與加工工業失衡，導致大量貨品因運輸問題而積壓以及企業生產能力閑置。
3. 地區產業結構趨同化，不利各地區之分工發展。
4. 工業技術結構一般薄弱，鄉鎮企業由於投資規模小，設備十分陳舊，特別是廣大農民，生產主要以手工勞動和簡單工具為主，效率很低。

(3) 總量失衡，經濟波動

由於改革期間經常爭取高速發展、再加上經濟體制中企業對投資失敗無需負責等體制原因，往往造成社會總需求過旺，貨幣發行過多，而資源短缺、資金不足又制約著供給方面的增長，總需求大於總供給局面之結果，是通貨膨脹，使企業安排生產以及人民生活皆受嚴重的影響。政府為改善此情況，往往被迫採用緊縮的調整政策，收緊銀行貸款，減少財政開支以穩定經濟，而結果卻又是經濟衰退、生產滑坡，在七九年經政開始後已進行了四次調整，分別是七九年的「調整、改革、整頓、提高」；一九八六年的「鞏固、消化、補充、改善」；八七年的財政貨幣雙緊政策以及八八年開始的「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深化企業改革」；以及九三年的「宏觀調控」。

(4) 財政赤字，債務負擔加重以及長期通脹隱憂

中國自七九年以來，除八五年財政出現盈餘外，其他各年皆有赤字，出現赤字原因主要是企業經濟效益差，此外，在擴大企業的主權後，國家資產收益受嚴重損害，政府在下放經濟權力後沒有建立相應的企業約束機制及宏觀約束，使企業把本應上交國家的利稅發放予員工，從而造成國家財政收入減少。在財政支出方面，國家除要負責一些大型基建外，對物價及虧損企業之補貼也使支出連年增加，造成入不敷支的現象。

中國在改革初期開始便大量借款，以引進技術發展經濟，七九至八八年政府內外債項共計一千零四十六億元，(註三十一)而從一九九零年開始，中國便進入還債高峰，在一九九一至九五年的八五計劃期間，中國每年必須償還內外債七百多億元，估計每年的還債額將佔每年新增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十，(註三十二)債務負擔嚴重制約經濟發展的能力，迫使政府要借新債以還舊債，加深債務危機，更使政府將那些需要財政支援的改革措施推後出台。

由於七八年洋躍進，以及八十年代中期開始中國經濟一直處於過熱狀態，財政赤字增加，貨幣發行量多，再加上資源緊缺，供給不足之情況，導致長期的通脹壓力，雖然中央在開放後曾對經濟進行四次調整，然而由於導致通脹出現的深層原因如企業缺乏約束機制而導致投資過大、消費基金膨脹、經濟結構失衡、企業效率差及體制問題等根本因素仍然存在，通脹不單在八十年代，更在九十年代成為經濟發展的一大隱憂。

上述提出在發展期間各項經濟困難互有聯繫，如經濟結構失衡、長期波動是造成效益差的主因，而這又反過來影響著中央財政收入及促使政府更多借債，這樣的赤字財政又是中國出現通脹的重要原因。在下面的經濟改革一章中，將會從中國經濟體制度角看這十九年的經濟改革與發展。

九 政治的困擾——腐敗現象

由於革命時期統一意志的需要，在建國後亦需面對複雜的環境，再

加上建設的要求以及計劃經濟體制客觀上需要權力集中之種種因素，中共遂於中國這個長期受封建主義幽靈影響的國家中，建立起一個強大集中的政權。由於建國後長期缺乏民主，民間監察力量薄弱，在權力使人腐化的規律下，腐敗遂成為困擾中國而導致社會運動頻生的一個重要原因。

腐敗在政治上主要表現為黨員幹部任人唯親，編織關係網，很多官員藉著手中之權力在經改過渡期間的空隙貪污受賄，進行官倒，大發橫財。有些握有權力之官員亦藉工作之便大吃大喝，營造私房，奢侈浪費，侵佔國有資產，並導致中國的企業及機關等集團消費劇增，加速經濟失衡。

腐敗現象導致政府於民眾心目中形象嚴重受損。面對腐敗的官僚時，民心容易瓦解，有些市民再也不願響應政府的號召，共渡難關，從而使改革中一個重要因素——「市民心理負擔能力」大受影響。這因素甚為重要，因為在改革期間無論是物價改革，裁員、企業破產及削減住屋福利等措施，都有可能對社會帶來陣痛，導致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受損，而這是需要市民支持理解才可過關的。此外，政治的腐敗亦會使群眾產生極大的不滿，這亦是中國在改革開放期間頻頻出現示威、到北京上訪等群眾運動的主因。

十 開放衝擊下的城市與農村意識形態

毛澤東時代結束後，改革建設成為國家的中心思想，民間思想空前活潑，外國的知識及經驗亦得以大規模引進，這對中國國民思想現代化帶來積極影響，很多知識分子及城市居民開始有較獨立及批判性的思考，成為促進現代化的一股重要力量。

而在另一方面，中國亦面臨許多意識形態的困難及社會問題，這包括：

- (1) 在改革期間市民生活整體上得到逐步改善，但在八四年開始改革步伐受挫，出現官僚腐敗、官倒盛行、社會分配不公以及連年通脹的

情況，使群眾改革熱情消褪，出現了「端起筷子吃肉，放下碗筷罵娘」的不正常情況，正是居民對物價上漲的不滿，促使他們在一九八八年以搶購否決了中央改革物價的決議（註三十三）。可以說，在毛澤東時代的極左思想解體後，中國未能建立一種新的社會風尚及價值觀以維繫人民，在人心瓦解下市民出現了心灰意冷之癱瘓狀態。

- (2) 在資本主義思潮衝擊下，在八零年中開始，帶著補償物質享受心理的人不顧國力盲目追求先進國家的消費模式，導致利用公費大吃大喝的集團消費現象普遍出現，直接引起社會消費基金急劇膨脹，加劇經濟失衡。
- (3) 為盡快成為「先富起來的一群」，很多地方都出現了一切向錢看的短期行為，很多人並利用改革過渡期間新宏觀控制法規仍未健全之情況發財，以致在市場化開展初期出現了大量不正當的經濟行為，如售賣冒牌劣貨，企業不顧社會環境衛生，隨意排放廢氣廢物；個體戶擺賣假劣貨、不衛生食物及阻塞交通等。此外，賭博、娼妓、迷信等現象在城市重新出現，成為改革期間之嚴重社會不規範行為。

雖然改革的風氣從農村開始，而農民的思想亦在改革期間出現變化，然而，由於農村與城市始終較為分隔，資訊科技亦較落後，因循保守、封閉、怕冒尖的平均思想在農民中仍佔有一定之陣地。這結果是使農村仍繼續成為中國的穩定器。

第三節 制約發展的多重困境、惡性循環及啟示

一 多重困境與惡性循環

可以預見，中國在可見的未來會繼續面對上述提出的種種困難。造成眾多危機之原因十分複雜，其中包括歷史、人民素質、政府政策失誤、改革過渡期的短期行為傾向及眾多在經濟起飛時無可避免之因素等，這些客觀制約大大增加了政府施政的困難。況且，上述危機並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互相影響，相互循環，有很多根本是超乎人力及政府

所能控制的。

舉例來說，中國人口眾多，要提供就業機會及養活新增人口，對資源及環境構成壓力，造成生態不平衡，並限制了農業及其他原材料長期之發展潛力，影響社會長期總供給，加劇供需失衡，導致通脹危機加重。宏觀經濟之波動又影響企業之效益，減少中央財政收入，影響教育投資，亦導致內外債加重，政府為償還債務又得加快建設，這樣又進一步導致資源緊張。

此外，經濟開放改革是中國下一步發展的必然潮流，在此過程中無可避免會引入西方種種不適合中國國情之思想，在中國於現階段仍未能建立一套適合改革的意識形態情況下，社會出現思想混亂無可避免。在另一方面，由於改革的進程不能一步到位，而在逐步改革過程中由於缺乏經驗及宏觀法規之不完備，使不少官員能在市場化過程中藉權謀私，導致市民失望，民心瓦解，阻礙著改革之進程。而改革的阻滯又會使經濟效益無法改善，企業利潤減少導致政府財政收入受影響，這又會反過來制約著中國的發展。再者，多重困境的解決要求中央政府有足夠的權威及力量，然而在執政黨於缺乏充份監督情況下，官僚主義的特權又成為派生的必然現象，對經濟發展及市民心理狀態亦會產生不良的影響。

二 在國情制約因素下對國家發展的四點啟示

研究國情，最重要的功能是可以使我們更深刻理解改革開放十九年來眾多政府決策、政治及社會事件的深層原因，可以說，中國面對的困難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由於中國國情之制約而會出現之歷史必然現象。此外，由於這些制約發展的因素不是短時期可以改變，故通過對國情的分析，將有利於估計將來國家的發展方向。總的來說，通過對國情制約的研究可以給我們如下四點啟示：

- (1) 經濟建設、開放改革及造就穩定社會環境（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政府必然採取之治國方針

為改善市民生活，提高國家聲望及鞏固現政權之統治權威及合法

性，以經建為主的治國總方略必然會取代毛澤東時代的階級鬥爭路線。雖然在開放改革的十九年期間中央政府曾面對眾多的政治衝擊，但「一個中心」——即以經濟建設為主導的方針始終沒有絲毫動搖。無論是八一年文藝界整風、八三年消除精神污染、數次學運、兩位總書記下台、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乃至外交上的紛爭如釣魚台等問題，可以看出中國政府面對某些政治挑戰時在短時期內可能會作出劇烈的回應（如「六四」等），但總的建設方向仍無動搖，始終環繞理性的發展經濟角度考慮問題，最突出的典型例子莫如八九年六月九日（六四事件後五天）鄧小平對戒嚴部隊的講話中仍毫不含糊地強調經濟建設。可以設想，在邁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經濟發展始終會繼續成為中共的建國方針。

要建設經濟，為中國的生存和發展尋出路，更全面的改革與開放遂成為時代的趨勢。如果說七十年代末的改革是因為中國經濟陷於極為不利的境地，那麼「九五計劃」期間更全面開放的改革，將是中國克服國情制約、維持中華民族發展與生存的唯一選擇。若然還有所爭議的，主要是執行開放改革的步伐、改革措施推出的先後次序及技術性的具體問題，改革開放的總方針並不會動搖。

為了維持經濟發展及開放改革，學者胡鞍鋼指出「創造和保存一個穩定的政治環境和安定的政治局面是中國經濟起飛階段中最突出的問題」。註三十四針對此，中共提出了「四項堅持」——核心為「黨的領導」之方針，以防止國家出現動亂與分裂。可以說，維持中央政府的權威與效率，在中國這樣一個複雜的大國來說是極其必要的，然而，我們更應理解，逐步的民主化是維護政府權威、防止黨風敗壞及使黨內不同觀點競爭趨向和平理性化的一個重要策略。

（2）地方割據力量興起、社會整合力下降

中國的城鄉差距以及東西地區發展不平衡，再加上開放改革以來地方「財政包幹」等政策（詳見上述國情之分析），使地方政府往往為了本身區域之利益而在不同方面抗拒中央政策，「諸侯經濟」的形成對社會整合力造成破壞。雖然地方的行為有其背後的苦衷，但中央政令不能貫徹亦

對國家帶來一定之負面影響。

在改革期間，中央多次要求各地區降低投資率，以舒緩過大需求而造成的通脹及經濟緊張局面，無奈中央的願望卻由於缺乏充份之經濟調控手段而無法被貫徹執行。此外，由於部分地區實行經濟封鎖政策，對統一國內市場的形成構成很大的阻力，增加了改革之難度。可以預見，地區勢力仍會很強，在多方面制約著中央政令之貫徹，社會整合力之下降使中國形勢更趨複雜。在研究中國整體或某地區之發展時，我們不能只著眼於中央所制定政策，亦應分析各個地區之執行情況，方能得到正確的判斷。

(3) 人口多、資源少、自然災禍頻繁、農業落後及經濟效率差等問題將會加強經濟改革的難度。

經濟改革需要一個較為寬鬆的經濟環境(即市場物資相對豐富)，以防物價開放後過度上升。此外，政府又要掌握較大的財力以應付改革出台後的種種開支，例如在面對價格改革而造成物價上漲時，政府有能力提高人民之工資以助其應付生活，及對一些企業給予減稅以抵消這些企業由於要付出較高價錢的生產要素及工資而造成的虧損等。

然而，由於上述提出的人口過多等不利因素，再加上企業效益差而影響政府之利稅收入，以及中央財政收入過多地下放地方等原因，使中共不能掌握充份之財力支持改革，從而嚴重制約著經濟體制的改革。

(4) 社會不穩因素增加，但農村仍舊會繼續成為國家的避震器。

經濟改革雖然改善了市民的生活，然而，由於經濟變革和社會的整體發展出現了不協調，再加上體制轉換過渡期之因素，中國社會各階層市民與政府的磨擦增加，成為經濟上升期的不穩定因素：

1. 官僚腐敗，官倒橫行，社會風氣日差，引起學生、知識分子及工人的強烈不滿，這是改革期間頻頻出現社會運動之主因；
2. 分配差距擴大，以及城鄉、東西部的貧富縣殊拉大，直接造成人民對政府政策之不滿。此外，大量湧向城市的盲流群，亦構成潛在的

不穩危機；

3. 改革期間通脹與緊縮間歇出現，嚴重影響市民生活及生計(失業威脅)，使市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降低；
4. 經濟改革的積極措施如優化勞動組合(即裁減多餘人員)及打破鐵飯碗等制度，由於沒有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及轉業機會的配合，勢必造成企業員工之不安，而被辭退者更會做出激烈之反抗行為；
5. 經改期間出現相對獨立的經濟階層(如個體戶、私營企業及專業人士等)之多元化局面，為爭取其團體及階層的權益，他們必然會與壟斷所有權力之政府產生某程度之矛盾，他們並會要求與新經濟角色相適應之政治地位，這解釋了除大學生外，知識分子及個體戶等民間力量支持八九民運之經濟原因。

由於改革期間引發很多新的矛盾，再加上政府相對放鬆控制的情況下，一如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驗，各項潛在及新產生的矛盾會迅速爆發出來，影響社會之穩定。

然而，中國基本仍是一個農業大國，上述種種不穩因素在城市中更為突出，而農村由於在二元結構及相對封閉的體系下，再加上農民之傳統保守意識及改革後之生活改善，遂使農村仍舊為社會之穩定器，在很大程度上抵消整體社會之不穩因素。正是這個原因，中共政權在多次市民間群眾衝擊下仍能屹立不倒，反映了農村的平衡力量。

總 結

在八十年代改革開始，縱使政府面臨資源之限制、地方權力坐大及種種不安與危機，然而由於其堅持經濟建設之政策及廣大農村的平衡力量，中共政權當能繼續存在與發展，而仍為無可替代之現代化主導力量。

註 釋

註 一 中國社會學報社編《國情與決策》北京出版社，一九九零年 第103頁

註 二 李鵬《政府工作報告》一九九零至一九九一

- 註一 任慧文《中南海權力交班內幕》太平洋世紀研究所，一九九七年，第390頁
- 註二 鄧小平〈堅持按比例原則調整國民經濟〉《鄧小平文選》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149-150頁
- 註三 陳雲〈堅持按比例原則調整國民經濟〉《陳雲文選》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226-227頁
- 註四 國家科委政策法規編《中國人口控制研究》載《2000年中國重大問題研究》地震出版社，一九九零年，第13頁
- 註五 馬洪《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道路和前景》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22頁
- 註六 江流、陸學藝等主編《社會藍皮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第37頁
- 註七 孫學琛、貢光禹〈居安思危、探尋對策〉載《發展與抉擇》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4頁
- 註八 同註一，第148-149頁
- 註九 有關此方面的詳細數字，可參考《公元2000年的中國》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4-5頁
- 註十 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小組《生存與發展》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 註十一 《我國的耕地問題和對策》同註五，第34頁
- 註十二 胡鞍鋼「中國：長期發展的多重危機」《中國走向二十一世紀》，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51頁
- 註十三 《緩解華北水資源緊缺的對策》同註五，第71-72頁
- 註十四 郭書田等《失衡的中國》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零年，第7頁
- 註十五 方承、何導煌《中國不發達地區經濟新論》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4頁
- 註十六 同註十七，第238頁
- 註十七 願宗根〈治理整頓與區域協調發展〉《人民日報》一九九零年六月十一日
- 註十八 薛煥玉《百年大計，教育為本》同註七，第308頁
- 註十九 楊東平〈中國的教育危機〉載《中國的危機與思考》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228-229頁

- 註二十一：《人民日報》一九八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 註二十二：一九八八年四月九日 新華社
- 註二十四 同註八，第97頁
- 註二十五 雷弢《反思公平》，中國婦女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53頁
- 註二十六 同上註，第55頁
- 註二十七 陳錦華主編《第八個五年計劃期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報告》，中國物價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378頁
- 註二十八 梁天明《當代社會熱門話題集》，廣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零年，第159-161頁
- 註二十九 陳子明《十年改革反思》，當代出版社，第192頁
- 註三十 有關效益下降原因之分析，請參考馬劍、宋建《走出迷宮》，學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70-86頁
- 註三十一 同註十四，第101頁
- 註三十二 劉國光等著《八十年代——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經濟管理出版社，一九九一，第262頁
- 註三十三 同註三十，第99頁
- 註三十四 同註十四，第161頁

第六十七章 開放十九年的經濟體制改革 與經濟發展述評

導 言

要更透徹了解開放十九年的中國，就一定要掌握這段時期經濟建設的主線，這分別是一、經濟體制的改革；二、發展經濟的策略。雖然經濟體制的改革與經濟發展的策略有甚為密切的關係，但它們畢竟是不同範籌的東西。經濟體制是指一個社會中調配有限資源的機制(例如資本主義主要是靠市場的力量以及企業家營利的動機以決定生產哪種商品，而社會主義則希望能在有計劃、按比例之協調運作的情況下，由經濟計劃官員作出生產那類商品之決策)。發展策略則是指在某既定經濟體制下，能作經濟決策的單位(包括政府或私營機構)所作的發展及投資決定。

從實踐的經驗，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很大程度受到該國經濟體制的影響，一個有效的經濟體制可以更充份的調動人、財、物等資源，在高效益(低投入，高產出)的前提下促進經濟的發展。因此，世界各國，尤其是社會主義國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都十分重視改革自己的經濟體制，使之能更有效的促進經濟發展。

開放十九年的中國，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下了很多工夫，雖然風浪重重，但仍積累了很多寶貴的經驗。從時期來劃分這十九年之經濟體制改革，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改革以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起點，重點的轉變在農村，城市主要是進行經濟調整(屬經濟發展範圍)，而城市經濟體制的改革只是以試點形式進行。第二階段開始於八四年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整體(包括城市)的經濟體制改革在這階段全面展開，但瞬即碰上兩次經濟波動(八四年至八五年，以及八八年)而被迫停止，以進行調整(一九八六年至八八年，以及八八年至九二年)。第三階段是從鄧小平在九二年南巡特區發表談話開始，中國經濟又一次全面飛躍，中央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後來又由於經濟出現混亂及局部

過熱，政府進行宏觀調控，並成功實現「軟著陸」，中國經濟遂走向持續的發展方向。

這章討論的內容包括：

- 一、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形成與問題；
- 二、七九年前行政性分權的改革與局限；
- 三、七九年後「放權讓利」改革、雙軌制的形成與其不足；
- 四、十九年改革開放期間，中國面對之經濟困難；
- 五、經濟困境原因分析；
- 六、十九年經濟改革及發展的十點經驗總結；
- 七、十九年經濟歷程之重點述評。

第一節 計劃經濟之形成、問題與改革

一 計劃經濟的優點

中共在建國初期，按蘇聯模式建立起指令性經濟計劃制度，在這制度下，中央的計劃機關通過中央的指令性計劃對整個社會的活動與發展策略進行規範。在當時推行中央指令性計劃實符合中國的需要：

- (1) 能速迅動用人力物力應用在需要優先發展領域中，以達國家規定的經濟目標，這點對於中國在四九年期間被封鎖，而必須盡快建立起工業及國防基礎的情況下，十分重要。
- (2) 通過有計劃的控制，決定社會上每人的分配比率，而達成社會主義分配平均目標。
- (3) 國家通過計劃，能以長遠的政策決定社會的長期發展需要，並保證各經濟部門及環節的正確比例關係，保持經濟協調的發展。

二 計劃經濟產生的弊端

然而，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計劃經濟制度的缺點便暴露出來：

(1) 生產與需要脫節

隨著經濟發展，人民需要的消費品日多，中央經濟部門根本不可能預計到人民千變萬化之需求，往往造成貨品不切合市場之需求，造成積壓，而市民真正需要的貨品又供應不足，供銷脫節問題異常嚴重。

(2) 企業(經濟中最重要的細胞)效率低下

在決策及動力機制上，傳統的公有化計劃經濟把企業生產權集中在政府手中，這實際使企業成為政府行政部門的附屬物，既無自主經營權，亦不需負虧損的責任，從而使企業缺乏主動性。由於企業的資金、物料、人事等全由上級決定，而企業通過銷售賺取之利潤又須全數上繳，故企業的責任只是依照國家計劃的指示生產某一數目的產品。這制度使企業不需面對市場，滿足消費者需要，更不需對資金、物資及盈利等負責，更沒有壓力使企業在生產的過程中，節約生產之消耗，改善產品質量，以提高生產效益。企業關注的只是在制訂計劃時爭更多預算資金、爭物資，這樣的結果往往造成中央物資分配不足，而企業的物資存貨卻不斷增加，造成很大浪費。

在動力機制上，國家實行統收統支之政策，企業吃大鍋飯，職工依靠三鐵(鐵飯碗、鐵交椅、鐵工資)，平均主義盛行，由於經濟責任不明朗，以致企業和職工都缺乏活力，去改善效率。

(3) 企業出現結構上自給自足及企業間互相封鎖之現象

在先進的社會生產中，各企業應分工發展，通過企業間之聯繫，以創造由專業分工所產生的最大效益。然而，中國在計劃經濟下是按行政系統來組織經濟，企業分別附屬於不同的行政部門(如冶金、電子等)或行政區域(中央、省、市等)。此外，在工業部門內又再細分為軍工、民用等系統，這些不同系統往往自成體系，互相封鎖，形成割裂的「諸侯經濟」。

由於這種體制切斷了橫向經濟的正常聯繫，使個別企業往往要經過甚為繁複的程序，如長時間申請方能獲得所需的生產資料，故逼使各地區、部門以至企業皆追求自成體系，務求不需外求，大搞「大而全」及「小

而全」、造成重複建設，浪費資源。各企業或地區更不求邁向專業化方向，以發揮本身之優勢，而造成極大之浪費。

(4) 容易制訂錯誤決策，導致經濟發展不平衡

指令性經濟只適用於較為簡單的經濟，以方便集中資源優先發展某項戰略性的工業以爭取較高的發展速度。要使指令式計劃運作完善，一定要有迅速的資料搜集與傳送技術加以配合，並要有一理性、高效率、現代化分析技術和專業人才集中的決策中樞，然而，以上的條件在當時中國並不能具備，故在決策時往往產生重大偏差。

1. 由於資料不齊全，而作出計劃的官員又望國家能盡快擺脫貧窮狀態，加上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之影響，往往使計劃過份注重高累積及重工業的高速發展，超過國力(指資金，人力及其他資源等)所能負擔，造成經濟供應的長期緊張及脫節，農業、輕工業及重工業的發展比例失衡，國民經濟不能按計劃比例發展，出現嚴重之浪費。
2. 在中央指令經濟下，物資是根據官員計劃的決定而調配，市場及價格被嚴重忽視。由於價格通常維持長期不變，在供不應求時，政府並無意識通過提價來刺激供給增加以及控制需求，而只採用票證來限制購買，從而使價格不能起調節資源分配之功能。此外，由於制定的價格長期不變及不合理，很多企業生產成本往往高於市場價格，以致某些企業由於銷售價格過低而長期虧蝕，這對增加企業的積極性，帶來不利的影響。而忽視價格功能更使資源無法被更佳的調配。

第二節 七九年前行政性分權的改革與局限

一 七九年改革開放前中國的兩次行政性分權

計劃經濟的弊端在五十年代中期已為中央領導人所察覺，陳雲提出

應允許部分小商品採取選購和自銷，讓許多小工廠單位生產，以及開放一部分自由市場的方針。^(註一)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也提出「把什麼東西統統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給工廠一點權力，一點機動餘地，一點利益，恐怕不妥。」^(註二)當時經濟體制改革之方向包括下列兩點：

首先是在中央與地方關係上，中央提出各個生產單位都要有一定之獨立性。劉少奇在中共第八次全國大會上，指出在「保證企業在國家的統一領導……下，在計劃管理、財務管理、幹部管理、職工調配、福利設施等方面，有適當的自治權利。」^(註三)其次，毛澤東也提出要關心群眾生活，使工人、農民在增產的情況下能增加收入。

由於中央領導層的意見，中國在五八及七零年分別進行了二次經濟改革。由於五七年反右運動及極左思潮之影響，「企業自治」和收入與增產掛鈎的「物質刺激」都被當作修正主義而遭批判，而改革的重點則放在各級行政機關之間的利益和權力上，在經濟上稱之為「行政性分權」：

(1) 大躍進期間第一次放權

第一次權力下放是在一九五八年，主要是擴大了省、市等的經濟管理權限，當時中央要求各主管經濟的中央部門，除了一些十分重要的企業仍由中央管理外，其餘企業原則上一律下放予地方。在五八年底，中央直屬企業下放了百分之八十七，中央統一分配的物資比五七年減少了百分之七十五。^(註四)在行政分權體制下，地方政府成為經濟活動主體，企業雖然隨著中央權力之下放而有一定之擴權，但仍受制於各級政府，從中央的附屬地位變為地方的附屬物。而這種行政性分權體制更促使地方政府成為五八年大躍進之主體。

雖然擴大地方機動性的方向是正確的，但五八年過急的下放權力措施，使中央不能保證統一計劃和整體經濟的綜合平衡，削弱了中央的調控能力，再加上地方的發展計劃可超越中央訂定的指標，可以突破既定之建設規模，在這下放權力的基礎下，地方官員為了追求更高產值從而得到更佳的政績，往往有很強大的投資擴張意慾。

十分不幸，在五八年地方擴權情況下，毛澤東又鼓吹大幹快上、超

英趕美的「大躍進」高速發展經濟政策，使全國各地投資規模嚴重膨脹，加深了財力、物力、人力之不足，並產生極大之浪費。隨著大躍進之失敗，以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為首的實務派為搞好面臨崩潰的國民經濟，使經濟能更均衡、穩定的發展，在六一年開始重新加強中央的集中統一管理，上收一批下放得不適當之企業，並採取了一系列政策，在信貸、財政和企業管轄權等方面重新集中，以壓抑地方投資。

（2）一九七零年第二次放權

第二次下放權力是於一九七零年，在第四個五年國民經濟計劃綱要〈草案〉中提出，當中又重新強調經濟改革，將部分重點企業下放地方。是次擴權與五八年一樣，雖然有利於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但是由於缺少正常的調控秩序，使宏觀管理失控的問題更加嚴重，而地方盲目建設、重複生產，基建規模進一步擴大，造成國民經濟嚴重失調。在七五年鄧小平整頓中國經濟時，中央上收了一定之權力，而在七六至七八年期間，中央又再上收部分財政、稅收及物資的管理權。

二 七九年前中國經濟體制特點與行政性分權的局限

中國傳統的指令經濟在短短二十年中，出現過四次變動，兩次放權，兩次集中，在這些轉變中，有幾點值得注意的現象：

（1）中國經濟體制特質為「談判經濟」

由於兩次權力下放的行政性分權改革，再加上中國經濟的特殊情況，如地區經濟實力之巨大差距、人民公社制度下的農村分散性等，使中國各級地方政府的權力遠比其他實行命令式經濟的國家為大，中央政府計劃及約束能力相對較為薄弱。在中央計劃外，有獨立自主、以本區域利益為主的地方計劃，在此情況下，中央計劃絕不等於地方計劃的總和。而在地方政府計劃之外，又有不受任何計劃約束的農村社隊或其他集體企業。故此，中國經濟體制在五十年代下旬開始便實際上成為一種

可以付價還價的「談判經濟」，這與東歐各國有甚大分別。

(2) 「市場化導向」改革被排斥

由於毛澤東批判物質刺激、工分、獎分掛帥與企業自治及自負盈虧的影響，使各級領導人雖然有意識改革中國僵化的經濟體制，但由於思想之束縛，以擴大企業權力的「市場化導向改革」很難被廣泛接受，而以權力下放地方為中心的「行政性分權」遂成為經濟體制改革之唯一選擇。

(3) 「一統就死，一放就亂」的循環困境

行政性改革主要是調整國家機關內部，即中央與地方的經濟管理權限。當權力集中中央時，發覺地方及企業缺少活力、積極性及效率，但當權力分散於地方時，又發現中央缺乏必要的調控力量，而地方及企業皆有極大的投資衝動，從而導致國民經濟的混亂無序，出現了「一統就死，一放就亂，一亂又統，一統又死」的循環現象。出現這個循環原因在於改革只局限於行政管理經濟的框框下，排斥市場機制，否定企業的相對獨立性，不符合客觀經濟的內在聯繫，不能從根本的機制改革(如市場化及企業自治)的方向上解決問題。

第三節 七九年後「放權讓利」改革，雙軌制的形成與其不足

一 七九年後「放權讓利」的改革與過往的區別

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重申經濟改革的必要性，而指導是次經改的主導思想，仍是五六年毛澤東發表的〈論十大關係〉中的放權原則。故此，七九年的改革強調：一、將更大的經濟決策權下放予地方與企業；二、給地方、企業及個人更大的利益以調動他們生產的積極性。基於這兩點重要原則，很多經濟學者都把七九年開展的改革總結為「放權讓利」的策略。

雖然七九年後的經改在放權讓利方面與上兩次改革相同，但由於經過思想解放，突破了文革以來的極左框框，它與以往之改革亦有一定之區別：

首先是七九年的改革重點強調國家與生產的基本經營單位——企業的關係，擴大企業自主權成為城市改革的中心，國家從不同方面為企業鬆綁，使企業能發揮更大之活力；

其次為七九年前之改革主要是於國家部委中推行，改革的重點在城市，而七九年改革的發源地主要是農村，城市企業的改革只是以試點的形式，實驗性地推行。

最後，由於七九年時已突破許多思想束縛，改革亦伸延至對外經濟領域，通過鼓勵外貿等對外開放政策，把經改引向更深層的發展。

總結而言，由於七九年後的改革已突破許多左的框框，故企業自治、擴大企業自主權、強調物質刺激及對外開放等政策已不再成為禁忌，而整個改革基本上亦朝向「市場機制的方向」發展。

二 七九年後改革的主要內容

七九年的改革大致分為下列幾個方面：

(1) 中央與地方關係

中央與地方分權包括三點：

1. 中央將各部門管理的企業權力下放到企業所在的各省市。
2. 為了擴大地方的財力以增強地方理財的責任心，中央改變地方政府以往財政統收統支方法，改為「分灶吃飯」及「劃分收支，分級包幹」，確定地方與中央的分成比例或補助(上繳)定額五年不變。地方在超額完成上繳中央的計劃而有額外收入時，地方政府可以自由使用。
3. 國家亦將基建方面的投資審批權向地方分散，逐漸使地方政府變為投資主體。

(2) 農村改革

國家將土地長期租予農民，推行包產到戶，即家庭承包責任制政策，從而使生產權力從人民公社下放至農村的家庭單位。此外，國家亦大幅提高其對農產品之收購價格和減少國家收購農產品數量，以放權與讓利兩方面激勵農村生產的發展。

(3) 多種經濟成份的發展

中央放寬政策，大力發展集體和個體行業，使這些企業有長足的發展，整個經濟形勢更為活潑，增強了社會主義經濟的活力。

(4) 國家與企業的關係

分權以前，企業盈利要上交，虧損由中央補貼。分權強調擴大企業自主權，表現在：

1. 企業有部分計劃權。企業在完成國家計劃之前前提下，可以根據市場需要自訂補充計劃，生產這部分產品所需的生產要素可於市場上購買。
2. 在供銷方面，企業有部分產品銷售權，在完成國家計劃後的額外產品，可以直接上市推銷，使部分產品進入市場領域，自由買賣。
3. 財務方面，企業有利潤留成權，國家把利潤的一定比例留予企業支配，用於企業的生產發展基金、新產品開發基金及獎勵基金等方面。

此外，企業還在投資、對外貿易(出口談判和外匯分成)以及人事和工資等方面，獲得更大的權力。

三 雙軌制之形成

七九年後經改的主要目標，實質是希望將過去帶有軍事共產主義因素的指令計劃經濟，朝著市場化方向發展，轉換到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經濟模式。然而，這個改變並不能一蹴而至，而要以漸進方式一

一即經濟體制內各主要環節有先有後地逐步改革，這是因為中國國情之制約，人口多、耕地資源少及地區差別大的相對貧困環境(詳見上章)，使中央不可能推行風險太大、一步到位之改革，政府必定要保留部分計劃權力以支配部分資源，使其能集中財力及將產品調配予某些需要發展及支援之產業及地方，若在短期內放棄計劃，肯定會使中國出現極大之震盪。

在上述客觀環境制約之下，中國出現了雙重體制，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即雙重的「計劃體制」、雙重的「物資流通體制」及雙重的「價格體制」(價格雙軌制)。原來依照指令計劃生產的企業，現在已把生產分為計劃內和計劃外兩部分，企業所需的物資，也分為中央調配和在市場自由採購等兩個來源，而企業在滿足國家計劃後生產的額外產品，也可以在市場自由銷售，並按比國家定價較高的、反映市場價格之價錢出售。

在雙重體制下，企業和國家的行為都是雙重化的，企業有一定的自主權，但另一方面還要受國家計劃的制約，而國家在減少對經濟指令控制的同時，又未能有效運用間接的宏觀控制工具，故不得不一時採用行政控制，而一時又搞市場調節，造成經濟混亂。

除了體制改革的局限外，當時各方面對發展經濟的要求過快過急，造成投資的壓力很大，再加上各階層皆希望在改革中獲得更多利益，故對增加工資及要求政府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的呼聲也很大，造成投資及消費的擴張，導致改革十九年來總需求失控。

四 放權讓利改革之不足，兼論雙軌制的困擾

改革僵化的經濟體制，以放權讓利為主導思想下放權力予地方及生產單位(包括企業及農村家庭)是直接及自然的選擇，而這次改革亦成功地把企業的積極性調動起來，產品大幅增加，經濟呈現前所未見的活潑局面，可以說是甚有成績的。然而，由於行政性分權是擺脫舊指令式體制的第一步，難免會出現種種缺點，主要問題包括四個方面：

(1) 行政分權永遠不能明確界定分權的合理標準

究竟中央應下放哪部分權力予地方或企業，根本沒客觀的準則，這是十分致命的弱點，因為任何分權都是討價還價的結果，而放權機構又可以在某些情況下收權，從而造成國家機關之間(中央與地方)或國家與企業間的爭權和互相侵權的局面。八十年代中共中央曾下發十餘個放權文件予企業，然而許多權利被中間的各個政府機構截留，權力根本不能下放到企業手中。總之、行政性分權是十分脆弱的，遇上突發情況很可能被取消。故此，很多經濟學者在總結以往「權力收放循環」的行政性分權之弊病後，皆提出「經濟分權」的主張，即在法律上明確界定企業為一獨立於國家的實體，確立任何政府機關皆不能侵犯企業的主權，使企業的活力得到切實的制度化保證。(註五)

(2) 讓利政策削弱中央財力，並不利調動企業的積極性

讓利是伴隨放權出現的，目的是以讓利來調動被放權單位(地方政府或企業)之積極性，然而物質刺激的缺點是會隨時間而減弱，而需不斷追加更多的利益來繼續調動被放權單位的積極性，這必導致國家要不停的讓利，削弱國家的財力基礎。此外，企業的精力亦會放於國家的討價還價上，而會相對忽略提高效率。因為只要能向國家爭取更多利益，員工的生活就能得到改善，這樣就對充份發揮企業的積極性帶來壞的影響。

(3) 「市場化」經濟體制改革遠非「放權讓利」便可達到，必須進行「制度創新」

以放權讓利來調動生產單位積極性的構想，在較簡單的商品經濟(如中國的農村)是甚有效的，因為農業只是整個經濟體系的其中一個環節，只要國家下放更多權力予農業單位，並提高對農產品之收購價格，農民由於物質刺激自然會生產更多產品，然而，在這個過程中國家需作出很大的補貼，既要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但又不能提高農產品售予城市居民的銷售價，結果必為中央財政增重負擔，而這亦是中國財政連年出現赤字的原因之一。

然而，假若整個經濟體制都要改革的話，情況就複雜得多了，因為高度的社會化使每個單位一定要互相協調，它不像農村經改可以只孤立某一環節，而以經濟體制的某一個部分如財政等支持而推行。舉例來說，如政府在提高農產品收購價的同時又不想承擔更多財政赤字的話，唯一的選擇是提高農產品銷售價，將加價之影響轉嫁予消費者，但這必導致價格極大之波動。從這簡單的例子可得知，試圖從根本上改革整個經濟體制的運作，使資源能被更佳的調配的改革是十分艱辛及繁複的，遠非放權讓利所能做到。

（4）雙軌制的困擾

放權讓利是以原來指令式計劃經濟為基礎。在放權後，經濟出現計劃與市場並存之雙軌制現象，雙軌制是循序漸進式經改所必然出現的局面，有利於使改革及時起步，緩和改革的劇烈震盪，能維持穩定生產，發展供給及積累經驗等。（註六）然而，在另一方面，雙重計劃、雙重流通體制及雙重價格亦帶來一定的經濟混亂，正如中共〈七五計劃〉指出「改革必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兩種體制同時並存……新體制的因素在經濟運行中日益增多，但還不能立即全部代替舊體制，舊體制的相當部分還不能不在一定的時間內繼續存在和運動。這就決定了改革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種種問題和矛盾複雜紛呈的局面。」（註七）

簡單地說，雙重體制的主要問題為：

1. 不利企業爭取高效益的運作

價格的雙軌制破壞了市場平等競爭。對生產企業而言，銷售的計劃指標越低，自銷比例愈高，則對企業越有利，因為企業的產品可按市場價格而出售。就需求而言，情況剛剛相反，若企業得到計劃供應貨品越多，由於計劃價格較低，企業的生產成本就愈低，利潤更多。故此，不少企業只求在投入上追求低價的國家供應，而在銷售方面則盡量把產品推向市場，千方百計擺脫國家計劃，爭取不把產品賣給國家，扭曲的經濟體制使企業不從增產節約入手，而從利用雙軌制的空隙來獲取更多

利潤。

此外，在雙軌制下被倒賣出來的物資往往會流到集體企業及鄉鎮企業手中，這些企業相對國營企業來說，設備差及成本高，但由於企業的負責人往往能以變通的靈活方法獲得緊缺的物資，從而使他們成為國營企業的強勁對手。短缺資源從先進的企業流向落後的企業，在資源調配角度來看無疑是一種浪費，進一步加劇市場的畸形發展。

2. 弱化國家調控經濟機能，導致經濟動盪增加

在雙軌制下，中央由於下放權力，對企業的直接控制減弱，而間接調控經濟的手段又未臻完善，在此情況下，中央對地方政府或企業的過份投資及消費無法控制，造成一次又一次的比例失調，政府不得不重新強化行政的控制。

此外，由於企業千方百計避免把產品賣予國家，這種計劃外擠計劃內的做法，使國家不能完成產品收購，從而削弱了國家控制經濟的實力。

3. 加深了供需矛盾，經濟的失衡導致穩定的市場調配資源方式難以建立，並加劇通脹

雙軌價格誘使企業盡量儲存由計劃調撥的短缺生產資料及產品，雖然沒有需要，但企業仍千方百計的爭指標，形成過高的庫存，加劇供需之矛盾。

此外，雙軌制亦從供給及財政赤字增加兩方面加劇了中國的通脹。據經濟運作，價格上漲會刺激供給增加而達至新平衡，但在雙軌制下，由於計劃部分的產品出廠及價格管理較嚴，結果，商品價格因通脹上升，但商品供給卻沒有因價格上漲而增加，流通領域的漲價並不能刺激生產。

再者，計劃內的生產者出售商品時須照較低的計劃價格出售，然而在購買生產需要的原材料時，卻往往按市場價格購進。雖然國家按計劃為企業分配了原材料，但往往是有價無貨，企業被迫在自由市場以高價進貨。例如，一九八八年北京內燃機總廠計劃供應鋁錠一千三百七十八

噸，但實際上只能訂到六百九十噸；國家分配予北京輕型汽車有限公司的計劃鋼材三萬噸，但實際上只能訂到百分之四十一點七二。（註八）在上述高價購入原材料及低價售貨之情況下，企業大幅虧損變為無可避免，這就增重了國家補貼企業虧損之負擔，造成更大的財政赤字，進一步惡化通脹。

4. 雙軌價格下的巨額差價成為官倒的溫床

享受計劃價格供應的企業由於計劃內外價格的差別造成巨大的利潤引誘，往往使他們不肯從事正常生產，而以倒賣營利，官員的權力與市場結合，形成甚不合理的經濟運作情況。在貧富極端擴大的情況下，加深了市民對政府官員作風的不滿，成為多次民間運動的成因。

第四節 在十九年改革開放政策下，中國面對的經濟危機

放權讓利及雙軌制的消極後果，以及七八年後中央數次出現要求經濟發展過速等錯誤策略，導致改革十九年碰到一系列經濟危機。

一 出現不顧全局、地區封鎖壟斷的諸候經濟

放權讓利對調動積極性甚有幫助，一般來說，權力放到哪一層，哪一層就有了積極性。然而，問題在於權力放得越低，塊切得越少，資源的調配效益就越低落，而使統一的國內市場陷於分裂。在財政「分灶吃飯」的體制下，部分地方政府為了維護自己區域的利益和收入，往往出現三種行為（註九）：

（1）對中央的逆向調節及反控制

這裡較為突出的是地方對中央的政策指示陽奉陰違，於自己部門或地方有利的則作為尚方寶劍，於地方不利的則「變通執行」，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局面。

中央政府希望各地區能根據本身各種資源的比較優勢來發展適合本地區的產業，然而，各地在制訂地方產業規劃時，為著保障自身利益，各地區皆希望發展高增值的加工行業，以致造成產業結構出現「大而全」（筆者按：即在本地區內甚麼行業都發展），地區間的產業趨同趨勢不斷加劇，重複建設情況嚴重。各地區龐大的投資不單導致需求擴大，引發通脹，亦由於不顧市場需求的過量供應，而使工廠設備閑置，經濟規模效益無從發揮，同行業間被迫競相壓價以促銷，造成嚴重浪費。

再者，各區域為爭奪各種資源，區域間開展了一場場羊毛、生豬、蠶繭、桂皮等爭奪戰，各外省均以高價爭相搶購某地區之資源，在這情況下，往往呈現區域間互相爭持的局面。

以上地區保護及封鎖的結果，形成了按行政區域劃分的分割市場，嚴重阻礙了全國統一市場的出現，造成資源不能有效的運用。

為扭轉上述情況，中央不斷向地方發出指令，要求地方壓縮生產已過剩的加工業，把資源用於發展交通和通訊等瓶頸產業，並促進農業發展。然而，由於製造業附加價值高，而基礎產業投資回收周期長，地方政府總不願意將地區的資源調往基礎產業，故此，調整經濟結構總是不成功，基礎產業成為瓶頸情況不能改善，農業發展缺乏後勁，土地流失連年加劇，影響經濟的健康發展。

另一個反控制情況通常在經濟緊縮期間出現，當中央希望壓低發展速度以抑止經濟過熱時，地方往往抵制，儘管地方向中央上報的統計數字速度下降，但實際上地方往往仍以高速發展以解決地區就業和提高本區的發展水平。

(2) 地方政府過份干預所在地區之企業

地方政府對所屬區域內的企業、銀行及農民作直接干預，故不少地方企業抱怨地方政府在人、財、物、費的攤派過多，對很多企業內的事情插手。在政企不分、企業產權含糊不清下，企業自主權無法真正落實，嚴重影響企業對生產及對財產責任承擔的積極性。

（3）地區保護、地區封鎖和地區分割

地區保護主要是阻止外地商品流入，免其與本地企業競爭，防止其佔領本地區市場，以保護本地區的產業。

地區封鎖的目的在於防止本地區的各種資源流出，從而使本地區自然資源能通過加工變成高增值的製成品；限制本地區的人才流往外地；以及盡量使本地區的資金留在本地區運用等。一般來說，地方政府會運用下列手段防止本地區資源的輸出：（註十）

1. 行政干預，地方政府制定特殊政策和行政規定，如推行准運證制度，輸出資源要經過當地政府批准，否則處以罰款和高稅等。
2. 設卡放哨。為防止自然資源外流，地方政府聯合各行政部門和公安幹警，廣設關卡，沿路盤查，圍追堵截。
3. 地方政府對重要生產資料進行專營，禁止其他單位收購。例如安徽省在八八年春節時曾規定：「蠶茧收購只准省絲綢公司經營，其他單位無權收購。」（註十一）
4. 運用價格競爭手段，地方政府大幅提高本地自然資源的價格，以防止外來的收購。

二 財政困難嚴重，國家調控經濟能力下降

與地區封鎖同時出現的是中央財政困難嚴重，導致國家調控經濟能力下降。

（1）財政困難的情況

改革開放十九年來，中國國民收入的分配格局湧現極大變化。七九年前，與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國民分配中國家所得分額一向十分大。然而，自改革以來，為更大發揮地方、企業及個人生產的積極性，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以及整個政府對企業皆進行放權讓利的改革。總的來說，這政策基本上是合理的，大大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性，使中國經濟取得驕傲的成就。但在這過程中，也出現了「國民收入分配過

份向個人傾斜，國家所得的比重過低」(註十二)的問題，這情況就如《第三隻眼睛看中國》一書所說：「中國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時強調的是簡政放權，給地方或企業以自主和積極性……希望枝榮而本固……小河有水大河才有水……但是，十幾年的執行結果卻是大頭與小頭的倒置。國家的相對貧窮與地方及個人的絕對富裕成為鮮明的對照。」

國家財政困難的情況表現在下列幾個方面：

1. 財政收入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大幅下降

據統計，「八五」時期(即一九九一年至九五年)前四年，政府財政收入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百分之十二點八，比「七五」時期(即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零年)的百分之十六點九下跌了百分之四點一，為歷史上比重最低的時期。從年度來分析，這比重更是持續下降，一九七八年，財政收入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百分之三十一點二五；一九八五年為百分之二十一點八九；一九九零年為百分之十八點七五，九三年為百分之十四點九七，九四年為百分之十一點八三。(註十三)

2. 中央財政收入在全國財政收支和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也在下降

由於實行「分灶吃飯」的財政包幹改革，財政收入在中央及地方政府之間的分配亦向地方政府傾斜，中央財政收入佔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據統計，「從七八年至九五年，中央財政收入佔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平均每年下降一個百分點；中央財政收入佔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由過往的百分之六十下降到百分之三十六點七，大大低於國際上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財政收入佔百分之六十的最低標準。」(大略)(註十四)

3. 與收入增長的速度比較，財政支出增長更速

改革十九年來，其中十七年皆有赤字，而且差不多每年的赤字都在增加。如九三年財政赤字為二百零五億，九四年則增加到六百三十八億元。

中國在改革十九年出現龐大赤字實有其歷史必然性。首先，這十幾

年間財政的一項重要任務是促進經濟高速發展，投資的擴張導致政府龐大的支出；此外，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推行需要國家承擔龐大的改革成本，財政為確保在改革期間社會穩定，並保障各集團的既得利益而不得不付出大量資金，這分別包括對城鎮居民的價格補貼、對企業虧損補貼、國家提高對農產品收購的價格以及更廣泛的推行社會保障等；第三，改革十九年來的通漲亦迫使財政的支出水漲船高。

值得注意的，是財政支出在增加的同時，正如上述提出的中央政府向地方及企業實行讓利政策，再加上由於中央政府直接組織的財政收入是以中央直接控制的大中型國有企業收入為基礎的，在現時國營企業連年大幅虧蝕及國有經濟在整個經濟結構中所佔比例不斷縮小的大環境下，中央財政收入自然無法大幅增長以應付龐大的支出。

(2) 國家能力下降的影響

財政赤字的增加，將會引發嚴重的經濟危機：

1. 影響對金融穩定的信心

雖然中共九三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方案已規定財政不能通過向銀行透支以彌補財政赤字。然而，假若政府的財政赤字不斷加大，而又不能成功發行債券以作彌補，則為解決危機，財政最終也可能要被迫向中央銀行透支借款，萬一此情況出現，則不單使中央的金融改革方案破產，並會使通貨膨脹壓力加大，導致金融動盪。

2. 影響改革進程

要進一步推行經濟體改革，財政需承擔龐大的開支，如政府要注資以降低國企的負債率、增加國企的技術改造資金以加強國企競爭力、加速社會保障支出以照顧退休或被辭退職工的生活，以及準備基金以支持銀行面對的企業貸款壞帳等。財政若再持續出現赤字，將嚴重影響上述改革措施的推行，使市場經濟體制無法建立。

3. 影響財政支持各項事業的發展

在西方主要市場經濟國家中，中央政府一級財政在政府的總體收入中，往往佔主導地位。據八八年對四十五個國家的統計，美國、聯邦德國、瑞士等六個國家比重為百分六十至七十；瑞典、奧地利等五個國家之比重為百分七十至八十；英、法、澳大利亞等十二個國家的比重為百分之八十至九十；而意大利、荷蘭及比利時等二十個國家更高於百分之九十。(註十五)

從中國的情況分析，到二零零零年中央政府財政收入應佔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約為百分之六十(註十六)，正如江澤民指出的：「進行現代化建設，國家必須有一定積累，才能集中力量辦大事。」(註十七)只有在中央掌握一定數量的資源，方能有足夠資金用於重點建設，方能有足夠的能力支持經濟發展較落後的區域，以舒緩經濟區域間不均衡的情況，此筆轉移支付費用約佔中央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相反，假若國家(中央)財力持續下降，國家將無力支持微利的基礎產業及基礎設施的建設，無法進行甚為重要的經濟結構調整，「瓶頸」狀態無從舒緩，經濟持續發展將遭受制約。

三 十九年來社會總需求全面膨脹，而緊縮政策亦帶來經濟波動的危機

(1) 改革開放實施以來的三次需求膨脹

從七八年改革實施起，中國經濟便承受了兩種災難——投資膨脹和消費膨脹，兩者並匯成總需求膨脹，帶動通脹惡化，造成經濟緊張的局面。

十九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生過三次經濟過熱和較嚴重的通脹。第一次在八四至八五年，國民生產總值分別比上一年增長百分之十四點七和百分之十二點八，其主因是銀行貸款和財政支出較鬆，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大幅增長，造成社會需求過大，最後導致八五至八六年全國零售物價指數分別上升百分之八點八和百分之六。

第二次為八七至八八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大幅上升，造成社會總需求膨脹，再加上八八年關物價關的影響，物價總水平大幅上升。八八年第四季度開始「治理整頓」的緊縮政策，財政、金融雙緊政策下，社會需求大幅減少，大批企業倒閉、產品庫存增加、工人失業及三角債嚴，經濟大幅波動，而八九一九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下降為百分之四點四和百分之四點一。

第三次是鄧小平南巡講話後掀起的加快發展熱潮，九二至九四年間固定資產投資再次高速增長，再加上價格改革的調價因素，亦帶動了九三至九五年間物價大幅上升，導到了「宏觀調控」政策的出台。（註十八）

（2）導致總需求膨脹的原因

上述幾次經濟波動的特點，是投資與消費規模過大，經濟增長速度過高，導致貨幣供應高速增長，從而導致物價大幅上升：

1. 投資

從改革初期開始，中國投資額在十九年間基本上高據不下，八一至八四年每年投資的增加幅度分別為百分之二十八（八二年）、百分之十六點三（八三年）、百分之二十八（八四年），而在八四年開始經濟過熱的現象更為嚴重，八五年增幅近百分之三十九，八六年百分之二十或以上，八八年亦由於投資增幅之影響，使貨幣發行比八七年猛增百分之五十三。

2. 消費

消費總需求過快地增長，遠遠超出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此外，消費需求結構亦出現超前增長之現象，即是在很多基本生活需要品仍未滿足之情況下，市民卻傾向購買高檔耐用、甚至是進口的高價消費品，如高級家庭電器等，導致這些高檔產品的生產大幅增長，從而在後期造成生產過剩、浪費資源的現象。

3. 投資與消費互相推動的增長

由於城市經濟的互相聯繫及制約，消費的擴大必然導致投資的追加增長(生產者增加投資、擴大生產以滿足消費者之需要)。此外，投資所增加的支出部分會創造新的就業機會，由於中國的就業伴隨著工資及各項社會福利如房屋等開支，造成推波助瀾的局面。

(3) 總需求膨脹及通貨膨脹帶來的惡果

投資與消費的增加帶來嚴重的後果。第一，社會總需求的膨脹導致它與社會總產品和重要生產資料的供應脫節，八三年的總差為百分之四點五七，八四年為十六點五六，八五至八七年稍為緩和，但八八年又上升到百分之十六點二，結果造成經濟緊張，價格全面大幅上漲。中國經濟供需不平衡的情況直至九十年代上旬才出現轉變。第二，由於投資與消費皆超過國民收入的增長，國家根本沒有足夠財力支持過速的經濟發展速度，結果只有依靠赤字的財政政策。九三年以前，中國的財政赤字基本是靠增發鈔票來彌補的，八三至八八年間，貨幣增長每年平均為百分之三十二點，大大超過同期的經濟增長率，這導致物價大幅上漲，貨幣貶值。通脹的後果是十分可怕的：

1. 使依靠固定收入之居民的生活質素下降，生活的困苦更使他們支持改革的熱情消褪；
2. 通脹破壞價格的正常機能，阻礙生產的增長。這是因為在通脹的環境下，價格變動很快，比價失真而使價格喪失調配資源之功能，企業不知那一樣產品生產效益最大，不知用什麼原材料效益最好，從而導致企業無法根據市場價格所提供的信息作出產出及投入的決定，這必導致生產緩慢，影響經濟增長。此外，很多企業更希望多囤積貨品，在價格進一步上升時才拋貨以獲更大之利潤，這又導致供需矛盾加大，經濟局面更為緊張。
3. 通脹最嚴重的是會使中國的改革停步，由於市民不願持貨幣而以搶購來保值，企業頓失改善效益的壓力，無論其產品質量是多麼

惡劣，企業還是能利用市民希望搶購貨品以求保值的心理，在不需競爭的情況下將產品賣出去。此外，由於經改目標是朝向市場化方向發展——即以價格作為調配各種稀缺資源之手段，而通脹的出現恰恰破壞價格調配資源之功能，價格訊號的失真使改革無法起步。

4. 通脹更會吞噬農村價格改革已有之成果，七九年提高農產品價格使農民生活得到改善，但是八零年代後期的嚴重通脹、使工業消費品及農業生產資料價格大幅上漲，遠超農產品價格增長的幅度，工農產品間的比價重新呈現不合理，農民在以往經改的利益化為烏有，打擊了農村的生產熱情，而這亦是農業生產連年徘徊下降的主因之一。

（4）治理通脹的緊縮政策導致經濟滑坡、經濟大起大落

由於面對嚴峻的通脹及經濟緊張局面，中央政府為保持經濟持續、穩定的發展，在改革十九年間四次被迫採取緊縮的財政金融政策，收回部分下放予企業及地方之權力，並在某程度上以行政手段對經濟進行調整，以挽救經濟的危機。

雖然緊縮政策是無可厚非，但收放循環亦無可避免地造成經濟的大起大落，引致經濟衰退、生產滑波，工人大規模失業、企業資金緊張及企業間拖欠的「三角債」情況，這又迫政府放棄緊縮政策，循環困境又會再出現。

在中國經濟循環過程中，有一個更棘手的現象，是基於市民對物價預期進一步上漲，以及經濟結構和資源限制之影響，價格在壓抑需求和刺激供給方面作用甚微，政府被迫採用行政手段以壓抑總需求，然而，在行政緊縮的政策尚未能有效的抑制需求時，供給卻由於緊縮政策而迅速衰落，而當刺激經濟、增加供給的政策發佈後，需求的反應比供給卻又快得多，供應尚未恢復過來時，總需求又會再度膨脹。（註十九）

四 產業的結構不平衡及質素低下

地方政府及企業在中央放權後已成為投資的主體，由於價格長期不合理，越是短缺的資源如農產品、原材料、能源及運輸等基礎工業品，相對價格越低，而耐用消費品工業，則價高利大，再加上基礎工業所需的投資較大而建設周期亦長，所以消費品等加工工業與基礎工業間存在一個甚不平衡的利潤率。在權力下放後，地方政府及企業為了賺取最大的利潤，在上述價格扭曲之情況下自然傾向投資於那些價高利大的「短、平、快」項目，而基礎工業及農業的投資則嚴重落後。在此不平衡發展情況下，農業、能源、原材料供應緊張，運輸落後，形成改革十九年制約經濟發展的重大薄弱環節。

八四年第四季度進一步下放權力予企業後，加上經濟決策的錯誤，經濟發展越來越熱，加工工業過快增長，使比例失衡的問題惡化。往後幾年，基礎設施、基礎工業與加工工業間之比例關係日益處於失衡狀態，造成極大之浪費，並制約著經濟之持續發展，現時中國面對的產業結構問題約有下列幾個方面：

(1) (業結構不協調

1. 農業仍是國民經濟中最薄弱的環節，不能適應國家的需要。

現時中國農業的問題在於增長速度減慢，滯後於經濟發展，某些農產品還供應緊張；此外，農業基礎薄弱，對農業的投資不足，耕地驟減；再者，因為農業的「比較利益」低，農民收入增長緩減，打擊農民務農的積極性。

令人憂慮的，是中國的農業在緩慢發展的同時，國家對農產品的需求卻十分大。在九四年，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的布朗，在其〈誰來養活中國〉的文章中指出，中國的資源潛力於二零三零年將趨枯竭，並將出現三點七八億噸的糧食缺口，糧食短缺將帶來政治動盪，中國經濟奇跡將可能夭折，雖然，布朗的預言可能基於很多不準確的假設，然而，中國農業所面臨的壓力亦實在很大：

- i 農業要滿足每年一千五百萬左右新增人口的口糧；
- ii 隨著消費水平提高，食物結構將從「以糧為主」向「糧肉並重」的方向轉化，這將對飼料糧的供給造成龐大壓力；
- iii 伴隨著轉移農業大量剩餘勞動力，以及進一步開拓國際市場，中國將繼續增加對糧食的需求。

現時中國國內糧價已逼近甚至超過世界市場價格，再加上財政困難等因素，依靠政府以提價來刺激農民種糧的做法愈加困難。

2. 基礎工業於國民經濟的瓶頸制約未解除

各種交通運輸方式仍未能滿足需要，鐵路旅客列車嚴重超員。公路國道幹線中一半以上路段車流量超過設計能力，港口壓船壓港亦嚴重，機場數量不足，候機樓不夠、通訊業的發展仍未能滿足需要。

此外，居民生活及商業用電需求仍遠不能得到滿足，而目前電力建設規模仍小，若將來不能加速投資電力工業，供需矛盾將更為嚴重。（註二十）

中國在八十年代開始，高附加值，技術水平要求相對較低的加工業大幅擴張，而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礎工業得不到大力發展，在此等瓶頸制約下相當部分加工行業因缺電、缺原材料及交通運輸供不應求的影響，以致有大量生產力沒法發揮，意味著極大浪費。此外，由於原材料行業缺少投資，供應緊張自然會從成本上推動加工工業品價格之上漲，惡化通脹，加劇經濟不穩。再者，經濟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倚賴各環節的配套協調，若中國基礎工業無長足發展，必然會影響經濟前進之後勁，使生產無法踏入新台階。

3. 第三產業發展不足

這主要表現在第三產業於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比重過低，難以滿足居民及國民經濟發展的需求，亦制約了農村大量剩餘勞動力的轉移。此外，第三產業內部結構不合理，新興行業發展不足，未能滿足居民消費和產業結構升級的需要。

(2) 產業整體素質低下，與先進國家差距大

產業素質低下主要表現在下列幾個方面：

1. 產品和服務結構檔次低，落後於市場需求的變動

與先進國家相比，中國有不少產品顯著地質量差，品種少，消耗大，成本高，競爭力弱，不符合市場需要。^(註二十一)例如輕紡產品的結構不符合市場的需要；機電產品難滿足市場需要；大型成套設備國產化進展緩慢；基礎機電產品受進口產品強烈競爭，中國生產的技術含量較高之產品的質量和可靠性差，標準化生產程度低。^(註二十二)

此外，中國每萬元國內生產總值消耗的能源過高，為日本的四點九五倍、法國的四點九倍、美國的一點七七倍。發電用煤單耗比日本高百分之二十六，比美國高百分之十二。這情況大大加重中國產品的成本。再者，中國的彩電集成電路成品率比日本低一半。轎車和貨車的價格比國外高一倍左右，塑料價格比進口高一倍，電子計算機價格亦高出一倍左右，高昂價格使中國產品競爭力甚為薄弱。^(註二十三)

2. 企業技術結構水平低，產業工藝裝備落後

中國的產業技術水平約比發達國家落後十五至二十年，尤以機電工業差距最大；^(註二十四)在產業的工藝裝備方面，重點企業關鍵設備接近或達國際水平的僅佔百分之十五，屬國內先進水平的佔百分之二十五，三分之二的設備屬國內一般水平或國內落後水平。^(註二十五)

3. 產業組織結構不合理

中國企業全能性的多，專業化組織程度低，規模經濟效益極差。許多行業的生產，必須達到一定的企業規模方能減輕成本，提高效益。汽車工業為典型的規模經濟產業，據國際經驗，一間汽車廠的生產規模不應低於五十萬輛，而具國際競爭力的規模在一百萬輛左右，然而，中國最大的汽車集團，生產能力都沒超過二十萬輛，根本極難在國際市場競爭。^(註二十六)

五 國企及社會生產過程各個環節的經濟效益低下

「經濟效益」是指各種經濟實體(國家、企業、個人)的投入與回報，要提高經濟效益，就是要以盡量少的活勞動消耗和物質消耗，生產出更多符合社需要的產品。

企業是經濟體制最重要的基礎，負責組織生產，直接創造財富。然而，國有企業卻基於產權虛置，缺乏自負盈虧的約束機制，經營管理不善，再加上沉重的利息、賦稅、攤派及各項社會職能的負擔，以及非國有企業的競爭，造成生產經營效益低下，大幅虧損。在國企的投資領域方面，由於國企負責人缺乏明確之責任約束，往往造成投資過量、引發通脹，而投資資金使用效益亦低，流動資金投資亦超出合理水平。基於國企多集中於基礎工業及資本品如機械設備等工業領域，國企效益低下不單使企業不能生產社會需要的產品，擴大市場供應，更會影響整個經濟升級、生產高檔案產品的能力，不利國民經濟持續發展，並使中國出口不能在國際市場競。(有關國企問題的詳細討論，請參閱「江澤民為核心的建立——挑戰與回應(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七)上」)

除了國企效益低下外，中國經濟發展效益不高還表現在下列幾個方面：

(1) 中國勞動生產率絕對水平低，其增長率低於產值增長率

據一九八八年的資料，中國工業勞動生產率不足美國的十分之一和日本的十一分之一。從七九至九二年，中國獨立核算工業全員勞動生產率平均每年增幅為百分之四點九，與同期工業總產值增長之百分之十三點二相比，差距很大，表明中國生產的增長主要是靠投入大量勞動力而推動的。(註二十七)

(2) 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遠高於技術進步的貢獻率

這表明中國經濟的增長主要靠大量資金的投入，而並非由技術進步所帶動，由於投入過多，往往造成投資需求膨脹，經濟總量失衡。

- (3) 單位產品物耗高，工資含量上升
- (4) 產品質量差，合格率低
- (5) 工業企業資金利潤率下降，虧損面積大
- (6) 基本建設規模大，但投資效益低(註二十八)

除了企業的問題外，中國的外貿出口由於多頭對外，各出口機構為爭取本單位利益，不惜自相壓價競銷，造成出口價格下降。在利用外資方面，各地區為吸引更多外資，均不惜爭相濫施優惠，大幅減稅，再加上貪污腐敗以及對「三資」企業於財務上的管理監督不嚴，使一些無實力的「三資」企業根本不用出資，或僅靠當地區的優惠政策便能打跨國內企，造成中國財富流失。

六 中長期制約經濟成長的因素

中國中長期的持續發展，受著國內國外種種制約因素的限制。

(1) 國內制約因素

1. 人口和就業負擔沉重。中國於九六年的人口已達十二億，到二零一零年可能已達十四億，僅每年新增人口就高達一千四百多萬，差不多相等於一個澳洲，今後幾十年，雖然中國經濟總量將有大發展，但人均水平仍是很低，與此相伴，中國每年新勞動力高達一千萬，就業將是一嚴重問題。
2. 自然資源制約，耕地不足，供水能力弱。環境污染、自然生態繼續惡化。而能源及交通仍將繼續成為經濟持續增長的瓶頸。
3. 國民經濟整體素較差，這主要表現在技術結構水平低及教育事業發展落後兩方面，教育與科技的落後，同經濟高效益增長的要求十分不協調，將嚴重制約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請參閱上章有關中國基本國情的分析。)

（2）國際制約因素

這主要包括兩個方面。首先是在競爭激烈的國際經濟競爭中，中國面對先進國家於科技及經濟上佔優勢的壓力，威脅著中國民族工業的生存及使中國產品較難佔領國際市場。其次，在國際政治關係中，中國面臨著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後西方強權政治的壓力。基於意識形態及實際經濟利益爭奪等原因，西方列強極不願意看到標榜獨立自主的中國日益強大，故中國始終是這些國家所針對之重點目標。

七 其他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嚴重經濟問題

- (1) 就業壓力與轉移農村剩餘勞動力過程中出現的「民工潮」問題
- (2) 地區發展差距擴大，部分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別懸殊，貧富不均帶來社心理失衡的困擾
- (3) 社會治安惡化與不穩定
- (4) 不良現象滋生，法制建設進展不理想

中國在經歷以泛政治道德為特徵的文革後迅速向西方開放，社會急速的變化帶來不少腐敗及消極的東西，在過份「向錢看」的心態下出現色情、吸毒、暴力、貪污、短視、教育落後、貪污、權錢交易及社風風氣不振的現象。

（上述問題請參閱「江澤民為核心的建立——挑戰與回應（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七）上」。）

第五節 經濟困境原因探源——缺乏制度創新與發展戰略錯誤

在十九年改革中，於放權讓利及雙軌制下，中國經濟面對市場割裂、通脹加深經濟循環以及產業嚴重失衡的危機，這些因素匯合在一起，促成種種經濟困難如經濟效益低、國際競爭力弱、財政赤字及內外

債務加重等。以上一連串經濟困境促使中國的領導層及經濟理論界尋根究源，分析產生經濟危機之深層原因，從而避免重蹈覆轍，帶來有利於長遠發展的改革大思路。

一 改解放權，沒有明確界定企業產權制度，造成利益約束軟化，並形成新的膨脹主體

傳統中央指令經濟體制中，若出現過量投資，只要收緊中央的財政預算龍頭，問題就能逐步解決。然而，放權讓利所造成的地方財政「分灶吃飯」及企業自主權擴大，使企業及地方擁有資金的渠道越來越多，再加上投資權的分散，以及工資控制權已下放予企業，使地方與企業變為新的膨脹主體。

匈牙利經濟家科爾內提出「企業軟預算約束」的概念以說明企業擴張衝動（詳二十九）、投資與消費饑渴及囤積傾向等現象。雖然國家將很多權力下放予企業，然而，國家仍是企業的所有者，再加上中國缺乏失業及退休等社會保障，企業的生存基本上還是完全倚靠國家。社會主義國家與企業實類似大家庭中的父子關係，國家一方面以行政或經濟手段對企業加以控制，在另一方面，又對企業加以保護，以減免稅收、提供國家補貼或貸款來挽救面臨破產的企業。在此情況下，企業的生存不需依靠商品競爭優勝劣敗的規律，其發展亦不必依靠賺取利潤的積累，而是通過國家無償撥款或貸款來解決：企業只生不死。在這情況下，企業對盈虧不必負責任，企業核算不過是形式，企業財務狀況並不能有效的約束企業行為。企業根本無內在動力可言，假若企業的投資成功，廠長及工人皆可獲得更高的獎金，而萬一失敗，也可倚仗國家「父愛」般的保護，而無須面對倒閉的危機，由於低效及虧損企業不被淘汰，故這類企業仍佔用大量資源，而且國家還不斷對其增加貸款，致使資源配置效益十分低下。

在軟預算下，企業總希望囤積更多原材料以保證生產，並有投資擴張等衝動。此外，由於企業產權界定不清，國有資產無人負責，企業經

理及員工利益是一致的，工資提高總能以提價方式轉嫁予用戶。中國企業經理並不會像市場經濟下般會重視企業的累積與盈利，抑壓工資過份的提高，著重生產效率及控制成本，而反而會為員工不斷爭取較高的工資（就算企業仍在虧蝕），從而導致企業資產大量流向個人，使企業工資成本上升。

與企業的情況類似，銀行貸款約束不嚴。企業貸款到期不還時，銀行與企業皆不需要負責，由於過多貸款對企業及銀行皆無大風險，從而造成了企業對貸款的龐大需求及大量壞帳的增加。投資與消費的總擴張，導致科爾內提出的社會主義短缺經濟現象，這並解釋了改革十九年總需求膨脹之體制原因。

在地方政府行為方面，「產值政績觀」是誘發地方政府經濟行為扭曲的原因。長期以來，中央過於突出將產值視為衡量地方政府工作成績的標準，產值越快，政績越大，再加上財政「分灶吃飯」的影響，強化了地方政府的本位主義，這也是造成經濟過熱、割據經濟以及產業不平衡之主因。

二 以市場調配資源的機制未能成立，而價格體制亦存在雙重扭曲現象

經濟體制改革的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個以市場機制為主、運用價格調配稀缺資源的經濟運行機制。然而在改革的過程中，由於通脹而造成的經濟緊張局面，使價格改革無法開展，價格未能理順，使有效的市場無從建立，價格雙重扭曲的情況嚴重。

首先是價格扭曲，即比價不合理現象還沒徹底改進，如前所述，能源、交通、通訊、原材料及糧食等產品價格仍偏低，鼓勵投資湧往價高利大的耐用消費品，加劇經濟失調。另一方面，價格雙軌制的一物多價現象，使各項經濟計劃無法開展，企業亦可因自由市場銷售比例大及計劃價產品供應多而賺大錢，根本無需改善生產方法，從而導致微觀運作效益無從提高。

三 傳統的經濟調節手段已經弱化，但新的調控手段尚未形成

傳統經濟體制中，政府可用行政手段迅速舒緩經濟矛盾，使經濟困擾能得到暫時的治理。然而在改革後，中央指令性計劃的範圍縮小，放權讓利使中央收入減少，要用借債和補貼來支撑改革及挽救瀕臨破產邊緣之企業。除財力減弱外，中央掌握的物資亦不斷減少，無法支持很多重要建設。

在新的宏觀調節體制中，銀行信貸功能越加重要，然而，要使信貸功能逐步取代財政控制經濟還有漫長之道路，舉例來說，直至九三年底，政府之財政赤字仍靠銀行透支及增發貨幣解決，使中央銀行無法發揮獨立的控制經濟功能。此外，銀行企業化使銀行一方面希望能貸出更多款項，但另一方面銀行的調控經濟的角色又促使其控制借貸數量，這方面的角色衝突並未能得到徹底的解決。

再者，貸款以及利息高低在企業財政軟約束的情況下無法發揮作用，因為無論貸款利息多高，企業在無需負破產責任下仍願意多借貸，從而導致銀行調控企業的手段失效。有見及此，政府仍不得不採取指令式的信貸手段，規定各企業的借款限額，這往往造成「一刀切」的現象，限制了很多應該借貸的資金，而最後又被迫放寬指標控制。

簡單來說，政府職能轉換緩慢，各種調控經濟的手段落後，而在宏觀管理經濟的過程中主要仍運用「一刀切」的行政手段來控制經濟，使低效益及高效益企業同時受抑制，然而低效益企業由於經常受地方政府的保護，故隨高通脹後而來的緊縮政策往往更多是限制高效益企業的發展。

四 經濟發展決策錯誤，經濟決策官員推行了脫離國情、超過國力的發展策略

八二年中共十二大提出先慢後快的發展方針，強調重點發展農業、能源、交通、教育及科技等薄弱環節（註三十），八五年中共七五計劃建

議，亦強調改善宏觀控制、抑制需求、改善供給、防止攀比追求高速增長，避免經濟生活緊張，為八七年的改革創造良好環境。(註三十一)然而，由於中央部分決策人士沒貫徹七五計劃所指出的兩年調整方針，以及部分國務院智囊團提出適度通脹論，再加上企業及地方在體制上已潛在擴張傾向等原因，使中央實行了擴張性的財政及貨幣政策，以致在八零年代中期開始通脹加劇，經濟比例失調，而兩位數字的通脹更使經濟生活緊張，嚴重阻礙價格改革的推行，使體制方面的缺陷長期無法解決。

第六節 十九年經濟改革及發展的十點經驗總結

一 提高效益是經濟改革的最終目的。而循序漸進，適應國力的發展策略，與有效調配資源之市場經濟體制，乃是中國經濟高效益的保證

經濟學家最關注是稀缺資源的最佳調配，以達最高的經濟效益。在中國這樣一個受資源嚴重約束的發展中國家，提高生產效益、避免資源浪費是發展之最重要關鍵。傳統指令式體制之缺點如生產與需要脫節、企業無動力及自給自足傾向等之最終結果也是資源浪費。基於此，任何體制改革的目標皆應以提高效益、充份運用稀缺資源為依歸。

改革十九年的幾次波動，一是政策失誤，各級政府領導皆希望在短期內加速發展經濟，導致急於求成，使建設規模超乎國力，引起信貸激增，嚴重通脹及經濟波動。二是機制缺陷，缺乏動力及約束機制誘使企業善用資源，簡單之放權讓利強化了企業之投資擴張衝動，價格之扭曲亦導致經濟結構畸形的發展，造成資源之嚴重浪費。

基於這兩點深刻教訓，為提高效益，並使經濟能穩定、協調及持續的發展，企業及各級政府領導一定要嚴守「量力而為搞建設」之經驗，理解經濟增長的問題不是速度，而是質量與效益，必須將過往靠消耗大量資源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改變為重視效益的「集約型增長方式」，轉變經濟

增長方式涉及新上項目與利用現有經濟基礎的關係。新項目須留意經濟規模和較高的技術起點。而立足於現存經濟基礎則必須以現存企業為依托，充份挖掘潛力，通過改革及改組等工作，提高生產力，並堅持資源開發與節約並重，提高資源利用率。從長遠發展來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最重要的是靠教育及科技，只有高質素的人才，配合先進技術，重視效益，紮實的發展經濟，才能避免造成供需失衡、物資緊張和通貨膨脹。

此外，傳統的指令性經濟計劃是助長低效益「粗效型增長」的體制原因，例如資金無償使用、不需負責的投資體制、用產值速度考核政績的辦法，都助長了粗放型擴張。故此，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推行經濟體制改革，爭取在較短時間內實現新舊經濟機制的轉換，如改革國企，徹底克服只負盈不負虧的投資飢渴症，加強企業內部約束及激勵機制等，以建立有利於提高經濟效益的市場經濟體制，使資源能在新經濟體制下能更充份的被有效運用。

二 建立市場經濟的重點——市場與企業兩方面改革並重、政府的角色，及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

(1) 市場與企業改革必須並重，不能偏廢

經改之方向是以市場來調配稀缺資源，這必須兼固三方面：

1. 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有約束機制之企業；
2. 競爭性的市場體系，包括商品、勞務、資金等要素市場；
3. 適合於上述兩方面的宏觀調控機制，從而保證在經濟出現動盪及危機時，政府能加以控制。

以上三方面都是市場制度的有機部分，尤其是獨立企業及競爭性市場兩項，它們必須互相配合，互相包容，缺少任何一方都會產生災難性之後果。由於中國經改方向是充份發揮市場調配資源的作用，價格改革就是為市場運作提供真實的信號，若價格扭曲，則企業越活，資源調配反而會更不合理而造成浪費(如消費耐用品價格人為地偏高，企業會越向此行業投資，使失衡局面更加嚴重)。企業所有制改革是為市場運作提供

負責任、有動力的主體，若企業不改革，缺乏約束動力機制，即使價格合理，企業也不一定會根據市場價格之信息而行動。

基於此，企業改革是經濟改革之核心，而價格改革是整個改革成敗的關鍵。企業產權之改造，需要作為外局條件的價格改革和競爭性市場的形成之配合，而價格的理順和開放又要求企業行為機制的相應改變。在此情況下，只突出企業改革或價格改革其中一項之改革都沒有成功的機會。

(2) 新體制運作機制建立後，政府仍需掌握強大之權力以調控經濟，以保證重點環節不被忽視

市場機制雖較指令式經濟更有效的調配資源，但市場運作本身仍有先天性弱點，這包括：

1. 市場自發力量經常帶來盲目性生產，經濟缺乏協調的發展，並出現經濟循環現象。
2. 市場需求只考慮有購買能力人士的需求，而這未必反映社會需要，例如富有的人可以窮奢極侈，而窮人仍得不到極需要之必需品等。故此，市場經濟下貧富矛盾較為對立。
3. 在市場運作中的企業通常都不會顧及界外效益，例如污染等問題，而需政府的干預。

在中國這個地大物博、存在二元結構及地區貧富差距較大的地方，完全依仗市場調節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政府一定要對某些影響整體效益深遠之行業如交通、電訊等作出調控。此外，對一些供需矛盾過份突出如糧食等物資，政府亦需實行直接的計劃控制，以保證生產及分配。再者，政府為引導整個經濟結構的發展路向，還需制定長遠的產業政策。以上促使政府仍需保留較大調控經濟的能力，故此，中共十三大提出的「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公式在上述這些環節就不再合用。

最後，在新舊體制轉換的關鍵時刻，中央政府的經濟調控能力反而需要集中強化，避免地方割據，使中央能掌握足夠財力物資，平衡經濟各個環節，尤其是集中資金發展農業、能源、原材料、交通郵電、教育和科技等，保證中國經濟發展之後勁，為改革創造良好環境。

(3) 進行社會保險保障制度改革，以穩定改革的推行

站於公義原則，並為使經濟結構調整和企業自負盈虧及破產的出現取得實質進展，建立一個社會保障制度就成為必要。否則，由於改革而失業的人，將會因為缺乏各項社會保障而流離失所，對社會安定構成很大的威脅。

三 國企改革的十大思路

國企改革是中國經濟改革的核心環節，極具重要性，而國企改革亦牽涉很多方面，國企改革的總思路可概括為下列十個方面：

(1) 國企改善需要一個長期過程，不能期望一蹴即至

國企嚴重虧蝕、低效益、高負債、管理差及自有流動資金短缺等困難不是一兩天而是長期形成的。此外，更應該明白到國企在改革十九年中承擔了各種有形及無形的改革成本，包括高稅負、負擔起職工及其家屬各方面的社會保障功能，以及在不平等競爭及不能享受各種優惠條件下，鼓勵非國有企業蓬勃發展等等，實為中國十九年的改革開放立下極大的功勞。

基於國企問題的複雜性及牽涉面廣闊，其改革實需要一個長期進程，正如中國付總理吳邦國指出的：

「總書記在四中全會上講到企業改革一年兩年不行，要三年五年，都是強調需要一個長期過程、不能想像，今天開會，明天就解決問題，這是不可能的，對我們來講，要有長期的思想準備，要鍥而不捨，充滿信心。」(註三十一)

(2) 國企改革的目標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改革方向應使國企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具有自我約束及理性發展能力的「獨立法人實體」。為此，應按照政企分家，即政府出資者所有權與企業「獨立法人實體」之財產權分開的原則，建立政府出資者所有

權制度、企業「獨立法人實體」之財產制度，明確互相的權力、責任和義務，並建立激勵和約束結合的機制。

（3）「政資分家」——落實政企分家的關鍵

政企分開是建立企業「獨立法人實體」的關鍵，否則，政府將繼續干預企業運作，或企業祇能按長官意志辦事，不承擔經濟責任。然而，改革十九年，此問題仍未能圓滿的解決，其中一個重要症結，是「政資不分」——即資本行政化，政府與資金不分。國企生產運作的資金，皆由企業的主管政府行政機構控制，企業根本缺乏資本來源，一切資金以及隨之而來的投資決策皆集中在行政部門手中，若「政企」真正分家，缺乏資金的企業根本無從發展。基於此，要「政企分家」，首先要「政資分家」^{（註三十三）}，政府應按照其「社會經濟管理」職能和「國有資產所有者」的職能分開的原則，探討國有資產管理的合理形式，落實「政資分家」，規範行政機關的行為，從而徹底推行「政企分開」的構想。

（4）抓大放小，搞好整個國有經濟

著力搞好整個國有經濟，對現存國有企業推行戰略性改組，中國在九五計劃期間，應繼續推行「搞好大企業，放活小企業」的方針，以市場和產業政策為導向，引導國有企業將其資產向高效益的領域轉移。

具體來說，國家集中力量支持一批國有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並以企業之資本為核心，通過聯合、兼併等方法帶動整個國有企業的改組，在這重新組合之過程中，國家務須集中財力、物力支援這些優勢骨幹企業。此外，國家須在電力、石油天然氣、冶金、交通、通訊、航空和大型成套設備製造業等關係國計民生的重點行業中，支持某些企業集團，以帶導整個經濟向前發展。

與此同時，政府應對一般中小型國有企業進一步放活，採取合併與收購、承包經營和出售等方式，將中小型國企出售或租賃給個人（包括企業職工）、非國有部門或外資企業。此外，政府應支持國有銀行為非國企提供必要的貸款以完成這類型收購和兼併中小型國企的工作。

(5) 創造條件，解決企業過度負擔，並減低負債

這首先要分流企業的富餘勞動力，並將企業過往對社會的承擔如教育、住房、醫療及退休保障等轉移往地方政府。事實上，某些地方政府已開始實施由政府、企業和個人共同出資建立的退休保障基金。此外，為大幅降低住房補貼，政府決定開展同時提高職工工資及房租，或將房屋產權賣予住戶的改革。

至於減低企業過度負債，政府當然期望企業能通過改善效益，增加收入，累積資金以作解決，然而，對一些歷史包袱重，在國民經濟中舉足輕重的企業，國家亦同意將過往對這些企業的貸款改為國家的投資，將債務轉為國家資本金。其實，為聚集財力以減輕負債及促進企業發展，各個方面都攬盡腦汁，江澤民曾形象的描述上海的「六個一塊」，即「主體多元吸一塊、存量盤活調一塊、債權轉股權換一塊、兼併破產活一塊、企業發展增一塊、政府扶持補一塊。」(註三十四)

(6) 強化國企內經營管理，並容許企業職員擁有企業資產分配權，以調動其積極性

企業應按市場需求組織生產，推行勞動合同制，在企業內形成競爭機制，以提高經濟效益。此外，亦應改革企業的分配原則，職工除獲得勞動工資外，職工更可購買部分國企股份，從而擁有部分國有資產的分配權，這樣不單可調動職工生產之積極性，更有利於實現國家資產的增值保值，並杜絕企業過往揮霍浪費及偷盜成風的現象。(註三十五)

(7) 推行各方面配套改革

首先要完善市場體系，創造一種較公平和有利企業改革的資金、土地、勞動力制度，保証企業可以公平的在要素市場中尋找各種需要的生產資料，以組織生產；其次，政府應對糧食、原油、煤、電力、有色金屬及交通費用等作出更合理的定價，以支持這些行業內的企業發展(註三十六)；第三，改革投資體制，強化投資決策的責任及約束機制，回應投資飢渴症問題；第四，加速社會保障改革，避免失業人口

造成社會動盪的根源。

（8）提倡公平的經營環境，提高國企的競爭能力

為增強企業的競爭，政府應逐步取消按企業所有權而劃分的不同利率和信貸政策，逐步結束提供給外資企業的種種優惠，並容許外資企業進入某類受保護的行業，這將迫使國企進行更徹底的改革，增強國企的競爭力。（註三十七）此外，雖然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對幼稚工業進行某程度的保護是理所當然，但力度要恰當，否則這些民族工業的技術及競爭能力永遠不會提高，效益無從改善，故此，中國應繼續溶入國際經濟體系，適當地降低關稅，這將對國內企業產生很大壓力，但亦會同時促使國企提高產品質素、技術水平及競爭能力，中長遠而言，對國企發展更有好處。

（9）非國有經濟將成為國企改革的依托

國企改革需耗費國家高達數千億元的改革成本，這對於財力不足的政府來說實屬力有不逮。要應付此筆龐大開支，中國極需倚靠非國有企業的大力發展。只有非國有企業的強大，方能為國家提供足夠稅賦，以應付改革成本，並容許國企能逐步減輕其稅項負擔；此外，非國有企業的發展亦可成為國企富餘勞動力的就業依托，為富餘的職工提供就業機會；再者，國企要進行資產重組，出售部分產權，亦需社會上有足夠財力購買這些轉移出來的資產的經濟組織，否則，國企根本就無可能被拍賣，而國企股權轉換亦無法推行。（註三十八）

（10）加強國有資產管理，建立權責明確的國有資產管理、監督和營運體系，杜絕國有資產的流失，並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

四 經改需要相對寬鬆的環境，慎重處理「改革」與「調整」的關係，這就需要堅持抑制通貨膨脹的戰略方針

(1) 經濟改革需要一個寬鬆的經濟環境

要發揮市場調配資源之功能，除卻要有價格、企改及政府功能轉換等因素外，還需要有一個寬鬆的經濟環境，具體表現為出現一個買方市場(供大於求)，因為只有買方市場的存在，才能促使企業間競爭，迫使企業精打細算、提高效率、改善經營，不再出現像賣方市場時商品像皇帝女兒不愁嫁的情況。

改革時的寬鬆環境還包括國家擁有較充裕之財力，價格改革普遍會將以往不合理的產品低價格情況改變，物價上升成為價改初期之產物。為保證企業及個人收入不會受價格上調之影響，除卻要求企業及個人承擔及消化部分提價外，國家還需有相對充實的財力對在價改中損失利益的個人與單位作出補貼，以消除不滿，緩和改革之陣痛。

故此，在改革前，國家應盡量抑制過份擴張之投資及消費，並以產業、財政、貨幣等政策保持總供需的基本平衡，阻止賣方市場及通脹之出現，創造寬鬆環境，大幅降低改革難度。

(2) 「九五」期間誘發通脹的因素

這裡就涉及一個抑制通貨膨脹及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的大問題。眾所周知，在任何國家，通脹都是經濟健康成長的大敵，中國在「九五計劃」期間正處於經濟體制轉軌和快速增長時期，誘發通脹的因素十分多，這分別包括：

1. 過往幾年通脹幅度大，積累起來的通脹壓力較嚴重，如九四年為百分之廿一點七，九五年為百分之十四點八，在高起點的通脹基礎上增大了保持物價穩定的難度。
2. 為理順價格，改變部分農產品、基礎產品及生產要素價格偏低的情況，必需進行價格調整，價格改革將通過成本推動，引起全國

物價總水平上升。

3. 投資需求膨脹的壓力仍存在，中國在九六年的建設項目已有很多，而各方面準備新建的項目又更多，在企業投資主體的風險約束機制未形成，新的政府宏觀調控機制又未完全建立時，在投資決策分散化和各級本位利益驅動下，投資飢渴症仍相當強烈，出現了投資總規模超過財力物力的可能，引致高通脹再出現的危機。
4. 國企改革及發展將要求有更多金融和財政資源支持。國企由於效益差，故消化油、電、煤、運輸等基礎產品價格上升之能力十分有限，而勞動力價格(即工資)又將由現在的低工資制轉向高工資制，國企工資成本亦將大幅上升。另一方面，為支持國企改革及加強其技術力量，國家亦需在九五計劃期間付出高達約五千億元的昂貴改革成本，以增強企業之活力。近數年來，銀行的壞帳增加，其中一個主因，就是銀行對國企難以收回的貨款上升，此情況在國企改革未完成前仍將繼續出現，以上財政及金融的大量支出皆會加強中國潛在的通脹壓力。
5. 中國大量進口的某些資源在國際市場上供不應求，價格上升，輸入的通脹亦加強了中國通脹壓力。

(3) 抑制通脹的根本措施——增加供給

要徹底的解除通脹對經濟的威脅，中國應從增加有效供給入手，這些措施應包括：

1. 大力發展農業；
2. 增加緊缺產品的有效供給，調整投資結構，強化對「瓶頸」性的基礎設施及產業的投資，緩解結構性供求矛盾；
3. 積極推行國企改革，提高國企效益，並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之進程，重視科技教育，務求企業能在有限資源的投入下，能生產最多符合社會需要的產品；
4. 加強市場法規體系建設，反對壟斷，打破地區封鎖和部門分割局

面，並打擊部分經營者藉市場競爭不充份下而非法漲價及收費等行為。

當然，創造相對寬鬆環境不是易事，中國的改革就是在資源嚴重制約下的不寬鬆狀態下進行，若然真的容易做就買方市場(供大於求)，可能根本不需改革。所以，不可能等候全面穩定的寬鬆環境後才進行改革，而是要把握時勢勒住過大需求，在通脹期嚴重、經濟失衡時採取緊縮的「調整」政策，對經濟過份扭曲形勢進行調整，從而為下一步改革提供較雄厚的基礎。

從以上分析可知，中國改革十九年來的四次調整期不一定是所謂保守派的極左陷阱，反而是冷卻經濟，創造相對寬鬆環境、買方市場之所需——客觀上、調整為改革打好基礎。

五 在經濟進行調整期間，改革未必需要停頓，而應推行一些對社會震動不大而有利於長期改革的措施。

調整期間，一些改革未必一定要停頓，有些改革搞好了，不僅不會妨礙調整，反而會對經濟結構的調整有利：

- (1) 深化農村改革。除堅持家庭承包責任制外，還應健全農業產前、產中、產後等流通體制。此外，亦應探索推行擴大規模經營(相對於一家一戶)和新的集體經濟，這些改革可加強農業發展的後勁，對整體經濟貢獻甚大。
- (2) 企業改革——包括完善承包制及開展股份經濟試點等。
- (3) 推行宏觀經濟調節體制改革。這方面範圍很廣，包括政府部門職能的轉變，某些部門如通訊、航天等可改組為公司，實行政企分開；改革稅制及稅務運作；強化中央銀行的職能，使其能獨立於國家行政機關而以較客觀的標準來發行貨幣等。
- (4) 利用通脹受控制時刻，及時地推行某些影響較微的價格調放改革，以理順市場，逐步解決雙軌制的困擾。

六 調整及優化產業結構

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產業升級，從而提高經濟增長的潛力，是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重大關鍵，為回應中國產業結構所出現的問題，中國現階段調整產業結構的主要任務是：

(1) 切實加強農業的發展

保證糧棉油等基本農產品能穩定增長，並因地制宜地發展多種經營。為此，必須落實中央各項在農村的政策，深化改革。在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之基礎上，鼓勵土地使用權轉讓，以達至土地能擴大規模經營之目的。保護耕地，加強水利建設，增加對農業的投入，並制定法規與政策，引導農村集體、個人及社會增加對農業的投入；

(2) 加強基礎設施及能源、交通、郵電及原材料等基礎工業

國家應集中力量，有計劃地建設一批重點工程；並建立政策性的長期投資融資體制，通過政策性金融等渠道，鼓勵社各方面的資金參與基礎工業建設。政策金融要發揮作用，重點是解決財政貼息問題。由於使用政策銀行資金的項目都是自身經濟效益較差的項目，極有可能不能承擔正常的貸款利率，為支持這類型基礎設施項目的發展，就需要政府對息差進行財政補貼。

(3) 發展對國民經濟有主導作用的支柱產業如機械、電子、石化、汽車及建築業等

支柱產業主要表現為有較高的產值、有較快的發展速度，以及在國民經濟的產業體系鏈中有強大的牽引力，能從產前和產後的聯繫中帶動一批產業的發展。

要發展支柱產業，首先應確定有限的目標，擇優集中重點扶持，積極利用國內外資金和技術，建立有利於促進支柱產業發展之投融資政策，並調動財力物力支持支柱產業中某些重要領域的技術開發，以加快

此等行業的自主開發能力，形成經濟規模，提高產品附加值和市場佔有率。這裡應特別著重擇優扶持的原則，在有限資源的限制下，一定要改變過往那種各地一齊上、以至各項目皆不能達高效益的做法。

要加強國有企業的競爭力，提高中國工業化的水平，應廣泛採取先進技術裝備各級企業。基於此，中國應更重視機械工業與電子工業相結合的裝備工業，因其發展直接影響國民經濟技術裝備的水平。對工業升級有關鍵性的影響。

(4) 加速第三產業的發展

第三產業泛指第一產業(農業)及第二產業(工業和建築業)以外的一切社會生產，在中國，第三產業普遍分為四個層次，分別為：

1. 流通部門，如交通運輸、郵電通訊等
2. 為生產和生活服務的部門如金融、法律、審計、房地產、保險、諮詢及旅遊等
3. 為提高科學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質服務的部門如教育文化、廣播、體育衛生及社福利等
4. 為社會公共需要之部門如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及軍隊與警察等。(註三十九)

發展第三產業，有利於緩解資金和就業的壓力，優化產業結構，有利於整個國民經濟效益的提高，促進市場發展。例如加速商業的發展可加速售貨速度，加快資金周轉；而諮詢、保險及流通等行業又為第一、第二產業提供產前、產後服務；此外，法律、審計、測量及評估等行業，則起著維護市場秩序，保証平等競爭的功能。

基於與世界發展水平相比，中國第三產業發展極為不足，故此，中國應繼續發展商業等傳統第三產業，並加速發展信息、諮詢、法律、會計、測量及評估等配合市場經濟建立的新興行業。此外，中國更應吸取國外及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後，中國在股票及房地產等領域出現的過度投機以至出現「泡沫經濟」的教訓，對這些行業加強管理，並制定必要的法規，防止類似情況再出現。

七 重視科技和教育，認真落實科教興國戰略

科學技術對企業的競爭能力有關鍵影響，而教育則是科技進步的基礎，故此，中國應認真落實科教興國戰略：提高經濟發展中各企業的科技含量，促進科技與經濟的緊密結合；並將教育當為一重要戰略產業來發展，加大對其投資，提高勞動人口的素質，以鞏固經濟持續發展最深厚的基礎。

至於科技發展，主要處理好三大方面，分別為：

- (1) 瞄準世界科學前沿，加強基礎性科學研究，發揮自身優勢，爭取在某些領域有重大突破。
- (2) 研究開發高新技術，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並有規劃地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如電子、信息、新材料、航空航天及新能源等。
- (3) 加強技術推廣，加速科技成果產業化及商品化的進程，並採取先進技術，加快重大機械裝備的國產化步伐。

在加強教育方面，則必須努力增加對教育的資源投入，改善辦學條件；建立及健全教育法規體系，並加強師資隊伍建設，重視教師質素的提高。

八 促進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

要解決沿海與中西部(內地)發展差距過大問題，應通過加速內地發展及擴大中西部地區對外開放的程度來解決。

就中央支援方面，國家應採取有力措施支持中西部不發達地區開發，這些支持可包括：

- (1) 國際金融組織和外國政府貸款，大部分以上要用於中西部，中央並應優先在中西部地區安排基建及資源開發等項目。
- (2) 建立完善的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制度，通過中央財政的再分配方式將更多的財政資源轉移予中西部地區。
- (3) 提高資源性產品的價格，解決資源性產品同加工產品比價不合理的問題，使擁有豐富資源的中西部地區能從出售資源獲得合理利益。

(4) 放寬外資在內地投資政策，並吸引內資來加強中西部地區的資源開放和發展，為此，中央應有規劃地引導沿海地區某些資源加工和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內地發展。

除卻中央的支援外，中西部地區亦應利用自身的資源優勢，提高加工深度，增加產品的附加價值，將資源優勢變為經濟優勢，為此，內地應加強交通及通信建設，開發能源和礦產資源，引入加工技術及先進設備，為高增值的加工業創造更堅固的基礎。

九 繼續擴大對外開放，提升對外開放的效益

中國經濟的對外開放是為了促進國內經濟發展，對外開放要突出有利於中國產業發展的大原則，基於此，應把拓展出口、擴大進口、引進外資等政策與國內產業之發展及吸收國外先進科技等結合起來，以便好好地利用國外資源，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服務：

(1) 擴大出口的政策

擴大出口，改善出口結構和經濟效益，以賺取更多外匯以購買必須的進口產品。這首先是禁止某些初級產品及能源含量高的產品出口，並不鼓勵中國國內短缺的大宗資源性產品出口；中國政府應協助各出口企業進行價格協調，扭轉互相削價競爭的狀況；發展境外銷售網絡大力開拓新市場；增加出口商品附加值，徹底改變以人民幣貶值的方式刺激出口；要求政策性銀行對企業收購出口商品所需的資金儘量支持，並對成套設備等大宗機電產品的出口提供買方信貸，從金融領域支持更有效益的出口業務。（註四十）

(2) 控制進口，防止外債過度膨脹

進口方面，主要是鼓勵新技術與相關的設備、關鍵零部件，以及國內短缺的資源產品的進口，不支持高檔消費品的進口；此外，要對銀行對外借款實行控制，防止進口規模在債務擴大情況下過度擴張，實行債務自借自還的制度，把資金流出控制於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與擴大必要進

口所需外匯的合理範圍內。

(3) 引導境外投資往關鍵領域

在吸引外國資金方面，中國應根據國家的產業政策對外資的進入有所選擇，將外資的投向結構與中國產業結構調整配合。引導並以優惠政策鼓勵外資帶入先進科技，發展為現有產品配套之高科技含量的零部件項目；鼓勵能夠改善節能、提高檔次、擴大出口創匯的高增值項目，以及引導外資更多投向農業；基礎設施及基礎產業等項目，從而提高這些國家鼓勵的產業中之外商投資的比重。

(4) 開放金融業，調動國內外金融資源

中國應有步驟的更多開放金融業，通過引入境外銀行及境外投資銀行以開闢更廣闊的融資渠道，境外金融機構不單可使中國能更充份的利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資金，中國更可以通過學習境外金融機構的運作，而更有效的調動國內的剩餘金融資源，將儲蓄更大程度的轉化為投資，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更雄厚的資金基礎。

十 實現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回應人口增長與失業、社會差距擴大、生態和環境保護、以及社會不良風氣諸問題

(1) 人口增長與就業

首先要堅定不移的執行計劃生育國策，儘量控制人口，這是關鍵所在；其次，在提供就業機會方面，應加速發展第三產業、促進中國勞動力進入國際市場，大膽的將勞動力邁出國門、並廣泛在農村小城鎮，繼續發展適合中國人口資源過多之國情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吸收剩餘的勞動力、大力發展勞動力市場，支持各種職業中介組織，廣開就業門路；第三，對於失業人士，應加強職業培訓，提高其技能，使之能適應就的就業崗位。此外，政府應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險制度，使失業人士能

享受起碼的社會保障，維護他們的尊嚴，並使失業人口不致成為社會動亂的根源。

(2) 回應貧富差距擴大的措施

貧富差距擴大，是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無法迴避的現象，問題是如何縮小收入差距，解決差距過大的原則是取締非法收入，並對過高的收入採取個人所得稅等手段加以調節。與此同時，政府亦可通過社會保障、社會救濟、加強職業培訓、大力支持農村及中西部地區發展等綜合措施以協調地區、城鄉以及不同群體之間的分配關係。

(3) 環境、生態和資源保護

應盡速建立環境保護的法規及管理體制，加強工業污染防治及環境污染防治技術之研究，污染防治逐步從終端治理為主改變到整個生產過程控制，並積極發展環保產業。

在保護資源方面，政府應更多制定自然資源管理法規，建立各類資源管理及監督機構，完善自然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價格體系，以建立資源更新的經濟補償機制，並盡快解決現時普遍存在的對資源管理有法不依及執法不嚴的情況。

(4) 社會規範與道德建設

至於回應在建立市場經濟過程中之社會不良問題如娼妓、暴力及治安、吸毒、短視眼光及向錢看、不守商業信諾與及售賣假貨等，應理解這類問題是在發展中一個必然經歷的陣痛，其他國家在完善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亦有類似的經驗，問題在於要採取有效的手段將這類問題逐步糾正。一方面，要加強法制，並嚴格執行，以打擊這些不良現象，另方面，則必須加強教育及道德建設，培養市民正確的公民及守法觀念。此外，政府應更自覺的反腐敗，並在財政可支持的範圍下提高各級政府官員的待遇，從更根本方面建設一個廉潔政府。

第七節 十九年經改歷程之重點述評

在討論過上述經濟困境及根源後，此節重點論述十九年經改的情況，希望使讀者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有更深入的了解。

一 七八至八四年（改革的第一階段）

自七八年開始，中央便以財政「分灶吃飯」的原則下放財權予地方政府；而全國經改的重點乃在農村，國家以提高農產品價格及准許農民進行家庭承包責任制等策略推動農業之發展；擴大企業自主權以試點形式在各城市中推行；大規模的對外開放亦開始。

七八年十二月，標誌著中國改革時期開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到七九年四月，中央便察覺到權力下放後經濟結構嚴重失衡而提出落實調整的十二條措施，然而在七九、八零年，由於基建過大，連續兩年出現財政赤字，導致貨幣發行量增加及物價上漲，中央於是在八零年再強調進一步調整。由於是次調整措施有力，收效顯著，使經濟緊張局面大大緩和。

八三年六月中央開始進行利改稅改革，目標是為企業創造一平等競爭之環境。以往企業利潤全數上交，改革後利潤留成於企業的比例往往要通過國家與企業間的討價還價。利改稅的推行是為改變此種情況，國家以劃一稅率規定企業上交之稅收金額，將利潤上交的某部分轉為稅收。這改革第一步十分順利，由於鐵定稅率的存在鞏固了國家之收入，而企業交稅後的利潤仍是通過部分留成的辦法由國家和企業分享，出現稅收與利潤並存局面。

八四年為利改稅改革的第二階段，在市場產品價格扭曲及各企業佔用資源不均的情況下，國家希望對不同產品收取不同稅率以緩和扭曲的情況，並開徵資源稅和固定資金佔用稅來解決企業佔用資源及資金的差別，務求以各項調節稅使企業能在較平等之起點上競爭，並希望在完成第二步改革後企業利潤不再上繳。然而，調節稅在推行上出現重大之技術困難，由於企業條件的差別，造成調節稅率的千差萬

別，為了讓交企業稅後企業的留利平均，國家最後採取了一企業一稅率的辦法，這實際上和過去企業上繳利潤並無差別，每個企業的稅率仍要經討價還價，破壞了統一稅率的原則，利改稅出現嚴重挫折。

二 八四至九二（經改第二階段）

這階段標誌著經改全面推行，經濟理論日趨成熟，但由於政策上急於求成的影響，再加上經濟體制改革不徹底等原因，造成經濟三次循環波動之困境。

(1) 一九八四年

鄧小平第一次南巡特區，中國經濟從「調整」轉變至全面改革局面，十四個沿海城市及海南省進一步開放，多份企業擴權文件下達；此階段的高峰期是八四年十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召開，通過經濟改革的綱領性文件——〈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肯定社會主義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註四十一)

從八三至八五年，經濟從調整期間的平穩發展走向超高速增長，通脹開始出現。八四年下旬，政府宣布各銀行於八五年所能得到的資金份額，以及工人的工資，皆以八四年的實際信貸額與工資額為基數，引致八四年第四季度出現銀行致力突破借貸額及企業爭發更高工資，貨幣投放加速增長。八四年底現金淨投放二百六十二億，使流通的貨幣增加百分之五十，通脹情況出現。

(2) 一九八五年

中共全國黨代表大會召開，通過七五計劃建議，此建議對經改有極其精彩的論述：

1. 要達至在公有制基礎上發展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一定要先使企業成為相對獨立、自負盈虧的生產者和經營者；其次是發展有計劃的商品市場，完善市場體系；第三是建立全面的間接控制體系，以經濟、法律及行政手段控制及調節經濟。而「企業活力的增強，商品市

場體系的形成，間接控制手段的完善，三者必須互相配套」^(註四十二) 中央的決定與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吳敬鏈等「三環節同步配套改革」^(註四十三) 及劉國光的「企業改革和價格改革雙向推進」^(註四十四) 的思想吻合。

2. 強調七五計劃的頭兩年(八五至八六年)要「為經濟體制改革創造良好的經濟環境」、故要控制社會總需求，「作一些小的調整。」，這實際上同意以劉國光為代表的、認為改革需要穩定、總需求和總供給較為協調、經濟環境比較寬鬆及國家財力有餘地的觀點。^(註四十五)

從八五年三月至八六年三月，宏觀經濟開始推行緊縮政策，政府提出「消化、補充、鞏固，改善」的新八字方針，在召開四次省長會議後，再對中國經濟進行另一次調整。

國務院在八五年下旬開始，制定以價格改革為中心的改革方案，準備在八六年下半年實施：

在改革初期曾獲很大發展的農業生產由於個別家庭經營單位過小，無從發揮規模經濟，農民因農地產權不明確而不肯進一步投資，國家於農業基本建設投資過小、整體經濟通脹下農產品價格重新偏低，及農產品流通體制運作不良等原因，農業出現生產下降之局面，加劇供應不足及通脹之情況。

(3) 一九八六年

經濟調整政策執行不到一年，由於生產迅速下降，引起地方驚慌，中央在地方政府及部分理論界的壓力下，放棄緊縮政策，銀行貸款再次放鬆，經濟即時迅速增長，出現新的物價上漲、通脹加劇局面。

以價格改革為中心的經改方案由於遭受各方壓力，而無付諸實踐，而讓位於強調以「企業改革」為中心的改革思路。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經濟理論界在肯定七五計劃三環節配套改革(企業、市場、宏觀調控)的前提下，出現了以「價格改革」為主的「整體協調改革派」^(註四十六) 與繞開價格改革、而先進行「企業所有制改革」之論爭。^(註四十七) 當時反對八六年

價格改革的原因約有以下三點：

1. 八五年的經濟調整帶來生產滑坡，企業由於虧損導致政府財力受影響，價改需要政府有較充裕的財政以支持提高工資及其他對企業由於價改後成本上漲之補貼，故此，在財政緊縮前提下並不宜推行價改。此外，當時經濟供求還緊張，潛在通脹壓力十分大，價改會造成物價上漲，況且，價改意味著巨大利益調整，不可能對社會上每個集團都帶來好處，風險太大。
2. 一些部門和地區之反對，害怕價改後使他們的經營成本上升，減低利潤。
3. 經濟理論界主張企業改革優先，反對價格改革，其中最大影響力的是厲以寧，他提出價格改革與企業改革的十大對比，認為價格改革不能進行試點，人民會對價改帶來的波動感到不安，以及價改需要財政支持，增加經濟成本等。

八六年第四季度價改方案被放棄，代之而起的是以企業承包制為主要形式的企業改革。

承包制即政府將企業承包予個人經營，就像農村承包一般，承包人需完成多項國家規定的指標，有獎有罰，這制度對保証國家財政收入及完善企業的內部改革有一定的好處，很多經濟學者更認為這是過渡到股份化企業體制的一個良好模式。企業承包制自八七年大規模推行開始，便發覺有一定之缺點：

1. 承包制是以一定時期為條件的，故承包者只著眼於較短期的利益，而對一些需投資多而效果要較長遠才可發揮的項目，往往裹足不前，這就不利於技術及管理的創新；
2. 承包企業往往會提高開工率，從而保證能完成承包時所承諾的指標，雖然企業在較高效率的情況下運作，但卻無助於產品結構方向的調整和技術創新，因為新產品需要額外調配人手、資金和工具，而這往往是承包人所不願冒險嘗試的；

3. 此外，承包制亦是傳統放權性改革的一個變種，因為在承包過程中所定的指標都是發包者（國家）與承包者（企業承包人）討價還價的結果。況且，在承包過程中假若外部經濟環境出現變動如通脹、價格改革等，承包人皆會向國家要求改變承包的指標，若指標不調整，企業間就會出現不公平競爭，但若進行調整，「包死基數」就成一句空話，承包制遂名存實亡。

（4）一九八七年

中共召開十三大，提出新的經濟運行機制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註四十八）這是指國家運用經濟、法律及行政手段，調節整體經濟，促使社會總供給和需求平衡，避免重大波動，從而創造適合的經濟和社會環境，以此引導企業進行正確的經營決策。

改革重心為企業承包制被中共十三大及李鵬的政府工作報告所肯定。

由於八六年的通脹，八七年九月中共召開多次計劃會及體改會，再次執行緊縮政策，推行財政、信貸雙緊的方針，此為八零年中期後的第二次調整。政府採用提高銀行貸款準備金及高利率等收縮銀根方法，使緊縮政策收到成效，但隨即又發生生產滑坡，緊縮方針又被迫停止。

理論界提出國際大循環戰略，受到趙紫陽支持，並命名為「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

（5）一九八八年

由於生產滑坡，導致緊縮方針被逼放棄，中國再度出現信貸發放的高峰，物價大幅上漲。

八八年四月，中央領導主張要冒險闖物價關，推行開放市場的物價改革，消息一傳出，市民紛紛提款搶購，使物價及工資改革無法推行。

這次改革事出慘悴，很多即使是支持價格改革的學者，亦主張先緊縮需求，才放開價格。中央領導匆匆推行價改，可能是基於下列原因：

1. 雙軌制不但造成特權腐化，更不利企業提高效率，不能再忍受。
2. 沒有價改及新的價格機制，不利於誘導企業及地方政府把投資引向經濟的薄弱環節如農業、能源、交通等。
3. 起初(八六年)放棄價格改革是恐怕價改帶來通脹，但後來發覺八六至八八年沒有價改的情況下通脹仍是高據不下，證明價改非導致通脹主因，故不如冒險進行價改，以理順經濟關係。

價改嚴重失敗、再加上通脹極為嚴重，中共遂於九月下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並在隨後召開的十三屆三中全會中，決定了「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進行三年的緊縮政策，這是八零年代中期後的第三次調整，

改革的重心從價改再移向企業改革，並以股份制為試點。

(6) 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一年

是次治理整頓較有決心地執行，成效較好，通脹被抑制、經濟秩序好轉、農業豐收及外貿改善。然而，治理整頓亦存在一定問題，包括市場疲弱帶來的生產衰退，不少企業破產，經濟結構調整不理想，企業效益下降影響財政收入赤字增加，而市民大量銀行存款有可能成為新一輪通脹之基礎，經濟仍不穩定。

在緊縮環境下，政府並無停止價格改革的措施，於八九年提高糧棉合同收購價，提高鹽和鹽製品的價格以及較大幅的提高民航、水路、客運和鐵路的票價，而是次以調價為主的價改並無引發震盪。

股份制之改革以理論探討及試點推行

(7) 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三年(經改第三階段開始)

九二年三月人大宣佈三年緊縮期結束。鄧小平繼八四年後再次南巡深圳及廣東各地，強調敢字當頭，加快改革開放步伐，他並提出以有利生產力與否來分別姓資、姓社之標準。

改革經濟體制重新成為重點，股份制試點被逐步擴大。

中共第十四次全國黨代表大會召開，並確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受鄧南巡效應的影響，中國社會及經濟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飛躍至另一台階：投資擴大，經濟發展速度猛增；房地產、開發區及股票成為投資熱點；中國全方位的對外開放；經濟體制改革深化；社會並出現「下海」及「經商」的熱潮。

（8）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四年

受投資熱潮影響，再加上未及時建立市場秩序、政府宏觀調控經濟的手段不足，以及官員（尤其在銀行系統）藉權謀私等因素，中國經濟在九二年下旨開始出現了「局部過熱」及「混亂」的情況。

為解決經濟運行的難題，中央進行了三項措施，分別是：

1. 發出〈六號文件〉，提出宏觀調控〈十六條〉，進行「治亂」及「治熱」。
2. 中共於九三年十一月中共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中，通過〈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從金融、財政、稅收、國有資產管理、投資體制和外貿體制等各方面，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及總體藍圖，希望通過徹底的改革以根治中國經濟體制的缺陷。
3. 提倡反腐敗，推動廉政建設，並號召維護中央權威。

〈十六條〉推行三個月，中國經濟熱度已大幅降溫，但亦帶來企業生產過度下降及三角債重新湧現之困難，為避免經濟滑坡，中國政府於九三年第四季度鬆銀根，緩解企業資金短缺之困境。

九四年開始，中國推行大幅度的經濟體制改革。元旦剛過，政府即取消雙重匯率制度，實行匯率併軌；推行分稅制，劃分中央與地方的事權與財權；強化中央銀行職能；並大膽地放開了糧食的銷售價格。

基於提高農產品收購會格之影響，再加上總需求「累積」膨脹，以及流通體制及格價監督體制不完善等之影響，中國於九四年出現高達百分

之三十一點七的通貨膨脹率。

九四年九月，國務院召開「加強物價管理工作電視電話會議」，提出十項抑制通漲的措施，同年十一月，中央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倡「一線兩點」方針，進行平抑物價，控制通脹，並集中改善農業與企業改革這兩個重點。經過一連串的努，中國的通漲率開始被控制，一九九五年的通漲率下降到百分之十四點八。

在研究這時期開始的經濟形勢有一點特別值得留意的，是中國的社會總供給形勢良好，即工業產品穩步增長，能源、運輸和重要原材料生產的增長率逐年提高等，在很多領域皆一改過往「供不應求」而出現「供過於求」的狀況。

(9) 一九九五至一九九七

九五年九月，中共召開十四屆五中全會，提出〈九五計劃及二零一零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此文件於九六年三月被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文件突出「兩個根本轉變」，即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增長方式則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

九六年為「九五計劃」的第一年，但卻沒有出現新的投資擴長熱潮，宏觀經濟形勢進一步改善，經濟增長率維持百分之九點七的同時，物價增長落到百分之六點一，明顯低於年初預期的百分之十。此外，九六年農業獲得大豐收，外匯儲備更超過一千億美元。在經濟成功實現「軟著陸」的情況下，中國政府於九六年內兩次減利息。

基於九七年中國將收回香港主權，並召開十五大，中央政府自九六年十一月開始便相繼召開多個會議，在整體經濟政策、計劃工作、財政、體制改革、農村及金融等各方面作出部署。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九日，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逝世，終年九十三歲，舉國哀慟。

同年三月，第八次人大五次會議召開，深化國企改革，是大會最關注的問題，企業實行兼併與破產更在總理李鵬的政府工作報告和計委主任陳錦華的報告中加以強調。此外，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更指出

國家在九七年會撥出三百億元作為推動國企破產、兼併所需的資金，這部分資金主要用於職工的安置和再就業方面。與此相配合，國務院於九七年四月決定成立全國企業兼併破產和職工再就業工作領導小組，統籌企業破產及職工再就業等事宜。

註 釋

- 註一 陳雲〈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的新問題〉《陳雲文選》(一九五六至一九八五)，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13頁
- 註二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第267-288頁
- 註三 《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233頁
- 註四 有關五八年下放權力的論述，請參考周太和、高尚全等《當代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70-79頁
- 註五 有關企業主權的權威論述，請參閱蔣一葦〈企業本位論〉載《經濟改革文叢》第一輯，一九八一年，第167頁
- 註六 劉國光〈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和雙重體制向目標模式的轉換〉載《中國經濟大變動與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發展》，江蘇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第176-177頁
- 註七 趙紫陽《關於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報告》，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41頁
- 註八 《北京日報》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 註九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形勢分析課題組〈整體配套重點突破〉引自《經濟研究》一九九四年，第一期
- 註十 原因忠夫、常清主編《中國生產資料流通實證分析》下冊，中國經濟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97-100頁
- 註十一 同上註
- 註十二 《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五次全體會議文件》，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21頁
- 註十三 《學習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文件十講》，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143頁
- 註十四 翁杰明、張西明等主編《與總書記談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167頁

- 註十五 楊春貴主編《學習江澤民同志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係十二講》，中共中央黨校出版，一九九五年、第145頁
- 註十六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計劃委員會《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二零一零年遠景目標綱要講話》，中國經濟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52頁
- 註十七 同註十二、第21頁
- 註十八 林兆木〈努力保持宏觀經濟穩定〉載《迎接中華民族新的偉大振興——學習八屆人大四次會議精神》，中國言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106-107頁
- 註十九 馬劍、宋建《走出迷宮》，學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56頁
- 註二十 王春正〈積極推進產業結構調整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載同註十八第93頁
- 註二十一 林兆木、邵寧主編《國家計委宏觀經濟研究院重點研究課題——跨世紀的發展思路研究》，中國計劃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191頁
- 註二十二 同註二十
- 註二十三 同註二十一，第190頁
- 註二十四 同註二十
- 註二十五 同註二十一
- 註二十六 謝伏瞻、李培育主編《跨世紀中國經濟發展——戰略與政策選擇》，中國發展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53頁
- 註二十七 同註十五，第37頁
- 註二十八 同註十五、第37-38頁
- 註二十九 科爾內、J. Kornai《短缺經濟學》下卷，經濟科學出版，一九八六年，第9-13頁
- 註三十 胡耀邦〈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
- 註三十一 趙紫陽〈關於制定七五計劃的建議的說明〉一九八五年九月十八日
- 註三十二 陳清泰主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試點工作手冊》，中國經濟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35頁
- 註三十三 魏杰〈國有企業市場化問題〉《管理世界》一九九五年第六期，第11-20頁

- 註三十四 江澤民《堅定信心、明確任務、積極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在上海、長春召開的企業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14頁
- 註三十五 同註三十三，第17頁
- 註三十六 翁齡、朱蘊儀等主編《國企改革》 百富勤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研究報告 一九九六年，第2頁
- 註三十七 同註三十六
- 註三十八 周振華《現代企業制度叢書——步履艱難的轉換——中國邁向現代企業制度的思索》 上海澤文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第170-171頁
- 註三十九 同註十五 第68頁
- 註四十 同註二十一 第38頁
- 註四十一 〈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
- 註四十二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載《十二大以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795-834頁
- 註四十三 吳敬鍊〈單項推進，還是配套改革〉載《經濟改革問題探索》，展組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第268-269頁
- 註四十四 中國社會科學院課題組〈中國經濟體制中期（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九）改革綱要〉《中國社會科學》 一九八八年，第四期
- 註四五五 劉國光「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理論十年回顧」載《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十年》國家體制改革委員會編，改革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145頁
- 註四十六 吳敬鍊〈關於改革戰略選擇的若干思考〉《經濟研究》 一九八七年
- 註四十七 詳見厲以寧《中國經濟改革的思路》，中國展組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 註四十八 趙紫陽〈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六十八章 建國方略——官方與民間

導 言

中國政府在改革開放的十九年間，扮演著主導國家發展的角色，為受種種經濟及社會危機困擾下的中國，提出了治國總方針和推行了一系列具體治國措施。在民間方面，個別民間團體在十九年間曾就政治及社會等問題進行抗爭，形成多次的群眾運動。本章分為官方與民間兩部分，官方部分、主要討論：第一，中共於改革期的總方針「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並從歷屆政府報告、國家社會經濟計劃及四個五年計劃(六五、七五、八五、九五)中，簡要的總結中共具體的治國策略；第二，討論中共黨內不同的觀點對國家發展的看法以及其分歧，這分別包括以陳雲為代表的穩進計劃改革路線、強調黨權威的意識形態思想幹部，以胡耀邦、趙紫陽為代表的開明市場改革路線，及以鄧小平、江澤民為代表的平衡實用市場改革路線；

在民間運動方面，則主要集中介紹：第一，十九年的民間運動及其出現的社會基礎；第二，民間運動的中心思想以及民間團體中不同派別之理論及爭取策略，以求對十九年的民間運動作一總結。

第一節 官方的治國方針及政策

一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原則(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以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改革開放兩個基本點；是文革後中共自七八年十二月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總方針。

文革期間，中國國民經濟受很大衝擊，社會積壓著很多矛盾，政府政策若再不改變將會帶來火山爆發般的震撼。再者，文革以來，通過連綿的民眾運動及對各級幹部的批判，使市民更明白黨內很多不正常現象，從文革期間到四人幫下台期間，皆可以看到這些不同意見的呼聲，

六八年的省無聯、七四年的李一哲大字報到七六年的天安門運動，使人民明確感受到民間由下而上尋求變革的社會力量。最後就是很多提倡改革的高幹如鄧小平、楊尚昆及萬里等，他們在文革期間挨整挨鬥，上山下鄉，發放偏遠地方勞動，在無權無勢的日子中真正接觸群眾，他們目睹中國的貧窮落後，民生凋零，從親身的苦難經歷中大徹大悟，認定要改變中國落後的形勢，除推行大幅改革外並無出路。

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放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基本路線，並決定將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在檢討中共於四九至八一年（三十二年）的歷史總結文件〈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第一條總結就是：

「黨和國家工作重點必須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來……今後，除了發生大規模外敵入侵……決不能再離開這個重點。」^(註一)

為了達到經濟建設之目的，中共認為一定要強調四項堅持與改革開放。鄧小平及大部分領導人都強調改革開放的重要性，鄧曾說：

「不改革就沒有出路，舊的那一套經過幾十年的實踐證明是不成功的……中國社會實際上從一九五八年開始到一九七八年的二十年時間內，長期處於停滯和徘徊的狀態……這種情況不改革行嗎？……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發展和相關的其他各個領域的改革。」^(註二)「我們提出要發展得稍微快一點……就要對內把經濟搞活，對外實行開放政策……我們首先要解決農村問題，在農村實行搞活經濟和開放政策，調動全國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的積極性……幾年功夫就見了。」^(註三)

在另一方面，中共也同樣重視四項堅持，鄧小平指出：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實行開放政策，同時也要刹住自由化的風，這是相關聯的問題。不刹住這股風，就不能實行開放政策。」^(註四)

「我們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這四項是：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大家知道，這四項基本原則並不是新的東西，是我們長期以來所一貫堅持的。」(註五)鄧小平及趙紫陽等中共領導人亦反覆指出：「堅持四項原則的核心，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註六)

二 中共治國總方針下的啟示

從中共這十九年的實踐，可以得到如下幾點啟示：

(1) 經濟建設的國策不會改變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配合改革開放政策，使中國經濟充滿生機，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緩和了文革以來的社會矛盾，令社會及中共政權得以穩定。改革使各個階層市民的生活改善，而最重要的是穩定了佔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農村的安定，使中國政府能面對種種衝擊而屹立不倒，如在十九年間經歷過數次民間運動，包括捲入千萬市民的八九民運等，中共亦能渡過難關，這不得不歸功於十九年來一直堅持的經濟建設的路線。

以經建為中心的政策由於能改善市民生活而得到廣大人民的支持，各個地方領導人也基於自己管轄區域的經濟利益而不會放棄此基本路線，可以預計，中國政府將會長期堅持經建這條總方針。而亦是由於堅持經濟建設的總方針，中共在處理很多政治事件如台灣統一、收回港澳而容許其繼續實行資本主義、與日本就釣魚台的主權爭論、對美政策與蘇聯邊界談判、以及處理異己分子時，皆以實用主義甚至是讓步的手法，沉著應付，盡量減輕政治衝擊帶來之震盪，從而能集中精力，搞好經濟。

(2) 總治國方針下的民主運動與官方民主改革

中國政府認為經建及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必須在共產黨的領導下

進行，這樣才能保持中國穩定，使國家能集中搞經建及改革的保證，鄧小平認為：

「沒有共產黨領導，肯定會天下大亂，四分五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對黨的領導，沒有黨的領導也就不會有社會主義制度。」(註七)趙紫陽亦指出：「只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能穩定全國的局勢、集中全國人民的意志的力量，進行改革和建設。」(註八)

在維持黨權下推行改革開放，實行邁向市場化方向的改革，在發展中國家有不少成功的經驗，突出的例子是南韓、台灣、新加坡、菲律賓及香港，這些國家及地區在發展初期一般都沒有推行西方式的民主，而是在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領導下將國家帶到現代化的道路。基於歷史的經驗，黨的領導與改革開放未必一定會有衝突。此外，在一個急劇轉變的社會經濟環境中，要推行大規模的經濟機制轉換，平衡國內不同地區、城鄉及各民族的利益，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是不能想像的，故維護政府權威在客觀上是有其必要性。

然而，同意要有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央，並不否定社會上需要有制衡及監察黨權的民間力量，以及國家及黨需開展民主改革。正是因為民主政制可保證安穩的政治運作，使種種不同意見能通過制度化的民主渠道協商，而無須像文革時般作出你死我活的鬥爭。此外，通過制衡及監察，將會更有效的遏止由於黨權膨脹而衍生的貪污、腐化、欺壓民眾的官僚行為，使社會更趨安定。

雖然，社會上出現爭取民主的運動有可能對社會帶來某程度不穩，但是認為民主開放、容許民間獨立團體出現的多元化政治，就必然導致八九年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般的共產黨下台，以及社會混亂的觀點亦是過於片面。這原因是中國跟東歐各國甚為不同，中國共產黨是通過長時期的解放戰爭由人民支持上台的，在建國後雖然犯了不少錯誤，但中國畢竟克服了過往四分五裂、由帝國主義支配的黑暗局面，更重要的是改革開放給市民帶來實惠，經濟的成果大大提高了黨的威信，一般市民，尤其是農民皆十分清楚無一力量能代替共產黨之領導地位。況且，

提出要組織不受黨支配的民間團體並不如東歐各國民間力量般有強大的民族主義情緒及宗教背景，他們爭取的只是不受黨支配，能獨立地對共產黨作出批評，並為自身代表的群眾爭取利益，這其實是各國經濟發展、教育水平提高、人民獨立思考增強的必然結果，政府的反對只能暫時抑制此趨勢，只要繼續改革開放，經濟趨向多元化發展，這股爭取成立利益團體或壓力團體的力量客觀上必然會在適當的歷史時刻重新活躍。研究發展中國家政治的權威亨廷頓在《轉型社會中的當代政治》中警告，人均國民收入五美元到三千美元過渡的過程中，如果時間很短，肯定要出現政治動盪。(註九)中國在「九五計劃」期間(一九九六—二零零零年)經濟肯定將大幅持續發展，亨廷頓的分析實值得留意，在《與總書記談心》一書中，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年輕理論家曾作出善意的建議：

「在現代社會中，隨著人們民主意識的提高和政治、經濟訴求的增長，陣發性的小動盪、小衝突等形式的局部不穩定會經常出現，對這些小的不穩定或動盪……要有正常的心理準備……要充分理解這種小型、局部的、陣發性的不穩定乃是現代社會或向現代轉型時期社會的正常現象(有時還有宣泄不滿、平衡內心，避免更大的動盪，甚至動亂的效果)……反之，如果對出現一些小的局部的不穩定，時時處在心理緊張狀態，就表明心理脆弱，從而處理時就會動輒大動干戈，反彈過度，不但效果甚小，而且容易人為地形成熱點，授人以柄，反而被動。」(註十)

實際上，中共高層是十分清楚經濟改革開放會帶來群眾參與政治的客觀事實。鄧小平在八九年六四後數天曾指出：「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轉移的」(註十一)，在九六年十月中共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中，更明確的指出：

「我國的實踐已經證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利於增強人們的自主意識、競爭意識、效率意識、民主法制意識和開拓創新精神，使

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進一步發展出來。」(註十二)

為因應歷史潮流，務實的中共第三代領導人通過加強人大及政協的功能與地位，以制約國務院的行政權力。此外，中國政府更提供更多制度化的諮詢渠道，及時吸納社會各團體的意見，來塑造中央權威的民主基礎。

(3) 意識形態對改革過程仍將產生牽制

中共堅持的社會主義是以「公有制」及「按勞分配」為核心，提倡這兩條的原因是希望國家經濟能在有計劃下達到協調穩定的發展，避免分配極端不公之現象。在中國這個幅員廣大，正進行變革的國家裡，堅持社會平等的共產黨人提倡這兩條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在十九年中推行的很多經濟改革政策都被某些堅持平等理想的幹部批評為與上述社會主義經濟的兩點基本原則出現矛盾，例如農村的包產到戶、引入外資、城市企業的承包制、私營企業、個體戶、自由經濟及市場化方向等等。雖然鄧小平在九二年南巡中曾強調應以對生產力、綜合國力及人民生活改善是否有利等三項標準來判斷改革是「姓社或姓資」，而中國很多理論家亦作出無數的學術分析，論證上述提出的改革並沒有偏離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然而，由於意識形態的框框客觀著實存在，以致在某項改革的推行過程中無可避免地要進行爭論，出現堅持「平等理想」與「實際經濟利益」的論爭。如黑龍江省委書記孫維本在九二年人大提出：

「姓社還是姓資，這一困惑使我們在採取改革開放重大措施時心有餘悸，左顧右盼、搖擺不定、推進不力。」(註十三)山西人大常委主任王庭棟亦指出：「我們已摸索了幾十年，搞農業怕個『戶』字，一包到戶就是資本主義；搞工業怕個『市』字，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就是資本主義。迷信一個字可以耽誤幾十年。」(註十四)

總結以上三點，可以說由於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總方

針，中共的統治地位將不會動搖，而中共亦會繼續推行改革開放政策。然而，由於社會主義理論的存在，以及中國在前進過程中難免會面對很多難題，這將會使某些改革開放政策會被堅持社會主義平均主義思想的領導人質疑，從而使改革遭受某程度阻力。在另一方面，雖然中共強調黨的領導，反對有可能影響穩定的民間自發運動，但開放改革必然客觀上帶來多樣化的經濟、政治情況，要求民主呼聲將會繼續，若中共未能因應客觀之要求，加快民主改革，提供更多渠道吸納不同觀點，則民間力量與政府的衝突將無可避免。

第二節 中共治國的具體政策

在改革十九年間，中國經歷了三個五年計劃及審定了九五計劃和二零一零年遠景目標綱要，政府曾發表十九個工作報告以及共產黨曾多次召開會議，這裡希望能從上述各會議報告及文件簡要的總結中共的治國政策。

雖然在十九年中許多政策都是互相連貫及具有延續性的，但在不同期間國家總政策都有特定的側重點，以回應某個時期的需要，例如七九至八四年間強調經濟的「調整」，集中計劃權力及資金以進行重點建設；八四年則強調全面的改革開放，後來為了回應經濟的失控而重提穩定發展之經濟之方針；在八七年中共黨十三大期間重申經濟、政治的全面開放並大力推行價格改革；在八八年的關物價關失敗後又進行三年的經濟調整；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後黨又加強思想教育；直到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及十四大後又再重申更大程度的開放改革，確立市場經濟的目標；而在九三年經濟出現混亂及局部過熱時又提出宏觀調控等。

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提出的具體政策。很多都是中央的良好意願，然而，在執行過程中往往由於種種原因而未能落實，這些原因包括：客觀資源制約、經濟體制改革不徹底、地方政府的抗拒、中層官僚的阻力、市民不支持，以及需因應重大的經濟及政治危機而作出政策轉變等。雖然如此，理解這些具體政策畢竟可以協助明瞭總理工作報告、

每年發表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及一些重要的中央決議文件等。

一 政治

(1) 政治體制改革

1. 黨政分開

改變過往事無大小皆由黨包辦的狀況，強調黨的領導應是政治領導，是政治原則方向、重大決策的領導和向國家政權推薦幹部，而不是包辦國家政權、群眾團體及企業單位的工作。

2. 下放權力

為改變過往權力過份集中現象，提出劃分中央與地方及各企業單位的權力，將權力下放，以調動地方及各團體的積極性。

3. 改革政府工作機構

為改革架床疊屋、人浮於事的政府機構，並順應經濟改革及政企分開的政策，政府希望能精簡機構、撤銷因人設事的部門，並完善行政機關組織法，用法律和預算手段控制機構設置和人員編制等。

4. 改革人事幹部制度，廢除幹部終身制，建立公務員制度

為改變以往用人唯親的情況，國家制定一系列的法律和規章，對執行國家公務的人員，依法進行管理，以提高政府的效率及穩定性。

5. 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

提高政府開放度，並加強政府與各團體的對話渠道，重視諮詢，並發揮輿論監督作用，以反對官僚主義和不正之風。

6. 監督行政機關

制定監督法，強化人大、政協及各人民團體如工會、共青團的權

力，以對政府工作進行監督。推行差額選舉制度，使民主能逐步落實。

7. 強調法制

加強法制建設、立法工作及執法力度，保障司法機構能獨立行使職權，並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識，中國更出現多宗市民或民間團體向政府提出訴訟的案件。

(2) 整黨與反腐敗

進行整黨，以克服部分黨員以權謀私、奢侈浪費及貪污腐化的現象，中央制定嚴格的紀律，對犯錯的黨員幹部進行教育，以及對腐敗分子執行開除出黨及交法律制裁。

(3) 國防現代化

重視國防建設，發展國防科技，精兵簡政，紀律嚴明，從而提高部隊之戰鬥力。

二 經濟

(1) 發展之目標

一九八二年中共十二大提出從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紀末的二十年，經濟建設總的目標是力爭使全國工農業的總產值翻兩番，即由八零年的七千一百億元增加到二零零零年的二萬八千億元，經濟建設戰略步驟是在二十年分兩步走，前十年是打基礎，積聚力量，創造條件，後十年進入新的經濟振興時期。(註十五)一九八七年的中共十三大中，總書記趙紫陽補充提出經濟發展目標的「第三步，到下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註十六)而在九六年三月就九五計劃(一九九六至二零零零年)及二零一零年遠景目標綱要的報告中，總理李鵬提出在二零零零年在人口比一九八零年增長約三億的情況下，實現「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比一九八零年翻兩翻，基

本消除貧困現象，人民生活達小康水平。在二零一零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二零零零年翻一翻。

(2) 經濟發展策略

1. 提出以「經濟效益為中心」的思路

在八一年五屆人大四次會議中，總理趙紫陽把經濟建設方針的基本內容概括為：「今後我們考慮一切經濟問題，必須把根本出發點放在提高經濟效益上……走出一條速度比較實在、經濟效益比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實惠的新路子。」^(註十七)他並從農業、消費品工業、能源利用率、企業技術改造、整頓企業、資金運用、對外開放、經濟體制改革、科研及安排人民生活等十方面提出建議，以保證效益能得到落實。

在改革十九年的各份有關經濟發展文件中，經濟效益始終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是各項經濟發展政策及改革所希望達到的目標。

為落實將「提高經濟效益作為經濟工作的中心」之國策，中共於九五年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中提倡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這主要為依靠經濟體制改革，形成有利於節約資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業經營機制，有利於自主創新的技術進步機制，有利於市場公平競爭和資源優化配置的經濟運行機制。

2. 保持供需平衡，使經濟能持續發展

保持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基本平衡，使建設與國力規模相適應，保證經濟能持續、快速、健康及協調發展，避免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大上大落，從而造就一穩定的經濟環境，使企業的效益能充份發揮。

3. 調整產業結構，使各個經濟環節能協調發展

i. 集中力量搞好農業

爭取糧食、棉花等較好的收成。農業一向為中國國民經濟最重要的基礎，故發展農村乃成為十九年間的一貫政策，尤其在八四年農業生產出現下降後，政府更重視農業的發展。政府提出於制訂計劃及部署經濟

工作時，應首先把農業和支持配合農業發展的產業安排好，各級政府領導人要親自處理農業問題，調動農民、農業科技工作者和農村幹部的積極性，並動員各方面支持農業發展。

ii 加強能源、交通、通信和重要原材料等基礎工業與建設

這些基礎產業一向薄弱，制約著各行業的發展，影響經濟發展的後勁，所以是政府一向希望能集中資金，重點建設的戰略行業。

iii 調整加工工業的消費品生產

由於文革以來忽視工業消費品的生產，故在改革初期，出現消費品供不應求。為改善人民生活，政府大力提倡消費品生產。然而在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由於加工工業品利潤高，又引致過度生產，故在八十年代中期國家開始提倡嚴格控制加工工業發展的規模與速度，以使加工業能與農業、能源、原材料和運輸能力的增長相適應。

iv 發展支柱產業如電子、房地產、汽車及機械等，並培養順應市場需要的新經濟增長點。

4. 重視發展教育與科技，實施科教興國戰略，提高國民經濟的整體素質

在科技方面，除繼續推行高新技術研究外，還重視將科技成果推廣應用、以改造傳統產業，節能降耗，開發新產品及提高產品質量等，務求使科研與經濟活動緊密的結合。在教育方面，國家每年增加教育經費，改善教育結構，提高教育質量，改善知識分子的工作及生活條件，並加強對勞動者的職業教育和在職繼續教育，以建立一支質素較高的勞動隊伍。

5. 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

這包括發展競爭能力高的出口產業；將進口的重點放在引進技術和重要設備上，發展「進口替代」的生產，即加快國產化進程，以逐步代替進口貨；改革外貿體制，吸引更多外商來華投資及引導外資投向高技術含量的行業，以提高使用外資的經濟效益；並繼續辦好特區、沿海開放

城市及沿海經濟開發區。

6. 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控制人口，盡速建立勞動力市場，加強培訓工作，以造就更多就業機會。

(3) 經濟體制改革

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中央政府主要根據十二屆三中全會、七五計劃中經濟改革部分，以及九五計劃等的建議，改革內容包括下列六點：

1. 國企改革

國企改革按照所有權(指國有制)與經營權分離的原則，搞活全民所有制企業，企業改革包括推行承包制、租賃制及股份制等。

基於企業是經濟運行最基礎及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故中央政府將國企改革看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中央指出國企是國民經濟的支柱，故增強國企尤是國有大中型企業之活力，發揮其主導經濟之作用，關係到經濟體制改革成敗及經濟發展目標的實現。國企改革，要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目標，真正做到「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並要大膽試驗，敢於探索，著眼於搞活整體國有經濟，抓大(企業)放小，尋找一條適合中國企業改革的路子。

2. 建立和培育社會主義市場體系

這不僅包括建立消費和生產資料商品市場，還包括資金、勞務、技術、信息和房地產等生產要素市場。要達這個目的，必須進行價格改革。

3. 建立以間接管理為主的宏觀經濟調節體系

為保證經濟能有秩序地運作，必須實現市場機制和宏觀調控的有機結合，一方面要充份發揮市場機制分配資源之作用，使各企業能適應供

求變化，體現競爭原則。另一方面，則重視宏觀調控，保持宏觀環境穩定，使政府能集中資源推行既定的產業政策，以促進經濟更為健康的發展。

4. 促進經濟橫向聯合

促進人才、資金、技術及資源等各種生產要素的流動與重新組合；鼓勵企業間進行兼併，以達至優化既存資產的原則。

5. 鼓勵多種所有制的發展

在公有制為主體、國營企業為主導的前提下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如集體所有制（鄉鎮企業）、中外合資企業、外商獨資企業及私營經濟等。

6. 分配政策

推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方式如佣金、股份分紅及經營的利潤等。

（4）具體個案介紹——九七年國家計委的工作報告

一九九七年三月召開的八屆人大五次會議中，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陳錦華提交了〈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草案〉的工作報告，提出了政府在九七年的八大任務。從這八項工作中，可以作為具體個案反映出中國政府在九七年經濟工作重點：

1. 繼續加強農業基礎地位，全面發展農村經濟；
2. 進一步搞好國有企業，保持工業適度增長；
3. 保持適度投資規模，大力優化投資結構；
4. 加強價格調控監管，降低物價上漲幅度；
5. 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提高利用外資質量；
6. 進一步減少財政赤字，繼續保持金融穩定；
7. 努力發展科技教育和各項社會事業，推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

設；

8. 繼續改善人民生活，加快實施再就業工程。

三 社會

(1) 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縮小東部沿海與內陸中西部地區之差距，重要思路為更重視內陸地區的發展，並實施有效措施，處理好城鄉經濟關係；千方百計提高農村居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至於社會成員間收入差距懸殊，則須取締非法收入，提供社會保障，並以稅制調節過高收入等，以回應社會不公之問題。

(2) 精神文明建設

這主要是在引進商品經濟的情況下，政府希望避免市民一切「向錢看」以及社會意識形態崩潰的現象，而提倡一種思想風範，在新文化下使國家能朝向健康的道路發展。

(3) 搞好社會治安，維護社會穩定

這主要是針對開放以來，由於物質引誘下出現的種種罪惡如賣淫嫖娼、拐賣婦女兒童、吸毒犯罪、黑社會、經濟犯罪及其他種種罪惡等。

(4) 加強環境保護，控制環境污染的惡化，植樹造林，改善生態環境。

(5) 實行計劃生育

控制人口增長，提高人口質素，由政府提倡晚婚晚育，少生優生，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

(6) 加強民族團結

一律平等對待不同民族，制訂民族區域自治法，貫徹民族自治，並尊重不同民族的風俗習慣。

(7) 宗教

為配合改革開放及不同民族的信仰，容許宗教信仰自由，以調動各個宗教團體的積極性，擁護中國的統一。

四 中國統一

在堅持收回主權的前提下，准許香港和澳門在回歸中國後，實行高度自治、一個兩制，資本主義制度不變，並通過大陸及台灣兩岸人民更多交流與貿易，為爭取國民黨與中國政府談判建立基礎，以完成中國的統一事業。

五 外交

中國政府的外交原則，可以概括為下列幾個方面：

- (1) 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發展各國友好合作和促進共同經濟繁榮，作為對外工作的基本目標。
- (2) 堅持獨立自主，不依附任何超級大國，也不與任何一方結盟或建立戰略性伙伴關係。
- (3) 以和平共處五原則，處理與其他國家的關係，即尊重別國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及和平共處等，而不再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異同來決定彼此關係。
- (4) 中國將自己劃入第三世界，堅持及再進一步發展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和合作。

在上述和平共處的大原則下，中國在改革十九年間改善及強化了與美國、蘇聯、歐洲各國、日本、周邊國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從而使中國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扮演著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

第三節 中共內部對具體治國方針之觀點分歧

西方很多中國問題評論家都把中共內部分為「保守」及「改革」兩派，

所依據的是改革派多贊成加快經濟步伐、對外開放，較能容忍不同聲音及重視民主，而保守派則多次反對開放之步伐，對一些大膽的改革措施不以為然，並經常批評開放帶來的負面影響，而對民間不同意見的呼聲採取強硬的鎮壓態度。

從十九年的發展來看，上面所述的二元分法有一定的事實根據，但亦有很大的缺點。在此二分法下，究竟鄧小平、江澤民、楊尚昆及王震等應屬於哪一派，而作為改革力量的代表趙紫陽及胡耀邦又是鄧小平提拔的，楊尚昆在八九年曾指出趙紫陽「這幾年的成績根本就是由小平同志提出經政治局集體決定的，他只是執行。」而江澤民在出任總書記後，又大刀闊斧的進行市場經濟及推行以制約行政權力為重點的民主政制改革。此外，陳雲是中國最早提倡改革計劃經濟體制的領導人，多次成功拯救瀕於崩潰的中國經濟，文革期間被視為修正主義者而落台，改革十九年間幾次經濟失調反證他經濟理論的正確，又怎能簡單地把陳雲實事求是的意見視為保守理論呢？

這裡希望強調的是由於改革帶來的經濟活力及實惠，無論中央持哪一個觀點的幹部都是衷心支持的，分歧點主要在改革之幅度、深度及某些重要方向。在政治問題方面，中共高層都一致支持黨領導之原則，趙紫陽就是「新權威主義」的支持者，與經改一樣，政治領域分歧主要是究竟可以容忍反對聲音的程度。故簡單以「保守」、「改革」的派別名稱未必是貼切及全面的，這裡將介紹中共黨內不同的主要代表思想，並作簡要之評論。

一 中共黨內不同的觀點

（1）穩進的發展觀點——陳雲

這觀點的代表人物是備受黨內推崇的中共元老、財經專家陳雲。他是黨內道德力量的典範，其支持者主要是財政部及計委等單位。陳雲受尊重的原因除了他在一九五六年已是中共的副主席外，還由於他性格謙遜、實是求是、不在黨內形成派系、重視調查研究以及「淡泊寧靜，不與

人爭權爭利」(千家駒語)(註十八)。更為重要的，是陳雲曾為中國經濟建設立過不朽功績，例如制止建國初期的嚴重通脹，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針對建設規模过大而與周恩來提出「反冒進」主張，六十年代初期挽救因大躍進而導至經濟崩潰之局面，而在七九年經濟面臨嚴重失調時他亦提出經濟要調整的正確主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陳雲在五五、五六年开始便提出要下放權力，對指令性經濟體制進行改革，以及在農村准許農民擁有家庭副業，鼓勵以私養代替公養母豬，以物質刺激調動市民之積極性。正是由於陳雲的改革思想，他在文革期間受到紅衛兵的衝擊，指他是反對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總頭目、毛澤東身邊的定時炸彈及修正主義祖師爺等。基於此，把陳雲說成是反對改革的保守派是不全面的。

然而，無可否認，陳雲是一個十分慎重的領導人，再加上留蘇及多年治國的經驗，使他十分強調中國經濟應持續、穩定及協調的發展，他更強調經濟建設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在八五年九月黨代表大會中，陳雲指出「社會主義經濟，還是要有計劃按比例，我們是共產黨，共產黨是搞社會主義的。」(註十九)，踏進九十年代，當中國全面推行經濟體制變革，建立市場經濟的時刻，陳雲的經濟理論明顯不足，陳雲曾坦白並謙虛的指出：「過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當前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很多已經不再適用。這就需要我們努力學習新的東西，不斷探索和解決新的問題。」(註二十)扼要而言，陳雲的思想包括下列幾點：

1. 經濟應穩定平衡地發展，「建設規模要與國力相適應」，經濟的平衡發展是最快的發展。中共於改革開放後曾針對經濟過熱及失控的現象進行過四次調整，反證陳雲觀點的正確性。
2. 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註二十一)，以及重視公有制、國營企業為主導力量的「大計劃、小自由」思想。這觀點是陳雲求穩慎重思想的另一表現，為了避免計劃經濟束縛太大的缺陷以及自由市場的盲目調節，陳雲選擇了著名的鳥籠經濟理論，以保證國家建設必須全國一盤棋，按計劃辦事。鳥籠經濟將國家計劃與搞活

經濟比喻為「籠子」和「鳥」，使很多評論認為陳雲反對市場改革，把經濟像鳥一樣放在很小的籠子裡般，這其實是歪曲了陳雲的願意，陳雲的原話是這樣的：

「今後 要繼續實行搞活經濟的政策，繼續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但是，我們也要防止在搞活經濟中，出現擺脫國家計劃的傾向……這就像鳥和籠子的關係一樣，鳥不能捏在手，捏在手裡會死，要讓它飛，但只能讓它在籠子裡飛……當然『籠子』大小要適當，該多大就多大，經濟活動不一定限於一個省、一個地區，在國家計劃指導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區，甚至不一定限於國內，也可以跨國跨洲。」（註二十二）

3. 推行有限度的對外開放政策。陳雲同意利用外資以引進技術，並指出使用外資的數量決定於國內的配合能力和償還能力，而這又取決於中國出口商品的換匯能力，這個觀點無疑是正確的。陳雲對中國設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有一定的保留，是極少數在改革十九年沒有到訪特區的領導人，在八一年他指出要充份估計特區帶來的副作用，故特區不能增加，而重要的任務是總結經驗，並提出特區搞的來料加工不能把中國自己的產品排斥掉。
4. 堅持社會主義，端正黨風。陳雲強調社會主義必定戰勝資本主義，他並針對很多幹部在改革開放期間，利用自己的權力，以權謀私，違反國家利益。他更對改革帶來的很多負面影響，如只顧發展輕工業，忽視農業之投資，貧富差距大幅擴大和經濟失控等作出嚴厲批評，他認為這些問題的出現，同共黨放鬆思想及削弱思想政治工作部門的作用和權威有關，在八九年六四事件後，他更「大呼特呼」要警惕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註二十三）故此，他認為應當加強共產主義思想、四項基本原則及穩健發展經濟的宣傳，以維持清廉的黨風，並使改革更有秩序的發展。

與此同時，陳雲認為要以較溫和的方式對待「犯政治錯誤」的官員，例如在六四後，他提出在政治問題上，要格外慎重，「不要扭住不放」，

並為六四期間「犯有錯誤」的官員開脫。(註二十四)

基於陳雲強調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政治工作部門的作用，以及謹重發展經濟的思想與及對外資、特區警惕的觀點，他自然被視為黨內保守勢力的代表人物。

(2) 強調黨權威的意識形態思想幹部——鄧力群、胡喬木等

持這個觀點的人如鄧力群、胡喬木、王忍之等十分重視黨權及社會主義的純潔性，這些幹部長時期在意識形態領域工作，儘管支持改革開放、引入外國科技等沒有階級性東西，但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行政和管理經驗，則認為要分清這些知識是否違反社會主義發展的規律。(註二十五)他們對改革開放在哲學及社會科學等領域上，引入各方面的思想如自由化及異化等理論，認為會挑起市民對社會主義制度及共產黨的不滿，故主張加以批判和禁止。王忍之曾經指出：

「從一九七九年春……這整整十年中，自由化思潮時起時伏，但黨的趨勢是愈演愈烈，從提出一個又一個錯誤的、反動的觀點，到意識形態的許多領域裡，都形成一套相當完整的思想體系；從以理論學術形成的面目出現，到直接地公開地反對四項基本原則，鼓吹實行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鼓吹全盤西化……否定我們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註二十六)

由於這些主管意識形態的幹部對於改革開放帶來的鼓勵社會多元化及削弱黨權的思想持一種否定態度，故在很多反自由化政治運動如八三年的「反對精神污染」、八七年初隨著胡耀邦下台的「反自由化運動」及八九年六四事件後的「反和平演變」等，他們都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

此外，由於持上述觀點的幹部對經濟改革開放的態度十分慎重，認為向資本主義傾斜的經濟改革務必帶來資產階級自由化、挑戰四項原則。故此，鄧力群曾指出：「我們實行的開放政策，是建立在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上的。我們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是建立在堅持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基礎之上的。」(註二十七)在這背景下，他們對陳雲提倡的穩健

發展方針及重視端正黨風的觀點甚為贊同，並向之靠攏，希望能對市場改革觀點作出抗衡。

（3）政治較開明的市場改革觀點——趙紫陽、胡耀邦

與其他中共黨員一樣，強調黨的領導，樹立黨的權威、支持「新權威主義」是胡耀邦及趙紫陽等的一貫觀點，與其他黨內高幹所不同的，是胡耀邦及趙紫陽對於政經改革及對外開放的步伐、程度與深度往往較為徹底。值得注意的是胡趙皆由鄧小平的支持而上台，其經濟改革政策亦得到鄧的鼓勵。雖然胡趙提倡的政治改革也是呼應鄧小平政改的指示，但由於他們認為群眾運動或獨立於黨領導的利益團體及壓力團體的出現不一定會導致混亂，故他們容忍反對呼聲的程度比鄧更大，而最終與中央主流傾向發生矛盾，分別在八七及八九民運中下台。然而，隨著經濟改革持續深化，以及受社會的影響，與胡趙持較相同觀點的官員肯定會再出現。雖然有關經濟方面的政策多由趙紫陽提出，胡耀邦一向較重視黨務，但從總的來說，胡趙及其支持者的主要觀點如下：

1. 推動朝向西方市場經濟模式的經改方向。與穩進派「大計劃、小自由」之觀點不同，趙紫陽等較強調市場的作用，在七五計劃建議中，他曾指出「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進一步減少國家分配調撥生產資料的種類和數量，擴大生產資料市場，縮小指令性計劃範圍，擴大指導性計劃範圍。」^(註二十八)「改革現行計劃體制，就要有步驟地適當縮小指令性計劃的範圍，適當擴大指導性計劃和市場調節的範圍。」^(註二十九)在八七年十三大報告有關經改部分中，趙紫陽更提出「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觀點，提出改革任務在於建立一套宏觀經濟控制機制。^(註三十)用國家計劃、政策調節市場的供求關係，從而影響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十三大這個觀點明確指出，國家計劃一般不會直接下達到企業，故應以指導性計劃為主，側重中、長期計劃，而計劃內容是粗線條和有彈性的。總的來說，趙紫陽等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在經濟

發展策略上，鼓勵市場化及非國有化，要求建立全面的商品和生產要素市場，鼓勵個體及合營企業，推行國營企業出售、出租、股份制以及准許外資大幅進入等。這種提法與陳雲提倡的國家建設必須全國一盤棋，按計劃辦事（註三十一）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方針，在朝向市場方向的改革幅度上有顯著之分別。

2. 在對外開放及捲入西方世界經濟體系的程度上，政治較開明的市場改革觀點比穩進路線所強調的自力更生有明顯的區別。十三大閉幕不久，趙紫陽便兩訪上海、浙江及福建等沿海省份，鼓吹國際大循環的沿海經濟發展戰略，鼓勵沿海省市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加工業，以「大進大出」（大量進口原材料，加工後出口製成品）的策略進行。
3. 對政治改革採取較開明的態度。趙紫陽等由於在具體經濟領域上經常要衝破種種理論框框，尋求突破，故使他們較易接受各種不同的社會政治主張。具體經濟改革歷程使這批市場改革者更明瞭政改的重要，他們認為不貫徹黨政分開、權力下放及解決官僚主義阻礙改革的情況，將使改革不能順利執行。為發展經濟，調動各種積極因素，他們亦重視發展鄉鎮企業、私人經濟、加速引進外資及開放等。由於經常要接受新事物，這批改革者對一些突破傳統馬列理論及甚至在某程度上挑戰黨權、要求成立獨立於黨控制的團體的觀點，採取較為諒解及容忍的態度。

基於此，趙紫陽等對八七年初胡耀邦下台後的「反自由化」活動進行抵制，趙並於八六、八七年大力鼓吹政制改革，以及在八九民運期間採取與大部分堅持黨權威不容侵犯者如鄧小平、楊尚昆等不同立場。趙認為可接受獨立於黨領導的民間團體，以解決當時全民示威的局面。基於學潮愈搞愈大，不受控制，趙被批評在危機、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錯誤，楊尚昆在中央軍委緊急擴大會議中指出趙紫陽與胡耀邦「不反對自由化性質是一樣的。」（註三十二）

雖然胡耀邦與趙紫陽都是由於反自由化不力而下台，故他們被視為

中共黨內的民主開明派，然而，在分析胡耀邦與趙紫陽的觀點及關係時，下列兩點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趙紫陽與鄧小平一樣，極重視黨的領導。此外，趙紫陽更被視為支持「新權威主義」理論，在一九八九年三月六日，趙紫陽向鄧小平指出：

「國際上有一種新權威主義理論……這個理論的要點是：在落後國家實現現代化要有一個過程；這個過程中，需要權威的強人政治作為推動力，而不能採用西方民主。」

鄧小平回應道：

「我就是這個主張。具體的提法可以再斟酌，再考慮」(註三十三)

然而，這並不表示趙紫陽不贊成民主，據美國出版的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回憶錄，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他與趙會見時，趙曾提出：「一黨統治能保證民主發展嗎？它到底能不能有效控制住社會中的不良現象？扼制黨和政府中的腐敗行為」，戈氏進而指出：「趙紫陽是這樣一種思路，中國共產黨準備在黨統治的前提下推行政治體制改革，讓老百姓廣泛地享受民主權力。他得出結論說：如果這條路行不通，那麼多黨制的問題是不可避免的。」(註三十四)

第二，趙紫陽與胡耀邦間亦有一定之矛盾，曾任職於中共中央宣傳部的阮銘曾指出趙紫陽比較「主張中央集權，反對胡耀邦的分權主張。」陳雲批評胡耀邦時常說的一句話是：「我與紫陽說的是北京話，你說的是地方話。」

此外，阮銘等更指出在一九八四年底，趙紫陽更寫信予鄧小平與陳雲，「表示他不能與胡耀邦合作共事，要求中央解決胡耀邦問題，也就是改變胡耀邦的總書記職務。」(註三十五)

再者、在八六年底，當北京發生嚴重學潮的時刻，鄧小平召集少數領導人開會談領導幹部年輕化、學潮問題，同時譴責「資產階級自由化」，「在這個小會上，趙紫陽直指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註三十六)

(4) 堅持兩個基本點的實用改革觀點——鄧小平、江澤民、楊尚昆、王震等

鄧小平及江澤民等一向強調改革及對外開放，在開放特區、引進外資、建立西方式市場機制，以及改造國有制各方面基本上與市場改革觀點無異，一九八八年的關稅價關就是由他決定及鼓勵的。在九二年初南巡期間，鄧小平針對六四後執行意識形態幹部門所經常強調的反和平演變、問改革是姓社或姓資等問題，作出實用主義的回答，明確指出某項改革是否符合社會主義，主要是看改革是否有利於生產力、綜合國力及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等。在政治改革方面，鄧小平等亦十分理解黨政分家、下放權力、改革機構等政治改革對經濟改革的重要性，雖然鄧的政改範圍偏重於行政效率方面的改進，但堅持老幹部退休、強化人大及政協的權力、放鬆輿論控制、加強法制建設、容許縣級以下直選人大代表及差額選舉等，無疑加強了改革十九年整個社會的民主自由氣氛。

然而，鄧小平與開明的市場改革觀點所不同的，是他十分執著四項堅持中共產黨領導的原則。鄧小平可以接受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但對一些堅持要脫離黨控制而成立的壓力或利益團體，如獨立學生組織及工會等，則堅決反對。鄧小平認為，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對黨的領導，壓力團體的成立將促使反對黨出現，若然黨的權威被挑戰，則整個社會就會缺乏整合力量，在體制轉換、經濟起飛而引發的重重經濟政治危機衝擊下，國家將陷於分裂及內戰，在不穩定的社會環境下四化願望一定落空。然而，在另一方面，鄧等又對改革開放路線大加支持，他在改革十九年期間曾於八四及九二年兩次南巡，隨即引起八四年及九二年的改革高潮。八九年六四事件後幾天，在社會局勢極為緊張的情況下，鄧小平於六月九日接見戒嚴部隊，發表講話，清醒地指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政策沒有錯，要繼續堅持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堅持不要把中國變成一個封閉國家，提出「要說不夠，就是改革開放得還不夠」^(註三十七)等支持改革開放的話。

楊尚昆、王震等與鄧共事多年的黨內元老也是持與鄧類似的觀點，

拿王震來說，他是外界形容的「左王」，在八三年清除污染運動中，經常發表講話，強調要勇敢地站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前列，引導廣大群眾堅信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註三十八）在八六年胡耀邦下台的時刻，王震到中央黨校進行一次著名的演講，說話時揮拳把擴音機打斷了，他說：「你們知道我是誰嗎？我就是關帝廟裡關雲長身邊那個拿大刀的周倉。你不是有三百萬大學生嗎？我有三百萬解放軍，我要砍他媽的一批腦袋。甚麼方勵之、巴金，都是民族敗類，社會渣滓。」（註三十九）然而，王震又熱情地支持對外改革開放，在八四年與鄧小平及楊尚昆南巡，肯定特區政策，並對成立珠海特區作出很大的支持與貢獻。

二 中共黨內不同觀點之分析

基於上述討論，可以得到下列幾點啟示：

- (1) 簡單的「保守」、「改革」二分法不能全面描繪中共內的不同意見與傾向。總括來說，黨內對「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有著共同的認識，而鄧小平是此政策的最重要制定者，江澤民則一向堅守此政策，他們極力平衡改革開放與四項堅持兩者所帶來的衝突，盡量做到政治上維護黨權威，推行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維護社會穩定，並在經濟上敢闖開放，希望實行類似東南亞發展中國家政制與經濟發展的模式。可以說，由於各持不同觀點的人都支持鄧小平的政策，故此，中央內未必可劃分出明顯之派系。
- (2) 黨內不同傾向，可大概分為一、穩進發展；二、重視黨權威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幹部；三、政治開明的市場取向改革；四、改革開放與黨權並重的實用主義四種。一般來說，不同觀點中的差距主要是執行四項堅持及改革開放的程度問題，而相互的爭持亦非你死我活的鬥爭，然而，在某些重大事件上，不同觀點的對立亦顯得尖銳，例如八七年胡耀邦下台，八九年民運期間部分元老批評趙紫陽反對戒嚴而導致中央出現兩個司令部，造成黨內嚴重分歧。（註四十）但畢竟由於經濟開放的實惠已使中央領導層更重視經濟建設，意識

形態之爭相對讓位，例如胡耀邦下台後仍得保中央政治局常委職務，趙紫陽於六四後亦未遭受如文革期間般的折磨對待，在另一方面，一些重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幹部雖然經常批評鄧小平的經改路線，但亦沒有遭受批判。

- (3) 尤其值得留意的，是在江澤民主持中央領導工作後，上述的觀點分歧明顯減少，各中央領導人工作務實，十分重視專家的意見，在充分諮詢及研究的基礎上形成共認，推行改革。
- (4) 就黨內不同的意見，可以概括有下列幾點：
 1. 鄧小平與陳雲在黨權問題上意見基本一致，雖然鄧小平亦同意鄧力群、胡喬木等強調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但鄧卻十分注意分寸，不希望意識形態如「反精神污染」、「反和平演變」等造成過大束縛，影響開放步伐。
 2. 在經濟領域方面，鄧小平的改革思想與政治開明的市場改革思想一致，而與陳雲的漸進、大計劃、小自由觀點及對外開放較保留的觀點有明顯之不同，而形成在經濟領域上鄧陳多次交鋒。
 3. 由於陳雲經濟觀點趨向穩重，再加上其堅持黨風等理想，使他成為強調意識形態幹部所靠攏的對象，用以抗衡市場改革及較大程度的政治開放。
 4. 以趙紫陽、胡耀邦為代表的政治開明路線在某些關鍵時刻無可避免地和鄧小平、陳雲、鄧力群和胡喬木等發生衝突，而這亦是兩位總書記下台的原因。

第四節 民間運動的興起

一 民間運動興起的背景

在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總路線下，十九年改革帶來豐碩的成果，人民生活改善、解除思想控制、人民言論相對開放、半市場化經濟確立、對外開放加促等，這幾點是十分值得肯定的。在另一方面，除了

客觀資源制約的限制外，十九年改革亦帶來一定的負面因素，如企改不徹底及宏觀調控機制失靈而導致的經濟波動、國民經濟結構比例失衡、社會貧富差距不合理擴大、教育經費不能追上需要、意識形態崩潰、一切向錢看，以及崇外思想泛濫，國民意識薄弱等。更為致命的缺點，就是黨權仍不受有效監察，貪污腐化嚴重，部分在文革期間受批判而在改革期間復出的官員黨幹，他們沉醉於保障自身的權力，由於經過文革衝擊，他們了解失去權力及種種特權的滋味，這部分人士對中央高層一些影響到其權力的改革措施如黨政分家、下放權力、精簡機構、引入競爭機制及優化勞動組合(即解僱企業冗員)等，有著自然的抵制情緒，出現「兩頭熱，中間冷」的現象，成為進一步改革的阻力。

由於四項原則之變革模式未能容許改革挑戰黨權，使民主開放幅度受著一定之制約。在一黨專政體制以及無可避免的官僚權力政治下引進市場機制，大量造就了官倒的機會，使政治權力轉化為資本，「貪污腐敗……形成某些類型『官僚資本主義變種』的新階級」，(註四十一)在半市場經濟下薪權營私不單加劇貧富不均，通脹惡化，更使發展為現代形態的、真正理性化的市場經濟不易出現，而這亦成為十九年間要求限制黨權、推行民主化之社會運動的客觀基礎。

二 幾次較大規模的民間運動

在改革十九年間，要求民主的呼聲不斷，這包括：

(1) 從反「凡之派」到「北京之春」民主運動

這段期間由於受到天安門平反、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凡是派下台、鄧小平政改文章〈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之鼓舞及縣級以下直選制度的推行，使民間尤其是大學出現了參選熱潮，而文藝界亦出版了尖銳批判政治現狀的傷痕文學及電影劇本〈苦戀〉，人大政協亦躍躍地對官僚現象作出猛烈批判。在八零年初，中共開始起草〈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總結建國經驗中，不少幹部提出否定毛澤東思

想，這對中國正在轉變而意識形態開始鬆散的形勢，極可能帶來更多不穩定因素。在上述種種衝擊下，加上波蘭團結工會運動的啟示，鄧小平感覺民間及黨內的回應有可能使中國出現混亂，為維護黨的權威，在八零年底八一年初，他開始禁止民刊出版，取締民間組織並對〈苦戀〉開展批判，而他亦肯定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這階段的民主運動由於官方的取締而正式結束。

(2) 重視「雙百」方針到「反精神污染」

八二年下旬中共十二大召開，在官方開放言論如尊重知識分子、重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下，中國大陸一些高級知識分子及教育文化界的開明幹部如周揚、王若水及于浩成等，開展了對社會主義異化問題的討論，由於這些理論有著正統馬克思主義著作為依據，並挑戰著黨的權威，超過官方的容忍界限，而鄧小平及一些強調黨權和掌管意識形態的幹部如鄧力群、熊復及賀敬之等亦開展了對這些「精神污染」理論進行批評。然而，由於胡耀邦及趙紫陽努力，使反精神污染的運動只進行了八十三天。

(3) 政治改革與胡耀邦下台

一九八六年中開始，隨著經改的深入帶來了政制改革的呼聲，在鄧小平、胡耀邦及萬里等中央領導的支持下，政治改革提上日程，引發思想大解放及民主辦學的推行，大陸的思想學術界更出現了寬鬆、和諧的環境，很多高級知識分子如方勵之、溫元凱、蘇紹智、李澤厚、劉賓雁及王若望等發表很多評論時局的言論。在開放環境下，刺激著各地學生爭取民主的要求，形成八六年底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在此情況下，方勵之、王若望及劉賓雁由於曾發表尖銳批評黨領導的言論，而被鄧小平勒令開除出黨，開明的胡耀邦也因為對學運及之前的大膽言論採取容忍的態度被批判而黯然下台，而中共亦開展反自由化運動。自由化運動由於受到代總書記趙紫陽的限制，鄧小平亦不希望此政治震盪衝擊太大，故對反自由化的措施作出嚴格的限制，不致擴大為另一次政治運動。

踏入八七年上旬，社會上再湧現開放寬鬆氣氛，以迎接黨十三大的召開。十三大肯定了「社會主義初階理論」，強調政治、經濟及各領域的改革，並決定以「改革總攬全局。」

（4）胡耀邦去世到八九年「六四事件」

由於寬鬆的政治環境，八八年的人大會議又呈現活潑氣氛，代表紛紛對教育經費不足、通脹、分配不平及官倒等問題提出尖銳的批評。雖然八八年下旬關物價關失敗，社會上還是瀰漫著較為活躍開放的氣氛，直至八九年四月胡耀邦的突然病逝，刺激了學運的發展，其後更爆發多次百萬人上街的遊行示威。由於部分學生及工人要求成立不再受制於黨的獨立團體，超出中央的界限而被取締，而黨內亦出現了對處理學運態度的嚴重分歧，而最終導致較開明的趙紫陽、胡啟立等下台。

三 改革十九年民間運動的幾點分析

（1）民間運動出現的社會基礎

改革十九年間的民主改革思想及運動連續出現，反映其發展有濃厚的社會經濟基礎。首先是改革十九年間的種種負面因素，使群眾深深感受到官僚主義的禍害，再加上連年經濟失控、通貨膨脹及分配不公等，也增加群眾對政府的抗拒。值得留意的是中國的改革是從經濟領域開始，中國領導人希望通過經濟改革帶來的實惠使群眾認同中共的統治，從而保持文革以來黨領導的權威性。在七九至八四期間的放權讓利改革中，打破了以往的經濟束縛，使生產力大大的爆發出來，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在這幾年間基本上沒有較大規模的民間運動，人民都期望共產黨能帶領國家推行更深一步的改革。然而，從八四年底開始，隨著農業生產下降及深入改革面對的深層難題，導致經濟連年反覆，通脹、緊縮、官倒及分配不公的情況日趨嚴重，再加上教育經費連年不足，影響學生及知識分子的生活，這群思想敏銳、對社會批判性較強的人遂成為爭取民主的先鋒，使民間運動在八五年開始便以較大規模的市民運動形式蓬

勃地湧現。

除了對社會現況不滿之外，十九年改革本身也成為刺激民運發展的基礎。西方民主自由意識隨經濟改革開放而轉入中國，而市場經濟帶來的競爭概念，亦使社會氣氛更為活躍，再加上經濟結構多元化的發展帶來較獨立的經濟階級如個體戶、私營企業及其他專業人士等，這些人在某程度上無需依附國營經濟而生存，而他們的利益亦與政府有一定的不協調。據西方發達國家及部分發展中國家的經驗，經濟現代化帶來的城市化、教育普及、傳媒活躍、法制健全、各個經濟集團及專業階層興起以及其不甘受制於官僚而追求自身利益發展等，皆會促進利益團體和壓力團體的發展，可以說正是改革開放本身帶來群眾對民主的要求，衝擊著黨的絕對領導權威。

此外，在十九年間的民主運動中，可以看見基層力量與官方的政治改革有著微妙的聯繫。官方在經改過程中，受到龐大官僚系統的阻力，上層的改革分子也明瞭要進一步解放生產，非要解決權力過份集中、官僚主義、黨政不分、機構臃腫及貪污腐化等問題，甚至可以說在某程度上正是官方的鼓勵使積聚起來的民主呼聲熱情地爆發出來。七八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引來民主牆及民刊湧現；八二年的思想解放引發上層知識分子對社會主義異化論的探討；八六年間由經改引發的上層政治改革呼聲帶來八六年底的言論假期及開放的人大、政協會議，而社會上較寬鬆的氣氛更刺激著學運發展；八九年中央高層的分歧亦促使群眾運動進一步擴大。這種「上下結合」的民主發展帶來甚大的威力，可以說是改革開放的自然結果，這情況在將來亦會因應某些歷史時刻而再度出現。

(2) 民主運動未能動搖中共統治的原因

改革十九年間的民運雖曾對中共產生一定的威脅，但與東歐於八九年的變革相比，卻顯得十分脆弱，正如鄧小平在八六年底指出「學生鬧事，大事出不了。」(註四十二)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國根本沒有羅馬尼亞、波蘭社會般那樣異常激化之矛盾。八十年代的改革使人民生活帶來很大改善，尤其是佔人

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更是改革的受惠者，再加上其傳統保守意識形態及安於現狀的心態更使其成為穩定中國局勢的重要因素。經濟的改革，帶來活躍經濟形勢及社會多元化發展，人民雖然對官僚特權深痛惡絕，但一般來說始終對鄧小平及江澤民等中共領袖抱有一定的信心，並不認為共產黨完全無可救藥，反而希望通過由下而上的群眾運動為上層的改革者剷除改革的障礙。此外，人民也深切明白中共的地位根本無可取代，與東歐共黨倚靠蘇聯軍隊支持上台不同，中共握有忠心於黨的解放軍，中共亦是經過千般鬥爭由人民擁護而上台執政。

此外，在數次群眾運動中，中國的民間組織也沒有類似波蘭教會或獨立工會那類有組織及受外國支持之政治力量，再加上民運的主體主要是城市的知識分子，在主觀上他們的行動是針對黨缺乏監察而產生貪污腐敗現象，根本沒有取締中共的意思，極其量只是希望能成立一些在中共控制之外的獨立民間團體。民運主體在客觀上反映了個體戶、私營企業家及部分新湧現的專業人士的利益，但基本來說，他們的群眾基礎只局限於城市內部分的市民階層，不但農民沒有被發動起來，連工人的響應也不見得熱烈。在國營企業佔主導的經濟環境下，企業工人會由於經濟利益（家庭收入及企業帶來的種種福利）而不敢對知識分子的行動作出明確的支持。另外，工人的心情也是矛盾的，他們雖對官倒及通脹抱怨，但亦對改革派徹底的改革而帶來的容許企業破產及優化勞動組織（即可辭冗員）產生很大的恐懼，砸碎鐵飯碗不單帶來失業，更會使其喪失種種福利如房屋、子女教育及退休金等。故此這部分工人實對改革出現某程度的抵觸情緒。

再者，中國開明的改革力量始終服從黨紀，他們不願亦不能對鄧小平作出真正挑戰。開明領導如胡耀邦及趙紫陽等與其他領導人一樣，皆堅持黨的領導，他們所不同的只是對群眾運動較為理解，對民間出現利益或壓力團體採取較容忍的態度，故他們皆希望以對話方式解決矛盾，並沒有希望借助群眾力量來動搖黨的統治。況且，胡耀邦與趙紫陽都是由鄧小平支持才得以擔任總書記，他們的實力根本無從與握有軍權的鄧小平相比。在此情況下，群眾運動無法像蘇聯般有戈爾巴喬夫等強人的配合，失敗乃無可避免。

(3) 民間與官方鬥爭的焦點

十九年民運出現了很多精闢的思想，從不同角度論證民主化的需要，這包括：

1. 從馬克思的原著如論巴黎公社及異化論等，引伸社會主義出現異化現象的可能性，以及提出應推行民主政制及限制特權等。主要人物有王希哲、徐文立及王若水等；
2. 西方自由民主派。主要代表人物為魏京生及方勵之，他們主張學習西方的自由民主化，警惕中共改革的局限，慎防新獨裁者的出現，並強調民主應要自己爭取，不能由上層恩賜；
3. 文化啟蒙主義者。這批人從批判中國文化中的封建主義出發，主張吸收西方自由、人權及科學等文化，對中國文化及國民性格進行再造，以建立堅固的民主基礎，代表者有李洪林、溫元凱、《河殤》的作者蘇曉康及王魯湘等；
4. 經改引發政改的理論。不少接近中央領導人的智囊團成員皆從經改深入而面對的困難，提出權力下放、黨政分家及擴大人大、政協以至半民間團體如工會、農會、青年組織的權力，以清除經改觸動官僚利益而面對的障礙；
5. 以民主改革改善民生及社會問題的理想。一般群眾皆希望民主能改變社會腐敗現象，在八九年五四大遊行時，學生發表了五四宣言，指出：「我們促請政府加快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採取切實措施，保障憲法所賦予人民的各項權利得到保障。實現新聞法、允許民間辦報、剷除貪污、加強廉政建設、重視教育、重視知識、科學立國。」

雖然上述各類思想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但他們對中國黨權過大、缺乏監察而造成的特權貪污現象作出嚴厲的批判，提出人民監督、民間辦報、成立獨立於黨控制外的民間團體以對黨權作出制衡等意見。

此外，還有一派是新權威主義者。在改革於八五年開始面對重重困難期間，持這觀點的人從西方學者亨廷頓研究第三世界政治發展的經濟出

發，提出中國應出現開明的強人政治，使中國盡快完成政經改革，從而奠定強大基礎，為民主政治鋪路。其代表人物為張炳九。而新權威主義亦得到趙紫陽支持。

（4）民運人士採取的不同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民運人士為爭取上述目標而採取的主要三種不同策略（這些策略不同的部分原因是由於有些民主人士所處的環境而造成的）：

第一是官方改革派。這些主要是中央智囊團成員或一些與高層領導人較接近的高級知識分子，他們以實務的態度為改革出謀劃策，希望通過領導人的支持而推行某些由上而下的民主改革。代表人物為陳一諮、蘇紹智及嚴家其等。

其次為堅守民間立場，但亦支持黨內民主改革者的「上下結合」爭取策略，這些人士與黨內民主改革者有某程度之默契（雖然未必有組織上的聯繫），他們採取邊緣鬥爭策略，在官方容許的範圍內宣傳自己的觀點，試探、衝擊，並試圖突破官方的禁區，他們工作時步步為營，有時更以正統馬列主義理論為其爭取民主的行動辯護。由於他們的爭取策略較為慎重穩健，又能引經據典，往往能爭取廣大市民更大的認同，而被官方視為更危險的分子，在鎮壓後這批人往往被判重刑。採這策略的代表人物有王希哲、徐文立、王軍濤及陳子明等。

第三是堅守民間立場，但拒絕與黨內任何人士、包括開明的民主改革人士作出任何配合，持這策略的人士強調其團體的獨立性，對黨內改革人士亦失卻信心，他們採取的都是較激進的不妥協策略，故可視為民間運動的激進分子，代表人物包括魏京生、何求及八九年學運期間不少學運領袖等。

無論民運人士採取的策略及理論觀點有所不同，但其爭取的目標總是一致，就是針對黨權過大而要求民主化，迫使官方容忍更大幅度的言論自由、准許成立獨立於黨控制的民間團體。從官方看來，這無疑是挑戰黨的權威，多元化民間團體的存在容易為成立反對派創造基礎，在中

國於變革期間面臨的各類社會經濟危機，再加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干預中國內政的企圖，使中國政府對民間呼聲十分警惕，認為脫離黨領導的開放會帶來無政府狀態，使國家出現混亂，破壞穩定的政治環境。鄧小平曾對美國總統布殊指出：「中國人多，各有各的看法。如果今天這個示威，明天那個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會有示威遊行，那麼就根本談不上搞經濟建設了。」^(註四十三)由於黨權成為雙方分歧的焦點，官方的鎮壓便無可避免。

可以預期，在黨權、軍權相對高度集中的情況下，中國民間運動的發展將面臨很大的限制。然而，隨著經濟繼續改革開放，西方自由民主意識不斷傳入，經濟結構多元化帶來新的社會分層與不同利益取向的團體湧現，再加上經改過程帶來政改的客觀需要，將使黨內高層也將出現更多同情民主的人士，在長征老將逐步退出政治舞台後，通過某些政治社會契機及人民的爭取，可以預見更大程度的開放與民主將再出現。實際上中國領導人亦感受到，推行民主，使權力繼承問題制度化及法律化，使社會不滿通過有效渠道宣洩，將使政府能更早的緩和社會各項矛盾，維持社會穩定，使中國得以健康的發展，這就形成了江澤民推行人大、政協監督行權力的政策，加強法治，以及容許傳播媒介有更大的自由度的原因。

註 釋

- 註 一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載《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上冊，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第345-346頁
- 註 二 鄧小平〈改革步子要加快〉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載《堅持改革、開放、搞活經濟——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有關重要文獻摘編》，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第428頁
- 註 三 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三聯書店香港分店，一九八五年，第34頁
- 註 四 鄧小平〈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載《鄧小平同志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人民出版社，一九八

- 九年，第122頁
- 註五 鄧小平〈綱堅持四項原則〉載《鄧小平文選》，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150-151頁
- 註六 鄧小平〈關於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載同註五，第346頁。
- 註七 同註六，第346頁
- 註八 〈趙紫陽在春節團拜會上的談話〉《大公報》，一九八七年二月一日
- 註九 翁杰明、張西明等主編《與總書記談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22頁
- 註十 同上註，第32頁
- 註十一 鄧小平〈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302頁
- 註十二 本書編寫組《精神文明建設的歷史文獻》，新華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6頁
- 註十三 《文匯報》〈思想障礙須進一步打破〉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 註十四 《大公報》〈防左——鮮明的主旋律〉一九九二年四月三日
- 註十五 胡耀邦〈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一九八二年九月十日
- 註十六 趙紫陽〈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載《十三大以來》一九九一年，第16頁
- 註十七 趙紫陽〈當前的經濟形勢和今後經濟建設的方針〉載同註二，第361頁
- 註十八 千家駒〈我所知道的陳雲〉載《去國憂思錄》，天地圖書有限公司，一九九一年，5經321頁
- 註十九 陳雲〈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載《陳雲文選》一九五六至一九五八，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304頁
- 註二十 陳雲〈悼念李先念同志〉載《陳雲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379頁
- 註二十一 同註十五
- 註二十二 陳雲〈實現黨的十二大制定的戰略目標的若干問題〉載同註十九
- 註二十三 陳雲〈帝國主義本沒有改變〉載《陳雲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370頁

- 註二十四 陳雲〈要反對動亂〉載同上註，第369-369頁
- 註二十五 袁木〈精神文明建設和反對自由化〉載《反自由化文集》第一輯，重慶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537頁
- 註二十六 王忍之〈關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載《反自由化文集》第二輯，重慶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484頁
- 註二十七 鄧力群〈我們的旗幟是共產主義〉載同註二十五，第50頁
- 註二十八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七五計劃的建議〉
- 註二十九 〈中共中央關於經濟改革的決定〉，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
- 註三十 同註十六
- 註三十一 陳雲〈經濟建設的幾個重要方針〉載同註十九，第277頁
- 註三十二 楊尚昆〈在中央軍委緊急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載《血沃中華》，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出版，一九八九年，第91頁
- 註三十三 香港中通社北京八九年四月七日電
- 註三十四 《戈爾巴喬夫回憶》錄，美國雙日(Double Day)出版社出版，轉引自香港《開放》雜誌，一九九七年三月
- 註三十五 阮銘《鄧小平帝國》，時報出版，一九九二年，第188頁
- 註三十六 吳江《十年的路》，鏡報文化企業出版，一九九五年，第210頁
- 註三十七 鄧小平〈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載同註十六，第540頁
- 註三十八 王震〈高舉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旗幟，防止和清除思想戰線精神污染〉載《共和國風雲四十年》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1020頁
- 註三十九 阮銘《歷史轉折點上的胡耀邦》，八方文化企業公司，一九九一年，第74頁
- 註四十 同註二十六
- 註四十一 魯凡之〈改革失敗與強硬路線〉，香港明報，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 註四十二 鄧小平〈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 註四十三 〈鄧小平會見布殊的談話〉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六日